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下）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阿多尼S61000

法 兰 西 的 特 性

人 与 物(下)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 良 张泽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 下/(法)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SBN 7-100-01933-8

I. 法… I. ①布… ②顾… ③张… III. ①法国-民族-研究②法兰西人-研究 IV. K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270 号

FĀLÁN XĪ DE TÈXÌNG

法兰西的特性

人与物(下)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泽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33-8/K·455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60 千

印数 10 000 册 印张 15 1/4

定价: 20.60 元

目 录

第二部分 直到 20 世纪为止的“农民经济”

第三章 乡村是经济基础	1
一 法国的“农民经济”延续了多少个世纪	4
直到今天	4
农民经济在 11 世纪终告确立	7
二 整体特征	13
自然力	13
季节的节奏	17
锹、锄、镢、犁	22
一项出人意外的计划	26
一系列例子	27
作物的种植比例	30
作物的种植比例(续)	35
新作物代替旧作物	39
在休闲地上	46
新作物代替旧作物(续):人工草场	48
革新在法国总是姗姗来迟	54
三 牲畜、葡萄、小麦和森林	57
不忘整体	58
1817 年的情形	59
往昔的牲畜饲养的第一条规律:牲畜自己找食	65
第二条规律:季节性圈养和野外放牧	69

另一条规律:劳动分工导致交换、出售和转销·····	72
季节性的易地放牧相当少见·····	75
科学饲养方法的难产·····	77
法国过去缺少马匹应如何解释·····	80
畜牧业是项副业·····	81
身份高贵的葡萄·····	83
葡萄种植的推广·····	86
葡萄种植的平民化·····	91
酿酒工业·····	95
法国三大葡萄产区·····	98
最后谈谈小麦及谷物·····	102
苛刻的要求·····	104
轮作·····	106
法兰西至少可一分为三·····	113
追索历史过程·····	116
从麦到面包·····	122
法国人吃面包·····	126
白面包·····	127
谷物和国民收入·····	129
四 算一笔总账是否可能·····	131
法兰西能不能做到自给自足·····	132
缺粮、荒年、饥馑、骚乱和暴动·····	142
农民起义和麦骚动·····	145
1680年以前的暴动·····	146
1680年以后·····	149
五 毕竟取得不小的进步·····	158
能否确定变化的时间·····	158
普遍的进步及其挫折·····	159
技术先行·····	162

第四章 上层建筑	168
一 首先看城市	170
一条古老的和暂时的浮动线:10%	170
城市的地位不断壮大	174
城市与国王	176
城市网的确定	178
设置城市的地点	180
人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184
城市与法国经济	189
关于城市人口的比重	197
城市与法国经济(续完)	199
以里昂为例	202
以里尔为例	205
其他的责任因素	208
二 流通与结构	212
大流通和小流通	213
通衢大道	217
水路是第三种交通途径	221
陆路胜过水路	227
整体:国家的作用	230
流通总量	236
铁路建设的前后	238
拉后腿的旧事物	244
三 工业与工业化	249
“工业”一词	249
采用科学的术语	253
审慎和保留	255
分散的制造厂	258
手工工场或最初的工业集中	262

大工业与新能源	266
技术革新	270
知其然,再问其所以然	274
反复的波动	278
结果是小企业仍继续存在	282
四 商业始终提前点火起动	288
以经商为业的人	290
批发商和远程贸易	295
赢家占少数	300
关于大商业的见证	302
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324
五 阶梯的最高一级:资本主义	327
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	328
休眠资本的重力	330
金属货币:储备和流通	336
王公的货币	340
货币的内部交换	343
纵向兑换	351
纸币慢慢才露头	353
汇票的作用	358
汇票是否促进了欧洲内部的联系	361
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开端	371
金融和银行:错过一次机会	379
金融和银行(续完)	385
从 1789 年至 1848 年	388
少数人的重要性	397
总结论	403
多样性和单一性	403
世界是个不容忘却的干扰因素	405

法国农民经济的剧变	407
长时段	411
编辑后记	412
注释	413

图表目录

1807—1810 年和 1814—1819 年法国各省 遭灾总数一览表	16
1806 至 1945 年间乡村人口和牲畜的数量	32
土豆在欧洲	44
法国 1800 至 1950 年的土豆产量	47
1852 至 1882 年间休耕地的减少	52
1818 年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益	60
罗马统治期间和法兰克王朝期间高卢的葡 萄种植和葡萄酒贸易	89
阿基坦地区 13 世纪向英格兰出口葡萄酒 的城镇	90
法国西南部乡村的种植布局(18 世纪)	92
17 和 18 世纪巴黎廉价葡萄酒的供应	96
根瘤蚜虫害在法国的蔓延	103
18 世纪耕畜的地理分布	110
步犁和轮犁(1852 年)	112
19 世纪初法国的土地轮作	117
18 世纪欧洲俄罗斯地区的土地制度	120
17 世纪末年的奶酪进口	135
1810—1911 年法国的谷物产量、对外贸易 和平均价格	136
运抵马赛的小麦,1845 年 11 月 5 日	138
17 世纪法国的平民暴动	150

小麦产量的增加	164
新作物的不均衡分布(1787年)	166
1806—1954年间的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	171
各省城市人口的比例千差万别(1806年)	173
河流吸引城市的指数	183
法国在1841年依旧是交易会星罗棋布	185
西南部若干城市里的外乡人	190
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192
法国及其欧洲邻国城市人口的比例(1800— 1980年)	198
1820年后里昂四周乡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204
1781至1938年间的工农业产值	210
上多菲内地区伊泽尔省1787年的交通要道	214
分省道路密度图(1820年,缺损的路段除外)	218
法兰西的幅员辽阔,使建立民族市场遇到 重重困难	224
1632年时的驿道	231
1797年时的驿道	233
1785至193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商品生产量	235
1820年的公路干线网	238
铁路的诞生	243
运输革命与社会变迁	247
特鲁瓦稽察所下属的纺织品制造商(1746年)	260
充满活力的工业、渐进中的工业和日趋衰 落的工业	281
法国经济地域的水平差异(1830年)	286
圣马洛与南海贸易的短周期	310
图尔里佛的市价(以金银为基准的芽月法 郎计算)	345

货币贬值在欧洲各地是普遍现象	347
1820 至 1895 年间银行券和金属货币在货币 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357
汇票的流通渠道(1385—1410 年)	368
汇票金三角以及世界的货币运动	370

第二部分

直到 20 世纪为止 的“农民经济”

第三章 乡村是经济基础

本章及下一章将介绍对往昔法国经济的长时段观察。我将从公元 1000 年开始注视其命运，在叙述清楚、足以提出并可能抓住重大问题的条件下，干脆就从 1450 年开始。但是，即使缩短了时间跨度，这段时间还是长得惊人。更何况，我们必须挖掘经济史的深层。鉴于上述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原因，给予法国乡村以优先地位，从乡村出发，并根据乡村的作用，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判断，这是合乎逻辑的。读者从两章的标题便可一眼看出。我在叙述中将经常使用“农民经济”一词，它不属于我的发明。我是从达尼埃尔·托尔内 1964 年 5—6 月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上照搬过来的¹，他在这篇至关重要的、独辟蹊径的文章里，曾试图撇除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套话，这类空洞无物的套话曾风行一时，在书面论述中更屡见不鲜。

当然，他并不想用“农民经济”一词专门确指一切经济中无不包含的、由农民经营的产业，况且在过去，农民人数之多犹如汪洋大海。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乡村活动占着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活

动必定伴随着它，并逐渐发展壮大，削弱乡村的实力。

达尼埃尔·托尔内认为，乡村活动和非乡村活动的比例是确定社会分界的首要特征。只要往昔的西方国家和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结束以下的状况，社会便始终停留在“农民经济”的阶段：

——本国的农业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

——一半以上的农产品由农户提供（农民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与领主、有产者、资本家经营的大农庄截然不同）。这些小农虽以不同方式蒙受剥削，但他们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与市场保持直接的联系。

尽管如此，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已足以使：

——国家及其必要的机构得以存在；

——城乡间的对话使相互关系更加密切。

以上是达尼埃尔·托尔内为“农民经济”所定的标准，我接受这些标准，显然是为我所用。大家将注意到，即使不作极端的推论，这些标准本身便划定一个体系，一个整体：把城市和国家置于“模式”之中，也就是说，把规章制度、工业、形形色色的交换、信贷，甚至蹒跚学步的资本主义，全都接纳进来。另一方面，“农民”这一形容词势必使人集中注意农业的首要地位：乡村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乡村的活动无孔不入，其他活动不过是大海中的孤岛。但这些孤岛毕竟存在着。

欧洲的所有国家都曾经历过为时达几个世纪的“农民经济”。它们后来又全都超越了这个阶段，时间或早或晚。法国比几个别的国家慢些：这一落后肯定给法国的深层历史打上了烙印。路易·歇瓦利埃 1949 年谈到法国时已经断言：“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意识作为一种习惯势力，约束着国家的发展可能性。法国什么事情能放心大胆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拒绝去做，都要通过农民去辨别”²。农业

既是经济的命根子，它本身又反映着“法兰西的某种观念”。农业的沉重包袱在暗中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能否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对此表示怀疑。或者，是否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这是一件坏事？

与其就此作出判断，人们不妨先问：法国怎样和为什么在国内保留了数量众多的、功能越来越小的农民？它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难道是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才使乡村能够不顾风浪的袭击，将其领先地位延长到超过合理的界限？难道法国乡村的惰性及其无可否认的成就竟使法国长期陷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境地，以至在朝夕之间难以自拔吗？这些疑问贯穿在本章的各个段落。其实，直到本书的末尾，问题还将是悬而未决。

一 法国的“农民经济”延续 了多少个世纪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划定界限：究竟在什么时候（具体的时间）人们可以观察到农民经济，进而根据这个“模式”推导出我们所需的教益和认识？显然，当模式要素之一鲜明地出现时，模式已经近在眼前；到各要素完全具备时，模式已发挥作用；后来，随着主要部件的陆续断裂，模式便逐步损坏。

早在罗马统治期间，高卢已出现了城市和乡村，也就是说，已存在一种秩序和一些束缚。在这以前，独立高卢的情形无疑还若明若暗。但是，在罗马夺取城市时，模式也许还没有完全定型，因为在各地的乡村，庄园主及其奴隶与达尼埃尔·托尔内提出的条件相矛盾，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产品要靠拥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农户所提供³。罗马统治下的高卢诚然有了独立的农民，但他们的产品还不占多数。此外，城市正日趋没落，其领先地位不久将被庄园所取代；那时候，割据纷起，国家黯然失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几个世纪后出现的领主制预先作好了准备。如果我没有搞错，“农民经济”的确立要一直等到公元1000年的转折关头，这一爆炸将促使我国和欧洲的乡村蒸蒸日上。从那时起，农民经济具备了所需的全部特征，当然发展程度还有先后之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隔一会再谈。对这划定的第一条界线，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不会有产生怀疑的可能。

直到今天

奇怪的是一一在前不久，在马克·布洛赫那时，几乎所有人都

会感到惊讶……法国农民经济延续的时间十分长,居然包括了甚至超过了19世纪。据一位名叫卢兰·德·夏托维厄的严肃的农学家说,1840年前后,自耕农以及租佃制和分成制农庄主经营的土地差不多占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⁴;1881年左右,农业收入已相对减少,仍占国民收入的一半,或将近一半;到1931年,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在这以前,总是以农村人口领先。法国乡村的潜在力、影响力和约束力也许决定了它长期成为理清我国脉络所必须参阅的“帐本”。只是在前不久,我们才经历了自古流传至今的农民经济在法国出人意料的、灾难般的迅速解体。

莫里斯·帕罗迪在《1945年以来的法国经济和社会》一书中为农民经济出具了死亡证明文书,他简单地写到:“从就业人数看,农业于1968年仍居国民产业之首,从业人员达312.5万人,到1977年就只剩下200万人。”⁵转变是在不到10年内完成的。我们不仅看到转变的结果——这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而且还会注意到转变的过程;在此期间产生的社会动荡,土地接二连三的荒芜、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的勃兴;所有这一切全都令人触目惊心。马克·布洛赫在1930年发表《法国乡村史特征》一书时不可能想象到会出现这样的狂风巨浪,会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动。达尼埃尔·哈莱维⁶于1934年访问法国中部的农村,犹如瞻仰圣地,他同样也想不到会产生这样的大变动。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当今农村出现的上崩瓦解般的灾难同针对绵延几百年之久的长过程的经典性认识联系起来:这些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今天必定发生,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它们是社会演变长期经受了减速、刹车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观察的视野,把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进、并以其现代化成就自傲的19世纪硬塞到过去的时代中去;显然,19世纪仍不免窝藏着过去时代的残余,有些残余甚至一直遗留到今天。

我们因此看到,在过去很少有所变动的法国农村,不久前突然冒出了工业、城市服务业和运输业等现代化部门,以及成千上万种有关国计民生的新型经济形态。一方面,新事物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保守势力依然存在。很久以来,现代化的法国鄙视和诋毁另一个法国,竭力指责它暮气沉沉,拖了后腿。在18世纪的普罗旺斯,在城里人的眼里,“农民是险恶、狡诈的兽类,是凶残、半开化的野人”。这类偏见在19世纪广为流行,并且花样翻新。这也恰好证明,盘根错节的农民经济继续存在,仍在抵制和阻挠另一个法国为在工业化世界中独树一帜所作的种种努力。银行家兼政治家雅克·拉斐特(1767—1844)抱怨说,19世纪的法国费尽心机地在开发新产品,而产品的消费者却还是停留在16世纪的穷光蛋⁸。在他看来,这种双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于1824年写道:“诚如人们所见,几个商埠和省区参与了现代的工业勃兴,资金充足,信贷利率很低;但其他地方仍沦于无知、守旧和贫困的境地,备受高利贷的盘剥,远远落在堪称文明之邦的法国的后面。”⁹

一个贫穷、勤劳、纯洁而又成为拖累的法国在艰难困苦中生存,不得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哪怕是从走私贩那里买来的盐和又长又粗的火柴;每个晚上在灰下埋好火种,以便第二天早晨重新引燃;至少隔一星期才烤一次面包;不论男女,一辈子只有一件会客穿的礼服;一切都尽可能靠自己生产(食物、房屋、家具、衣服)——例如科雷兹地区的农民,直到1806年,“自己养羊,把羊毛织成粗呢,再供自己穿着”¹⁰——;与牲畜同睡一屋,冬季借以取暖;没有今天正普及推广的任何卫生设施,¹¹为了节省蜡烛,“多数居民天刚发亮就立即起床,冬天做早弥撒时,大地还笼罩在黎明的薄暮中”。¹²

与我同龄的人都曾亲眼见过和喜爱过这个农民的世界,这个艰苦、活跃而又恬静的天地,以及它特有的色彩和习惯,它对乡土

的熟悉，它对需求的知足；只要这个天地还存在，法国的生活便建立在另一个基础之上，发出另一种谐振，与自然界也保持另一种关系。

保尔·杜富耐对萨瓦的过去和现在的熟悉，无人能望其项背；我的这位同代人甚至认为，“新石器文明及其使用的牛和马几乎一直延续至今”。这话未免说得有点过头。但他补充说，“在我乡间别业附近的一块地里，我捡到过几块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燧石，这使我猛然间想起，我的一位叔祖是农民，我曾见过他用小锄刨土¹³。我由此联想到也许远在五、六千年以前最初开发这块乡土的人。我同这一业已被埋葬的世界的最后代表曾进行过交谈。我眼看着那些证人接二连三地迅速过世，口述的传统从此停止。至迟可追溯到历史初期的许多道路，由于不能供机动车通行，因杂草丛生或改作耕地，如今已再也不见踪影。1960年前后，这些道路至少还有行人使用”¹⁴。

这些昨天尚可通行、今天业已消失的道路不计其数。最明显是山区季节性放牧经过的小路。自从成千上万头羊每年不再过路后，它们便成为荆棘的天下。艾古瓦尔高原和洛泽尔山的荒坡野岭便是这种情形，距今约4000年的时候，即在公元前2000年，最早的季节放牧曾踩出了条条道路。羊信今天还把少量的羊群赶到阿尔卑斯的高山地区就食，它们只得披荆斩棘，在茅草丛中开路前进了。多么奇怪的画面啊！¹⁵

农民经济在11世纪终告确立

几十年来逐渐解体的农民经济，其最后的残余即将或才刚消失。但向前追溯，过程的开端又该定在什么时候？

当然应该定在我们已进行了长篇论述的“村庄——集镇——城市”¹⁶的地理格局终于定型的那个时候。根据不同地点的具体情

形,就算是在11世纪或12世纪吧。我甚至同意某些历史学家的见解,说是中世纪的“村庄战胜了城市”¹⁷,或者说乡村的活动主宰了城市的秩序以及为这一秩序所必需的交换¹⁸。但是,反过来说也部分地说得通:包括远程贸易在内的交换的增长(忽视这一增长是错误的)¹⁹刺激了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乡村活动的增长。两种增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垦荒活动的开展不仅可满足日益增多的村民们的食品需求,历来处在领主、教会或修会控制下的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剩余劳动力,使城市因远程贸易的欣欣向荣而逐渐膨胀起来,且不说城市的手工业产品也因更加精巧和更加专业化而日见增多。

总之,古老经济基础的成熟及其未来的发展也有赖于经济上层建筑的建立。如果我们必须确定一个起点——不是绝对含义上的起点——,那就要把目光转向这些正在形成的上层建筑。只是当它们开始展现时,所谓农民经济的长过程也真正起动。

十世纪时的普罗旺斯西部可能是个极好的例子。地中海促使这个地区的经济早熟。高居乡村之上的城市,如阿维尼翁、艾克斯、阿尔勒、塔拉斯孔等,在十世纪都已兴旺发达。它们向四郊扩张,侵占附近的农村,必要时兼并农民的手工业,成倍地增加自身的工业活动。一些木船很早就可在罗纳河和杜朗斯河运输地中海沿岸宝贵的食盐,并在固定的中间站停靠:圣吉尔、塔拉斯孔、阿维尼翁、圣灵桥。河流还通行木排,漂送“从加邦塞山和迪瓦山上砍伐的”树干²⁰,后来,小麦也加入这些交换的行列,成为一大创举。

从此,集市已不能够满足需要,交易会便于12世纪应运而生,圣灵桥每年一次,嘎浦两次(一次在圣母诞生的八日庆期,另一次在圣阿尔诺节),其他几次分别在圣保尔—台夏托,弗累瑞斯、马赛、阿维尼翁、博凯尔等地举行。成群结队的驴把村庄的胭脂²¹送往城市的染坊,另有用于染白的白垩土,用于上色的蕨。除开这些

地方性交换外,还应加上远程贸易,如来自近东市场的香料、胡椒和蚕丝。

因此产生了地方贸易和远程贸易的关系网。“当伦巴第人光临圣吉尔或弗累瑞斯的交易会时,他们不仅送来蚕丝和香料并带走皮货,而且还用他们的大船载盐运往热那亚,木材则沿罗纳河顺水而下,送到圣吉尔,又把小麦、成捆的呢料运往各地²²。1190年,在弗累瑞斯的交易会上,除其他颜料和蚕丝外,还销售圣里基耶,沙特尔、埃唐普、博韦、亚眠、阿拉斯等地的大宗呢料。”²³在普遍进步的帮助下,发展中的城市活动逐渐向村庄伸展,由此形成的商业久而久之更破坏了古老的乡村手工业的自由。

货币自然也参与其事。流通的货币来自加洛林王朝时代的马赛和阿尔勒的铸币工厂(从9世纪开始),帕维亚随后也轧制铸币,还有梅尔格伊铸币所(梅尔格伊现名莫吉奥,位于蒙彼利埃附近)。到了11世纪末,农民已用铸币向领主缴纳领地杂税。在12世纪,随着贸易活动的蒸蒸日上,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货币流通更加快速发展。²⁴

当然,普罗旺斯的经济早熟远不成为通例。在遍及法兰西全境的普遍运动中,毕竟有先有后,甚至还有停滞不前。

以马孔内地区为例,罗纳河和索恩河贯穿全境,理应促进该地区的发展,但当地的经济却未见早熟。直到十世纪末,马孔内仍是“纯粹的土地经济”²⁵。“土地经济”一词显得过分绝对化了:又有哪一种经济活动仅限于经营土地?更何况,当时集市众多,交易活跃,早在公元1000年前,“994年在昂斯举行的主教会议曾考虑禁止教民在星期天从事买卖,‘当天所吃的食物除外’,当天购买当天的食物,正是那时的惯例”,即使安息日也不例外²⁶。这些地方性交换以及领地杂税和罚金往往都用现金支付。索恩河上“繁忙的船运业”有利于开展较远距离的贸易。克吕尼修道院吸引了众多的朝圣

者,由此产生的新兴集镇逐渐发展为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货币铸造分别在克吕尼、图尔努和马孔内进行,后两个城市历史悠久,罗马时代的繁荣虽然已如昨日黄花,但至十世纪末仍举行每年一度的交易会²⁷。公元950年,马孔内伯爵莱托二世的领地分布甚广,他在汝拉山“前沿丘陵地带开采岩盐”,“获取巨额收益”²⁸。马孔内地区还经由犹太商人输入盐、铁以及少量奢侈品,如香料、珍贵织物等²⁹。

只是到了11世纪的下半叶,罗讷河和索恩河流域的商业活动才逐渐扩展,并且有效地向邻近的地区渗透。图尔努、克吕尼、马孔举办的交易会不断增多。外地人或乡下人的涌来使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为满足居住的需要,便陆续兴建了新的市区和关厢区。陆路运输的发达竟使当时的人感到吃惊,修道院和城堡主纷纷在路口设卡收税³⁰。货币总量不断在膨胀³¹,商业与手工业同步发展,商人兼营高利贷,对地产不再有所偏爱³²。在12世纪末年,马孔出现了第一批富商家族。

我们再看沙特尔,货币流通早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已经开始,后来由于商人、朝圣者和学生前来该地,发展愈加迅速。³⁴巴黎更是个极好的例子:早在菲利普·奥古斯特统治期间(1180—1223),小麦开始经水路运来,城市人口众多,惯常的陆路运输已不再能满足需要³⁵。在11世纪的图卢兹,纺织业的帮工抬着巨大的旱船上街游行³⁶。在索米尔地区的蒙特勒伊贝莱附近有一个名叫梅隆的税卡,我们凑巧找到了1080至1082年间的一份过境货单:除马匹、牲畜、羊毛、油脂、羽毛、石腊外,还有“驮驴运输的外国商品或高价商品”;³⁷利用驮驴进行运输,赶集自然方便多了。工匠和商人不难向城市汇聚,道路畅通无阻,河上又架有石桥。

我们最好来到地处法国正中的贝里地区考察,早在罗马征服高卢前,贝里地区已经得到开垦,至少香巴尼一带已基本上见不到

荒地³⁸。居伊·德韦依正确地指出,在11世纪,“已有几个城市存在,特别是布尔日,但城市毕竟为数不多,规模不大,并且与乡村仍保持密切的联系。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仍花大部分时间种地,同时也经营商业,加工农产品或制造自己所需的劳动工具。11世纪中叶,城乡对立尚未出现,特别在法国中部地区”³⁹。我在这里加上了着重号,并不是想与作者挑起争论。实际上,重要的问题不是要把城乡对立起来(大家往往都这么说),而是应该说明城市与乡村共存的原因。在当时的贝里地区,经济生活几乎还处在原始阶段,城乡之间的联系尽管尚不密切,但这种联系毕竟业已存在。⁴⁰

有人认为,尚未摆脱乡村生活的城市便不再是城市,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直到旧制度的末年,甚至在这以后,法国的城市几乎仍有半个身子陷在乡村生活之中,乡村包围着城市,并向城市渗透;对于以上的事实,难道有谁还看不见吗?在1502年的巴黎,许多人的家里养着“鸽子、家禽、兔子和猪”⁴¹。一位注意观察的旅行者提到,在1643年的里昂,“城市很大,面积很广,因为市内有着射击场、公墓、葡萄园、耕地、草地和其他空地”⁴²。类似的一般性例子⁴³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回过头来再说巴黎,1775年5月的面粉战期间,一名被捕的穷人正是把巴黎各畜厩的粪肥送往市内和市郊的田地里去的马车夫⁴⁴。在19世纪末的利摩日,“不算私人的菜园和猪厩,城区四围之内还留下一些草场和菜地”⁴⁵。城市是否保存某些乡村的活动,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否起到城市的作用。从11和12世纪开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城市和集镇恰巧做到了这一点,即面对着村庄,扮演自己的角色。

这一“城市—集镇—村庄”的体系扎根之深,显然要追溯到公元1000年以前的“黑暗”时代:人们隐约可以看到,在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过后不久,法国和欧洲仍有一些城市继续保持其生命力。这个追根溯源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出可靠的答案,因而引起了人们强

烈的兴趣。安娜·隆巴尔-茹尔丹的论文令人刮目相看。一些元气大伤的城市仍然散发着微光，一些早在罗马征服前的高卢时代业已创设的交易会仍在发挥作用，尽管我们对当时的情形并不清楚。一些外来产品经由交易会向各地销售：“葡萄美酒，香料，比呢料更暖和的和象征着财富的皮货，特别是供神庙装饰祭台和供女人打扮所用的漂亮织物”。这些“诱人的”货物，“不再由叙利亚商人销售，后者在墨洛温王朝末期已经消声匿迹”，买卖从此经由交易会进行，这些为期甚短的聚会促进着集市经济的发展，并且推动着沉睡中的城市的苏醒⁴⁵。法国 11 世纪的“复兴”并不是从无到有地白手起家的。

二 整体特征

考察“农民经济”只能从考察农民本身开始。真要看清楚和弄明白农民问题,也还不是那么简单。诚如雅克·米利埃⁴⁷所说,法国的农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同样,法国的农民也不可能千篇一律,而只能名目繁多,各不相同。又有谁还会看不到这个事实呢?⁴⁸

尽管如此,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农民和乡村活动毕竟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独立的范畴,一个自成体系的结构。且不谈地区的生活方式,单是在种粮食的、种葡萄的和养牲畜的农民之间的千差万别,恐怕也只有上帝知道的了!因此,我不想从差异出发去谈论农民,而是首先进行整体的观察,注意与社会的其他成分作比较,进而衡量农民这个整体的重量、数量和体积,以及它所占的可变空间。换句话说,是要衡量农民与非农民的比重。然后,我们还有时间再回过头来研究细节,分门别类,并同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作出必要的解释。

自然力

农民经济的重大而恒久的特征是与不可控制的自然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千百年来,通过与自然界的抗争,农民积累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其中既有破坏,又有建设。从这个角度看,最简单的办法似乎就莫过于遵循既往的传统,承认历史是自然界的反命题⁴⁹了。人与盲目的自然界相对抗,这就是历史,难道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其实,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土地上,在气候中与各种生物相共生,无论是不受人控制的生物,或是多少听命于人的

生物(但以人开始适应生物的要求为条件)。人在自然界与家畜和野兽为伍,人利用泉中涌出的水,河里流淌的水,淹没土地、冲塌山岩的水,以及拦截起来然后推动乡村磨坊的水。人每时每刻都处在阳光的普照之下。弗朗索瓦·雅可布写道,“归根到底,正是太阳向大部分生物提供能源”⁵⁰,其中也包括人。

可见,“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⁵¹①马克思的这番话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真面目。人创造人类社会,不正是要把社会当作征服自然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吗?⁵²

然而,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人已经开始幻想征服自然。我们都知
道弗朗索瓦·马鲁埃(1740—1814)在制宪议会扮演的角色,他对西方人完成的业绩颇为倾倒。他写道:“在旧大陆居民的艰苦努力下,天工造物及其留下的原始成果几乎已荡然无存。”⁵³这话说在蒸气机和电力出现以前,恐怕不十分恰当。今天,到了广泛使用机器的时代,保尔·杜富耐出于同样的幻觉,进一步指出,“自然的因素正逐渐消失,一切都成为人的产物”⁵⁴。

确实,在今天,农村已找不到“天然的”景色,尤其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景色已经完全改观,景色本身就像一件衣服,披在自然界的身上。是否就此可以认为人定胜天了昵?请想想1976年的旱灾;撒哈拉萨赫勒反复出现的饥荒;1983年圣诞节时袭击美国的前所未闻的寒冷(这次寒潮与1709年冬季的那次寒潮相比,也许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请想想安的列斯群岛或佛罗里达的龙卷风,每次释放的能量都比原子弹在广岛的破坏力大百倍乃至千倍。这些事实足以使当今的人恢复清醒。在让·若

① 上文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译者

尔日兰的笔下,往昔的世界几乎处在“自然环境的专制统治之下”⁵⁵,我以为没有人能够推翻这一断言。

专横的自然力正在被人们所利用。乡村的经济并不完全靠天吃饭,但自然界仍约束着乡村经济,控制着它的前进步伐,调节着它的血液循环。大自然的狂暴,天灾给人类生活造成的各种破坏,人们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但我们也要防止仅仅看到灾难和破坏,仅仅看到大自然的狂暴和可怕,历史上发生过的几场空前浩劫仍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我们不能仅仅注意业已载入史册的惊人打击:寒流袭来,果树全都冻死,甚至森林里的橡树也未能幸免;提前返青的小麦,因没有厚厚的一层雪作保护(俗话说:“二月雪胜过一层被”⁵⁶),被霜冻毁坏殆尽;火灾、旱灾以及牲畜病害;霜冻的突然袭击在几小时内毁坏所有的作物,无论是小麦或者葡萄。在维瓦赖、费托瓦等山区,“人们为驱赶暴风雨,惯于敲响教堂的钟”⁵⁷。

历史文献记载的天灾真是连篇累牍:大雨滂沱,连绵不止;小麦拔节开花时突遇一场大雪;⁵⁸严重的草荒扼杀了作物,与其收获粮食,还不如割草;干旱旷日持久,农民结队求雨;葡萄接连四年歉收,甚至做弥撒所用的葡萄酒也不能保证供应;冰雹把某城市的玻璃窗全都打碎,把附近的葡萄树全都砸倒;⁵⁹当然还有洪水危害。1649年1月16日,“塞纳河水泛滥,不少地方上街竟要坐船”(与1910年相同)⁶⁰。1651年1月21日,马耶讷河的洪水把昂热的“整个下城和桥梁两侧全部淹没,河水竟有房屋的三层楼高”!⁶¹至于卢瓦尔河,它能把罗阿讷和奥尔良之间的盆地在顷刻之间化作一片泽国;1693年6月末,“作物长势之好为前所未见”,就在收割前夕,竟被洪水淹没。等水退走以后,如果把草场收割干净,还“有希望在9月再长一茬……问题是在外省各地,草场一经收割,人人都有权去那里放养牲畜”。任何一名法官都不敢出面反对人们享受这

种权利。结果造成牲畜冬季草料不足⁶²。真是祸不单行。

如果不标明这些灾难的具体日期,不说明它们延续的时间长短,从而看到在两次灾难之间毕竟还有好收成和几乎平静的间歇,人们可能以为灾难就像砌墙的黑石块那样,一次紧挨着一次,那可真是说不完的苦难了。不过,诉苦,哭穷,夸大苦难,生活不就是这样吧?

1807—1810年和1814—1819年法国各省遭灾总数一览表

年	水灾	雹灾	火灾	牲畜疫病 和其他灾害	总数
1807	869 000	2 467 664	2 533 171	450 000	6 319 835
1808	2 373 242	12 394 109	3 621 993	3 293 769	21 683 113
1809	3 807 485	12 115 710	3 073 111	17 100	19 013 406
1810	4 781 898	16 828 316	6 485 995	16 000	28 112 209
1814	796 003	3 390 108	7 097 571	4 999 845	16 283 528
1815	3 647 230	6 573 917	5 041 171	96 436	15 358 754
1816	3 868 864	9 296 203	4 133 138	51 105	17 349 310
1817	3 094 709	18 912 478	4 302 755	190 512	26 500 454
1818	109 991	4 596 305	4 315 899	360 873	9 383 028
1819	525 610	37 659 925	5 181 840	4 835 481	48 202 856
合计	23 374 032	124 234 736	45 786 644	14 311 121	208 206 493

“水灾、雹灾、火灾和其他天灾均向有关当局正式呈报,以取得国家的救济”(材料来源:国家档案馆 F12560)。

对历史学家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测出灾难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份关于19世纪初的统计材料:它涉及1807—1810年和1814—1819年,共计10年。这是法国各省因雹灾、火灾、水灾以及包括牲畜疫病在内的其他灾难所受损失的情况。十年加在一起算个整数,损失总共达20 800万法郎(参看以上的一览表)。

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按各种灾害的严重程度依次排列:雹灾高居榜首,损失为4 600万;水灾2 400万,牲畜疫病和“其他灾害”1 400万。这一排列顺序几乎具有常数的价值。总之,雹灾和火灾的

损失最重,这个事实应该记住。当时,城市中的房屋还是木板墙和茅草顶;一位旅行家 1728 年注意到,皮卡底地区的教堂也还用麦秸覆盖⁶⁴,一旦失火,损失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例如,在 1524 年,一场大火几乎把特鲁瓦全城化为灰烬⁶⁵。在汝拉山区卢河河谷的一些村庄中,穆捷村于 1719 年被烧毁 99 所房屋;离前者不远的维耶方村 1733 年在两小时内烧毁 80 所;附近的小城市奥尔南于 1733 年损失 100 多所,1764 年在该地又有 100 多所房屋毁于火灾⁶⁶。破坏性最大的两项灾害——雹灾和火灾——很早就引起了保险商谋利的热心,雹灾保险至少从 1789 年已经开始⁶⁷,火灾保险则从 1753 年开始;这不仅因为两项灾害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估测和预防,而且因为它们可能吸引大批客户。

这难道不是重要的见证吗?关键在于,十年总共损失 20 800 万,平均每年为 2 000 万左右,而国民毛收入(我在下文将详细谈到)约莫在 80 亿上下,农业收益约为 50 亿法郎⁶⁸。在这些大数目的基础上,算出损失所占的比例,结果将吓人一跳:即在 0.25% 和 0.4% 之间。显然,1812 和 1813 年没有被列入统计材料之内,而这两年同 1814 和 1815 年一样,也是多灾的年份:“帝国末年的饥荒肆虐,气候失常无疑是个重要的原因。”⁶⁹可是,在前面的材料中,因气候周期变化,季节错乱以及通常的寒暖失调而造成的歉收都还没有计算进去;在路易十四统治年间,不是曾出现过所谓“小冰川期”吗?坏年成应该列入灾害的范围之内,应该计算出与正常年景相比收成减少的数量。因此,我们不宜过分匆忙地得出结论。

季节的节奏

四季轮回不息乃是自然规律。地球绕太阳作顺时针运动,过了一个季节,又是另一个季节。每年的季节转换表面上似乎完全相同,单调地决定着农活的日程。但根据晴雨寒暖的调配,土地的收

成却有着丰年、平年和灾年的区分。

为了对往昔的收成有更正确的了解,也许应该认识到,季节的转换对决定整个生活的节奏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大体上说,我们生活的一年四季确实是相同的,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再相同了。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像所有的读者一样只穿衬衣(1968年),而户外寒风凛冽,雪花纷飞。霜冻可破坏蔬菜种植,淫雨连绵能使小麦倒伏或使土豆烂在地里,但我们都知道,不论经济损失能有多大,我们不会有挨饿的危险。

我们再设身处地为往昔的人去想想,他们全都为气温变化,为作物的生长状况,为小麦的拔节开花担惊受怕,即使城里人也“往往一半以种地为生”⁷⁰。梅斯的一位“有产者”1675年在日记中写道:“圣灵降临节过后,连日大雨低温,至今已近一月之久,着实叫我放心不下。由于小麦和葡萄不能开花,所有人都心急如焚”⁷¹。菲利普二世的大使,法国国王的巡按使,在他们的信函和报告中,也不免要谈到天气的晴雨,就是说,要预测下季收成的好坏。这难道值得奇怪吗?

四季的轮回不仅使气候冷暖转换,而且还决定农忙和农闲的交替。

不论迟早,春天一到,各种农活便都要着手进行:犁田,锄地,播种,挖沟,如此等等。但这还不算是大忙季节,还正是低价雇佣农民劳动力的好时候;或让他们牵着牲口去王国各地跑运输,或让他们从事公共工程。

皮埃尔·德·里盖(1604—1680)主持开凿两海运河的工程(起迄时间分别为1666年和1681年),1679年4月16日,正当工程接近收尾时,他突然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你们不难懂得他感到为难的原因。当时任朗格多克巡按使的达兰索在那天写道:“里盖先

生希望你把工程款项如期交付给他,因为他手下用着很多工人,他的心情如此急切,以致我未能阻止他派专差送信,向您请示旨意。确实,当时正是一年中加快工程进度的最好季节,如果他在圣约翰节前不能作出巨大的努力,以后再想弥补可就难了。”⁷²

你们也会懂得一位商人为何等得心急火燎的原因,这位商人为了保证瓦莱省的食盐供应,利用罗讷河的船员从远在朗格多克的贝该盐田运来食盐。1651年1月3日,他自日内瓦写道:“假如天气再不转暖,我们只得等到复活节再运出食盐了。”⁷³确实,他不能不根据天时确定运输日期,不能不忧心忡忡地事先等着天时的变化。

夏季和秋初是一年中的大忙季节;割草、收庄稼、摘葡萄全都在这个季节进行;脱粒从9月开始,观察仔细的人注意到,“9月吃新麦”⁷⁴。萨瓦地区有一句谚语说:“九个月过冬天,三个月进地狱。”⁷⁵地狱显然是指夏季,农活紧急,必须马不停蹄地完成。确实,这与山区的气候寒冷有关,冬天不但来得早,而且持续的时间长。

在收割庄稼和摘葡萄的季节,活计十分艰苦,但乡村中也还有节日、欢乐、庆典乃至盛宴……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闲人,城里人放下自己的职业,纷纷下乡;这在欧洲各地都习以为常。直到19世纪中期,这种全民动员的情形在我国还可以见到。

在大革命前的曼恩地区,“每年8—9月间,鞋匠和其他工匠全都抛开自己的工作,下乡劳动,这无疑能使他们得到一份较高的工薪”⁷⁶在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山区,简直就是一哄而起:“收割季节几乎把所有的人手全都调动起来。因季节交替、气温变化过猛或因生活贫穷而得病的人一到开春便霍然痊愈;夏季将临时,所有的病痛全都烟消云散;患有各种炎症、陈伤旧痛、伤风、发烧等慢性病的人到了集镇和村庄就立即恢复健康……麦客走乡串村,根据小麦成熟的先后,逐块收割,足迹遍及外省的一个又一个地区……他们

成群结队地流动,首先从纳普勒平原开始;他们先去弗累瑞斯、勒皮热、圣马克西姆、格里莫等紧靠海边、庄稼成熟较早的地方”⁷⁷。阿尔卑斯山区的男女山民⁷⁸每年照例都要下山,来到盛产粮食、葡萄和葡萄酒的下普罗旺斯地区;这一惯例又有何人不知呢?

一切随即又恢复平静。从8月15日起,农民按俗语所说,“收起油灯过日子”。葡萄已经采摘完毕,农田也已进行了犁耕,秋季尚未过去,农民已经在作过冬的准备。就在1804年的寒冬季节里,“雇工的工资很低,仆人干活十分卖劲,轻易不敢离开主人”。他们又上哪儿去另找活计?真想换主人的雇工,不等寒冬到来,早已拔脚走了。“当摘葡萄的季节开始时,工价上涨,几名仆人不告而别,另找地方去打零工或谋待遇较好的新职。”⁷⁹

我们今天有装设暖气的房屋可住,道路平整,交通方便,河流经过疏浚,很少发生水灾,很难想象冬季的严酷。若在过去,每到冬天,生活自动就遇到重重的困难,逼人的寒冷带来了危险和破坏。各种征兆反复出现,已成司空见惯的常事:正当需要书写时,墨水已冻了起来⁸⁰;甚至在路易十四和德·梅特农夫人的餐桌上,葡萄酒居然结冰;在田野和树林里,可以找到冻死的猎物;寒冷的其他事例,多不胜数!在1709年的马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旧港居然被冰封冻⁸¹,这一灾难并非第一次出现,荒唐的现象于1506年已经发生过⁸²。1544年冬季,曼恩地区“天气极冷,桶装的葡萄酒要用利器切割”⁸³。1660年2月,在卡昂,据西蒙·勒马尔尚的日记记载,“我和其他人一起吃饭,面包必须烤热,才能切下来吃。葡萄酒在桶里也已结冻,想喝酒就要把小火炉放在龙头下面,把冰化开”⁸⁴。

所有这些事情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就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仍然一再经受寒冬之苦。请看塔恩—加龙省的圣安托南城,法国大革命后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在1845年12月11日,这个

小城仍有四分之三的人过着乡村的生活。据一份历史文献记载，“冬天即将来临，活计减少，圣安托南市将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几千个其他市镇也是同样的命运⁸⁵。1853年11月18日，在马赛，第二帝国将庆祝一周年纪念，省长总算说了一句让人宽心的话：“总而言之，农民阶层今年过冬大概不会再受太多的苦。”⁸⁶可是，仅隔一天之差，1853年11月19日，奥布省的省长写道：“自从我的上一份报告发出以后，奥布省和特鲁瓦区的一般形势没有变化。但不容掩盖的是，人们对冬季即将来临感到担心，深怕面包价格出现上涨。在人口众多的各大城市，特别是在特鲁瓦，市政当局正要考虑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自本月7日星期一开始，已向生活最困苦的家庭分发了限价面包券。此外还进行了一些调查，必要时将创办一些应急的工厂，对失业工人进行登记，使他们有工可做，因为工厂主往往在进入冬季后被迫辞退工人。”⁸⁷在旧制度下，所谓应急的工厂也就是慈善性工厂。

最后一个例子，1854年2月27日，在阿登省的罗克鲁瓦：“法国北部各省今年的冬季又冷又长，灾情比往年更加严重。勉强糊口的贫苦百姓不能正常从事劳动，处境大大恶化。然而，政府采取的慈善措施减轻了他们的困难，激发起他们对皇帝和皇后深切的感激心情。公益救济事业时刻不敢有所松懈，随时向各地的慈善机关供应物资，以便及时向生计无着的家庭发放救济。”⁸⁸

以上这些见证都谈到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无非就是失业和生活费用昂贵，但还不是往昔经常发生的饥荒。农民叫苦的声音不高，可能是他们容易逆来顺受，也可能是他们的日子比城里相对地好过些，后一种可能不能完全排除。

我坚持认为，无论在法国或在别处，只要冬季对人还是一场严重的考验（我们今天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只要热昂·里克多（1897年）用关厢土语所写的《穷汉自哀自叹》还能打动每个人的心，农民

经济仍然存在。请听：

冬天到，苦日来，真是见他娘的鬼
再也不能赤膊光脊梁
掌权者，管事人
纷纷朝着南方跑。⁸⁹

锹、锄、镐、犁

人要同大自然抗争。应该使用什么武器？什么工具？什么办法？首先当然依靠家畜的帮助，特别是马、牛、驴、骡等“耕畜”⁹⁰。直到20世纪，在穷乡僻壤，轭具仍架在牛角上；一位历史学家⁹¹说，驴和骡是“适应各种道路的交通工具”。牲畜在运输中确实占据首位。中国与西方在农业耕作方面的巨大差别就在耕畜的使用，这一事实虽然已属老生长谈，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这些用以提供动力的力畜，早在欧洲的史前时期，已为人所驯养。但在几个世纪期间，农民拥有的力畜数量仅足以开拓辽阔的耕地。据拉瓦锡的估计，法国大革命前夕，约有牛300万头（另加奶牛400万头），马178万匹（其中有156万匹用于农业⁹²）。就在当时，马、牛和骡的数量相对说来尚嫌太少；兽力的应用只是在后来，在20世纪初才达到极盛的时代。

此外，牲畜不能承担各种工作。为兽力所不能完成的部分工作仍要由人亲自动手。使用人力正是农民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尽管人们通常对人力所起的作用视而不见。

这里所说的人力，并不是赤手空拳的人，而是使用工具的人；其中包括锹、锄、镐、镰刀、耙、三齿叉、砍柴刀以及一些特殊的工具，在葡萄树、橄榄树、核桃树、桑树、板栗树旁松土的工具，且不说砍树用的板斧和锯子，或用于小麦脱粒的连枷（贾朗德等地区在20世纪初仍然听得见它那“杂乱无章的噪声”）。

当然，“兽力化”（请原谅我生造了这个方便的新词，但愿它不至谬种流传）减轻了人的劳动，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展示更大的宏图。没有牲畜的帮助，要像当时那样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将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兽力也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是为保持人畜的食物，必须注意小麦和饲草生产的配比……人的食物往往也是牲畜的食物；某些食物“可以互换”⁹³。

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16世纪的英格兰，托马斯·莫尔（1478—1535）在《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绵羊是性格温和的家畜，但如果一味扩大牧草地，而使粮食作物减少，也会使人活不下去”；换句话说，这会使人没有饭吃，甚至没有工作可做：“同一块土地，过去种植粮食，需要几个人去照管，如今改为放牧牲畜”，有一名羊倌也就足够了⁹⁴。康替龙（1680—1734）指出，法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国内喂养的马匹越多，给居民留下的粮食就越少”，“或者是马，或者是人，二者不得兼顾”⁹⁵。梅桑斯于1788年桴鼓相应：“扩大草地面积和繁殖马匹使人吃的粮食数量日渐减少”⁹⁶。在1660年后的奥热地区，以及后来在1780至1820年间的整个下诺曼底地区，为饲养奶牛而发展人工草场居然达到了与人争食的地步。

由此可见，人从事耕作，一方面要靠牲畜的帮助，另一方面又被迫或宁可自己动手。那么，人们过去常说的所谓“手臂耕作”究竟能有多大的范围呢？

首要的手臂耕作区是宅旁园地，还有麻田，后者与园地相仿佛，有时种大麻，有时种亚麻。田地面积狭小，麻枝生长茂密，高度有时超过2米，今天的手扶拖拉机或许还能进地耕作（那也十分勉强），可以设想，过去用马恐怕转不过弯来。刨地势必要用小锄，这份工作往往留给妇女去做。宅旁园地为农民生活所必需，大量施肥，但很少用人粪；法国农村一般不收集或不善收集人粪，某些市郊和北部地区除外，那里的城市粪便得到利用，不嫌脏臭⁹⁷。确实，

城市四周的菜地有时使用粪肥和各种垃圾；例如在拉瓦勒，仆佣或下人每星期二、四、六晚间把“便罐”端到屋外，让“清道夫”运走⁹⁸。里昂的情形也是如此：“清道夫既管扫街，又要把粪使用驮驴运往乡间”⁹⁹。巴黎的脏土、垃圾和粪便供四郊的菜地充当肥料。共和二年雪月十三日，有一个名叫布里代的人“经巴黎巡按使的特许，可将粪便粉碎成粉末出售”¹⁰⁰（粪便在蒙福贡收集）。但是，据说这种粉末状肥料的肥力不如粪便，引起了菜农的不满。菜农为此要求取消这项特权。然而，很久以前，早已明令禁止巴黎城外贝尔维尔、圣热尔韦、庞坦、圣乌安、拉维叶特等村庄的农民在“粪便淤积足够的时间前直接用于肥田”。¹⁰¹

宅旁园地条件优越，施肥量超过一般耕地，甚至多于播种小麦的土地。施肥越多，投入的人力劳动也越多。雷岛正是一个极好的事例。该岛的土地全部用于种植蔬菜，因而既不养马，又不养骡，甚至连猪也不养一头！“铁锹和居民的双臂，这就是所有的农具……这里过去曾有一些老农，毕生从事刨地，以至弯腰曲背，竟像葡萄植株一样”¹⁰²。据画家欧仁·弗拉芒丹说，一些自耕农“就用双手掐下大麦的麦穗”，“麦草则弃而不顾”¹⁰³。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土地分散和地块太小吗？或者因为雷岛的海藻资源极其丰富，确保了粮食的高产？每当深夜退潮以后，即使海上风急浪高，人们也下到齐腰深的水里打捞海藻。无论如何，靠海总要吃海。

施肥和锄地的联系始终未被人们忘记，但这种联系却远远说明不了在施肥很少的“大田”里人力投入的增长。尽管农学家梦想有计划地进行大面积的推广，但在实际上这只是出于迫不得已。一位名叫 P. G. 普安苏的农学家 1806 年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能用铁锹翻耕所有的土地，那是人们最希望的事。这比用铁犁犁地有更多的好处，法国的许多乡村宁愿使用铁锹，用习惯了十分省事，一个人花 15 天功夫能翻地 487 公尺，深度达 65 公分，而且一次完

工；而用轮犁耕地，在泥土板结时，必须反复进行四次；方能播下种子，犁过的土块也不如铁锹翻得那么细碎。有人或许会说，铁锹翻地的开支将比犁地大得多；依我之见，他们没有计算喂养牲畜、购买农具和农具的费用，另外再加上牲畜的疾病和死亡。大家将会看到，如果耕种大片土地，犁地只会吃亏。铁锹翻地的一大好处是从不需要歇晌，田边地角又都尽得利用；此外，产量等于其他地块的三倍。铁锹的长度和强度至少应比园地所用的小锹增加一倍，翻耕和粉碎板结的泥土，势必用力较大，小锹会抗不住劲。锹把的上端应装设横撑，以便工人脚踩锹板挖土时双手同时用力。如果地里石子太多，可使用三齿叉，齿尖容易插入石子间的空隙。里昂四郊的土地多石，人们就用这种工具翻地。它还可用来为葡萄树松土，不伤树根。”¹⁰⁴

在以上关于人力耕作的方法和优点的冗长叙述中，还没有谈到有关施肥的必要：铁锹翻地本身确实具有卓越的功效，它有助于通气，促使地表和地下的泥土相混合，但如果要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让“土地永不歇晌”，就必须勤于施肥。没有肥料，便不能连续种植。因此，还必须把肥料搞到。

可是，肥料偏偏极少，因为肥源主要来自牲畜。如果按照普安苏的主意取消大牲畜，这显然无济于事。“费托瓦地区从17世纪起通过追施石灰改良土壤，使产量增加三分之一。1748年，一些农民把蕨类植物和苔藓植物混合沤制绿肥，送往勒芒的集市出售。”¹⁰⁵对于这种混合肥料，对于各地几乎普遍采用的焚烧草皮取得的肥料，或对阿尔卑斯山区用橡树叶、白蜡树叶、落叶松针以及黄杨、百里香、熏衣草等灌木的枝条沤成的肥料¹⁰⁶，我不能保证它们究竟有多大的肥效。至多只是聊胜于无、勉强充数而已。既然人粪很少使用，牲畜便成为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肥源。在阿尔卑斯南部山区，农民冻拾季节放牧的或土生土长的绵羊夏季留下的粪便，然后通

过人背驴驮，把珍贵的肥料送往山下的谷地¹⁰⁷。1918至1939年（正值两次大战的间歇时期），在马恩河畔的沙隆，“不是有几个邻近的村庄专门包下几条街道或几个地段，负责拣拾马粪吗”¹⁰⁸？在各种例子中，最典型的也许来自18世纪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地区。这里是绵羊的天下，牛的数量已经很少。然而，与别的地方相比，当地的牛多系老牛，养着就是为了积粪¹⁰⁹。肥料奇缺，据说农民可以卖掉一切，唯独不卖牛粪。

一项出人意外的计划

除非不是农民，才会忘记肥料的价值。有人曾设计了一项美妙的计划，恰巧忽视了肥料的作用，这项计划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后果，但值得在这里作番介绍，尤其因为它尚未公诸于世。作者坚信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缺，建议采取一些断然措施，并且广征博引地进行论证。这项计划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793年1月正值大革命时期，高谈阔论十分风行。然而，当时任巴黎驻军工程局长的茹里安纳·贝莱尔竟莫明其妙地把以下建议送呈内政部长。¹¹⁰这位局长先生显然是位“颇顾声誉的公民”，希望“干点实事”，并且“不肯轻易进言”；他建议政府实行一种奇妙无比的耕作制度。“经过反复多次的大规模试验，我确信我历经十年研究设计而成的人工耕作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首先，只要把翻耕土地的时间提前一天，就能多用人力和铁锄，少用马匹和犁具；在其他手工行业，使用机器以节省人工总是比较有利，但我确信，在种植业，人力劳动却不能被犁耙所代替（人力耕作简便易行）。我所做的试验主要在平均产量一般不超过15公担小麦的土地上进行；按普通耕作制进行精耕细作，播2公担多一点的种子，可以取得这一收成。首先，我把播种量减少了60斤（或3斗），这已是一笔实际收益；接着，我收获的小麦不是15公担，而是55、56乃至60公担

以及相应的麦秸……实行旧的耕作制，在同等的土地上，播下 2 斗种子，可以收获 11 斗粮食……也就是说，播 10 斗可获 55 斗，而我只播 7 斗，却收得了 280 多斗。在旧耕作制度下，产量等于种子的 5.5 倍，现在因消灭了害鸟害兽¹¹¹，可能达到 6 倍，而照我的办法去做，产量竟达种子的 40 多倍。据此可以判断尚待出售的国有财产将达多高的价值。……”

计划的作者所考虑的恰恰正是利用人力开发法国拥有的 6 000 万弓丈(每弓丈约合 40 至 50 公亩)可耕地。他明白此举非同小可，承认为此必须调动 1 000 万名劳力，“正如一位经济学著作家所说，工人即是拥有劳力资本的人”。对于我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名称，读者可顺便辨辨它们的味道。我们这里先记住下面的数字：使用工具和赤手空拳的一名工人的劳动力可开垦 6 弓丈土地(约折合 2.4 至 3 公顷)。

这份计划最后自然毫无下文。何况，在热马普战后不久(1792 年 11 月 6 日)，由于战争征调民工和马匹，农业失去了一大部分劳动力，人们又上哪里去凑集这必须的 1 000 万名劳动者？甚至根据作者的建议先调 100 万人作初期试验也不可能办到。

一系列例子

依靠人力耕种土地在法国是古老的现实，是环境和经验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这甚至是摆脱困难的唯一方法。

山高坡陡，怎样耕种土地？在中央高原，除开低地以外，种地以往主要靠人力，很少使用耕畜。阿尔卑斯山区正是这种情形。例如在瓦桑山区的陡峭山坡上，畜力劳动完全无能为力。同样，在杜朗斯河中游一带(例如蒙特隆附近)，“全部劳动都靠人力完成。多么不幸的事啊！”¹¹²

可是，尽管存在种种困难，每当人口增加时，山地便广为得到

耕作,甚至在较近过去,还是这种情形。在比利牛斯等山区,人们费尽心机,设法开垦新的土地,安道尔的山地高达海拔2 000公尺,塞尔达涅和卡普西尔的海拔高达1 600公尺。可是,在高山上发展农业简直纯属取巧弄险之事:农民为了去山上种地,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要把耕畜和农具留在山下。他们一直爬到雪线的边缘,“耕畜不能达到这个高度,只得用铁锹耕种小块的土地。他们妻儿相随,肩背手提,把装满肥料的筐子送上山去。不施肥料,种地就会劳而无功”。即使如此,也还可能因出现“雪崩”,顷刻间把已开垦的土地冲塌¹¹³。

曼恩是主要依靠人力耕作的另一个贫困地区。耕畜和铁犁在当地均很稀少。此外,这些笨重的木制工具“是农民在村庄铁匠的协助下拼凑而成的”,¹¹⁴使用十分不便,并且仅铧尖部分才由铁制成。犁地的深度约在10至12厘米之间,不足以切断野草的根子。然而,由于分量极重,犁至少需要6头牛或4匹马牵引,每年至多能犁耕6公顷土地。更何况,这些工具的数量很少。“圣马尔苏拉菲泰共有81家小农户,其中仅3家农户拥有耕犁。”¹¹⁵一般农户当时都雇一名帮工从事耕地,后者往往自备锄、镐、锹(锹系木制,外面包一层铁皮)上门耕地。人力耕地费时费工。“每人每年至多可锄地2公顷,活计十分辛苦……使人弯腰曲背,未老先衰,而所得的成果却极其低下。”¹¹⁶

另外还要考虑到曼恩的特殊环境:随着牛羊饲养的发展,自由放牧的土地逐渐增多。特别在拉瓦勒地区(1777年),草地每隔8年、10年、12年才重新播种一次¹¹⁷。地里往往茅草丛生,“染料木长得密密层层,农民们捕猎的小动物(野兔、山鹑、丘鹬)在这里建窝筑巢,害兽(狼、狐、獾)出没其间”。由于犁铧不能进行土地深耕,这项艰难的任务自然由人力承担。为了重新开垦已被撂荒的土地,必须披荆斩棘,实行刀耕火作。

此外,土质贫瘠和腐植层过薄使犁铧不能使用。例如,多尔多涅的农特龙区位于佩里格城以北 50 公里处,几乎遍地都是石子,仅在个别狭窄河谷才有少量腐植土。该区的统计委员会主任于 1852 年指出:“由于本区腐植土少,农活费劲、辛苦和困难,用犁的效果不如用镛的好。钉耙和石礅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因此没有这些新式工具……每当天气过热,由于缺乏养料,小麦秸秆长得又细又矮,往往不能捆成麦捆,于是便用树枝代替,给林木造成很大损害。麦秸不再被沤成肥料,便往往充当牲畜饲料,用于垫厩的麦草则被苔藓植物所代替,害处更加严重,因为一车麦草沤成的肥料,肥效至少抵得上三车苔藓植物。”¹¹⁸

南方的梯田(往往种植葡萄)也靠手工劳作。新作物在各地的推广,例如土豆和“大萝卜”(1785 年)¹¹⁹,还有刚出现时被称为“土耳其麦”的玉米,也都使用人力劳动。凡试种新作物的土地,都用双齿铲进行深耕;这一方法长期应用于小片土地,直到 1965 年仍旧得到保留(我所说的正是 1965 年)。¹²⁰因此,玉米一开始便为贫苦农民所引种¹²¹。至于双齿铲,1868 年的一部著作指出,这个工具当然不仅用于玉米种植,“呈叉状,有十分结实的双齿,装在一米长的木柄上”。在朗格多克地区,“工人正是用这种工具在冬季翻耕土地,取得事先商定的报酬”¹²²。

在 19 世纪,农民地产的日益分散在很大程度上使手工耕作得以保存。地块极小,只能使用锄镐翻地。因此,人们毫不惊奇地看到,手工耕作不仅在 19 世纪得到保留——例如在葡萄园松土,使用锄镐确实得心应手,犁耕只是到第二帝国期间才在法国西南部¹²³和朗格多克地区首次出现;据 1860 年的一位见证人说,在阿尔萨斯和利马涅这样的地区,耕作原先并不使用锄镐,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有的人都忙于种地,而且往往使用锄镐。”¹²⁴

赶上机会凑巧,人们又在哪里会见不到人力耕作?一位历史学

家在安德尔省马尔什村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¹²⁵中见到了“耕夫”一词,该词今天当然早已过于陈旧而被废弃,但它却令人回想起昔日用锄镐耕作小片土地的农民。

总的说来,在法国昔日的乡村,农田耕作长期陷于停滞不前、抱残守缺的境地,不能充分使用畜力,土地翻耕不透,施肥又少,更不能铲除杂草:杂草的生长迅速赶上了小麦、黑麦或燕麦。正如今天的农民并不全都拥有拖拉机一样,过去的许多农民(占半数以上)没有牵犁的牛马。就在20世纪初,夏朗德等地区“使用两头牛的农户已属富裕农民,一般小户人家犁田,就用一头驴或瘦弱的母牛牵引¹²⁶”,且不说有的人家还没有犁。

以上说明已十分清晰明了。但是,还可以反过来进行解释;一方面人力耕地要求拥有大量的劳力;另一方面,劳力过剩也势必让人采用这类费工的耕作方法。劳力过剩自动限制“在农业劳动中使用牲畜”¹²⁷。人和牲畜互相抢活干。

我们对当时的人畜数量略有所知。1789年约有马170多万匹,牛600至700万头¹²⁸;到1862年,马和牛的总数分别为300多万匹和将近1300万头。¹²⁹牲畜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而农业人口的增长却没有那么快,只是从2090万人上升到2660万人¹³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这相当短的时间内,我国的农民开始获得解放。透过停滞不前的表象,我们看到农村已有了迅猛而持续的进步。在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这一进步来得更要早些¹³¹。

作物的种植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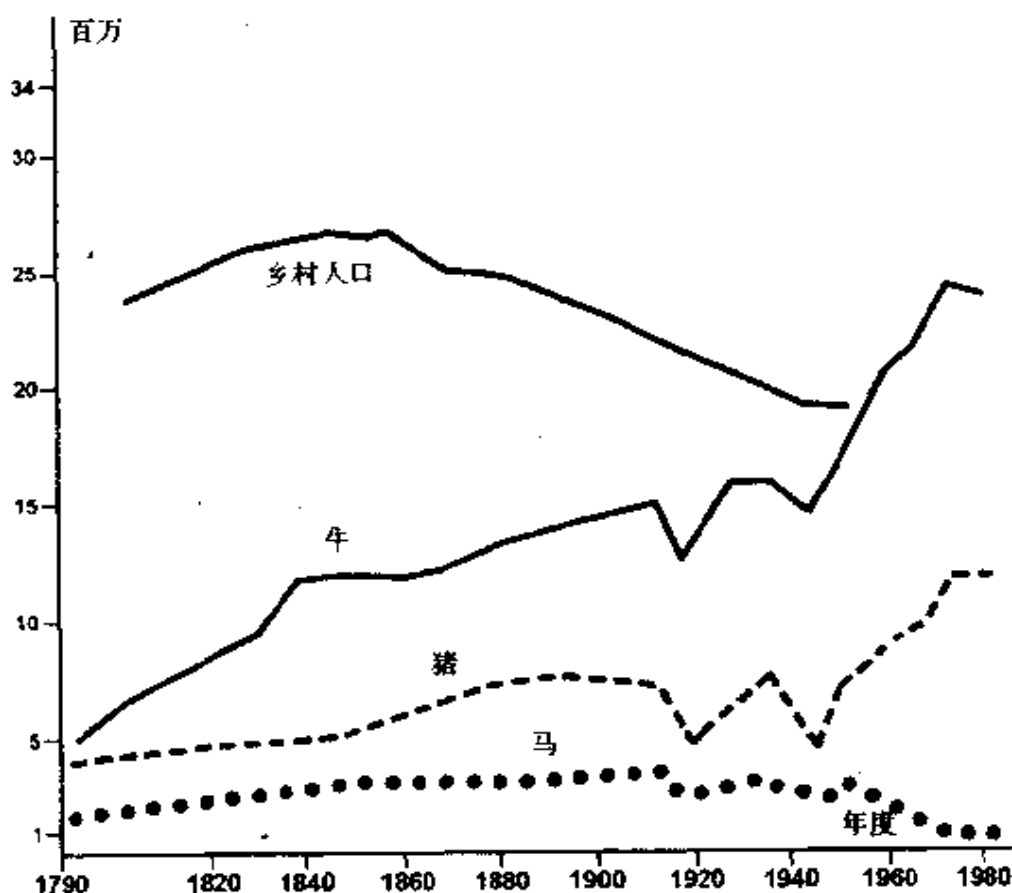
标题本身足以说明问题。它表明农民必须注意不同作物的地理配比,并且有比例地分配种植面积;比例一旦确定以后,随后的变化便只会很小。

要弄明白这些配比的原因,可以通过许多途径。首先,人吃东

西是为了生存,不能仅仅吃面包或者吃谷物、栗子之类的面食。¹³²必须有油料作副食:黄油算是奢侈品;猪油和肥肉;橄榄油及其他植物油;核桃油既可食用,又可当作灯油。最后还要有蛋白质:奶、蛋、肉。皮埃尔·台封登把“食品地理”置于“住房地理”之上¹³³,但住房也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如果再加上“衣着地理”,介绍就更加全面了。农民为了吃穿住,力求做到“自己养活自己”,不仅“吃自己做的面包”,而且在自己生活的地域内生产一切。为此,多种经营也就势在必行。

看来,我们必须抛弃某些似乎合情合理的旧习惯,甚至违背由词源所确定的词义,硬是把“农业”一词用作多数,以便把各种乡村活动全都囊括进来。列入农业范围的有林木及橄榄、板栗、核桃等果树;葡萄种植;草场和养殖;菜地和麻田;大田作物(以种植谷物为主)和小杂粮,其中包括荞麦、玉米、土豆等逐渐试种和推广的新作物;人工草场(人工草场怎样被纳入到旧式的土地配比系统中来?这个问题尚待解决);最后还有一系列经济作物,如桑树、烟草、甜菜、油菜、向日葵以及菘蓝、茜草等染料作物。关键是要看到这些不同作物在农业地域内怎样合理布局和互相制约,因为它们势必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每种作物的地位本身都可能有所变动,但即使在所谓危机和解体的时期,这种变动也极其缓慢。

在以上列举的一长串名称(单子并未列齐)中,人们惯于仅仅关心名副其实的农业和畜牧业,也就是只考虑到谷物和牲畜的生产;它们确实是最主要的两项,但乡村活动并不仅限于这两项。马克·布洛赫指出:“在法国以及在欧洲,农业经济建立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的文明有别于远东文明的一大特征”¹³⁴。这个事实早已为人们所知。阿里埃日省1790年的一份文件说:“农业由相辅相成的两部分所组成,即耕种土地和饲养牲



1806 至 1945 年间乡村人口和牲畜的数量

以上图表记录了 1789 至 1860 年间力畜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与之相比,乡村人口的增长较少(自 1860 年起,甚至逐渐减少);1930 年以来,力畜不断减少(马今天几乎消失);猪和牛的数量增加很大,与肉食消费的增长相适应。

(资料来源:《生殖力与市政建设》,Y. 杜戈著,1975 年版。)

畜。”¹³⁵所谓“相辅相成”,也就是保持平衡对双方有利;上面引证的文件恰恰反对过量垦荒,这对畜牧业显然有害。

但在法国,不可能不把葡萄种植业当作农民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伊萨克·德·品托¹³⁶始终关注当时的现实,他于 1771 年清楚地看到了农业活动之间的平衡问题。他写道:“剩下的问题是要知道在耕地和草地之间是否应保持一定的比例,把太多的草地改作耕地是否有危险,英国过分奖励出口小麦是否可能导致这一流弊¹³⁷。法国必须同时照顾葡萄、草地和耕地;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

当然更加复杂。”

在伊萨克·德·品托列举的三项变数——小麦、饲草、葡萄——之外，我至少还要加上林木这一重要的变数，以便在整个乡村世界中突出乔木林、灌木林同“田野”的重要界限，所谓“田野”¹³⁸也就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开阔地。

举出以上三项或四项变数，目的在于说明农村的漫长演变，其中自然还有其他的变数。这样做未免有点简单化，但仍可为人们所接受：稍为懂得点代数的人都知道，凡在作大数（乡村的情形正是如此，涉及到几百万公顷，几百万公担，几百万法郎，几百万头牲畜，几百万名居民）的运算时，函数的总和接近于最大可变数。

从以上概念出发，我们且看法国当时的情形。1859年，即在萨瓦和尼斯被并入法国前不久，法国领土面积约在5300万公顷左右（萨瓦和尼斯的面积为100万公顷，人口约70万）。¹³⁹在这个数字中，一般应扣除“不征税”的土地面积（居民点、道路、河流等）；经过扣除后，取个整数，以便对始终不完整的资料作出概略的计算：土地面积为5000万公顷。资料不全的原因已如众所周知：首先是农民对调查统计怀有反感，他们总是害怕在调查的背后藏着开征新税的计划。¹⁴⁰帝国期间向各市镇收集的统计数字可能在细节上有点出入；但就总体而言，我们从中还能得出几个大致可靠的认识。

计算得出的第一个结果：全国土地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可耕地”，另一方面则是我有时因找不到更好的词而称之为任其自然的“空地”，其中无疑包括森林、天然草场、荆棘丛生的荒野和放牧地。“可耕地”是个方便的用语，但在使用时必须小心，它确指实际耕作的或可用犁翻耕的土地，也许采用“耕地”这个说法更加恰当。根据这一方法计算，1859年的耕地约为2500万公顷大田，加上200万公顷葡萄园，200万公顷菜地和果园，总共达2900

万公顷。至于空地，共有森林 800 万公顷，天然草场 500 万公顷，荒野和放牧地（原有的荒地或后来撂荒的土地）800 万公顷，总计 2 100 万公顷。全国的土地面积并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 2 900 万公顷对 2 100 万；人力经营的土地占一部分；空地向耕地的过渡相当缓慢，但从很早开始，并且持续不断。1815 至 1859 年间，转为耕地的数量可能达 100 万公顷，为数已很可观。

就在 1859 年，由人力经营的 2 900 万公顷土地又怎样划分？在“菜地和果园”的范围内，菜地为 50 万公顷；栗树 55 万公顷；橄榄树 10 万公顷；桑树 5 万公顷；苹果树及其他果树 20 万公顷；苗圃、柳树等 60 万公顷。在 2 500 万大田中，小麦占 650 万公顷；黑麦及小麦和黑麦的混种占 250 万公顷；大麦、玉米和荞麦占 250 万公顷；燕麦占 300 万公顷；块茎作物（包括土豆和甜菜）占 150 万公顷；人工草场 250 万；豆类 50 万；经济作物（油菜、大麻、亚麻、茜草、烟草等）50 万；还有休耕地 550 万¹⁴¹。至于葡萄，种植面积不过 200 万公顷。

以上数字在许多地方引人注目。

它们又一次表明葡萄占地面积较小（甚至不到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在一张小型地图上只能用点、线和有限的暗影显示）。

它们还表明，在 19 世纪中叶，外来的新旧作物，即块茎作物（土豆和甜菜）、玉米、荞麦、人工草场、茜草，都已在当地立足生根。

然而，即使晚至 19 世纪中叶，谷物种植数量之大使法国乡村仍保留着昔日单调的景色。正如马克·布洛赫¹⁴²所指出的，明知多种小麦有害，也还拼命多种，因为小麦“必不可少”¹⁴³。结果在本该长草、种葡萄或果树的地方，也都成了麦地。鲁西永地区普拉德附近的乡村为保护庄稼免受北风带来的干旱之害，对土地进行浇灌¹⁴⁴。在汝拉山区的蓬塔利耶（海拔 837 公尺），莱昂斯·德·拉韦涅（1860 年）惊奇地“发现在松树区的上方竟有麦田；这里同北欧

一样,在每年9月初雪降临进行收割。¹⁴⁵

作物的种植比例(续)

把统计日期定在1859年,也就是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中期,这是否超出了所谓农民经济的时间界线了呢?我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

通过用以上列举的数字所绘制的模式,我们不难向以往的时代进行追溯。

阿瑟·扬就旧制度末年所作的估测,经莱昂斯·德·拉韦涅略加修改后¹⁴⁶,与以上的数字相当接近:耕地(2500万+150万+150万)共计2800万公顷;非耕地(900万+300万+1000万)共计2200万公顷。耕地已经占了多数,森林、荒原和天然草场只占不到一半,尽管其绝对数字比1860年多了100万公顷。

我们还不妨把时间再往前推,虽然越往前去,出现误差的危险越大。好在我们至多只是寻求一些数量级。

1700年正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夕,路易十四(卒于1715年),沃邦(卒于1707年)和布阿吉尔贝尔(于1697年和1707年分别发表了《法兰西详述》和《法兰西一览》两书)已近暮年,法国全境的面积约在5000公顷左右。洛林、科西嘉、孔塔—佛奈桑、萨瓦和尼斯当时都还不归法国所有(洛林于1766年夺得,科西嘉于1768年购买,孔塔—佛奈桑于1790年为法国侵占,萨瓦和尼斯公国于1860年并入法国版图)。扣除300万公顷的“非征税土地”后,还剩下4700万公顷。耕地除2300万公顷农田外,加上葡萄园,共2600万公顷,而空地则是2100万公顷。在这启蒙时代的初期,耕地与野地比1789年那时更接近于一半对一半。差距不大,但差距毕竟已经存在,并且今后逐渐扩大。布阿吉尔贝尔说,“法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陷于荒芜或没有很好耕种”,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他又补充

说,如果农民进行垦荒,由于捐税和费用过大(我再补充一句,由于产量低下),“收成将得不偿失”¹⁴⁷;对于这一见解,人们倒是值得再作一番考证。

毫无疑问,在时间上再往前追溯,将是令人神往的和十分必要的。达符内尔伯爵很久以前(1894年)¹⁴⁸曾作过这一尝试;当时,价格运动的研究、历史人口学尚未诞生,或至少还不易为我们所掌握,任何人还没有根据宏观经济和国民产值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达符内尔伯爵过去曾遭到大学里的历史学教授的无情批判和讽刺挖苦,如今重新获得我们的信任,因为大家发现,我们根据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数据小心翼翼地画出的价格曲线,竟与他凭着一些零星资料推导出的结论只是大同小异。归根到底,谁又会不承认达符内尔伯爵的广博知识?他的计算和估测险象丛生,但又充满机智,使我们回到1600年左右亨利四世和苏利时代的法国。一下竟又后退了整整一个世纪。

1600年的法国版图不过4400万公顷(扣除“非征税的”土地,面积可能为4200万公顷)。根据达符内尔的推算,耕地占总数的32%;荒地占27%;林木占33%;草场和葡萄园占总数的7%。把最后的数字一分为二,3.5%为草场,3.5%为葡萄园。种植面积将达35.5%,空地则相应为63.5%(前者为1500万公顷,后者为2700公顷)¹⁴⁹。由此推测,在所谓“近代”业已开始的当时,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竟比人力耕耘的土地还要广阔得多。

我不能肯定达符内尔的计算完全可靠。也许他本人能确信无误。在我们只拥有零星数字的条件下,他却推算出了一些数量级,这毕竟是个聪明的办法。他对每公顷土地的收益(根据在外省进行抽样调查所取得的几个可靠的数字)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进行比较,然后再计算农业总收入。他得出的结论是,从1600至1890年,实现了三大进步:首先,法国的领土扩大了,面积由4400万公

顷上升到 5 300 万；第二项进步更值得我们重视，种植面积增加了，已从 1600 年的 35.5% 提高到 1890 年的 60%；第三项是每公顷土地的产值，按法郎的固定值计算，从 1600 年的 19 法郎增加到 1789 年的 26 法郎，又增加到 1890 年的将近 50 法郎。由此可以说明，农业总产值由 1600 年的 5 亿法郎上升到 1789 年的 10 亿法郎（这个数字据我看恐怕偏低了），再上升到 1890 年的 24 亿。以上是达符内尔推算的数字¹⁵⁰。历史学家自然可以对此各抒己见，甚至加以完善，但就发展的方向和规模而言，达符内尔的推测大体是无可怀疑的。

以上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历史的背后，还有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法国，这一庞然大物千百年来受到人力劳动的蚕食，但它又不断在抵抗斧、锄、犁、锯的侵蚀，抵抗刀耕火作的盲目破坏。人一旦稍有松懈，自然便迅速夺回土地。此外，自然也利用某些人为的保护：领主把森林视为禁脔，竭力禁止狩猎，各村庄对公有产业死死抱住不放……非耕地自然也必不可少，城里人要取得建屋的木材，取暖的木柴，以及工业用的燃料；农民和领主则利用天然草地和树林放牧牲畜。“天然”和“耕作”必须共存，并保持一定的平衡。

平衡何况有一道防线作保障，这就是效益递减律，杜尔哥至少已预感到这条相当严格的法则的存在。确实，开垦荒地势必扩大村庄的耕作范围，同时也增加在住宅和耕地之间的往返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尤其，远离迄今已有几百年耕作历史的土地，那里的荒地土质极其贫瘠。收获的庄稼微不足道，甚至不够耕作者养家糊口。1520 年间¹⁵¹，香巴尼的某些修会把土地撂荒，正是因为这些土地超出效益递减的警戒线之外，生产的产品“不能与支出的费用相抵”。

总之，各种迹象全都有助于我们看到，法国农业的命运就表现

为人与自然(乔木或灌木、植物或动物、死水或活水)进行的一场决斗。野兽数量之多难道不恰好说明人类世界之外还另有自由天地吗?特别是狼,狼在法国的滋生繁殖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据一份报告指出,在弗朗什-孔泰,自1775年至1784年3月,该省9年内共杀死母狼627只,公狼641只,狼崽1385只,总计达2653只¹⁵²。但这肯定还不是最高记录。如果离开法国,再往东去,狼的骚扰简直成为一大祸害。“1822至1824的两年间,利沃尼亚被狼咬死的家畜达2.5万头。”¹⁵³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挪几个世纪,狼的活动地盘也就更大:“1341年夏季,特鲁瓦附近的人共捕获狼571只,打死18只。”¹⁵⁴只是到了1850年前后,狼终于消声匿迹。也有一些例外,如在贝里地区,莱昂斯·德·拉韦涅于1870年说,“这里的狼害尤多”¹⁵⁵;但有些喜欢猎狼的人也往往人为地让狼的存在多维持几年时间,正如今天个别地方还在继续捕猎野猪一样。

野猪本该是更好的见证,但有关野猪的骚扰,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却不像狼害那样令人惊慌不安而引人注目。我在一份名叫《下莱茵省信使》¹⁵⁶的正式报刊上读到1817年6月22日的一段新闻,确实有点感到意外:“在默兹省,人们对野猪的危害抱怨甚多,它们成群结队地涌到土豆地里去进行破坏。”野猪虽是食草兽,但对人的抵抗,比食肉兽狼更凶;照道理讲,狼并不可怕,而且也不值得可怕。至于一般的小动物,那就更多了,尤其领主自己很少使用狩猎权,却对别人强加许多限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狩猎活动有了显著的增加,农民的偷猎行为也成倍增多。这对“黑色兽和褐色兽”¹⁵⁷原是活该倒霉。可惜的是,与此同时,却造成了对森林的破坏,这几乎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我们另外还看到,尽管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耕地的面积会有增有减——已经排干积水的沼泽再次沼泽化,已经开垦的土地重新被撂荒,已经砍伐的森林自动复生,逐渐长高,漫过林

边的沟壑¹⁵⁸……但从长远看,征服自然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耕作和开垦荒地是人与自然作斗争并不断战胜敌人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取得一定的进展,把这种恒久的积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法国农村乃至整个法国发展缓慢的、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

新作物代替旧作物

在农业活动的范围内,各种作物之间互相争夺耕地。负责种植的农庄主至少总会偏向一些作物,然后又反过来偏向另一些作物。平衡似乎自动得以实现;明年的作物布局会与今年差相仿佛。但是,通过点滴的变化,差异终究会逐渐变得明显起来。

例如,诺曼底原来比别处更加重视种草。但真正从种植粮食到发展草地的转变却姗姗来迟。在奥日地区,牧草种植只是从1680年开始出现和迅速推广。下诺曼底地区更要等到1820年,草场才取得胜利。有人说,在诺曼底是牛排挤了人;此话不错,但这一进程却花了很长时间,前后延续达几百年之久。尽管牧草的单一种植具有很多便利,实现这一转变却绝非一日之功。

我举诺曼底地区为例可以提醒人们注意,新作物的打入农业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不仅因为人们对新作物很不熟悉,需要经过多年观察和试验。人们宁可在便于日常照看的宅旁园地中进行试种,使之经历炼狱的考验:荞麦、玉米、烟草、土豆、菜豆、西红柿、油菜、向日葵、甜菜等等无不如此。德·维旺骑士从美洲回来,于1637年在克莱拉克引种烟草,拉普莱涅神甫说,“种子首先播在宅旁园地”¹⁵⁹。只是到后来,在试种成功后,作物才移种大田,并茁壮生长。

新作物一经栽种,便与其他作物进行全面的竞争:为了争得立足之地,它们必须取代原有的作物或与后者和平相处。对于作物与

作物的争夺耕地，人并不始终都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一切全都将缓慢地进行。

油菜很早已在后来的北部省种植，但要等到 1788 年才传到厄镇和迪埃普一带，并于 1860 年前几年逐渐普及¹⁶⁰。甜菜（普鲁士化学家阿夏尔于 1799 年在柏林试验成功后，实现了甜菜炼糖）¹⁶¹ 也不例外。第一执政于 1801 年决定在法国引种甜菜，大陆封锁政策促进了这一作物的种植。然而，在与蔗糖的竞争中，甜菜糖将花 100 年时间，方才站稳脚跟，并在法国逐渐发展。

如果新旧作物能和平相处，问题可以较快得到解决。在玉米地里仍可间种蔬菜。让-雅克·默努雷（1791 年）对伊泽尔河两岸的作物进行了仔细的观察¹⁶²，发现“如在玉米株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间种豌豆和菜豆等作物”。这在葡萄株距间本是习以为常的事。例如，在 18 世纪汝拉山区的卢河河谷¹⁶³，或在 1900 年朗格勒高原的某个村庄周围，据约瑟夫·克雷索说，“葡萄园里还生产大蒜和小葱，菜豆和小萝卜”¹⁶⁴。最后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一半小麦对一半黑麦实行混播。朗格多克还将燕麦和野豌豆混播¹⁶⁵；曼恩地区实行小麦和山豆混播；黑麦和燕麦也可混播。另一可能是在一种作物的行间套播另一作物的种子。作物套种来自英国，法国当局于 1787 年正式通令推广：6 月初，在蚕豆和豌豆地里，建议播种大萝卜（品种不同于英国的），大萝卜长成前，前两种作物业已收割完毕¹⁶⁶。

这几乎可以说是新旧作物之间的妥协。一些新作物就这样悄悄地取得细小的成功。但也有一些新作物不是那么容易迁就。

以荞麦为例，尽管名称叫麦，却是一种蓼科植物¹⁶⁷。它于 13 世纪抵达布列塔尼，由于生长迅速，可在收割完小麦、黑麦或大麦后空出的土地上种植。让-雅克·默努雷指出¹⁶⁸，每当 7—8 月间，只要割完小麦的麦穗，土地不经翻耕，“即可播种荞麦；到 10 月末，农

民又能获得一季不错的收成；荞麦面可制面包，顶饥而富营养，也可煮面糊；荞麦粒和荞麦面用处甚广，主要用于为猪、火鸡和其他家禽催肥。草秸还可用来增加肥料。如在荞麦开花时把作物翻入土下，立即使土地适于小麦的播种和生长；在一些收割较晚和播种较早的地区，由于间歇期太短，赶不及多收一季荞麦，就必须把播种推迟到下年的春天”。以上文字清楚地说明有两种办法可以采纳：或者收获粮食，或者在作物开花时充当绿肥。第三种办法要我们花点功夫去想象。我以为荞麦只能在小麦、燕麦或大麦留下的空地上作为春季作物种植。可以肯定的是，荞麦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及南方各地农民的食粮中从此占有重要的地位。到17世纪，荞麦也在阿列埃日的山区落户生根。¹⁶⁹

玉米很早抵达巴斯克地区¹⁷⁰，但它在阿基坦地区，特别在图卢兹四周明显地站稳脚跟，却是在17世纪最后的25年期间。玉米逐渐发展推广，取得重要的地位，并成为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产品。尽管圣通日地区的“葡萄园主眼看廉价劳动力纷纷出走而叫苦不迭”¹⁷¹，玉米生产却使巴洛克时代的法国南方免遭饥馑。到18世纪末（1791年），让-雅克·默努雷为玉米大唱赞歌：“玉米，又称大粒麦或土耳其麦，系枝叶繁密、籽粒众多之作物，多粘质，喜在优质土地生长，但它在空气中吸取大部养料；收成可达种籽的百倍，余下大量的棒芯可充肥料；过剩的枝叶是喂牛的极好草料……留茬地上播种的玉米可提供青饲料，在春季可多次收割，堪与优良的草场相媲美。”¹⁷²最后这个方法至今仍然通行。但玉米的主要用途还是充当粮食。在春季青黄不接之际，实行两年轮作制的法国南部用玉米补充食粮的不足，不但人可食用，饲养牲畜价值更高。每当农民需要增加收入时，便以玉米充饥，留下小麦送集市出售。图卢兹正是依靠玉米才得以发展粮食贸易，并成为专门从事小麦贸易的大城市。顺便指出，玉米原系南方作物（见本书第一卷第41页插

图),只是在不久前培育了抗寒的杂交品种后,才在法国普遍推广。

土豆同玉米一样都从美洲引进,也曾经历同样的困难,随后陆续得到解决。由此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鉴于土豆在法国的食物中所占的地位,这场革命的意义肯定将更加深远。欧洲 19 世纪的人口增长,据有的历史学家说,是因为接种天花疫苗的逐渐普及,又据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斯歇等另一些人说,是土豆种植的推广¹⁷³。两种理由无疑比一种理由更能说明问题。

土豆于 16 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几块块茎先后被交给了两位植物学家,一位是名叫约翰·钱拉德的英格兰人(1586 年),另一位是名叫夏尔·德·莱斯克吕兹的法国人(1588 年),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居住。凑巧的是两人拿到了两种不同品种的土豆,随后一个半世纪种植的土豆均来源于此:一种是德国的土豆,呈红色;另一种是英格兰的土豆,呈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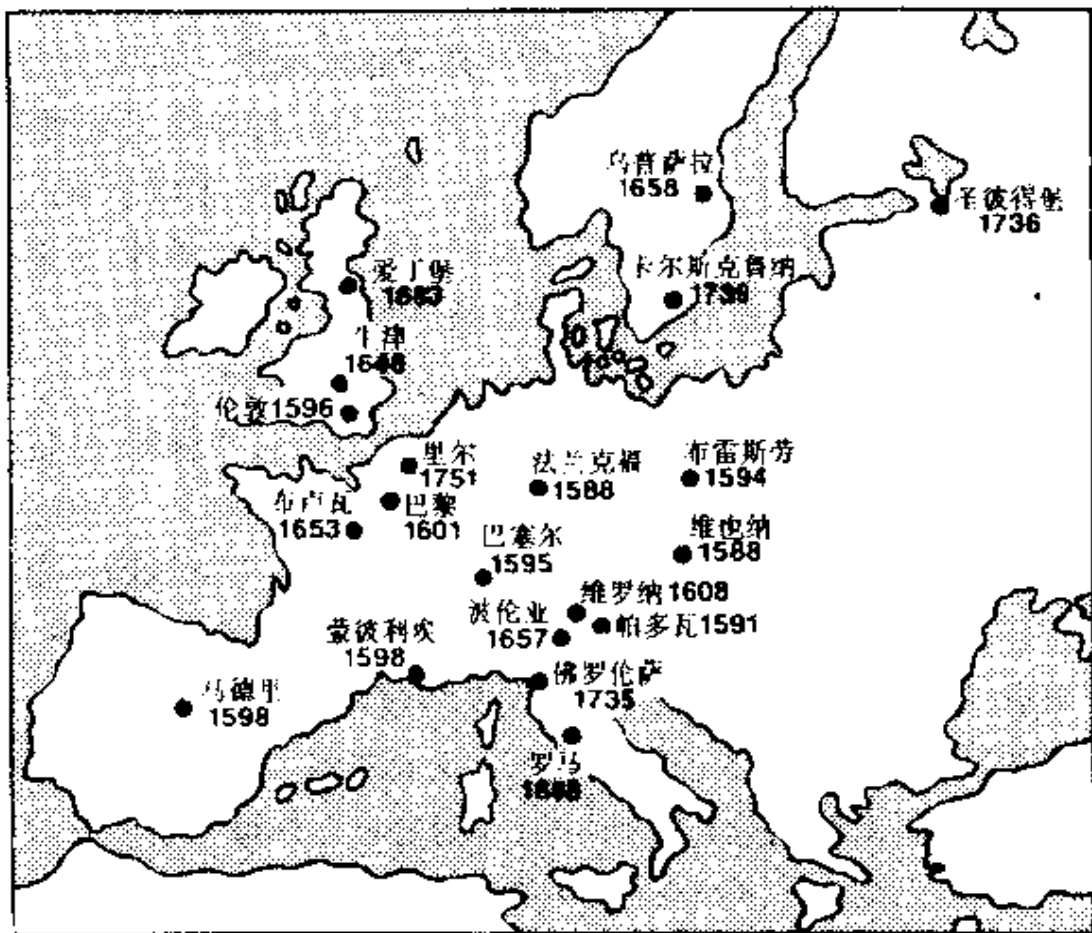
然而,土豆只是到 17 世纪中叶才在德意志和奥地利从小块园地移种大田;随后,土豆又传往意大利、瑞士、多菲内、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孚日和佛兰德等地区¹⁷⁴。当时,土豆几乎专供牲畜和穷人食用。帕芒蒂埃于七年战争(1756—1763)被俘期间在普鲁士发现了土豆,他告诉我们说,当时唯一的食品就是土豆以及刺柏子酒。同样,很久以后,当法军从莱茵河到多瑙河迅速出击、攻克乌姆(1805 年 10 月 20 日)、接着在奥斯特利茨一战大捷(同年 12 月 2 日)时,法国士兵也以土豆为食粮。土豆在德意志首先充当粮食因此已可以肯定无疑。尽管如此,直到 1781 年,在易北河流域,仆人宁愿改换主人,也都不肯食用土豆¹⁷⁵。英国对土豆的成见更深,长期只是被当作一种普通的观赏植物,而贫瘠的爱尔兰将于 17 世纪下半叶接受新作物。正是爱尔兰人终于把土豆种植引进到英国农业中来,并随后又传往北美洲。

尽管取得了这些初步的成果,土豆却必须等到 18 世纪中叶,

才在我国登上“大雅之堂”，才有人鼓吹它的食用价值和烹饪价值。人们可以猜想到，土豆的长期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试种的原始品种质量不尽人意：直到1752年，土豆品种始终只有两种；1757年已有7种；1770年有9种；1772年有40种；据维尔莫兰提供的数字，1846年多达177种。今天可以举出几千个品种，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种植者不同的要求以及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人们最初往往想用土豆制作面包，其失望的心情不难想象。

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演变无疑可用人口增长作解释。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懂得了新作物的社会意义。例如，在利摩日财政区，土豆一度曾遭禁止，据说食用后会生麻风病。当杜尔哥于1761年出任巡按使时，他在农业学会和神甫的帮助下，终于破除了这个迷信；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公开食用使人产生恐惧的块茎。卡斯特尔大主教在教务会议上向属下的本堂神甫也作了宣传，因而比利牛斯地区于1770年前后已大规模种植土豆。¹⁷⁶

然而，只是在1769—1770年的大饥荒后，才实现了重大的转折。贝桑松科学院次年以“指出有什么植物在饥荒期间可作人的代食品”为题举行征文。送审的所有论文都谈到了土豆，特别是帕芒蒂埃提交的获奖论文。帕芒蒂埃当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对“同胞的恶意诋毁”表示遗憾；他接连发表文章，介绍种植和存放土豆的方法，组织以土豆食品为主的晚宴（阿瑟·扬是宾客之一），在巴黎集中法国种植的所有土豆品种，并从美洲引进新品种，以便进行选种¹⁷⁷。1786年，经路易十六批准，他在位于巴黎城外讷伊附近萨布龙平原的20多公顷的贫瘠荒地上建立了土豆种植场。试种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帕芒蒂埃希望带动更多的人食用土豆，他灵机一动，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引诱偷盗。他故作姿态地派出骑警队看守种植场，但仅限于白天。与此同时，他劝说地主不要对农民实行强制手段，只是自己在一块好地上精耕细作，并且“明令禁止外人进



土豆在欧洲

请注意,这张地图只注明了土豆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日期,但并未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土豆作为人畜的食粮在欧洲推广,这一推广的时间更要晚些,具体日期且因地而异。以英国为例,则要晚一个多世纪。地图原作者为格奥尔基·芒迪和泽尔丹·察克。

入”¹⁷⁸。他采用的这一手法自然比弗里德里希二世更加巧妙,后者在普鲁士出动部队强迫农民种植土豆!

帕芒蒂埃所作的努力常遭耻笑,被人视为怪癖;其实,这种努力不仅十分必要,甚至还很不够。请看马延省共和四年风月 29 日的这封官方信函:“土豆种植几乎仍处在摇篮阶段,因为它仅在宅旁园地、最好的土地以及不惜工本地施粪肥的地块取得了成功。”¹⁷⁹

在法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土豆的光临姗姗来迟。在昂茹地区的于耶村，仅在 1790 至 1795 年才出现土豆，但随后逐年有所发展。土豆不但是“为猪催肥的饲料”，而且是“人在灾年的食粮”。“于耶村 1834 年共有 105 公顷土地用来种植土豆，几乎占谷物种植面积的 25%。”¹⁸⁰

让-雅克·默努雷于 1791 年对土豆的赞誉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因为他生活在伊泽尔省，生活在法国首先种植土豆的地区。请听他说：“土豆这一奇妙的植物包含大量甘甜的粘液质，可充当最高级的和最普通的菜肴配料，可制作精细而多样的美味佳肴，供富人们大饱口福[实际上，富人对这‘胖乎乎的怪玩意儿’向来很不感冒]，也可提供为公民各阶层普遍接受的简易食品。”他接着又说：“经过我的推广、鼓励和促进，这一作物已在我的土地上种植，并给我带来许多好处：土豆用途众多，可端上主人、佣工和仆人的餐桌，可充当猪、火鸡及其他家禽的饲料；此外还可赈济贫民，在市场出售，等等。产量之高令人欣喜！”¹⁸¹土豆很早被用来养猪，赶着猪群去森林里吃橡实现象因而逐渐被人所遗忘。在圣通日，当小麦和玉米出现匮乏时，农民不得不以土豆充饥，养猪业为此陷于停顿。19 世纪初期的尼韦内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形。¹⁸²

土豆对生产者或对消费者，都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读者要了解这个过程，请到法国东部去访问。在阿登省的利伯维尔，有一名教师自告奋勇地向你作介绍，此人名叫科莱，其身份我还说不清楚。利伯维尔是大革命初期确定的地名，不必再到地图上去寻找，该地现名夏尔维尔。我这里有科莱于共和三年霜月 30 日所写的信，离罗伯斯庇尔垮台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国民公会将于 1795 年 11 月 26 日宣告结束。但这封信件对政治竟然完全置之不顾，一味谈论土豆。首先就讲土豆的种植方法，科莱写道，“我的办法是，在冬季或秋末冬初，先用犁锄进行一次深耕”。霜降后，再耕

一次，用锄挖孔，沿直线保持四、五尺的间距，一人在孔内安放土豆，另一人在边上传送……每个孔内都要施肥，然后用土盖上。当作物“长到一尺或一尺半高时，我把尽可能多的茎枝一次翻压在地，以利生根分蘖”¹⁸³。到了夏天，必须铲除野草，但下手要轻。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科莱谈到了土豆的品种问题。他写道：“我现在种的土豆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红皮的，另一种是黄皮的。红皮的与甜菜的颜色相同，表面光滑而皮厚，呈椭圆形，最大的个儿与妇女的木屐差不多大。第二种有黄色的外皮，长得最好的比拳头大一点，表皮与第一种同样光滑，呈不完整的四方形。两种土豆的内实都呈白色，且味美可口，让人愿意吃它。”¹⁸⁴

土豆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发展可见下面的图表。甚至在霜霉病——该病并不仅限于危害葡萄——于 1846 和 1847 年先后在爱尔兰和法国肆虐期间，土豆的增长仍未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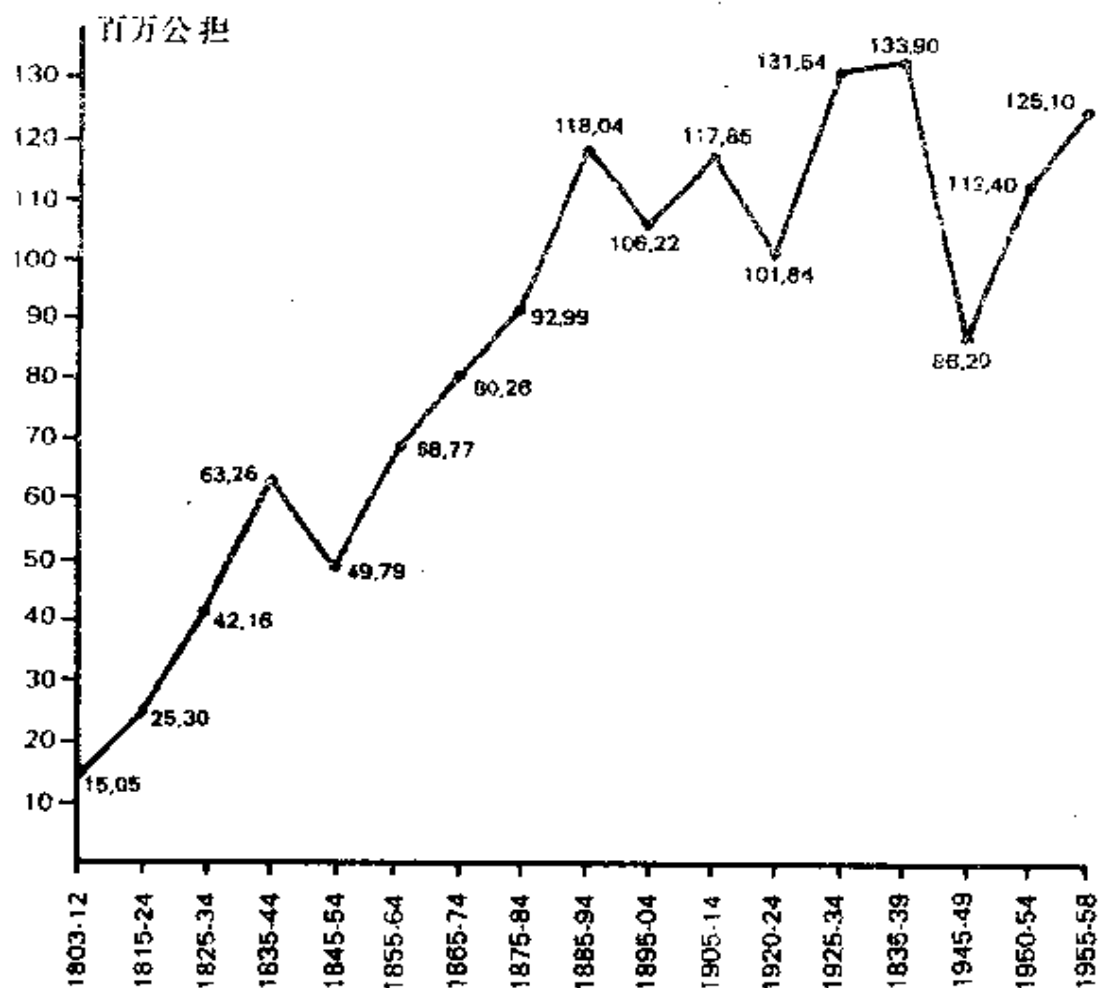
以上对土豆所作的介绍大体上对甜菜、茜草和桑树均可适用；在罗纳河谷和阿尔萨斯北部，茜草长期又名阿格诺“红”；桑树在这里种植更早，促成丝织工业的繁荣。

在休闲地上

所有这些新作物都有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它们可在休闲地上种植，而不与传统作物争地。

在实行两年轮作制的情况下，乡村的土地被分成互相轮换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种植庄稼，另一部分休养地力。这些土地每两年都有一年轮空，原则上不种任何作物，但只是表面上不事生产；地上长的草可供牲畜食用；土地经过多次翻耕，可为来年进行播种，特别是为播种小麦作好准备。

在三年轮作制中，休闲地占村庄土地的三分之一，其他两部分土地分别种植小麦（或黑麦）和春季作物（又称三月作物，因在三月



法国 1800 至 1950 年的土豆产量

(参见让-克洛德·杜坦:《1700 至 1958 年的法国农业生产》, I, 《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学报》第 115 期, 1961 年 7 月。)

播种而得名)。这些茬口实行交替轮换。法国各地休闲地的面貌各有不同(名称也因而异¹⁸⁵)。有些地方实行“绝对”、“完全”的休闲,称作“死休闲地”;另一些休闲地则是相对而言,多少还种一点作物。18 世纪被称为“农业生活的耻辱”的休闲地显然是“死休闲地”,它们不事任何生产,满足于为来年的庄稼作好准备。

这些空地历来都促使人们加以利用。自古到今,每当春天来临,休闲地上长出了青草,人们就去那里放牧。人们不经意地在休

闲地上种点作物,如白豌豆、灰豌豆、野豌豆、滨豆、蚕豆、菜豆等等,这种做法已有很长的历史,即所谓“偷种”。对各种因素经过仔细的衡量,荞麦、玉米、土豆至少最初都曾所谓“偷种”的作物。被它们所挤走的无非也就是以往“偷种”的作物而已。在莫尔旺地区,土豆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种植以后,因 1812—1813 年的粮食危机而得到推广,它一下就把荞麦种植给淘汰了。¹⁸⁶

总的说来,以上这些新作物都比较顺利地站稳了脚跟。建立人工草场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农业革命。

新作物代替旧作物(续):人工草场

天然草场是与沟边、河岸一样自动长草的草地,向来成为人们觊觎的对象:早在十世纪那时,马孔内地区草地的价值“两倍于耕地”¹⁸⁷。晚至 1680 年,博韦齐地区种植谷物的耕地每弓丈价值 60 至 100 里佛,而每弓丈的草地则达 200 至 800 里佛,差价反而有所扩大。¹⁸⁸

与天然草场相反,人工草场是人力经营的产物:用锄镐翻耕土地,施肥,播种苜蓿、三叶草、驴食草、野豌豆。这些作物有时混杂在一起播种,效果往往不好,因为它们长势不一,又不同时开花。有人于 1786 年经观察后指出:“这大概不是个好办法,因为三叶草长不到苜蓿那么高,往往被闷死;驴食草比其他作物早开花,也应该早收割,总是因为等着苜蓿和三叶草而受损失。苜蓿和驴食草理应单独播种……”¹⁸⁹

无论如何,如果面积相等,人工草场的产量比天然草地约高 2 至 3 倍。人工草场为畜群提供重要的补充饲料,使牲畜数量得以增加,并为农业输送更多的肥料。人工草场当然占用了一部分神圣不可犯的麦地,但它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肥源,并促进土地的固氮能力。小麦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总产量却反而增加了。

这个道理本来容易理解,但据夏普塔尔说,当时像第一执政波拿巴这样的聪明人居然始终弄不明白。¹⁹⁰

简而言之,人工草场是一场必要而强有力的农业革命的原动力,虽然这场革命在法国的展开并非一帆风顺。夏普塔尔于1823年断言:“建立人工草场和完善土地轮作已成为今天发展农业的基础。”¹⁹¹但直到那时,这个主张并未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然而,至少从16世纪起,人工草场所种的作物已在法国为人们所认识。两个世纪以后,这些作物已在夏朗德、多菲内、巴黎附近、鲁西永、佛兰德等地区种植¹⁹²,但只限于小块的土地。尤其在18世纪30年代,英国扩大人工草场取得了成功¹⁹³,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在法国方面,就有不少人进行提倡,发出警告,有时甚至声色俱厉地横加指责。1795年,马尔丹·德·夏西隆对拉罗歇尔附近的农民说:“你们在贫贱和肮脏中苟且偷生,这是因为你们不懂得安排好活计:谷物种植过多,草场面积太少。”¹⁹⁴早在20年前,有人于1777年在梅斯写了一份报告¹⁹⁵,虽然言辞的语气比较缓和,但其锋芒所向却并不含糊。报告的作者解释说,“有些土地接连从事谷物生产,致使地力衰竭”,必须予以改变;此外,现行耕作制造成洛林地区和主教国的大牲畜饲料严重不足;由此不得不从瑞士进口耕牛和菜牛,从德国、阿登地区和丹麦购买马匹,“供作战和耕地使用”。

那么,人工草场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推广呢?18世纪末,重农学派、农业学会和许多大地主(也有些大地主重视提高产量和准备进行试验)“提倡推广人工草场和块茎作物”,并把这当作他们的关心焦点,但他们的主张却很少被付诸实施。为什么“在鼓吹革新的同时,古老的轮作制在各地却依旧大量存在”¹⁹⁶?

这主要因为,人工草场的豆科作物虽有许多优点,但它们很少能在休闲地上见缝插针地“偷种”。三叶草或野豌豆每年勉强可以

充当一季作物；它们在休闲地播种后生长迅速，收割后可作饲料，获得养料的土地可接着腾出种麦。轮作仍照常进行。

但是，根据现行的规定，苜蓿在一块地上可以连续生长9年，播种驴食草或三叶草的草地也可持续6年。人们早已发现了连续几年种草的好处。大革命前夕¹⁹⁷，一份有关巴黎地区的长篇报告指出：“种植驴食草、三叶草和苜蓿的草地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几年正是生长最旺盛的时候。在这以后，作物开始明显衰退，草地也就需要更新。”人们不难猜到，连续种草就使土地不能进行传统的轮作，或者说，导致轮作次序的被打破。

然而，打破轮作次序会遇到两方面的障碍。

首先在法律方面遇到障碍：无论是承包制租地或分成制租地，租约一般规定“必须精耕细作，勤施肥料，不得改变或打乱轮作次序¹⁹⁸，违约者应负法律责任”。地主必要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据了解，在佛兰德和阿图瓦等地区，地主的起诉曾不止一次被驳回¹⁹⁹；尽管如此，法院的裁决一般都倾向于维护传统的轮作次序，人们当时认为，这对取得谷物的好收成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个障碍来自传统的放牧习惯，也就是说，土地实行轮作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耕作制度，并且是在实施习惯法的地区中推行所谓“自由放牧权”的必然结果，在法国南部实行成文法的地区，这种做法又名“通融放牧权”。

凡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村庄始终面对着由饲养牲畜和种植粮食而产生的种种束缚。村民不能够不吃面包，也不能够不拥有家畜。为便于饲养家畜，各村庄历来就实行草场的“自由放牧”和“自由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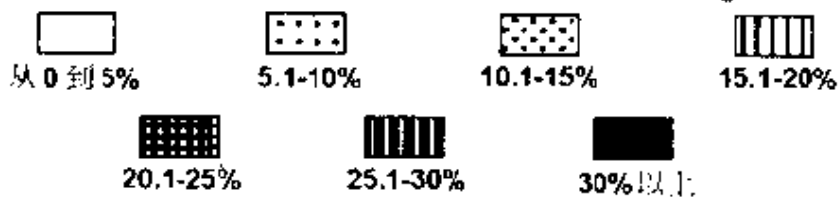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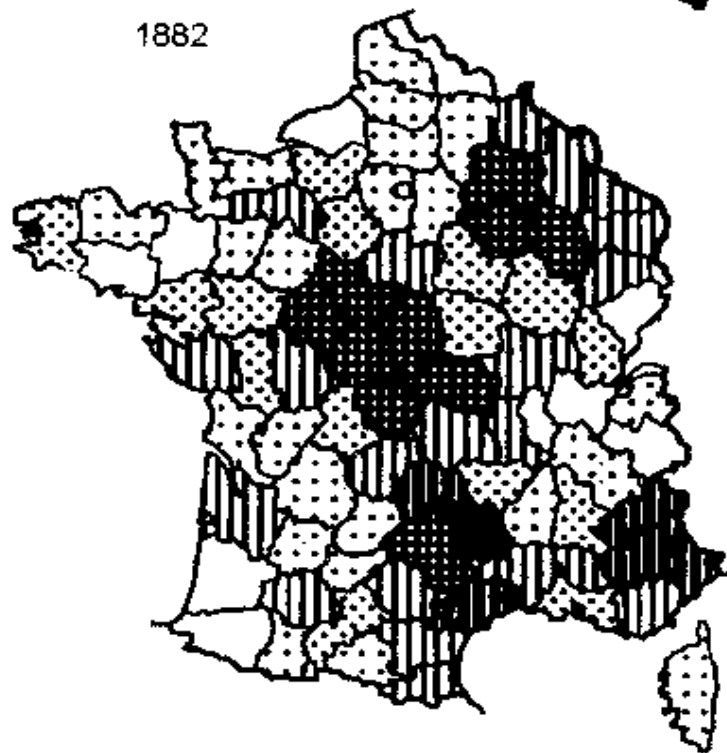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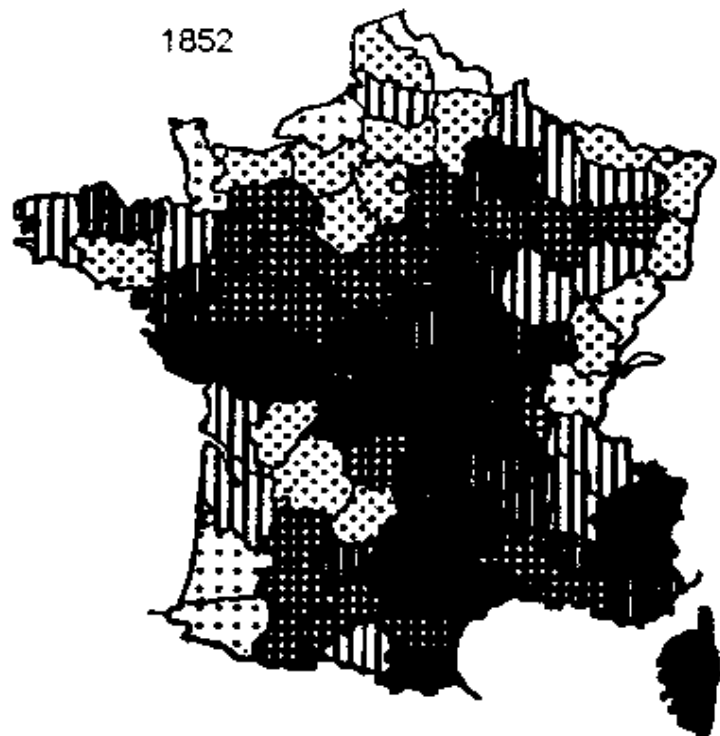
所谓“自由放牧”是指为饲养牲畜所必需的全部草地对本村的畜群开放。穷人可把奶牛牵到长草的路边自由放牧。村庄公有的未开垦土地也允许自由放牧，村民不论贫富均可受益。我在上文已

经说到,休闲地上一旦长出青草便实行自由放牧。种植粮食的上地在收割后也是如此。最后,人工草场也可自由放牧,或在饲草收割完毕以后(这种情形较少),或在新草重新长出以前(这已成为例规)。收割后长出的新草有时被称作“再生草”。洛林地区 1789 年的一份陈情书说:“自古以来,二次再生草[即经过两次收割后长出的新草]属于村民公有。”²⁰⁰

“自由通行”是“自由放牧权”的扩展,一个市镇可给予邻近市镇或从它们那里取得自由放牧的权利。村庄之间的界线犬牙交错,参差不齐,自由通行可使放牧不受村界的限制。这个办法相当巧妙,便于畜群的往来,不但有利于畜牧业,农田耕作也不受妨碍。

但这毕竟还需要有条不紊地进行,必须有计划地调换茬口,使草地能及时开放。然而,人工草场由于常年生长,势必实行圈地,以免畜群任意啃食青苗,这就使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必须把人工草场置于篱笆、围墙、栅栏和沟壑的保护之下,并且进行有效的看管。结果造成了对立双方各执一词,聚讼纷纭,一方力主维护乡村惯例,另一方要求保护私有产业,针锋相对,都想争得自由²⁰¹。在草场广泛发展的富裕地区,例如诺曼底,实行圈地无疑比别处较为容易。法国南部也同样如此,那里的休闲地、灌木林和荒地较多,推广人工草场和实行革新终究比东部困难少些(例外正证实了规律);在东北部地区,有大片的开阔地种植谷物,受三年轮作制的约束很紧,而且公有地产的面积较小。

国家显然主张增加生产,因而迅速采取了支持推行革新的富裕产业主的立场。从 1764 年起,通过发布一系列地区性命令,断然宣布废止自由放牧和自由通行。但这遇到了普遍的和强烈的抵抗。农民竭力维护他们微薄的利益。领主则不愿丧失他们拥有的自由放牧权。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法院追随领主的立场。教会也站在领主的一方,因为教会对新增的草地,如同对新开垦的荒地一样,不



1852 至 1882 年间休耕地的减少

参见费·布罗代尔和厄·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史》第三编第 672 页。

能征收什一税。各种势力全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共同汇合成为一股洪流,抵制人工草场的开辟。

至于在 1787 年成立的农业管理会议,它一方面反对自由通行,另一方面又反对禁止改变轮作次序²⁰²。这个主张其实没有多大的实际效果。1787 年,法兰西岛省农业会议曾允许希望建立人工草场的产业主实行圈地,但其面积不得超过他拥有的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²⁰³。这也许是为了寻求妥协,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一纸空文。大革命期间,1791 年的乡村法典又恢复了村民原有的自由放牧权,这一古老的权利并未真正被剥夺。

随着岁月的流逝,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而有关自由放牧权的争执丝毫得不到解决。直到 1836 年,农业委员会仍承认对此无能为力;埃纳省的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全部赞成维护自由放牧权。该委员会的专家们说,牲畜最好实行厩养,但在目前的农业条件下,这个办法似乎行不通。²⁰⁴

他们说得一点不错,如若不信,请看 1861 年 7 月 14 日在富托村(默兹省克莱蒙—昂—阿尔戈讷区)爆发的这场小小的革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村民们在小村里开始闹了起来。村长躲在家里,“未能设法平息激忿的情绪”,“该村的保安队军官杜邦·弗朗索瓦先生没有接到命令就让部下撤回”。闹事的原因正是取消自由放牧权!当时干旱肆虐,饲草匮乏使得灾情变得更加严重。14 日至 15 日的夜间,“草场的篱笆全被拆除”,此事无疑出自保安队军官的纵容。²⁰⁵

这个圈子兜了下来,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归根到底,在长达几乎百年之久的时期内,单凭小麦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并不能阻止人工草场合乎逻辑的发展。

到了 1861 年,苜蓿、三叶草和驴食草的种植面积达到 250 万公顷,约等于天然草场面积的一半。革命毕竟必然地发生了,尽管

遇到了重重障碍,尽管进行既不顺利,而且也不彻底。到1877年,村庄的公有土地在西北部地区几乎绝迹,“荒地也已消失,而在1789年,荒地仍占当地总面积的八分之一”²⁰⁶。但是,取消自由放牧权的法律只是于1889年11月21日方才通过,当时有3000多个市镇愤起抗议,认为这一决定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²⁰⁷。就在1914年甚至在后来,据我亲眼所见,在东部地区的一个村庄里,所有的畜群等到草场的再生草开始收割后,立即就通过辽阔的林地,涌进引水灌溉的草场。

革新在法国总是姗姗来迟

读者对荞麦、玉米、土豆、油菜、茜草、甜菜、人工草场等新作物如果逐一进行考察,将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全都来自外国,有时甚至飘洋过海,不远万里之遥。但是,当作物的旅程行将结束时,却总是在我们四周的欧洲邻国首先落脚(这些邻国使法国与世界相联系,又与世界相隔离):荞麦在荷兰,玉米在西班牙,土豆在德意志,桑树在意大利,人工草场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如此等等。

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任何经济,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任何政治机构,都不断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处于不停变化中的文化财富。法国的地理位置对接受外来文化并非不利,因为以波罗的海为起点,外来文化可经由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北方航线抵达法国;它与中欧和东欧腹地以及与遥远的亚洲广大地区有几条陆路相通(可惜往往也是动物流行病的通道);朝地中海方向的交通始终十分活跃,最后,法国朝西对大西洋门户洞开,法国本可利用迪埃普、鲁昂、翁弗勒尔的诺曼底水手以及布列塔尼成千上万的船只开辟远洋航线,但可惜没有及早进行;布列塔尼的木船在16世纪曾是欧洲海域的主要运输工具。

无数文化财富经由这些道路传到我国,如船壳的搭接结构和

舰舵这两项革命来自 14 和 15 世纪的波罗的海；马镫和肩轭对马匹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它们于八至十世纪从东欧传到法国。即使在 17 和 18 世纪，地中海贸易还经由法国南部影响北方各省，向北方供应麦种，可用于嫁接的枝芽，蔬菜，果树，花木等等。但这一切通常都间接传到我国，而且在时间上都比欧洲其他国家落后一步。

是否应该认为法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地理位置的牵累呢？难道法国四周的欧洲边沿地区对世界的新事物和多种经济活动更加敏感吗？总之，正是“欧洲的极端”成功地开创了大陆的对外扩张：庞大的俄罗斯于 16 世纪吞并了哥萨克骑兵的西伯利亚；伊比利亚半岛因与信风相邻——以加那利群岛为起点的气流常年不息地把帆船推向西方——发现了新大陆。至于英格兰、荷兰和法国，它们全都落在后面，无论对素以皮毛和雪橇闻名于世的西伯利亚或是对美洲，它们都未能捷足先登。

但是，法国的落后不，但与其地处欧洲中心有关，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它自身的地理结构。往昔的法国土地辽阔广大，经济生活势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也说明了这个国家尽管门户洞开，而任何外族入侵却进展缓慢。同样，法国地处交叉路口，尽管各种外来文化都在这里汇聚，但进展却都十分缓慢，无论在艺术和观念方面，或是在物质财富方面，莫不如此。玉米于 1570 年传到巴约讷，但要到 1637 年和 1678 年才分别在卡斯泰尔诺达里和贝济耶露面²⁰⁸。原产意大利的乌格纳白葡萄和黑葡萄于 17 世纪从亚平宁半岛来到孔塔—佛奈桑地区，于 18 世纪抵达朗格多克，于 19 世纪逐渐向波尔多地区的圣埃米利永和夏朗德推进，“建立科涅克葡萄酒的生产基地”。²⁰⁹土豆由奥利维埃·德·赛尔于 16 世纪在维瓦赖试种两个世纪过后，在法国的许多省份仍未出现。

法国领土辽阔，外省如群星灿烂，各展异采：由于缺乏互相交

流,据巡按使们说,它们以自给自足为主²¹⁰。有的省份抱残守缺,死守陈规旧习;另一些省份跃跃欲试,颇想有所作为,但终究因路途遥远,鞭长莫及,或因曲高和寡,而与其他省份相脱离。阿瑟·扬风尘扑扑自布尚远道来到佛兰德地区²¹¹,对当地农产品的丰裕赞叹不已²¹²。在少数孤岛地区与法国一般地区之间存在的这种鲜明差异,将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叶²¹³。当地每公顷土地的收益那时高达450法郎,等于全国平均数的3倍;每平方公里土地有居民213人;每公顷土地平均拥有一头大牲畜;除牲畜提供的肥料外,还可加上城市脏土、菜籽饼、骨粉、海砂和人粪。这使佛兰德的农民能够“大量种植作物而又不伤土地的肥力,并取得高于英国的产量”²¹⁴。此外,所谓轮作制和休耕在这里也已取消。没有公共地产。这个地区毕竟情况特殊,总的说来更多地向荷兰靠拢,而与法国其他地区相脱离。除佛兰德外,法国还有几个特别富裕的地区,如阿图瓦、加来海峡、诺曼底、博斯、法兰西岛等。

法国各省互不相同,缺少整体的特性,甚至毗邻省份之间也很少沟通。国土辽阔和路途遥远自然也起一定的作用。吉尔·勒布维埃于1450年曾对法国作了以下的描绘:“南北相距22天路程,东西相距16天路程。”²¹⁵

三 牲畜、葡萄、小麦和森林

主线一旦确定,大量的细节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妨删繁就简,逐一进行选择,只把最主要的东西留下,可惜还是略嫌庞杂。牲畜、葡萄、小麦和森林是必须予以注意的四大项。它们在法国占据统治地位,把法国切割成不同的地区:根据不同的重点,或发展草场和畜牧,或生产葡萄和葡萄酒,或种植小麦和粮食,或生长大片的树木,它们岂不就是四个不同的而又若即若离的法兰西吗?

与种植谷物、饲养牲畜或生长林木的广大地域相比,葡萄园的面积乍看上去似乎极其有限。但是,酿制葡萄酒需要并使用大量的人工,这门行业吸引和推动人口的集中,有时甚至导致一触即发的人口爆炸:在18世纪,当局曾试图禁止或限制扩大葡萄种植,但纯属徒劳²¹⁶。葡萄利用大革命时期的方便条件,侵占了大片农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50年左右,甚至更晚的时候。为此而新增的葡萄种植面积至少达50万公顷,数字相当可观。到了19世纪,葡萄种植更吞并朗格多克原来种植粮食和经营工业的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一种名符其实的狂热。铁路的建成大大便于产品向北方运输,葡萄种植的狂热更在法国南部地区全面展开。

总之,无论过去和现在,尽管其他三大活动就占地面积而言大大超过葡萄种植,但后者的地位丝毫也不比前者稍逊一筹。更何况,葡萄也完全有理由自抬身价。约瑟夫·德·佩斯基杜于1920年在谈到他的家乡黑色阿马尼亚克时说,“牧人多懒散,农人少远见,家乡的人凡是种植葡萄的,全都劲头十足”²¹⁷。

但任何一项活动都离不开其他三项,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它们谁也离不开谁。一句古谚说得对:“有了饲草,就有面包”。诺曼底地区今天还有类似的警句:“要想谷物收成好,草地不可少”²¹⁸。人们完全还可以说:“有粮便有肉”,“有酒必有粮”,如此等等。勃艮第有时用木桶装运小麦,这是援引葡萄酒的先例,因而在生活里也不能缺少木料。

不忘整体

短距离和中距离的交流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睦邻关系。例如,普瓦图地区的马莱(牧马地区)与附近的丰特奈—勒孔特平原(生产谷物),香巴尼省的贝里地区与西边布瓦肖和布列讷水草茂盛的沼泽带,逐渐专事牲畜饲养的下诺曼底地区与阿让唐、塞城和卡昂一带种植粮食的平原地区,尼韦内地区与盛产小麦的卢瓦尔河和约讷河流域²¹⁹,佛兰德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法兰西岛的丘陵带(此起彼伏的葡萄园蔚为壮观)与东边香巴尼省的白垩土带(这里麦地成片,绵羊成群),盛产葡萄的波尔多地区与盛产谷物的加龙河流域,全都成双结对,相互调剂余缺。至于树木,它们利用村边地头,见缝插针地挤进乡村的各项活动中去。

饲养牲畜,经营农业和种植葡萄的人由于活动门类有别,生活习惯相异,往往只能成为冤家对头;尽管如此,他们在自然条件的强制下,依然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的整体,保尔·亚当称他们各自的活动范围为“经济场”²²⁰。虽说法国各地区之间的对立犹如异电相斥,它们其实也互相吸引,并自动纳入到同一个辽阔的经济框架中去。由此可见,谷物、牲畜、葡萄和林木的杂居并存显然是件合乎逻辑和势在必然的事,尽管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大事。

1817 年的情形

为了画出一张草图,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统计数字。一份有用的历史文献即使不能把我们领到目的地,至少将为我们指出正确的道路。

这是 1817 年末根据土地丈量得出的一份确切统计资料²²¹。材料提供了当时法国 86 个省的各生产领域(耕地、葡萄园、草场和林木)每公顷土地的收益。然后再算出第五个数字,即各省全部土地每公顷的平均收益。为作出以上的计算,必须考虑到各生产领域的占地面积。

请看最穷的省份,下阿尔卑斯省排在末位,它提供的数字按粮食、葡萄、草场和林木的顺序排列,分别是 13、30、57 和 2;平均每公顷土地的收益为 6 法郎 38 生丁。最富裕的省份(当然是塞纳省,尽管面积最小,仅 1 万公顷)每公顷农田(以种植蔬菜为主)可得 100 法郎;葡萄当时仍占一席之地,可得 112 法郎;草场可得 84 法郎;树林日渐减少,只占全省有限的土地,可得 108 法郎。但是,塞纳省毕竟属于例外,尤其是巴黎,更加显得超群出众。

诸位不妨猜一猜,除了塞纳省以外,按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入计算,哪个省的农业资源排在首位?你们大概会想到卡尔瓦多斯省;该省不长葡萄,但那里的农田收入为 59 法郎,草场为 83,林木为 36。每公顷平均收入达 78.25 法郎。塞纳省是唯一没有算出总平均数的省份,估计超过 100 法郎。随后几个省份的差距很大:芒什省为 62.44;塞纳-瓦兹省为 58.63;北部省为 58.17;厄尔省为 47.3;汝拉省为 46.64;瓦兹省为 45.75;塞纳-马恩省 43.35(见 62 页地图)

这一顺序表明,对各省的农产资源作一估测殊非易事,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划一两条分水线就能够加以确定;尽管如此,

1818年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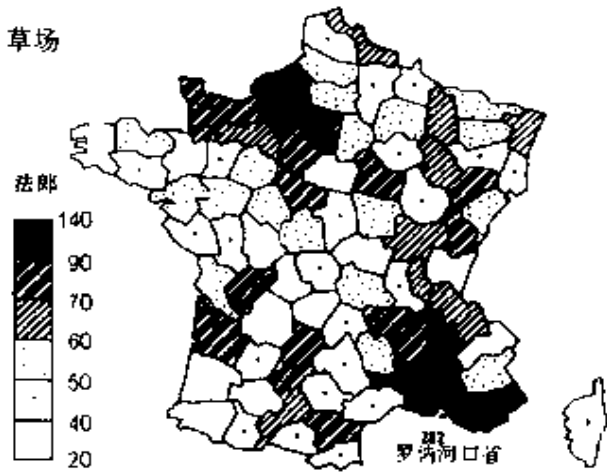
在各项土地收益中,草场的收益最高,罗纳河口省在其中更雄踞首位,该省的草料供不应求;诺曼底的部分地区直接关系到巴黎的肉食供应,草场收益也超过其他地区。

葡萄的收益超过农田,收益最高的地区不在著名的葡萄产区,而在各大城市的周围。由此可以说明,葡萄种植十分普遍,几乎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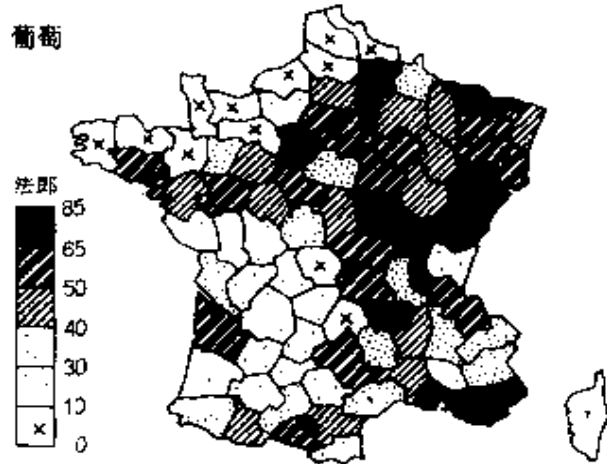
高收益的农田分布突出地展示出法国中部的贫穷以及北部资本主义农业的优越。

当森林位于通航河道的两侧并适应大城市和工厂的巨额需求时,其收益也相当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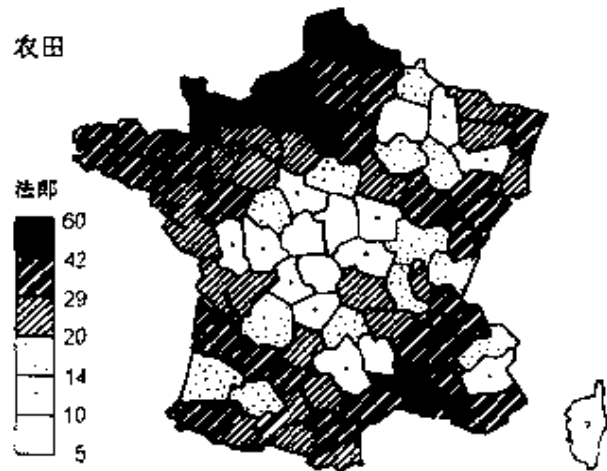
草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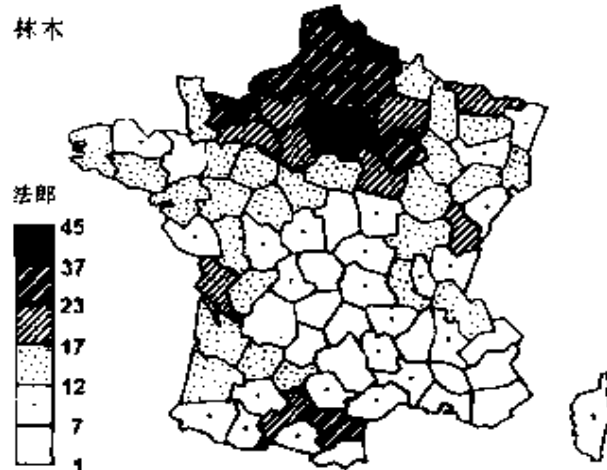
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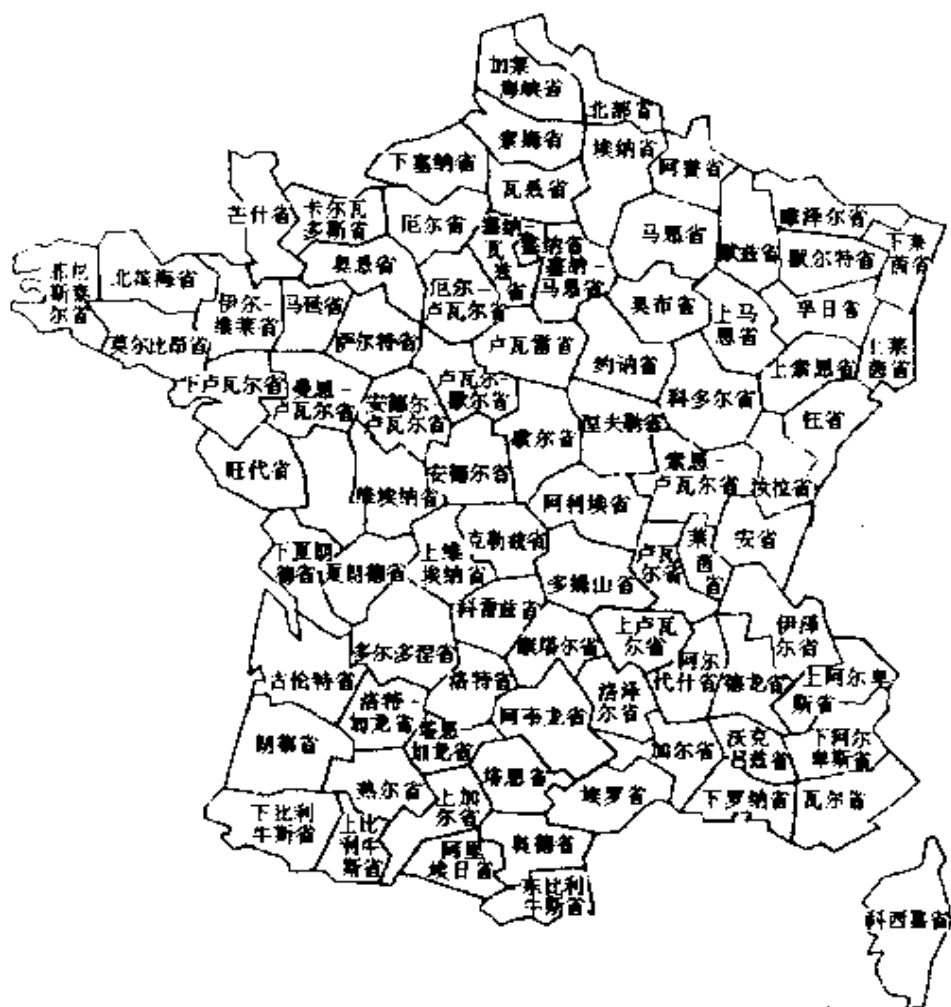


农田



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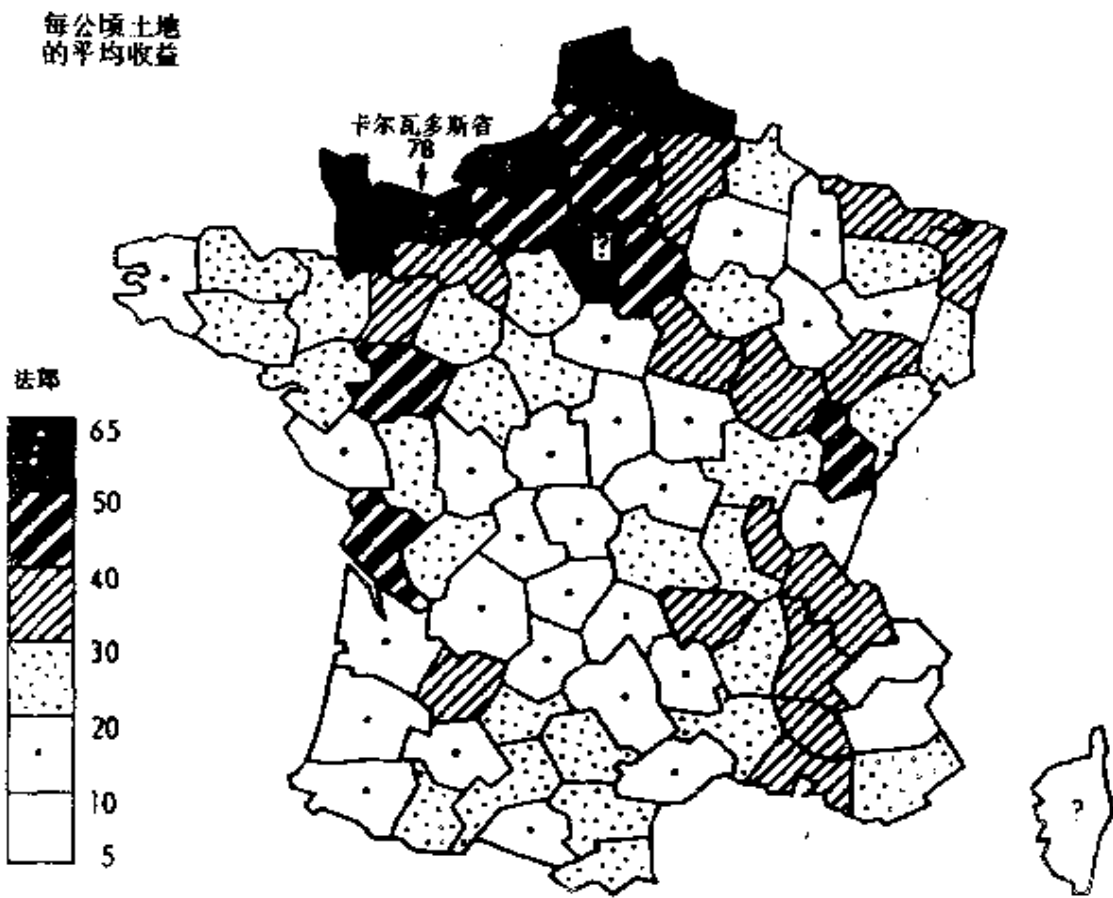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不是排列顺序。我们暂且感兴趣的显然是林木、饲草、粮食、葡萄之间的冲突；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带来的收益相当悬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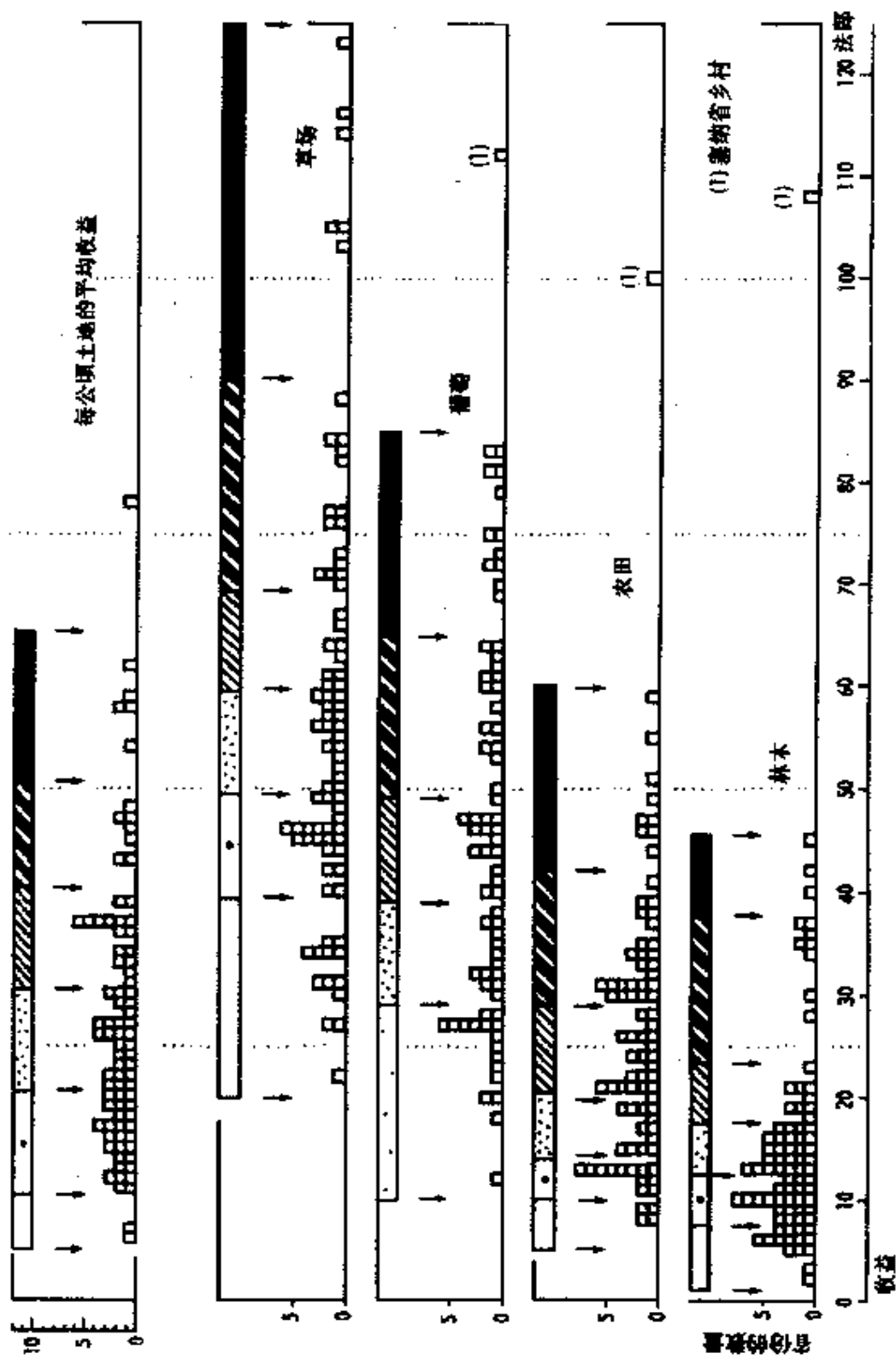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还应该算出 1817 年法国全国（即 86 个省）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益：农田 26.8 法郎，葡萄 47 法郎，草场 60.9 法郎，林木 16.4 法郎。最后一个数字最低，可是，直到 1817 年，森林还向居民和工厂提供不可缺少的燃料，而且数量实在惊人。²²²

1817 年的统计资料是个由 430 条线汇总的矩阵（86 个省，每省 5 个数字），计算起来可能会很费功夫（参见 60—61 页的地图及其说明）。千万不要以为统计结果足已说明问题。每个省还有很多



从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益来看,该图再次表明法国的北部与南部迥然相异。

的特殊情况。除其他因素外,不同经营活动每公顷土地的收益还取决于就近有无购买谷物、葡萄酒、木材、牲畜及其产品的主顾。拉韦涅在谈到诺曼底因“毗邻首都”而财源茂盛时指出,“在乡村经济中,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当产品有充分的销路时,其发展前程之广,实在让人难以想象”²²³。土地收益也取决于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各省之间的工资水平自然是不平衡的。就拿农业工人每年的工资来看,例如在东北部与中部或西南部之间,省与省的差距可能高达一倍²²⁴。



根据每公顷土地的平均收益绘制的各省数列图解及其等级分类和水平标尺。

产品的相对匮乏和需求的旺盛影响着价格的起落和收益的高低。这有助于我们懂得,在葡萄生长茂盛的地区,加龙省每公顷的收益仅 58,马恩省为 58,奥布省为 46,科多尔省为 42.36;而在上索恩省却达 83,摩泽尔省达 81(梅斯附近生产的劣质酒居然十分畅销),杜省 79,罗讷省 75,汝拉省 74.64,上卢瓦尔省 73;巴黎周围占据首位,达 112 这个创纪录的数字。首都周围每公顷葡萄的收益竟比佛兰德地区的农田高 33%! 以上是葡萄及葡萄酒非同寻常、出人意料、但又是真实的写照。凡在葡萄种植面积小、产品质量差的地区,葡萄种植者的收益偏偏最高!产生这个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在铁路的时代到来前,交通很不发达,运输不便使地区之间难以调剂余缺。

饲草不足也是罗讷河口省的草场收益遥遥领先的理由。收益的绝对数字创最高记录(282 法郎);法国的任何一块土地,甚至种的是葡萄,也都没有这么高的收益。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恰恰因为该省饲草奇缺;克罗平原乱石遍地,卡马格三角洲沼泽丛生,剩下的其他地区也很少长草,而每年临近冬季,从阿尔卑斯山返回的羊群却难以数计。就在卡马格地区,每年新生的羊羔即达 4 万多,羊群日夜在户外自由放牧;1780 年当地还有 3 000 匹马和 3 000 头牛;马匹全系白色,牛系黑色,一眼即可辨认²²³。其他得天独厚的草场位于塞纳—瓦兹省、厄尔省和下塞纳省,但其原因与罗讷河口省不同。它们的优点在于距首都较近,且有迪埃普的大道直通巴黎。道路设施十分完善,这里的货车络绎不绝,每天赶运鱼类和其他海鲜。奶产品也经过这条道路兼程而进,因而布赖地区的占尔奈成了名符其实的黄油生产中心。

至于森林,由于木材采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运,其收益在下阿尔卑斯省仅 2 法郎,而在巴黎四周则达 108,差别虽大,但并不值得奇怪。

鉴于以上的发现,我们还希望得到更多的数字,单凭一年的统计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往前追溯和向后查找,得出长系列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竟付阙如,至少我没有找到完全可信的材料。

不得已求其次,我们且看另一组数字,我必须立即声明,它们比我们刚才使用的那些数字更加粗糙,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我在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中得来的²²⁶。

在不到一百年内(1785—1875),法国农业的产值、产量和占地面积均有所增加。取其整数,谷物种植面积由2 400万公顷上升到2 700万;葡萄种植面积由186万公顷达到250;唯独草场和果园由520万减少到500万。每公顷耕地的地价(请注意,这里说的不再是“收益”,而是“资本”)由1785年的900法郎提高到1875年的2700;草场或果园的价格也同样由每公顷1500上升到4500;葡萄园的价格翻了两番,由2500达到10000,创最高记录。葡萄种植的发展肯定将使我国的自然景观显得更加高雅,而不会打乱整个农业布局。农村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将在后来发生,但其原因并不是葡萄种植的发展。

往昔的牲畜饲养的第一条规律:牲畜自己找食

牲畜的饲养方法,过去与今天自然有所不同。这是不必再说、不必多作解释的事。

第一条重要的规律:在过去,人们尽管与家畜打交道,但对家畜的照管却远不如今天那么周到。这岂不是件怪事?

今天的饲养者专心致意:养100头牛的牛场,养1 000头猪的猪场,养10 000只蛋鸡的鸡场,就像在工厂一样,不容出现任何疏忽。畜群在夏季实行圈养,饲养者更是精心照看。同样,在根据科学方法布置“投料路线”的牛厩里,在现代化的羊厩或新式的猪厩里——建筑地点往往离住家很远——,负责饲养的人从没有闲暇

时间。采取防病措施,接种疫苗,实行机械喂食,都必须按时进行。他们不停地忙活,力求达到最高限度的产量或最好水平的质量。

过去则相反,牛马等大牲畜大多有相当长时间实行自由放养,“任其在外找食”²²⁷,不加看管,几乎处于野生状态。

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畜牧只是一项副业,农民以种植小麦、黑麦、燕麦、大麦为主。粮食主宰一切,农家饲养牲畜主要还是为了粮食,牛马驴骡等力畜除提供肥料外,主要用于拉车牵犁。

此外,农民没有太多的时间。他们在饲养牲畜方面便力求减少开支和少花力气。

自由放养的好处正在这里,牲畜主的土地和活计都不会因此蒙受损害,因为牲畜可以安闲自得地在杂草丛生的辽阔荒原上或在坑洼遍布的沼泽中生活……在这些包括树林和坡地在内的荒野上,种植任何作物都极其困难,农民放养幼小的或老龄的牛马,有时也根据可能和需要,放养其他的成年牲畜。

应该承认,我们对这些“野生牲畜”的状况知道得很少。原因当然是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更加重视小麦种植,而较少关心牲畜饲养;雅克·米利埃不久前出版的著作²²⁸属于例外。我们看到这个现实,也往往事出偶然,正如猎物不小心撞到猎人的面前一样。

请看以下的例子:1731年1月10日向布列塔尼省三级会议提交的一份农业计划。据这份计划揭露,为了让牛长膘,当地采用的办法是把牛送到面积约5—6弓丈的一块草地上(这里是指布列塔尼辽阔的荒草地)放养;牛在这里完全自由,牲畜主只是给牛留下“5000来斤²²⁹干草,而牛也就吃一半扔一半”²³⁰。想出这种催肥养膘的办法确实让人觉得奇怪!不过,催肥的牛毕竟多少受人照管,因为主人给它留下了一份饲料,而且只是暂时任其自由而已。它们大概在充当了力畜以后,然后再被送到屠宰场去。萨瓦里在《世界贸易辞典》(1772年)中指出,牛满3岁即可“拉车牵犁”,到

了10岁,“必须撤套,转而催肥养膘”²³¹。

古贝维尔的日记向我们提供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我们且同他一起回到16世纪去。我们刚刚离开布列塔尼,现在又来到了诺曼底,勒曼尼尔庄园位于科唐坦半岛的北部,离瑟堡约步行一天的路程,那里树木繁茂,属于篱乡地区。庄园主古贝维尔亲自主持经营管理,居然颇见功效。庄园以饲养牲畜为主,分设马、牛、猪、绵羊、山羊等畜厩。然而,正如古贝维尔所说,多数大牲畜“在树林中放养”,有时与邻居的牲畜相混杂,自由交配繁殖。每当庄园需要,或为送往市场出售,再把牲畜找回。为此就必须召集二、三十人,组织一次“围捕”。围捕者往往空手而归,或者他们没有找到目标,或者牲畜奋力挣扎后逃之夭夭。就以这头母马为例,它向一名围捕者“猛冲过去,把他撞倒在地,并一跃而过”²³²。

古贝维尔每天写下的日记令人惊讶。1562年6月24日,牛群几乎完全集中了起来;根据古贝维尔的习惯,新生的牛犊于当天被打上烙印,部分小牛被留下进行阉割。在另一天,组织了一次真正的围猎,以捕杀已由客商买下的一头“野公牛”。古贝维尔定期带队去森林“挑选种马和从事配种”²³³,但并无成功的把握。适龄的公马和母马一般被留下进行调教,或被打上烙印放回森林²³⁴。

这些记述所展示的景观与其说是法国的乡村,不如说更像美国的草原;它让我们历史学家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是说,我们对牲畜饲养远不如对作物种植那么重视,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继续进行探索,对一些内容不尽清晰翔实的历史资料作出解释,进而改变习惯的观察视野,把握住当时的历史真实。

例如,在18世纪,佩里戈尔的“饲养者”通常去上利穆赞地区购买12至18个月的小牛,接着在“次等草地”上放牧到4至5岁后,再“进行交配和调教”,留下几头干活,其余的便脱手卖掉²³⁵。据

此,我是否有权认为,这些牲畜在受“调教”以前,多少同古贝维尔的马匹和“公牛”一样,处于野生状态?

下阿尔萨斯的情形比较特殊,更加说明问题,可供我们详加叙述。当地气候适宜,草木茂盛,牲畜一年中有9至10月可在户外生活。奇怪的自由:在森林、荆棘地和沼泽中,牲畜悠闲自得,可随意找食。这些草场往往属于公产,对所有人开放,而且历时已有几个世纪。直到1805年,塞莱斯塔村的村长曾抱怨牛马对伊勒河(该河横贯阿尔萨斯全境,与莱茵河相平行)两岸的森林造成了严重损害。他写道:“牲畜又用脚踩,又用牙啃,到处进行破坏;据了解,一匹马每天糟践的树木比15名樵夫的砍伐还厉害得多”²³⁶。

然而,那时候,阿尔萨斯的牲畜饲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往昔充足有余的草地,从12至13世纪起,已随着开荒和畜群的增多而变得不够了。因此,同法国整个东北部地区一样²³⁷,阿尔萨斯也制订了规章,确定了地权,强制畜群沿一定的路线通行,终于导致了牧羊人的出现²³⁸。秩序就这样建立了起来。这是对别处同样适用的一条规律吗?难道往前追溯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就势必会发现牲畜处于完全放任自流的或至少无拘无束的状态?拿波旁地区的情况来看,在百年战争时代,农民不顾领主的强烈反对,听任其畜群在森林中胡作非为²³⁹。

值得注意的是,就马匹而言,旧秩序有时竟一直维持到19世纪;雅克·米利埃不久前在其著作中证实了这一点。这是由于马匹的不受管束,或是由于人的因循失责?

直到18世纪,布列塔尼的马匹仍整年在荒野和树木丛生的沼泽地自由生活。即使在冰雪封冻的天气,也是如此!它们刨出冰雪覆盖下的青草食用。遇到狼群袭击,它们便奋起抵抗;母马和幼驹每晚都聚成一团,外围由公马保护,直到天亮。畜群繁殖完全自发地进行,后来,为了避免劣种传代,人们注意宰杀次等马驹。

贝阿恩地区及比利牛斯山麓的情形也是如此。当地的“纳瓦尔马”自行繁殖，主人不予置理。公马和母马处于野生状态。他们在出生以后，就自己照管自己，顶着风暴，迎着早雪，在陡峭的山坡上稳步攀登。当冬天的恶劣气候迫使它们前往平原时，它们有时深入波尔多的荒原寻找草料。这些马匹精壮矮小，敏捷灵活，经训练后可供狩猎之用，也可充当轻骑兵的坐骑。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给当地的养马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加上其他原因，养马业竟从此一蹶不振。但读者可以想到，马匹并不因此在当地绝迹。1843年8月，维克多·雨果前来科特雷游览，发现有“纳瓦尔马”，便找了一匹使用。惊喜之余，他写道：“山区的马匹真是绝妙，既耐心，又温和，还听从命令。无论登山或下坡，无论在草地上，石路上或冻土上，甚至在紧贴悬崖的边沿，它们都步履稳健，其聪明伶俐简直与擅长上窜下跳的猫不相上下。”²⁴⁰

普瓦图省水网交错、淤泥存积的沼泽带，虽然几经开河疏浚，仍有相当多的地面积水。那里的畜牧业别具特色。容易受淹的土地被草木所覆盖。一位巡按使说，在这里“养马几乎不费钱又不费力……只要放到野地里去，马无论冬夏，都有草吃……专门以养马为业的农民往往只留下良种母马，其中多数还是从未入厩、从未被人碰过的野生牲畜”²⁴¹。

这个办法显然不能培育良种。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养马业仍停留在百年战争那时的水平？原因可能是野马很难驯养。或者是，同人们的推测相反，养马的收益不如养牛或养骡那么好，因为厩养母牛至少可以挤奶以及取得各种奶制品。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可作解释。

第二条规律：季节性圈养和野外放牧

“圈养”顾名思义就是把牛留在牛厩内，但从广义上讲，该词也

意味着把家畜关进一个对外封闭的地点，不论是牛厩、马厩、羊厩或猪厩。用今天的说法，也就是“永久性”圈养或“季节性”圈养。最早被完全关起来的牲畜是猪，当时就留在家里，主要喂它土豆。在这以前，猪群都被赶到树林里去吃橡实或山毛榉的果实；这种办法至今仍在科西嘉的某些地区得以保持。古贝维尔经常把他的许多猪赶到橡树林中“就食”，有的猪不免因此下落不明或被狼吃掉。他还把这一权利（赶猪到林中就食的权利）出售给其他养猪人。然而，为了家里的肉食需求（不论年成好坏，每年总要宰杀 15 头猪腌制咸肉），他在秋初便把猪关起来催肥。这一习惯相当普遍。橡实也是可供买卖的一种商品。古贝维尔派许多下人出外“采集橡实”，并作大量储存；有时候，他还半价收购，转手倒卖。²⁴²

至于所有的其他家畜，只能实行季节性圈养。在出现人工草场和牧草种植以前（大体上在 19 世纪以前），饲草始终不敷需求。把牲畜留在厩内，就要给它们喂食；即使喂得不多，每头奶牛每天吃 10 斤草料，这就要求仓储大量的干草。只要一有可能，人们赶紧让牲畜恢复自由。

每当寒冬季节，牲畜便留在屋内，人与牲畜生活在一起，借以利用牲畜的热量。人畜共居并非没有缺点，甚至还有危险。在布列塔尼等地区，有人指出这有害农民的健康。由于山区气候恶劣，冬季极其寒冷，人畜共居更势在必行，而且延续的时间也特别长，几乎可以说没完没了。“整个冬天睡在密不通风的马厩里，空气潮湿缺氧，又闷又热，把人憋得头昏眼花”，这就是农民的生活！尤其危险的是，一出这个蒸笼，“稍有不慎”，就会“因户外的严寒而着凉”²⁴⁴。

牲畜也同样受苦，饲料是干草或秸秆，质量既差，数量又少。萨瓦地区有一句谚语指出，到 2 月 23 日那天，假如干草储备只消耗掉一半，顺利过冬将不成问题。但在布列塔尼和萨瓦，每到冬末，为

应急而把垫床的秸杆和屋顶的茅草投入牲畜食槽的事并非罕见。当春天终于来临时,备受折磨的牲畜极其瘦弱,必须扶着母牛站起来走出牛厩。奥弗涅地区的冬季严寒肆虐,母牛照例只在5月25日圣乌班节那天重新下地劳作,这一传统至今仍予保持。至此,“葡萄酒和面包等物不再上冻”。“牲畜肚里都装着历本;当它们知道圣乌班节临近时,逐渐变得不安起来,只等厩门一开,就自动走出”²⁴⁵。

牲畜出厩的具体形式因地而异。在许多村庄中,只消走很短的路程:我在上午或中午离家,带着狗和几头母牛,来到村内那块不大的草地,让畜群留下休息。任务的确极其简单,若是牛擅自闯入邻居的地界,自有狗把它们赶回来。我尽可以生一堆篝火,弄几个土豆埋入热灰下烤熟。这是乡村少年的一大乐事!因为这类工作照例由孩子去完成。圣女贞德童年时曾在栋雷米附近的什努树林中放羊。尼古拉·杜里瓦尔²⁴⁶于1778年称,洛林地区的马“矮小,其貌不扬……虽说个头不大,却是精壮勤劳;温顺、听话而又灵敏,很少得病,不难钉掌;白天干活很多,晚上在草地放养,只留下孩子和狗看守,无力对付狼的袭击”。

但在法国东部地区,这项工作主要由专职人员去做,每村指定三人,分别出任牛倌、羊倌和猪倌。他们于早晨吹牛角为号宣布出发,在傍晚再吹号催促返村。

以上只是最普通的放牧活动。但在山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每到夏季,那里的畜群就要爬到山顶的高山牧场去吃草。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无论在中央高原、孚日山区或阿尔卑斯山区,牲畜放牧的“活动范围”通常较小²⁴⁷,因而算不上是大规模的游牧生活或季节迁徙。牛羊离开山坳中的牛厩或羊厩,只是朝着一眼即可望见的高山进发。如果在上山前来到这里,你将听到“牛厩内传出的哞哞叫声”,“在牛厩的上方,宽敞的草料仓内堆满了干草……厩门半

开,门口有栅栏挡着,散放出一阵阵浓烈的膻味,使人立即猜到厩里挤满了绵羊;有限的几束亮光透过气窗进入羊厩,气窗之小简直像是堡垒的射击孔”²⁴⁸。据一位旅行家说,在1696年的孚日地区,牛于春季能自动前往高山牧场,于10月再自动返回,但在海拔较低的草地,牛群则有牛倌看管,牛倌往往来自瑞士各州。他们赶在牛群的前面抵达草地,在他们的木棚中生活几个月之久,“与世间完全隔离,除了奶制品几乎没有别的食物”。“只是当小麦价格低廉时,他们才有面包吃,否则他们就靠粗糙乏味的奶酪充饥”²⁴⁹。

在阿尔卑斯山区,每到4月初,必须“重新打通与野外的联系,为了加快雪的融化,在路上洒几锹泥土”²⁵⁰。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由于山顶融雪较晚,“登山的路要分几站陆续走完”;牧场也往往分散在2至3个不同的海拔高度。“首先到海拔约在1500米至1700米之间的低山地带停留一段时间……下山时也同样如此”。畜群在这里将交给专职的牛倌或羊倌看管,牛倌或羊倌往往在巴斯洛内特的集市上雇佣。但在塔朗泰斯和上福西尼等地区,则是畜主的家人于夏季随畜群前往高山牧场。“在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情况下,竟是妇女背着孩子上山,看管畜群,从事包括制作奶酪在内的各项杂务,而男人则留在山下翻晒干草和耕种田地。”²⁵¹夏季上山的人或者各据一方,自建小木屋单独居住,或者相依为邻,集中在几个山村,具体情形因地而异。

下山时,畜主把自己的牲畜同随带上山的外来牲畜分开。他把部分外来牲畜委托他人收养过冬,以牛奶和新生牛犊充当报酬。从9月开始,成批的牛羊将送往牲畜市场出售。

另一条规律:劳动分工导致交换、出售和转销

在今天和昨天,根据劳动分工的要求,畜牧业被分为几个不同的活动部门。每个地区往往根据其从事的活动而各具专长。例如,

普瓦图的骡；佩尔什和布洛内的良种马；克罗和卡马格的绵羊；佩里戈尔的猪（其产品由波尔多商人所控制）。此外，特别在养牛方面，有些地区专门饲养幼畜，并迅速出售；另一些地区擅长饲养菜牛；有的地区在买进牛犊后，尽快投入使役，等到牛老退役时，再卖到别地供屠宰用；有的地区则集中驯化处于半野生状态的牛，然后送往集市出售。

总之，规律就是买了再卖，卖后再买。由此活跃了省与省之间的流通，流通距离有时很长。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农民为改良当地的畜种，甚至到奥弗涅、阿尔代什或上卢瓦尔地区买牛。至于利穆赞的农民，他们先把买来的牛养肥，然后向圣通日提供优质牛肉，圣通日地区则提前几年在饲养牛犊的地区订购菜牛²⁵²。贝里地区的农民在普瓦图购买马驹，经调教后在当地从事拉车、牵犁等轻便的活计，然后再转手卖往诺曼底或巴黎；在这后两个地区，即使衰颓的老马也可用来拉出租马车²⁵³。

1768年，马尔什地区“饲养绵羊到2至3岁后，于每年的5—6月份在贝里或波旁地区出售（每两头售价约8—9法郎）”。还是在贝里或在普瓦图，人们于8—9月份购买小猪，“每头10至12里佛，等到冬季再脱手，每头15至18里佛，但有一个条件，即要采集到足够数量的橡实”²⁵⁴。迪瓦、代沃吕、尚索尔、韦科尔等山区（阿尔卑斯山）历来由卡马格地区供应小羊，因而“在共和八年（1805年）的前几年，当卡马格地区冬季遭到严寒袭击，冻死许多小羊时，阿尔卑斯山区的畜牧业也连带受到损害，原因不言而喻；在代沃吕山区冬季饲养的7000头绵羊中，有3000头是在春季买下的，几乎占据半数”。伊泽尔河两岸的山民在朗格多克地区采购畜源；博蒙地区依赖沃克吕兹提供幼畜。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需要开列单子，法国的所有地区都将榜上有名²⁵⁵。

牲畜饲养的专业化适应于不同地区的具体条件；各地生长的

草质量不同,并非所有的草场都利于牲畜长膘。习惯势力以及市场的刺激也起一定的作用,如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法国境内的牲畜集市如星罗棋布,其数量不断增多,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虽说里昂、吉勃莱、博凯尔、波尔多等具有国际规模的大型交易会逐渐丧失其重要性,地区性的集市贸易却继续主宰着农畜产品的交换和销售。对农民来说,供交换用的最好货币始终是牲畜。为了购买需要的物品,为了有现金支付各种赋税,农民往往不等牲畜长成,就把马驹、牛犊或幼驴卖掉,而且销路总是不错。农民有时不也出售青苗吗?其实,农民买进牲畜,无非是为了在喂养一段时间后重新卖出;而在买方,不论是农民或商人,也赶紧要再次脱手,由此促使了买卖的膨胀。

畜产品——包括牛奶及奶制品、皮革、羊毛等——不断被运往不定期的交易会 and 城市的集市。

以奥弗涅地区为例,当地生产的大块圆形奶酪行销四面八方。这种奶酪于1543年已在马赛可以见到²⁵⁶,出现的时间也许更早。阿尔卑斯山区的奶酪更远销伦巴第、皮埃蒙特、日内瓦、罗纳河谷、普罗旺斯等地(奶酪每块重达35至60斤,有时用木桶装载)²⁵⁷。就拿专营这一贸易的塔朗泰一地来看,18世纪期间,“每年驴驮运往皮埃蒙特的奶酪竟达6000块之多”²⁵⁸。从中世纪开始,“沙莫尼隐修院的驮马将粗奶酪²⁵⁹、精奶酪乃至黄油运抵萨瓦”²⁶⁰。凯拉地区历来重视道路的修筑和养护,以利于奶制品的出口;“凯拉生产的黄油在多菲内和普罗旺斯的整个阿尔卑斯山区被认为品质最佳,因而不仅仅在加普和昂布兰的集市上出售,并且大部分远销普罗旺斯各地”²⁶¹。这些交易活动都有悠久的历史:用拉尔扎克地区的山羊奶制造的“罗克福尔干酪”早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并深得罗马人的青睐²⁶²。

牲畜本身就是最标准的商品,它的好处是不用运输就能自动

送到集市和交易会去,发货不存在任何困难;不必修筑可通车辆的或笔直的大道,有条小路就能解决问题。

面对以上的需要和方便,农民终于经不住“赶集”的诱惑;在集市上喝一杯葡萄酒,打听点儿消息和会见几位朋友,这对他们无疑是件乐事。赶集的人照例喝酒,在风笛的伴奏下跳舞,赶上骑警队的新兵不识相地前来维持秩序或追捕逃犯,就对他们拳脚相加,狠揍一顿²⁶³。由此引起的斗殴几乎总是闹得不可收拾。

最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一番辛苦以后,在这类集市上进行交易的人却获利照例极低,如果用今天的观点算帐,则尤其如此。往昔的农民在算帐时不把自己的辛苦计算进去。不算辛苦钱,甘愿白费劲,这也是一条规律,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规律。

季节性的易地放牧相当少见

在这些规律中,季节性的易地放牧²⁶⁴是个例外。它在法国各地长期存在,但并不多见。易地放牧是一项古老的活动。经过几百年的缓慢演变以后,它确定了行进的路线,开创了必要的交换,并把炎热的地中海平原或阿基坦平原的冬季牧场与远在中央高原、比利牛斯或阿尔卑斯等高山地带的夏季牧场结合起来。在实行易地放牧的条件下,牲畜的圈养至多属于临时措施。它们在专职牧人的驱赶下有条不紊地、组织严密地从事长距离的往返运动,每天的行程约达 20 至 25 公里。

易地放牧不论顺正方向走或朝反方向走都无关紧要。所谓顺正方向走,就是说畜主在平原居住;朝反方向走意味着畜主住在山区。但在两种情况下,畜群和牧人的往返运动都必定在一端或另一端作为外来的入侵者闯入他人的领地,并由此产生各种后果和对抗²⁶⁵。

畜群在迁徙过程中穿越村庄、耕地或城市,沿途总要遇到麻

烦，所经的道路在东比利牛斯地区、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通称“畜道”。

有时候，双方的利益可以兼顾。例如，当地人允许易地放牧的畜群在他们的耕地上过路，利用畜群留下的粪便肥田。即使在今天，畜粪总是很受欢迎的。正如拉伯雷在谈到丹德诺的绵羊时所说：“羊在地里到处撒尿，犹如天神赐福，小麦因此受益，不必再施其他肥料”。²⁶⁶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当地人往往故意作对，因此纠纷始终不断。18世纪那时，朗格多克的巡按使往往对“畜主”呈递的诉状立案调查：这些畜主几年前因牲畜害了传染病，暂时停止了易地放牧，如今却发现畜道已被沿途居民蚕食，以至畜群不能在过于狭窄的畜道通行，“牧人因受虐待，被迫中途返回”²⁶⁷。《埃罗省地方民间惯例集》于1936年指出，由沿途村镇负责养护的大部分畜道已经不再存在，“有的被改造成村际或省际的公路，有的被沿途居民所侵占，损害了过路人的利益”²⁶⁸。

往昔浩浩荡荡地进行季节性放牧的畜群正逐渐减少，但其奇情异趣则至今依然存在。目前，从事这种季节性迁徙的绵羊总共在70万头上下，与过去的数字已丝毫不能相比。此外，利用铁路或三层大卡车运输，每层装载500头羊，也使我们再也见不到原来在欧洲的地中海边沿地区光天化日之下展示的动人场景。摄影师有鉴于此，争先恐后地拍摄古老的易地放牧的最后镜头。

趁着这些古老的景象尚未绝迹前，我们且领略一番它的奇异风情：正如一位节目主持人所说，“见诸圣经和维吉尔笔下的”景色，至今犹栩栩如生，反映着“远古时代的风貌”。请看，1980年5月，在比利牛斯山区的苏勒河谷，“身材高大的牧人带着畜群，沿阿尼峰至奥里山的山脊向高山牧场进发。他们走在队伍的前面，飞尘过处，但听得一片丁丁当当的钟声和铃声。畜群在行进途中，发出

嘈杂的铃声,但在接近市镇时,牧人就从驴背上卸下大钟,系在体格健壮的牲畜脖颈上,畜群就像浩浩荡荡的军乐队一样穿街过巷,吸引居民在门口驻足观赏”²⁶⁹。

放牧者,“在贝阿恩地区称为‘牧工’,在科曼日地区又名‘山佬’,善于同狗、羊等牲畜传情达意,能观察天气变化和使用草药治病”²⁷⁰。他们在山上的木棚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孤苦伶仃,整天就与狗和畜群为伍。平原的人对他们既害怕,又妒忌和鄙视,这种情形反复重现,几乎成为毫无例外的规律。在欧洲各地,牧人始终是独居一隅的孤家寡人。他们往往以能在死人和活人之间传话而著称,因而在法国南部被称为“灵魂信使”。他们有时还能眼观阴阳两界,与冥间取得联系。据说,这不是什么巫术或骗术——尽管有人指责他们“与魔鬼打交道”²⁷¹——,而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特异功能。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恐怕就该受人诅咒了。

我们还能通过别的途径来观赏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季节性迁徙,或者请泰雷兹·斯科拉费尔²⁷²充当导游,或者与玛丽·莫隆²⁷³结伴同行;后者曾经用诗歌一般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描绘了牧人的生活,以及她与她们一起度过的时光。还有安娜—玛丽·布里茨巴尔,她于1978年曾把我们领到中央高原,沿着艾瓜鞞山的山坡,见识了马尔热里德山的畜道²⁷⁴。

科学饲养方法的难产

大约从1750年起,传统饲养方法受到了法国农学家的猛烈攻击。农学家们责备本国牧业主的无知和短见,竭力主张以英国为榜样,推广与异种的种公畜杂交选种的方法。这些尝试有时取得了成功。例如,在19世纪的下马恩省,畜种曾有明显的改良²⁷⁵。

但在农民方面,抵抗十分顽强。杂交繁殖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时,往往出现畜种退化,农民于是重新采用当地的畜种。直到1860

年前后,诺曼底地区对是否保留当地的“科坦登”种奶牛(每头可产100公斤黄油),或与英国的达勒姆种牛杂交,或干脆用达勒姆种牛取代,始终举棋不定²⁷⁶。“毛色黑白相间”²⁷⁷的莫尔比昂种奶牛,甚至夏罗尔种奶牛——经多次杂交改良后,已成为全世界最优良的品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从17世纪起,王国政府不断鼓励畜牧业的各种进步,科尔倍尔于1665年首创了种马场。种马场断断续续地办了一段时间,也许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那时才不再存在。下卢瓦尔省皇家科学院²⁷⁸于1833年一再指出,国家兴办的种马场当时已“糟得不可救药”,并且抱怨不该取消1787年前在普瓦图原有的种马场。随着旺岱暴动的发生,“英格兰、安达卢西亚、伯伯尔、利穆赞、诺曼底或荷尔斯泰因的种公马”²⁷⁹竟从此绝迹。就算这一指责确有道理,难道全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吗?一所省级科学院的断言不一定就是金科玉律。

事实上,到了18世纪末,经过多年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培育成功了佩尔什种马和布洛内种马,佩尔什种马一度更炙手可热,成为客货运输业竞相争购的对象。同样,为了把西班牙的美里奴种绵羊引入勃艮第等地,于1786年在朗布依埃创办了一所示范饲养场。真是出于奇迹,这所饲养场居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革命和帝国的动荡岁月;1815年后,到了复辟王朝的初年,它又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成就的取得也是多年努力的结果。面对农民的因循守旧,新事物的推广还将遇到困难。

但是,农民偏爱已为他们所熟悉的和适合当地环境的畜种,这难道始终是错的吗?雅克·米利埃²⁸⁰认为,牲畜的传统饲养方法来自“民间实践的合理总结”。尽管在地区之间各有分工,并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相互不断有所交流,各地却始终保持着适应当地条件、满足地方需求的特定畜种。黑山地区饲养的矮种母牛能够牵

犁、拉车以及提供牛奶、黄油和奶酪。普瓦图地区和比利牛斯山麓的高大公牛在郎格多克地区拉套耕地，诚然蔚为大观，但到黑山地区又能派什么用场？素以“忍饥耐劳和适应高温气候”著称的“塔朗泰斯”种牛成为阿尔卑斯山区的“特产”²⁸¹，决不是事出偶然。实际上，幼畜产区总是要根据主顾的要求行事。为此饲养的产仔母畜必须是适应购畜地区的需要和自然条件的单一品种，并在产下的幼畜中选种，不必保留专事繁殖的种公畜。结果，每个幼畜产区都分别根据购畜地区的特殊需要而发展特殊的畜种。

可是，为了改良畜种，人们却要幼畜产区引进异种的种公畜。这就会打乱它们惯常的销售市场。首先必须建立种畜系谱，保证“纯种”，进而培育“纯种”牲畜。其目的是经过人工选择，实现遗传基因的提纯优化；所选畜种将取代其他畜种，因为其肉奶毛油的产量均达到最高水平，良种猪则是其瘦肉率较高。

必须指出，纯种牲畜的饲养只是在本世纪的50年代，随着人工授精的兴起，才在我国真正普遍实现。全面推广有限几种优良畜种从此已变得十分容易。然而，遗传学家不久前注意到过量削减基因库的危险。假如“根据目前的经济条件，集中发展几种高产畜种，取消几百个其他畜种”，这样不断减少下去，“畜种的种群和种间变异”最终将危及现存畜种的基因量，人们因此赶紧回过头来保护正趋消灭的畜种²⁸²。

在就近利用自然资源、饲养牲畜不太费劲的条件下，实行传统的饲养方法无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适应巴黎等大城市的优质肉食需求而进行的牲畜饲养则不能放任自流，必须采用十分专门的方法。为此，在利穆赞、诺曼底等地区，兴起了专为高品味的顾客提供优质牛肉的菜牛饲养业。利穆赞地区于18世纪推行的方法精巧而又复杂。菜牛通常选用畜龄较小者，约在6岁左右。“由于可供使役的小牛很多，每当缺钱花时，人们情愿出售中年的牛。”²⁸³

在沙巴努瓦乡,养膘的菜牛在草地放牧,但不在户外过夜。如果青草不足,就喂以干草;核桃仁榨油后留下的渣饼,经热水调匀,也可充当饲料。这些菜牛颇受优待,只在晴天出外吃草。它们在厩内享用黑麦或大麦面糊。牛栏里垫有大量干草。照顾之周到简直无微不至。同样,邻近的蓬巴杜尔乡所养的牛也很漂亮,诸圣瞻礼节前在草场放牧,入栏后即食用干草以及用粟子粉和杂面粉调制的面糊。

这些牲畜中的精品通常在庆祝封斋期结束的那天高价出售。然而,不管菜牛食用的是什么饲料(在利穆赞地区,即使邻近的乡村也各不相同),饲养者所得的收益却相当微薄。1791年有一篇长文对饲养业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们从中得知,扣除支出的饲料,赢利已所剩无几:“买进的瘦牛价值 200 里佛,养肥后出售只卖 300 里佛”,考虑到各种开支,“收益仅 60 至 70 里佛。”²⁸⁴

鉴于以上情形,畜牧地区不免有所抱怨;有趣的是,这些抱怨也再次暴露出法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隔阂。我们已经说过,每个地区虽然都养牲畜,但总有几种牲畜在当地缺少。珂瑟·扬在土伦至戛纳途中想喝一杯牛奶,居然遍找不得,这种情形值得我们同情。皮戈一勒勃伦这位鲜为人知的旅行家于 1827 年抵达奥朗日,他的经历听来未免让我们发笑。他写道:“奥朗日的肉铺里买不到牛肉,就像在西伯利亚不长橄榄树一样。到处但见小羊肉,配以各种调料,居然味美可口。法国各地在上主菜前照例都先喝汤,这里端上餐桌的也是羊肉汤。蒜瓣被用以解膻。人们喝羊奶,食用由羊奶制成的奶油和奶酪。诺亚当年在其方舟中收留了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肯定不是为普罗旺斯人所准备的。”²⁸⁵

法国过去缺少马匹应如何解释

在介绍利穆赞地区的菜牛饲养时,我曾强调了需求的作用,似

乎需求能自动带动供给。然而，法国军队不断需要的马匹——需求紧迫，质量要高——却要向外国购买。我愿承认，雅克·兴利埃的论断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的初步解释虽说是必要的，却还是不够的。早在封建时代，甚至更远的过去，法国曾经拥有过由本国培育和饲养的优良种马，但国王推行的政策却使它们逐渐消失。这项政策旨在削弱贵族的政治实力，让贵族最终对国王俯首听命；国王为此作出了长期而耐心的努力。“黎塞留下令拆除贵族的城堡，同时也使领主的种马场毁于一旦；国王为打破封建割据，便把为维护封建主统治的养马业一并消灭。”²⁸⁶

据我看，还有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原因：从17世纪开始，种马场所需的纯种良马都来自北非和近东。安达卢西亚和意大利南部（特别是那不勒斯）均因地理位置的近便而发展了养马业。在16世纪乃至更早的时候，法国人曾不断谋求这些良种马。他们试图在产地直接采购，也曾派人多次前往联系，甚至准备在的黎波里定居。这些努力都纯属徒劳。到了18世纪，企图直接在产地购马的法国人“遇到了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通常不得不委托伯伯尔沿海各地的领事负责代购，而这些领事偏偏是些蹩脚的中间人。当“国王的马厩或种马场”需要良种巴布马时，派驻当地的专使竟具有准外交官的身份²⁸⁷：法国人是否动手过晚了呢？难道市场已对他们关闭？总之，单用地理位置作解释自然是不够的。英格兰的位置不比法国更好，却在法国之前培育了纯血的种马。我国的东部边界情况比较特殊，那里危机四伏，军费开支庞大，但有一个好处，即是能够在德意志和瑞士各州就近取得军马的供应。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畜牧业是项副业

今天，在整个法国，饲草和牲畜已经翻过身来：经过有利的兼并和集中，畜牧业竟占农业总收入的55%。但在过去，畜牧业即使

十分活跃,却从不具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和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畜牧仍是一项额外的副业。往往是一种陪衬,或者是顺便捎带的一种活计。

历史学家 R. 夏皮经过对卢河河谷(该河谷从东到西在汝拉高原打开一个宽大的半圆形缺口)仔细考察后指出,在 18 世纪,位于激流两岸的村庄饲养的牲畜“为数不多,仅供拉犁而已,粪便可为耕地或葡萄园充当肥料,全家老小喝奶不用发愁,屠宰时还可让全家吃肉解馋”²⁸⁸。任何畜产品都不进入商业渠道。然而,千万不要搞错,这里不是一个对外封闭的、死气沉沉的偏僻地区。实际上,由于地处汝拉山麓和东部高原之间,四通八达的交通联系使河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成片的麦地四周,花团锦簇般的葡萄园居然也远近闻名,河流两岸还分布着一系列磨坊和欣欣向荣的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自然可以舍俭求奢,满足于饲养仅供本地需要的牲畜。

卢河河谷诚然是个特例。然而,人们可以由此及彼地进行推想。法国各地发展的多种畜牧业确实有着不少共同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饲养的牲畜并不供农民消费。只有猪肉才端上生产者的餐桌,无论羊羔、肥羊甚至禽类,生产者自己都享用不到;巴黎肉铺主从诺曼底运来的牛,生长期有的仅 6 个星期,号称“未断奶的牛”,但只要一过了哺乳期,就被叫作“食草的小牛”²⁸⁹,这类牛肉不为生产者所能问津。阿尔卑斯山区所养的牲畜比别处多,奶酪和奶是“当地的基本营养食品”²⁹⁰。但农民消费的肉食仍然不多;福西尼地区每年出售其三分之一的活牲畜,以销往日内瓦为主²⁹¹。牲畜进入市场后,给生产者换回为数可观的现金。此外,各地拥有力畜的农民²⁹²在农闲季节经常从事运输,也可从中获利。毫无疑问,不同方式的牲畜饲养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但又仅仅是项副业。

凡在畜牧业主宰、垄断乡村活动的地方,对多种经营留恋不舍

的农民认为这是一种畸形发展。总之，直到 20 世纪，农民一方面受到法国某些社会阶层的耻笑，另一方面又对专事放牧的牧人肆意嘲笑和挖苦。他们自以为比牧人高明，就该轮到他们对后者评头品足，多方挑剔和戏弄。这种奇怪的报复心理例如在诺曼底就可以见到。布赖地区是插在庇卡底白垩土高原中的一个粘土地质带，当地水草丰盛，交通不便，四处长着零星的果树；布赖地区向古尔奈的集市输送无数的大块黄油，供远道而来的巴黎客商选购。由于草茂畜肥，布赖地区牧民的日子过得舒坦自在。博韦地区种植谷物的农民对他们的这些邻居百般讥笑，称之为“好吃懒做”²⁹³，似乎喜欢举办庆典和盛宴就是犯了什么罪过，似乎“不用费钱费力”，“坐收牧草之利”²⁹⁴竟是这些诺曼底人的一大污点。

农民对牧人的鄙视在法国自古至今历来存在。谓予不信，请听以下的故事。1920 年，达尼埃尔·哈莱维在佩里戈尔遇到一位农民，这位农民从家乡利雷兹来到这里后，经过胼手胝足的辛勤劳动，开垦了荒地，种植了葡萄。可是已近年高力衰之时，难道他从此将以养羊为生？“瞪着眼睛看地里长草和绵羊吃草……说到羊信一词，他流露出一不屑一顾的神情……种麦、植麻和栽培葡萄这类艰苦的农活才是他所器重的一门学问……在他看来，饲养牲畜不是正经人干的活计……对于羊信，他只有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鄙视，文明人对野蛮人的鄙视。”²⁹⁵

我经常想到，假如欧洲不把犹太人当作长期仇视的对象，恐怕早已驱赶最不合群的牧人了。

身份高贵的葡萄

商品葡萄的北部界线以卢瓦尔河口为起点，朝着梅斯到特雷沃一线延伸，往东走出我国的国境。也就是说，位于这条界线以北的地区虽然也能种植葡萄——过去确实曾经种过——。但如果今

天再在那里栽种,收获的葡萄将不会具有商品价值。

在这条界线以南,葡萄往往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只是沿着“逶迤曲折”的高山低谷,在向阳一侧的坡面上栽种²⁹⁶。在你外出旅行的途中,葡萄间或会偶然出现在路边,但随后便立即消失。除非在普罗旺斯、朗格多克、鲁西永等真正的南部地区,才见得到成片的葡萄地,但是,决不会有葡萄地覆盖全部乡村的景色。

因此,即使在最负盛名的葡萄产区,葡萄园的地块也都小得出奇。名闻遐迩的科多尔省就是如此:“从乌什河谷到德讷河谷,葡萄地像是一条条细长的丝带起伏延伸”,途经尼伊、尚贝坦、拉罗马内、武若园等名酒产地²⁹⁷。香巴尼省的情形也是如此:在1860年²⁹⁸,葡萄酒生产“集中在布里和香巴尼之间的狭长地带”,占地6万公顷。此外,在我国5000万公顷的土地上,葡萄占地面积随不同的时代在150万至250万公顷之间摇摆,等于总面积的1/33到1/20。

然而,葡萄地始终极其宝贵,如果种植面积相等,其收益比附近的谷物地要高得多。正因为它极其宝贵,再加上各种历史因素,葡萄地的所有权被分割得七零八碎。就以1898年阿尔萨斯的里博维莱葡萄产区为例,“面积达894公顷的私有土地共分为8967个小块”²⁹⁹。同样的规律适用于科多尔省和图赖等地区。艾蒂安·歇瓦利埃是紧靠巴黎的阿让特伊的葡萄种植者,他于1790年指出,“在法兰西岛地区,根据他的观察,一般农民与葡萄种植者的生活有着惊人的差别,因为拥有一弓丈的葡萄地,便足以应付举办婚事的全部开支”³⁰⁰。

由此可见,种植葡萄本身迟早甚至很快就能使自由农民取得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并带来必然产生的各种后果。与英国和德国相反,法国是个以小土地所有为基础的國家;这已成了一句老生常谈;值得予以补充的是,法国的这个经过长期酝酿而形成的特性³⁰¹

主要就归功于葡萄种植的分散布局。雷蒙·勒蓬(1792年)认为,居住的分散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一论断不尽准确,因为在产粮地区,还有一些间隔距离很远的大村庄³⁰²。

葡萄种植的历史演变过程确实复杂而又引人入胜,其中发生的每个大小事件都使我们击节称奇,都要提出有待历史作出回答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社会、政权、特殊的劳动领域乃至文明。

如果说面包是基督的躯体,葡萄酒便象征着宝贵的血。如果把小麦比作历史悠久的散文,起步较晚的葡萄可被认为是诗歌;葡萄为我国的景色增添光彩,使之变得雍容华贵。正如乔治·迪朗³⁰³在一部赞颂葡萄酒的著作中所说的,“葡萄酒不是土地的产物,而是出自人们寻欢作乐的愿望。……人们喝酒远不是简单地满足生理需要,这与一系列的生活追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生活追求也就意味着文明,葡萄对其种植区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并且始终以惊人的活力取得成功。更何况,没有一种土壤不适宜种植葡萄。

随着铁路事业的发达,葡萄种植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危机,某些地区已不再种植葡萄,即使在那里,它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葡萄农的住所一眼即可辨认:房屋高大,地窖的门厅宽敞,与运入地窖用以装酒的酒桶尺寸相符,食物贮藏室几乎占整所房屋的底层,并不总是因陋就简的楼梯往往设在屋外,通往楼上的住房³⁰⁴。葡萄佳酿已别去,良辰美景今犹在。在拉昂、贝桑松、巴勒迪克四周的乡村,荆棘和灌木已乘虚而入,侵占了原有的葡萄地,而弯曲的小路却让人回想起,在当年的采摘季节,人们背着满筐葡萄往来繁忙的景象。就拿奥尔南河谷来说(奥尔南河流经利尼昂巴鲁瓦和巴勒迪克),葡萄种植虽然已经废弃,但村庄的洁净和雅致却说明这里原是葡萄产地。村民们惯于嬉笑逗趣,肯定不是笨拙迟钝、只会弯腰刨地的乡巴佬。

葡萄种植的推广

葡萄于公元前 600 年由马赛希腊人传到高卢，时间早在罗马入侵以前。葡萄最早在福西亚城附近出现，希腊人曾经向高卢出售过葡萄酒。

罗马人后来才到高卢，但对葡萄种植的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公元前 122 年，罗马占领了纳尔榜省，大致相当于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两地区。葡萄开始在纳博讷附近立足，并迅速在全省传布。公元前 111 年条顿人入侵时，在艾克斯被马略军团挡住了去路，蛮族部队在临战前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普卢塔克说，他们“因大吃大喝而变得肥胖臃肿，但他们喝的葡萄酒却能给他们增添快乐和勇气”³⁰⁵。

随着葡萄种植在高卢取得初步成功，葡萄酒便大批向北方运销。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³⁰⁶说，“许多生性贪婪的意大利商人利用高卢人对葡萄酒的嗜好，便船载车运，攫取高额利润，一瓮葡萄酒居然能抵一名奴隶的价钱，酒客甚至随带奴隶上门顶帐”。这种情形使人联想到今天的毒品贸易，它为中间商、运输商、推销商以及为在远东产地种植罂粟的农民都带来莫大的利益。

迅速推广葡萄种植的各种条件似乎早已具备。奇怪的是历史却偏偏止步不前。葡萄迟迟不肯超出南方的地中海沿岸地带的范围。往北和往西的方向，葡萄遇到了寒冷的阻挠，另一种地中海植物橄榄树也从来望寒却步。然而，葡萄因适应性较强，后来又发现和培育了新的苗种——一种成为勃艮第葡萄的始祖，一种成为波尔多葡萄的始祖——，困难终于逐渐被克服。一些能在霜降前结果成熟的苗木从此诞生（可能经野生葡萄嫁接而成，这些野生葡萄后遭根瘤蚜危害而在法国森林中消失）。到了公元一世纪，葡萄沿罗纳河往北发展，越过维埃纳后，绕塞文山西行，抵达位于瑙鲁兹山

口以北的塔恩河谷，再经由加亚克转加龙河谷来到波尔多。

从此以后，葡萄对高卢的入侵便自动进行，只是各地的进展有快慢不同而已。它于公元后 311 年在勃艮第的坡地安顿了下来³⁰⁷，于六世纪抵达莱茵河（我对此说存疑）³⁰⁸，紧随蛮族入侵之后³⁰⁹。波尔多和摩泽尔的葡萄酒在查理大帝帝国末年一举成名³¹⁰。葡萄种植在高卢的推广得益于葡萄酒消费的增长。当地产量上升之快，以至在图密善皇帝当政期间（公元 87—96 年），高卢葡萄酒反而向意大利出口。图密善下令停止扩大高卢的葡萄种植，这可能是为了保护意大利的葡萄农和确保高卢的小麦种植。据说曾要求拔掉已种葡萄苗株的一半³¹¹，这项命令成效甚微，本是自不待言之事！两个世纪过后，到了普罗布斯在位期间（276—282 年），高卢全境重新开禁，允许自由种植葡萄³¹²。果真有此必要？总之，当罗马统治结束时，葡萄已遍布高卢各地。

到处都栽种葡萄，甚至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寒冷地区。尽管满载着一桶桶葡萄酒的车辆和船只随处可见，运输的速度毕竟十分缓慢。消费决定生产，但顾客并不亲自组织生产，他们贪图近便。因此，只要可能，或不如说除非不可能，所有的城市全部在近郊种植葡萄。罗马皇帝尤里安（332—363 年）之所以乐于在吕岱斯居住，这是因为城市在其近郊拥有果园和葡萄园，以及他所熟悉的自然景色³¹³。

早在五世纪蛮族大规模入侵前，罗马在高卢的统治已开始崩溃，而葡萄、葡萄酒和葡萄种植者却并不因此凋零破败。蛮族在高卢当地将有充足的葡萄酒供他们享用。葡萄仍在市郊和寺院周围种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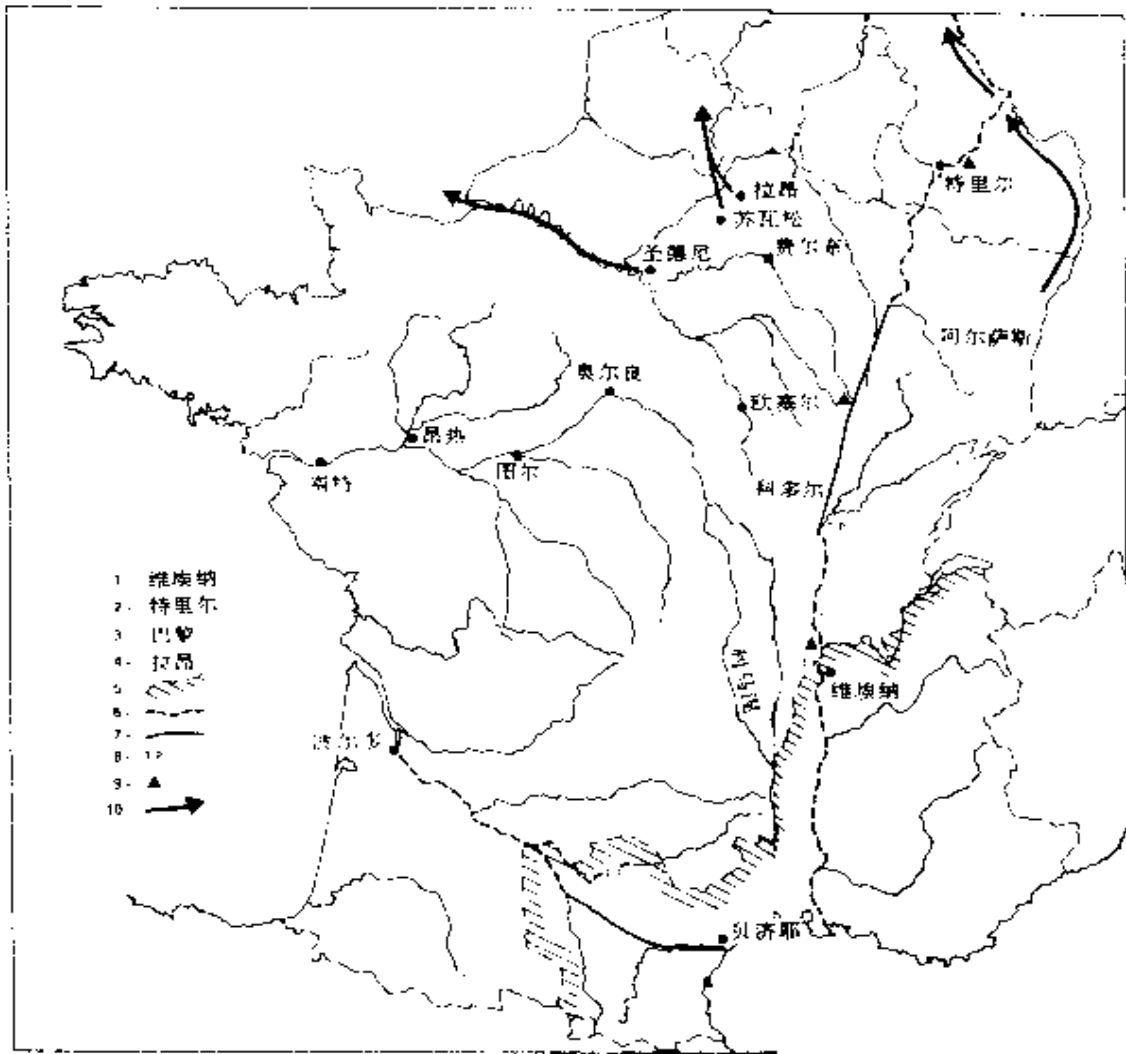
然而，葡萄农的生计已今不如昔。随着城市的急剧贫困化，喝酒的人越来越少，葡萄农的生计自然受到影响。少数城市作为主教所在地得以幸存，因而主教便成为葡萄种植的保护者、推动者和救

星。富有的修会也在其寺院附近种植葡萄；各地的教会在做弥撒时少不了要有葡萄酒作祭品。更何况，对世上的所有达官贵人来说，葡萄酒仍是财富和好客的象征，是交友待客所必须的赠品。王公同修道士一样保护葡萄的种植。但葡萄酒的远程贸易丧失殆尽，特别是罗马时期对不列颠群岛和北方地区进行的活跃的大西洋贸易。

到了11和12世纪以后，由于欧洲经济的复兴，流通有所改善，葡萄种植又再度兴旺起来。当时，城市里的富人多了，葡萄酒的顾客也跟着增多。经济欣欣向荣的北方各国或者不长葡萄，或者不宜这一作物的生长。越是缺酒，那里的人越是吊足了胃口；英格兰（岛上栽种的葡萄仅供观赏）、佛兰德、尼德兰、北德意志等北方国家的“客商”将云集法兰西王国，使葡萄酒的出口贸易得以振兴。用13世纪那时的话来说³¹⁴，葡萄酒就是黄金。

可惜运费极其昂贵，因而只有几经挑选、严加品评的优质葡萄酒才供出口之用，一些葡萄产区经过优胜劣汰的兼并，将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勃艮第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地的葡萄园将落入第戎高等法院富有的参议们的控制之下，并为此而蒙受损失；特别兴旺发达的波尔多葡萄产区也是如此，纷纷落入当地高等法院的长袍贵族之手³¹⁵。

葡萄酒的出口力求采用便利、廉价的运输手段，大多经由大小江河和海道。例如，卢瓦尔河沿岸的产品，包括福雷地区的在内，均利用卢瓦尔河外运。索恩河和罗讷河也自告奋勇地承担这一使命。约讷河不仅漂送来自莫尔旺的木排，而且还输出沙布利的桶装葡萄酒，马恩河负责把香巴尼的葡萄酒运出境外，到了18世纪，随着香槟酒的酿制成功，运输量不断增加。甚至默兹河也不甘寂寞，把巴鲁瓦生产的口味偏酸的葡萄酒运抵列日；莱茵河则很早就促成了阿尔萨斯葡萄的兴旺。斯特拉斯堡曾是向北海出口葡萄酒的集散地³¹⁵。



罗马统治期间和法兰克王朝期间高卢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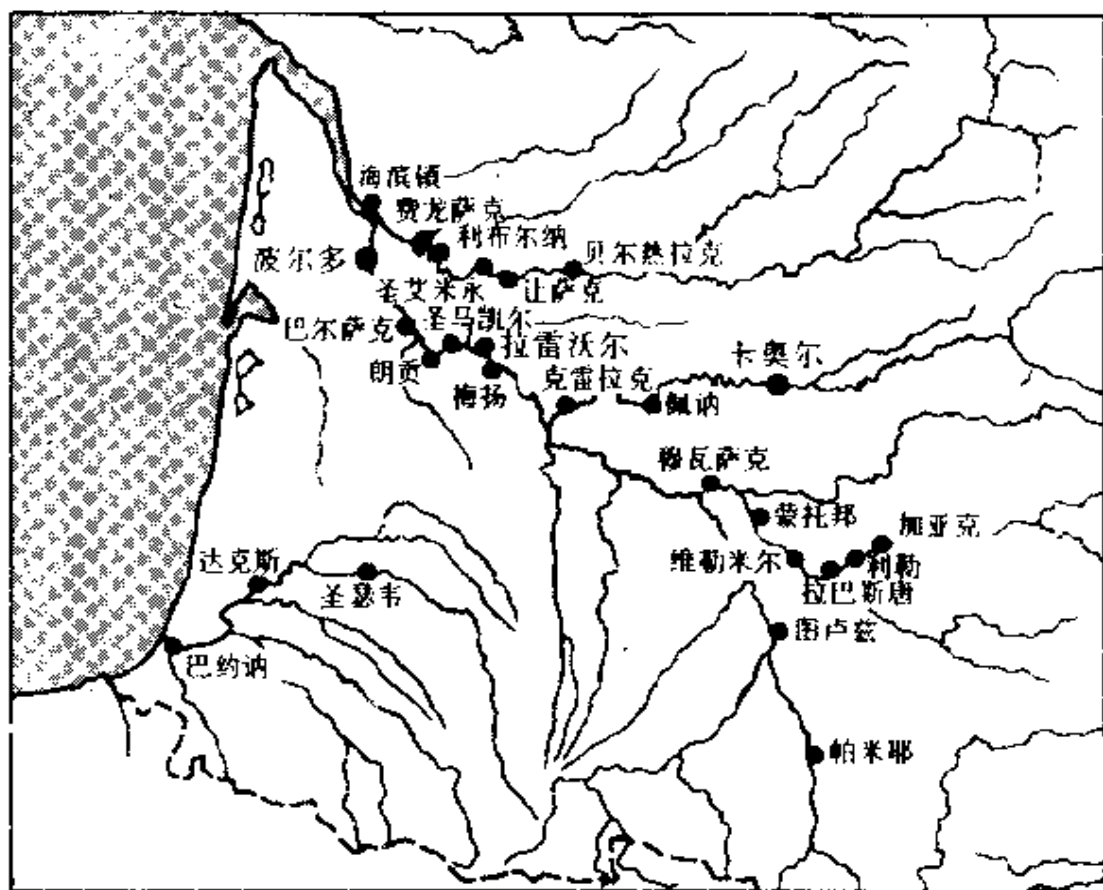
早在罗马统治期间和法兰克王朝期间,高卢已向北方的顾客出售葡萄酒。(资料来源参见罗热·迪永:《法国葡萄和葡萄酒的历史》。)

维埃纳 特里尔 巴黎 里昂

列举的四个城市系葡萄酒产地

- 1、公元一世纪。
- 2、三世纪。
- 3、四至五世纪。
- 4、六至九世纪。
- 5、上罗马帝国纳尔榜省的界限。
- 6、和 7、罗马时期运销葡萄酒所使用的水陆要道。
- 8、双耳尖底瓮残片的主要集中地。
- 9、罗马时期与葡萄酒水陆运输有关的古迹所在地。
- 10、法兰克王朝时期的葡萄酒主要运销方向。

在大西洋方面,圣通日和欧尼斯两省的葡萄酒一马当先,最早打开销路;圣让—当热利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拉罗歇尔则是生机勃勃的出口城市。波尔多的葡萄酒随即鸿运高照,后来居上。依靠英格兰国王给予的特惠,波尔多更如“快马加鞭”,飞速猛进。尤其是,拉罗歇尔当时落入法国国王之手,切断了与英国的往来,这对波尔多更是莫大的机遇。为了满足英国饥不择食的需求,波尔多在城市附近树木丛生、坑洼不平的滩地³¹⁷广事开荒,发展葡萄种植;英国的需求甚至还有助于波尔多名酒的形成,推动了内地的兴盛,至少在沿河地区。总而言之一句话,出口优先!



阿基坦地区 13 世纪向英格兰出口葡萄酒的城镇

本图展示了阿基坦地区 13 世纪的葡萄产区;除了于该世纪专事生产生命之水的新作物区以外,其余产区于 13 世纪已向英格兰出口葡萄酒。(同见迪永:《法国葡萄和葡萄酒的历史》。)

读者请不要误以为，巡按使巴维尔 1734 年称阿莱斯葡萄酒“不宜运输”³¹⁸，就是对该酒作了死刑判决，或至少会使它成为仅供当地消费的次等酒。同一位巡按使在谈到加亚克³¹⁹（在阿尔比教区境内）时补充说，唯独这里“生产的葡萄酒能够运输。塔恩河在该地可通航运，利于发展大宗贸易。葡萄酒将运往波尔多，由英国商人收购；经过运输的葡萄酒品质更佳，特别适宜于向海外出口”。英格兰商人在塞特港装船外运的朗格多克葡萄酒也具这一特性：“葡萄酒在伦敦颇受欢迎。人们曾担心酒经不起海上的颠簸，其实大谬不然，海运反而使酒味更醇”³²⁰。愿海运的葡萄酒万古长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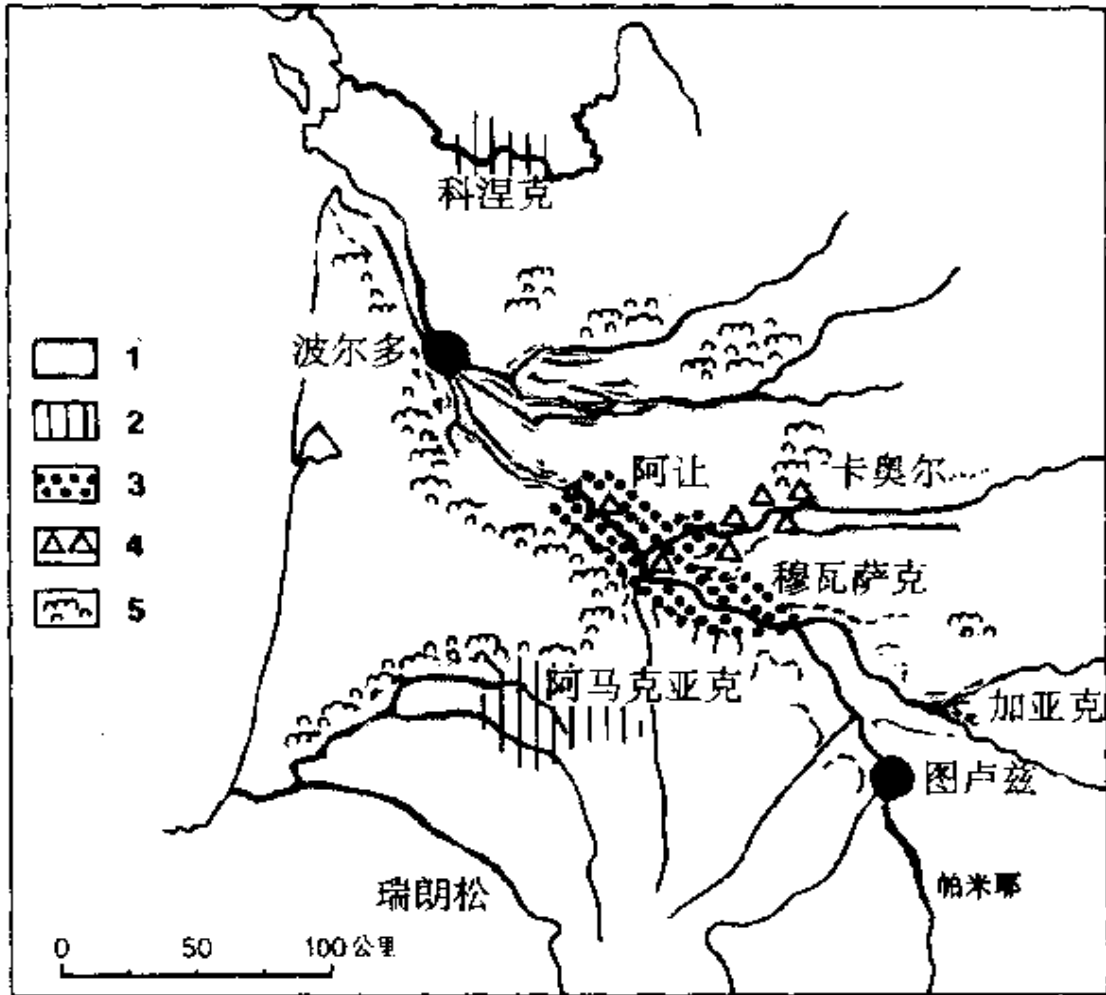
从 17 世纪起，应荷兰客商的要求而酿制的生命之水取代了葡萄酒在海外出口中的地位³²¹。价值相等，份量较轻，生命之水更便于搬运，而且也不怕长途运输。交货地点既可在塞特港（朗格多克的产量举足轻重），也可在巴约讷、波尔多或拉罗歇尔，由此导致了科涅克酒和阿马尼亚克酒的异军突起。即使在勃艮第、香巴尼和洛林等内陆地区，未发酵的葡萄酒纷纷被用于蒸馏，提取生命之水。据说，啤酒在香巴尼像在别处一样渐趋盛行，当地缺少木柴，葡萄酒有时竟充当燃料。

各大葡萄产地正是经过这几个世纪才各具特色。它们在科尔倍尔时代的区划界线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体相同，但也远不是完全不变。更何况，这里并不仅仅涉及生产优质葡萄的地块和品种。

葡萄种植的平民化

富豪人家拥有的葡萄园长期委托葡萄农经管，或支付一笔工资，或对半均分果实。葡萄农的处境比普通农民大概略为好些，但繁重的活计迫使他们不停工作：用锄镐在株间松土，拔除和更替老株（尽管葡萄可生长百年），把被雨水冲到坡下的泥土用人力背回

原地,每年修整长短不一的蔓枝……



法国西南部乡村的种植布局(18世纪)

农业活动全部依市场(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为转移,首屈一指的葡萄(1),兼领首位的生命之水(2),还有阿让的杏干(3),烟草(4)和出口橡木(供制造酒桶用),均与航路有着密切的联系。(见保尔·克拉伐尔:《人文地理概论》)

在剪枝的问题上,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塞纳河畔的巴尔有一句谚语:“早剪晚剪都不如在3月剪”³²²。在19世纪的香巴尼,有人则相反断言,相当普遍的毛病是“等到开春才整枝压条。这项工作如果换在秋初进行,葡萄就不会为无用的花芽和花朵浪费养料”³²³。在19世纪的朗格多克地区,洛代沃堂区的葡萄农每年在冬

季剪枝。一到开春,他们锄松根部的土壤;葡萄园每年犁耕二次,“一次在2月或3—4月间,另一次在5—6月间;如果因干旱遇阻,第二次可推迟到11月进行”。耕地时使用的是“装着铁铧的一种轻犁,又名叉犁”。坡地上只能用“小锄松土,又称培土。许多呈梯级状的地块需要不断修补”³²⁴。

所有这些活计在收获葡萄的大忙季节便退居次要地位,临时雇佣的大批劳力,由一名领工指引,分别从事“采摘、搬运和榨汁”等项工作。在博韦地区,“工人一日三餐相当丰盛,汤菜齐备,还有牛下水可吃,每天可得几苏工钱”³²⁵。他们都是些打杂的零工。

葡萄农相反是手艺人,手艺的高低“比葡萄本身更加重要”³²⁶。葡萄的生命力极强,插到哪里便在哪里生长,它在葡萄农的手下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葡萄农可让它像藤本植物一样攀架爬藤,也可让它成为盘根错节、独立无依的矮生灌木;他能通过改良种苗和土壤成分,改变葡萄的口味和含酒量,提高产量或赋予特殊的品质。他能随意改变土质,有时杂以石块,或相反大量施肥,以致使“葡萄酒变稠,不再清醇爽口”³²⁷。总之,葡萄农必须掌握精巧的技术。

早在14世纪,当葡萄出现全面振兴时,葡萄农和地主之间便开始发生冲突³²⁸。冲突随后将不断扩展。最初是在巴黎、里昂、奥尔良、图尔、桑斯、欧塞尔、布卢瓦、梅斯等城市的四郊。那时候,城市人口刚经历了一个急剧增长的时期,资产者为了与贵族和僧侣分庭抗礼,都想拥有自己的葡萄园和享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葡萄酒。位于市郊的葡萄地顿时奇货可居,身价百倍,地块也被分得七零八碎。可是,当园地的面积下降到2公顷以下时,地主便不可能再挽留葡萄农在那里安心劳作。资产者的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块土地因此就雇佣一些零工照料,当然所雇的零工都是懂行的人。

这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零工都颇有心计,也想拥有自己的园圃和出售自己的产品。随便买块土地并不是件难事;不宜种植谷

物的瘠地即可栽插葡萄。主要的投资还是人工。

雇工们想方设法要偷懒,缩短劳动时间,因此总是与雇主发生龃龉。照例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雇工“下葡萄园”却惯于早晨晚到,刚过中午,等三点钟敲响,就歇工不干。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冒犯雇主,因为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艾蒂安·帕斯基埃(1529—1615年)认为,法语中“丁当作响”一词正是指布卢瓦的葡萄农用石块敲铲,互相通知歇工时间已到所发出的嘈杂声³²⁹。每当官府接受资产者的诉状,强制工人留在地里时,敲铲的信号一响,工作便立即停止,成为某种就地罢工。

地主们竭力追求葡萄酒的质量,为了他们自己和城市的荣誉而大声疾呼。葡萄农则不然,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不栽经过传统选种而培育的上等葡萄,却引进次等植株(在勃艮第引进洛林苗枝,在法兰西岛引进萨瓦苗枝),后者便于种植,产量又高,但酿造的酒品质低劣。葡萄农在与地主的对抗中终于取胜,这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正迎合平民对廉价葡萄酒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这里的平民不包括农村。葡萄酒在乡村仍是节日的奢侈品,直到18世纪末,葡萄农自己满足于喝点由留在榨具底下的酒渣兑水配制的“渣水”,这种饮料的名称因地而异,如“酸汁”、“水酒”等。相反,在城市中,如果主人想喝酒,照例也给仆人喝点,尽管是另一种等级的酒。可见,仆役以及工匠全都喝酒。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普通葡萄酒的消费量也迅速提高,特别是在亨利四世即位以后。

葡萄种植的平民化“有助于葡萄农摆脱资产者的束缚,但次等植株的推广同时又使葡萄的品质一落千丈”。拉昂、欧塞尔、奥尔良、巴黎等城市附近生产的优质葡萄酒陆续归于灭亡。劳动力不但要价很高,而且偷奸耍滑,再加上气候作梗,葡萄园几乎无利可图。资产者被迫出售土地或拔除苗株。葡萄农乘机买进,纷纷用高产植株取代优质苗种³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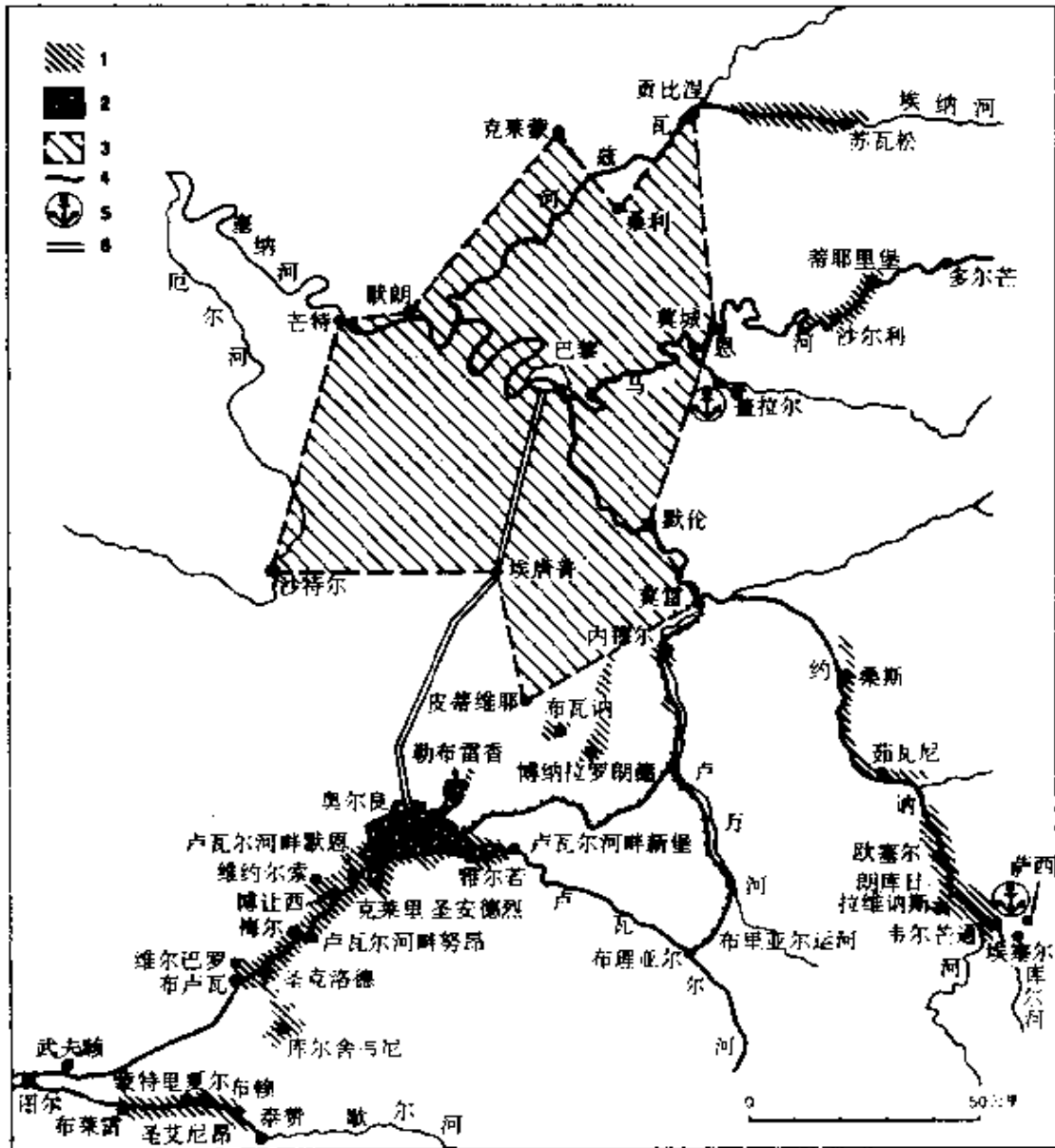
在对荷兰商人开放的大西洋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演变,但其起因却与前面完全不同。英国在波尔多的采购推动了优质品和名牌葡萄酒的发展,而18世纪的荷兰定货却产生相反的效果。荷兰人需要的是生命之水,或者用来挤兑葡萄酒和提高酒的度数,或者为了提纯取得酒精。可是,作为燃料,次等葡萄酒足以符合要求。荷兰贸易在大西洋沿岸和内陆的沿河地带(阿杜尔河、加龙河、夏朗德河、卢瓦尔河)迅速发展,促使人们大批生产产量高、品质低的葡萄酒。这一演变进展很快。正如1725年昂古穆瓦省的一份报告所说,“葡萄生产从前完全掌握在资产者和富人的手里。如今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自己栽种”,拥有地产的资产者再也找不到为他们干活的劳力,因而正日趋消失³³¹。

这一演变说明,葡萄农的生活水平在一般农民之上。即使充当雇工,他也能够保护自己,取得一份土地对他比较容易。在大革命前夕的勃艮第地区,“葡萄农比平原的人吃得还好,精麦面包常可吃到”³³²。阿瑟·扬当时曾提到,葡萄农的家境在法国所有农民中堪称得天独厚。

酿酒工业

小麦要制成面包必须经过磨盘和烤炉;同样,葡萄酿酒也要经过一个加工过程,只是这种加工仍由生产者所掌握而已。是否因此可以说,酿酒属于农民经济的一部分?酿酒算不算是一项工业?

即使算不上是工业,酿酒的工艺毕竟十分复杂。人们只要查阅萨瓦里·台布吕斯龙的《辞典》(1762年)³³³就可以明白。《辞典》告诉我们,所谓“原汁”是“在酿酒工进入酒槽踩踏葡萄前,从酒槽塞口自动流出的果汁”;“一榨”是“酒槽中的葡萄经踩踏后流出的果汁”;“二榨”是“经过踩踏挤出头遍果汁后剩下的果渣连同果柄一起,经榨机榨出的果汁”;榨后留下的果渣“用以制造所谓渣水”(果



17 和 18 世纪巴黎廉价葡萄酒的供应

为保护巴黎葡萄酒的质量,1577 年的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首都四周方圆 80 公里的范围内,禁止巴黎酒铺主采购葡萄酒。实际上,这个地区在 17 和 18 世纪将成为专供各关厢小酒铺广为销售的劣等葡萄酒的主要产区。巴黎此外不通过附近的各条水道和奥尔良大路取得廉价葡萄酒。(见罗热·迪永:《法国葡萄和葡萄酒的历史》。)

1、供应劣等酒的葡萄产区。2、据了解,奥尔良财政区中的这些堂区“布满了葡萄园”(国家档案馆 GT421 号)。3、1577 年 8 月 14 日经巴黎高等法院裁定,将首都的范围至少扩展到 20 里以外。4、可通水运的河道。5、通航河流的抵达港。6、奥尔良通往巴黎的大路。

渣兑水后再榨一次)；“甜酒”是“未经发酵的酒汁”；“生酒”是“特意阻止发酵的酒汁”；“熟酒”是“发酵前煮过一次的酒汁，因此可始终保留其甘甜”；在“甜烧酒”中，“普罗旺斯地区的圣洛朗和拉西约塔，朗格多克地区的弗龙蒂尼昂和巴尔班塔纳，里昂地区的孔德里约，勃艮第地区的阿尔布瓦和马孔，尼韦奈地区的普伊”，当地所酿制的麝香葡萄酒都各具特色。葡萄酒的品种今天更花样翻新，名称已无从数计。

若想对葡萄酒进行普查，说出各种名酒的特色、价格和客户……恐怕写整整一部书也写不完。此外势必还要谈到酒桶的制造以及酒的运输、保存和翻窖；在香巴尼地区的庞大酒窖里，第二帝国期间或更早一些时候，“四驾马车可畅行无阻”³³⁴。还有形形色色的榨机，它们往往属于公有，致使葡萄互相混杂，葡萄农对此很有意见，但也别无选择。总之，酿酒工场并不集中，而是相当分散，甚至门类繁多。

各地的酿酒业是否妨碍其他工业的发展？科尔倍尔曾有此担心。为了发展纺织业，特别是在城乡推广家庭劳动，他曾怀疑事情在勃艮第是否能够行得通。他指出，“如果有两个城市，地点都适宜建立纺织工场，一个城市属于葡萄产区，另一个则不是，那就必须挑选不产葡萄的城市，因为种植葡萄对发展纺织业妨碍甚大”³³⁵。罗热·迪永写道，毫无疑问，“拉瓦勒、鲁昂、康布雷、富尔米等地不产葡萄，是法国发展家庭织机及其他乡村工业最好的地区。相反，在商品葡萄生长线以南，乡村居民对家庭纺织是否真能减轻他们的贫困不无怀疑”³³⁶。照这么说，酿酒业或其他工业，二者不可兼顾。这种看法未免太简单了一点。

18世纪的朗格多克是个人口稠密的贫苦地区，人流还源源不断地从比它更穷的中央高原涌来。当地穷人不得不在谷物种植(土地归资产者和教会所有)之外另谋生路，见缝插针地在贫瘠的土地

上栽种葡萄；富人当然对此竭力抵制。洛代沃、蒙彼利埃等城镇周围的穷人，有时包括酒铺主³³⁷和手工工匠在内，拚命想取得一块土地，以便种植葡萄和自己酿酒。这些小型葡萄园不仅旨在满足当地平民的消费，而且把大量剩余产品外销意大利，其中弗龙蒂尼昂的麝香葡萄酒尤以优质甜烧酒著称，产地不限于弗龙蒂尼昂一地。

与此同时，朗格多克建立了许多纺织工场，洛代沃加工的毛料充当军需，克莱蒙和卡尔卡松的产品供应东地中海的市场。一系列兼并使贫苦的纺织工匠的生活变得朝不保夕，但也促进了该省的勃兴和平衡。

由此可见，问题不仅在酿酒业和其他工业之间的平衡，而且在工业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平衡。一般说来，葡萄农的生活比较优裕。如果他们在乡下的日子还过得下去，为什么再向城市外流？如果另有出路，他们怎会同意为乡村工业从事家庭劳动，所得报酬又低于城市工匠？盛产谷物的卡昂地区的农民不就是拒绝这么做的吗？城市商人想在村庄中招收纺织女工，发现村姑们反应冷淡。如果工资高些，她们勉强还能接受。在这经常输出小麦的地区，家家户户都能做到吃饱有余。

一位机敏的英国商人 1750 年想在法国开设一家英国式的纺织厂，填补法国纺织产品的不足，厂址选在哪个地区？选在热沃唐。这并非因为葡萄在该地区生长不良，而是那里十分贫穷。³³⁸

法国三大葡萄产区

葡萄种植的历史，概括地说，应在法国划出两道分界线：橄榄生长线靠南的一侧，包括地中海地区在内，是法国境内最早出现葡萄的区域，可称“天然生长区”；往北是商品葡萄的北方界线（再强调一次，说的是商品葡萄），从卢瓦尔河的海河口开始，向东延伸，穿越整个欧洲，直到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及波斯，那里的葡萄冬季

必须埋在土下避寒³³⁹。这是欧洲的一条幸运线，当然是对南侧的幸运。由此形成了互相连接的南北两大地块：每年采摘季节过后，葡萄酒便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往北方。以威尼斯为例，一边在马尔凯和那不勒斯采购供本地消费的高度酒，另一边又让德意志车队在每年夏季把弗留利和威尼西亚地区生产的普通白葡萄酒运到阿尔卑斯山的北侧³⁴⁰。

可见，这两条界线把法国划成三块。

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当然是界于两线之间的中区，即波尔多、卢瓦尔河流域、勃艮第、香巴尼和阿尔萨斯等地区，我把洛林地区（土尔和梅斯一带至今还种少量葡萄）撇开不算。

毫不夸张地说，法国的这块中区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葡萄。不单是法国人持这样的见解。在这个地区，天气一冷，就必须对葡萄进行整枝，汰劣存优，等果实成熟很久以后再行采摘，利用天然的糖化作用增加果实的甜度和含酒量。在索泰尔讷地区，葡萄农甚至分几批用剪刀剪下陆续成熟的葡萄串，以保证果实的充分糖化³⁴¹。这种做法晚至1845年才刚开始，使索泰尔讷葡萄酒以“制作精心而闻名于世”。

中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决定那里的葡萄势必出类拔萃。但从第一眼看，说它得天独厚似乎也有道理。葡萄与葡萄各有不同。罗马人纪元前在高卢纳尔榜省栽种的葡萄并不是公元一世纪后在罗纳河流域的阿洛布罗克斯人地区推广种植的葡萄。老普林尼谈到，这一新品种适应寒冷的气候，果实至霜降时成熟（勃艮第至今往往还是如此，这在朗格多克平原就简直不可想象）³⁴²。事实上，波尔多葡萄和勃艮第葡萄这两大品种适应潮湿和寒冷的天气，它们并不由地中海苗枝所衍生，勃艮第葡萄可能由当地的野生品种培育而成，波尔多葡萄可能从坎塔布连山区移植而来。

此外，地理位置对中区发展葡萄种植大有帮助。葡萄的主要产

区靠近北方,这是因为,我再说一遍,北方人的消费量大,是购买葡萄酒的主顾。为了保证外销,另外还必须投入资金、精心管理、维护产品质量等条件。直到今天,这也还是至关重要的政策。

法国的第二个葡萄酒产区位于卢瓦尔河以北,从表面上看,它的发展过程极其简单,容易被我们所理解。在运输还很困难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郊区留几块土地栽种葡萄,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由于气候不宜,产量很不稳定,有时还因涝灾或冻灾而失收,葡萄种植后来曾有所缩减。自12和13世纪开始,海上航运在那时已经开通,法国中区的葡萄酒可从水路运来。到了铁路的时代,南部的葡萄酒更大量运来,将给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葡萄种植业以致命的打击。葡萄是否因此就退回到正常的气候区域去了呢?

事情毕竟不是那么简单,法国北部完全可能保存并且在这里和那里确实保存了一些优质葡萄园。叙雷纳的优质白葡萄酒³⁴³今天不是又恢复生产了吗?气候因素不足以解释一切。罗热·迪永曾经注意到,在南方葡萄酒占领北方餐桌的同时,谷物在乡村经济中又重振雄风,种植体系的完善促使人们在原来的休耕地上种植甜菜或发展人工草场。银行家、商人和农学家从此宣称,“唯有谷物和牲畜才是货真价实的农业”;作为经济作物的甜菜,其身价也胜过葡萄百倍。总之,葡萄的后退并不依气候差异的逻辑为转移,而是“根据耕地的不同土质而划界”。葡萄从所有富饶肥沃的耕地上退出,相反却坚守“土地不像巴黎北部那么肥沃……得以去支撑其他作物生长的地点”(例如在卢瓦尔河两岸)。正如马蒂厄·德·栋巴勒1829年所说,“我们发现富裕的农业几乎完全集中在不种葡萄的北方各省;越往南去,农业就越不景气,差不多与葡萄种植面积的增加成正比”³⁴⁴。

第三个葡萄种植区位于法国南方,也是最早栽种葡萄的地区,虽说自然条件最适宜葡萄的生长,但其发展却长期不如法国中区,

因为中区拦路抢走了好主顾，包括首都的主顾在内。

到了 18 世纪，以上情形全都开始改变。确实，1709 年的严冬使北方的葡萄全都冻死，而在南方，部分葡萄得以幸免，北方因此对南方葡萄酒大门洞开。酒价急剧上涨促成了南方的酒桶北运巴黎。

大变动随着铁路的问世而产生。葡萄酒的地理布局全被打乱。博若莱酒就在当时真正进占巴黎市场。更往南去，历来对制造业、酿酒业和谷物种植业三者兼顾的朗格多克地区，出现了葡萄种植的狂热。这场革命导致单一种植的形成和推广。根瘤蚜虫害（1865—1890 年）——加斯东·鲁普内尔称之为“第三共和国的重大事件”³⁴⁵——使当地不惜巨资引进美洲植株，更新种苗，但葡萄从此占领朗格多克平原，并向地中海靠近。正在那时，突然出现了滞销的危机，生产过剩造成价格下跌。无地或少地的葡萄农群起抗议。眼看着生产了“佳酿”却吃不上面包，他们懊恼之余便揭竿而起，1907 年竟调动部队进行镇压。

我们是否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谈到？单是考察葡萄和葡萄酒的历史，恐怕仍嫌不够。我们还要与中等消费者接触：巴黎工人每星期天惯于光顾市郊的小酒铺，那里的葡萄酒比较便宜，因为不付首都的入市税。去葡萄产区旅行的人顺便也会喝点新酒，既然是在产地，价格自然便宜。国王的药师亨利·德·卢维埃尔³⁴⁶于 1703 年（没有说明该年的哪个月）前往南方旅行，他说，到了离莫城 12 里远的蒙米赖尔，“我们又像在维厄梅松一样喝开了可口的香槟酒”，尽管蒙米赖尔和维厄梅松相距仅 3 里。歇脚就要喝酒。阿瑟·扬在瓦唐城外买到一瓶桑赛尔酒（大概是白葡萄酒）饮用。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只花 10 苏，而在城内，这瓶酒则价值 20 苏³⁴⁷。

出门旅行途中，本来没有开怀畅饮的打算，却碰巧喝到令人终生难忘的美酒：这样的经历，谁又没有遇到过？1920 年，我骑自行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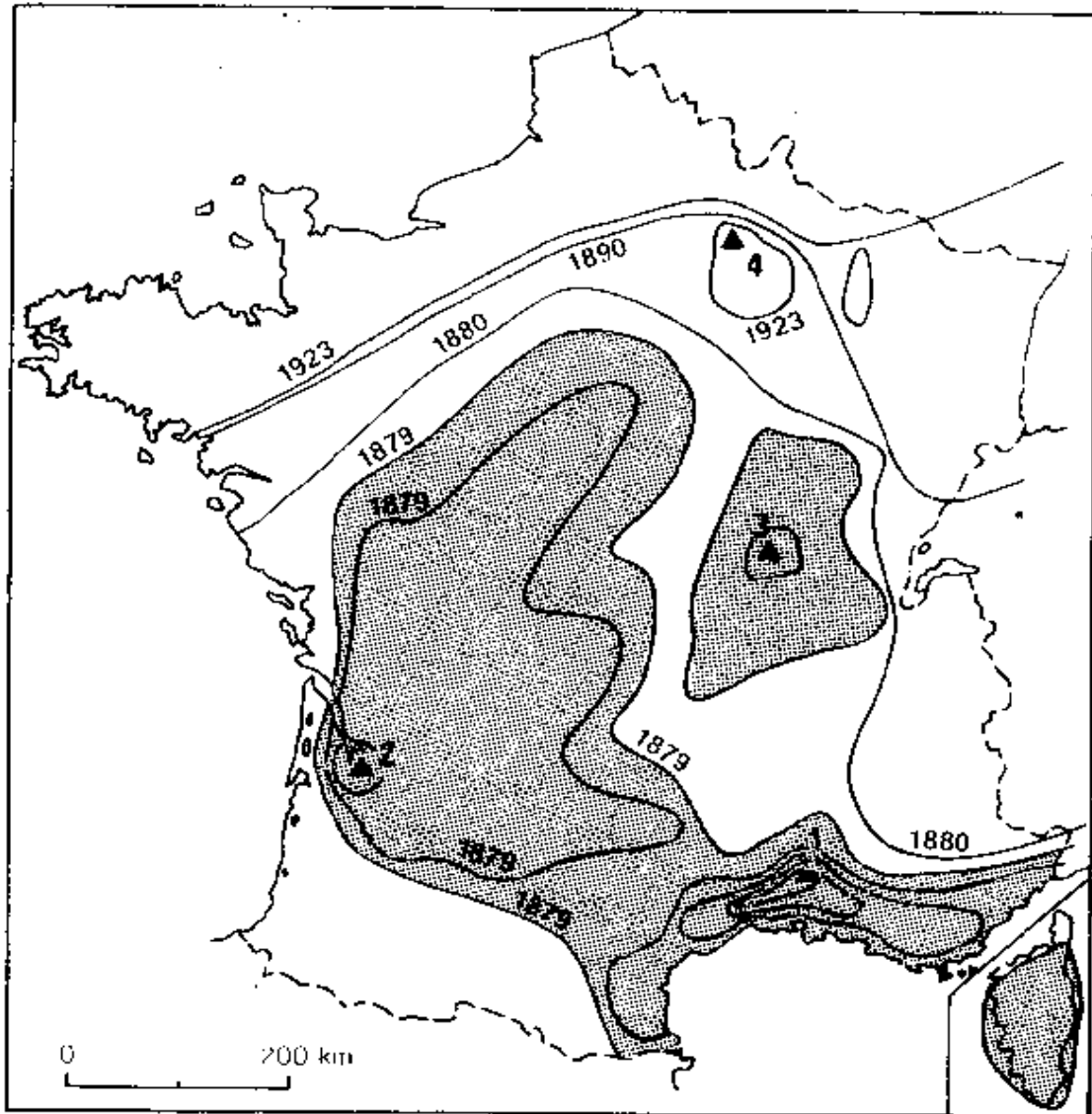
车沿巴鲁瓦和茹安维尔的边界前行，深入马恩河谷，尝到新上市的白葡萄酒。也许因为我当时缺少品酒的经验，我觉得那酒的味道简直美不可言。

最后谈谈小麦及谷物

我没有先从谷物谈起，独出心裁地打破了叙述的习惯顺序。鉴于谷物的地位举足轻重，我曾担心，它的出场立即会使其他角色黯然失色。既然它在整本戏里扮演支配一切的主角，何不让全体演员登台以后，再让主角露面？

根本的根本是什么？对人来说，活命第一，吃饭第一。此外，照皮埃尔·古鲁的说法，麦原是文明的一种选择，它的诞生远比所谓历史早得多，正如选择稻米或玉米千百年间支配了远东农民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美洲农民的命运一样。选择一经作出，便使人欲罢不能。

在进一步叙述前，我们必须说明，“麦”一词这里不单指小麦，而是泛指麦类，我们的祖先把可制面包的各种谷物统称为麦，其中当然有小麦，但也包括大麦、燕麦、似双粒小麦、黑麦（直到18世纪末，黑麦是法国种植最多的作物）³⁴⁸、混合麦（往往由小麦和黑麦对半混合）和荞麦，“小春作物”³⁴⁹（不仅指3月播种的大麦和燕麦等谷物，而且指豌豆、芸豆、扁豆等）还不算在内。正如奥利维埃·德·赛尔所说，“麦一词可泛指包括食用菜蔬在内的所有籽粒”³⁵⁰。1898年，一名社会学家经实地考察后断言，在我国的中央高原，栗子作



根瘤蚜虫害在法国的蔓延

发源地:1、1863年:皮若(加尔省);

2、1865年:弗洛拉克(吉伦特省);

3、1876年:博若莱;

4、1890年:香巴尼。

灰色:1879年虫害蔓延区。

(参见保尔·克拉伐尔:《人文地理概论》,1980年版。)

世纪为止,应该说是黑麦占据首位。这说明黑面包久盛不衰的原因;人们过去和面时往往都掺杂粮粉,并不如今天所要求的那样单用精麦粉。用精麦粉制作的白面包虽然人人爱吃,但它确立统治地

位的时间却比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要晚得多,换句话讲,远在大革命和帝国时期以后。雷蒙·勒蓬于1792年断言³⁵³，“常吃精麦面包的人体格壮实,精力旺盛,不易得病”。法国的平民百姓要等很久以后才有幸吃上白面包。

苛刻的要求

麦的收成究竟如何?这个问题让当局时刻挂记在心,当局被它所困扰,被它搞得神魂颠倒。人们密切注视谷物的生长;人们知道,生活的太平安稳或朝不保夕,就看收成如何了。尽管没有一部法国史曾赋予它应有的重要地位,麦在我国历史上却始终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至少直到19世纪为止。它主宰一切,既普施恩泽,又强加种种束缚。

首先,麦要求实行“轮作”,换句话说,在同一块土地上,不能连续两年种麦(例外恰好证实规律)。它总是要求在不同地块轮流种植。农业学家们对此作出各种解释。德·加斯帕兰伯爵于1831年说:“麦不能在一块地上连续种植,原因来自肥料不足,还因为不能同杂草作斗争,杂草的成熟又早于麦,很难在麦的播种前清除杂草”³⁵⁴。另一位农学家³⁵⁵(1843年)谈到植物的生长法则,认为作物吸收土地的某些营养成分,并留下其剩余成分;因此,如果再种相同的作物,就会使土质变坏。“我们发现,同一种草如果在天然草场的某个地点生长茂盛,它在生长期满以后便不再萌发,而被其他草种所代替,因而草场收获的下草从不会相同。”

然而,对于几乎无处不在的麦地轮作,还有其他的解释理由。

麦地的轮作周期长达14至16个月,跨着两个年度,周期也并不始终从9—10月间的秋播开始。无论是种冬小麦或冬黑麦,必须首先整地,通过一系列的翻耕,使种芽更易破土而出。如果实行深耕(如在北方地区使用带导轮的重型犁翻地),犁三四遍地就足够

了,在南方地区,由于只使用轻型步犁,耕地的次数就该加倍;大革命以前,普瓦图地区的土地翻耕不少于九次³⁵⁶。步犁这一工具不尽完善,只是划破土地的表皮而已。在犁地时,它“把切下的土块倒翻过来,放在原地的侧面,因而底层的泥土几乎没有犁到;由于犁及的土层厚度不超过4寸,野草不但很少受到伤害,相反却受益不浅……犁地过后不久,野草又到处萌生,农民因此被迫多次进行犁地,以求清除野草”³⁵⁷。

犁地一遍又一遍,把耕畜和人累得精疲力尽。其目的是要驱除麦仙翁、野豌豆、矢车菊、野燕麦³⁵⁸等与小麦竞相生长的植物;可惜,目的从未完全达到。如果不实行犁耕,野生植物开花较早,结实也赶在小麦的前面。于是便出现普瑞于1527年描绘的卡奥尔乡村的那种可悲景象:地里“杂草丛生”,“野燕麦长得比小麦更旺”³⁵⁹。马蒂厄·德·栋巴勒写道:“为了取得好收成,清除地里的杂草是与施肥同等重要的一项措施。”³⁶⁰

这块不断进行犁耕的土地名叫“休闲地”,村庄每年留出部分土地休闲,恰恰为了使轮犁和步犁能够清除杂草;农民在锄最后一遍草时,活计就极其轻松了。1914年前,洛林地区进行锄草是为了使小麦摆脱繁殖力很强的蒲公英的竞争。

犁地和整地十分费时和费工。此外还要加上秋播前的施肥。这是十分繁重的活计;即使是一个不大的农庄,在最后两遍犁地的中间,施肥数量也高达150车之多,最后一遍旨在把播下的种子用土盖上。然后再把地耙平,耙上压着重物,以便耩平犁沟,这道工序有时称为“整地”³⁶¹。另一方面是堆土培垄,垄间的深沟可利排水³⁶²。

说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轮作。

从4月开始,休闲地普遍开始犁耕。当时,于前年9—10月份播下的小麦已经长高,纷纷拔节开花。因而有两种麦地的并存:一种是反复犁耕、留待播种的麦地;另一种是在7—8月即可收割的

麦地。读者可以想到,直到收割、捆把和堆垛为止,小麦要花 14 至 16 个月时间才完成它的周期,备耕也包括在内。根据备耕和收割开始的或早或晚,周期长达 14 至 16 个月时间,超出了正常年度。迪哈梅尔·杜蒙索认为,麦地轮作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所说的一句话言简意赅,初读不易使人明白。他写道:“在同一块土地上,不能每年都种小麦,因为从收割到播种,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适当的犁耕。”³⁶³农学家兼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西戈³⁶⁴对迪哈梅尔·杜蒙索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论证清晰明了,胜过一篇冗长的演说。他举出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伦巴第地区“夏季炎热(据说,米兰兼具那不勒斯的炎夏和阿姆斯特丹的寒冬),小麦于 5—6 月间即已成熟。由于收获提前,在 9 月进行下一季的播种前,就空出了 4 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被用于在休闲地进行 4 次犁耕,并施以绿肥”³⁶⁵,然后再播种小麦和耙地培土。就这特例而言,小麦的生长周期被纳入到正常年度中去。收了再种,种了再收,可以连续进行。各种条件确实都已具备:有充裕的时间犁耕土地,利用间作提供必要的肥料。

然而,节气转换尽管重要,却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谷物植根较浅,显然消耗地表的肥力。因此,有必要与甜菜、芜菁、土豆等块茎作物实行轮作,块茎作物根系很深,在距地表较远的地方吸收营养,尤其还具有大气固氮的作用。它们的茎叶在翻进土里后还可充当肥料。

轮 作

米兰的情形是个特例,例外也正证实规律。直到今天,麦地仍普遍定期实行换茬。这种现象使历史学家为之神往;他们的眼睛简直盯住轮作不放。

轮作的地理分布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参见本书 117 页的地

图)。从圣马洛到日内瓦拉一条直线,线北以三种作物轮流换茬为主,即所谓三年轮作制。耕地划分为三茬:小麦、早春作物(大麦、燕麦)、休闲。最后一茬原则上让土地完全休息,又称死茬。因此,如果耕地可用一个圆形表示,这个圆形又被划分成几乎相等的三个扇面,扇面每年自行转动:小麦取代休闲,早春作物接替小麦,休闲代替早春作物,反复循环,永不停止。

在圣马洛—日内瓦界线以南,照例实行两年轮作。耕地一半种麦,另一半置于休闲。下一年再把布局颠倒过来,如此不断反复。

界线的划分,南北的对立,确实颇具特色,但也有一个问题要问:原因何在?在界线的一侧和另一侧分别坚持不懈地反复转换茬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越是仔细研究,问题就变得越复杂,答复就变得越困难,甚至变得模糊不清。

首先,两个对立的法兰西本身都分别具有众多的乃至奇特的变异。

实行三年轮作制的地区存在某些不正规形态。在18世纪末,至此推行三年轮作制的下阿尔萨斯地区突然转向二年轮作制³⁶⁶。蒂耶拉什地区也曾出现同样的现象,但时间更早,是在中世纪末;该地区在接受二年轮作制以后,地块的四周逐渐围上树木,展现篱村的特有风貌³⁶⁷。自古以来,至少从我们观察所及的时代起,科城地区一直实行二年轮作制,尽管那里也存在部分篱村。但在旧制度的末年,树围地得到广泛的发展³⁶⁸。同样,我还注意到普瓦图沼泽地的情形,随着贵族对他们拥有的土地实行兼并³⁶⁹,当地的农村于16世纪也变成绿树成荫的篱村。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汝拉山脉的西部山麓于1770年后“渐趋篱村化”³⁷⁰;山高谷深的布洛内地区在同一时期“正推广树围地”³⁷¹。

佛兰德地区完全属于例外,这里必须单独作一番介绍;当地的农业与尼德兰的农业革命相结合,历来推行“交错种植”,土地一年

四季不得休闲。过了布尚,再往北去,“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片精耕细作的园圃”,这里没有歇晌的习惯³⁷²。在告别了懒惰之乡以后,人们转身就迎来勤劳和智慧之地。

另一个特例出现在阿登地区。休闲制很可能诞生于地中海地区,奇怪的是,它却未能传到这个孤零零地被包围在林海之中的穷乡僻壤。弗朗索瓦·西戈指出了这个现象³⁷³。无论如何,按当地的习惯,人们只耕种小片土地,而把周围土地上所积累的肥料统统施在位于中心的耕地:在这与众不同的中心,作物种植接连不断。

我国实行二年轮作制的地区比三年轮作制的面积更广。这里不免出现种种特殊的例外,由于国土辽阔,特例的数量自然也相当多。在某些狭小的地区中,人们确实见到实行三年轮作的土地,其他的例外也同样存在。地处波尔多以南的朗德省于19世纪推行的耕作制与阿登地区相似,即像中国那样,把大量粪肥施在小块土地上,无休止地种植作物。根据莱昂斯·德·拉韦涅(1877年)的见证,在尼姆附近,“人们遵循一种独特的轮作制。首先是在大量施肥的土地上播种苜蓿;过了4年后,经过翻耕的苜蓿地不必追肥立即改播小麦,并且一种就是4年;随后再种2年驴食草,又种2年小麦。总共在12年内,有6年种植小麦,只施一次肥料”,而产量很高³⁷⁴。这显然是较晚采用的办法,因为它以人工草场为依托。但是,如果我们向中世纪追溯,也可在布列塔尼或在图卢兹地区发现某些土地实行三年轮作³⁷⁵。还是在中世纪,一份经过公证的土地租契表明,格拉斯附近照例都按三年轮作的规矩办事³⁷⁶。

尽管存在种种偏离规律的例外,二年轮作制和三年轮作制在各自的区划范围内毕竟占据绝大多数。因此,重要的还是应该知道这两个地区怎样互相对抗,怎样在边界沿线确立自己的地位;一般说来,边缘地带总是最能给人以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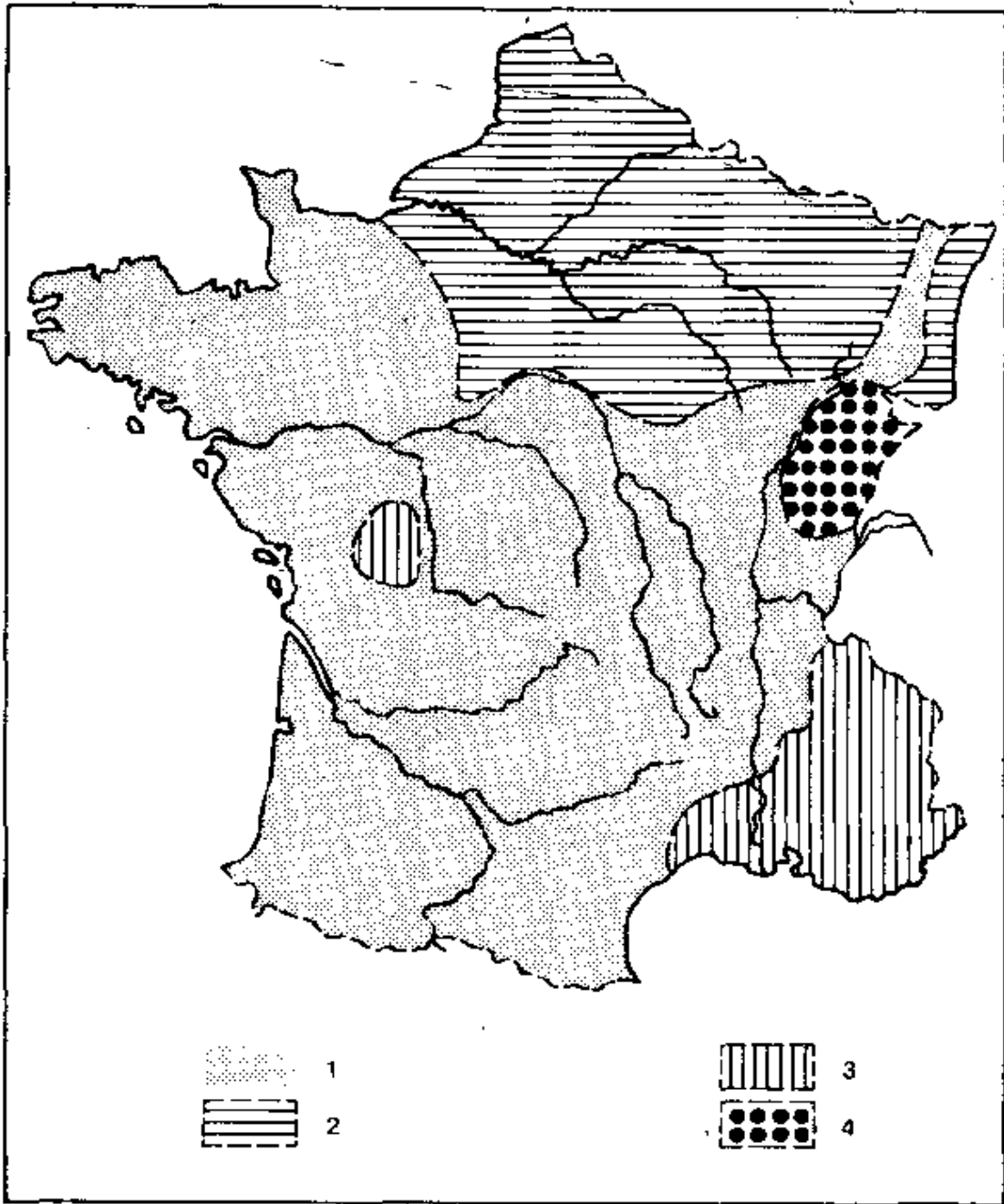
关于这个大问题,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可惜太少。总的来看,三

年轮作的地区很可能对另一地区有所蚕食。例如，它陆续侵占并最终吞并了图尔地区；³⁷⁷后来，在大革命前夕，它又向夹在沙台尔罗和普瓦蒂埃之间的普瓦图地区渗透³⁷⁸。这些情况大概并非绝无仅有，但有据可查的考证却十分罕见，也许因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已认定三年轮作比二年轮作更加优越。既然前者蚕食后者，这种优越也就不成问题。马克·布洛赫、阿尔贝·德芒荣以及不久前一位名叫利恩·怀特的很有见识的技术专家都持以上的见解³⁷⁹。他们认为，三年轮作这个后起之秀不断排挤了过于年迈的邻居。照此说来，历史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为了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些，我们不妨召请为二年轮作辩护的律师出庭发言。罗杰·迪永指出，实行二年轮作制的地区之所以不种燕麦、大麦等早春作物，原因不在所谓时间仓促等结构方面，而是因为这些作物不能抗拒普瓦图以南的法国存在的干旱气候³⁸⁰。雅克·米利埃则认为³⁸¹，二年轮作制的优点是比三年轮作制更加灵活，更容易适应 19 世纪的革新要求，而三年轮作制则过分刻板，往往受太多的束缚。最后，在弗朗索瓦·西戈看来³⁸²，没有理由可以证明二年轮作制不如三年轮作制，他所提供的数据即使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至少在理论上还能讲得过去。

请看他以下的推断：一块实行二年轮作的土地，3 年可提供 3 次收成，取得的收成每次都占耕地的一半；假如整个耕地一年的收成为 100，我们所得的总数将是 150。如果现在改成三年轮作（早春作物的产量通常按每年冬小麦的一半计算），小麦每年可得 100 的 $\frac{1}{3}$ ，3 年加在一起等于 100；在这期间，早春作物的收成为小麦的一半，总产量还是 150，与原来二年轮作的产量完全相等。

我们不妨承认，在相同的条件下，两种轮作制所得的结果相当接近；这种判断比较符合实际，不能断然证明完全相等。我们应该考虑到耕作、气候、水文、种子、所有制类型、地力、投资、工具等各



18 世纪耕畜的地理分布

1、牛。2、马。3、牛和马。4、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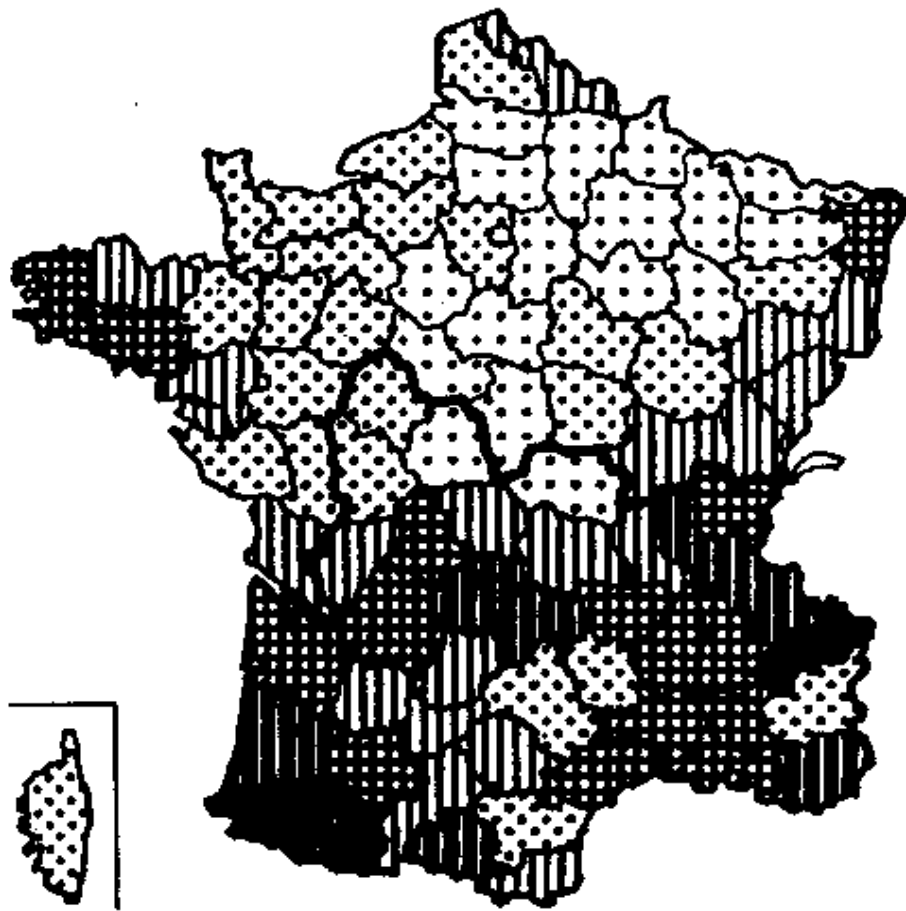
项具体条件。更进一步想,还必须就北方的轮犁与南方和西部地区的步犁,就拉犁的牛与马……进行比较。步犁大多用于犁耕土层较薄的多石坡地;操纵步犁因此可算是项艺术,比使用轮犁耕地更加复杂。至于比较马和牛的优劣,更是说来话长,争论在几百年前已

经开始,再争也不会争出什么结果来!牛行动迟缓,但消耗较少,不像马那样要吃燕麦,并且简直就是“无底桶”³⁸³。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或独出心裁的结果,而显然是适应环境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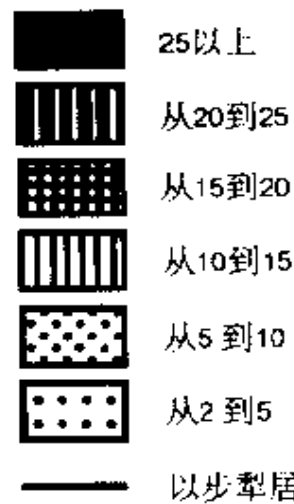
对我国以往的农业状况极其熟悉的勒内·缪塞³⁸⁴根据对上诺曼底地区乡村的考察,毫不犹豫地断言三年轮作具有优越性。但是,既然勒内·缪塞所作的抽样调查是否能够推广还成问题,我们怎么相信他的断言完全可靠。再说,在实行三年轮作制的地区,种植早春作物虽然可能,但希望究竟又有多大?每当发现小麦和黑麦未能顺利越冬时,人们往往利用早春的晴天赶紧补种。兰斯四郊1651年的冬季很长,寒风凄雨,又不降雪,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城里的一名资产者说,“我们希望播种一季大麦,终因士兵骚扰而受阻”³⁸⁵。当时正值投石党作乱期间。人们之所以愿冒风险,把赌注压在早春作物上,正是因为冬小麦肯定已经失收!1740年戈内斯的情形则不然,在这个距巴黎不远的、素以其面包师傅闻名的村庄,“农民不敢对遭灾的麦地进行翻耕”³⁸⁶。

鉴于以上的种种事实,我们对这个问题终究百思不得其解。任何事实都不能确证一种轮作制比另一种更加优越。任何事实也不能确切说明,在这里或那里,为什么一种轮作制要让位于另一种。在一个更大的变革范围内,轮作制的变更也许会容易得到解释,后一变更只是前一变革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说到过,沙泰勒罗三年轮作制的发展伴随着另一项变革,即马匹的引进。然而,在当时沙泰勒罗地区的地主和农民的心目中,引进马匹才是他们斟酌再三的重要变革。一位匿名作者对其家乡“放弃老习惯,不再用牛而改用马耕地”一事大动肝火,指责不该如此胡闹。为此,一名地主为保护其权益,特意在租契中规定:“佃户只能用牛耕地”³⁸⁷。

总之,轮作制的演变恐怕与其他的变革因素结伴而行。“在沙



每100公顷耕地拥有的步犁和轮犁数



步犁和轮犁(1852年)

(参见费·布罗代尔和厄·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史》,第680页。)

泰勒罗地区,农户采用了底卡底或博斯的设有高大院门的封闭式场院建筑,而不像篱村地区那样,场院对外敞开。”³⁸⁸这一现象本身值得作一番研究,它至少告诉我们,土地轮作制并不是个独立的存在,并不单独进行变迁,它是一种经济乃至一种乡村文明的组成成份。莫里斯·勒拉诺³⁸⁹指出:“自然条件无足轻重;关键还是要看人类群体的历史”。依我之见,前半句话还可斟酌;后半句话则正合我意。归根到底,文明是多种成份、多种因素的总和。

法兰西至少可一分为三

从耕作制度方面考察,我们不宜过分拘泥于法兰西乡村一分为二的简单模式。更何况,地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在轮作问题上还要加上“土地制度”的问题,或者说土地景观的问题。农学家们习惯于把这些长时段整体统统混在一起,干脆称之为“土地结构”,这到也有道理。

如果再把这些因素算上,法兰西乡村就不是一分为二,而至少是一分为三了。

首先是法国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开阔地,即英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农学家所说的“露地”,居住密集的村庄位于一片空旷辽阔的土地的中心³⁹⁰,没有树木,甚至见不到篱笆。“季节”随着圆的扇面逐个转换,村庄作为圆心既是终点,又是起点,肉眼根据扇面的不同颜色即可辨认季节。耕地呈长条状延伸,使人想起镶木地板的条木。这肯定是最熟悉的景观,无疑也是为大家公认的、最明白不过的景观。我还记得,1945年6月,我坐飞机从德国返回法国,在过了布尔唐沼泽后,景色突然一变,发现已在底卡底的上空;看到五颜六色的耕地被切成细长的条块,界线的分明就像是拉着绳子划出的一样;每块土地上都井然有序地长着庄稼,它们似乎排成整齐的队伍,欢迎我的归来,仿佛教堂里擦得锃亮的大钟敲响召唤

信徒的钟声。

这片整齐划一的开阔地，它的伸展显然与三年轮作制恰相吻合。最早决定推行这套办法的人真是机敏超群。

其次是法国的中部和西部，即所谓“篱村地区”。我们不要以为那里的景观千篇一律，树围地各具特色，相互间有许多不同³⁹¹。

就举马耶讷省和曼恩—卢瓦尔省的以下例子来看，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地边围着密密层层的各种树木〔树木长在地埂上〕；中间往往还栽有几株苹果树和梨树，果实用于酿酒，因而整体的外观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地块的面积平均约在 30 至 40 公顷上下，一些地块要小得多，仅有 10 至 12 公顷，人们称之为‘小围地’，因为它们各自构成一个小天地”。这个情景是在 19 世纪中叶形成的，以上简要的介绍见诸莱昂斯·德·拉韦涅的至今不失其价值的著作³⁹²。在这副速写画面上，必须加上低洼的道路，茅草丛生的沼泽荒原，尤其还要说明，树木乃是一种徒具形式、似是而非的假象。树木在这里只是土地地区划的一个工具或一种补充。1870 年那时，还没有飞机俯视全景；莱昂斯·德·拉韦涅说，在莱昂镇“登高望远”，布列塔尼别具一格的景色尽收眼底，仿佛是“划分成无数格子的一个棋盘”³⁹³。

最难说清楚的是第三部分，即位于索恩河和罗讷河流域的法国东南部地区，这道巨大的裂缝从地中海一直伸展到孚日地区，夹在萨瓦、多菲内、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山、中央高原和比利牛斯山的中间。总的说来，这些地区的植被、种植节奏、作物、树木和生产活动都各不相同；旅行的人走不多远，就会发现景色已全盘改观。

马克·布洛赫³⁹⁴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模式，这个模式把特殊性介绍得面面俱到，却偏偏没有把地区的整体性完全抓住；现在让我再作解释，恐怕也不会比马克·布洛赫解释得更好。读者可以作出评判：就整个地区而言，关键既不在于谷物两熟制的推进和逐渐占

据主要地位,也不在于令人想起罗马屯垦区的那种呈四方形的大块耕地,而是那里有着大片人迹罕见的中性地区,一些难得种过一次作物就被撂荒的“野地”或“荒地”³⁹⁵。北方人初来这里,见到这些空地上石块密布,荆棘丛生,蝉鸣声中鸟兽出没,野生花草香气扑鼻,不禁为此情此景而惊诧莫明。

至于作物,这里的多样性堪与土地和景色相媲美。果树同小麦一样茁壮生长,随处见缝插针。栗树和核桃树在高海拔的地方密茂繁生,较低一点的地方以橄榄树为主,另有桑树、无花果、苹果树、榛树、樱桃树等。最后还有杏梅树,“含苞迎春传为千古美谈,因为它在冬末已经开花”,但在地中海沿海一带,寒霜天气甚少,危险自然不大³⁹⁶。在耶尔、戛纳和土伦附近,柑桔树就在平地上栽植,“正如意大利的索伦托地区一样”³⁹⁷。唯一不同的是,有时寒潮袭来,把这里的柑桔树全都冻死;结冰的天气甚至有可能把橄榄树和橡树歪歪扭扭的树干冻裂。

在气候允许的条件下,在梯田上种植的作物无不生长茂盛。宽广的河谷地带,无论是伊泽尔河的下流,东比利牛斯山的各个河谷,或位于莫尔山麓和埃斯特雷勒山麓的阿尔让河谷更展现出万物竞生的繁荣景象。拉韦涅发现,“在一块几百平方米的土地上,竟同时种着果树、橄榄树、桑树、小麦、蔬菜、葡萄和花卉”³⁹⁸,不禁赞叹称奇。在两排葡萄架之间,居然挤进了蔬菜、桃树乃至橄榄树,尽管后者不宜与葡萄结伴配对³⁹⁹。伊泽尔河流域的格雷齐沃唐谷地“四季如春”,恰与“寒冬经年”的山区遥遥相对。桑树或樱桃树种在大田里,葡萄沿着树干爬藤,树荫下则长着小麦、大麦、玉米、土豆、黄麻、油菜、三叶草、苜蓿、荞麦等作物⁴⁰⁰,这是在第二帝国期间人们依然可以见到的景象。

最后的一个特点是城市、集镇和大村庄几乎遍布各地。在这些阳光明媚的地区,当然并不是到处都十分富裕,那里的夏季往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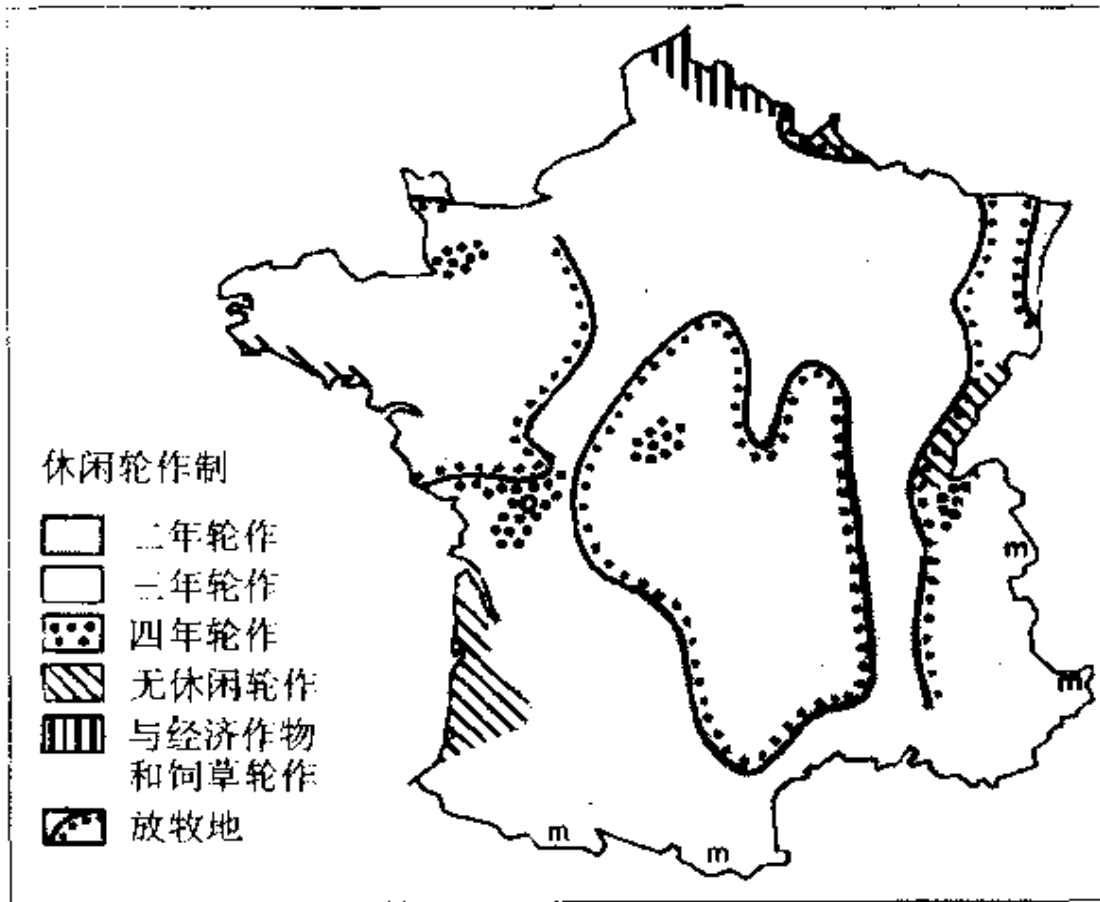
现干旱,牲畜数量过少,因而造成肥料不足。富裕地带大多局促于平原的一隅之地,四周群山环绕,山上的土地由山下的富人所开垦,盛产葡萄和小麦的朗格多克或普罗旺斯都是如此。

总之,如果必须用三言两语对实行三年轮作制的地区作个概括,我们就应该说,这是人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大面积的可耕地:“耕地”万岁,“野地”让位!开垦荒地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秩序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也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相反,在实行二年轮作制的地区,“野地”仍保留存在的权利,树木在野地到处生长;这在篱村地区是如此,在法国南部等一系列林区据说也是如此。这些几乎无需人去照管的树木给人带来很大的收益。由于寒冷的季节较短,那里种植的蔬菜品种既多,产量又高,食物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在三年轮作制以外的地区,人的活动余地更大,人人得以各显神通。人的精神状态与乡村的自然景观互相适应,互相协调;在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原因和结果的位置可以颠倒。

追索历史过程

以上的解释和形象表明,人们一谈到谷物,势必要涉及到其他东西。这也许是合乎自然的。但我还没有讲到大家的切身经历,就是说,近三、四十年以来的现状竟以其雷霆万钧之力,一下打破了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习惯和智慧,即丹尼尔·富歇等人曾经说过的“耕地布局的平衡”。弗朗索瓦·希雷尔·吉尔贝⁴⁰³于1787年不是曾强调指出,法国的农业自古罗马以来没有任何进步吗?这个见解尽管未免言过其实,但出诸对当时现实十分熟悉的人之口,毕竟不是无的放矢。

可见,不久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往往令人惊诧莫明的变化。我们生活其中的现代不可能是这一巨变的必然结果,它对演变的来龙去脉也无从作出解释。我们必须意识



19 世纪初法国的土地轮作

在二年轮作和三年轮作的两大地区中，弗朗索瓦·西戈揭示了一系列其他“耕作技术”，上方的简图仅反映出其中的几种：

——四年轮作：一季休闲，连续三季收获粮食。这种轮作制仅星星点点地分布在普瓦图、贝里、萨瓦、下诺曼底等地区，不过占国土面积的 1% 而已。

——无休闲轮作：完美的典型位于朗德省。每年收两季粮食（黑麦、小米），土地没有间歇。大量施用的肥料来自羊粪。

——与经济作物和饲草轮作：完美的范例是佛兰德地区，那里的休闲地被种上饲草、油料作物以及旨在提供纺织原料的作物。

——放牧地：弗朗索瓦·西戈这里指出，主要在二年轮作制地区，土地继一系列正常的轮作后，空出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供牲畜放牧。在二年轮作制地区，以阿摩里卡丘陵东南部、下普瓦图、安茹等地区为典型。在三年轮作制地区，以布列塔尼地区为典型（在连续了 2—3 轮三年轮作以后，空出 6 至 9 年充当放牧地）。（参见弗朗索瓦·西戈：《19 世纪初法国土地轮作图示》，该文于 1976 年在《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发表。）

到,演变过程中存在着障碍和断裂。

为了把经过弄清楚,唯一的办法是沿着时间长河往后追溯,而不是向前展望。马克·布洛赫⁴⁰²建议,在进行这一历史追溯时,把现时且搁在一边,先把19世纪时的情形确定为起程的第一站,然后再继续进行逆向的观察。以19世纪作为起点对我们特别有利,因为我们拥有翔实的文献资料,而且19世纪期间的变化相当缓慢,不会过分扭曲观察中的事物形象。

弗朗索瓦·西戈已就1800年前后的概况画了一张草图。我这里且把他绘制的地图借来使用,读者将可参看他随图所加的长篇评述⁴⁰³。

真正的问题是要从19世纪开始,尽可能往后进行追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开展历时多年的集体研究。究竟追溯到什么时代为止?直到科尔倍尔的时代,这肯定是可能的。但要追溯到苏利的时代,恐怕会有点危险。争取到这几百年时间是否足够了?真要对“开发土地的顺序”追根究底,将需要往后追溯更长的时间。

暂且,采用历史的比较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当然很好,但与哪个国家比较?究竟比较什么?莫里斯·勒拉诺⁴⁰⁴把我们领到撒丁岛去:该岛的东部,或更确切地说,引人注目的坎皮达诺地区,当时实行三年轮作制。萨维埃·德·普拉诺尔远届安纳托利亚南部⁴⁰⁵;让·罗伯尔·皮特前往毛里塔尼亚……至于我,我劝诸位到俄罗斯去走一趟。这岂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十分明白,俄国照搬了欧洲的经验,但不同毕竟还是很多!与俄国进行比较的一个好处:俄国落后于西方,农业演变的历史进程相当鲜明。由于具有“古老农业”的俄国中部地区比依旧处在蛮荒状态的边沿地区(包括乌克兰在内)起步早2—3个世纪,人们看到各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同时并存和同时演变。下面就借用米歇尔·康费诺的地图⁴⁰⁶,省得我再长篇大论地进行解释。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土地最初曾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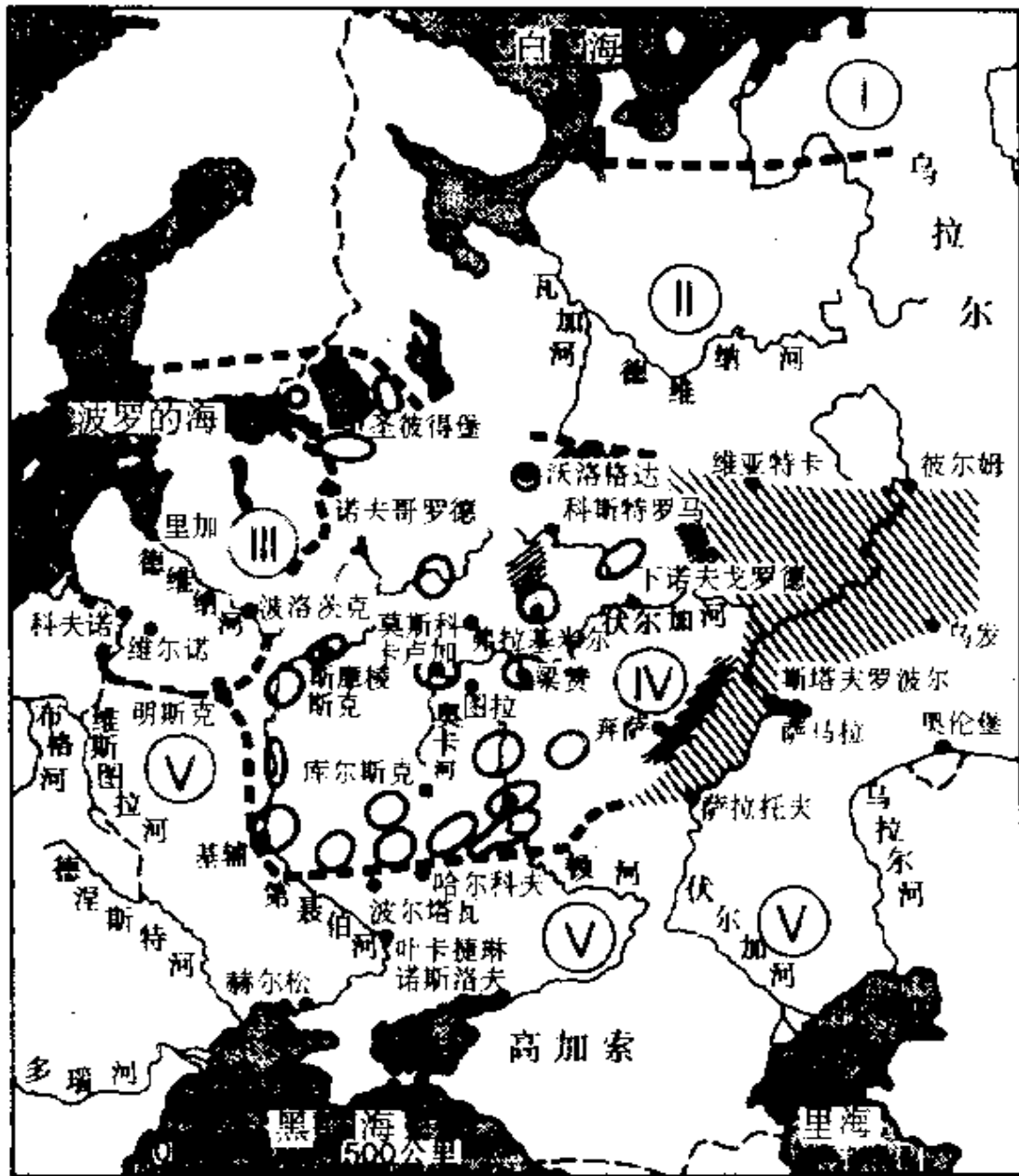
历过刀耕火作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作的稳定，便形成了二年轮作制，接着又逐渐向三年轮作制过渡。

如果把这个过程搬到西欧，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解释，至少也要接受三年轮作替代二年轮作的老一套说法。但究竟为什么呢？问题仍然有待解答。至于在二年轮作之前存在的刀耕火作，我们几乎闭着眼睛也会承认这个事实。据史前史学家的判断，刀耕火作是新石器时期前后的耕作制度。在法国，人们所说的“不规则种植”——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布列塔尼、蒂耶拉什等地区开垦的一小块块荒地，经陆续种植作物后，又恢复了茅草遍地的状态，甚至变成了树林——这难道不就是刀耕火作留下的残余吗？

与俄罗斯的这个比较已经一目了然。它向我们提供一条必要的思路。真要进行比较，法国理应与整个欧洲比较。在法国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 1982 年举行学术讨论会期间，拉兹洛·马凯断言，三年轮作制直到 16 世纪初才在匈牙利出现，农民从此就被置于领主的严厉的管束之下⁴⁰⁷。在 16 世纪的勃兰德堡，三年轮作和绵羊饲养与领主的反扑同步并进。三年轮作在伦敦盆地、巴黎盆地和伦巴第盆地也已出现，但为时更早，所有这些地区都被人紧紧地抓在手里。

假如不感到后悔，我们不妨再前进一步。确实还存在一些可能的、有用的假设；将来的历史学家必要时可把这些假设抛弃不用，提出更好的假设。

就拿法国南方来看，那里实行的二年轮作制似乎是古地中海文明留下的遗产，让我们再说一遍，大块的耕地可能来自古罗马的屯垦地。二年轮作制（一季休闲，一季种粮食）在科卢梅拉的《论农业》或色诺芬的《经济论》中随处都可读到。据著名农学家德·加斯诺兰（1831 年）说，色诺芬写作时“对农民的耕作习惯仿佛亲眼目睹”⁴⁰⁸。在他描绘的画面中，似乎增一笔嫌多，减一笔嫌少。这是因为



- ① 完全没有农业的地区
- ② 刀耕火作的地区（其中，二年轮作，三年轮作，四年轮作等“有规则种植”正趋扩展）。
- ③ 三年轮作地区（其中，也有大片土地实行二年轮作，还有刀耕火作的残余）。
- ④ 三年轮作地区。
- ⑤ 不定期的三年轮作地区，与刀耕火作或临时性耕作相结合。
- ⑥ 临时性耕作地区。
- ⑦ 介于刀耕火作和临时性耕作之间的过渡地区。

18 世纪欧洲俄罗斯地区的土地制度

几种正在演变之中的土地制度当时在俄罗斯同时并存：V 代表刀耕火作的原始阶段；II 反映着“有规则种植”的崛起；III 和 IV 表明三年轮作尚未完全战胜二年轮作和刀耕火作。（参见米歇尔·康费诺：《土地制度和农业进步：18 至 20 世纪俄罗斯的三年轮作制》，1969 年版。）

自然景观没有发生变化；一种耕作体系适应一种特定的环境，才可能取得最高的产量”。以上的假设比较可信。

另一种假设令人神往，却远不如前一种假设那么可信，它把篱村体系的形成归功于居住在高卢的凯尔特人，确实，在威尔士和爱尔兰地区，也可找到篱村体系，但其形成的时间恐怕比人们所说的要晚得多⁴⁰⁹。

剩下还有实行三年轮作制的开阔地。我们仅仅可以肯定，三年轮作于12至13世纪刚刚问世；据历史文献记载，燕麦种植随着马匹的饲养和使用而诞生。法兰克族的重骑兵不正是针对阿拉伯人的入侵，于八世纪初组建起来的吗？难道必须再等几个世纪以后，在以畜牧为生的日耳曼入侵者及其他移民的影响下，三年轮作方能出现？显而易见，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罗热·迪永和莫里斯·勒拉诺主张，我们应追溯到这一遥远的过去。在他们看来，一切均发端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动乱，这在帝国的边境特别明显，那里形成的密集的村落群和居民点首先出自防卫的考虑。但大村庄不一定意味着采用三年轮作制。此外，我曾提到的关于使用马匹促成燕麦种植的说法也还存有疑问：燕麦等早春作物同样也可供人食用，其食用量即使不超过牲畜，似乎至少与后者相等⁴¹⁰。可以肯定的是，三年轮作制在居住分散、耕地很不规则的地区早已普遍存在，英法两国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

根据萨维埃·德·普拉诺尔的推论，三年轮作制的推广与畜牧业的发展有关；13世纪前后，随着专职牧羊人的出现，羊群逐渐实行集中放牧，原有的圈地逐渐消失⁴¹¹。依我之见，这是最周全的解释。耕地的扩展及畜群的增加也许使农民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为了找到一条出路，就必须放弃个体羊圈，把羊群交牧羊人集中放牧，利用休闲地和公共草场，饲养好牲畜。

罗贝尔·斯佩克兰把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揉合起来⁴¹²，他那独辟蹊径的见解鼓励我向 13 世纪以前追溯。照他的说法，法兰克人的征伐（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导致了在卢瓦尔河南侧建起一道据点林立的防线：北侧为日耳曼化的高卢，南侧为罗马化的高卢，与北侧隔界相望；西边则是凯尔特人占有的阿摩里卡丘陵（该地区于公元七世纪再度凯尔特化）。本书第一卷 78 页复制的草图展示了这一见解的基本框架。是否能把关于并村自卫的论点纳入其中呢？如果可以的话，人们不禁会问，与我国境内的阿摩里卡丘陵、中央高原这两个最大的古山系相比，“罗马帝国的长城”难道不就是更加古老的文化边界的体现吗？有人曾凭空猜想说⁴¹³，凯尔特人和法兰克人本是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居民，随着对农业发展和外族入侵的适应，他们最终合二而一。虽说是凭空猜想，但没有完全猜错。

目前对史前史的研究试图跳出传统的考证范围（青铜器时代或铁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入侵浪潮的联系），发掘古代的土地耕作以及零星的村落或村庄；这些研究有一天也许能够证明，正如吕西安·加松早已说过的那样，“夹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之间的卢瓦尔河曲在法兰西版图上并不是一条匀称的线条”⁴¹⁴；它是我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解释。

从麦到面包

说到麦，也就是说到面包，面包显然脱不出上述农业活动的范围之外，正如葡萄酒离不开葡萄一样。

在烤制可端上富人或穷人餐桌的面包以前，麦确实需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人工程序。必须用连枷打谷，或牵着牲畜碾场；还要妥善收藏，运到集镇和城市的市场，最后送往磨坊碾压。由此取得的面粉必须赶紧使用，因为面粉不宜保存。除家用炉灶及领主或村

庄拥有的公用烤炉外,制作和烘烤面包的任务由面包商承担。

以上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麦穗必须干透后方可脱粒。在波兰和北欧,打下的麦粒仍很潮湿,必须送到烤炉烘干。法国北方地区让麦捆留在地里晾晒,或连草带穗送进宽敞的仓房。等到冬天,再陆续用连枷脱粒。如用大镰刀割麦,就得在麦子熟透前进行收割,以免籽粒脱落。因此,晾晒的时间需要拖长,脱粒也需推迟⁴¹⁵。南方地区通常采用牲畜碾场,可加速打麦的进度。

粮食的储藏并不容易。

西西里、北非、西班牙和匈牙利等地实行窖藏,人们在地沟或地洞里铺上千草,使粮食保持干燥,然后再盖上泥土;在法国,除凯尔西、维瓦赖、鲁西永、热尔等地区外⁴¹⁶,这种方法很少使用。谷仓里不但潮湿,而且还要对付虫蛀和鼠害,粮食至少在半年内必须每隔半月翻晒一次,然后每月过筛。对存粮甚多的大谷仓来说,如在城市或军事要塞,就不可能进行如此精心的照管。萨瓦里声称,小麦可保存几十年之久。办法是在麦堆上盖一层“三尺厚的生石灰粉”,然后用喷水壶浇湿;表面与石灰混合的麦粒纷纷发芽,经冬季晒干后,形成一个既厚又硬的保护壳,使麦子与外界隔绝,就像在麦窖中保存一样⁴¹⁷。

尽管存在各种困难,粮食通常都连续保存2年、3年或4年。“关于禁止囤积粮食两年以上的1577年11月21日的原国王敕令于18世纪已不再执行;这条敕令可能从未被实施过。”⁴¹⁸富人、有产者和教会团体有囤积谷物的习惯,常年保持仓满粮足。穷人不储备粮食,农民被迫出售当年的收成,他们始终怀疑粮商和财主进行囤积居奇,事情也往往确实如此。谁又不搞这类投机的呢?如把参与投机的几名滑头家伙找来一问,人们发现他们分属各种社会阶层,而且并不全都腰缠万贯。无论如何,仓储粮食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积谷可以防歉。法国于1816年遭到饥荒的突然袭击,原因

是“冬季奇冷，但又几乎没有下雪”，接着“在开花的季节”突然降温⁴¹⁹；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随着外国入侵及同盟军在占领地就食，存粮早已吃空。

粮食的地区调剂被置于地方当局的监视之下；中央政府和巡按使竭力参与其事，市镇当局有时拒不从命，有时则心急如焚。粮食从仓库运往市场，从市场再转到磨坊和面包炉，都由警察押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人们确实议论纷纷：粮食流通自由对确保民众的生计难道没有好处？事实上，当局一再颁发规章条令，数量之多几乎达到荒唐的程度，而在真正的困难时期，更要有力地、坚持不懈地（或及时地）贯彻执行规章。困难屡见不鲜。例如，1699至1763年间，沙特尔（地处盛产谷物的博斯地区的中心）共有25个丰收年，市场上的粮价大跌；又有17年因歉收而粮价居高不下；在剩下的22年里，粮价在每色提埃10里佛和15里佛之间徘徊，农民出售粮食的价格约在12里佛左右。

粮食原则上仅在公共集市出售。只要农民按规定把粮食送到公共集市，交易便顺利进行。人们往往也正是这么做的。其实，甚至在1709年的正式许可令颁布后，“看样出售”的办法在法国仍很难推行。因此，于1683年创建的沙特尔粮行⁴²⁰每周仅开业三次，“直到19世纪仍保持原状，看样出售迟迟不得推广；粮袋整齐地码在广场四周，超过沿边的二层楼房的高度”⁴²¹。

集市交易都由官方指定的工作人员从中撮合：经纪人（经纪人以妇女为主，又称代理商或“掮客”），质量检验员，计量员，还有搬运工。必须通过这道中间环节。搬运工生活无着，尤其在冬季，为了活命，他们违背行会的规则，兼做木工、瓦工或泥水工⁴²²。在所有的集市上，最早接待的一批主顾是包括面包师傅在内的本市居民，然后是流动客商前来赶集⁴²³。

麦显然有不同的种类，正如面包铺里的面包也品种各异一样。

就拿沙特尔来看,首先是“优等小麦”,然后是“商品麦”;“农家麦”于18世纪初含有三分之二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黑麦;“混合麦由小麦和黑麦对半组成;有的混合麦里以黑麦居多;甚至还有大麦和燕麦掺杂在内”⁴⁴。麦粒在磨坊加工成面粉,根据加工的谷物品质和配比,磨成不同等级的面粉。

所有的面粉都有不耐运输的缺点,面粉的运输损耗比麦子还大。城市因此必须就近设置磨坊,取得新磨面粉的供应。巴黎的四郊磨坊林立,如贝尔维尔高地、圣热尔韦等等。到了冬天,由于大河封冻,只剩下风磨转动,不然就是一些小溪,因离源头不远,水流湍急,尚能向水磨提供动力。埃唐普的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成为面粉生产的一大中心。磨坊有时因夏季水位下降而暂停工作。为此,1789年7—8月间,鉴于许多磨坊停工及饥荒日趋严重,路易十六放弃了凡尔赛预定在圣路易节举行的大型喷泉表演。

尽管如此,面粉有时也实行远程运输。对生活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即使能进口小麦,却也因当地没有磨坊而磨不成面粉。同样,在远东地区,人数不多的欧洲侨民为了吃到面包,也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经使用表明,阿基坦比别处所产的面粉更宜保存。阿基坦的面粉启运时一律实行密封桶装,空桶由驶往岛屿的原船或由印度公司的船只带回,下次发货时再次使用。

面粉最终都送到面包师傅的手里。在日常生活中,唯独面包商才引人注目。价格稍有变动,总把责任归诸于他。说来真是莫明其妙,面包商往往成了发泄愤怒的对象。1775年春季,关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杜尔哥法令导致了一场所谓“面粉战”,巴黎竟出现了多次抢劫面包商事件。让·肖卡恩的遗孀卡特琳娜·勒鲁在巴黎的圣雅克鲜肉市居住,临街开了一家面包铺;她说,昨天(1775年5月3日),“约在上午11时左右,有几个人乘乱闯进她的家里,抢走了铺子货架上的面包……其中一位像是个12岁的孩子,拉开柜台的抽

厘,取走价值 80 里佛上下的银子和现金……随后,有人从铺子进入厨房,偷走三把叉子和一只勺子……还有三个银杯”⁴²⁵。根据这些银器,是否应认为原告是个殷实之家?在旧制度下,面包商素称比磨坊主更加富有。

我主张不宜夸大“面粉战”的影响,至少在巴黎是如此;当时曾逮捕了许多罪犯,有的据说罪有应得,有的一眼便可看出是完全冤枉的。针织业帮工让·莱基利埃⁴²⁶年仅 16 岁,被控参加了对让·巴蒂斯特·巴尔在莫夫塔尔街开设的面包铺的抢劫。他称在家中被抄出的面粉和面包来自慈善施舍。可惜,被抄查到的偏偏是白面包,而“善主一般又不施舍白面包”!这无疑是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一样的故事。

在面包问题上,弄不好就极容易引起闹事;巡按使及各城市当局密切注视市场动向,为压低粮价而施加威胁,或直接干预粮食调运,不惜动用武力扑平骚乱,归根到底,在灾荒期间,城市总是比乡村得到更多的保护。每个人都各求自保,各谋其利,规章也就置之度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粮商纷纷去农家登门求购,预付货款,在城市或乡村囤积粮食。“可以稍为夸张一点地说,谷物在旧制度下是一种走私商品。”⁴²⁷粮食走私在当时确实存在,但我们不要把一切都归罪于走私,我随后将试图指出,供应体制首先就有不可克服的缺陷:粮食产量低下(据沃邦估计,播种和收成之比为 1:4.5 或 5),运输条件很差(直到第二帝国期间普及铁路为止)。

法国人吃面包

究竟是出于喜好还是迫不得已,或者两种原因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法国历来就数面包吃得多。当然不是唯独法国人才吃面包,但戏称法国人吃面包天下无敌的说法也确有道理。一名日内瓦人于 1843 年⁴²⁸指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居民的小

麦消费量比较多,而蔬菜、肉食和奶制品的消费量则比较少,法国因此愿意种植小麦,以满足其紧迫的需求”。“更何况,他补充说,法国吃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面包”。

据帕里—杜韦奈 1750 年的计算⁴²⁹,法国人每年消费小麦两袋,每袋约重 200 磅,如果略为夸大一点,约合 200 公斤。勒格朗·多西⁴³⁰估得更宽,他于 1782 年把每天的面包消费量定为 2 至 3 磅。另一个数字来自雷蒙·勒蓬,此人几乎默默无闻,他于 1792 年估计,年消费量平均在 3 色蒂埃左右(1 色蒂埃等于 156 公升,相比之下,每公担小麦约合 120 公升)。年消费量可见略低于 4 公担(3.8 公担)⁴³¹这个数字与中世纪史学家计算出的平均消费量相等:一个拥有 3 000 居民的城市需要 1 万公担⁴³²。从中世纪到 18 世纪(或甚至到 1850 年?),平均配额大体上几乎保持不变。平均数自然包含一些千差万别的特例。波蒂埃·德·拉埃斯特洛瓦于 1716 年指出:“享有肉食和其他食品的人每天所吃的面包不到 1 磅。对于仆人,巴黎通常每星期只供给每人 9 磅面包,也就是说,不到每天 1.5 磅;这已超过他们的食量,人们知道,剩余的面包往往转手出售”⁴³³。就一日三餐而言,仆人的待遇相当优厚。

一个世纪以后,只是自 1950 年以来,面包的消费量才急剧下降,尽管面包对我们仍不乏吸引力。面包商设法找出各种旧配方,烤制黑面包和黑麦面包,并在饮食风尚的协助下,销售麦糠面包,因此赚取大钱。今天,在拥有 5 400 万人口的法兰西,粮食产量平均达 1 700 万吨,每人的拥有量与过去的消费量(3 公担)差不多相等。其中,200 万吨留作种子,800 万吨送磨面厂和面包铺,700 万吨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并非毫无困难)。与旧制度末年相比,我国的谷物消费量几乎减少了一半。

白面包

消费量刚刚有所下降,另一场革命,即白面包,精麦面包地位

的上升⁴³⁴，便接踵而至，这后一事实往往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白面包长期仅为富人所享用，一般人难得能够吃到。早在好人约翰（1350—1364年）的时代，大概在他以前，所有的官方文书都对面包作出区分。

面包的等级和名称随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不同，而且不断有所变化。1362年，普瓦蒂埃有四种面包供应顾客：无盐的司铎面包，有盐的司铎面包，全麦面包（由未过筛的麦面制成），麦麸面包（小麦出面率为90%，在普瓦图当地的土语中，麦皮的碎屑至今仍被称为麸皮）。1372年的巴黎有三种面包：纯白面包，螺形面包（又称“家常面包”）和长条面包（即黑面包）。在大革命前的布列塔尼，除供富人享用的各种面包——精麦面包，松软面包，小面包——外，日常消费的是“杂合面包”，由小麦、黑麦、二棱大麦混合磨成的面粉所制成⁴³⁵。

是否所有的富人都吃白面包？我们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在19世纪初的利摩日⁴³⁶，“人们居家过日子仍然精打细算。家里人日常就吃黑麦面包，精麦面包专供招待宾客或至多供主人享用”。确实，利摩日是法国贫穷的省份之一。

尽管如此，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各省的面包铺和正规市场都分别列出三种不同品质的面包的价格。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军队对在法国和欧洲各地推广白面包大有功劳，白面包的一统天下只是慢慢才形成的，并且不早于19世纪末。在这以前，白面包仍是稀罕的食品，为穷人所可望而不可及，乡村的人更往往从不问津。生于阿尔托奈（今约讷省）的古钱币学家瓦朗丁·雅姆雷·杜瓦尔在他的青年时代（1696年路易十四治下），有一天看到村里的本堂神甫在吃面包，当他发现这种面包的“颜色与他以往所见的不同”⁴³⁷的时候，顿时感到大惑不解。我的一位朋友原是东比利牛斯省的农民家庭出身，不久前与我在一家饭店共进午餐，当我端给他

装着黑面包的小筐时，他笑笑说：“我在童年时已把黑面包吃够了，现在只吃白面包！”他生于 1899 年。

谷物和国民收入

在把有关谷物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前，我将引证一份历史文献，据我所知，它从未被历史学家使用过。1785 年，由于整个法国受到特大旱灾的打击，路易十六设置了农业管理局⁴³⁸。这个机构（拉瓦锡在此任职）尽管名气很响，其实没有多大的作为。由它提供的两份调查报告却是宝贵的信息来源。

报告之一⁴³⁹指出：“口粮过去均以每人 3 色提埃计算；在采用经济的磨面方法后，2.25 色提埃就足够了。但这种方法尚未得到普遍的介绍和推广，因此，如推算目前国内每人消费 2.5 色提埃，这恐怕略嫌夸大……谷物消费量约在 5 000 万色提埃左右，其中五分之二为小麦和黑麦，以及两种谷物差不多各占一半的混合麦。以每色提埃 20 里佛计算，2 000 万色提埃的小麦价值 4 亿里佛。3 000 万色提埃的黑麦以每色提埃 15 里佛计算，价值 4.5 亿里佛。”合计价值 8.5 亿里佛。

从以上引语中得出的第一项认识：既然黑麦在谷物产量中占很大比重，黑面包不可能在朝夕间消失。

第二项认识：这里计算的人口为 2 000 万，而并不像当时一般认为的那样，是 2 300 或 2 400 万。据推测，很少食用面包的幼儿已在总数中扣除。假如根据历史学家最近的计算，总人口为 2 900 万，吃面包的人数至少应达 2 500 或 2 600 万（幼儿也不算在内）。就以 2 600 万人算，小麦消费量将达 2 600 万色提埃，黑麦达 3 900 万色提埃，其价值分别为 5.2 亿和 5.85 亿里佛；总价值超过 10 亿，达到 11.05 亿。

除了人的口粮外，报告还谈到“其余的一半”，即早春作物的收

成，供饲养牲畜之用。据报告计算，应补上 4.25 亿里佛。由此应列入国民毛收入的数目将高达 12.75 亿里佛，而且只多不少。

然而，“农业收入”还包括家禽家畜、瓜果蔬菜、葡萄、树木（木材、烧柴、橡栗坚果、松香树脂）以及麻、丝、盐、矿、石等其他项目，粮食大体上只占其中的一半；加在一起，就算是 25 亿里佛。农业局在进行复算时，还是认为这个总数太低了一点。报告又说，“农业生产几乎包揽了 2 400 万居民的吃穿大事”（按我的计算，可能达 2 800 万居民），“为应付这笔开支，各种收入加在一起，至少应达 30 亿里佛。应该让生产维持下去，不能每年吃光用光”。

总之，这里有两个数字：下限是 25 亿，上限是 30 亿⁴⁴⁰。如果农业生产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或一半，国民生产总值就将在 30 亿到 60 亿之间⁴⁴¹。人均收入最高也达不到 200 里佛。这个数字已超过 40 埃居，即伏尔泰对当时法国中等收入推算的 120 里佛的水平⁴⁴²。

四 算一笔总账是否可能

当然不可能。尤其，直到这里，我们只是考察了经济的下层，即狭义的农业活动。只有当所谓农民经济的全部——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都经过了考察和衡量后，总帐才可能算得出来，这正是我在下一章里想做的事情。

暂且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在铁路革命前，法国的食物是否能够自给自足？让-克洛德·杜坦在他的著作里补足了为我们所缺少的有关18世纪至今的可靠数据，但他声称对“由法国农业承担的食品生产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供不应求”的问题⁴³不作深究。至于我，则恰恰想把供求关系这个难题重新提出来。

其实，对许多法国人来说，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不必再次提出：法国不但能够自给，而且绰绰有余。苏利(1603年)就曾为此洋洋自得；他在《回忆录》⁴⁴里写道：“在食品分配方面，法国显得特别优越，这是它的福运；可能除埃及外，它是世界上生活必需品供应最充足的国家。粮食、蔬菜、葡萄酒、苹果酒、亚麻、大麻、盐、羊毛、植物油、苕蓝以及无数的大小牲畜(肉食是人的家常便饭)使法国对每一种食品丝毫也不必羡慕邻国；不仅如此，它与单一从事某几种食品贸易的意大利、西班牙、西西里等国，甚至也能争个高低。”乐观、骄傲和自满只会使人误入歧途。

前人犯过的错误，后人一定还会再犯：昂都纳·蒙克里斯蒂安(1615年)原是后来广为通行的“政治经济学”一说的发明者⁴⁵，他断言：“唯独法国可以做到凡事不求邻国。它拥有无穷无尽的富源，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在内。太阳可以作证，法国是普天之下物产最齐全的王国”。沃邦的观点也十分明确，只是把话说得比较婉转，使

用了条件状：“法国本可以不要外国人的帮助”，外国人所带来的东西只是满足其奢侈需求而已⁴⁴⁶。

这类话语大概已经被重复过千百次。否则，对谷物的贸易和供应行情十分熟悉的金融家帕里·杜韦奈怎会于1750年郑重其事地批驳所谓平常年景一年的粮食收成足够法国吃上三年这个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经考察1740、1741、1747、1748这几年的情形，以上的说法显然大错特错⁴⁴⁷。帕里·杜韦奈的批驳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这与当时的思潮无疑背道而驰。17世纪末有一份关于多菲内经济状况的报告，在当时，任何人都不会提出异议；作者吉夏尔先生⁴⁴⁸认为，“在王国的每一个省内，假如人们都勤恳劳作，尽享自然之利，法国就可以不买除香料和药材以外的所有外国商品”。大家在下文将能看到，这个观点并不完全合理。

其实，对于法国自给自足的能力，至少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还应从长计议：

1. 对内和对外是否达到了自给？下一个段落的标题就是：法兰西究竟能不能自给自足？问题涉及到与外国的关系以及法国各地之间的关系。

2. 缺粮、歉收和饥荒确实经常发生，证据俱在，不容否认；国内的粮食供不应求。

3. 农民起义和“麦骚动”在16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的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类骚乱肯定不会使人对以养活全国为首要目标的所谓农民经济作出有利的评判。

4. 农业毕竟有所进步，但进步究竟有多大？

法兰西能不能做到自给自足

法国农村依靠自己的产品是否能够养活自己？它是否能够养活本国的非农业人口，确保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大体上说是能够的，因为法国的人口总数保持基本不变，甚至在灾荒年间还有所增长。这个成就主要应该归功于土地的养育之恩。

尽管如此，不足的情形还是很多。供应出现卡壳和脱节，不得不向外国求助；从 18 世纪开始，尤其在 19 世纪，购买外国粮食比较容易，但并不始终都能完全地、及时地恢复平衡。奥布省农业、科学、艺术和文学协会⁴⁴⁹1836 年在特鲁瓦公布的研究报告并不言过其实。报告认为，增加牲畜的数量在法国是“当今的第一需要，因为法国生产的牲畜数量不足，以至每个居民每天吃不到 3 盎斯肉〔约等于 90 克〕，收剪的羊毛每人分不到 12 盎斯〔约等于 270 克〕，提供的皮革不够每个居民每年做一双鞋子”。我们还要指出，法国的黄油和奶酪产量也同样不足。在 18 世纪，从荷兰进口的奶酪“数量惊人”⁴⁵⁰。路易十四时代的海船在启航前为备足食物，往往就靠向爱尔兰采购大批的桶装牛肉、猪肉或咸黄油。法国还向德国、瑞士等国购买活牛。马匹（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汽车）的生产，无论从质量和数量看，都不尽人意。洛林地区的农民用七拼八凑得来的钱购买德国的高头大马，“这种马要用大量的燕麦去喂养”⁴⁵¹。所有的城市都靠它拉车，甚至成千上万的巴黎出租马车也是如此。于是，早在 18 世纪前，来自东部的马匹成群结队地、络绎不绝地朝巴黎方向前进，后一匹马被拴在前一匹马的尾巴上。

为了保证军马的质量，部队不得不在德意志和瑞士购买数以千计的马匹，瑞士各州是向法国东部输送马匹的中间环节。这种依赖直到 19 世纪仍很明显。例如，1859 年第二季度在索恩河畔沙隆举行的马匹交易会，“因遭到德语国家的抵制”，停止了惯常的马匹买卖。确实，在正常情况下，“北部地区的商人都在这里选购德国、丹麦和荷尔斯泰因的马匹，转手卖给南方的商人。就在那一年，交易会上只有来自沙罗莱和莫尔旺山区的本国牲畜，而且价格又贵。

部队的采购员好不容易才买到几匹军用种马”⁴⁵²。

法国国内当然也有不少地区饲养马匹；尽管王国政府于1665年建立了种马场，法国生产的良种马还是太少。良种马因此仰赖外国，每年的贸易入超达几百万里佛⁴⁵³。1792年1月，即在4月20日宣战以前，法国骑兵为购买军马，“当时向外国交付了1200万里佛以上的巨款”⁴⁵⁴。再举一个例子，在拿破仑进行西班牙战争期间，法国军官对其敌人英军拥有的骏马十分羡慕：若能逮住一匹，就是莫大的运气！

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必须进口牲畜：每当国家放松边界的盘查（不论事出偶然或者故意如此），每当关税有所降低，活牲畜的进口便成倍增加。政府通过1714年9月14日法令，借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要改良国内畜种和降低肉价，竟直接向外国生产者求购牲畜。法国畜业主立即群起抗议。⁴⁵⁵一个世纪过后，即在1818、1819和1820这三年，“法国进口的公牛、母牛和绵羊分别达到1.6万、2万和15万头”。进口量在1821年更分别猛增到2.7万、2.3万和26.5万头，进口的公牛、母牛和绵羊甚至在苏和普瓦西的集市出售。1822年开征的捐税“遏制了上升的势头，1823年的进口量降低到公牛0.9万头，母牛1.3万头，绵羊11.5万头。1824年又有所回升，并且一直保持到1830年为止”⁴⁵⁶。对牛、羊、猪六年（1831至1836年）进出口总量的比较表明，进口额为4200万法郎，出口额为1670万法郎，平均每年的贸易逆差约达420万法郎⁴⁵⁷。

还有更加严重的事：法国几乎经常缺粮；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阿尔弗雷德·索维指出，1913年，“法国食品进口达18.18亿法郎，出口仅为8.39亿，贸易逆差约近12%。仅以举足轻重的谷物一项，进出口差额高达1500万公担，占消费量的七分之一”。而这还不算是个特殊的歉收年景（当年收成为8700万公担，前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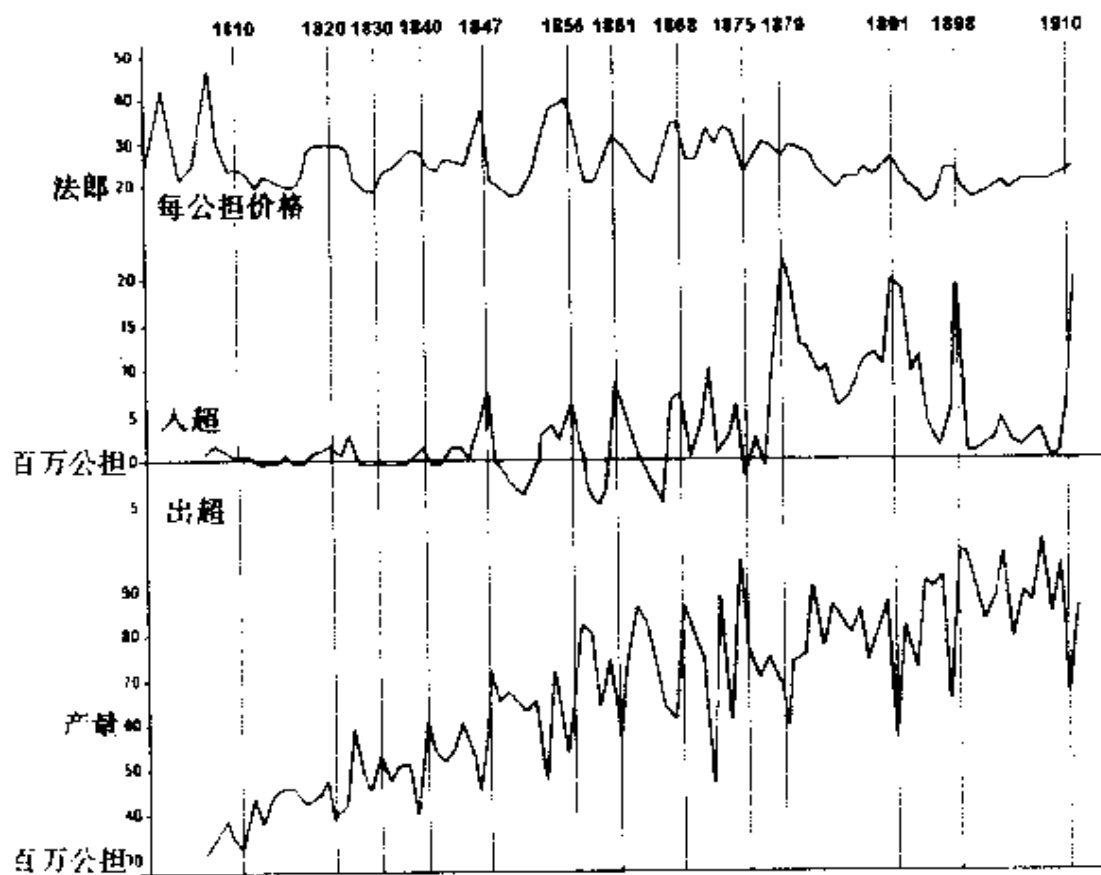
17 世纪末年的奶酪进口

弗朗索瓦·韦尔尼奥制图，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 1685 年 G7 号卷宗。

年的平均收成为 8 960 万公担)。⁴⁵⁸

这丝毫也不算是新鲜事。据一位历史学家⁴⁵⁹说，“所谓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六边形法国从来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实际上，在近代的所有历史时期里，法国经常求助于外国的粮食。这并不等于说，法国的谷物每年都不外流。有几个地区甚至经常出口粮

食,例如 16 世纪时的布列塔尼、欧尼斯和朗格多克。除了赶上歉收,朗格多克每年都向意大利外销谷物。布列塔尼的小帆船从当地和欧尼斯向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运送谷物;塞维利亚用银币付款,里斯本则用金币支付。1667—1668 年对西作战期间,法国偷偷向敌方供应谷物,“因为谷物能从西班牙换取金银”⁴⁶⁰。1684 年,法国与西班牙再次交战,一些英国船和荷兰船在波尔多装载运往伊比利亚半岛的粮食⁴⁶¹。



1810—1911 年法国的谷物产量、对外贸易和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历史统计年鉴》,1966 年版。

如果算笔总帐,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收支一般都是逆差(见本页图表)。遇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货源突然中断,而巴黎又急需供应,通常就向波罗的海(阿姆斯特丹的谷物市场于 1544 年取代了安特卫普的地位)⁴⁶²和马赛(马赛从勒旺和柏柏尔地区取得粮食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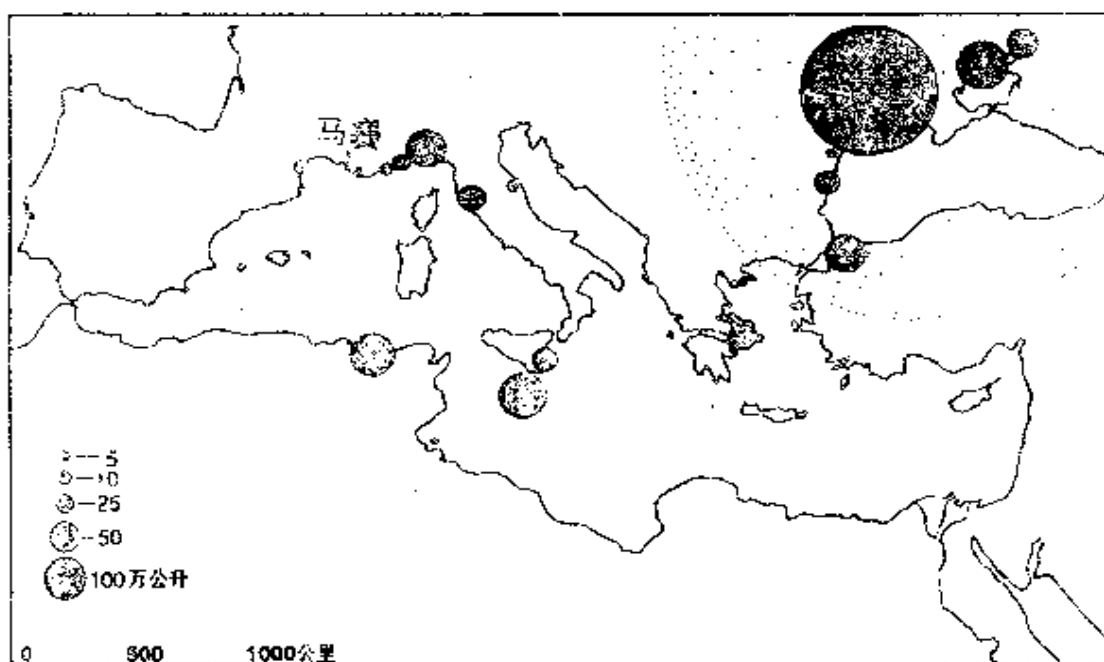
应)发出订单。马赛和热那亚商人立即抽调库存,运往马赛;反之亦然。巴黎多次接受从热那亚或马赛运来的地中海小麦,运到时往往已经变质,或者受到虫蛀。

另一个粮源是英国,1660年后,英国因推行出口奖励制,促进了小麦的出口;据昂热·古达尔的计算,到1775年为止,向法国输出的小麦达2100万色提埃,“价值2亿图尔里佛”⁴⁶⁵。折合我国的度量单位计算,2100万色提埃相当于2700万公担,进口量十分可观。

到了18世纪末期,又增加了两大谷物供应来源:美国 and 南俄罗斯。从1739年起⁴⁶⁴,满载小麦和桶装面粉的费城船只远航法国。乌克兰的小麦也于同期运抵马赛,但这对西欧和法国,只是到了后来,即在1817年欧洲闹饥荒的时候,才形成革命性的转折。这种小麦价格低廉,犹如来自天赐,却也包含着危险。它于1819年曾使索恩河上和罗讷河上载运勃艮第小麦的船运业破产,这难道还不够吗?据当时的一份报告⁴⁶⁵说,“来自克里米亚的小麦”使法国的粮价下降到每百升20法郎以下,而低于这个水平,“粮食种植就要亏本”。

我们还可以就1662、1693—1694、1709—1710、1740、1788—1789等困难年景的情形,举出许多其他例子。有人于1789年4月24日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见证材料⁴⁶⁶,他写道:“目前的粮荒令人可怕,因为在去年的收获季节过后不久,灾荒几乎立即露了苗头,收成实在很糟……粮商乘机囤积居奇,陷百姓于艰难竭蹶之中;今天,在王国几乎所有的省份,穷人简直已没有任何生路。上星期,附近的一个城市〔阿朗松〕曾发生一起流血事件,一些闹事的贫民被召来镇压的部队所打死。呵,大人,屠杀饥民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来年的收成肯定将比去年更差。”

大革命初期,面包不足造成了悲惨的后果。雷蒙·勒蓬于



运抵马赛的小麦,1845年11月5日

产粮地点和出口数量。虚点表示被隔离的小麦供应区。

1792年⁴⁶⁷告诉我们,1789和1790年,“为了赈济巴黎及法国其他几个地区的灾民,已经花7500多万里佛向外国购买粮食和面粉”,货款数量之大,竟影响到法国货币在伦敦市场上的汇价,“这就可以证明,粮食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法国经常有充裕的供应”。

奇怪的是,在以上的情况下,却总还有人(如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借口法国粮食过剩,主张开放边界,以便鼓励出口。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如果把法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这本是正常的事,在铁路广为发展以前,法国还没有名符其实的“民族市场”),法国需要补足其粮食生产经常出现的缺口。它只能依靠出口剩余的葡萄酒和工业产品,航运和商业收益(即利用其贸易盈余)还不算在内。

然而,恰如其分地进行计算,即与其消费量相比,粮食的产量虽然不足,但缺额有限,我们对此切忌夸张。

首先,粮食进口主要限于巴黎和沿海地区;敦刻尔克、鲁昂、南特和马赛是外国谷物在法国的主要转运站,但实际上,所有的港口都能根据地方的需求(即使为数极小),促进“海上谷物”的流通。例如,1683年4月的一封信提到,“大批但泽黑麦抵达奥洛讷和南特后,已分别运往普瓦图各地”⁴⁶⁸。1701年1月,一艘英国小船和三艘荷兰船满载小麦、黑麦和燕麦抵达圣马丹德雷,“还有其他几艘可望到港”⁴⁶⁹。从海上运来的外国谷物再取道江河到奥尔良;经罗讷河到里昂,如此等等。

据杜尔哥估计,当时欧洲的谷物海运总量达500万公担。法国在其中只占一半,约250万公担,等于其消费量的5%,法国当时的谷物消费量高达5000多万公担⁴⁷⁰。阿尔弗雷德·索维曾经提到,1913年从海上进口的粮食占消费量的14%,大大超过了前面的比例。以上数字如果确实无误,局势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从长时段的眼界观察过去,我们对旧制度时的君主不要滥加指责:君主所能犯下的过错往往并不如传言渲染的那么严重,所谓“勾结奸商、利用饥荒发财”的说法更纯属虚构。君主动辄禁止粮食出口,并且对外国谷物敞开大门,这难道也该受到责备?复辟王朝1819年颁布的税率升降法,七月王朝关于保留进口税的1832年法,又有什么不好?难道能说这使生活水准居高不下,进而导致一连串骚乱的发生吗⁴⁷¹?

此外,不要忘记,无论在法国和欧洲,直到18世纪末年,边界的守卫仍很松弛,外国商品不难进入国境。国与国之间的渗透也十分频繁。更何况,谷物贸易又分散为几百万笔小生意,出头露面的都是些小商人,即使想管,怎么能够管住?马布利说,法国的“粮食贸易比秘鲁的金矿更有价值”⁴⁷²。但是,粮食交易市场却是零碎到了极点。布阿吉尔贝尔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希望取得粮食的出口自由,他认为供需的不平衡终究是容易补救的。他写道,只是在1679

年进口 2.5 至 3 万桶小麦,就避免了发生与 1693—1694 年类似的缺粮危机⁴⁷³。事情果真如此吗?既是又不是。缺粮的程度诚然不应夸大,但难道就该缩小吗?

其实,鉴于当时的交通不便,除了外在的不平衡,还有内在的不平衡和混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麻烦、窘迫和担忧。某省于某年逃脱了普遍蔓延的灾荒——如布列塔尼于 1709—1710 年——,但在下一年却可能遭灾。人们因而很难相信德·拉马尔在《警察论》中的断言;拉马尔说,1684 至 1692 年,法兰西全国接连 8 年喜获丰收⁴⁷⁴。此说可信与否姑且不谈,王国政府于 1763 年和 1764 年发布命令,在粮价不超过每公担 12 里佛的条件下,允许粮食出口,这一举措导致了出人意料的混乱;粮食投机猖獗,价格普遍上扬。巡按使们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分别作出了解释。他们的解释可归纳为同一个结论;在他们看来,谷物问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毛病就在于各省之间(甚至邻近省份之间)的粮价高低不一,价格差异有时达到荒唐的程度。距离把法兰西切割成七零八碎的小块,从而造成了居民的生活困难。

情况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在大革命初期,人们注意到,在 32 年行省(更确切地说,32 个财政区)中,12 个人口最多的行省经常缺粮;10 个行省供求平衡,另外 10 个有所富裕。这种不平衡状态还不能通过省际调剂解决,因为运输缓慢,费用高昂,远水救不了近火。

战争更如火上浇油。境内和境外的军事冲突要求远距离供应粮秣。军需商的肆意搜括,当局的强征暴敛,打乱了正常的粮食流通。有的巡按使经常为此拒不接受命令。1709 年 8 月,政府下令苏瓦松财政区“征集 1 万袋混合麦或大麦面粉”,巡按使勒费弗尔·多尔梅松于 8 月 26 日立即作出了答复⁴⁷⁵;他说,命令难以执行,因为“大麦收割才刚开始,尚待 9 月底方可结束”,面粉更需在 10 月

底准备就绪,而且还达不到1万袋这个数目……“当地一般几乎不生产大麦;仅在河谷地带才有少量播种,这种谷物不产于肥沃的良田……更何况,四个月来,本省为应付接连不断的军事差役,农田耕作几乎全告停顿。”这也是说,政府征集运输车辆已妨碍农民进行正常的劳动。多尔梅松随即提出,以“燕麦、燕麦面粉或可制作面包的其他小杂粮”代替大麦。这个方案显然已被采纳,在信件空白处写着的“可行”二字,是另一人的笔迹。政府之所以接受巡按使的意见,无疑因为其理由是不容置辨的。当时,距马尔普拉凯战役(1709年9月11日)尚有两个星期,急需粮食供应前线的部队。这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法军虽然失败,但终究在北部边境的沃邦防线遏制了敌军的入侵。

部队在战争期间调动十分频繁。在以上引证的信件发出后两天,“图尔奈的驻军因领不到军饷”纷纷出城劫掠,“践踏草地和果园,尽管城市向部队供应面包,士兵并不以此为满足”⁴⁷⁶。

即使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战场一带,自然更为所欲为——,即使不在作战期间,部队也不断为城市和乡村制造麻烦,因为部队总要移防,等到年底,再回他们的营地过冬。调防也罢,驻守也罢,部队的士兵当时都由居民留宿和供养。根据所谓“宿营制”的规定,过境部队在居民家中有权取得吃、睡、烤火、照明等各种待遇⁴⁷⁷。这些开支随后将予偿还,但往往拖欠很久,经手人还从中克扣肥己。1682年,部队过境极其频繁,布雷斯地区的布尔格、科利尼和维拉尔三镇的居民“再也撑不了门面,决定弃家出走”⁴⁷⁸。1694年的情形更糟:田地遭灾,粮食歉收,加上“2.7万名士兵在比热地区过境”,只住5个晚上,就把布雷斯和比热地区闹得居民没有饭吃。早在路易十四进行长年的征战以前,这类事例已屡见不鲜:1625年8月,在圣通日地区,“为国王效力的2—3个团队竟比雷击、瘟疫和饥馑加在一起所能造成的祸害更大”⁴⁷⁹。

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征兵、提高捐税和削减国家津贴。波迪埃·德·拉埃斯特洛瓦认为(1716年),在1701至1713—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农田的收成之所以不如往年,原因恰恰在于战争,“战争把农村的男人罗掘俱空,因而没有足够的人手从事耕作”⁴⁸⁰。

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加在一起,使以乡村为基地的经济体系更加脆弱。弗雷德里希·吕奇揭示了这种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他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地区,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的人口密度,就不可能让居民都能吃饱肚皮,难道这是解释一切的根本原因吗?法国真是人口过多了吗?照这么说,阿瑟·扬在大革命前夕认为法国人口过多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了;阿瑟·扬声称,法国人口“多了600万人”⁴⁸¹。至于让·符拉斯迪埃,他历来强调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这也不无道理。在1700年,10个农民种地可以养活17个人,他们自己也还包括在内⁴⁸²。

以上可以说明,即使法国能做到食物自给,也还相当勉强。按1949年的法郎固定币值计算,1700年的人均消费支出可达5万法郎,1972年则为47.6万。让·符拉斯迪埃为进一步说明这一差别,补充说:“1700年的低收入家庭所吃的面包比1976年的低收入家庭多8倍以上,因为其他食物超出了购买力的范围”⁴⁸³。

缺粮、荒年、饥馑、骚乱和暴动

总之,在几个世纪期间,绝大多数法国人备受缺粮之苦,始终担惊受怕,有时也起而反抗。缺粮、荒年、饥馑、骚乱和暴动在历史文献上均有反复的记载。缺粮是其中最轻的一项,较少见诸史书;灾荒和饥馑则相反经常提到;灾荒与饥馑只不过是一字之差:“大灾之年”与“饥荒蔓延”显然只有程度的差别而已。骚乱与暴动同样也只是严重程度有所不同;前者历时较短,一天或几个小时,在路

旁、河边或集市上发生；农民暴动可持续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并且波及辽阔的地域。

但是，真所谓祸不单行，缺粮、灾荒、饥馑、骚乱和暴动往往结伴而来。骚乱本是苦难深重的表现形式，这也恰好证明，法国的社会动荡正是农产品不足的悲惨后果。情况确实悲惨。各种见证往往令人心酸：1661--1662年、1692--1693年和1709年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达尔让松侯爵1739年1月26日在其《回忆录》中断然声称：“外省路有饿殍，百姓以野草充饥。”⁴⁸⁴其他见证人于1652年记述，“洛林及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像牲畜一样在草地吃草”；1662年在勃艮第，“三分之一的居民，甚至一些城里人”，也不得不以野草裹腹，“食人肉者间或有之”；1694年，默朗附近的人“以食草为生，形同牲畜”⁴⁸⁵。相对而言，城市得到较多的保护和救济；粮食被城里人夺走了以后，农民纷纷涌向城市，流落街头，坐以待毙（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威尼斯的农民来到威尼斯城，在桥孔下和运河码头上奄奄一息）。1694年5月2日，里昂巡按使报告说，“灾荒日趋严重，里昂市内挤满了农民，他们不顾一切，见到面包就抢；他们利用夜晚，在城墙上将面包扔出城外，还有的将面包藏在酒桶内偷运，已被扣留”⁴⁸⁶。

奥弗涅的巡按使戴马雷·德·伏布尔于1691年6月20日亲赴“莫里亚克和欧里亚克财政区视察”；当时正值青黄不接，“农民已把去年收获的少数粮食以及有限的一点其他食品完全吃光，欧里亚克财政区严重缺粮，挨饿者历时已有2至6月不等”。在该财政区的四个不同城市，“每星期向所有的贫民分发一次面包。欧里亚克本月8日分发面包时，贫民人数极多，尽管勉力维持秩序，仍有11人在拥挤中窒息致死。每次分发面包，通常总有6000多人涌来。其他城市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这四个城市的分发工作在同一天进行，以免穷人去两处领取救济品”⁴⁸⁷。

巡按使为“该财政区的处境维艰”提供两项理由：最近两年的农业歉收，“宿营制负担的增加”；这一负担“去年竟达到 66.6 万里佛，这对奥弗涅省来说确实是太重了一点”⁴⁸⁸。

下面再请谁出来作证？蒂勒的本堂神甫于 1692 年 12 月 11 日的讲话也许值得一听。蒂勒是利摩日财政区的一个极度贫困的小城市。默隆神甫写道：“方圆 10 里的范围内有面包吃的人家竟不到 10 户；霜冻导致颗粒不收，百姓在吃光了萝卜以后，再也没有别的食物可以充饥。如果不赶紧给予救济，普罗旺斯三分之二的人都将饿死。”⁴⁸⁹显而易见，神甫的这番话未免夸大其辞，但他难道不应该对百姓表示同情吗？

历史学家异口同声地承认，法国经历的全国性饥荒，16 世纪为 13 次；17 世纪为 11 次；18 世纪为 16 次⁴⁹⁰。就算这项统计是完整的和可信的（我对此有点怀疑），它却把地方性饥荒撇在了一边，而地方性饥荒是经常出现的，几乎年年都有，不在这里发生，便在那里发生。甚至到了 19 世纪，人们也不能说灾荒和饥饿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往事。1812 年，在“一场可怕的灾荒”的打击下⁴⁹¹，法国大伤元气；1816—1817 年间，饥荒迅速蔓延，举国为之震动；1819

年实施了对谷物进出口的税率调节制 1820—1822 年 1827 年

农民起义和麦骚动

灾荒不断激起农民的骚动。动乱突然爆发，接着又迅速衰竭。这在遥远的过去已经是如此：1356年的扎克雷起义于5月28日开始，在恶人查理的无情镇压下，于6月10日结束⁴⁹⁴。几万农民惨遭杀害。起义历时短暂，无力抵御当局的镇压；这些特点对1381年英格兰的贫民起义，1525年德国的农民战争以及外国的其他类似事件全都适用。任何农民起义都利用社会秩序的缝隙和疏忽，出奇不意地一举得逞，但它随后总因组织不善而不能持久。出动进行镇压的部队占有无可改变的技术优势。由此可见，群众性反抗多次出现，彼此相似。然而，大约在17世纪80年代，即在路易十四实行亲政以后，法国的群众性抗租抗税的自发政治行动，表现为洪水暴发般的大规模暴动，特别是拒纳捐税的暴动。1670年维瓦赖地区的起义农民用投石党运动时代的一首歌曲抒发自己的心声：

农民，拿起你的武器，
向着贪婪的税吏冲去；
为了惩治恶狼，
必须使用你的锄镐，
打死恶狼，再剥下狼皮。⁴⁹⁵

1680年后，反抗大多以零星的农民骚动或市民骚动的形式而出现，范围有限，为时极短，少则一两天，多则一星期。事态比较容易平息，一小队骑警即能应付裕如，出动部队，加强巡逻，更足以把反抗镇压下去。这第二类反抗是由物价上涨、面包紧缺引起的。因此，我不完全同意路易丝·蒂伊(1972年)的论断；在她看来，17世纪后的麦骚动是一系列反对政府的政治行动。她写道：“不要在‘灾荒=饥馑=暴动’这个简单的经济公式中寻找法国17世纪以后的麦骚动的解释。原因更多地在于政治背景(政府的政策)的变迁，

以及粮食市场的长时段演变”⁴⁹⁶。任何反抗都针对着政府当局,而在法国,君主统治在夺取了城市的权力以后,便担负起谷物供应的责任。社会稍有动乱,政府便自动被卷了进去。但是,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的政治意图,不如说是贫困、灾荒以及对饥馑的恐慌。

在我看来,反抗的新特点表现为数量多和规模小,而且在城乡两处同时发生。城市原来往往置身事外,本能地与农民相对立。仅举一例,第戎于1630年一度受到四郊起义葡萄农的威胁。“多数殷实人家都把现金、文书和最值钱的家具搬到乡下,城里一日三警,人心惶惶,担心这些闹事的暴徒野性发作,再次制造一场更加严重的流血事件”⁴⁹⁷。于是,城门紧闭,自卫队发放武器,动员起二三千人,结果仅抓获十来名无赖。为怕其他葡萄农前来劫狱,晚间设双岗守卫,所有的神职人员,包括隐修士在内,全都被动员起来。

1680年以前的暴动

1680年以前的暴动我只是追溯到16世纪末年;当时正值宗教战争期间,税吏横征暴敛,兵匪四出劫掠,士兵和领主、王党和天主教同盟全都肆无忌惮地制造各种暴行,百姓则聚众反抗,揭竿而起。当形势转为对农民有利时,他们便以无情的暴力来回答压迫者的暴力。一些农民自卫组织纷纷成立;从发生阿尔克大战的1589年到亨利四世进入巴黎的1593年,就有“老实人”、“绿色城堡”、“利潘”等武装团体;随后还有名为“迟来人”、“晚起者”和“乡下佬”的武装集团。这最后一个名称竟成了深受起义农民欢迎的绰号,从佩尔什和马尔什一直传到利穆赞(起义中心)和佩里戈尔,几乎遍及整个西部地区。国王的士兵大部分正驻守在王国的北部和东部,无暇顾及法国辽阔的西部。

农民暴动本将如火如荼地继续发展下去⁴⁹⁸。但是,尽管起义者

人多势众(总数达5万人)和以火枪为武器,他们毕竟抵挡不住骑兵的冲击,甚至对付不了摆开阵势进行镇压的小股部队。1594年的起义自2月开始,至同年6月结束,恰好等于外来的镇压部队赶到当地的时间。后来,还曾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其他起义,但它们也先后偃旗息鼓:1624年在凯尔西;1632年在普瓦图、阿基坦和维瓦赖;1635年在朗格多克和阿基坦;1636年在阿列河谷至大西洋的广大地区;1643年在整个法国西部;1645年在波尔多至格勒诺布尔一线以南的法国南部;1670年在维瓦赖;1675年在下布列塔尼,等等。每次起义都席卷广大的地域,但从不持续很长的时间⁴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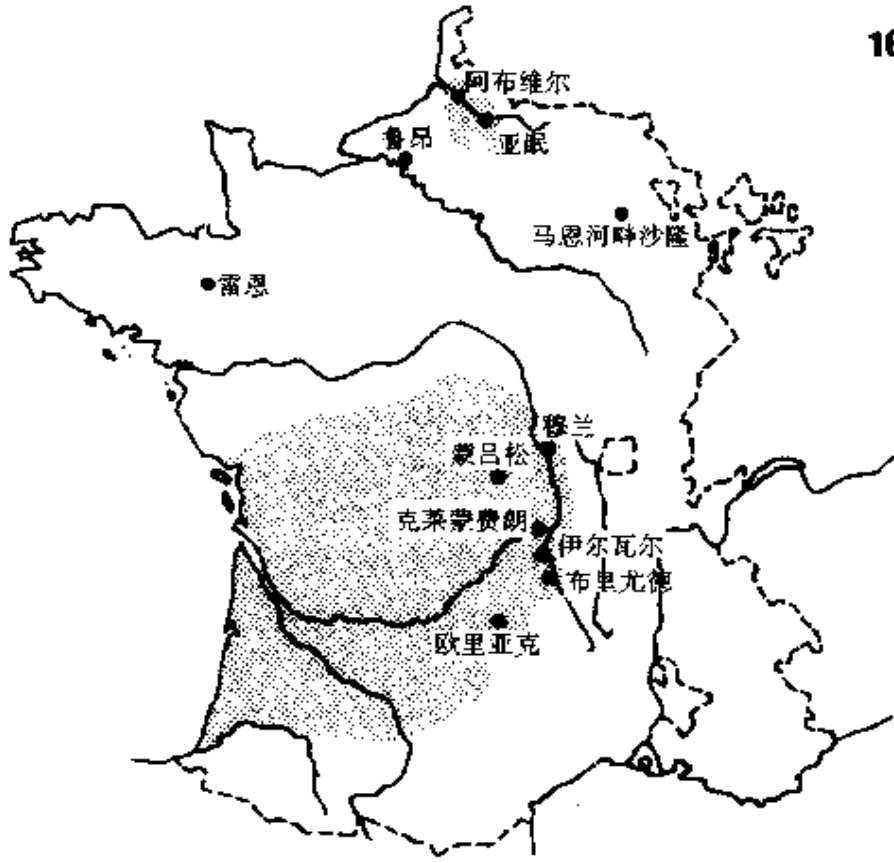
维瓦赖1670年的起义以5月和7月为起迄日期。布列塔尼的“红帽”起义自1675年5月开始,到同年8月结束。镇压行动照例都是十分残酷:士兵的表现简直穷凶极恶。塞维尼夫人写道:“在下布列塔尼地区,可怜的当地人一见士兵再现,便伏地求饶:‘饶命’是他们唯独学会说的一句法语……可他们还不免要被绞死。”⁵⁰⁰

除了这些公开的暴动以外,还应该考虑到许多隐蔽的反抗,火种刚刚冒烟即告熄灭,这类事件加在一起,为数相当可观。据伊夫·玛丽·贝尔赛的统计,1590至1715年间,仅在阿基坦地区,“火种露头的事”就有450至500起之多⁵⁰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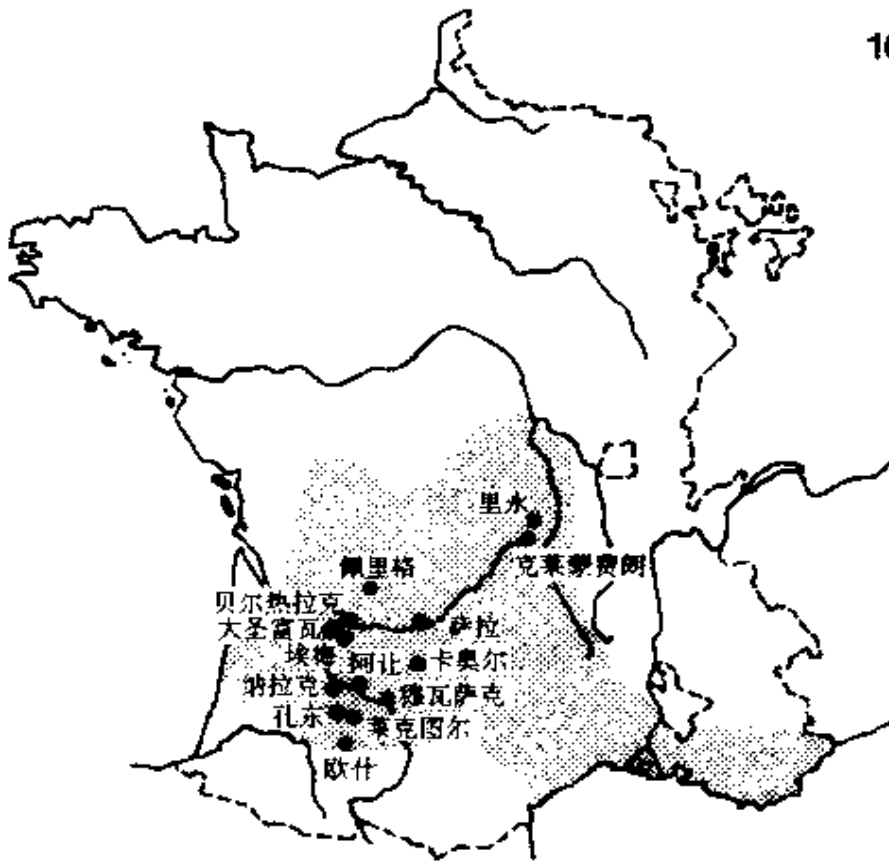
自从鲍里斯·波什涅夫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⁵⁰²于1963年出版法文本以来,历史学家对农民起义的原因和性质进行了众多的讨论。阶级斗争,政治反抗,抗税运动;所有这些解释都包含一部分真理。于格·纳佛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⁵⁰³中认为起义只是一种反抗行动,并试图找出反抗的各种理由。他强调农民朝不保夕的困难处境:税收负担的增加,剥削的加重,经济形势的逆转,粮价的下跌,都会使他们陷于贫困,甚至沦为乞丐。既然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幸和绝望就通过他们的反抗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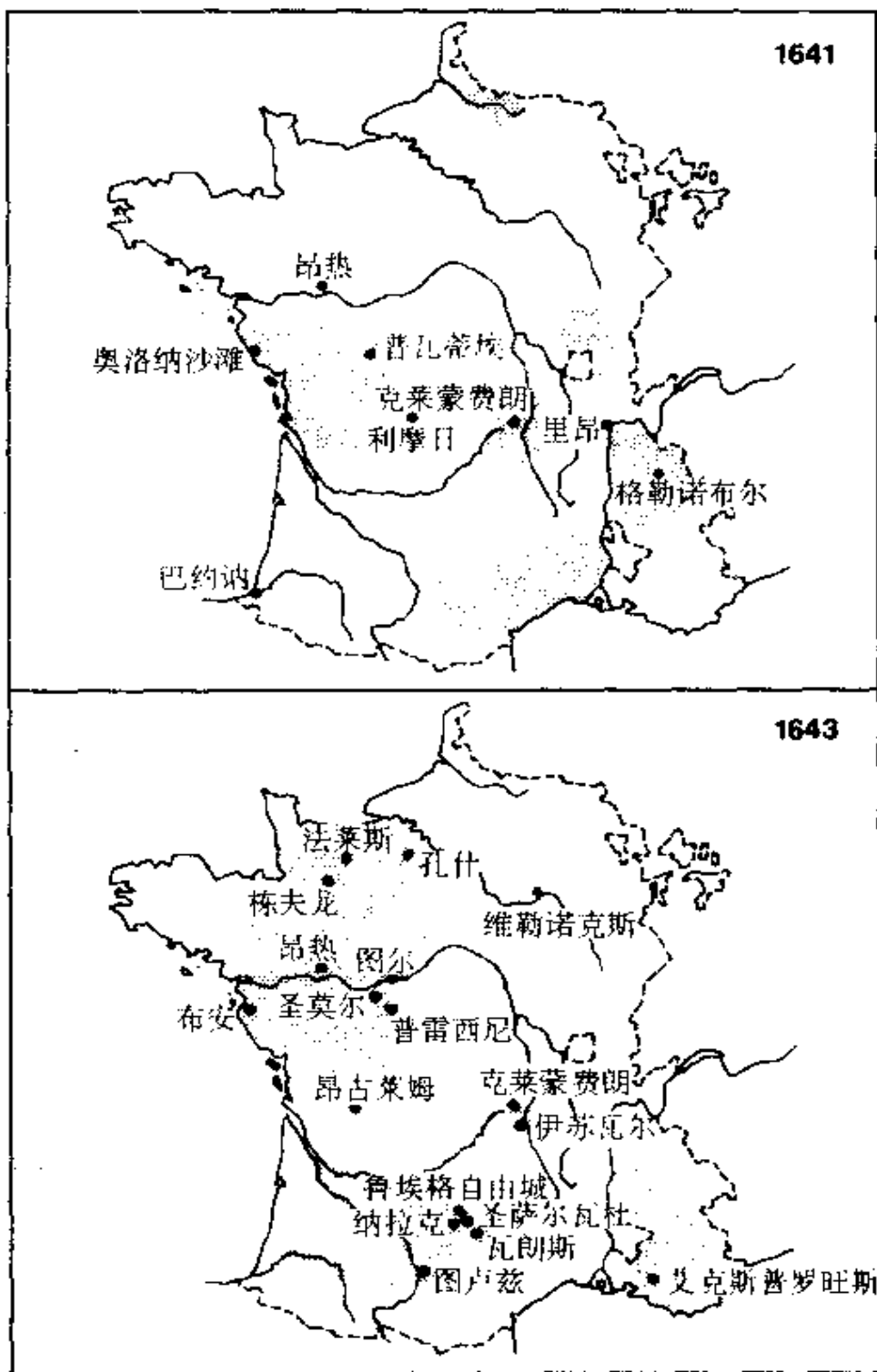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起义的地理分布或许也能说明某些问题。参看鲍里

1636



1637





17 世纪法国的平民暴动

在波什涅夫为 1624—1648 年平民起义绘制的 24 张地图中,我们挑选了以上 4 张,涉及我国最广大的国土和最经常发生平民暴动的地区。(引自鲍里斯·波什涅夫:《法国 1626—1648 年间的平民暴动》,1963 年版。)

斯·波什涅夫为 1623 至 1648 年间每次平民起义所绘制的区域图,人们就会发现,法国的西部,还有南部,总是首当其冲。我们由此又从另一条道路回到了我国从胎胞中带来的两条裂缝:阿摩里卡丘陵的前沿(呈南北向直线)和横贯全国的卢瓦尔河干线。值得奇怪的是,至少据我所知,这一图示竟从未被人认真看待,皮埃尔·古贝尔也只是偶然提到而已⁵⁰⁴。

这种区域分布还有待作出解释。但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些解释呢?我们总想抓住我国各地区在各大历史时期的细微差异,却始终也抓不住。我们可以说:1. 北部地区的日常生活较有保障;2. 君主从大局出发,对北部地区看管较严,因为它距巴黎较近;3. 当地交通方便,调动部队进行镇压较迅速;4. 饥民骚动在各地区都有发生,只是猛烈程度不尽相同。以上认识或许能够说明一点问题。

1680 年以后

1680 年以后,暴力事件并未停止,但有所收敛,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塞文山区 1702—1705 年间卡米扎尔起义者的拚死反抗当属例外,宗教几乎是这场起义的唯一原因。那么,在过了出现转折的 1680 年以后,暴力斗争为什么由强减弱了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困难的问题。

国家实际上已建立了专制的但又可被接受或已被接受的社会政治制度。此外,经科尔倍尔的提倡,当时正逐渐实行从直接税到间接税的过渡(相对而言,后者比前者较少引起纳税人的抱怨),这或许也是用以解释的一个理由。还有别的理由: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完善巩固了君主的统治,使君主学会了发号施令;长期首鼠两端的教会,在 1685 年废止南特敕令(这被所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一场灾难)后,开始投靠君主。在投石党时期往往与政府作对的教士从此改换了门庭。

最后一条理由：城乡群众的生活可能有所改善。这个特点还很难加以确证。不过，我们知道，玉米于17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以图卢兹为据点，先后在阿基坦盆地和整个法国南部立足生根，从而结束了所谓“巴洛克时代”的饥荒⁵⁰⁵。这难道不就是可能解释1680年后社会秩序相对平静的理由吗？这种平静至少一直保持到1775年5月的“面粉战”；随着1774年关于粮食贸易自由的杜尔哥敕令的实施，在巴黎、凡尔赛和周围乡村发生的“面粉战”无疑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一事件业已暴露出潜在的社会危机⁵⁰⁶。

到了大革命时期，骚乱更广泛蔓延，但并不像过去那样，动辄使用暴力镇压。1789年夏秋两季的骚乱利用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不灵以及群众的心理恐慌。但从秋季开始，城市中建立的国民自卫队陆续在附近乡村恢复了秩序。某些地区的农民直到1790年12月仍照常缴纳什一税⁵⁰⁷，这难道不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吗？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18世纪因缺粮而引发的骚乱和事件都限于较小的范围。基本情节、表面原因均千篇一律，当局的反应也始终相同。粮食奇缺，农村中以及城市集市上的粮价暴涨，这就是导火线。民众立即作出反应，力图阻止粮价上涨；或在城乡各地拦截运输谷物的车辆、牲畜和船只，或在市镇聚众闹事。如果顺利得手，闹事者不等骑警或部队及时赶到，便把谷物劫掠一空，有时低于市价强制出售。

1709年3月2日，在洛林地区购进的一批谷物被存放在布博讷城堡。布博讷当时是一个“小集镇”，位于今天的孚日省境内。部分谷物“装袋后交68头驴驮运，每头驴驮一袋，每袋重200斤”。驴队向索恩河进发，准备在距布博讷67公里的格雷镇装船转运。“聚集在布博讷镇的乱民敲响了警钟，几名男女拿着刀刃和铁棍准备动武，并且不顾赶赴现场的宪兵队长的警告，捅开粮食口袋，让小

麦四散撒在街头……一名妇女以及一个名叫阿尔潘的鞋匠表现最为激烈,对这次闹事起着主要的作用”,两人未经讯问,当即被带到朗格勒监狱关押⁵⁰⁸。

以上报告与伏布尔巡按使 1697 年 10 月 19 日就巴勒迪克的一次骚乱所写的报告大同小异。巡按使写道:“维特里的商人想要运走在洛林和巴鲁瓦买下的 12 车谷物。当地妇女认为这会刺激粮价上涨,这种看法确实也有道理。因此,她们聚集起 3 000—4 000 人,夺走了几袋粮食,又用刀子戳破了其他一些口袋。警官好不容易平息了骚乱。几天以前,南锡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忿激行动,驻军军官迅速予以制止。”⁵⁰⁹

如果这些本身无关宏旨的事件并不经常地反复发生,人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普通的社会新闻。可是,在灾难深重的 1709 年,骚乱的成倍增多竟使法兰西举国震动:3 月 15 日在马恩河畔沙隆(疑为索恩河畔沙隆之误)⁵¹⁰;3 月 16 日在卢瓦尔河上的赛桥(人群阻止满载谷物的 6 艘大船启程,并强制胆战心惊的商人在当地出售);3 月 18 日在昂热(乱民抢夺粮商和面包商的存粮,并造成多人死亡)⁵¹¹;4 月 4 日和 16 日在奥尔良⁵¹²;4 月 27 日在奥尔良再次闹事⁵¹³。当时,远在多菲内作战的部队急需供应,粮食已经装船,准备运往卢瓦尔河上游。那天正赶上顺风,聚集起来的人群不让船只起锚,“但是,两支团队及时赶来弹压,人群眼看谷物离开城市,禁不住号淘大哭”。1709 年 5 月 1 日在库洛米耶又出现同样的事件⁵¹⁴。7 月 16 日,在卢瓦尔河畔的蒙让,“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拿着石块、棍棒和武器”涌到城堡会集,阻止维伊鲁瓦元帅从田庄将存粮运走。经过巡按使出面斡旋,并答应把一半粮食留在当地,人群的忿激情绪才缓和了下来。作为镇压措施,当局只是将闹事的几名头头监禁半年了事,“以免激起已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更大的愤怒”⁵¹⁵。

但当局并不始终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波旁地区巡按使芒萨尔·德·萨戈讷 1709 年 6 月 15 日写道：“昨天，我对聚众持械抢粮的三名带头人依法开审。三人均被判处绞刑。其中两人在穆兰处决，另一人则绑赴现场绞死，以儆效尤。我以为这在各乡将产生好的影响，有利于遏制偷盗的横行。城堡和其他地点目前关押着其他人犯，待案情调查清楚后，将陆续进行审理。”⁵¹⁶旧时代的司法制度与今天不同，它通过显示威力和决心，求得不惩办过多的罪犯。但它又缺乏耐心。稍早一些时候，即在 1709 年 3 月，皮蒂维耶发生骚乱，当局出动了一连骑兵，避免了事态的恶化；12 名闹事者被逮捕入狱。奥尔良巡按使说：“我觉得有必要抓几个人法办，以示惩戒。”⁵¹⁷

反抗运动今天停止，明天又重新爆发；这里才刚平息，那里又闹了起来。每次歉收都会引起骚乱。1771 年 8 月和 9 月，车辆在所有的路口被拦阻。谷物奇缺，粮价飞涨，绍莱的 3 000 居民十分之九因没有面包吃而起来反抗。“他们高呼：与其饿死，不如绞死。”地方官员在致巡按使的报告中写道：骚乱天天都在发生，除非粮食终于运到，才会停下来⁵¹⁸。

为了重现整个事态的全貌，在叙述了有目共睹的以上事实后，还必须看到一般的犯罪行为：盐贩子无孔不入的走私活动（直到 1790 年制宪议会取消盐税后方告停止），乡村中的拦路抢劫，还有在 18 世纪末与日俱增的手工工匠罢工。尤其应该把结帮成伙的乞丐也展现在画面上。关于旧制度留给 19 世纪法国的这个巨大的社会创伤，我们以后在不同的场合还将重新谈到。

饥民骚乱在大革命期间变得更加严重，到帝国期间又多半趋于平息，然后到 1812 年再次爆发了灾难深重的谷物危机。特别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急风暴雨般的骚乱在复辟王朝、七月王朝乃至第二帝国期间仍时有发生。路易丝·蒂伊的功绩正是她在文章里指

出，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骚乱事件仍接连不断，似乎与过去没有任何不同。

我们从一份证据确凿的历史文献中可以了解到，1816 年秋季至 1817 年夏收期间法国各地风靡一时的大部分骚乱的情形⁵¹⁹，1816 年的农田收成比正常年景少了一半。1814 年和 1815 年的战争破坏和外国军队的消费又使法国存粮罗掘俱空。当时只得求助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小麦或巴尔的摩的面粉，可是缓不济急，粮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运到鲁昂和马赛。

如果说当时出现的饥荒“虚假多于实际”，这未免夸大其词；但是，人心惶惶和以讹传讹对笼罩全国的恐怖气氛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人当时曾说，“人们越是相信饥荒的存在，饥荒的危险也就越大”⁵²⁰。

总之，粮价飞涨，市场抢购一空，穷人怨声载道，蠢蠢欲动。为了阻止闹事，必须动用武力，施加威胁，说理劝戒和大批调运谷物。国立档案馆中存放的报告对这些可怕的动乱都有详细的介绍：群众的敌对行动，市场上一再出现的纠纷，部队的调动，国民自卫队的成立，当局的决定……看到这些，你顿时会觉得往后倒退半个或一个世纪，重又回到旧制度那时去了。同样的反抗运动，同样的戏剧情节；当局总是极力防范（例如，不准闹事者进入钟楼，深怕他们敲响警钟）；在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骚乱浪潮的包围下，官员们或处事迟钝，或手忙脚乱，始终表现无可奈何。

我们看到一起事件，就可以想象出几百起其他事件。我们且到图卢兹去：1816 年 11 月 12 日，城里爆发了骚乱，但粮食货栈看守很紧。巡逻队在街头往来不息，“突然，一大群人冲出大街，挤到市场的栅栏口上，吵吵嚷嚷地要求按限价购买 24 法郎的小麦”。警察局长当时恰好赶到，他说：“我首先下令集合部队，以便把竭力向粮站⁵²¹靠近的乱民推开，他们的打算显然不是按限价买粮，而是企图

乘乱哄抢。那里的地形使部队很难在正面展开；货栈底部围有粗大的柱子，四周的道路十分狭窄，防卫只能短兵相接。另一方面，我们在下令开枪以前，希望想方设法进行劝说。因此，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力图对群众说明道理和讲清利害，但对他们的吵闹不能表现软弱。守卫粮站大门的队伍曾有五次几乎被拥来的人群所冲垮，但经过五次增援，又坚决地把人群挡了回去；最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抵抗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办法，大胆地派出一队龙骑兵去把闹事的人从货栈和各条大街统统赶走。”⁵²²就这样，事情的结局还不算太坏：既没有开枪，又没有捕人。骑兵和马匹在驱散乱民后，返回军营。你在阅读这篇记叙和其他报导时或许会持乐观的态度。更何况，在官方文书中，娓娓动听的言词还真不少。凡尔登的警务长官 1817 年 9 月 15 日写信报告大臣说：“大人，百姓的心里几乎总是埋藏着正义和良知。”⁵²³

人们可以认为，暴力镇压已随旧制度的覆灭而消失，当然还有个别事件例外，例如蒙塔日的社会惨剧。姗姗来迟的骚乱大概于 1817 年 7 月 8 日方才发生，使这个小城市陷于一片恐慌之中。邻近的村庄里敲响了警钟，成群的农民手持棍棒，背着空口袋蜂拥而来，准备到城里抢掠粮食，他们早先已经在奥尔良运河边上抢劫了满载粮食的两艘船只。当局严阵以待，并逮捕了一些农民。群众试图进行援救，那也纯属徒劳。骑兵挥舞马刀冲向不幸的人群，但并没有造成什么伤亡⁵²⁴。在妇女呼天号地的哭喊声中，闹事者纷纷抱头鼠窜，事件以秩序的胜利而告终。当夜细雨蒙蒙，平安无事。这场起因于贫困饥饿的骚乱再一次失败了。一位同情骚乱的证人指出：“当平民大众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已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怎能不铤而走险？饥饿带来了绝望，而绝望又使任何罪错可予宽恕……大众在饥饿的驱使下奔走呼号，将对上帝的劝戒置若罔闻。”

出人意外的是第二天的悲惨结局。奥尔良的重罪法院前来蒙塔日开庭审理 25 名在押罪犯。检察官无情地提起了公诉；5 名犯人被判死刑，其中一名妇女自称业已怀孕，经确认后免于—死。四名犯人在城市广场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这位热心的匿名见证人说：“此情此景委实难以言表，我感到自己的心不断在怦怦乱跳。”

这些残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困难局势的接连出现，直到 19 世纪中期为止。就在 1852 年，圣伊里耶还曾有抢粮事件的发生⁵²⁵。

国家难道真有缓和局势的能力吗？实际上，国家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根据情况对外国谷物加征或减免进口税。这些措施何况也名声不佳。据认为，关于征收粮食进口税的 1832 年法应对灾荒年间的面包价格上涨负有责任，特别是在 1847 年，使好几个地区爆发了相当严重的骚乱。比藏赛（安德尔省）发生的那起骚乱，后来甚至还导致三人被判死刑⁵²⁶。

必须等到铁路运输网建立了以后，才能真正缓解法国农民吃饱肚皮的困难，才能在法国最终驱除饥荒的幽灵，从表面上看，法国粮食资源还算丰富，至少比许多其他国家强些，但也不能做到充分自给。如果要选定一个日期，为我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充当标志，1861 年（该年取消了粮食进出口税率调节制）恐怕会是个不错的选择⁵²⁷。

在所有的因素中，我坚信经济因素是最可能说明问题的理由。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事态发展进程几乎可以为我提供证据。1595 至 1715 年间，粮食危机和饥民骚乱在当地也时有发生。但勒内·皮约杰斩钉截铁地指出：“普罗旺斯从未发生过农民战争，也没有出现过全省性的、区域性的乃至几个村庄联合发起的反抗行动。与诺曼底和索洛涅不同，普罗旺斯在任何时候都从未经历过‘乡下佬’、‘赤脚汉’、‘木屐帮’之类的农民起义。”⁵²⁸ 局势相对平稳的一项重要理由，是马赛源源不断进口谷物，粮食售价虽高，但货

源充足，排除了缺粮、可怕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日三惊的紧张气氛。

五 毕竟取得不小的进步

骚乱、暴动、危机、供求失调、粮食不足使法国备受折磨，似乎永远也熬不到头。在法国进入现代的最初几百年期间，至少在1850年前，法国人对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旧病复发怨声载道。但是，蒙受苦难的法国农民并非完全止步不前，尽管这种进步本身不足以使他们获得解放。农民的解放及其境遇的变迁和恶化主要由外部原因所决定。

能否确定变化的时间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只要农民在每年冬季还像过去那样受痛苦的煎熬，法国经济就依旧保持其旧时代的特征。说到这里，新时代到来的时间就很难加以确定，既然在旧时代的冬季，不但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而且存粮将尽，难以满足人畜的食用需求。

我还曾经说过，只要面包仍是人们的主食，仍是一般价格运动的马达，法国经济也依旧保持其旧时代的特征。1856年在这里或许可以充当划时代的标志，凑巧的是，法国那年在远征克里米亚的战争中(1854—1856年)大获全胜。

还有其他的分界：乡村手工业的缓慢衰落；自1840年开始推广的煤炭⁵²⁹逐步取代木炭的地位。

但是，当马匹仍在城乡各地充当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时(这种工具今天显得实在太慢了)，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旧式农民经济不也继续存在吗？在法国的东部和北部，脱粒机、收割机和打捆机当时都使用畜力牵引。在最早的“铁路”上行驶的货车也用马拉。出租马车1914年仍是巴黎的交通工具，出租汽车那时刚刚出现。尤

其，在东部和北部的乡村中，马匹更长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得到普遍的使用。法国军队在1939年仍用马匹拖运辎重：口径为75毫米的大炮还像1914年那时一样用马牵引，骑兵和炮手就坐在弹药车上。

界石和标志可见在前进途中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如果同意这一认识。人们将会看到农民经济在法国境内的消失竟是惊人的迟缓。这种旧经济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将成为我国近期历史上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在考察这些问题时，历史学家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从今到古地对历史进行逆向追溯：他们着重考察为眼下实现的变革事先作好准备的进步征兆。另一派包括我在内（我是专攻16世纪史的历史学家），则是从古到今按时间顺序进行研究，他们着重要发掘昨天和今天的相似点，并且专心致意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比较。

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那就是兼顾两派的主张，即认为现时既是过去的继续，又是未来的先导。根据这个双重标准，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就很难进行考察。我们还是不要勉强去划定一条绝对的界线为好。

普遍的进步及其挫折

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从19世纪初期到今天，法国的经济生活处在持续的、普遍的进步之中，经常超出农民范围之外的所谓“农民经济”在近三四十年期间（“光荣的三十年”或四十年）已被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所冲垮。从此以后，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偶发事件、灾祸、困难和亏欠都定期被克服或被弥补。莱昂斯·德·拉韦涅⁵³⁰在1870年已经说过：“1815年以来，国家的蓬勃兴旺即使不是从无间歇，至少也没有出现长久的停顿，发展有时甚至表现为迅猛的冲刺。对外贸易翻了四番，工业生产翻了三番，进步相当迟缓的农

业也几乎翻了一番。”不断积累的财富随时为今后的进步提供后劲。法国人的平均财富,根据遗产的数字计算,自1925年至1914年约增加了3.5倍⁵³¹。就巴黎一地(并非整个法国)作个计算,则是增加了8.5倍⁵³²。首都的优越地位使我们联想到,经济进步并不同等地提高全社会的财富水平。在19世纪,某些社会阶级的收益飞速猛增,达到令人不可想象的高度。与尖端产业相联系的实业界人士就是如此:古尔曼家族(化学)的利润在45年内(1827—1872)增加了57倍;诺厄煤矿公司在20年内增加了23倍⁵³³……再想一想欧仁·施奈德,人称欧仁一世,克勒佐王朝的创始人,身兼政界要职的法兰西银行董事;从1837年开始到1875年去世为止,他的收益使他的财产平均每年净增11%(即每6年翻一番)⁵³⁴!可是,在19世纪的前75年期间,法国人均收入勉强才翻了一番。地租翻了一番或两番,这对小产业主和佃农十分不利,特别是农产品价格到1840年为止竟在下跌。1840年后出现了一次转折:地租有所下降,农业收益“猛烈上升”。然而,收益的上升也不过是在30年内翻了一番,并且还导致了一场危机;受益者最终只是经营直接面对市场的少数农户,其他农业经营者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⁵³⁵。

实际上,在经济高涨的条件下,处境最不利的人所受的痛苦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人数众多,特别在乡村中。我认为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的受害者,是相对贫困化的受害者。

除了广大的农民和市民以外,法国历来还有大批无业游民和乞丐。这些穷极潦倒的人早在中世纪已可见到。他们始终就存在着,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人数成倍地不断增多。在路易十四当政期间,“伟大时代的阴暗面”并不真如费利克斯·盖夫在其名著⁵³⁶里所说的,是那些诡计多端的冒牌金融家,而是这群衣食无着的穷苦人;他们在冬季向城市集中,在夏季往乡村分散,所到之处,往往惹得鸡犬不宁。请想一想那些使用烙脚酷刑、勒索财物的强

盗,他们的暴行令人发指;只是到1803年前后,别动队的追剿和军事法庭的无情判决终于把这些横行不法的匪徒勉强镇压了下去⁵³⁷。

游民、乞丐和盗贼在19世纪继续横行法国。各省的省长都与泛滥成灾的乞食活动作斗争。他暂时可以把他们从本省清除干净,并且以此洋洋得意,但流落到外省去的乞丐总有一天还会重返旧地。在有利条件的帮助下,他们在各地出没无常。在1816—1817年的饥民骚乱期间,当局对结帮成群的叫化拦路抢劫深感担忧。官府断然下令对流浪者严惩不贷⁵³⁸。内政大臣扬言:“叫化成群现在已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经与国防大臣和公安大臣商讨对策,我希望尽快解散这些乞丐团伙。”⁵³⁹

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动用武力,这显然表明,某些社会阶层不断处于贫困和苦难的边缘,社会机体的健康有所恶化,经济增长乏力;以上的情形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为止,在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拖的时间甚至更长。

在20世纪,城市的召唤终于使这些流动人口逐渐离开乡村。涅夫勒省议会1907年仍然指责“沿着大路不断外流”的游民“以偷盗为生,恐吓乡村居民,经常在城市制造事端”,成为传染病菌的媒介⁵⁴⁰。同样,在热伏唐这个贫困地区,刑事诉讼提供了有关流浪者盗窃抢劫案件的详情,“直到1910年后,他们终于彻底离开洛泽尔省,前往城市定居”⁵⁴¹。古老的法兰西,法国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一直延续到距今不久的过去。

在19世纪,有人大概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社会的严重性。居伊·图利耶以1850年前后的涅夫勒地区为例,介绍了当局与批评家之间展开的辩论:当局对平原地区农民的劳动条件、职业疾病、体质羸弱、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和乞丐患害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主张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行政措施;批评家们则大声

疾呼,指责社会不该遗弃“在工业庆宴上未能找到一席之地”的人,“2 500 万人……指控法国的立法和习俗亵渎人道”。⁵⁴²一位热心的省长于 1855 年决定设立“一项公共慈善基金”,要求地方绅士变私人施舍为自愿捐献,每隔 5 年捐献一次,由地方当局定期征收和保管。捐献的现金和实物最初相当可观,后来逐渐减少,乃至完全消失,因为事实证明,这项措施“不能禁绝行乞”;总之,问题很大,成效甚微⁵⁴³。

技术先行

然而,农业技术却在稳步前进,这方面的进步不一定引起哄动或惹人注目,开始不一定立见成效,但持之以恒,却能破旧立新。

首先是工具的改进。就轮犁而言,必须把 1824 年放在醒目的地位;马蒂厄·德·栋巴勒于该年在洛维尔(默尔特省)开办了农具制造厂⁵⁴⁴。美国的马克·科米克式收割机在 1855 年博览会上首次展出;这种机器逐渐得到了推广。蒸汽打谷机早在 1851 年已开始使用;尽管噪音令人震耳欲聋,蒸汽打谷机却迅速得到传播,但并不因此淘汰马拉打谷机,后者至少直到 1914 年仍在使

用。这些机器将不是在朝夕之间所能普及的。它们的价格又十分昂贵。直到 1852 年,在法国中部和西部,甚至在沃克吕兹地区,仍以步犁居多。就在同一年,“在最适于使用轮犁耕作的阿维尼翁区,不装前后轮的犁(步犁)共有 3 972 台,而装后轮的犁和装前轮的犁则分别为 737 台和 385 台”。在该省的山区,则是“清一色的步犁”⁵⁴⁵。即使到 1921 年,黑色阿马尼亚克地区“割麦既用小镰刀和大镰刀,又用割谷机”⁵⁴⁶。割谷机一路割倒的麦秸随后还要用人工捆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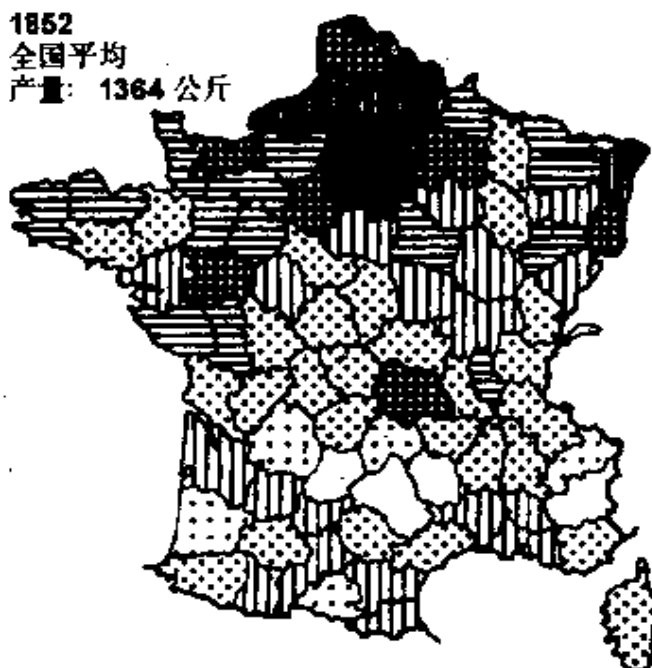
机器毕竟逐渐在扩大阵地,在法国东部,联合收割机于 1914 年前已普遍使用。人们在收割前夕总要检查机器的各个齿轮,整修

待用；马蹄铁匠并不始终能把机器修好，他们的焊接技术太差，只是满足于把破损零件的裂缝焊住……幸好机械材料还算比较结实。整个庞然大物（这是当时的形象）并没有发动机，而由三四匹马牵引和带动。在实行三区轮作制的成片麦地里，割麦时首先就要把准备收割的麦地同邻近的土地分开，在地边腾出一条可供机器自由通行的小道，然后一圈挨一圈地进行收割。这在默兹省被称作“开道”。人们用镰刀开出的“茬道”，其宽度与割捆机相等，因而作为序幕，收割仍然采用以往的方法。男女农民跟在收割者的后面，把割倒的麦子捆成小把，暂时搁在一边，等到“茬道”开通以后，再把麦捆堆成大垛。以上的办法直到 19 世纪初依然在默兹省盛行⁵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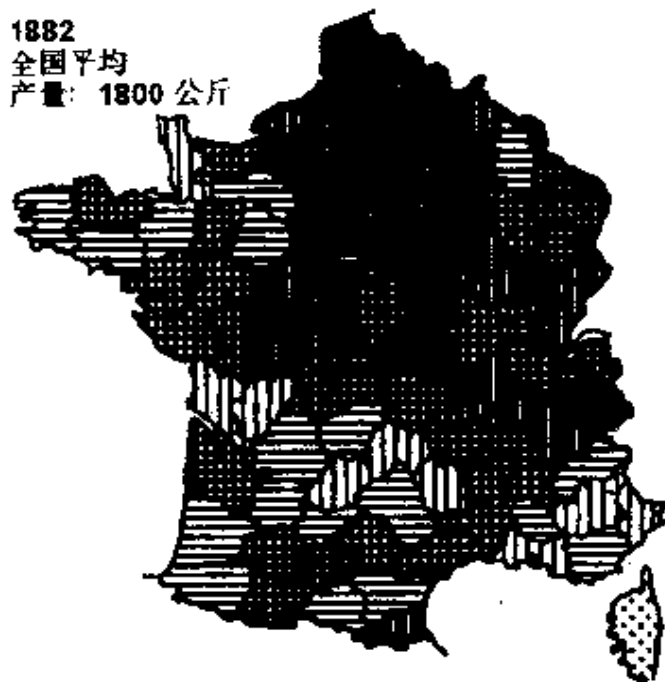
新机器引起了哄动，但它们的作用恐怕也往往被当时的人所夸大。对法国农业状况十分熟悉的格里尼昂农学院教授达尼埃尔·左拉 1913 年写道：“机器的使用有效地抵销了我国农村中工资的上涨，这无疑是个事实。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宜过分夸大农业机械所起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人力劳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削减劳动力的开支而改变耕作制度（即克服轮作的弊病），在瘠地植树，或把耕地改作人工草场，其效果会比最完善的工具所起的作用大得多。”⁵⁴⁸机械革命，即内燃机的问世，在我国将是更晚一些时候发生的事。

至于使用肥料的好处和作用，恐怕也应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以为，除增加粪肥外，最重要的还是不断追施土灰和石灰。在 19 世纪，曼恩省以及其他地区的石灰窑成倍地增多。至于土灰，只要具有足够的劳力进行采挖、运输以及像粪肥一样撒在地里就可以了。这是一项繁重的活计，但农村有的是人，劳力并不缺少。1857 年前后，塞约—马恩省的鲁夫赖村有一个大农庄（面积 250 公顷），农庄主“在一半土地上施洒土灰，平均每公顷洒 50 立方米”⁵⁴⁹。蒙

1852
 全国平均
 产量: 1364 公斤



1882
 全国平均
 产量: 1800 公斤



小麦产量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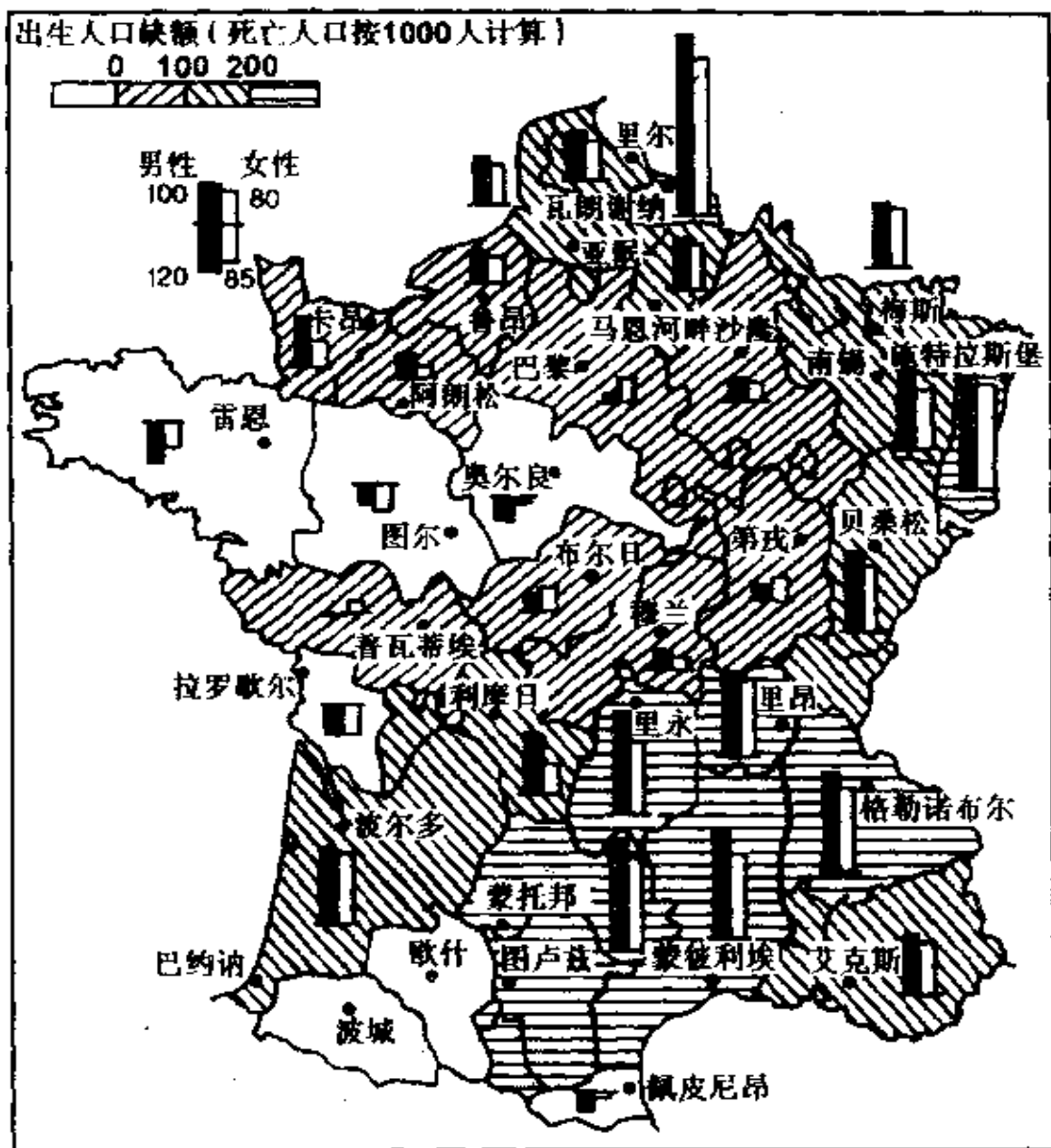
在 1850—1880 年间,小麦产量普遍有所上升,但各省之间原有的水平差异并不因此立即消失。(参见费·布罗代尔和厄·拉布鲁斯:《法国经济和社会史》。)

莫里永地区在 1830 年前后有一半土地被荒原所覆盖；在随后的 25 年期间，由于使用石灰和土灰施肥，荒原的面积有所减少⁵⁵⁰。这个例子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里显然是个贫穷和落后的地区。

智利的鸟粪肥、高磷酸盐、硝酸钠、羊毛粗脂和硫酸铵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它们分别于 1850 年、1867 年、1882 年和 1900 年被介绍到法国⁵⁵¹。这些新引进的肥料将慢慢普及，大批进口为时已晚，落在 19 世纪早期农业进步的后面。总之，可以肯定，1785 至 1850 年乃至 1870 年的进步仍是依靠老一套的手段和方法完成的。不断在扩展中的人工草场，其作用无疑比使用新肥料更加重要。拉韦涅在谈到 1789 至 1859 年间的农业生产进步时指出，荒地只是减少了 4%，“为时极长，成果甚微”，而耕地的利用却发生了彻底的改观。特别重要的是“块茎作物”（甜菜和土豆）的占地面积已由 10 万公顷增加到 15 万公顷，黑麦种植逐渐被小麦所取代，休闲地几乎减少了一半——从 1,000 万公顷下降到 550 万公顷——而人工草场则由 100 万公顷上升到 250 万公顷⁵⁵²。休闲地的减少自 1860 到 1880 年⁵⁵³将逐年加快速度。

总之，进步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产量水平很不均衡，与今天的情形相比，显然还很低下。然而，从 1815 年到 1880 年，产量的缓慢提高却是持续不断的和普遍的，尽管地区间的差异仍旧得到保持（见 164 图）。以 10 年为期进行计算，法国小麦的平均产量由 1 050 公升提高到 1 500 公升，约增加 40%⁵⁵⁴，但仍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水平：1886—1889 年间，尽管北部省的产量为 20 公担，“全国的平均产量不超过每公顷 11.8 公担，而德国、比利时和丹麦的平均产量则分别达到 15、18 和 25 公担”⁵⁵⁵。

正是农业落后和产量低下才使古老的农民经济在法国久盛不衰，一直延续到距现代不远的过去。安德烈·戈龙正确地写道：“法国社会直到 20 世纪中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农民社会和乡村社会



新作物的不均衡分布(1787年)

从展现 1787 年法国出生和死亡的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区差异:有些地区人口减少(雷恩、图尔、奥尔良、拉罗歇尔、枫皮尼昂),有些地区则明显超过平均数,人口有所增长。这一人口自然增长优势可能与这些地区推广玉米和土豆等新作物有关。(参见费·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的阶段。”⁵⁵⁶必须等到光荣的三十年(1945—1975)的急风暴雨才使法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国的地位。

法兰西乡村的落后有许多原因。非同质性无疑是原因之一:不

同地区、不同地方的历史、演变和进步都不一致，甚至并不近似。法国像部队一样浩浩荡荡地向前迈进，但前进的步伐却从不整齐划一。捷步飞奔者一路领先——关于这些得天独厚的地区，我谈得很不够——，但慢吞吞地落在后面的却占多数：落后者拉了整个乡村的后腿。难道法国乡村的命运和落后完全应由它自己负责吗？“农民经济”并不仅仅包括法国的农业，而且还涉及法国的工业和商业，正是农工商三业的总和才体现出经济的普遍高涨。这是下一章所要论述的题目。

第四章 上层建筑

贸易、加工制造、流通、公共信贷对国家的繁荣都是不可或缺的部门……但每一个部门都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相互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在保持比例关系的条件下，各个部门才相辅相成；不然的话，只会造成互相损害。

伊萨克·德·品托¹

“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分别体现社会的上下两个层次”。这个简便的划分要服从以下几项条件：不能认为划分是理所当然的或完美无缺的；在考察所谓农民经济的上层建筑时，不能忽视下层基础的存在；范围极其广阔的下层基础在整体中占多数，由于巨大的惰性和顽强的静止不变性，它很难适应接连出现的几个时代的要求，即使适应了也显得相当勉强。相反，上层的经济活动由于在很长的时间内数量不大，比较容易顺应时代的变化。经济形势有时更助以一臂之力。用皮埃尔·肖努的话来说：“上层摆动，下层稳定。至少在相对的意义，社会的可塑性位于大厦的上层。”²

这种摇摆难道是上层建筑的显著特性？我们在陆续考察以下因素时将作出判断：城市的作用；流通的性质；手工业和工业不同的、可变的地位；最后还有商业、形形色色的信贷以及资本主义本

身几百年间的存在。既然所谓农民经济是这些静止不变的下层基础和不断演变的上层建筑互为矛盾的整体,我在考察过程中将试图指出,对抗、聚合和水平差异始终同时共存,互为伴侣。经过长期的演变,尽管基础部分落在后面,经济的整体终究要发生深刻的变革。那时候,另一种经济,另一个法兰西,便在剧烈、狂暴的变革中脱胎而出。我们只是在不久前刚刚目睹了新生儿的问世。

为了考察上层建筑,在时间方面,我们的论述范围一般(并不始终如此)将比前面几章狭窄些。在这里,明智的做法是以统计数字新提供的事实为依据,这往往就要求我们把18世纪末当作起点;至于1700年前甚至1750年前的情形,我们只能进行描述和推测。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将采用历史追溯的方法。

关于靠近现时的终点,我们在谈到乡村生活时已经说过,确定一个绝对的日期十分困难。就城市而言,终点可能出现在1945年后;工业各部门的终点则分别位于1840年、1860年、1896年、1930年、1940年、1945年……以上这些日期大体上也是贸易、银行、信贷、货币的历史路标。因此,根据解释的需要,我们将在距现时远近不等的地点停下,而对现时,则基本上不再进行分析。我说的只是基本上。

观察为我们经历的和熟知的现时,怎么能脱离开长时段的视野?即使长时段的视野只是一种默契,它毕竟展现在读者和作者的头脑中。它的好处在于使观察具有时间的广延性;由此观察到的运动必定与现时向我们提出的并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自动地联系起来。

一 首先看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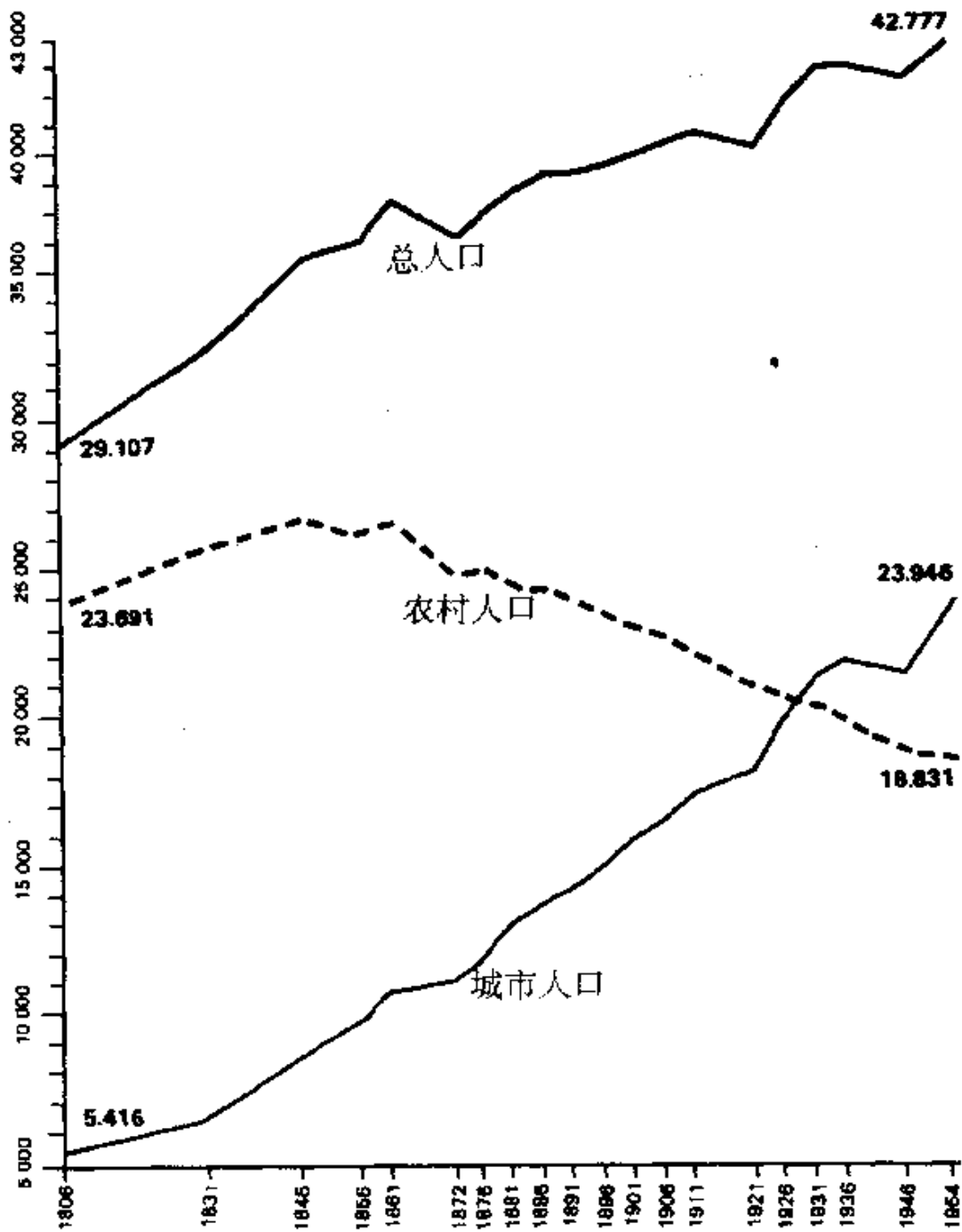
城市是法兰西历史演变的路标、阻力和动力。我们不得不又回过头来再谈城市，首先，经过许多历史学家的考证，城市的历史可追溯到相当久远的过去。人们由此对令人难以捉摸的长时段的准备过程将一目了然，并且在追溯过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此外，城市的历史显然可以举一反三：毫无疑问，城市确实就是上层建筑（而且远远超过一般所说的含义）。

在城市和村庄之间，自古以来就穿插着一个不能抹掉的边沿区域，一道如比利牛斯山那样的屏障；正如人们所说，一山之隔，天渊之别，实际上，城市世界的优越只是与邻近的乡村世界相对而言，乡村世界本质上不同于城市世界，尤其它很早已经处在城市世界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作为上层建筑，高高在上的城市体系要由在下层承受重压的农民世界作出解释。

一条古老的和暂时的浮动线：10%

真是咄咄怪事，城市和乡村的人口比重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倾斜。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城市人口曾长期大大低于乡村人口，这种情形在法国一直延续到1931年为止¹。请读者切莫忘记这个晚近日期，特别是如果你对此感到意外。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提示。

城市尽管人口较少，却享有几个明显的有利条件：村庄布局分散，并且相距甚远。从诞生那天起，城市就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众不同，必须为求得生存，为维持日常的生活而进行斗争。城市居住集中，彼此依傍，便于防止不测事件；城市必须不断维护、保存和利



1806—1954年间的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

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在1931年恰好相等。图示的人口数以1000为计算单位。(材料来自Y. 蒂戈:《人口增长与城市建设》,1975年版。)

用它很早夺得的权力、文化和各种财富。这些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真理都具有长时段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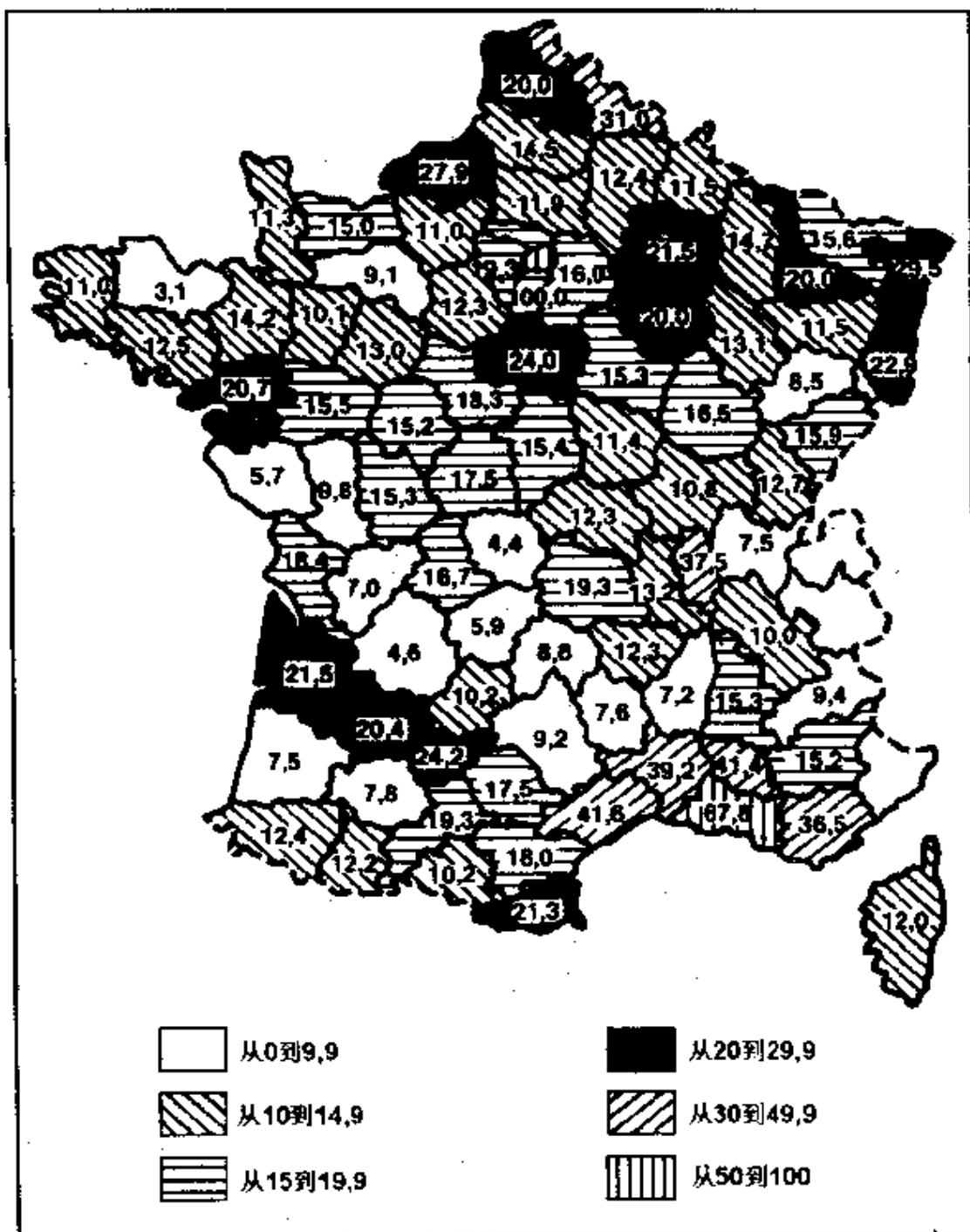
大体上讲,1450至1500年间(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把这

个时期当作起点)的农民至少等于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九,占全国的绝大多数。这是我凭空设想一个比例数,但恩里克·巴什泰尔⁵对15世纪德国人口所作的计算同它不谋而合。这个数字——城市占十分之一,乡村占十分之九——显然只是一个大致正确的概数。略多一点也罢,略少一点也罢,它毕竟具有“指示性”的价值:当时在10人中有9人在村庄中生活。

然而,请不要因此以为,所谓农民经济从一开始就必须确保这个最起码的比例数,似乎只是当城市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时候,农民经济才开始运行!其实,我们在1450年或1500年可以测出的这个水平,只是反映着当时的法国已处在农民经济的前进阶段;据我看,在百年战争才刚结束的当时,这种趋向可以证明,经过历时已久的演变,农民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

我们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别的国家为达到略高于或略低于一与九之比的水平,要比法国晚很长的时间。1812年正是拿破仑对俄宣战的那年,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共有居民81.1万人;城市(其中以里加和雷瓦尔的地位不容忽视)仅有6.6万人;就拿以上数字作个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出:城市占8.1%;乡村占91.9%⁶。在比这早将近20年的1796年,国土辽阔,经济落后的俄罗斯正在不断发展,但其城市人口仅占6%或8%⁷。读者从171页图可以看到,在第一帝国初期的法国某些省份,城市人口的比例还是很低:北部滨海省为3.1;克勒兹省为4.4;多尔多涅省为4.6;旺代省为5.7;科雷兹省为5.9,等等。作为比较,根据《末日审判书》的记载,在英国(1083—1086年)的150万居民中(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11.4人),城市占7%;三个世纪以后,在1377年居民达260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城市人口占10%⁸。

至于中国,在1949年的5.42亿人口中,城市居民仅占10.64%。后来,到了1982年,城市居民在10亿人口中已占



各省城市人口的比例千差万别(1806年)

转引自 Y. 蒂戈:《人口增长和城市建设》,1975年版。

20.83%。这一发展确实神速,不过它是不久前发生的事,符合当今世界的快节奏⁹。假如能够亲眼看到城市化的开端(如果真有开端的话),那当然是令人神往的。但即使在法国的热伏唐(今洛泽省)

和维瓦赖¹⁰(今阿尔代什省)这些不发达地区,我们也别打算找到现成的答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观察到城市的起源。

总之,在查理七世或路易十一的时代,约占总人口 10%的城市居民是个不容低估的数字。我甚至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出以下的推测:在黑死病和百年战争肆虐以前将近一个世纪的圣路易时代,欣欣向荣的法兰西王国可能也还没有超过这一城市化水平。法国人口在圣路易时代约为 2100 至 2200 万,而到路易十一即位的 1461 年,则为 1200 至 1300 万,前者肯定比后者更多。可是,1350 至 1450 年间,法国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这主要表现在乡村。在百年战争的动乱期间,城市有深沟高垒的保护,即使毁坏后也能及时修复,日子也比“无险可守”的乡村好过得多。圣女贞德童年时不是曾在讷沙托城内避难的吗?死于黑死病的人无疑是城里人多于农民,但城市的吸引力竟是如此巨大,那里的居民可以陆续得到补充,而乡村的人口相反却一落千丈¹¹。

城市的地位不断壮大

除开个别例外,中世纪的城市毕竟规模不大,它们刚刚从乡村中冒出,还没有真正确立对乡村的统治。为使“城市的市场……调节整个周围地区的经济生活,并按照城市的要求改变其面貌”¹²,尚需待以时日。至于通过城市与城市的关系提高整个城市网的地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城市的崛起是个缓慢的过程。城市资本主义当时虽说已经出现,但还处于起步阶段。一句话,我们不宜把城市达到羽翼丰满的时间定得太早。

当然,早在 14 世纪以前,法国的城市已在前进道路上获得了自由和权利(城镇特权),并创建了崭新的行政体制。但是,一方面,它们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遇到了“教会和国王两大权力机构”的抵制,而後者的结构则比前者更加牢固。因此,不管是否愿意,城市势

必“被纳入到领土国家的范围中去,而国家的政治追求却超出城市的眼界和利益的范围”¹⁴。这就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困难。另一方面,自治又导致城市愤台高筑,为数之大竟与它们的收益不成比例¹⁵。最后,在历时长久、灾难深重的百年战争期间,城市虽然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但它毕竟受到当时恶劣环境的冲击,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如果说进步,最重大的进步就是城市在百年战争期间逐渐在摆脱领主制的桎梏¹⁶;城市解放的意义非同小可,尽管直到旧时代的末年,领主制仍顽强地、持久地保留着若干残余。

1450年后,国内恢复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城市便以崭新的姿态,生机勃勃地重新发展起来。各种有利条件一应俱全:人口的猛烈增长,农村生产率的飞跃进步,农业生产的迅速复原,此外还有城市经济活动的繁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再次活跃¹⁷。从14世纪中叶开始,“工业品”(城市产品)的价格日趋上涨,而农产品则价格疲软¹⁸。价格“剪刀差”的扩大有利于城市。随着16世纪的复苏和腾飞,表现为通货膨胀的价格革命支撑着以城市为首的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¹⁹,城市的地位更加重要,城市人口不断增多,逐渐向关厢扩展,城市很快能够对四周缺乏防卫力的乡村颐指气使。

威纳尔·桑巴特²⁰认为,16世纪的这场“价格革命”之所以发生,城市所起的作用至少等于甚至超过美洲贵金属大批向欧洲涌来;城市里集中了日益增多的货币和动产,因而通货膨胀是在城市的推动下出现的。桑巴特的看法部分合乎实际。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历史学家历来讲述的价格史主要是城市物价的演变过程,或者不如说,是往往高踞在农民生活之上的“上层经济活动”。

但是,我们不要用今天的现实去推想当时的城市活动。哪怕只是为了不饿肚皮,这些城市还将长期依靠自己,还将在它们自己的土地上,挥汗劳作和维持生计。城市不得不“与农业活动保持密切的联系。市内依然展现田园风光,街上还可见到三五成群的牛羊,

以及大量的家禽和猪,猪居然承担着扫街的职责。鉴于城市居住十分拥挤,市政设施极其简陋,街道又不铺石子,十分需要猪从事这项工作。城里和近郊都有大小不等的园地,栽种葡萄或蔬菜,甚至还有大田作物。在贵族府邸或教士住所的附近,也修建了一些观赏性的花园。最后,城市的外围是皮革和羊毛工匠的聚居地”²¹。以上是对12世纪法国城市的描绘,它对16世纪的法国城市也同样适用;贝纳尔·歇瓦利埃在他的近著²²中主张按原来的名称把这些城市尊之为“城邑”,并试图估测它们直到宗教战争的长期动乱为止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

假如能够找到数字,那显然会比泛泛的介绍更加使人满意。历史文献凑巧向我们提供了远在1437—1438年的有关阿尔勒的几个数字。当时,阿尔勒城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农夫、壮工、畜群主、羊倌、渔民、猎人和“樵夫”;他们依赖阿尔勒辽阔的土地为生。“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居民中,几乎所有人都拥有一小块葡萄地,或至少从事葡萄种植”。路易·斯图夫由此得出结论说:“阿尔勒是一个从事经营土地的城市”,“一个农业性城市”²³。

在随后的若干世纪里,所有的城市都有与阿尔勒相同的经历。巴黎的葡萄农在采摘大忙季节到来时总要让整个首都乱哄哄地热闹一番。农业活动的进入城市,恰巧证明了劳动分工尚不完善,城市的专业化也还不够,这种状况至少一直保持到旧制度的末期,甚至更晚一些时候。这个缺陷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城市与国王

另一个缺陷历时也很长久,就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城市一方面在夺得自由,另一方面却在丧失自由;这有时是心甘情愿的,有时是并不愿意的。因为,在百年战争结束后,随着查理七世(1422—1461年)和路易十一(1461—1483年)二位君主的励精

图治,王权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国王从此又玩弄手腕,施加压力,打击城市的自由要求。

特别在路易十一就任国王后,压迫和控制变得愈加深重。城市稍不从命,就立即遭到严厉的处置,国王甚至出动军队强制城市服从。昂热、贝桑松、多勒、阿拉斯、康布雷、瓦朗谢讷、杜埃、奥梅尔、佩皮尼昂等城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请想一想在阿拉斯展开的惩戒行动:阿拉斯于1477年被占领后,大批居民于1479年横遭驱逐;城市的名称也被更换,并且召请别地的人移居这里!据说,这样做是出于王国安全的需要,但终究失败了。尽管如此,阿拉斯也不得不屈服于武力²⁴。

为使城市服从命令,不一定只是使用暴力。路易十一也力图拉拢权贵人物,唆使他们与小民百姓抗衡,同时又竭力把城市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某个小集团的手里,而争取这少数人也就比争取结构紧密的行政机构容易得多。城市内部因此便形成一个狭隘的政治集团,或不如说一个贵族阶层,他们世代相传,永远掌握对城市的统治。

这些贵族往往与君主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城市置身于君主的卵翼之下,无疑既是为了抗拒市内的贫民和市郊的农民,也是为了摆脱查理七世重新开征的部分税收。城市日渐成为推行国家政策不容忽视的舆论中心²⁵。因此,君主为争取城市的通力合作,便谋求城市当权人物的支持。未来的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将以此为转折点。最初,城市当局对君主往往表现为顺从、退让,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北方地区,法国的城市也没有朝着曾在意大利、德意志或尼德兰出现的城邦的方向发展,虽说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对建立城邦的要求呼声更高。究竟这是件好事,或者是件坏事?马基雅弗利说道,好处大极了!对于谋求统一国土的法国君主政权

的地位提高，马基雅弗利深表钦佩。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的崛起对我国沉闷的历史没有充分发挥其促进作用。城市困难重重，步履艰难，而国家的贪欲偏偏太大。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由于潜在的矛盾而竭力挣脱羁绊。每当君主制国家遇到严重困难时——例如在宗教战争结束后的神圣联盟期间（特别在马赛²⁶）或者在投石党扰乱期间（特别在波尔多²⁷）——，城市便试图谋求解放，至少重新争得主动。这些图谋每次都因不合时宜而失败。由法兰西的命运所决定，城市没有足够的力量求得自身的解放；说句公平话，我以为城市就像是在恶劣的土壤和自然条件下苟且偷生的植物一样，自己作孽自受罪。

与野心勃勃、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城邦不同，法国的城市韬光养晦，但求安享太平。蒙受历史残酷打击的通常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城市为此扬扬得意，对农民嗤之以鼻。在路易十一治下以及在后来，城市自认为是个免受外部侵扰的清静世界。贝纳尔·歇瓦利埃不禁感叹说：“高墙围绕，塔楼耸立，城门紧闭，这些保障使市民从内心深处相信天下太平，而谁又能够真正说出其中的奥秘？”城市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及储备维持生存：“当市内需求减少和远方市场关闭时，在包税商、公证人、官吏和司法界人士的手里，仍然拥有推动贸易和维持百业生计的许多手段。”²⁸为了过太平日子，城市也就只能压抑自己的雄心壮志。

城市网的确定

1450年的法国城市依然与几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这份遗产随后又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若干世纪。请记住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9世纪（1828年）所说的话：巴黎“绝大部分的街道在弗朗索瓦一世以前已经形成”²⁹。

1500至1789年期间创立的城市为数不多：勒阿弗尔1517年

只是设置了港口,过很久以后才发展成为城市;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城的建立是为了接纳于1544年被查理五世皇帝付之一炬的维特里—佩托瓦小城的居民;苏利于1608年建立昂里什蒙,贡扎加家族的查利在阿尔什的遗址建立沙勒维尔,都只是富可敌国的少数大人物的壮举。唯独沙勒维尔后来才变成真正的城市(直到17世纪初,该城的居民还不到300人)³⁰。黎塞留主教为使自己的姓传诸后世,于1637年创立了名为黎塞留的城市³¹,而在这以前,苏利所创立的城市则以国王亨利为命名,称作昂里什蒙;黎塞留主教不像苏利那样处事小心谨慎。昂里什蒙城到今天已只剩一座别具一格的博物馆,距图尔60公里。

在1661至1682年间建造的凡尔赛宫也是为了追求豪华,根据太阳王的设计,建筑规模宏伟无比,成为“王国的舞台……和祭台”³²。在凡尔赛的四周,一座城市随之拔地而起。宫廷留在凡尔赛使当地颇多受益,也使巴黎丧失某些利益,但巴黎的命运并未真正受到影响。

最后还要指出1666年兴建的几座城市:沃邦在面对大西洋的内陆建造的罗什福尔要塞;在路易港建造的、出让给印度公司的洛里昂城;塞特城(后来成为法国在地中海的第二大港)。我们还不要忘记科尔倍尔在布雷斯特、马赛、土伦进行的改建工程……在沃邦兴建的300个要塞城市中,有些原是从无到有地新建的:1679年有于南格、萨尔路易和隆维;1681年有蒙路易;1687年有路易堡;1692年有蒙罗亚尔和蒙多凡;1696年有位于莱茵河左岸的新布里萨克。在这些逼仄的城市里,“除军事设施外,也容纳一些居民,但为数不多”³³。城市的经济因此毫无活力。

总之,以上列举的新建城市纯属例外,而例外又始终只是证实规律。它们的数量在所有城市中可能仅占2%。

设置城市的地点

凡在高卢和罗马的时代业已建立了城市(几乎都是大城市)或在 11 和 12 世纪见缝插针地发展城市网的时候建立了(复兴多于新建)城市的地方,今天仍然是法国城市的所在地。

城市留在原地不动,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城市的所在地是人们想要摆脱也摆脱不了的联系据点。一个城市若是拥有 1000 居民,甚至不到此数,就必须对外开放,否则便不能生存。它不得不在邻近地区找到水源、食物、木柴、建筑材料以及人力。直到 19 世纪为止的过去,任何城市如果没有外来的人力(首先是附近乡村地区的人)作补充,就不能保证其人口的更新。当然,附近的乡村地区总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要。

巴黎幸而位于一块福地的中央,各种便利条件可以说“应有尽有”。正因为如此,城市方能渡过百年战争的艰难岁月。“与波斯地区不同,当地水源丰富,江河多鱼,森林盛产野物;戈内斯的乡村以五谷丰登而远近闻名;伊西和叙雷纳的丘陵提供葡萄佳酿;可被洪水淹没的浅滩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草场;小小的旺沃村生产的黄油‘质佳味美,为佛兰德和布列塔尼的黄油所不及’;木柴不乏供应;矿藏的数量和品种虽然较少,分布在费里耶尔昂布里一带,但在台尚圣母关厢附近,城市可在采石场开采优质石料。”⁵⁴巴黎四周的乡村到处都长着丰收在望的庄稼,但有时也可见到一些被撂荒的土地。科明尼斯讲述了 1465 年 9 月(正值路易十一与大胆菲利普交战期间)“骑兵队”发生的一次误会:他们在天色已暗的时分抵达巴黎附近,但见那里“枪矛林立,走近一看,却是长得很高的矢车菊”⁵⁵漫布田野,直到城门口为止。

回顾往昔的城市,人们所想到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它被一道城墙团团围住⁵⁶(参见富尔蒂埃尔的《辞典》),城墙赋予它充当城市

的资格。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罗伯托·洛佩斯认为,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在接受记者的采访³⁷时,他曾就此问题幽默地回顾说,“在法老时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一字就是在圆圈中加一个十字,也就是说,城墙内道路交叉”。为与外界联系,城市势必在墙上开设城门,供人通行,但城门也就成为城市的防卫弱点。因此,对外开放的这个出口有时十分狭小:根据沃邦的防卫要求而建造的敦刻尔克城 1708 年“在陆地一侧仅有两座城门,即罗亚尔门和尼厄波尔门”³⁸。出于防卫的需要,这后一座门而且仅在有集市的日子开放。相反,1785 至 1787 年间在巴黎周围建造的长约 23 公里的包税人城墙却有 17 所大门和 30 所小门,大小城门口都设有征收入市税的税卡。不管城门关得多紧,城市首先是道路起迄交汇的地点,此话说来平常,但必须牢记在心。

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显然比较优越。在城市初建的时候,可通航运的水道似乎起了首要的作用³⁹。城市兴旺发达的保障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位于一条通航河流的岸边,当地既是水陆货运的枢纽,又有连接两岸的渡口或桥梁。请看,施特拉斯堡横跨莱茵河的桥梁对货物或部队的畅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昂热位于曼恩河谷的窄口处,通行极其方便;南特拥有卢瓦尔河上离出海口最近的一座大桥;阿维尼翁横跨罗纳河的著名桥梁建于 12 世纪,罗纳河在这里的河面虽然很宽,但因分成两股河汊,水流平缓,使桥梁三分之一的长度建立在河流中央坚实的地基上⁴⁰;在塔拉斯孔和博凯尔之间,狂暴的罗纳河上只能架设浮桥。在 17 世纪,鲁昂也有一座横跨塞纳河的浮桥。浮桥始建于 1630 年,代替原来的大石拱桥,石桥共有 13 个桥孔,部分石拱因地基松软而倒塌。浮桥一直保存到 19 世纪;精巧的桥身随海潮升降,且可自由开合,供船只通行。“路易十六曾亲临观赏”⁴¹。

然而,单有河流仍不足以保证城市的崛起。位于卢瓦尔河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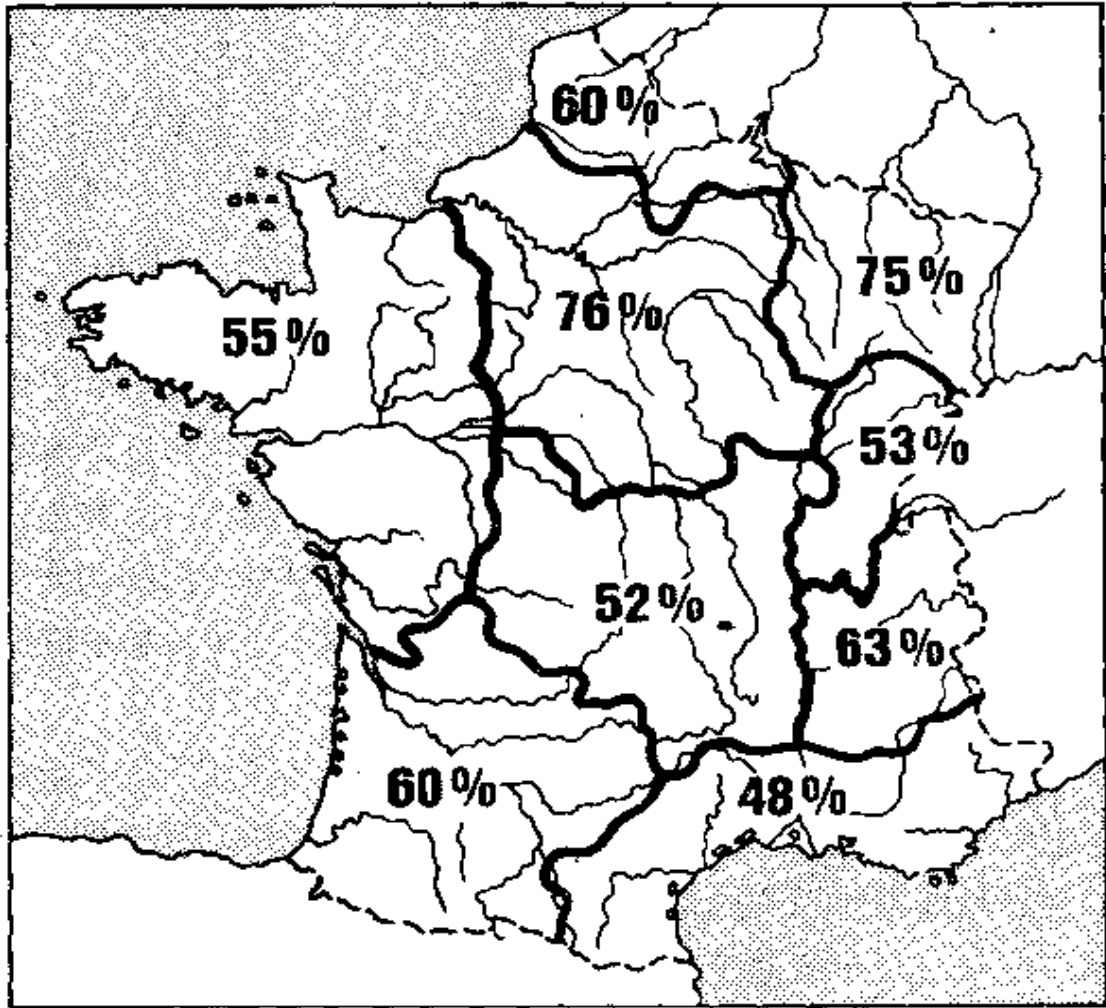
奥尔良一度有幸成为法国历史的中心,但它夹在两块杳无人烟的地域——北边是大片的森林,占地面积比今天更大;南边是索洛涅草木丛生的沼泽地——之间,怎么可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说实在的,再没有别的城市能比奥尔良的历史更加富有戏剧性了。

紧靠大海的城市——位置不在港湾的出口处,而在内陆一侧水流平缓、便于船只靠岸的地方——,如鲁昂、波尔多等,条件自然十分优越。其实,这些城市在外国的吸引下,对外国有所依赖,往往背离法国内地的利益。

不同地区的边境城市,即便夹在平原和山区之间,也势必发展贸易,它们的地理位置同样十分有利。例如,一些城市花团簇拥般地环列在阿尔卑斯山的四周。

然而,除巴黎和图卢兹以外,“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绝大多数都在法兰西‘外围’呈半圆形布局:南特、波尔多、马赛、土伦、格勒诺布尔、里昂、斯特拉斯堡、里尔”⁴²。达让松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常说,王国内陆简直是个虚有其表的“空架子”。

在克服障碍、充分发挥潜力的条件下,地域在城市生活中也起一定的作用。成功与否要靠城市善于牢牢抓住附近的乡村:巴勒迪克于1717年正是抓住机遇(洛林当时还不属法国),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仿制了印布花,并且走私运入法国⁴³;1812年,格朗维尔长期利用20至30艘载重3至18吨的大驳船,捕捞牡蛎、龙虾和大虾,并派几艘船捕捞鲑鱼,最后还从事南特至布雷斯特和迪耶普的近海航运⁴⁴。这样做有时候也有危险,即城市完全靠碰运气,陷于唯利是图的境地。以海岛贸易和贩卖黑人而繁荣的南特,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于18世纪末脱离了与其附近乡村的联系。城乡的背离极其严重,以致资产者决定出售他们的地产。阿瑟·扬大惑不解地问:“南特的繁荣和富裕同乡村毫无关系,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⁴⁵



河流吸引城市的指数

通航河流众多的北方地区看来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具有优越的条件,这或许因为那里的许多新兴工业城市与河流无关,但仍在这张地图上计算比例指数,或许还因为一些真正可通航的河流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地图上因规模过小而没有显示出来(例如里尔的德勒河)。

濒临地中海的南方则相反,一些小河也都见诸地图,贯穿全境的罗纳河吸引许多城市,提高该地区的比例指数。尽管如此,这里列出的仍然是最小的比例指数。

(茹尔·布拉什制图并说明,见《里昂地理杂志》,1959年,第13页。)

克服和冲破障碍,促进交换,扩大贸易,这是开设交易会和发展集市所要达到的目标。例如,在路易十四时代,普瓦图省仅吕松财政区一地就有87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交易会,另有18个每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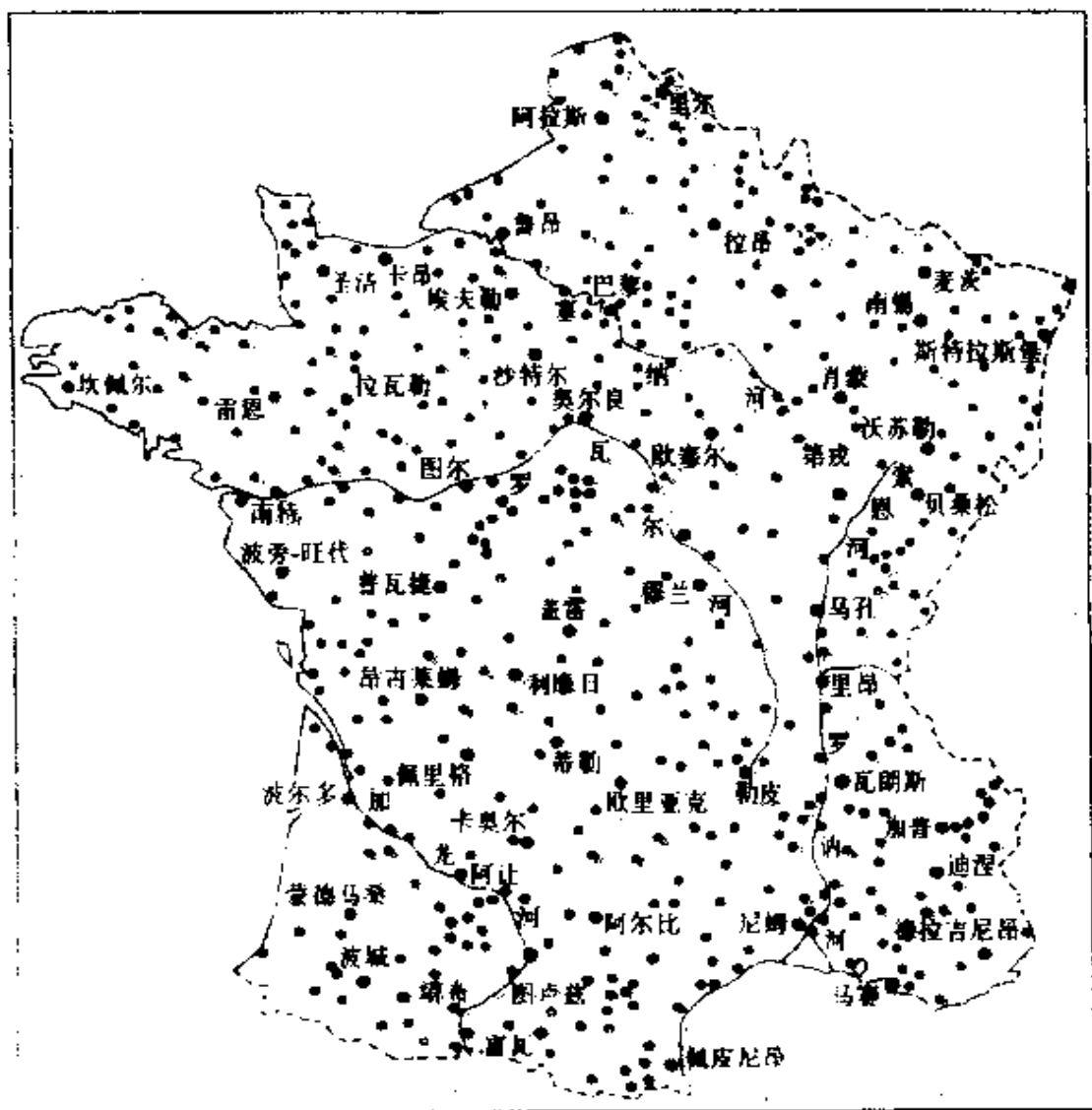
集的集市(18×52=936)。⁴⁶请相信这还不是一个经济高度活跃的地区。

实际上,交易会令人瞩目的繁荣往往只是表明,在某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集镇和小城市力图促进当地的交换。以1815年的沃克吕兹省为例,交易会在经济贫困的地区不断增多(博莱讷有11个一年一度的交易会,瓦尔雷阿斯有9个;马洛塞讷有8个;阿普特5个),而在该省条件较好的西部平原,交易会的数量和重要性却在下降⁴⁷。奥尔南位于法国落后地区的边缘,是汝拉山区卢河河谷出口处的谷物集市,直到19世纪,当地在“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仍举行交易会,一年共24次⁴⁸。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部地区,特别在上萨瓦省,山区的牛、羊、驴交易会历来比河谷和平原地区的交易会规模更大。

城市与村庄、城市与集镇、城市与城市的众多联系不厌其烦地在编织法兰西的物质生活网,而城市则在其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城市的集市是乐队的指挥,是与大宗贸易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纽带,是信贷资金的供应者;教会和国家在城市设置据点;司法、行政机关也以城市为基地,城市是“文字文明”不折不扣的体现⁴⁹。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于1851年写道:城里人和乡下人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两部分人,尽管他们被空前专横的中央集权捆绑在一起,但各自的生活却是截然不同,简直格格不入”⁵⁰。被迫共处的两部分人就这样组成一个整体。作为乡村的寄生者、剥削者,城市支配着乡村,但又把乡村的重要性提高到城市之上。城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单靠城市,仍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兴旺⁵¹。

人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当然,无论过去和现在,城市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要有源源不断



法国在 1841 年依旧是交易会星罗棋布

参见《贸易和商品辞典》，1841 年版，第一卷，第 960 页。

的人口补充。今天城市的畸形发展，它的胃口竟比妖魔还大。往昔的城市因经常存在人口亏空，也需要不断加以补充。为了填补由死亡造成的缺口并逐渐有所发展，城市必须不断吸收商人和资产者等社会精华，更要扩大熟练工匠和一般壮工的劳动力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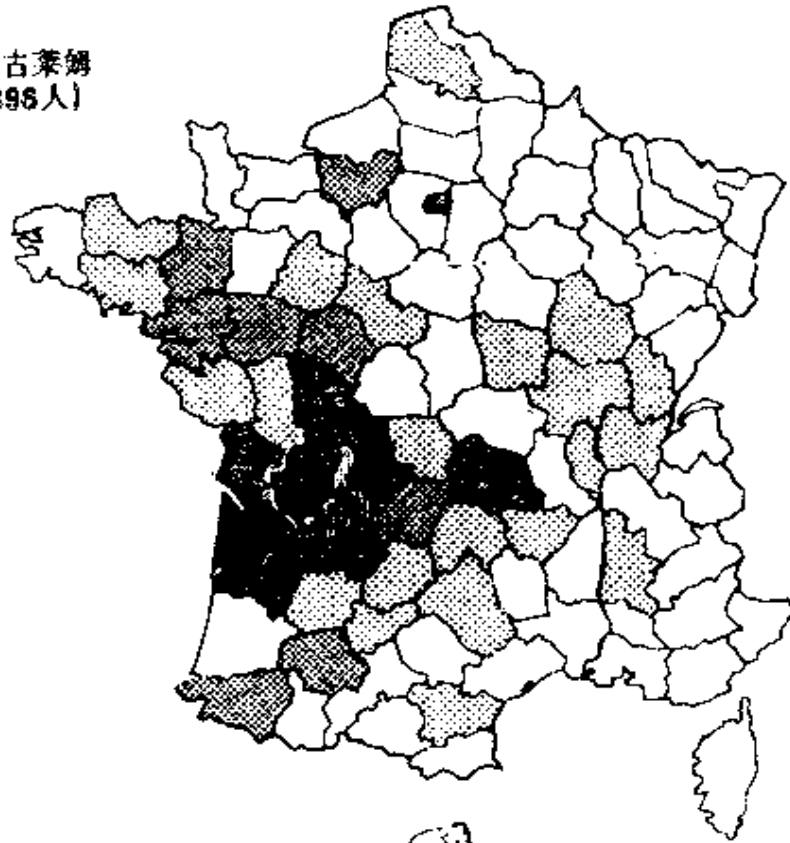
以往的城市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在城市四郊，有时也在很远的地方，招募新人（见本书第三册第 228、229、231 页和第一册第 183—188 页）。许多人纷纷从外

地赶来适应城市的需要。鉴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少，不能算出这些外来者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通过对结婚证书或死亡证书的分析，却可以清楚分辨出他们的原籍。来自远近各地的移民或者住在城门附近的街区，或者根据各自的原籍，集中居住在城市的某个部分，同一个省的人往往还从事同一门行业。巴黎的市区就这样实行分省布局，这既是实行劳动分工的结果和划分社会地位的需要，也是城市接纳移民时自发形成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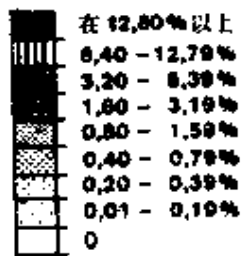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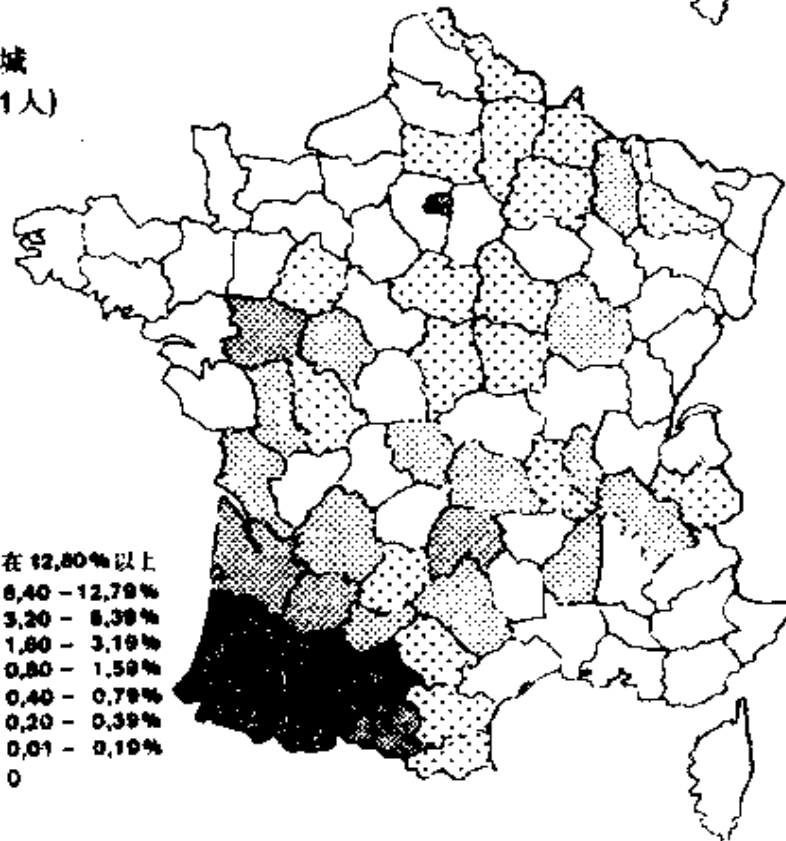
城市劳动力的不断亏损造成了乡村的人口外流；最令人惊奇的是，解决这个在我们看来对城市生死攸关的问题居然十分容易，仿佛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与城市人口相比，乡村的人口确实极其庞大。但是，正如欧洲的人口一样，法国人口的流动性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它能适应经济的各种要求和许诺。就拿阿尔勒来看，这个城市在盛极而衰以后，竟面对马赛、艾克斯乃至艾格莫尔特的竞争，于15世纪末又再次振兴。这次振兴足以使它接纳了众多的外地人，甚至包括来自法国北部的一些人。可见一切都是可能的⁵²。南特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它在16世纪之所以保持人口的持续增长，首先依靠了附近的乡村和布列塔尼，此外还有普瓦图、诺曼底以及直到奥尔良为止的卢瓦尔河流域。南特城内甚至住着一些马赛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以及为数可观的西班牙人⁵³。

当里昂于15世纪末需要劳力时，萨瓦人（他们当时分布甚广，南德意志、南意大利及法国的许多地区都有萨瓦的移民）自然纷纷响应这一召唤。当时有人甚至断言：“里昂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萨瓦人的后裔”；“城市里三分之二的人，即几乎所有以劳力谋生的人，无不来自萨瓦地区”⁵⁴。这肯定是言过其实了：根据确切的考证，萨瓦人1597年在里昂城约占人口的21.2%，但这已是个不容轻视的数字。尤其，这些萨瓦移民源源不断地提供纺织工人，比重大大超过了附近的福雷、里昂和博若莱地区（共占18.3%）以及从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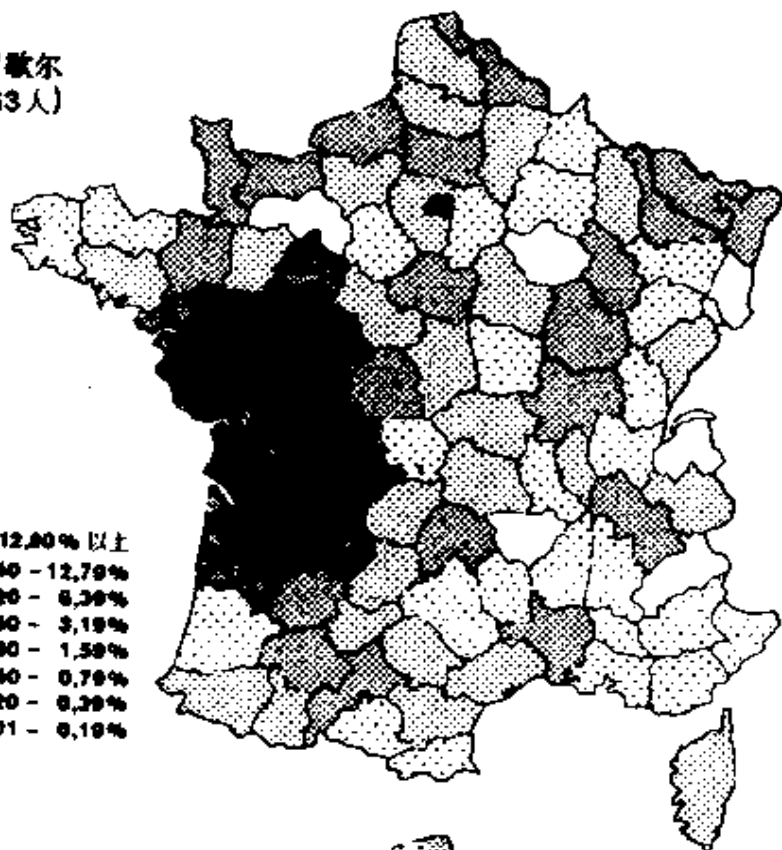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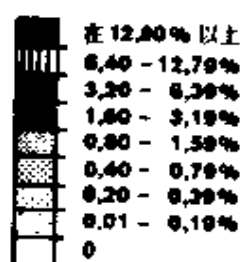
昂古萊姆
(396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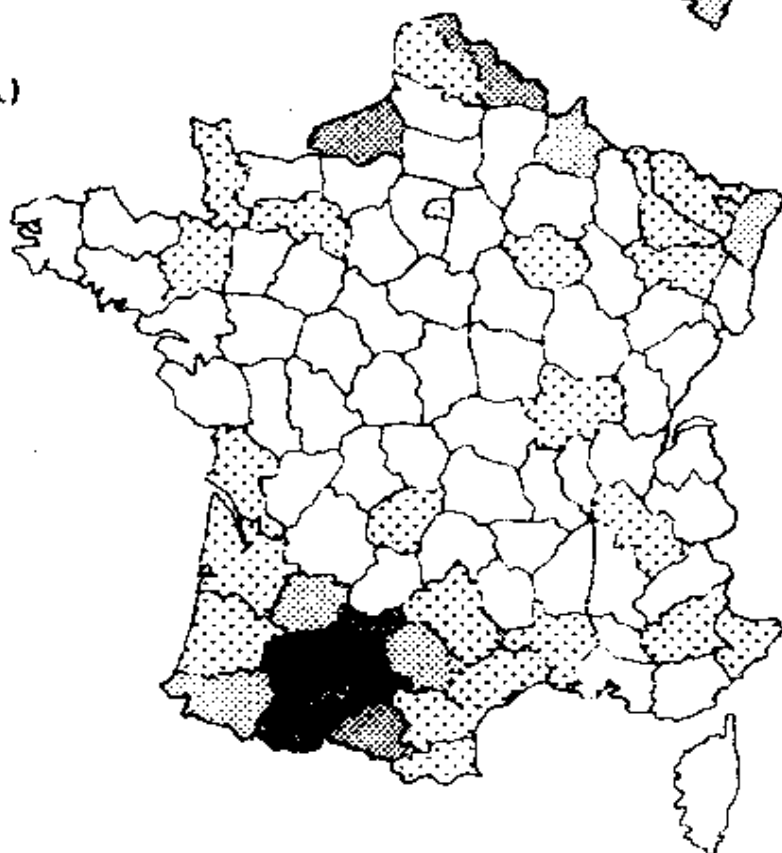
波城
(841人)



拉罗歇尔
(1663人)



歌什
(503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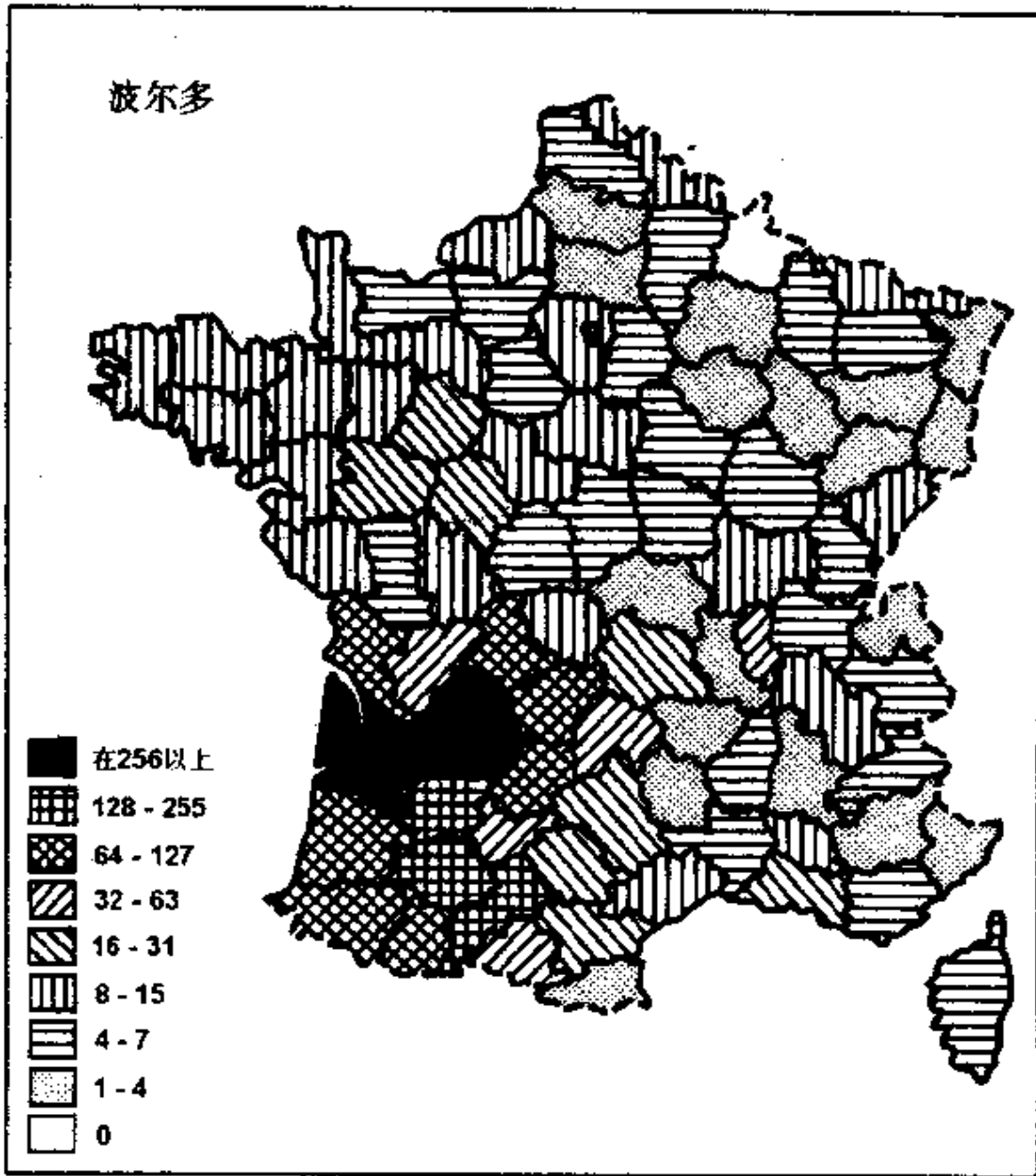
内地区(占 7.2%)招募的工人⁵⁶。总之,庞大的里昂城从外地——有时甚至很远的外地(见第一册第 151 页的地图)——招募的工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里昂的经济活动需要“不断吸收”⁵⁶新人。

我们且不谈巴黎这个胃口更大的庞然大物。萨巴斯蒂安·迈尔西埃在大革命前夕描绘的形象令人难忘⁵⁷:“干粗活的人”几乎全都来自外省,他们成份混杂,其中有萨瓦人和奥弗涅人,利穆赞人和里昂人,诺曼底人,加斯科尼人,洛林人。巴黎的情形理应另当别论。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 18 世纪中叶,当波尔多以法国西南部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魄力,发展其航海和贸易活动时,源源不断地拥来的人流使波尔多的人口急剧膨胀。从那时起,移民不仅来自邻近的吉伦特省,而且也来自更加宽广的区域。他们不完全来自乡村,尽管乡村的人在其中仍居首位。大批劳工,甚至一些大小商人,从其他城市——特别是西南部地区的城市——迁来波尔多定居。然而,以下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即使那些接受向波尔多移民的城市,却对其邻近地区(波尔多在这里招募的劳力为数不多)依旧保持严密的控制。总之,每个城市都拥有一个为它独占的、传统的“人口后备库”⁵⁸。

城市与法国经济

是否可以认为,法国经济发展的落后,物质生活的黯淡无光,责任应由城市承担?我们在上一章里曾援引了雅克·拉斐特的话⁵⁹,他于 1824 年指出,直到 14 世纪,法国工业发展仍被农村拉了后腿。与此相反,难道应该认为,城市在这里也有过错?照这么说,甚至到了 18 世纪,乡村仍然没有在城市的带动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是 18 世纪下半叶的经济起飞才使刚才提出的指控显得无



西南部若干城市里的外乡人

每个城市长期都在一个特殊的地区优先吸收外乡人,虽然波尔多的吸引力超出了整个西南部地区。

(资料来源:让-皮埃尔·普索:《18世纪的波尔多和西南部地区》,1983年版。)

的放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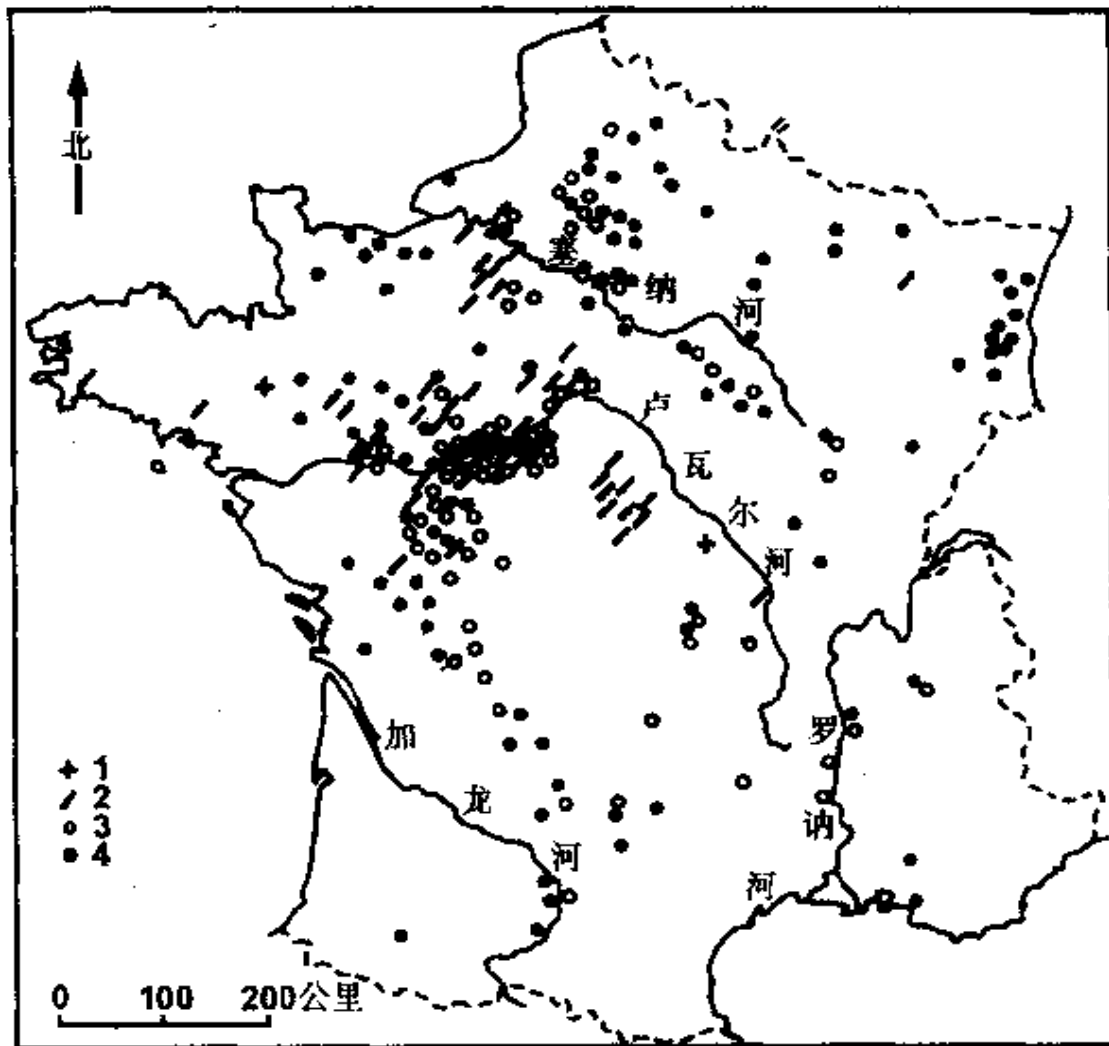
城市在1500至1789年间有所进步,这确实是个事实,但进步

仍然十分缓慢。由于人口普遍的增长,各城市纷纷扩展关厢,增加城市的居民和消费。这一发展趋势在16世纪已经显而易见,到了18世纪更是有目共睹:城市中大兴土木,面貌日新月异;城市挣脱中世纪的襁褓,有时干脆拆毁城墙⁶⁰,开直街道,扩大城区……

新兴的市政建设于16世纪促使君主政府推行“一意孤行”的政策。确实,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虽然尚未全面开花,却已在法国一些地方崭露头角。我们在让-罗伯尔·庇特的著作中借用的一张地图十分说明问题。从图上可以看到这种建筑风格首先在卢瓦尔河流域广为传播;直到1525年前后,卢瓦尔河流域是我国经济活动乃至我国文明的中心,法国国王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只是到1525年以后,由于弗朗索瓦一世(1516至1547年)的偏爱,巴黎才确立了首都的地位,但宫廷仍四出巡回旅行。说到底,首都也不免受到新风格的传染;就在市中心的格雷夫广场,新落成的美侖美奂的市政厅是根据新风格建造起来的巴黎第一座大型建筑物(1532—1549年)⁶¹。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对16世纪的法国城市很少打下烙印;但是,对称、远景、光线、宽阔的大道却从此成为城市建筑的美学准则;这份意大利的遗产将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主义艺术⁶²中大展风采。

到了启蒙时代,对城市建设的喜好不但有所加强,而且几乎遍地开花。让·麦耶写道:“在当时的法国,城区改造工程规模十分宏伟。假如我们把建于1650—1790年期间的房屋暂时置诸度外,那么,在我国今天的城市里——不仅是大城市,而且还有许多小城市——,市中心还能剩下什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当时的市政工程并不是一般的小修小补,而是彻底的推倒重建……从事大宗贸易的波尔多城及其令人赞美的城市布局,正如经斯塔尼斯瓦夫一世美化的南锡城一样,是当时城市改造的成功典型”⁶³。巴黎显然



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按文艺复兴风格修建的新建筑在法国比较少,并且根据君主的意愿,主要集中在卢瓦尔河流域和巴黎地区。

在地图展示的地点,均有一处或数处按文艺复兴风格新建或改建的建筑物,其时间分别是:(1)查理八世治下;(2)路易十二治下;(3)弗朗索瓦治下(1525年定都巴黎以前);(4)弗朗索瓦治下(1525年以后)。建筑物的名单已在奥特克尔的《古典建筑史》(1963年版)一书中公布。

转引自让-罗伯尔·庇特:《法兰西景观史》,第二卷,1984年版。

始终开风气之先:“一切时尚莫不来自巴黎”。建筑工地在巴黎犹如星罗棋布;高耸的吊车到处在搬运建筑材料;泥瓦匠歇工回家途中

在街上留下许多白色的鞋印⁶⁴。

这些活动在 19 世纪仍继续进行,终于导致霍斯曼男爵(1863 年出任塞纳省省长)对巴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外省城市也不甘落后。莱昂斯·德·拉韦涅于 1860 年指出:“勒芒、拉瓦勒、昂热在近 30 年来扩大了一倍,城市开辟了一些新街区,整齐宽敞的房屋正挤占或取代原来那些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富丽堂皇、毫无矫揉造作的新面貌正在城市展现”⁶⁵。

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国家征收巨额税款,尽管城市富人甚多,国家与城市却都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完成这些改造工程,因而不得不放弃一些过于庞大的计划。现有的许多部法国城市史著作都众口一词地谈到“财力不足”的问题⁶⁶。这在蒸蒸日上的波尔多是如此,在图卢兹也是如此(尤其因巡按使不在当地,必要的决定迟迟不能作出);马赛、里昂(扩展贝勒库尔广场)、鲁昂也曾遇到财力不足的困难,鲁昂被迫满足于改造城市外围;卡昂为本市改建工程提供的资金在 18 世纪不超过总数的 10%。

雷恩在 1720 年 12 月 23 日晚间燃起的一场大火,只是在 6 天后因为下雨才告熄灭,火灾过后,城市面临着紧迫的重建问题;地处市中心的上城共有 945 所房屋被毁,剩下的 1367 所房屋大多位于贫困而不卫生的下城⁶⁷。单靠自身的收益,雷恩不足以弥补灾祸造成的损失。

城市于是向国家求援,国王主持的大臣会议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对建筑师和工程师的任命以及对应该制订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无不考虑周到;尽管如此,国家自己却不肯慷慨解囊:“章程定得多,金钱抠得紧”⁶⁸。城市也向省三级会议伸手求援,而省三级会议则一切听命于国王。雷恩被迫举债,推行实物征用制,对从事搬运或砌造工作的农民克扣工价,有时甚至抓差拉夫,与工程师、材料供应商和土地主也斤斤计较地争执不休……

重建工程进展迟缓,原在情理之中;被安置在关厢和幸存房屋中暂住的市民还将长期在那里挤着;灾后不久经当局批准在各处临时搭建的木棚将不顾拆毁的命令,一直保留到1728年。房屋重建将花15年左右的时间,而公共工程的完工则更延续30年之久。这是因为市政当局和建筑师设计的计划过于庞大(计划本身不无争议,拖延时日),致使地产主在多年间彷徨等待,最后因筹集不到必要的资金而搁浅。城市终究只能筹得一部分资金,不足以彻底改造城区,却足以使城市沦于破产。为此,建造水井、铺设水管、整治河流(下城经常受淹)等项旨在改善下城环境的工程终将半途而废。

结果,在1728年,房屋的重建基本仍交原来的房产主负责。工程顿时进展迅速,雷恩的资产者并不缺钱。根据城市的设计,在新广场和高等法院的周围,成片华美的市区拔地而起,宽阔笔直的街道空旷宜人,有钱人在这里建造私宅和供出租的楼房。但在下城以及上城的东部和西部,弯曲、肮脏的街巷仍旧没有丝毫变化⁶⁹。

我们且记住这最后一点:私人的房地产投资。在法国各地,除开局部的市政改造工程外,主要由富人出资,新建了一些私人宅第(无论是在南锡,或者是在贝桑松和里尔)或供出租的楼房。房地产投资肯定收益颇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里,随着人口的增长,住宅危机日趋严重。如同在雷恩一样,主持工程承包的国家在卡昂也终究因“力不从心”而向投机者出让地盘;1770年前后,私人建房与房屋租金同时猛增⁷⁰。

城市建设诚然令人刮目相看,但其规模毕竟还很有限。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拆除了围在城市四周、往往使城市窒息的城墙。雷恩只是等到18世纪末,即在1774—1782年,才取消了城墙。墙体被推倒后,人们又建起了栅栏,以便征收入市税,并制造城市依旧与外界隔绝的假象!尤其,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名符其实地破除中世纪

遗留下来的曲里拐弯和臭气熏蒸的街巷。即使在为高等法院、巡按使署、初等法院、市政厅建造了宏大建筑的城市里，尽管人们为改善引水设施和消除垃圾作出了努力，也没有使城市从污秽龌龊中解脱出来；里昂用驴把垃圾袋驮走；里尔城里污水横流，“清洗街道和运送废水所使用的车辆和木桶往往出现渗漏”⁷¹。所有的城市——甚至在鲁昂、南特、波尔多、里昂、马赛、图卢兹、里尔等住房危机最严重的大城市——都未能真正摆脱旧时代的恶魔。皮埃尔·帕特在他 1772 年出版的著作中心怀忧伤地指出，在这些都市里，污水在“进入阴沟以前”，就在露天到处流淌……“此外，屠宰商把血泼得满街都是……赶上下雨天，你还会发现街头的行人被从屋顶流下的脏水浇得浑身湿透，沿街房屋的布局使雨水平增百倍”⁷²。

究竟法国的哪个城市最脏？据巴什蒙和夏倍尔 1656 年认为，那是纳博讷城；两人照例出生于北方，又都是诗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在诗中唱道：“旧城一片泥泞/污水四处横流。”还有别的旅行家也曾说过：茅厕还干净，高卢实在脏⁷³。读者不要片面相信他们的话：纳博讷之所以肮脏，主要毛病出在城市的地势很低，经常被奥德河水所淹没。至于它所占的不光彩的首位，我们也完全可以交给鲁昂。欧仁·诺艾尔讲到他童年时代的鲁昂时说，城里“臭气扑鼻”，即使在上等居民区，垃圾也“充斥街巷”，“在可怕的圣马克贫民区，但见破败、丑陋的小屋，……阴森、潮湿的小巷简直就是连警察也都轻易不敢进去的迷魂阵……一股臭味从这个垃圾堆里升起，传遍整个城市，甚至在半里地外也可闻到”⁷⁴。鲁昂 1832 年因霍乱蔓延，曾强制居民清扫街道，但福楼拜在致布依埃的信里仍对臭哄哄的街道咒骂不已，这些臭味直到第二帝国期间开阔街道时方才消失⁷⁵。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更重要的问题：房地产投资和私人资本在

18 世纪的城市改造工程占很大的比重,这是否足以表明经济充满了活力?甚至在比这更早的亨利四世时代,建造壮丽的孚日广场是否应归功于城市建设?难道应该人云亦云地认为,“建筑业带动百业的兴旺”吗?

许多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不愿发表意见。罗伯托·洛佩斯⁷⁶曾试图证明:

1、在中世纪末年,北欧地区积累的财富不足与地中海的大城市相匹敌,但北欧建造了宏大的教堂,而南方却没有发展象样的建筑,仿佛它要把钱派更好的用场;

2、在美男子洛朗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建筑和文化达到鼎盛之时,也正是经济开始衰退之日。让·若尔日兰对 18 世纪的威尼斯所作的分析⁷⁷与安德列西·维罗比茨就 15 世纪的克拉科夫所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维托德·库拉站在权威的立场上,肯定了他们的见解:“城市建造豪华的资产阶级住宅与商业的周期性下降在时间上恰相吻合,这在我看来是完全可信的。”⁷⁸

一些已经积累起来的、但又找不到合理用途的资金就这样被胡乱花掉了。我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据一些历史学家说⁷⁹,“里昂市府过去花钱相当省俭,但在路易十四时代却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当时偏偏正是困难接踵而来。如果解释其原因,这显然因为大小城市都很难借到资金。所有的城市无不债台高筑⁸⁰。私人投资的情形又怎样呢?皮埃尔·肖努说,从长远看,人口增长以及随之产生的物价上涨显然促进建筑业的腾飞;15 世纪康布雷的情形正是如此。17 世纪吸收过多移民的里尔也是如此⁸¹。卡昂的巡按使于 1759 年说道:“城里人满为患,找不到房屋可住”⁸²。相反,居住拥挤有时也导致建筑业的停顿,这是 1680 至 1720 年间在鲁昂发生的事⁸³。

可是,建筑与建筑不尽相同。法国各城市在18世纪的大兴土木,是采用优质的石料建造“贵族”宅第。“建造这些笨重的房屋,其目的也许是要解决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的困难……房屋可以比黄金更好地将积累的资金保存下来”⁸⁴。相反的证据是,19世纪工业起步时建筑业的发展却要缓慢得多:在1817至1827年间的巴黎,人口增加了25%,住房仅增加10%⁸⁵;同样,只要经济增长还在吸收流动资金的时候,里尔等地的工人就始终在地窖里和顶楼上挤着⁸⁶。我们这里不正是与罗伯托·洛佩斯和维托德·库拉的见解殊途同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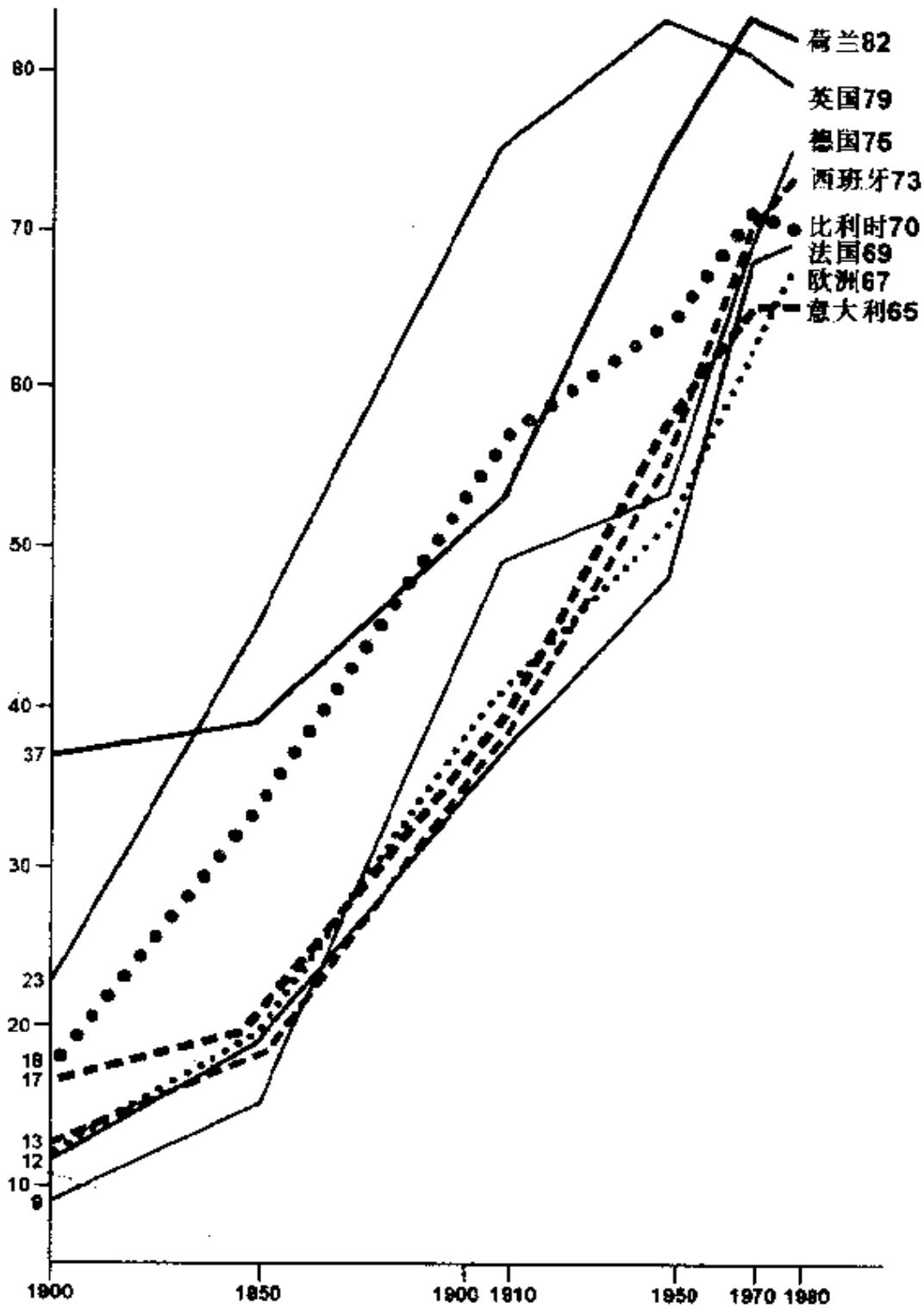
关于城市人口的比重

整个城市的问题在这里又重新提出。从法国经济现代化的角度看,城市的发展甚至在18世纪显然还很不够。城市肯定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联合省、英国等先进国家当时的经济相比,进展仍然乏力。

此外,根据既定的规则——凡人口在2 000人以上的居民点就算是城市——计算出的1 000多个法国城市,它们的人口在1500年、1789年和1809年⁸⁷分别占总人口的10%、16%和18.8%。城市发动机的功率在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内仅仅增加了6个或9个百分点。进展实在微乎其微。

以上数字何况还不一定可靠。

居民达2 000人这条习惯界线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我在上文已经作过解释⁸⁸,这里有必要回过头来再作分析。马赛尔·雷纳尔曾就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考察了这个问题⁸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他看来,假如把人口杠线定在10 000以上,有些城市就不配被当作城市。照这个标准计算,法国的城市不再是1000多个,而只剩76个。包括巴黎在内的76个城市共有居民2 564 000



法国及其欧洲邻国城市人口的比例(1800—1980年)

转引自保尔·贝洛什:《迄今以来的城市与经济》,1985年版,第288页。

人,占法国人口的9%。当然,对于10 000居民这个数字,人们也可能众说纷纭,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2 000居民这个数字与当时法国的经济和人口不再适应,业已扩展了的经济和人口要求有更大功率的城市发动机,以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标准尺度的这一改变提高了巴黎人口的相对比重,不再占法国城市人口(按2 000居民的标准计算)的六分之一,而是占四分之一以上(按10 000居民的标准计算)。首都的责任一下变得更重要了;大家都知道,与伦敦的情形不同,巴黎与海没有直接的接触,不足以带动法国经济阔步前进。法国的经济由若干大城市合力牵引,而在英国和尼德兰,除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其他城市几乎都插不上手。法国城市体系因此缺乏统一和协调,加上当时国土的相对辽阔,力量也就更趋分散。

这里有必要就法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与其邻国作一比较。请看下面的图表。图表采用了保尔·贝洛什⁹⁹计算的数字,与我们在别处提供的数字不尽相同;保尔·贝洛什为一致起见,注意了在欧洲各国实行相同的计算原则。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在1800年前后,法国的比例(12%)落后于英国(23%)、意大利(17%)、尼德兰(37%,创最高纪录),甚至落后于正处在严重的城市危机之中的葡萄牙(16%)和西班牙(13%),但领先于德意志(9%),恰好与欧洲的平均数(12%)持平(法国领先于德意志,这原在我的意料之中)。总的说来,法国还是落在后面。它的城市人口还没有达到足以允许“经济起飞”的比例。直到1850年,它还停留在19%这个相当低的水平。

城市与法国经济(续完)

法国城市陷于人口不足的困境,这多少表明了法国民族地位的低下。难道民族地位的低下是由城市一手造成的吗?我对此不

敢相信。

我不否认法国的城市往往暮气沉沉：许多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慢，但不慢又能怎样呢？我在上一卷书里详细介绍了贝桑松的情形；我还指出过，正如让-克洛德·佩罗在其不久前发表的一部历史著作中所说的，卡昂城仿佛是在“冬眠”。其他的例子还可举出几十个。在我看来，所谓沉睡中的城市就是它基本上满足于依赖邻近的乡村为生：官吏阶级以及少数资产者兼地产主得以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平民大众却生活窘迫，朝不保夕。火灾以前和以后的雷恩城是这样，王国内陆地区的许多城市也是这样；边沿地区的城市通常因地理位置有利，情形自然不同。

昂热具有法国城市最典型的特征。历史学家不久前指出，在1650年，这个“一律有黑色石板铺屋顶”的大城市“百年以来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且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也变化不大”⁹¹。到了1770年，尽管该城居民已达25 044人（其中16 879人住在城内），经济生活仍不活跃。昂热四周的地区农业繁荣，盛产大麻和亚麻。城市位于曼恩河和卢瓦尔河的岸边，具有十分便利的运输条件。但在18世纪，昂热还是很少展开工业活动。当地开办的毛织工场、帆布或印花布制造厂、炼糖厂，通常都维持不了多久。近在城外的采石场（制造石板瓦）也经营不善。原因并非缺少资金，“财主们害怕工业而担风险，宁肯花钱去买地产，收益虽小，但稳当可靠”⁹²。

因此，中等以上的资产者过着“优裕而节俭的生活”，他们“以贵族为榜样，并不常年住在城里：昂热几乎所有的资产者都在邻近的乡村拥有产业，每年有部分时间住在乡下，他们收取的实物和现金占总收益相当大的一个部分”⁹³。与此相反，工匠的生活相当困难，特别是织匠和男女纺纱工，面包师、屠宰工、客店主、染匠当属例外。一个很说明问题的细节：仆役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概括地说，如果仅仅考虑到昂热的特权者，“它便只是官吏、教

师、教士和食利者的城市”⁹⁴。图尔财政区的财务总办断言，在1783年，当地居民仍“沉湎于懈怠，不敢大胆冒险，不谋远大志向，从而更不愿勤劳工作。毫无干劲的新一代像老一代那样得过且过，下一代又将像这一代那样贪图安逸”⁹⁵。以上的判断对我国许多昏昏若睡的城市全都是适用的。

致力于发展工业的城市作出了相反的表现。它们奋力拼搏，施展影响，利用各种时机。然而，鉴于它们的结构各不相同，抓住时机又是谈何容易！

在多数情况下，城市的工业活动向周围的各个村镇伸展。在18和19世纪，至少直到1850年前后为止，乡村工业（原始工业）不断从地处中心的城市，像油渍一般扩散。这是一场革命。整个情景在法国和欧洲各国往往因地而异，花样翻新，仔细观察起来真还必须花点力气。从城市冒出的工业萌芽几乎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城市的控制，甚至完全为城市所主宰。由中心城市的包买商一手组织的乡村作坊就这样在拉瓦勒、勒芒、圣艾蒂安、瓦龙、格勒诺布尔、特鲁瓦、洛代沃等城市的周围大批建立起来。卡尔卡松也同样在18世纪发展了乡村作坊，卡尔卡松当时是法国最活跃的纺织工业城市之一，其羊毛加工堪与鲁昂、埃尔伯夫、卢维耶、兰斯、亚眠、色当等地相媲美。一位巡按使特派员于1731年指出，“卡尔卡松简直就是一个毛料制造工厂，城里住满了从事梳理、织造、纺线和修剪等各项工作的工匠；制造商和工人也密布整个乡村，工业发展过度对农业造成祸害。在毛料加工生意兴隆的年头，就很难雇到工人去葡萄园剪枝或雇到妇女去麦地除草，除非出高价雇佣”。类似的话于1733年也可听到⁹⁶。

鲁昂的情形更富特点。18世纪初，新兴棉织业在鲁昂的建立改变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和纺织产品的方向，“鲁昂布”（一种棉麻混纺织品）不仅在市內生产，而且向“博高原、凯依一带以及鲁穆瓦

和科地区发展,以致诺曼底商会于1707年断言,共有3万农户依靠纺棉纱谋生”。许多商人把成包的棉花——原料从国外进口——送往小村镇分销,如“鲁托、阿沙尔镇以及欧维尔、蒙福尔河畔伊勒维尔等堂区”⁹⁷。尽管如此,鲁昂仍是在诺曼底各地广泛开展的纺织业活动的中心,经鲁昂商标登记的布匹(棉布、麻布或混纺布)数量的急剧增加为此提供了证据:1717年为6万匹;1732年为16.6万匹;1743年为43.5万匹;1781年为54.3万匹⁹⁸。

毫无疑问,棉织工业的竞争终于挤垮了鲁昂原有的毛织业。但鲁昂城生机勃勃,力求进取。面对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它坚守海上贸易的阵地,兴建大小不等的各种企业。印花布、绸带、呢帽、挂毯、针织长统袜、陶瓷、造纸、炼糖、玻璃器皿、制皂、淀粉、鞣革等各种行业在鲁昂全面开花,特别是偷偷从英国进口纺机纺纱,根据贝托莱的新工艺用氯漂白布料,轧制铅材和铜材,制造硫磺和硫酸……鲁昂人不择一切手段,力求采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新技术⁹⁹。

以里昂为例

里昂是18世纪乃至19世纪法国最重要、最有生命力和最复杂的城市,举里昂为例无疑更能说明问题。值得称道的是,在启蒙时代,里昂确立了欧洲丝都的地位。里昂的工匠当时以其精巧绝伦的手艺确保着丝织品的出口,并奠定城市的传统富源。他们针对意大利的竞争——意大利工匠照着向商人寄送的丝绸样品如法炮制,并且模仿得维妙维肖——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对策:聘用专职画师,每年彻底更新图样。当仿制品上市时,在追求时髦的和喜欢挑剔的顾客眼里,花色已经过时,不能再被充当高级衣料¹⁰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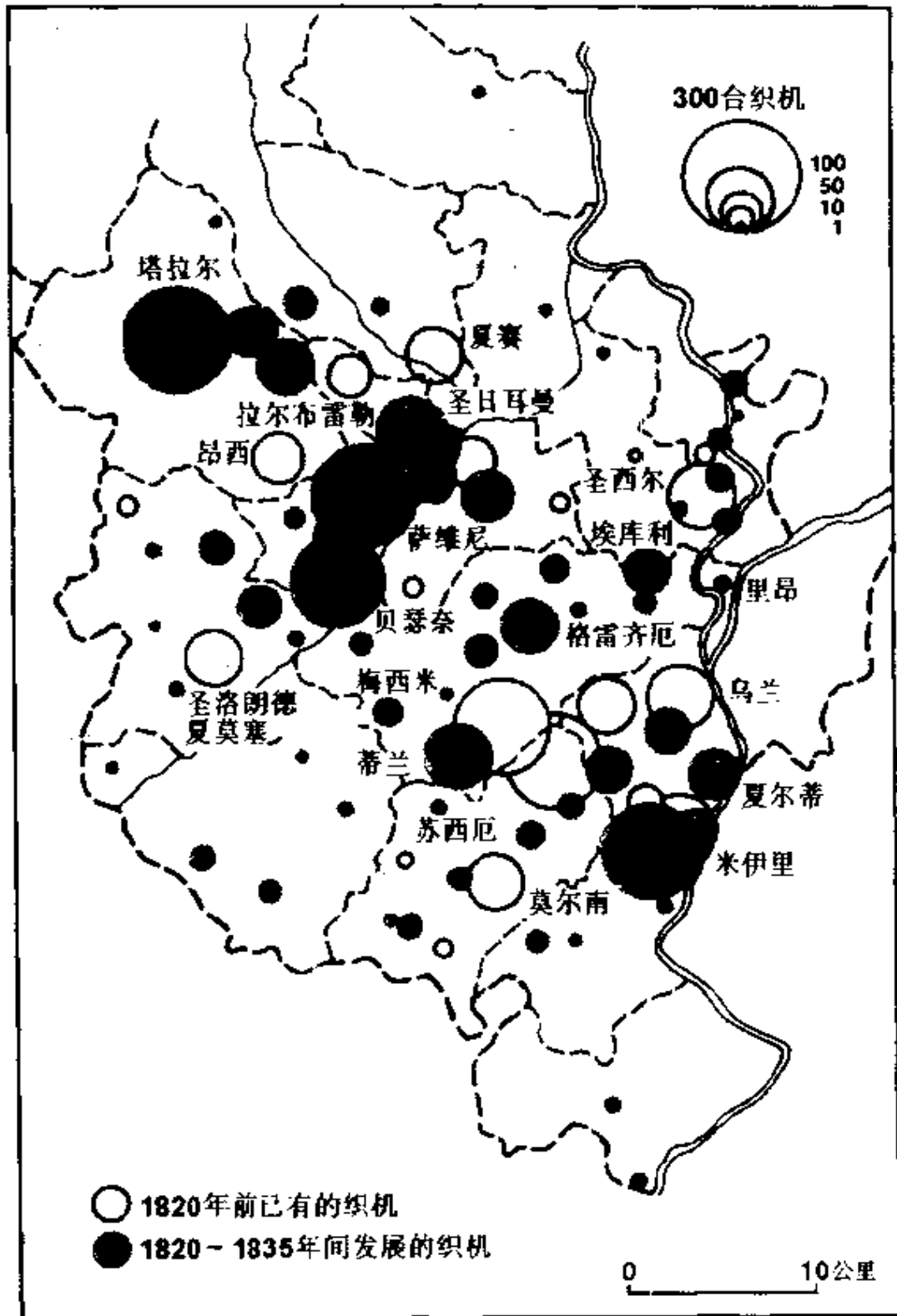
里昂在大革命和帝国期间经历了严酷的考验:暴乱、围城(1793年8月8日至10月9日)和随之而来的暴力镇压使里昂的

15万居民几乎减少三分之一，财物损失很大，不少企业主的工厂也遭破坏¹⁰¹。接着，对外战争旷日持久，外贸困难重重，加上征兵入伍，城市变得空空荡荡。居民于1806年下降到8.8万人。然而，里昂却推出了一种新型织机，并且针对劳力严重不足，有力地推广了机器的使用。提花织机的制造成功使丝绸得以“恢复优良传统和高额利润”¹⁰²。丝织工业仍有所进步，里昂虽然在帝国期间末年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但在1815年恢复和平以后，又几乎立即阔步前进。

里昂这个例子之所以能够说明问题，因为丝织工业在乡村地区的勃兴和泛滥（参见204页图）却是姗姗来迟的事。我们从皮埃尔·凯耶的著作中借用来的这张图再次表明，里昂确实是个经济都城。在城市所有的工人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向乡村发展纺织业不失为一项明智通达之举：技术要求较高的织造工序以及提花织机将留在城里，纺制丝线则交给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乡村地区去完成，以便减弱普鲁士和瑞士在这个部门进行的有力竞争¹⁰³。

与此同时，里昂开始投入到工业革命中去，并且在一系列部门居领先地位，直到1860年为止。里昂通过投资办厂，对广大的地区施加影响。总之，里昂不但不像其他城市那样暮气沉沉，而且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磁极，与蒸蒸日上的巴黎势均力敌。中央集权不可避免的实现对里昂城有害无益。里昂为此而备受损害，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但是，有些城市却硬是不愿充当经济发展的磁极。与里昂相比，波尔多的作用堪称是爱德华·福克斯所说的“另一个法国”¹⁰⁴的磁极，那里的巨大海港有许多行事方式与受巴黎操纵的法国经济生活格格不入。让-皮埃尔·普索在介绍波尔多18世纪的飞速发展时说到曾使阿瑟·扬叹为观止的“财富和豪华”，以及因城市人力需求的日益增长而对整个西南部地区施加的吸引力，但他最



1820年后里昂四周乡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转引自皮埃尔·凯耶,《里昂工业化初期时的提花织机和高炉》,1978年版。)

后又大惑不解地承认,波尔多对同一个西南部地区“在经济、人口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波尔多由于受到葡萄种植和“来自大西洋的强风”的双重诱惑,忘记了扮演地区首府的角色¹⁰⁵。

以里尔为例

在别的地方,又有别的特殊条件,别的经济形势促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城市及其周围的工业不一定构成和谐协调的整体。城乡之间的关系有时出现紧张。就里尔而言,这种关系显得特别紧张。

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多种纺织工业(毛织品、麻织品、棉织品、混纺织品、织毯、印花布、各种纱线、针织品、花边、印染、漂白、上浆)以外,城市还开展陶瓷和玻璃制造、压榨油菜籽、晒盐炼糖和烧制砖瓦等一系列生产活动,并且服从一系列的劳动分工,所有这些分工既不受城市界线的限制,又不受地区界线的限制。里尔城乡关系的复杂,主要表现在纺织工业方面,这是因为行会的规章阻碍着生产的发展,而政治危机又造成市场的不稳定:特别是法国于1667年占领佛兰德的部分土地后,里尔与尼德兰的联系已被切断(不易取得西班牙的羊毛供应);边界上战事不断;欧仁大公于1708年夺得了里尔,城市被荷兰占领,这对里尔工业不啻是场灾难,因为英国货或荷兰货的大批涌入直接与里尔工业品相竞争。在获得解放后,里尔尚需花几年时间设法出清压仓的陈货。另一个困难是里尔地处“外邦”,这对商品外销诚然有利,但要争得国内市场却又遇到许多障碍¹⁰⁶。

对里尔来说,主要的困难还在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工业不但不服从城市企业的命令,而且在集镇的周围单独组成团体。这些集镇在既得特权的庇护下,工业发展仍很活跃,甚至实行专业化生

产和取得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如图尔宽的双面起绒呢,鲁贝和阿吕安的粗毛呢,拉努瓦的丝绒和平绒等等。

在里尔方面,城市企业主根据城市的特权,力求把优质纺织品的制造以及印染、上浆等精加工活动据为己有。因此,城乡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互为补充,而是对立和竞争。这种状况早在查理五世皇帝时代业已存在¹⁰⁷。

不过,乡村的制造商有许多方便条件可以利用:他们免受城市行会繁文缛节的束缚,因而有更多的自由,可随商情的变化见风使舵;工人的吃、住开支也比较便宜,尤其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耕种小块土地或干一点农活”¹⁰⁸。

在17和18世纪,乡村工业的发展相当机动灵活,城市拚命防卫,不择一切手段。例如,在1670年前后,为了故意刁难,城市竟拒收乡村送来印染和上浆的毛坯布。鲁贝的织布商于是把毛坯布转送根特,并且上告官府。这项举措并非毫无成效,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乡村工业被逼得过紧,工人很容易就会离乡出走,去布鲁日或根特的作坊谋生。在里尔这方面,官吏们要尽花招,谋求国家确认城市的垄断。有的巡按使与官吏串通一起,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如在1704年就是这样。但是,只要遇到机会——例如里尔被荷兰占领——乡村工业就会卷土重来,夺回失去的阵地,并且争取国家发布有利于乡村的行政命令¹⁰⁹。

城乡之间的这种对抗一直维持到旧制度的末年。在文森·德·古尔奈和特吕丹的思想影响下,政府不再在城乡关系中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转而偏向农村。1762年的命令明确作出规定,“破除可能阻挠工业进步、特别是乡村工业进步的各种障碍”。这在里尔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尤其在工人居住区,巡按使为此出面干预,于1765年暂停执行以上措施。为了使工业更进一步向乡村倾斜,还要等待由杜尔哥设计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出台:1777年诏书(大

臣解职后一年)最后确认 1762 年的命令必须贯彻执行。“里尔的垄断至此寿终正寝”¹¹⁰,图尔宽“张灯结彩,爆竹齐放,鼓声震天”¹¹¹,以示庆祝。

以上简要的介绍尚不能概括城市和乡村在地区范围内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还将继续探索,方能摸清其中的底细。

但是,我觉得这足以表明,里尔没有起到发展地区经济的磁极作用。事情正好相反。这一政策是否符合里尔的真正利益呢?一些里尔人对此存有怀疑。城市当局如果不做二不休,岂不就要禁止本市的制造商在乡村推广织机,至少也要禁止某几种织物的生产?一位里尔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卡尔卡松、鲁昂、伦敦、莱顿、韦尔万等城市的四周,土地一片平坦,无论城市内外,均可自由设厂”。他还说,“位于这些制造厂中央的城市都十分繁荣”。在他看来,在城外设厂,成本较低,不但能增加产量,而且使里尔在出售羊毛以及在织物的印染、上浆、销售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收益;为“利国利民”起见¹¹²,他强烈要求保障“这种自由”。我们对此怎能不予置信?

由此可见,城市内部就有意见分歧,这个例子至少能使我们提防任何千篇一律的简单推论。旧制度下的法国城市放弃对工业的垄断,就像里昂和里尔一样,可能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不要过分匆忙地拿以上的情形比作今天工业化世界的活动朝着南朝鲜、香港、新加坡等第三世界地区的大量流失,尽管在二者之间确有某些地方应该进行对比。

我们这里作个小结。在大革命以前,法国经济有了广泛的发展,首先是在城市。但是,在经济发展中,有的城市一马当先,有的落在后面,有的不前不后。实际上,如果把法国的情形同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作比较,经济运动并不仅仅取决于城市,更不用说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

其他的责任因素

经济发展迟缓并不由城市单独负责。从18世纪起几乎直到今天,城市市场确实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¹¹³。就算如此,城市市场的不足既是整个经济状况的原因,又是整个经济状况的结果。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认真考察以下三个因素:

- 1、国家本身;
- 2、乡村(再次接受考察);
- 3、国际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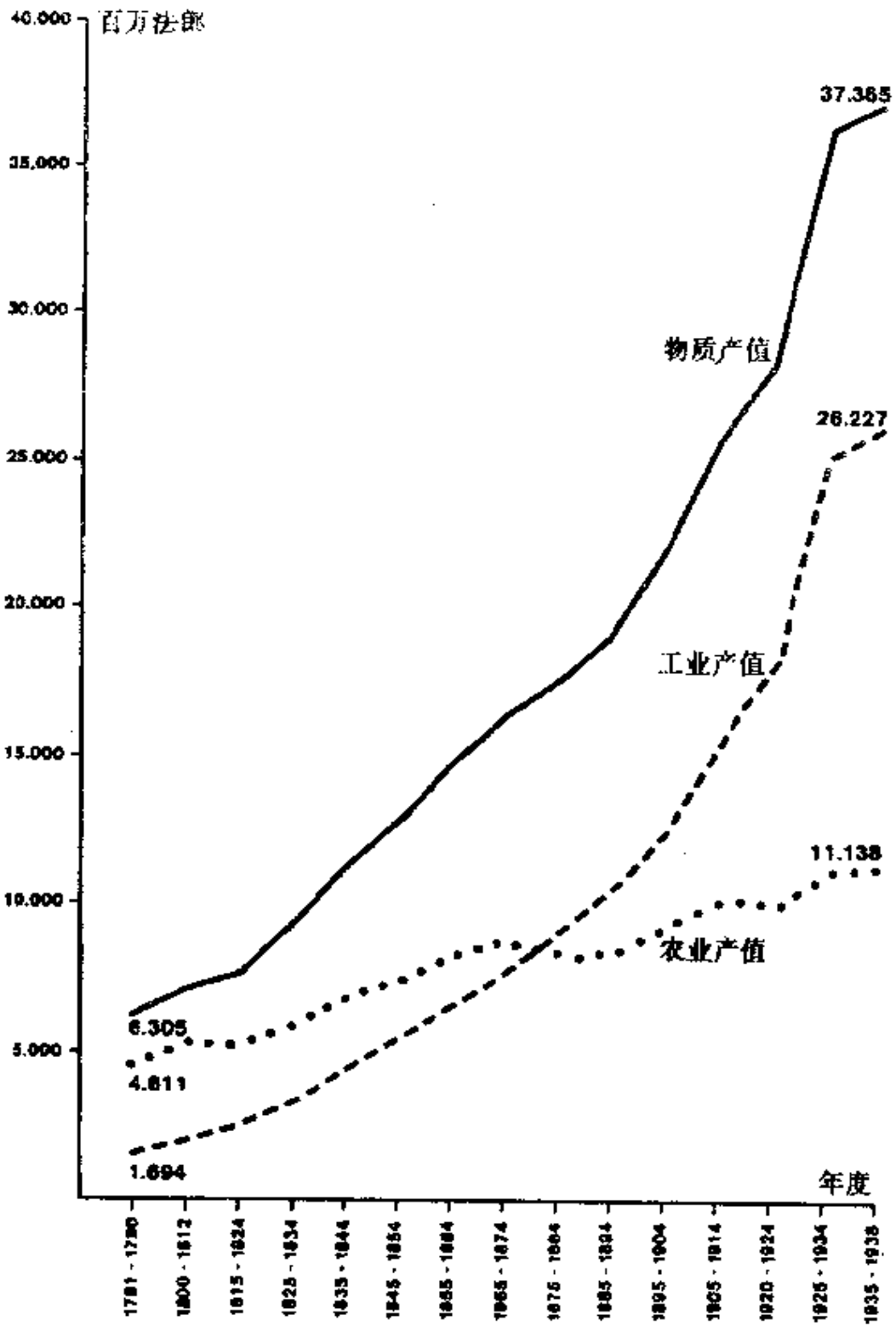
国家很早就把城市置于它的监护之下。国家对城市的财政收支、税收、债务、借贷和偿还都进行严密的监督;关注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物资供应;通过推广官职捐买制度,使各种市政官职由推选改为捐买¹¹⁴,即由所谓“商人”(不便明说是资产者)购买公职;并从城市收益中提取很大一个比例。最后,国家还在城市发行公债。

城市的资金就这样被国家变着法子所占有和挪用。花样虽多,但并不始终有效;我们在下一卷书里将重新谈到,旧制度下君主在征税方面的门槛不算很精。国家的收益——直接税、间接税、公借款——几乎丝毫不重新注入到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去,所有款项全归宫廷支配,“直截了当,不容讨价还价”¹¹⁵,用于铺张和排场,偿还政府债务,支付陆海军的费用……甚至在18世纪兴办的大规模公共工程,例如国王所提倡和关注的公路网建设——也首先是让地方财政提供资金。于贝尔·吕蒂¹¹⁶居然说国家的“活动纯属寄生的性质”,这也许有点夸大。因为早在1789年前,国家毕竟也承担一些不可缺少的任务。可是,国家的干预是否始终能直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要求呢?

至于乡村,我们不要以为它关起大门,与世无争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因而与经济发展毫无关系。乡村势必朝着集镇和城市的方向,作为流通的末梢而对外开放。乡村在18世纪也有所进步,但人口增长对乡村起着抑制的作用。尤其,正如米歇尔·莫里诺所证明的,农业革命还没有发生。没有一场农业革命为先导或相伴随,工业革命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也就是说,农业经营者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就不能在腾出人手从事其他工作的同时,逐渐富裕起来。

试举一个例子:图卢兹在当时是个大城市,尽管乡村富庶,却并不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它实际上处在睡梦未醒的状态:17和18世纪在图卢兹是“无所作为的二百年”¹¹⁷。当地的大资产者,特别是批发商,已实现了资本积累;他们利用大革命时出售国有产业的机会,购买大批地产;他们拥有的地产是大大扩展了,但资金却因此周转不灵,因而“处境窘迫,无力完成工业革命和促使上朗格多克省摆脱不发达状态”¹¹⁸。这种状态还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姗姗来迟,因为拥有大地产的这些资产者当然不事耕作,而深受他们压迫的传统型佃农又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乡村仿佛是个陷阱,使资金被固定在那里,而不能充分加以利用。

最后再来谈谈“世界的秩序”。在18世纪,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的领先地位日趋削弱:城市统治的丧钟在世界范围内敲响(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先后黯然失色);城市因其动力过小,不能确保对世界贸易的控制。城市从此大权旁落,今后将由英法两国争雄世界。我常常想到,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有利条件之一正是其国土的相对狭小:国土之大足以构成一个民族国家,国土之小恰好便于统一本国的经济。我以为,法国命乖运蹇正是由于国土宽广,因而单靠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一个城市的力量,即便是巴



1781 至 1938 年间的工农业产值

工业产值只是在 1875 年才超过农业产值。

(转引自让-马尔采夫斯基,《定量分析史导论》,1965 年版。)

黎,也不能够安排好本国的经济。这可能也与一种社会现象有关,关于这种社会现象,我将在后面再谈。“过贵族式的生活”当然并不意味着对金钱本身持某种特殊的态度,而是对赚钱和花钱的办法作出高贵和低贱的区分,也就是说,无论真假贵族都不参与商业或工业活动。在这方面,法国和英国的步调并不一致。

总之,早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在同伦敦进行的这场经济决战中吃了败仗。罗贝尔·贝尼埃的一句话说得好:在1783年的凡尔赛,“英国输掉了战争,但赢得了和平”¹¹⁹。英国不就在荷兰人和法国人的眼皮底下,立即恢复了与未来的合众国的贸易吗?还在滑铁卢大战以前很久,英法两国之间的较量输赢已定。赢家所得的正是经济(和城市)的高速发展,换句话说,在世界经济中雄居首位。有人或许会想(假设性推理今天正十分时行):若是我们赢了滑铁卢一战,结局又该怎样?无非会再度出现1783年英国虽败犹胜的局面。

我的这种看法与我国的几位历史学家恰相对立。他们认为大革命导致了法国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法国经济的落后及一系列灾难。他们的认识可能也有部分道理,但早在1789年前,确实是大局已定,法国的处境至少已经岌岌可危。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二 流通与结构

“流通”一词在 18 世纪那时十分常用，到 20 世纪初期有时还可见到，后来就越来越被科学论著所摒弃了。我为此曾犹豫再三：捡回这个旧词，几乎像是推出一个新词；由于种种词义引伸以及由该词触发的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争论，“流通”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年鉴派初起时（1929），不是曾指责它把赌注押在“流通”上面，而不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吗？这是无的放矢！首先，我们从没有打算在流通基础之上建立一种经济理论。再说流通又是容易测定方向和数量的一个过程；经济史也许有权甚至有义务从最不困难的事情做起。

最后，据我所知，流通不是空洞的虚构；既然经济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从旁门进入其中，毕竟也还是走了进去。难道有哪一种生产不是流通、供给和消费的延续吗？消费位于电路的末端，它要求重新“接通电路”，使“电流”畅通无阻，并使生产得以启动。同流通一样，生产以及生产方式单独不反映经济的全貌。更何况，“生产的发展仅仅依既存的市场为转移”¹²⁰，也就是说，必须先安排好流通，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吗？

我们且把这些无谓的争论搁下不谈。在这里，我们将一门心思只想着流通的要素和工具：道路、运载工具、载运的货物、存货的地点、集市、交易会、交换、通货、信贷以及形形色色的商业往来。当然，还要想到人、人的行为，人的流动。总之，我所说的流通是指为社会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经济运动，是指社会理所当然要维护和竭力提倡的经济运动，即便社会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社会都必定服从并适应经济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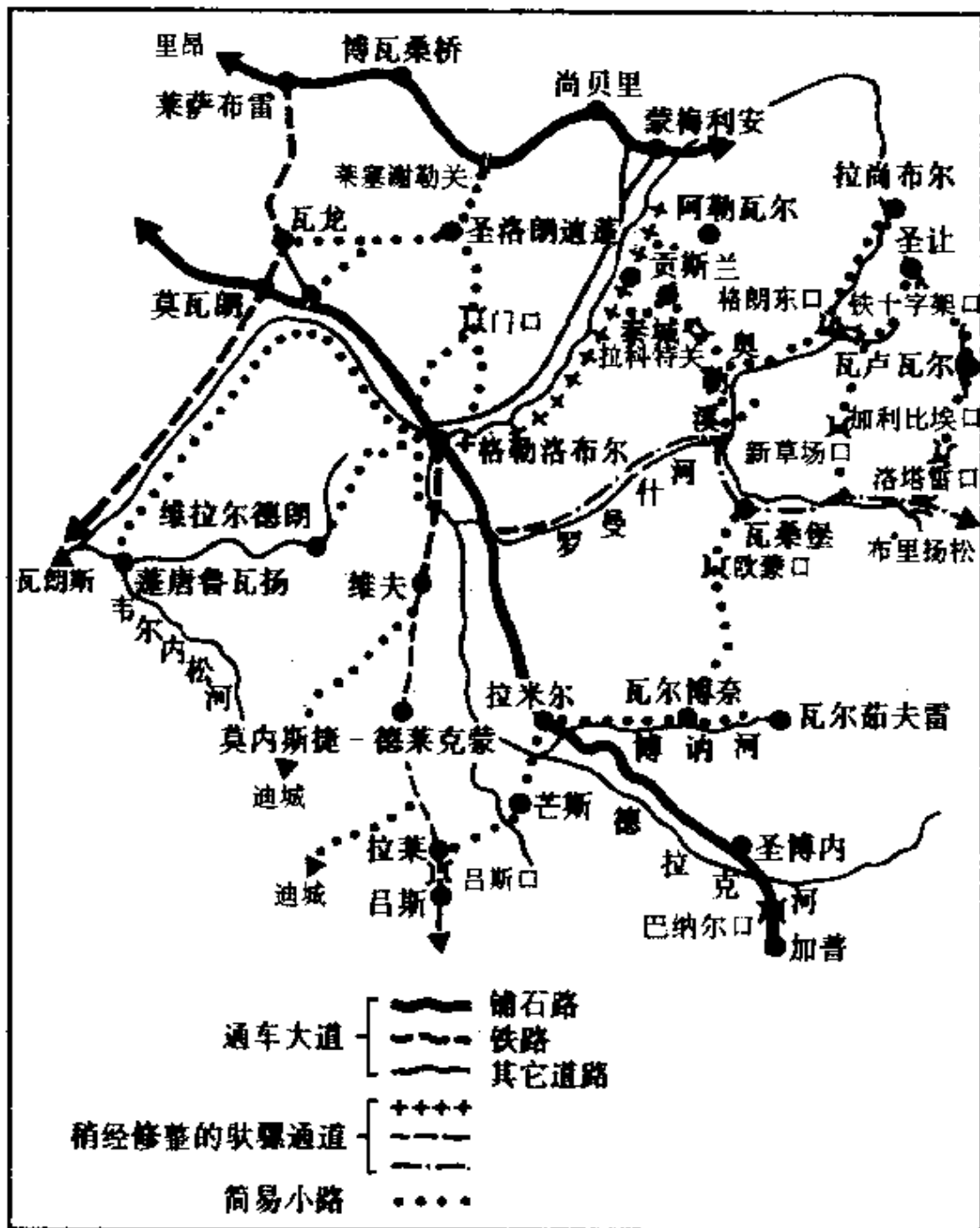
托马·雷加左拉和雅克·勒费弗尔的颇见新意的著作：《运动的驯化：国家的兴起及其推动力》（1981年版）。

大流通和小流通

流通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应该区分几种不同的流通，起码也要区分一种大流通和一种小流通；大流通是指动脉和静脉的循环，小流通是指细如发丝的毛细血管的循环。

这且说过不谈。出人意外的是，在两种流通系统中，却是小流通的流量最大，流通也最稳定。尽管成果卓著，或者正因为如此，大流通在整个循环系统中只占少数，它对可能加快或减缓运动速度的经济波折比较敏感，甚至因此而突然改变流通的领先部门。高等实验研究院于1950年举办的一个研讨班在对当时法属非洲各地的铁路运输进行研究时注意到，干线运输遵循一般经济形势的节奏运动，而支线则相反，它们有自己的脉搏，虽然有时不易被人所察觉¹²²。小流通力求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不论困难会有多大。

有人告诉我们说，在1796年，“勃朗峰省几乎全省都从事运输，但见乡村小路上人来人往，一片忙碌的景象”。各种车辆通常在大道行驶；乡村小路几乎仅供驮骡或背负重物的人使用。同一份材料进一步指出：“如能在该省修建可通四轮马车的道路，从而减少驮骡运输，当不失为一大善举”¹²³。虽说如此，但因当地一年中积雪时间长达数月，有了道路仍然不宜行车。请看上萨瓦省的孔塔明纳河谷1934年那时使用的扫雪装置：“这是一辆奇形怪状的拖车。颈上套着节日轭圈和铃铛的八头牲口（马和骡）成双配对地牵引一个大而无当的三角形木架”，架上堆满了沉重的沙袋。“站在牲口旁边的赶车人不停打着响鞭。使劲拉车的牲口浑身汗湿，热气蒸腾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前进，嗒嗒马蹄声伴着乡村音乐，节奏格外分明……经过笨重的庞然大物的碾压和清理，积雪被扔到路边，道路顿时变



上多菲内地区伊泽尔省 1787 年的交通要道

通往里昂和瓦朗斯的大路一般随河谷的走向延伸。所有横向的道路都还比较简陋。

(转引自吉尔贝·阿尔芒:《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城镇及其分布》,1974年版。)

得光滑闪亮……另有一组八人,各自牵着牲口”,紧紧跟在车后,每

隔二、三公里换一次班。“大汗淋漓、颤颤发抖的挽马”下套后留在车后，背盖一条毯子保暖。工作持续整整一天。孩子们站在一旁观看，妇女则准备好热饭热水等待丈夫的归来。这是在“大道”沿线进行的扫雪活动。至于村口的小路，人们只用一匹马拖两个木铲，在雪地上铲出一道“平滑的浅沟”，供大小雪橇通行¹²⁴。随着时代的进步，在1934年，卡车将代替马匹清除大道的积雪，村民套马轮班扫雪的传统转而使小路受益，扫雪工作从此更加广泛地展开；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1957年为止，马匹那时已在当地农庄中绝迹¹²⁵。铲雪机械只是在1960年前后才刚问世。

回过头来再谈大流通和小流通。这一区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今天也依然如此；次等的铁路于1940年已经被拆除（被遗弃的车站和守道工房就像荒废了的乡村学校那样只剩残垣断壁），但次等的“路线”并没有因此被取消，运输任务已由公共汽车、小卡车等机动车所接替。流动商贩继续走乡串村，供应面包、肉食和调味品，此外还有送信的邮差。这就证明最起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能消失的。快速的联系自然属于大流通的专利。如果旅行时间十分紧迫，你就去省会城市的火车站或附近的机场乘坐特快列车或飞机。大小流通共存的局面仍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

在19世纪初，陆路运输对大道和小路分别进行统计。大路的运输量比小路还少。根据车运局的统计材料，迪吞（此人在该局任职）估计1828年经由大路（国家级大道）运输的货物为1 040万吨，而经由小路运输的货物则为3 090万吨¹²⁶。毛细血管般的小路网比大型和中型的交通干线更加发达。国家级大道总长约34 500公里，损坏待修的路段除外；这些经反复维修的道路都是在50多年前由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政府开通的，这个漂亮的道路网深得外国旅行者的赞美，虽然在1789年前尚未竣工¹²⁷。阿瑟·扬这位观察细致、处世谦和的旅行家认为，至少在某些路段，路网没有

充分发挥作用¹²⁸。中等道路网(省级大道)约长 36 500 公里。可是,根据 1837 年的统计,乡村小路的总长长达 771 000 公里,相当于大型和中型干线总长的 10 倍多¹²⁹。1824 年和 1836 年发布的组织法,当局下达的各项命令,都是为了保证集镇的供应,便利谷捆、饲草、肥料、木柴、沙石、石灰等物资的运输,敦促各村庄修复这些不可缺少的小路¹³⁰。

皮埃尔·古贝尔正确地强调指出,这些小路具有不同的功用:通往葡萄园的曲径小道;贩运私盐的暗道、樵夫的林间小路¹³¹。乡村正是依靠这些小路打开门户,呼吸新鲜空气,摆脱闭门自守的生活习气。莱昂斯·德·拉韦涅认为,根据 1836 年法而在乡村展开的道路整修工程“使法兰西的面貌焕然一新,近 20 年来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大部分应归功于它”¹³²。大家顺便可以看到,交通与生产攸息相关!

说到这里,我们切莫因此而想入非非。法国的这些小路总长度可能不超过 10 万公里,它们需要养护,这也就等于说,还能为日常的交换所利用。请看 1788 年南德意志的情形:一位名叫让-玛丽·帕洛拉茨的萨瓦商贩认为,当地的道路对参加交易会尚属通行无阻,但要“下乡”,即走乡串村地从事贩卖活动,却有很多的不便¹³³。我国今天仍然存在的乡村小道,有的正逐渐消失,有的则加宽路面,适应摩托车、汽车、吉普车、拖拉机的要求。路上铺着不规则的石子,路边种着两排低矮的山楂树,山楂花初开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加斯东·鲁普内尔认为这些小路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¹³⁴,而把它们改造成笔直的直路则要归功于罗马人;他的看法无疑是错的,但可以肯定,这些小路毕竟十分古老。有些路段与当年领主沿着林区开凿的古老的水沟相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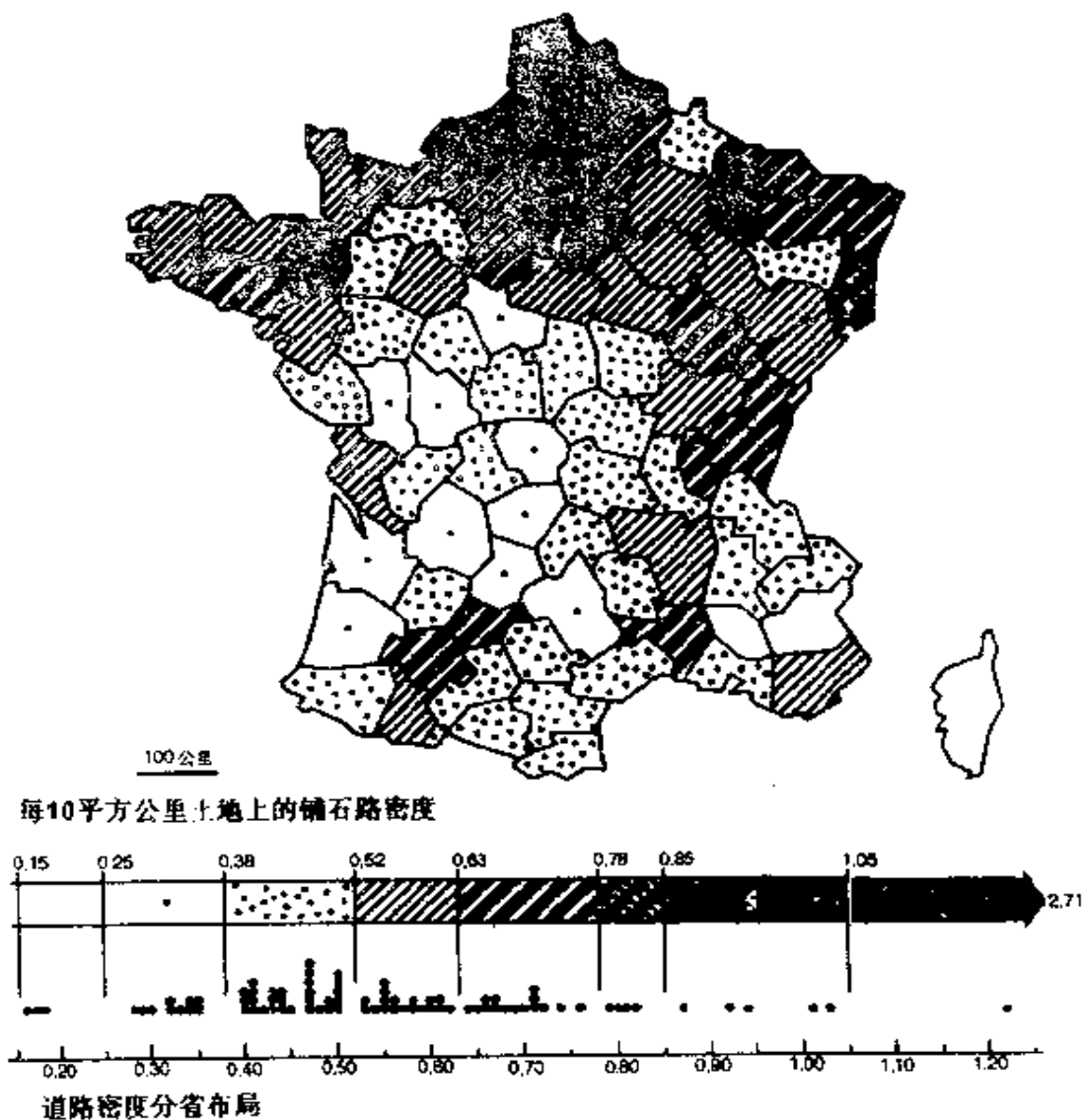
然而,一些省级公路陆续穿越了大部分村庄。它们照例都铺石子,由压路机辗得结结实实,路面结果越垫越高。默兹省有一所房

屋,1806年时要经阶梯向上攀登,如今却是拾级而下。这些公路由国家出资建成后,村庄最初仍过着闭门自守的生活,并不认为这对村庄是什么紧迫的需要,村民们感兴趣的只是附近的集市贸易,他们宁可抄以往的近道,甚至对公路心怀恐惧。“就在大革命前30年”,卢埃格的村民“对修建公路很不积极;有些人甚至把公路视为祸害,试图要求改道”¹³⁵。今天也是如此,一些小村庄把位于卡车接连不断、流量甚高的公路一侧视为灾难。除了噪声烦人和车祸频繁以外,村庄自身的交通也大受妨碍。

通衢大道和乡村小路的区分,大流通和小流通的区分,这在古老的城市中业已存在,即使在巴黎也不例外;巴黎市内有许多阴森、漆黑的小街,不久前仍阻碍着城市的交通。在像圣雅克街或圣马丁街这样的干线,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但也有一些狭街小巷,不但交通稀少,而且对外闭塞,整个街区仿佛是城市中的村庄。在第三共和国期间,即使乘坐出租马车,在巴黎穿街过巷仍然要花很长的时间。霍斯曼男爵大刀阔斧地展开的城市改造工程仅在若干贵族区开通笔直宽敞的大道;我始终不喜欢这些工程,但是否合理,这就很难说了。一位记者于1984年写道:“巴黎是个由不同村庄勉强拚凑起来的整体,拉米埃特区与金水珠区没有丝毫相似之处”¹³⁷。

通衢大道

法国的通衢大道网从1750年开始建设,到1820年已初具规模。这在当时往往是些非同寻常的高级公路。但它们仍没有使经济生活发生彻底的改观。更何况,道路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完工。它以巴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这显然对巴黎有利,但整个体系在19世纪初仍很不完善。尤其,这些交通要道还不足以把地区道路网联成一片,为地方需要而建造的道路多半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



分省道路密度图(1820年,缺损的路段除外)

南方和北方的道路分布恰成鲜明对照。

(转引自贝纳尔·勒佩蒂:《陆路和水路》,1984年版。)

这也就等于说,在铁路问世前,法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

上面的地图是从弗朗索瓦·勒佩蒂的近著中借用过来的,它显示出1820年前后法国各地道路分布的不均衡。这里再次可在圣马洛和日内瓦之间划一道直线,一边是“道路网极其稠密”的法国北方,那里的交通尽管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却是川流不息,往来繁忙;另一边是广义上的法国南方,那里仍以土路居多,石块

路和碎石路还很稀少，“法国南方的道路网除了稀稀朗朗的几条要道外，分叉很少，又没有可资替换的间路，不能把各沿途地区联成一片。”¹³⁸

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通衢大道本身还很脆弱，位于道路中间的狭窄路面虽然力求结实，但过往车辆却往往在路边下陷。这些道路事实上不断需要养护。举一个例子：巴黎至布雷斯特道路是贯穿伊勒—维莱讷省的交通要道，据说于 1794 年“一般尚能正常通行；几年来没有发生过半路受阻之事，但在雷恩附近，每逢下雨天，车辆行驶十分困难”¹³⁹。从格拉韦尔到维特雷，“路基坚实，但路面铺设的碎石太少，修路十分费劲，损坏却很容易，修路所需的石料只能供应三分之一”；从维特雷到沙托布尔，“路基坚实，但碎石路面铺得太薄，而且损坏严重，没有碎石可供修路使用”；从沙托布尔到雷恩，“土质极差，碎石的铺设很不均衡，但都远不能满足需要，克吕佐里荒原上有一小段路的路况很差，养护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在总长为 25 167 托瓦兹（约合 50 公里）的三个路段中，铺石块的路面长 5 032 托瓦兹，占总长度的五分之一。

以上的例子鲜明地表现了贝纳尔·勒佩蒂经过详细调查所指出的整体现实。从 1820 年绘制的道路分布图可以看出，国家级大道“纵横有序”地贯通全国。实际上，这些大道并非都已完全接通，它们还被一些“缺损路段”，即一些季节性通行的土路或损坏待修的路段所隔断。注意到以上的缺陷，贝纳尔·勒佩蒂又画了一张通衢大道网的修正图，用粗线表示路况良好的大路，用细线代表“缺损路段”，这张修正图当然不如官方提供的地图那么乐观。它表明：一方面，法国南部和山区还存在重大的地区性缺陷；另一方面，在整体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仅由一条大道所维系”，这条大道没有“缺损路段”。简单地说，可以正常通车的“名符其实的全国道路网尚不存在”¹⁴⁰（见 238 页地图）。

另一个障碍，大道势必穿过城市。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车辆在城市通行会比在郊野更加方便，至少因为城内的道路铺有石块。其实，城市的街道不但狭窄、弯曲，而且往往还有坡度。例如多菲内地区的维埃纳就是如此，从里昂通往普罗旺斯的大道在穿过城市时在莱茵河左岸被拦腰切断。市内的街道有时宽不过3公尺，斜坡部分往往被水淹没。车辆在雪天或夜晚行驶更是危险丛生。此外，城市虽大为扩展，但在城墙之内的房屋十分拥挤；随着居民的增多，集市侵占街道，“车马堵塞极其严重，行人走一步停一步，以免冒被压死的危险”¹⁴¹。

在18世纪下半叶，法国确曾作出巨大努力，发展交通建设。新技术陆续被采用，如加深路基，在河上架桥时改用新型桥墩；此外，还整修弯道，减少坡度，架设铁桥¹⁴²。所有这些改造都吸引了斯丹达尔的注意¹⁴³。工程师们写道，建于本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大道“只不过是把原有的小路加宽一点而已”¹⁴⁴！新的大道建成后，车辆行驶变得更加方便，更加舒适——车辆本身也在改进——，特别是更加迅速。关于18世纪推广杜尔哥式马车后车速加快，关于驿站的普及和运输公司的建立，我将不作长篇的介绍，因为我借用了居伊·阿尔贝洛有关这些巨大变化的草图¹⁴⁵。车速的提高在19世纪将更加引人注目，仅在18世纪末到1850年，运输公司的平均车速增加了两倍¹⁴⁶。

公路运输一度曾与铁路相抗衡：虽然铁路终将成为不可抗拒，但在初期毕竟分布不广，更何况速度也并不很快！让-克洛德·若尔日的祖母说，1910年，“在我还当姑娘的时候，人们去伯诺瓦特沃或圣阿维〔默兹省的村庄〕都乘火车。记得每当车子爬坡时，我们居然有时间下车去路边的草地转上一圈。我们甚至还能采集一束花，然后在岗顶赶上慢吞吞的车厢！”¹⁴⁷到了今天，火车不再在这些村庄靠站，已是不待言的了。

水路是第三种交通途径

如果说通衢大道是第一种交通途径，路虽小而覆盖面广的乡村小道是第二种交通途径，那么，第三种交通途径便是水路，其地位在铁路问世前和问世后都十分重要。水路也同样应区分大循环和小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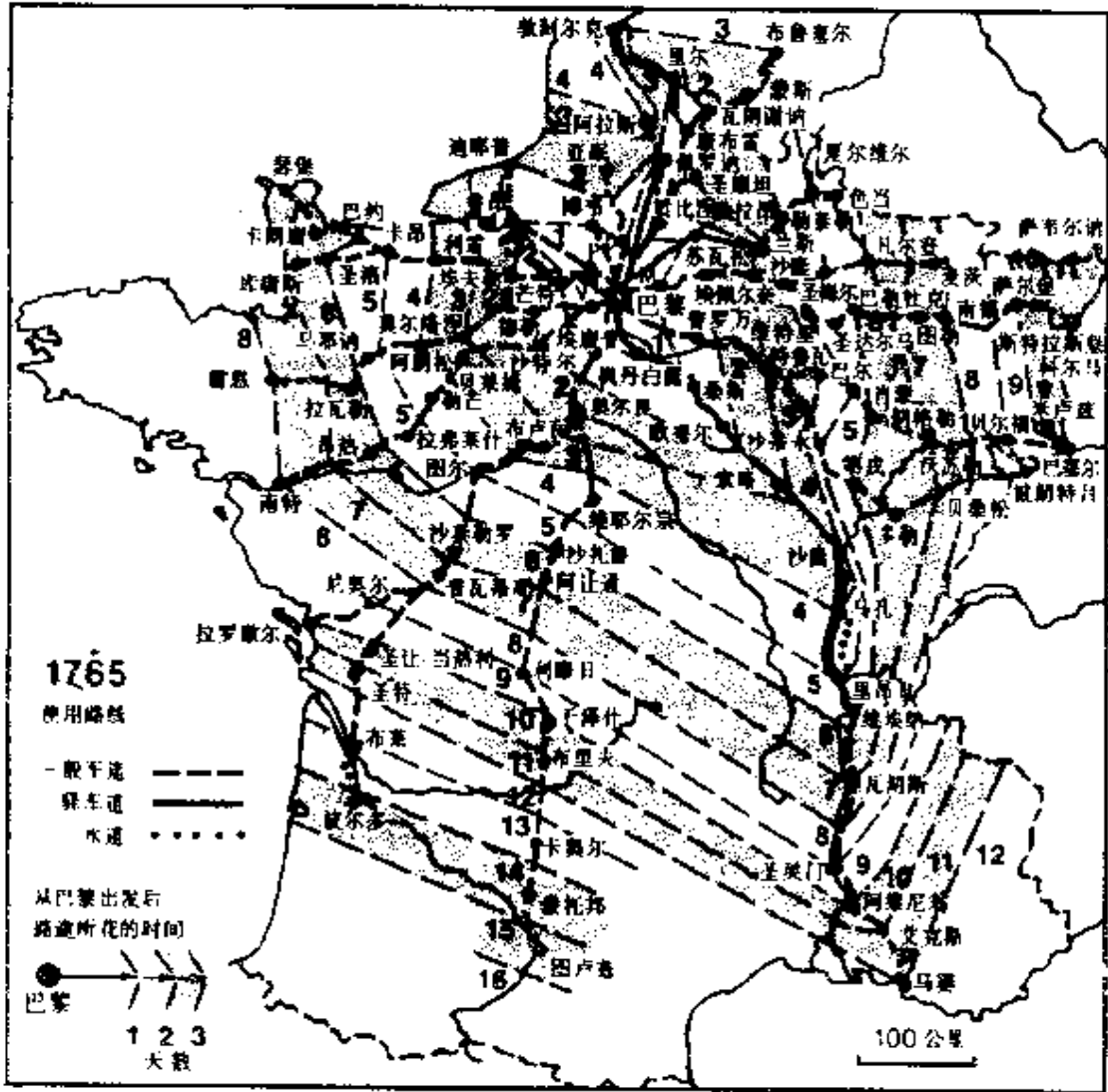
就以布列塔尼为例，阿兰·克洛瓦把卢瓦尔河和维莱讷河（后者是“法国第一条使用船闸调节航行的河流，船闸建于1539至1585年间”¹⁴⁸）称之为“高速公路”。许多小河则利用涨潮，把满载货物的木船推往内陆：乌斯特河、布拉韦河、欧讷河、特里约河、朗斯河、库埃农河也都“适于行船”，尽管经常出现事故。

各省尽管河流有多有少，但都力图把通航河道利用起来。大家知道，这里的“高速公路”都是大江大河，每条河流各有其独特的船运传统。维克多·雨果1843年7月乘坐驿车来到南方，旅行颇不舒适，他对卢瓦尔河作了以下的描绘：“五、六艘船排成一队，船队在河上往来穿梭。每艘船只有一根桅杆和一张四方篷帆。在前面开道的船所挂的篷帆最大。船队排列得十分整齐，从第一艘到最后一艘，篷帆按顺序逐船缩小，决不会出现任何的冒尖，任何的随心所欲。这种景象，我只在卢瓦尔河上见过；我愿承认，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诺曼底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单桅船和三桅船，它们在塞纳河下游如猛禽般飞驶，它们张挂黄色和红色的船帆，不顾风雨烈日，往返于基耶伯夫和唐卡维尔之间”¹⁴⁹。

我国境内的水上航运在不久前的过去还很活跃；泛舟水上当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旅行。皮埃尔·古贝尔对我的意见深表赞同¹⁵⁰。历史学家之所以“要让在前天充满着朝气，在昨天已经一命呜呼，而在今天又改变面貌，重新振兴的河流恢复生机”，这既是为了展示河流的昔日风采，也是为了显示人在当时的艰难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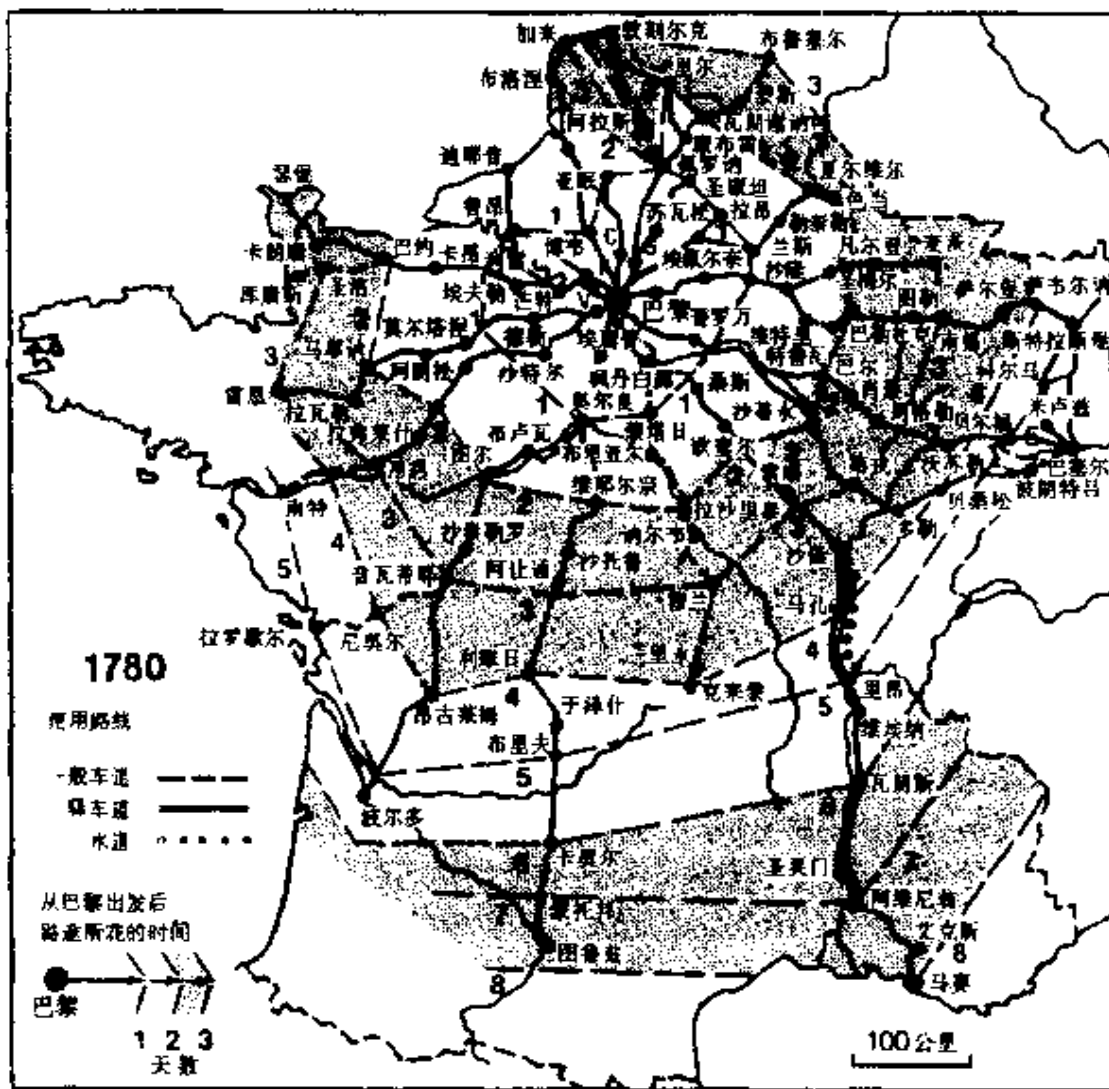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试图再现罗讷河和卢瓦尔河航运业的光辉时代。我举了这两条河流为例子，这也就等于牺牲其他的河流。我想告诉大家，由于经常有机会横渡二海运河，或顺着公路沿运河旅行，当我远远望见岸边的两排白杨树时，我曾不止一次想坐船航行，走完这条狭窄水道的全程，直到与加龙河会合为止。蒙吕克 1562 年有一句名言，他说加龙河和多尔多涅河“是为波尔多哺乳的两个乳房”¹⁵¹。

多尔多涅河是条大河，在波尔多北边坐木船横渡该河约需一个小时，“那里的河面至少同加龙河一样宽”¹⁵²；关于这条河流，我们有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介绍 18 世纪时两岸的风光¹⁵³。城市、村庄、零星村落、私人房屋全都面对河流，至多中间隔着“驳岸”；驳岸是建在河岸上的一种普通设施，“前端伸向河水，并由石块、束薪、木板、沙土等重物加固。整个设施背靠河岸，呈缓坡下降，以利平底船的靠岸和装卸，但它们对冬春两季的洪水抗御力较差，常因涨水而遭破坏或被冲垮”¹⁵⁴。船只的种类繁多，从仅供捕鱼用的小渔船直到运货的大型驳船，还有在加龙河下游与“木船”（一般用于近海航运）结伴同行的内河帆桨船¹⁵⁵。这些载重较小的船舶在逆水行驶时历来依靠人力拉纤。直到 1740 年前后，拉套的牛才开始与纤夫竞争，为此还曾触发过猛烈的冲突¹⁵⁶。多尔多涅河上游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仅可“放送木排”，柴片、树干乃至厚木板均随波逐流。事情当然并不像一眼所见的那么简单：木排在朝下游发送途中，必须予以照管和领航，直到“斯蓬图尔、阿让塔以及苏亚克的木材仓库拉鲁梅”¹⁵⁷为止。人们正是在拉鲁梅把木材转装船只运输（多尔多涅河与加龙河不同，加龙河漂送的大型木排可达下游的波尔多）。木柴、橡木板和木炭被装上一些轻巧、简陋的“阿让塔船”（因其停靠的小城市而得名）；它们同卢瓦尔河或阿列河上的“松木船”一样，只向下游作一次航行，抵达后即被“拆散”成一堆木板或木



柴¹⁵⁵。

尽管船的形状、名称以及航行的方式和困难因河流而异，但内河运输毕竟也有一些共同点。在塞纳河及其支流沿线，运输照例遇到种种束缚和引起种种争执。争执的由来往往是“设卡征税的领主”借故勒索；束缚则是因为国家对制订规章制度十分热衷。有些文件初看并不十分清楚，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每一艘船都应该备有“托运书”，即与货物托运人签订的契约¹⁵⁶，货物必须交“车户”先用手推车送到公秤处过秤，然后方能装船。因此，码头公秤处附近十分拥挤。装船时也同样出现拥挤和堵塞。总之，各种事情都是搞得杂乱无章。



法兰西的幅员辽阔,使建立民族市场遇到重重困难

从居伊·阿尔贝洛的这两张地图(《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3年,第790页单页插图)可以看到,随着杜尔哥式马车的推广和驿站的成倍增多,为适应“快速马车”的要求而进行的“大规模道路改建工程”在1765至1780年期间使法国的间隔距离有时缩短了一半。从里昂前往比利牛斯山,或从施特拉斯堡前往布列塔尼,1765年那时至少要花三个星期。即使到了1780年,穿越交通不便的法国仍然颇费时日。

但是,道路网正趋布满全国。在第一张地图上,人们确实注意到几条交通干线:巴黎至鲁昂,巴黎至佩罗讷(路程仅1天,与巴黎至默伦相等);巴黎至里昂(路程为5天,与巴黎至沙勒维尔、卡昂或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相等)。在第二张地图上,距离与时间大体上恰相吻合(在巴黎四周形成同心圆)。途中所花的时间仍与通往里昂和鲁昂的旧干线相同。这一转变的得以实现,根本原因就是杜尔哥于1775年创办了驿车和货运管理局。

但是,内河运输仍能照常进行。莱翁·卡昂在他早年的一篇文章里,对朝巴黎方向的水运量之少深表惊讶;这篇文章当时引起过哄动¹⁶⁰,但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见解真有道理。在1710年,为把小麦从鲁昂运到巴黎,必须花8天时间——6月10日至18日——,但货运量高达4533袋¹⁶¹。另据一份文件记载,1709年3月6日至4月13日,正值瓦兹河解冻不久,共有805穆伊德小麦(每穆伊德折合18市石,共计约1.5万市石)在苏瓦松港装船“运往巴黎”¹⁶²。由于首都神奇般的发展,塞纳河及其支流的运输量如按1857年计算,可达537.6万吨,领先于罗讷河(360.8万吨)和卢瓦尔河(211.1万吨)¹⁶³。

通航河道所运输的不仅是货物,而且是旅客及其行李。马拉驳船更以载客为主。在17和18世纪,例如从阿让前往波尔多,旅客都乘坐每星期两班的“马拉驳船”,花两天时间抵达波尔多。他们返回时可搭乘“利用每天涨潮上达卡迪亚克”的许多船只,再在卡迪亚克骑马继续前进,经六次更换坐骑后,来到阿让¹⁶⁴。巴黎开出的马拉驳船的行进路线通常张榜公布,出发的地点、日期、时间以及有关事项也一并通知旅客。开船时间一律以圣保罗教堂的大钟为准,地点有时在圣保罗码头,有时在图内尔门外码头;班次随季节变动,有冬令时和夏令时之分。旅客和行李均可登船,不得借故拒绝,票价可谓童叟无欺,经巴黎市行政署、司法署和商会1738年4月29日的共同决定,“在船桅悬挂的一块白铁皮上开列价目”¹⁶⁵。

那时候,各种旅客不分职业和国籍,就这样挤在一起,乘坐卢瓦尔河上的马拉驳船,票价按每人每里三苏计算。沿河两岸客店众多,接待旅客过夜。过了一个世纪以后,在1829年,出现了最初的蒸汽船,但因发生几起惊人的锅炉爆炸事件,旅客纷纷规避。于是在1838年又有名为“永不爆炸”的新型轮船的问世。它们于1843年在卢瓦尔河和阿列河大出风头(在卢瓦尔下游的旅客为7万人,

在卢瓦尔河上游和阿列河则为 3.7 万人)。人们对船的速度、娱乐乃至餐饮无不交口赞誉。至于它们有时像普通船一样在沙滩搁浅,这类事故自然尽量少说。一旦发生搁浅,必须用六对壮牛才能把船从沙滩拉出!名为“永不爆炸”的轮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过了十来年后,又不得不被铁路所淘汰¹⁶⁶。

大江、小河和运河当然都要反复进行疏浚。人们在可能条件下竭尽全力去整修河道,这本身足以证明水运的重要。有关开凿新河、扩展航运的建议书可谓汗牛充栋。就以谢尔河为例,疏浚计划于 1679 年提出¹⁶⁷。一度搁浅后,又于 1788 年¹⁶⁸旧事重提,仍属徒劳。1696 年,有人主张开通夏朗德河自昂占莱姆至旺特勒伊段的航运,以便向罗什福尔军港运送木材。波城和欧什财政区的巡按使为把船桅运往巴约讷,于 1763 年¹⁶⁹抢修阿杜尔河的支流奥莱龙急溪。到 1795 年,锡乌勒河两岸的葡萄农要求在该河支流与阿列河之间修一条长 6.5 公里的运河。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这一工程费用过高,且不甚合理,为建造一条短短的运河,竟要拆除三座磨坊¹⁷⁰。

1781 年 6 月 15 日,庇卡底商会提出的另一项计划也十分庞大:疏浚亚眠到出海口的索姆河河道;工程量大得出奇,据估计费用将达 90 万里佛¹⁷¹。由河水和海水随带而来的大量泥沙确实在宽阔的索姆河口不断堆积,多年来已对圣瓦莱里的商业造成严重影响。先后于 1764 年、1770 年、1779 年提出的疏浚计划全都落空¹⁷²。一项宏伟的计划于 1781 年问世:“索姆河将在距出海口不远处堵截”,“河水……由一条沿直线开凿的运河引向圣瓦莱里的前港……运河上将设一座船闸,用以清除泥沙……此外还要建造一条纤道,用马匹取代人力拉纤,纤道的起迄地分别为圣瓦莱里港和亚眠”。这项计划无疑促成了索姆河位于阿布维尔和圣瓦莱里之间的航道的疏浚;我们至此对这项计划不甚明了,但对熟悉索姆河口

(历来深受泥沙淤积之害)的人来说,便能通过以上叙述产生联想。

陆路胜过水路

水路不限于大江小河,必须再加上运河,即“人工挖成的通航河道”(在总长 7 000 公里的通航河道中,运河 1800 年占 1 000 公里;1830 年占 2 000 公里;1843 年占 4 000 公里,铁路的出现终于扼制了运河的增长势头)¹⁷³。还应该加上近海航运,甚至若干远洋联系。第三种交通途径就这样得到了加强,但它的份量是否抵得上庞大的陆路运输呢?

威尔纳·桑巴特很久以前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向我们提供的证据照例很少夹带论战的成分。他以德意志为例进行的论证势必使人联想到法国。让·梅耶正确地强调指出,即使像塞纳河这样一条水量稳定的河流,涨水和枯水也使它每年的使用期缩短近三分之一¹⁷⁴。还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呢?陆路绝对胜过与它平行的水道,这是确曾发生的事。例如在 16 世纪,阿拉斯、瓦朗榭讷或香巴尼的多数大车队在抵达索恩河边后,竟不把货物转交船只运输,“继续上路,直到里昂为止。它们赶到里昂,正值交易会刚刚开始,他们在交易会上备足供应尼德兰的货物,然后满载而归”¹⁷⁵。人们也许还会想到,陆路运输较有规律(但也只是相对而言,赶上农忙季节,农民无暇出外赶车,陆路的使用率便大为降低),而且迅速快捷;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与陆路相比,水运不但缓慢,而且某些娇贵的商品——如纺织品——在运输途中还有损坏的危险。最后,不容置疑的论据:1828 年的统计数字,水运量为 480 万吨,陆运量为 4 130 万吨¹⁷⁶。讨论至此是否可以结束了呢?

我并不是说威纳尔·桑巴特和让·梅耶完全错了。但他们是否很好地提出了问题呢?我们也许应该仔细听听沃邦这位无与伦比的观察家所说的话。他说:“一条中等大小的船,在正常情况下航

行,只用6个人和4匹马〔拉纤〕,其载货量却是200个人和400匹马在普通陆路上所难以胜任的。”¹⁷⁷这的确是个事实:只要一有机会,极其狼奔的货物(木炭、草秸)¹⁷⁸难道不都是自动选择水运吗?石料、熟铁、生铁、谷物、葡萄酒、木柴、泥炭也莫不如此。例如,1796年,人们在阿讷西附近发现了泥炭。一位仔细的观察家指出:“阿讷西盆地四周被很高的山岗团团围住,泥炭外运十分困难,由于运输全靠四轮或二轮马车,而且运价很高,泥炭在当地并不能产生多大效益。甚至,当地开采的泥炭在运到距阿讷西9至10里远的尚佩里以后,其成本很可能还不如在里沃·德日耶开采,经由罗纳河和布尔歇湖运来的煤便宜,尽管水运距离长达30至40里。这就证明,享有舟楫之利的地区总比仅有陆路相通的地区进步更快,哪怕陆路交通已是尽善尽美。”¹⁷⁹1757年6月,据库尔泰伊巡按使的计算,用30至50吨的小驳船从卡昂向巴黎运送小麦,运费可比车辆便宜三倍¹⁸⁰。

由此可见,水运优点在于运费低廉和能够装载重货。这些优点将一直保持到建造铁路为止,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例如,在鲁昂装货的10艘船于1817年7月把供应巴黎的谷物运抵普瓦西,每船载重约200吨¹⁸¹,至少相当于800辆车的运量,因为在18世纪末年,尽管道路的惊人进步已使车辆的载重增加了60%,用四匹马牵引的车辆的货运量也不超过25吨¹⁸²。更何况,即使这里不算细帐,1827年的水运费用仍然比陆路便宜两倍半¹⁸³。

以上见解不论怎样正确,却改变不了关于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相对比重的讨论方向。为了把讨论引向正确方向,我们应看到以下两项事实。

1、据我所能够证实的,木柴并没有被列入到水运量(体积和重量)的计算中去¹⁸⁴。这肯定使水运量减少了一个很大的部分。巴黎及其郊区1786年取暖消耗的木柴相当于70万至80万“趟”木

排,约折合 150 立方米¹⁸⁵。伊泽尔河、波河、阿列河、奥尔南河等大小河流全都发运木排,再经马恩河转送巴黎或鲁昂,成捆的松树主杆则由车辆从孚日山运到巴勒迪克。

2、水路适于中程运输,更适于远程运输:船舶几乎都能走完大小河流的全程。从罗阿讷开出的船驶向卢瓦尔河下游,至少到奥尔良才停下,有时甚至到南特;索恩河上的船如不在格雷靠岸,往往就一直开到里昂为止。水果、葡萄酒、石料、泥炭或木炭在阿列河沿岸装船后,直接运往南特、巴黎或奥尔良。在各河流之间起着联接作用的运河使避免水陆转运逐渐成为可能。水运可见属于大流通的领域,高层次运输的领域。

以上正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事实。水路运输可以与 1827 年的所谓“国家级大道”试比高低。内河运输量(480 万吨)并不是与全部陆路运输量(4 130 万吨)相比,而是与“国家级大道”(1 040 万吨)相比。这两个数字比较下来,得出的比例为 1 比 2。这也正是让-克洛德·杜坦就 19 世纪 40 年代计算所得的比例(陆路占 49%,内河航运占 23%)¹⁸⁶。如果把近海航运列入第三种交通途径,那在内河航运的 23%之上再要加上 25%。比例至此与陆路几乎相等。考虑到木排的运量(我再说一遍,其数额极其可观)尚未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又该作何变化?

最后,为了削减运输开支,减轻法国经济的沉重负担,人们制订了各种计划,试图扩大运河网(1800 至 1845 年间,增加三倍)。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沃邦为了贯通运输,曾主张整修 190 条河流,以利航运¹⁸⁷。水道应该并且可能扩大造福于人的范围。确实,1830 年后,它已证明了对一般陆路的优越性,因为它比一般陆路更好地和更长久的抗御铁路的竞争,保持运输量的增长,直到铁路通过“削价战”才终于取得了胜利¹⁸⁸。水路运输从此回落到它的可能水平以下,并且保持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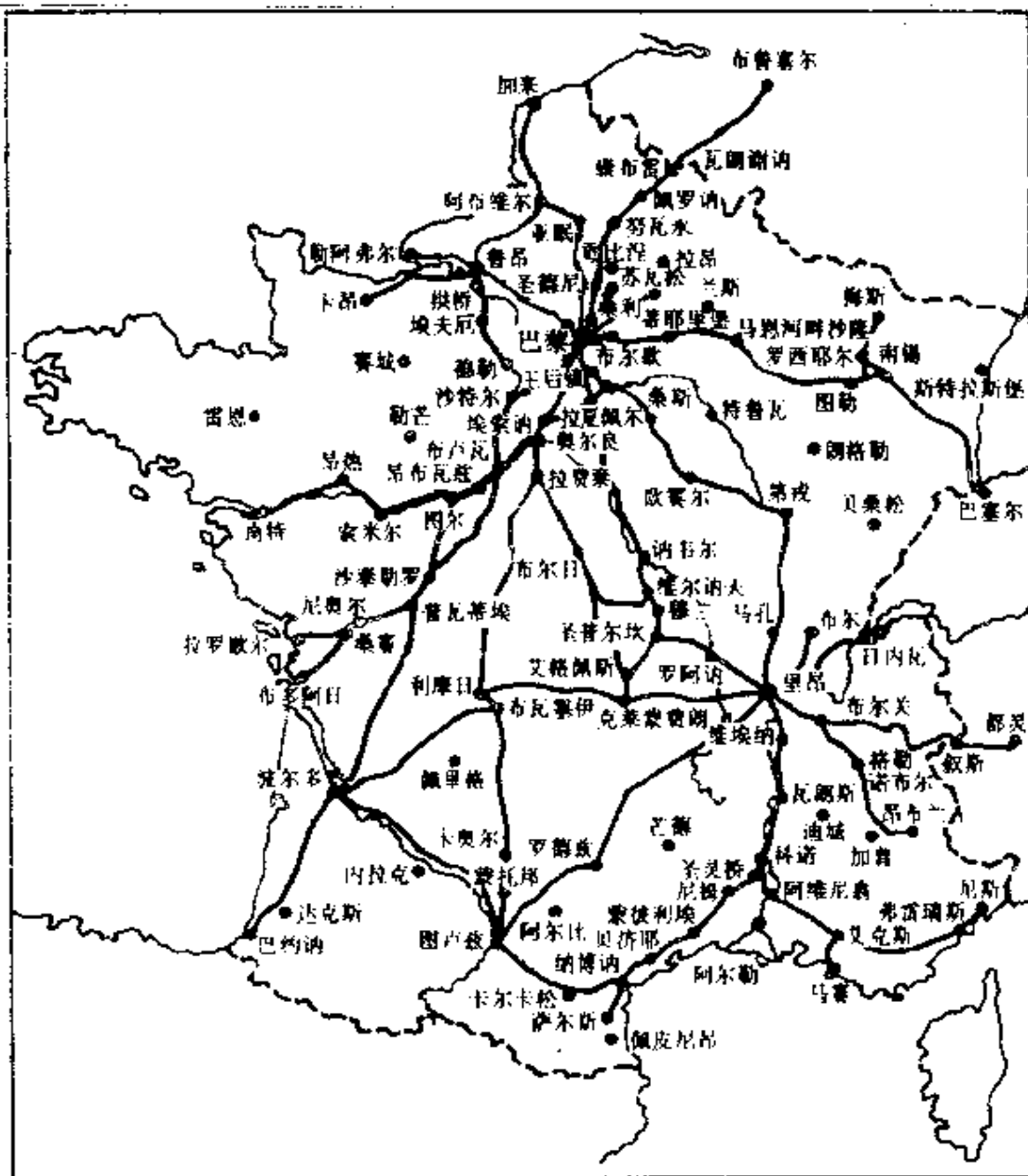
整体：国家的作用

在法国，国家只是通过“控制”全国各地的流通和交换，才巩固了（或不如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当然不是在朝夕之间就能做到的事。国家首先占据了集市、交易会等流通交汇点；集市和交易会需经国家批准方可开办，二者并受国家保护。作为不折不扣的通货，铸币一出铸币厂的门口，就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创建并优先发展驿路运输。最后，国家还越来越关注陆路运输的发展，特别是通衢大道以及由此形成的全国交通网，注意扶持位于交通枢纽地点的城市。

由于法国疆土辽阔，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势必为苏利所不能胜任，苏利虽然名重一时，但此人的作用其实有限，特别在法国蒙受宗教战争的破坏以后，更已退居次要地位。1599年为他特设的法国路政总管一职于1626年被裁撤¹⁸⁹。苏利当时曾特地指出，“修桥补路之事与国王无关”，应由地方当局出资兴办¹⁹⁰。科尔倍尔当政期间（1661—1683年），君主无疑开始投入到大规模的道路建筑工程中去。但是，在科尔倍尔去世后，国家又对道路不那么重视了。

到了18世纪，特别在1735年或者是在1760年以后，国家放手发展交通事业，其规模不但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甚至还超过了国家的良好愿望。确实，随着经济的增长，道路的建造、维修和养护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事；由于修路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项开支也就不断增加。因此，国家从事了一项为它力所未逮的任务，而国家的勉为其难正好暴露出由它自身的结构所产生的各种障碍。

因为，法国的经济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它由一系列外省所组成；各省出自地方的需要，偏重中程的流通。它们维护各自的特权、利益以及日常生活。既然国家长期把建造和养护道路的责任交给各省，道路也就主要为地方性的流通服务。即使由各省巡按使规划



1632 年时的驿道

驿道当时还不像在 18 世纪的时候那样覆盖全境,而主要集中在法国西部和东部。

(参见阿尔弗雷德·费埃罗-杜姆内克:《边沿区,法国的历史地理》,1986 年版。)

设计的大型工程也很少超出地区经济和地区需要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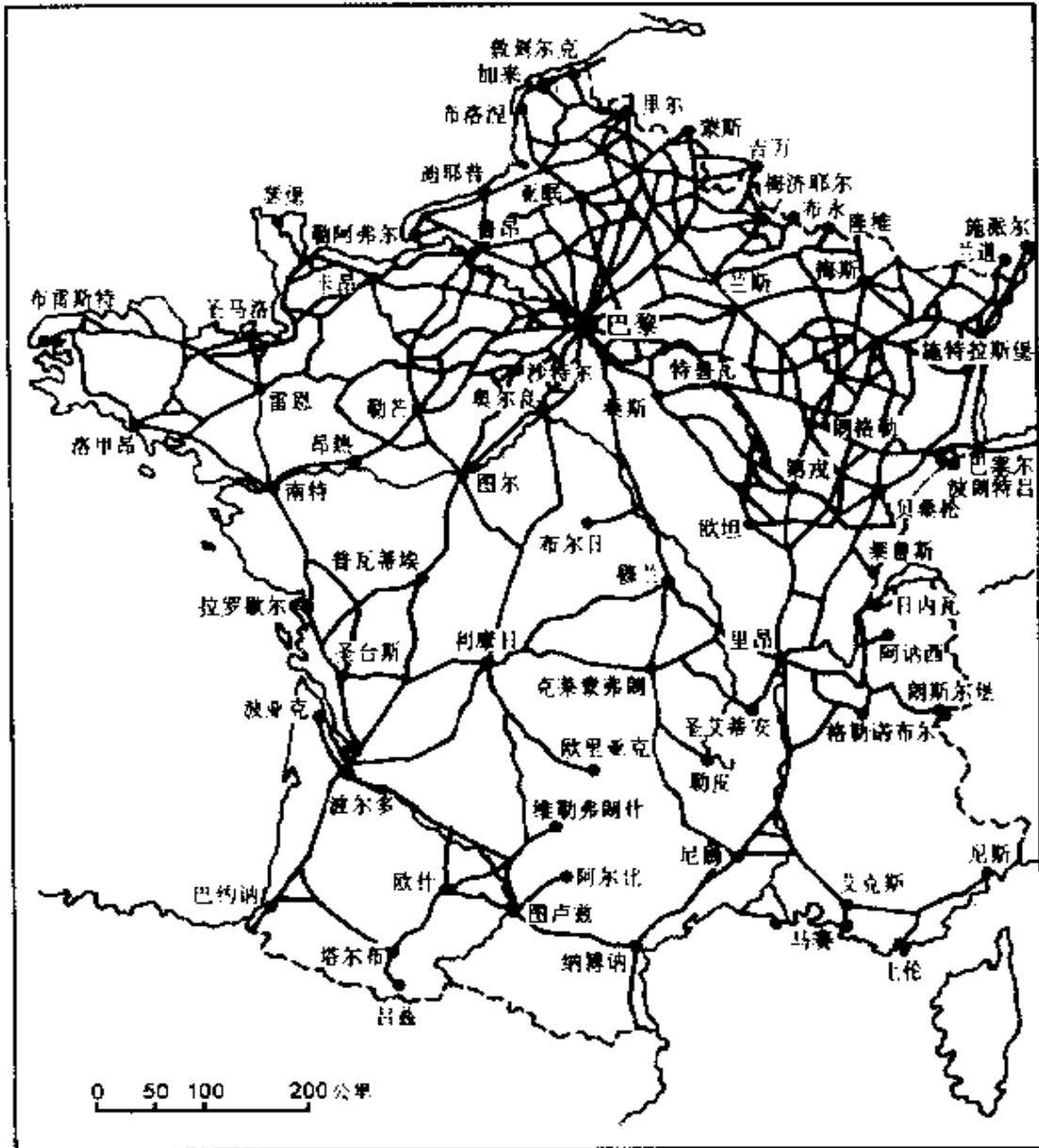
然而,国家对有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当然不能置之度外。它意识到必须让通衢大道脱离地方的格局,使之“非地方化”,并接通“由巡按使在各财政区内建造的地区干线”,以便形成一个以巴黎为起点的¹⁹¹辐射状大型交通网,并且在可能条件下,建立起一个今天经

济学家们所说的“民族市场”。这项任务只能慢慢去完成，尤其因为它有时会遇到地方的抵制¹⁹²。而且，任务越是迟迟不能完成，计划的目标就显得愈加宏大，所需的费用也愈加高昂。

可是，读者也许已经知道，旧制度下的君主并没有把国内的税收搞好。臣民缴纳的税收只有一部分归君主支配。国王借贷无门。建造大道只能根据所谓“徭役制”征调农民劳力。徭役制的规章尚未确定，却于1738年已由奥利总监下令付诸实施；科尔倍尔曾经提出过这方面的主张；至于巡按使，即使徭役制不是他们的发明，但他们主动实施了这项制度。

每年服役12至30天，甚至40天，这是一项极重的劳动负担。尤其，徭役征调一般仅针对距修路工地三、四里远的村民，时间长短不一，负担极不公平。结果造成被征调的“民工”或“役夫”（前者仅提供劳力，后者需携带役畜）的拖延推托。“开明人士”对此又纷纷提出强烈的批评，从《民众之友》的作者米拉波到《百科全书》莫不如此。确实，假如没有徭役制，特吕丹（1743至1769年任桥梁公路局总办）和佩洛奈工程师（1708—1794年，于1747年创办桥梁公路工程学校）就不可能建造起令人赞美的道路，但工程中不免也有人力和财力的浪费。从各村庄抽调的劳力对操作既不熟练，干活又不起劲，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在1701年，由于接连下雨，雨水冲垮了桥梁和道路，蒙托邦的巡按使痛心地说，20万个劳动日就被这几场大雨一笔勾销了，这些“新路不能通车，历时达40年之久”¹⁹³。

所以，在杜尔哥下令取消徭役制以前（1776年2月）和在恢复徭役制以后（同年8月11日），好几位巡按使曾用征收捐税的办法代替无偿服役，以便雇佣专业劳工。省议会1780年在批准贝里的巡按使的这项决定时指出，为了建造3法里（合12公里）的公路，应征劳工和车辆的劳动日拆价可达62.4万里佛，而如果通过不同



1797 年时的驿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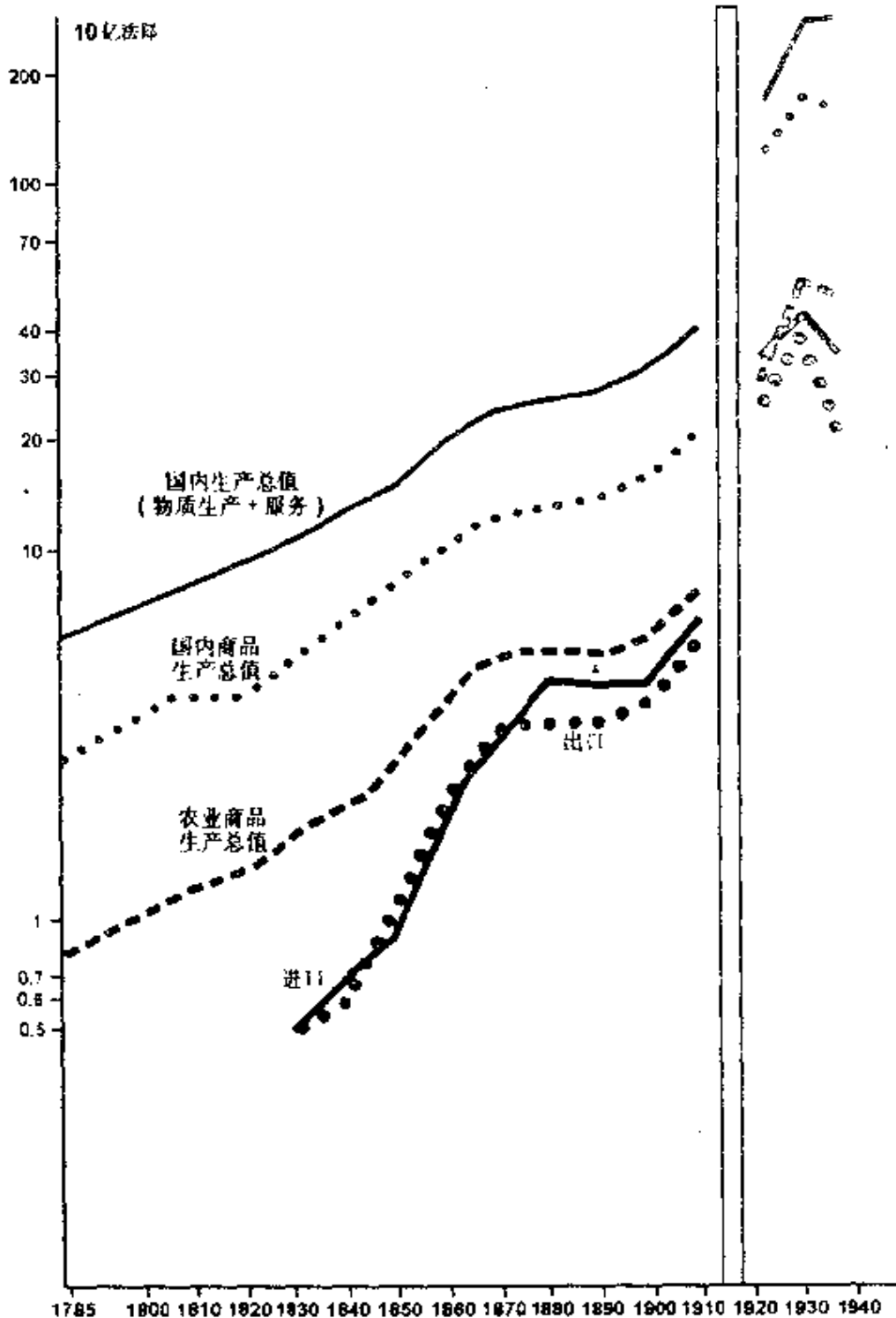
(参见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法国地理图表》和阿尔弗雷德·费埃罗——杜姆内克的《边沿区,法国的历史地理》。)

途径征收 24 万里佛的税金,建造的公路长度就能比原来增加一倍¹⁹⁴。1755 年的一份报告使用了同样的理由,建议在布列塔尼废除徭役制。它解释说,公路的质量,新技术的推广,将因此得益不浅。修路支出每年约达 80 万里佛,“数目确实大得惊人”,但是,

98 283名劳工和 69 918 匹马每年花 12 天功夫修路,无论把工价折算得多低,总该达到 193.3 万里佛。这就比 80 万里佛多了一倍多。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说,实行“征税修路,出工付酬”¹⁹⁶的办法已刻不容缓。

然而,开征新税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徭役制于 1787 年被废除,而税收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索恩—卢瓦尔省的省议会在共和十年(1802 年)不是就公开表示过不满吗?省议会声称,“徭役制能使共和国的公路再现昔日风采,这些公路对贸易十分有利,并赢得外国人的普遍赞美。”¹⁹⁶。

尽管存在以上困难,尽管发展相当缓慢,公路网毕竟有所扩大。在各“大路”沿线,驿站总数 1584 年为 302;1632 年为 623;1701 年为 798;1789 年为 1 426(几乎增加一倍);1850 年为 2 057¹⁹⁷。毫无疑问,直到 1827 年,公路运输仅占货运总量的十分之一。然而,尚不完善的公路网却能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并确保经常的联系。就在一百多年以前,1707 年 2 月,德·台赛元帅在都灵战败后来到格勒诺布尔,出任法国东南方面军的司令¹⁹⁸,他发现与宫廷的联络竟是十分困难,并为此深感恼火。在巴黎和里昂之间,驿站传送的信件十分迅速。但从格勒诺布尔到里昂,信件却靠牛车运送¹⁹⁹。1814 年时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正当拿破仑扼守各交通要道、防止外国军队进占巴黎时,法国东部和北部已遭外敌入侵;但是驿车仍在各地照常通行,虽然不免遇到困难。从斯特拉斯堡、里尔和里昂发出的邮件“因不得不绕道而耽搁很长时间”²⁰⁰,但仍能送达目的地(显然因为广大的国土并未完全受敌人的控制);不仅如此,邮件还定期带来和传播不尽准确的、始终令人不安的各种消息。3 月 30 日的投降使巴黎免遭“洗劫和焚烧”,但城市不能被外敌占领。当联军于 4 月 1 日开进巴黎时,“公众得到通知,邮差于当天照常出发送信,到 4 月 7 日,邮政业务可望在周末完全恢



1785 至 1938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商品生产量

曲线是根据让-克洛德·杜坦提供的十年平均数画成的，数据从 1920 年起中断了十来年，这意味着，1914 年以前依附于金本位的法郎流通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通货膨胀而成倍增加的法郎流通量不能进行比较。

复”。

更加奇怪的是，邮政制度虽不完备，而消息的传递却空前迅速。速度之快每次都使人怀疑是否真实。例如，我敢肯定，帕维亚战败（1525年2月24日）的消息于3月7日传到巴黎，而全靠双脚走路的那些败兵则于3月20日方才抵达首都附近，抢劫四郊的村庄²⁰¹。相反，我决不相信圣巴托罗缪惨案（1572年8月24日）的消息能在三、四天内传到马德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攻占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的消息却在几天内传遍了整个法国。

这里有一个不算重要但又完全可靠的事实，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从巴黎发出的驿车，不论其速度多快，总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穿越法国全境；与此同时，某些小道消息却能像沙佩安装的信号机一样飞速传送，尽管这种电报信号要等到1793年方才真正被发明。例如，路易十六及国王全家于1791年6月22日在瓦伦被扣，这个哄动的消息两天后竟已在位于法国另一端的坎佩尔传开。莫尔比昂省的议员为此致信国民议会：“本月24日星期五上午7时，我们接到了国王及其全家被劫的消息。”²⁰²

流通总量

为了认真地作个小结，我们必须对以往的流通总量进行计算，这里主要参照让-克洛德·杜坦的计算方法²⁰³。他对进入流通网的产品单独算了一笔帐，换句话说，把不被生产者就地消费掉的商品生产总量单独计算。他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了农民自身的食物消费及其牲畜的饲料，还扣除了他们制造的供家庭使用的各种“工业品”（织物、房舍、工具等）。人们或许会说，在严格意义上的工业生产中，特别在城市生产的产品中，也有一部分由生产者所直接消费，并不送往市场。但这部分产品为数不大，而且无从计算，即使忽略过去也无伤大雅。从根据让-克洛德·杜坦的数字制作的第

235 图表上,你一眼就会看到我们所能得出的结果。这些结果毫不含糊地表明 19 世纪的整体进展。

在以上的演变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商品生产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没有在图上画成曲线)。这里不正好遇到我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之一吗?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恰恰体现着非农业人口生活所需的剩余产品总量,其中包括城市、统治者、特权阶级以及有史以来的各种奢侈用品。这一比例只能作个粗略的计算,但即使如此,它也是反映法国以及所有“以农立国”的国家“真实”历史的一个黄金数字。

这个黄金数字因时因地而千变万化。就以 1737 年的朗格多克为例,根据德·巴维尔巡按使的报告,我可以算出,不在当地消费的产品约占全部产品的 14%,其中包括工业产品。由此可以推断,农业生产的商品率当时十分低下²³⁴。

商品率在 18 世纪下半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让·克洛德·杜坦提供的第一个数字,1781—1790 年间食品生产的商品率已达到 50%;1935—1938 年间平均达 75%;1980 年为 95%。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呢?²³⁵

范围狭窄的地方性流通确实已日薄西山;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经济(尽管从未完全做到)也几乎被扫除干净。因此,今天去任何村庄,去任何乡间别业,你所吃的东西都不属于当地产品(在邻居那儿买的几个鸡蛋、一点牛奶和水果除外),你消费的面包、葡萄酒、肉、黄油等食品一般不在当地生产。牛奶和葡萄逐渐由合作社统一收购;至于产品向何处销售,1903—1914 年间,39%的食品仍留在产地……今天的情形就远不是这样了。

旧式的联系可见已被打破。地区性流通正在消失,全国性流通正向辽阔的世界广开大门。如果边界进一步开放,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吃阿根廷生产的牛肉,新西兰生产的羊肉,非洲、美洲和澳大利



0 100 200 300公里

1820年的公路干线网

(参见贝尔纳·勒帕蒂:《陆路和水路》,1984年版。)

粗线条代表业已建成通车的干线,细线条代表尚有部分路段空缺的干线。

业生产的水果,工业品也将来自世界各地……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使我国的交换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经济的交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铁路建设的前后

法国终于完成了国家统一,不依法国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甚

至不被法国人所注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族市场还很脆弱，尚未弃旧更新的经济，就像糖在水里一样逐渐被国际场所溶解，所淹没。

我们今天早已告别了旧制度；在旧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的课题是怎样取消设在各省边界、水陆交通沿线及城市出入口的关卡、栅栏以及严重妨碍王国国内流通的割据状态！国家在成长壮大的同时，陆续把省、城市、地方、领地置于附庸的地位，但它又把一些通行税制度以及公私特权继承了下来，尽管科尔倍尔等人曾试图加以整顿，通行税制度和公私特权仍克服艰难险阻，继续保持了下來。

到了 18 世纪，特别是在 1750 年以后，经济学家纷纷提倡进行有力的改革。福尔邦奈惊呼：尽管有人或许不信，但完全可以肯定，只要“取消瓦朗斯的税卡，废止阿尔勒 2% 的通行税，取消四一抽成，不再在朗格多克与普罗旺斯交界处征收集市捐……把生丝税和原料税减少一半……对里昂经由普罗旺斯向国外输出的食品，特别对省际交流的各种货物，一律免纳通行税”，就能使“货币流通量在六、七年内增加一倍……从而使公共收益也增加一倍”²⁰⁶。瓦朗斯的税卡对法国贸易“危害最大”，仅此一处竟“使五、六个省断绝交流，百业不振”²⁰⁷。且不说在边境、道旁、城门口的无数税卡，货车每次被拦截所受的损失竟比缴纳的税金更高。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1788 年从洛林运往塞特港的一批木材竟在 21 处不同地点缴纳 34 笔税款²⁰⁸！

在以上情况下，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驻巴黎的大使的观感，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了。大使指出，法国的运输业不构成协调统一的整体，而只是三个系统的“人为的组合”：邮车、驿车和一般货车各司其职，各行其令，各守其禁，规定数量之多闻所未闻，细节之烦琐可谓吹毛求疵²⁰⁹。在大革命前夕，《百科全书》不是把夏朗德税务局

的税目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天书”吗？通行税的税率随货物的品种和征税的地点而千变万化²¹⁰。

到了1786年，政府似乎决心在国家政令所及的范围内对通行税进行一次清理。杜邦·德·纳穆尔建议采用一次性征税的办法（进口税分6等，出口税分4等），取代国内五花八门的通行税²¹¹。1786年11月20日，俄国大使西穆兰向本国政府报告了关于法国国内通行税“向边界迁移”的这项计划。他说，“政府部门认为有必要并希望将计划付诸实施，但根据计算，这项措施将使国王的收益每年减少800至1000万里佛，目前的财政状况恐怕难以承受这一损失”²¹²。

法国大革命将实现全国的行政统一，但国内的运输困难并不因此而得到解决。法国在旧制度下，在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未能实现的事，却在1840年将由铁路轻松自如地完成。流通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尽管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尽管工业革命悄然来到，流通仍然不畅——如今将由技术来解决。

且看1830年前后法国的形势。运输的急剧增长使前半个世纪道路建设取得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经济学家杜诺瓦耶毫不留情地指责，在法国的公路上，车辙密布，车辆颠簸，行驶艰难，车辆在“交车时稍有不慎”，难免在道边倾覆²¹³。尤其，运输费用极其昂贵。技术和费用似乎都已达到某种极限。“整个体系不但不能陆续有所改善，反而越来越不适应新的要求。”²¹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铁路终于诞生了。请读者不要想当然地以为，铁路就像高速公路那样，根据一个全国路网的范本逐渐建设起来。为了运输笨重的矿砂，一些地方的工业家纷纷主动兴建铁路。卢瓦尔煤矿公司首先获得了桥梁道路工程局的批准。新建的铁路以英国为榜样铺设铸铁轨，车辆由兽力牵引，把圣艾蒂安的煤（1812年的开采量将近30万吨，1825年则达60万吨）运往里昂。

专门用于运煤的铁路线 1823 年在昂德雷济约和圣艾蒂安之间开通(长 22 公里),该线于 1826 年由圣艾蒂安延长到里昂,1828 年又从昂德雷济约延长到罗阿讷。连接罗讷河和卢瓦尔河的这条现代化交通线将迅速兼营客运和货运业务。蒸汽机车于 1831 年被采用,到 1836 年,客运量达 17 万人。然而,法国在 1840 年还只有几小段铁路线,其分布状况可参见第 243 页的地图²¹⁵。

关于建立全国铁路网的主张曾得到圣西门派的大力提倡,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一场工业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政治革命”,这会大大增强“人与人的联系和城市间的联系”²¹⁶。这项主张在银行界和政界迅速得到传播,国家于 1833 年决定从桥梁道路局收回铁路出让权。然而,正如旧时代的国王一样,国家不愿承担建路开支,而满足于规划路网的分布,“对私营公司实行指导”²¹⁷。铁路当然以巴黎为中心向全国辐射;新建的铁路从一开始起就脱不开原有公路网的格局。

铁路网不如公路网那么稠密。各城市你争我夺,纷纷请政治家、资本家和工程师出面,力求在铁路网占有一席之地;争夺之激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并且往往不择手段,成为我国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城市的前途将取决于这新一轮的“发牌”:布里夫拉亚尔德因位于巴黎至图卢兹的直达铁路线上而使蒂勒黯然失色;格勒诺布尔从此胜过了尚贝里;阿讷西脱离了闭塞的状态,贝桑松则陷于不利的处境。历史命运展现的千差万别就以铁路和工业化为出发点;铁路是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要素。

大家也别以为铁路能一举提高法国的经济水平。铁路问世之初,有人欢迎,也有人怀疑。当巴黎至圣日耳曼的第一条铁路线于 1836 年建成时,阿道夫·梯也尔竟称之为旨在取悦公众的玩具,即一种“高低起伏的滑车道”! 革命家布朗基的兄长阿道夫·布朗基,颇有点书呆子气的国立工艺博物馆教授,就在同一年声称,“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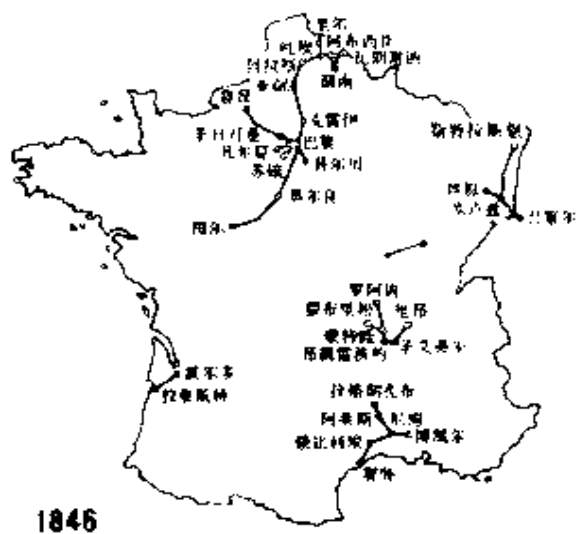
路的运费始终将过于高昂,以致吸引不来货物”²¹⁸。

然而,铁路尽管因运费高昂²¹⁹,有时不能迅速取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但它在被嫁接到旧式流通体系上以后,却从未成为“异体排斥”的对象。这是因为旧体系能与嫁接物配合一致。乔治·杜歇纳于1869年指出,“在运输行业中,各种旧式马车,两轮的或四轮的,轻便的或载重的,仍在互相竞争,使铁路运输得以进一步延伸”²²⁰。铁路线之间空着的广大地区为铁路所鞭长莫及;车辆、役畜就在那里继续从事运输活动。人们甚至还注意到,一些村庄为与铁路接通,竟大力发展和养护乡间小路;与此同时,与铁路平行的一些通衢大道却反而逐渐被废弃不用。到1900年前后,通衢大道将全部被淘汰²²¹。

确实,驿车不可能与铁路相抗衡。1856年10月,《辩论报》的一位编辑对一条新铁路的通车大发感慨:“只要离开中心城市,去稍远一点的地方,那便是驿车的天下:驿车每站都停,让人等得心焦,车夫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套绳断了,随便找几根绳子捆上,车子下坡时赶紧按住曲把或闸瓦,关在车厢里的倒霉旅客被折腾得头痛脑胀;到了这时候,人们就会觉得,铁路旅行该是何等舒适。”²²²从1860年起,各地纷纷要求修通铁路,国家最后也不得不于1880年出资扩建总长1.9万公里的支线。这项建设预计有亏无盈,私人拒绝进行投资。这是未来的铁路国有化的前奏。

后来,随着铁路机车遇到汽车的竞争,大型公路又卷土重来,恢复其重要地位。汽车将花很长时间才把次等铁路线淘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小卡车风尘仆仆地承担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正当凡尔登战役猛烈展开时,汽车在巴勒迪克到凡尔登一线的公路上往返不绝。与此同时,名为“瓦里诺”的窄轨小火车仍继续从事运输,小型的机车和车厢始终保持着巴勒迪克与凡尔登的联系。

正如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沥青路、电、电



铁路的诞生

从 1823 年起,法国开始建造主要用于矿产运输的纯地方性铁路线,25 年后,政府的计划被付诸实施,铁路网以巴黎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参见托马·勒加佐拉和雅克·勒费弗尔:《国家调节流通的作用日益在增长》,1981。)

报、电话、高速公路将陆续出现,最后还有国际航空线;乘坐国际航班出门旅行确实令人心旷神怡,我是享受这一待遇的特权者之一。以上种种,今天已是老生常谈。

但对当年亲临其境的人来说,这些变革该是多么出人意外,多么令人钦佩!信号远距离传送装置自从由克洛德·沙佩发明后,曾长期为政府所专用。19 世纪 30 年代末,人们试图使用电线传送信

号,成为今天的电报。再过几十年后,卢瓦雷省省长 1866 年 2 月 5 日自奥尔良报告说:“皇帝陛下在立法议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是 1 月的重要政治事件。我们在接到电报后立即付印,这个文件几小时后已在奥尔良张贴……我于当晚又发电直接通知各县县长和各镇镇长,要求在市镇各地普遍张贴布告。”²²³事情干得漂亮:

又过 20 年后,1887 年 2 月 1 日,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埃德蒙·戈特指出:“布鲁塞尔与巴黎可通电话。科学不断在创造新的奇迹。”²²⁴就在不久前,我自己也惊喜万分地获悉,巴西的圣保罗已与巴黎的自动电话联网。我迫不及待地立即拨号,与我在 1936 年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通话,当时从巴西坐船到欧洲,竟要 15 天的路程。

拉后腿的旧事物

然而,法国并没有以整齐划一的步伐,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在 1850 年前,甚至在 1914 年前,法国仍然残存着一些地方经济,而且堂而皇之地置身于流通之外。

成千上万个细小事例可以作证。例如,在位于里昂西侧的大村庄蒂兰,1830 年前后,农民去邻近的布里涅赶集,仍用骡驮运小牛,四脚被捆的两头小牛分别挂在骡鞍的两侧。又如,在 1850 年间,沃克吕兹省的一些山村与省会还只有小路相通。旺图山区有个名叫勃朗特的集镇,从那里运粮食去比莱巴罗尼,“驮骡要走 20 公里的崎岖小路”²²⁵。再如,“直到 1850 年,马拉尔斯或拉费日热的农民背着板栗去旺镇赶集,高低不平的小路上费劲地走四、五个小时”²²⁶。至于公路网和铁路网,凡是读过欧根·韦伯的名著的人都能深信²²⁷,一大部分法国乡村或者只是勉强通达,或者完全被排斥在外。

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在介绍圣安托南 1850 到 1940 年的变迁

时,以更加生动的画面,向我们勾勒了法国农村的落后面貌²²⁹。塔恩—加龙省的这个小城位于卡韦塞山的边缘,石灰岩盆地在阿韦龙河及其支流博内特河的冲刷下,形成险峻的峡谷,圣安托南曾有过长久的繁荣时期(罗马式的市政厅,几所哥特式住宅),它一度成为新教徒在鲁埃格地区的据点,1685年因南特敕令被废止而受重创。伤口在过了3个世纪以后仍未愈合。该市在塔恩—加龙省以“永不屈服”而著称²³⁰。

圣安托南城(居民5000人)及其周围的村庄在1850年几乎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城里共有7家小面包铺,前来买面包的顾客不过800人,使用的小麦来自附近农村,由阿韦龙河边的磨坊磨成面粉。其余的居民仍是真正的乡巴佬,他们如果不是自烤面包,便是出钱请人代烤²³⁰。随着人工草场的推广,牲畜饲养有所发展,尽管如此,肉食消费量依旧低下,肉价显得过于昂贵。到了19世纪中叶,货币流通在该市仍不发达。佃农耕种小块土地,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别人家里”充当短工或长工,在多数情况下,“支取实物报酬……为玉米除草可得收成的七分之一,收割一天可得一斗粮食,采摘葡萄可分享榨剩的果渣……总之,所有的产品都在当地交换,换取劳力或其他产品;磨坊主在顾客送来的小麦中提成;织匠代客织布,也有一定比例的留成;铁匠制造一柄斧子,换取客户为他在葡萄地工作一天”²³¹。葡萄酒、禽类、蔬菜、水果也都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特别是核桃可供榨油,更为家庭消费所必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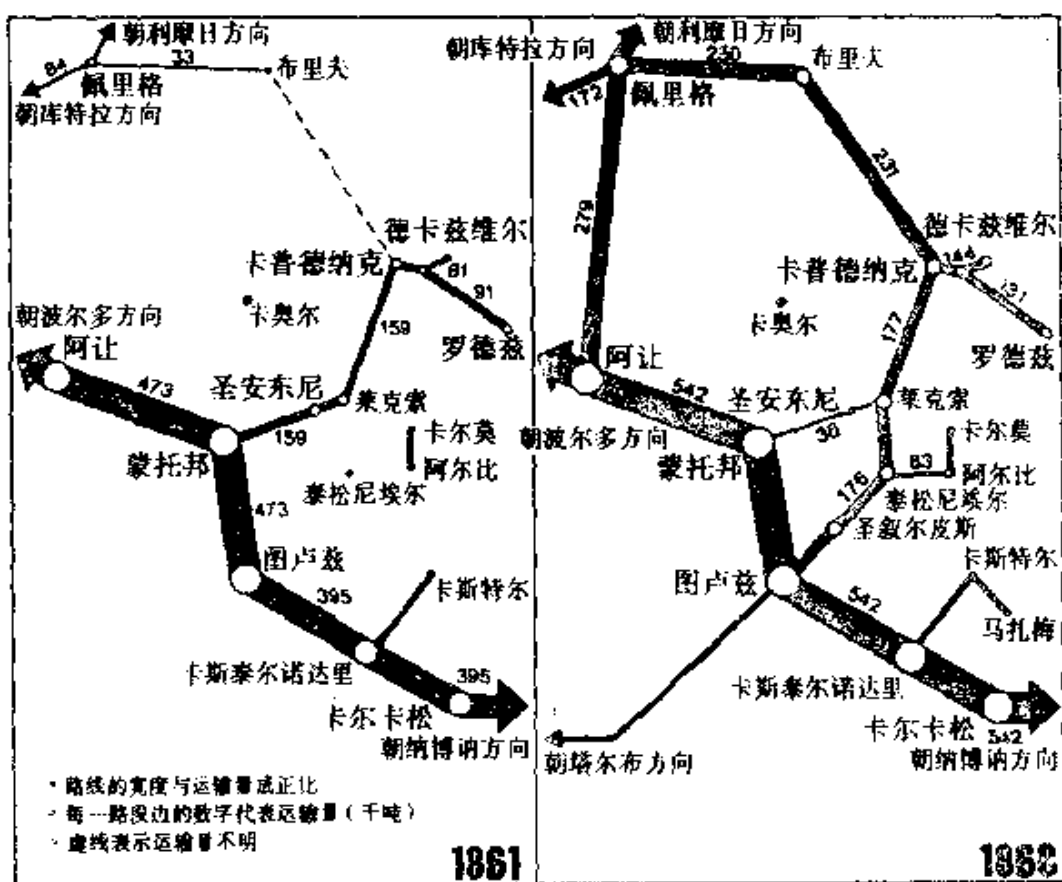
物物交换日复一日地在自动进行,人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白银很少,主要用于积攒,用于“保值”,与常情恰恰相反,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方才动用现金,例如上半年还在自己家里烤制面包的人,由于今年粮食歉收,不得不去面包铺购买面包。总的来说,这种自给自足具有懒散的、得过且过的、不求进取的特征。

商业和小型工业显然取得了一些突破。圣安托南及其四郊饲

养的小牛在交易会上(1860年举行13次)²³²是炙手可热的俏货,甚至罗德兹和蒙托邦等地的客商也远道前来采购;生皮和熟革也广销外地。圣安托南还生产纸张,但设备陈旧,没有荷兰那种现代化的棍筒;此外也有若干纺织工场。所有这些正在衰落的手工业活动,包括毛织业、印染业、制革业在内,都是光辉的过去留下的遗产。圣安托南在13世纪曾是与香巴尼交易会有着紧密联系的城市之一。

在圣安托南四周的乡村,道路十分稀少,出门旅行的人经常在途中遇到困难和不测之祸,因而在几个世纪期间,“修道院每天敲钟(中央高原的岗岭上也往往这么做),以引起迷路者的注意”²³³,“几千所房屋,几千个村落,甚至某些村庄和城市,到1820年仍不通马车。在距圣安托南大道几十公里处,展现着神秘的、闭塞的景象”,而圣安托南大道本身与大流通网并不衔接²³⁴。这里的乡村在19世纪中叶不但没有实行现代化,而且在自给自足的多种经营中越陷越深,集镇手工业的衰落使黄麻种植、颜料作物(特别是菘蓝)和用于加工皮革的植物渐趋消失²³⁵。

克洛德·哈梅尔在其著作中对铁路的出现(1858年)在当地所造成的影响逐项作了分析。大体上看,铁路似乎与环境“格格不入”。当地建成的第一条铁路,从蒙托邦经由圣安托南到卡普德纳克,目的是为欧班的冶金业和德卡兹维尔的采矿业提供交通服务。这条铁路线于1862年自卡普德纳克延长到布里夫,开通了巴黎与图卢兹的直接联系(在这以前,经波尔多中转);圣安托南因此交了好运,可惜时运转瞬即逝:从1868年起,通往图卢兹的干线实行了改道。蒙托邦至莱克索一线当即下降为地方支线(参见本书第247页的地图),圣安托南的过境运输量随即减少四分之三。这个小城市“朝工业革命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特别是1860年在造纸、纺织等行业采用蒸汽机,不久便功亏一篑。唯有制革业以及马具制造、



运输革命与社会变迁

圣安托南市 1861 年位于铁路沿线，该铁路线于 1832 年经由布里夫拉盖亚尔德与图卢兹至巴黎的干线接通。到了 1868 年，圣安托南又因铁路改变路线而遭排斥。

（参见克洛德·哈梅尔、乔治·埃利亚：《运输革命与社会变迁》，1932 年版，“圣安托南地区 1850—1940 年间的经济一落千丈”。）

车具制造和铁匠炉等直接为农业服务的行业勉强维持了下来²³⁶。几乎不与外界沟通的经济继续呈下降趋势，直到 1914 年战争为止。克洛德·哈梅尔最后说：“铁路的影响与人们的希望竟是背道而驰”²³⁷。

人们甚至不能说铁路为圣安托南沟通了与法国其他各地的联系，铁路并没有把这个小城市的居民从自己的小圈子中拉出来。在 1914 年战争的前夕，一张火车票的价格，“即使坐三等车作短程旅

行,对大多数人也还是极大的奢侈”。因此,在1876年,“马拉的班车居然成功地与开往蒙托邦的火车相竞争”。“在日常生活中,依旧以步行居多”,那怕是去三、四十公里路以外的集镇^[38]!

闭门自守、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传统因素长期制约着法国,至少制约着境内的很大一部分地方。真正的门户开放,迟迟未能实现。甚至直到今天,法国的某些农村仍然顽固地、几乎不顾一切地坚持其自给自足的生活。我们应该把这一切归罪于流通的不完善以及造成流通不完善的各项原因。

三 工业与工业化

谈到工业和工业化,我们无疑要面对一些新问题。奇怪的是,这些新问题却使我们又回想起在谈论流通时已经涉及到的旧问题。

从种种迹象看来,工业似乎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大工业,不折不扣地体现着剧变、归宿、奇迹、发展、未来、大生产,一句话,大工业是工业的上层建筑;另一种是小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长期占多数地位,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构成工业的下层基层,其中并包括大批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城乡独立手工业者。

总之,大小两种工业同时并存。皮埃尔·凯耶写道:“至少直到第二帝国末年,工业生产〔法国国内和国外〕还在用两条腿走路。”²³⁹ 弗朗索瓦·卡龙借用了“双重增长”的说法,并指出:这种双重增长,这种双重进步,一直保持到 1880 年,甚至到 1900 年为止。这确实是个令人大惑不解的问题!

著名的经济学家、1972 年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约翰·理查·希克斯主张把“工业”一词留给大工业,这是他的权利。我们甚至多次将试图追随他的主张。但是,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忘记,并存的局面将长期不会消除(且假定并存局面是可以消除的)。根据眼下的情形进行判断,我至今还持怀疑的态度。难道两种工业的对立、并存和互为补充竟是势在必行、不可或缺的吗?

“工业”一词

工业(Industrie)是由拉丁文的 *indo*(在……内)和 *struere*(建造)二词组合而成的,它长期具有“手艺”(habileté à faire quelque

chose),“发明”(invention)、“本领”(savoir-faire)等含义,进一步引伸,也可有“行业”(métier)的意义。只是在18世纪,也许在约翰·劳的时代²⁴⁰,这个词才取得“工业”的通用含义,但在正式让人们接受以前,“工业”不得不先取代“工艺”(arts et métiers)和“工艺制造”(arts et manufactures)的地位;后两个术语进行了长期的抵抗,甚至至今在某些机构的名称中仍得以保留,例如建于1799年的“工艺博物馆”和建于1829年的“中央工艺制造学校”。在19世纪那时,各省还有“工艺制造咨询所”。

“工业”一词在19世纪趋向于泛指一切“生产活动”,不论其规模、形态或专业如何,这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马蒂厄·德·栋巴尔1835年在谈到农业、葡萄种植业、商业、国内工业以及这些实业之间的必然联系时²⁴¹。竟一律使用“工业”(industrie)作名词,例如称农业是industrie agricole,葡萄种植业是industrie viticole,商业是industrie commerciale等等。蒲鲁东的朋友乔治·杜歇纳则说,“各行各业全都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紧密坚实的整体”²⁴²。人们在1853年的一封信中读到:卢代阿克的“居民目前正忙于农业播种,对不涉及这个工业部门(branche d'industrie)的事,仅给予次要地位的关注”。莫尔莱市(菲尼斯泰尔省)商会负责人比这早三年前也曾说过,“本市的工商业虽在许多方面尚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也应承认,形势毕竟已有所改善;假如我们的主要工业(la principale de nos industries),即农业,能以较低的代价和较少的困难生产出某些产品(特别是谷物),形势的改善将会更加显著。”²⁴³埃罗省1857年的一封信件对促进“农业(industrie agricole)和制造业(industrie manufacturière)的繁荣”十分关心²⁴⁴。

在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笔下,商业、制造业和农业也分别是industrie commerciale, industrie manufacturière 和 industrie

agricole)²⁴⁵,原因在于他的讲话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名气很响的农业部长茹尔·梅利纳(1883—1885)同时是孚日地区的纺织工业家,他居然说农业“居各种工业之首”²⁴⁶,这多少有点出人意外。

把农业、运输业、商业统称为“工业”(industries)或者“行业”(métiers),这又有什么可让人觉得反感的呢?既然工匠的作坊属于工业,农民的房屋也应如此,因为无论收谷入仓、保存工具、充当畜厩、供人居住,房屋都承担生产的职能;犁可被当作一种机器,拉犁的牲口则是动力。锄镐与工匠的工具又有什么不同?马西莫·奥热洛强调指出,在1830年前后的法国,工业被有意识地说成是“旨在生产财富和提供服务的各项活动的总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特地作了以下说明:“既然我们的全部物质财富都由工业所创造,我们势必要从更广的视角进行观察,换句话说,为人类活动的效能出发,把发展工业当作社会的根本目标。”²⁴⁷

“工业”一词模糊而广泛的含义并不为法国所特有,大卫·李嘉图(1772—1822年)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及后来的所有英国作家都把“劳动”和“工业”二词混用²⁴⁸。让-巴蒂斯特·萨伊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在他看来,“工业”一词只可能指要让人动点脑筋的“生产性劳动”²⁴⁹。

鉴于以上的现实,1849年索恩-卢瓦尔省的一位勤勉的统计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²⁵⁰;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行政部门所发的表格要求他分门别类地统计工人的人数,却并不说明“工业(industrie)、专门工业(spécialité d'industrie)、种植业(industrie de culture)和农业(industrie du travail agricole)等词的确切含义”。

对于历史学家坦然谈到11、12和13世纪的“工业革命”(révolution industrielle),甚至谈到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工业”(industrie),而丝毫不觉得内疚,大家也不会大惊小怪。这也就等于承认,人几乎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当他能用双手或原始的工具

从事劳动时，便与工业打交道；燧石是工具，掘地棒、锤、刀、剪、铲、镐、锄、锯更是工具。后来出现的杠杆、曲棍、脚踏车床、滑轮等“人力推动的器械”同样也是工具。更不用说“提供动力的牲畜”。

结果，“工业”只是在18世纪英国开始所谓“工业革命”以后（这场革命从此不断在激荡我们的生活），才摆脱了这一大堆的含义和用法。11至13世纪磨坊的兴起只是工业革命的一次尝试，这一尝试确实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它很少变化。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显著特点在于，它通过采纳新事物使革命不断延续和更新。玛丽亚·拉法埃拉·卡罗泽利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1978年）中谈到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²⁵¹。究竟是第二次或者应该算是第三次呢？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随着原子能的应用，已于1945年开始了吗？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第五次工业革命将是机器人、现代办公设施、信息设施的混合产物。我们至少应该承认，工业革命坚持不懈地在我们的身边继续进行，并且正如人设想的那样，还将不断发展；对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的成果，我并不始终感到高兴。

总之，正是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工业”一词就像被抬高了八度的音符一样，陆续解除了其它各种含义，最终只保留最高的含义，即大工业。今天，说到“工业”，人们势必指的是大工业。

“工业家”(industriel)一词最早大概于1770年出自加利阿尼教士的笔下；该词只是在后来才确立其企业主的含义，时间可能不早于1823年，圣西门伯爵那时指出，工业化和工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²⁵²。为使该词变得完全清晰起见，还必须对“工厂”，“制造厂”、“制造商”、“工人”、“工资”、“无产阶级”等关键词作出解释。这些词的词义也同样有所改变。单词本身不创造历史，但他们显示历史的运动。

采用科学的术语

与其使用以上这些至今广为流传的、令人难以抓住含义的词汇，我们不如创造一套毫不含糊的术语为好。使用科学的术语，这个要求未免过高，但这又是必须做到的事。于贝尔·布尔让的一本已被人们忘却的小册子及时为我们帮了大忙：《工业与市场：试论工业发展的规律》（1924年版）。在他看来，无论过去和今天，可被观察到的任何工业现象无不可根据其规模大小和分布地点而区分为三种形态：

1. 家庭“作坊”：工匠或者独自工作，或者雇一、二名帮工，通常与家庭在一起，在所有的情况下，这少数人几乎必须全力投入工作，方能勉强维持生存。“作坊”（由古法语的 *astelle* 一词派生而来，意思是“木块”）这个词最初仅仅是指木匠工作的场所。由于不加区分地被用来确指村庄的铁匠炉、地窖中工作的织机、修鞋匠的铺子等其它活动，它终于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就是说，成为一个不被更进一步的劳动分工所能割裂的基本单位。在一个城市中，这些作坊由行会或同业公会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位于同一条街上，但它们毕竟各有自己的铺面，各自进行独立经营。

2. 分散的“制造厂”：制造厂由一系列基本单位所构成，这些基本单位就是分散的、互不相关的作坊，但作坊的劳动和生产却又听命于一名“制造商”。制造商在一定程度上是联系它们的纽带。制造商向作坊发放原料，按期支付部分报酬，回收成品或半成品（半成品由制造商自己加工为成品），经管产品的销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4世纪佛罗伦萨的呢绒业：羊毛的清洗、梳理、纺线、织造等项工序在首都以及在佛罗伦萨四周方圆60公里内的托斯卡纳乡村分散进行，所有这些活动最后都向中心汇总，掌握在“呢绒业”的商人的手里²⁵⁴。我在上一卷书中曾经提及的

拉瓦勒织布业的发展²⁵⁵也是一个例子。如同在佛罗伦萨一样，资本主义企业的涓涓细流在拉瓦勒也包含着城市作坊和乡村作坊两个方面。

更何况，正是乡村工业的阔步前进在 18 世纪的整个欧洲促进了“制造厂”的兴旺发达。由于在城市中工资水平较高，劳动者且可依仗行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商业资本主义的处境相当困难，但它向乡村发展却如鱼得水。另一方面，置身城市之外的工匠也享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少受监视，生活也较优裕。

德国的历史学家率先把这个过程加以系统化，并在很早以前便称之为“包买商制度”(Verlagssystem)，在其中居核心地位的商人就叫“包买商”(Verleger)，以上两词很难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因而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历史语汇。上帝保佑，就让它们继续留着罢！至于英国人，他们使用了“外包工制度”(output system)这个说法，倒也不错，但我们还是很难译成法文。诸位或许可称之为“预付性包工”，但在同时，最好还要强调这些雇佣劳动的“家庭”性质。因为工匠留在自己家里，在家中从事劳动。此外，在乡村里(甚至在城市中)，“有的工匠兼营农业，参加收割庄稼或采摘葡萄，往往还拥有耕地、园地、葡萄地等”。在 16 世纪，每逢 8 月收割季节到来时，佛罗伦萨的织呢工和列日的煤矿工都下地干活。“到 19 世纪，皮卡底和康布雷齐的家庭织匠于 5 月至 9 月在地里收获甜菜；曼恩省的家庭织匠直到 1860 年仍参加收庄稼。”²⁵⁶即使在 30 多年以前，“孚日地区布萨克工厂的纺织工人白天做工，早晚生产牛奶”²⁵⁷，这类事情还屡见不鲜。

包买商制度遍布欧洲各地(无论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或在塞哥维亚四周的卡斯蒂利亚)和法国各地。仅举一个最不突出的例子进行说明，花边制造业 17 世纪在法国各地的分布：南北方向从巴黎一直伸展到桑利和尚蒂伊，东西方向从埃尔蒙维尔森林到业当

岛和蒙莫朗西森林。其中最典型的村庄是维利耶勒贝勒、萨塞勒、埃库昂、梅尼奥布里、丰特奈昂弗朗斯等。当地的农民不分男女在家制作花边。一些流动商贩(也是乡村的人)分发金银丝线、麻线等原料,集中收回成品,然后骑马送到住在巴黎圣德尼街的定货商的家里。这些定货商往往提供丝线和麻线,负责把花边转销尼德兰、德意志(特别是汉堡)、西班牙乃至“印度”²⁵⁸。总之,这是商业和金融的“汇集”,而不是劳动的“集中”。在17世纪末,当巴黎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时,取得了国家特惠待遇的“法兰西针织公司”共有2万工人为它干活,但这些工人却分散在52个不同地点²⁵⁹。

3. 最后一种可被观察到的形态是“密集型企业”,它把手工工场、制造厂和工厂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点。

这种最高类型的企业正是为了实现工人的“集中”²⁶⁰,虽然彻底完成这些变革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最后的结果将是把不同行业的工场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地点,这是一次数量级的变化,标志着工业发展从此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格尼翁锻造厂的情形足以说明问题,展示该厂全貌的一张原始平面图至今由国家档案馆收藏:它确实包括几座高炉和冶炼炉,几个水力锻锤(后被蒸汽锻炼所取代),以及精炼、铸造、拉丝、轧板等几个车间²⁶¹。这些并列的车间后来还将添置设备,其厂房时合时分,但其活计互相紧靠在一起;以上情形在格尼翁是如此,在克勒佐²⁶²、阿扬日²⁶³和尼德布龙也同样如此。

审慎和保留

这里也许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1. 作坊、制造厂、密集型企业的逐级过渡虽然是基本的、合理的发展途径,但切莫以为这是千篇一律的必然途径。工业不是一个具有独特逻辑的自在的世界,而是庞大、众多的经济活动中的一

种。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工业面貌的改观有赖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赖于具有经常的市场需求以及新技术的付诸实施。正因为如此，亨利四世以及后来的科尔倍尔创办的手工工场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当时的市场尚不允许进行规模生产，而没有规模生产，工业进步也就一事无成；在这方面，例外恰巧证实规律²⁶⁵。

2. 不是逐级过渡，势必就是并存：大中小工业应该和平共处。排斥虽然有时也会出现——烧焦炭的高炉于 19 世纪将消灭远近地区的烧木炭的高炉——，但中小工业毕竟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这在过去显然是如此，今天显然也同样如此：环绕着一些大工厂和跨国企业，总有一系列附属于它们的小厂承包部分工程。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管理层次的多少，成本的差距，工资和效益的差别。

3. 最后，如果回顾历史，于贝尔·布尔让所说的第一种类型并不是工业的原始阶段。工匠一开始并不就呆在自己的作坊里。他们走街串巷，四出飘泊，随时转移工作地点，并且不得不浪迹他乡。我们知道，在 20 世纪的印度或中国，这些流动工匠在城乡各地巡回活动²⁶⁶。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位编年史家在记述日耶河谷的冶铁活动时说，“一些穷铁匠常从外地来到这里，他们并不就此定居，而像候鸟一样往来迁徙”²⁶⁷，这段记述不会使我们感到过分惊奇。候鸟这一形象确实很美！但并不完全贴切，因为候鸟沿着相同的路线反复迁徙，而我们的铁匠则是随心所欲地浪迹四方。

这种流浪活动而且持之以恒。到 18 世纪，冶金业尽管出现了普遍的高涨，观察家们却众口一词地承认工匠和工人队伍的不稳定。一人说，毫无根基、“飘泊不定的群体”²⁶⁸；另一人说，“毋庸置疑的流浪者”²⁶⁹。第三人指出，“田地是恒产，而工匠却无恒心”²⁷⁰。还有一句话出自让-雅克·卢梭之口：“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得罪了工匠，他立即就卷起铺盖，甩手走人。”²⁷¹

在不久前的我国村庄中，除了流动商贩以外，不是还有中国式

的流动工匠吗？他们送上门来，向愿意雇佣他们的人出售、租让他们的劳动。焊锡匠，磨刀匠、通烟囱的工人以及受雇期间吃住都由雇主照管的粗木匠、制桶匠、染麻匠、泥瓦匠、石匠、用锄挖沟的壮工、裁缝、修补椅子草垫的工人等等，名目十分繁多，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尽管手边就有关于涅夫勒省各种工匠的一张长得没完没了的单子²⁷²。

默兹省在 19 世纪劳力过剩，外流的工人惯于“沿着不变的路线”，每年在外闯荡 8 至 10 月。1851 年的一项统计数字表明，诺南的吕村和巴鲁瓦的孔内村各有 40 和 78 名磨刀匠准备带着磨刀石出外谋生，布拉邦勒鲁瓦村及圣米耶勒的吕村还不算在内；阿戈讷地区的博略、拉雷库尔、苏埃斯姆等村庄也有为数甚多的焊锡匠；勒冯库尔和布兰德维尔的修鞋匠前往弗朗什—孔泰、巴黎乃至比利时谋生；一些编蔑匠主动上门，挨家逐户为农庄修理麦簸箕。²⁷³在中世纪的时候，洛林地区的铸钟匠分赴法国各地和西班牙工作。“正当圣女贞德在鲁昂壮烈就义时，就有一些洛林的铸钟匠在场，他们后来为自己的同乡恢复名誉出庭作证。”²⁷⁴

1900 年前后，一些能干多种活计的零工在加尔省的山地和河谷之间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走乡串村，据安德烈·尚松的描绘，“被雇的计件零工有时只干一天，甚至几个小时”，但他们从来不缺活干。他们一周内多次改变活计，轮流充任泥瓦匠、伐木工、掘井工等等”²⁷⁵。

这些流动工匠，由于不能“充分就业”，便在各地流动找一些活干；他们能使我们想象出往昔的“前工业”的古老起源该是什么样子。不论在什么地方，工匠一旦实行了定居，这就标志着工业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阶段。偏离交通要道的某些法国地区——如旧制度下的阿尔卑斯北部地区，至少是上阿尔卑斯地区——即使不是完全对外封闭，也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给自足；这些地区不得不满足

于村庄中的基本的手工业²⁷⁶。但是,这种平衡尽管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多么渺小,它对这个或那个落后地区来说,却是一项既得的成果,一种组织的形态。难道不应该认为,11和12世纪某些城市手工业的兴起是欧洲的诞生和朝着现代化方向走去的决定性因素吗?

分散的制造厂

制造厂名义上虽说分散,实际上却是集中和汇合的准备,它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要求的一种原始形态,也是对城乡之间存在的重大电位差的利用。诱惑力之大怎能让人不加以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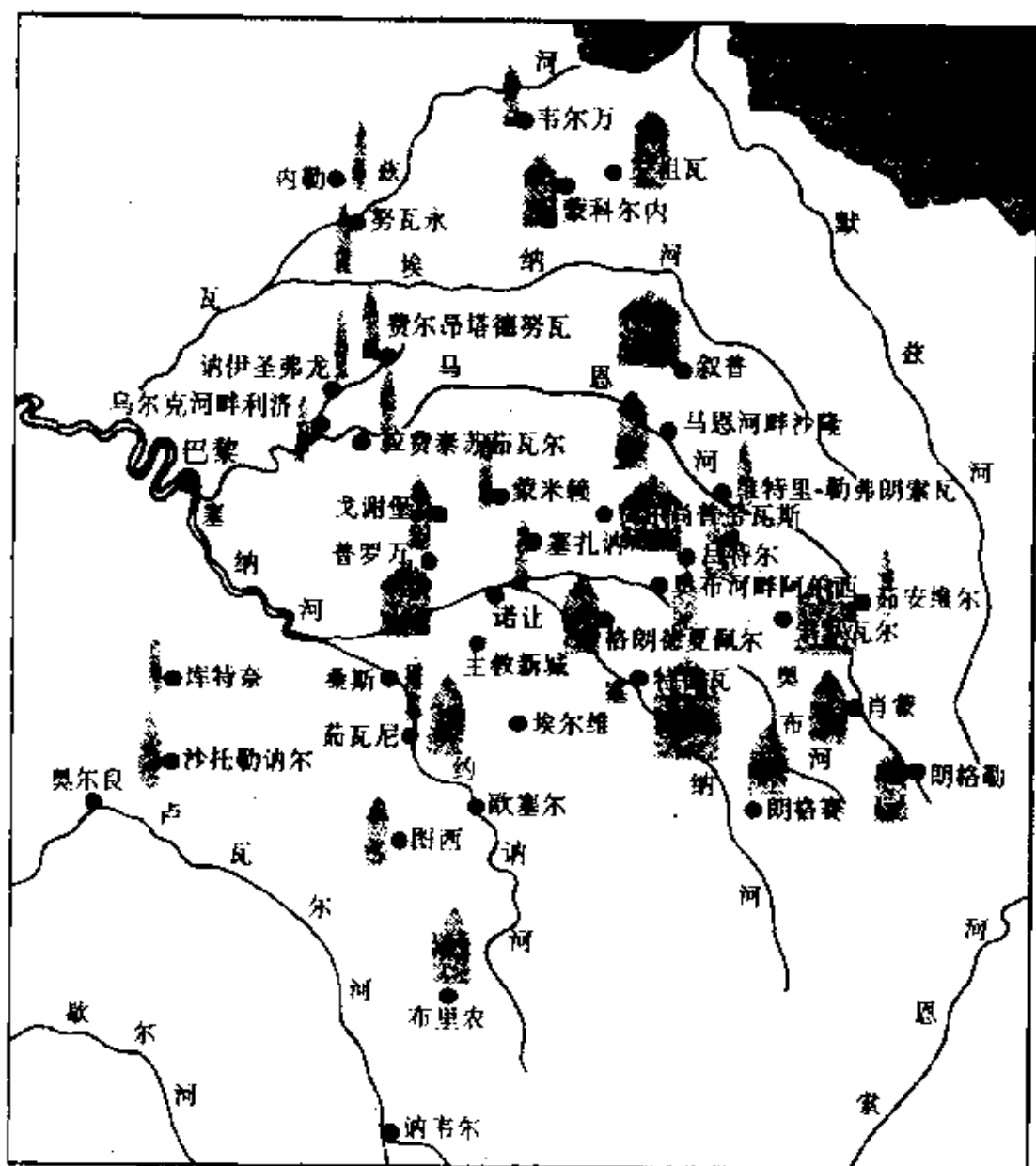
这些集合着城乡力量的制造厂至迟在15世纪以前业已问世,在16、17和18世纪广为发展,特别是在18世纪。拉瓦勒四郊在18世纪竟有7000人参加纺纱织布。绍莱的情形与拉瓦勒相同,1790年曾使下属的77个村庄为它出力干活。圣康坦也是如此,“漂洗场从桑利一直伸展到尼德兰”,干活的工人达15万之多²⁷⁷。同样,瓦龙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个经济极其活跃的小城市,1730年在其四周就有“4915人从事麻布生产,他们为瓦龙的制造商或者种麻,或者纺纱织布”,商人中的德南特家族后来还得到佩里埃兄弟等格勒诺布尔批发商的支持²⁷⁸。遍布法国各地的毛织业,里昂的丝织业,法兰西岛的花边制造业基本上都实行相同的组织方式。

格勒诺布尔的手套制造业在市内具有悠久的历史,于18世纪突破了城市的界限,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实例。1787年,手套制造业总共有6264人,其中作坊主64人,裁剪工300人,整修工80人,定型师傅30人和上色师傅10人(另有220名工人当下手),缝纫或刺绣女工5560人。作坊作为基层单位,往往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房间,一些长日制工人陪着作坊主呆在那里,这些工人多则10至20人,少则4至5人,视作坊大小而定”。所有其他人都在自

己家里为作坊主干活。每个作坊都由鞣革厂提供原料，商人委派的经纪人收购作坊的产品，然后再负责推销²⁷⁹。在这里，发号施令的还是金钱，即资本。既然金钱有权确定价格，金钱就能包围并扭曲行会的旧体系：作坊主沦为一名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他的唯一利益就是再雇佣几名像他一样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为作坊干活。

以上情形对圣艾蒂安的饰带制造业同样适用。那里的作坊主可分两类：“胆小的一类宁可推行不冒风险的来料加工”，另一类则致力于商业活动，不再从事饰带的编织。基层的饰带制造作坊，室内十分宽敞明亮，“装有巨大的窗户，但尽可关得密不通风，以免从外面带来脏物，弄脏丝绸”。总的说来，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加上通风不良，境遇更加恶劣。圣艾蒂安当时还是个小城市，饰带制造越出了城市的范围，在雅里、福雷、瓦莱等地全面铺开，1786年总计有26500人参加这项工作，作坊数量之多可谓星罗棋布²⁸⁰。色当的织呢工人分居市内和市郊两地：25名批发商在方圆25公里的范围内雇佣10000工人干活²⁸¹。从卡西尼绘制的马扎梅市及其市郊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自17世纪末开始兴旺发达的工业活动，于1789年后转向小城市的四周扩展。

在冶金业方面，包买商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活动。锻铁炉分散在法国各地，依傍提供动力的河流，并且紧靠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炉主在多数情况下接受客户的定货，如尼韦奈地区的一位大商人1689年在罗什福尔收到大批定购的货物，又如海军冶金总办1720年曾向贝里、尼韦奈、弗朗什-孔泰、勃艮第地区分发定货单²⁸²；炉主也向制造商定期供货，制造商的资本控制着从炼铁（原料）到制造工具的全部生产过程。再以下诺曼底地区为例，制造商就在每年举办10次的栋夫龙牲畜交易会上，与曼恩省的锻铁炉主签订合同。商人向炉主提供的铁将分发给“许多工人”，后者“亦工亦农”，在自己家里主要“加工铁钉”²⁸³（沙尼是诺曼底的制钉中心），也制



特鲁瓦稽察所下属的纺织品制造商(1746年)

制造商总共有 1138 名,各自拥有 1 至 4 台织机。在我们使用的报告中,有两个城市没有提供制造商的确切人数。我们根据报告提及的织机数字估测了制造商的人数(不尽符合实际)。

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卷宗号 F12748)。

造锁和小五金用品。

由此可见,无数个细小的生产单位分散在各地。它们的数量还将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瓦朗谢讷商业局 1795 年向前来

北部省视察的“人民代表”佩累提供的数字,人们不会感到过分的惊奇。在埃诺、佛兰德、阿图瓦、康布雷齐、庇卡底等五个省内,麻布生产为 150 万居民谋得生计,其中包括“种麻人、纺纱女、工匠、批发商、漂洗女和整理工”²⁸⁴。直接参加生产的人至少有 40 万。这个数字与朗格多克毛织业使用的劳动力不相上下。

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劳动力都被纳入到包买商系统之中。但是,包买商确实支配着大部分劳动力,由于这一制度的推广以及随之产生的城乡平衡,包买商制度的寿命很长。甚至奥伯康普于 1760 年创办的著名的印花布制造厂(到 19 世纪初,又投入了大笔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也实行这一古老的制度²⁸⁵。过了很久以后,即在 19 世纪的时候,“交换契约”也还屡见不鲜,订约一方是提供活计和回收成品的老板,另一方则是由一名所谓工头带领的一伙工人。交换契约与伦敦当时成衣业实行的“血汗制”有点相似,“血汗制”的词意足以表明,这是对室内贫苦劳动者血汗的剥削。在法国,巴黎的商店长期委托外省的男女农民加工产品(服装、绶带、钮扣等),一直到 20 世纪初仍然如此²⁸⁶。委托加工的好处十分明显:商人既可支配廉价的劳动力,又可避免与工人及其权利要求发生直接冲突,如果不再需要工人,他立即就抛开不管。

就拿眼下的情形来看,我国的一些采办商在南朝鲜订购帆布鞋、服装或收音机,在香港订购闹钟,一些法国纺织工业家把图案寄往印度,再接受在印度织好的成品,然后在国内销售甚至出口,这些与老办法究竟又有多少差别?被剥削的无产者距法国很远,但包买制本身还是不变。劳动力的受雇和解雇自动进行,不受工会的约束。采办商从中占了天大的便宜,今天的工业资本主义对此莫不怦然心动,却不知这原是古已有之的旧玩意儿!

手工工场或最初的工业集中

尽管“包买商制度”的传统形态延续了很长时间,最早于18世纪在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将席卷法国,并逐渐打破其原有的平衡。法国的企业将渐趋完善,渐趋集中。

我已经指出,我所说的“集中”,是指人和机器等生产资料集中在同一地点,而我所使用的“汇集”——调整是指企业的资金和商业组织汇集在最高的层次。资金和商业组织在上层的汇集比生产资料在下层的集中更容易和更早实现,早在19世纪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业已完成。保尔·贝洛什认为19世纪的许多进步和发展应归功于18世纪,我深表赞同。²⁶⁷

最初工业集中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时代随着“手工工场”的建立而逐渐形成,或不如说,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确实,“手工工场”一词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该词在旧制度下被到处使用,而且用得并不恰当。历史学家出自解释历史现象的需要,决定赋予它确切的含义。我们用该词确指旨在汇集大量生产资料的原始工业集中。例如,在纺织行业,手工工场除集中织机外,还增设储存原料和成品的仓库,染色的大缸,漂洗羊毛的清水池,推动缩绒机的水轮,晾晒布匹的木架(旺洛贝迟至1712年在阿布维尔建造的厂房被称为“架子房”)²⁶⁸。除水轮和个别马拉转盘外,机器数量很少,几乎并不存在。手工工场主要把人,把各具专长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工具照旧不变。集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显然有其好处;工人将在工头的监视下工作,随时受工头的指挥,尽管后者当时还没有这个头衔。一些工匠从此告别自有的生产资料,离开家庭去工场劳动。这是一次重要的彻底变革,其意义随后还将变得更加深广。

政府在这方面往往起着因势利导的作用。政府慷慨大方地给予某些企业王家手工工场的荣誉称号(直到1787年为止),并让工

场的门卫穿上象征着国王徽饰的蓝白红三色制服。但是,比这项荣誉更加重要的还是工场同时享有优厚的特惠待遇:垄断权,保护价,赠与、低息或无息贷款,不受行会规章的束缚(唯有正式任命的“巡视员”方可监督手工工场的生产),这最后一项权利对工场至关重要;此外,工场的工人可免除参加民兵抽签²⁸⁹。

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行这项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新鲜。鉴于工业发展的迟缓和混乱,科尔倍尔早已试图加以整顿。他想扩大就业,减少失业。尤其,考虑到法国的金银资源少得可怜,他要发展工业品出口,以便回笼货币和贵金属。为此,政府于1750年试图在多菲内建立丝织工业²⁹⁰。总之,这是一项不失为明智的政策,尽管决策者从未有意识地推行工业集中,而且成果也少得可怜;潜在的工业集中将在18世纪中叶以后自动实现。只是到了那时候,手工工场终于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德国历史学家对这一成功的重要性提出了异议。鉴于德国的情形与法国十分相似(包括波兰和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都曾经历过手工工场的阶段)²⁹¹,他们断然指出,手工工场至多只占工业活动的五分之一。威尔纳·桑巴特尖锐地责备马克思不该认为工厂或制造厂是手工工场集中劳动力的产物,在桑巴特看来,工厂或制造厂的诞生是增加新机器的结果²⁹²。其实,这条规律大体上没有发挥作用,手工工场并不是工厂的前身,即使从具体实例看来,似乎是手工工场在向工厂转变²⁹³。这场论争也许偏离了问题的要害,就是说,手工工场证明,由它所派生的、前途远大的工业集中过程在工业革命前早已必然地开始了。

毫无疑问,18世纪手工工场的集中尚未完全达到规律所要求的程度。有关的事例很多,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确切无误地证实上面的论断:矗立在比耶夫尔河边的壮丽的戈伯兰手工工场²⁹⁴;圣戈班玻璃制造厂²⁹⁵;位于蒙托邦的维亚拉特·戴尼昂兄弟手工

工场²⁹⁶；早在科尔倍尔以前建于1660年的“大狗”呢绒手工工场和建于1644年的迪戎瓦尔呢绒手工工场(均设在色当)²⁹⁷；还有经常被引证的、历时甚久的旺洛贝手工业工场(设在阿布维尔)。最后一家手工工场是科尔倍尔和瑞斯·旺洛贝于1665年创办的，旺洛贝从荷兰带来了50多名工人，它于1784年变成了王家手工工场。阿盖索1708年5月31日自巴黎写道，该工场后来所达到的完善程度，“堪与英国最好的细呢手工工场相媲美”²⁹⁸。如果把在架子房中使用的壮工以及在自己家里为工场劳动的男女纺纱工计算在内，这家手工工场当时集中的工人在3000名以上。

因为，无论在法国国内或国外，手工工场通常还兼营包买商的业务，控制着一大批小作坊。就纺织业而言，为使一台织机穿梭不息，至少应有12名男女纺纱工人提供纱线。与其把这些人集中起来，纺纱工序使用包买商制度岂不更加简单，耗资比较低廉？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利用大批顺从的、廉价的乡村劳动力。

在手工工场中央厂房长日工作的工人究竟占多大比重？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厂房的规模和容纳工人的数量了解甚少。虽说在维勒纳韦特以及在穿越洛代沃市的莱尔格河两岸，至今还残留一些旧厂房，但这些房屋早已经过改造，当年如何使用还是一个问题²⁹⁹。我们仍然不能作出确有把握的回答，更提供不了确凿可靠的平均数。只有几个零星的数字，虽然多少也说明一点问题。

18世纪末年，旺洛贝在阿布维尔雇佣的在厂工人共1800名，另有10000名工人在家劳动³⁰⁰。在维埃纳的夏尔韦呢绒工场，在厂员工仅占全体工人的三分之一³⁰¹。在奥尔良，一家机织袜厂1789年仅800名工人集中在厂内，留在厂外的工人比这多一倍以上³⁰²。马扎梅有一家哗叽厂，1810年雇佣“100名工人在厂内工作，1000名工人在厂外工作”³⁰³，前者负责整理羊毛以及印染和上浆，

后者从事纺织。这样的组织形式与一个世纪以前在沙托鲁所见的情形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据说，在1697年，沙托鲁的“一家工场是国内最大的制呢厂之一；它雇佣10 000名工人，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来自市内或来自郊区”³⁰⁴。显而易见，“手工工场”这个模棱两可的词在这里所确指的，并不是从事集中生产的厂房，而是分散为无数小单位的市内和市郊的纺织生产活动的总和。

从总的情形来看，手工工场无疑“慢慢在趋向集中”；车间的工人数量明显增多，尤其在机械得到推广以后。自1765年使用了纺织机械后（1800年普遍推广），棉织工业顿时具有相当宽阔的发展基础。缫丝和织绸也逐渐采用机械（1727年在里昂出现首台机械化织机）³⁰⁵。然而，纺织工人仍顽固地抱住传统不放。毛织业及棉织业不是就曾出现过令人咄咄称怪的反复吗？纺纱部门自从骑上了机器的骏马以后，便把乡村作坊统统抛弃，而在手工工场的厂房中（厂房位于提供动力的河流沿岸）集中生产。以往原是纺锤难以跟上织工的节拍，如今却是主要仍以手工操作的织匠必须增添人手。人们于是把织布的工作大量委托给厂外的工人去做，厂外的劳力众多，报酬低下，大多分散在乡村地区³⁰⁶。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70年代依然存在，尽管从1860年起开始采用了由蒸汽推动的织机³⁰⁷。

以上列举的所有例子都涉及纺织工业。鉴于纺织工业直至19世纪初在经济中仍占统治地位，由它担任主角应该是完全合理的。然而，除纺织工业外，其它的工业集中也应予以指出，例如在煤矿、冶金、造纸、玻璃、造船等方面。另一种类型的工业集中在一场革命的推动下问世，有时甚至出现在纺织业的集中以前。技术和机器在这里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技术和机器的存在本身就迫使某些部门实行现代类型的工业集中和放弃乡村工业。马克思关于手工工场加机器等于现代工厂的公式因此将获得另一种意义。

机器和技术的发展值得我们重视：它像一条滚滚东流的长河，不但把旧制度远远抛在后面，而且对现代工厂的工业化业已产生和即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大工业与新能源

大工业首先是推广新技术、采用新能源和适应消费新需求的产物；大工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而它自身的发展却受消费需求的制约。

今天向远离地球的空间发射的火箭装有逐级点燃的几个发动机。这个多级装置决定着火箭的运动。工业化进程也是这样。它需要拥有逐个使用的、间隔显然很长的几个发动机。即使在今天，工业化不属于瞬间的进程。

实际上，任何发动机用久了总会磨损，迟早会达到极限。由水力、风力推动的磨坊于14世纪达到了它们的极限。木材主要充当能源，兼有太多的用途，不可能消耗尽净，但从苏利那时起，木材价格之高已令人望而生畏³⁰⁸。发展兽力的可能性极其有限，康替龙说过，无论是马还是人，都要用食物喂养³⁰⁹。至于人，虽说单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人多势众，加在一起，可供工业支配的能源也就大大增加。不过，工人的工资起码要适应人维持生存的需要。每当人口增加，食品价格立即上涨，紧接着便是工资的上涨，生活费用的高昂危及既存平衡，并使工业放慢发展速度；工业的高涨与物价，工资的上涨是互不相容的。

机器的好处是它不吃东西，不增加劳动力的价格。然而，当它使用的能源达到其效益极限时，只有革新技术，使用新能源才能重新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样的机会并不是立即出现的。发明是一回事，革新又是另一回事；即使在今天，一项发明要有效地使用到生产过程中去，平均总要花四、五年时间。19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两种新能源——煤和蒸汽——也离不开以上的规律。它们将慢慢地发展起来。

上述内容不难理解。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总会遇到财政、技术、心理等多种障碍，阻止新体系的适应。有时候，由于没有更好的新方法，还必须一成不变地袭用老办法。第一帝国初期在巴黎发展的棉纺工业主要使用马拉车盘，正如许多年以前英国的早期机器³¹⁰一样。同样，法国的冶金业直到1750年乃至以后，竟仍然是木炭炼铁和焦炭炼铁同时并用。水力资源长期与蒸汽相竞争。蒸汽首先在北部的卢瓦尔河地区和莱茵河上游地区发展起来，而法国南部和布列塔尼地区沿用磨坊水轮还将拖很长一段时间³¹¹。蒸汽机在各地的推广旷日持久。在1847年，诺曼底“工厂所需的动力有58%仍靠水力提供”，过了10年以后，据统计，在法国734家棉纺厂中，只有256家使用蒸汽，占三分之一强³¹²。

阿德里安·普林茨的考证使我们能就近观察在洛林地区的阿扬日的新旧之争，这一冲突发生在芬希河谷由汪代尔家族经营的矿山³¹³。1825至1870年间，煤产量由3000吨提高到13400吨，而从种种迹象看来，那里的变革似乎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煤取代了木炭的地位，但蒸汽机却并未因此立即被采用，许多新厂房一如既往地建在芬希河沿岸，这不仅因为那里有空地，而且也是为了利用由一系列水坝拦起的落差。水力依旧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种叶片水轮因占地过大、转动缓慢和运作不正常而被废弃。但在1860年，阿扬日所使用的水力仍有500匹马力，蒸汽动力则为1024匹马力。轧钢机的水轮在1880年始终在转动。间或停歇时，工人们便乘机去附近的咖啡馆打一局牌或吃一点土豆（看门的女人把土豆在板材加温炉的热灰中烤熟）。当水轮重新转动时，他们便回来各司其职。应该看到，在1870年，汪代尔家族位居法国企业之首（占国民产值的11.2%）。

泥煤(18世纪又称煤石或煤矸)进入工业活动是木材危机的产物,这场危机早已出现,并逐年变得更加严重。我国的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也经不起日趋加剧的采伐;木材可用于家庭的取暖和烹饪,烧成木炭后可用于冶炼生铁、熟铁和钢。它也是制造木屐、木斗、木桶、车辆、犁所不可缺少的原料,是房屋、船舶的必要建筑材料。除高炉、锻铁炉、熔炼炉以外,用木材烧火的工厂还有玻璃厂、啤酒厂、石灰窑等等。

法国具有森林众多的有利条件,因而比英国较易抗拒这场潜在的危机。英国很早使用煤石为伦敦供暖,英国率行采用焦炭炼铁,其部分原因是迫于森林资源的穷竭。法国的自然条件较好,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就没有想方设法地、迫不及待地、拚命地去寻找煤炭矿藏。只是到了18世纪,商界才真正染上了“采煤热”,向原来的商务理事会提出的无数的探矿和开矿申请即足以为证³¹⁴。

煤的另一优点是它提供相等的能量,价格却比木柴便宜,这一优点将不断扩大。煤取代柴因而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从热量的角度看,1吨煤相当于2.5吨木柴;同等重量的煤,价格要比木柴便宜得多。在七月王朝时代,以相等的能量计算,煤价只等于木柴价的三分之一;到第二帝国期间,勉强达六分之一。新能源的降价已成为1830至1870年间促进法国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³¹⁵。

法国煤炭消费量于1815年达到100万吨;1827年上升到760万吨;1860年为1500万吨;1900年为4000万吨,其中三分之一从国外进口。在这4000万吨煤中,600万吨用于冶金;450万吨用于铁路;250万吨用于包括采煤在内的矿业³¹⁶;约有500—600万吨为“7.7万台蒸汽机或蒸汽锅炉所消费,其总功率可达120万马力……其中既有一年仅使用几个月的普通农用移动式锅驼机,也有不分日夜为工厂提供动力的巨型高压蒸汽锅炉”。阿韦奈尔子爵以上的话可能使人暗中发笑,但确实也表达了他对当时取得的出

色成绩的钦佩³¹⁷。他所提供的数字何况还低于实际情形,因为他没有把铁路机器及其马力计算在内。为此,据伊夫·居约的计算,1895年法国共有蒸汽机8.54万台,总功率达612.1万马力(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用于铁路)³¹⁸。综上所述,煤已跃居能源的首位。“磨坊水轮”的功率总共还不到100万马力。于1757年11月9日立约创办的实力雄厚的昂赞矿业公司在1791年已雇佣4000名工人³¹⁹。

问题在于法国的煤矿数量不多,开采困难,成本高昂,我几乎要说,情形委实可悲。开采的地点离消费的地点隔着很长的路程,由于运费很贵,从昂赞运到巴黎的煤每吨价格达33法郎之高。此外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在1900年,法国工人平均每年采煤200吨,而西里西亚的工人则达300吨³²⁰。在法国做煤炭生意当时往往得不偿失:在法国境内经营的297个矿井中,1900年就有123个矿井亏本³²¹。法国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煤炭方面的出帐大体上相当于在1945年后乃至今天的石油开支。如同今天一样,法国工业当时受累不浅。兰斯的一位织造商于1834年声称:“我们使用列日、蒙斯、昂赞等地开采的煤,消费量达12万百升,每百升价格为5.20法郎。煤价过高……原因是运费太贵(每百升4法郎),我们在利兹的竞争对手支付的煤价每百升为0.55法郎,便宜十倍。”因此,每公担铁在巴黎价值30法郎,在大不列颠的加的夫则值15法郎(322)。这对法国是个严重的不利条件,尤其在当时,纺织业在工业中的领先地位正逐渐被煤和铁所取代。

不管付出的开支多么昂贵,法国毕竟必须获得工业用煤以及家庭取暖用煤(煤取代了木柴)。巴黎在1890年前后每年买煤的支出约9000万法郎,包括粒煤、原煤、煤球、煤砖、纽卡斯尔煤、无烟煤等。今天上了年纪的巴黎人都经历过中央暖气问世前的时代,他们还能回想起从前经售煤和引火柴的奥弗涅“煤黑子”的形象:—

只空口袋盖住脑袋和肩膀,另一只装煤的口袋背在背上,脸上沾着漆黑的煤屑;他们把煤一直送到房屋的顶层,就像早先提着水桶在井边或塞纳河中取水的送水工一样。这些从前的“煤黑子”是否已在巴黎绝迹了呢?

精益求精

在朝大工业方向进军的过程中,在随着时代的前进,新技术的应用促使工业门类日趋复杂化的循环运动中,法国落在了后面。夏普塔尔于1819年写道:“从前,学者们的发现或被束之高阁,或被送交科学院备案,不产生任何实效,制造商似乎想不到实施这些成果能对他们的经营会有多大的好处……如今,二者之间开始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工场主向学者移樽就教……他们互相依靠,朝着改良工业的目标阔步前进。”³²³这是夏普塔尔对未来的清晰展望,就法国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也许还偏于过分乐观。但是,英国却在这以前早已跨过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鸿沟。

发明及其应用都属于文化财富,并且像所有的文化财富一样,自动传播,自动扩散。无论谁想保住秘密,都纯属徒劳;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曾想把技术秘密据为己有,但未成功。机器和工艺很早离开了岛国,来到英吉利海峡的彼岸。从18世纪下半叶起,一些英格兰或苏格兰企业家纷纷到法国定居,其中的威金逊曾与伊格纳斯·德·汪代尔一起,为创办克勒佐工厂作出了贡献。这些企业家在当地制造英国的机械。大不列颠的一些工人和工头也先后来到诺曼底、里昂、福雷等地。与此同时,一些法国企业家和工程师也经常出国旅行,从事今天的人所说的工业间谍活动³²⁴。在1815年后,因法国革命而中断了的双方交往变得空前活跃。英国于1842年终于准许机器输出,各项输出均经法国转口³²⁵。最早负责建造铁路的法国工程师莫不奉英国为师,尽管有的人并未真正踏

上岛国的土地。

其实,技术传播与发明创造一样是古已有之的事。既然人类始终有所发明,这些发明也历来传遍全球,例如史前时期的青铜和铁;长期遭人覬觐的丝在查士丁尼时代传到了拜占廷;火药在被发明后离开了中国。举较近的例子来看,德意志工人于15世纪将采矿和印刷技术传遍了欧洲各地,不久又传往欧洲的境外。英国人在18世纪初也进行工业间谍活动,以便仿制波伦亚一个世纪前发明的并始终保守秘密的自动缫丝机³²⁶。

相反,科学与技术之间对话的历史却并不悠久,我这里所说的技术是指与经验相结合的一种辅助性科学,默默无闻的技术实干家往往不自觉地也具备真正的科学家所特有的科学态度。总之,二者的关系像是同一幢楼的两个楼层,因而辩证法在其中起着作用。科学与技术今天不断在互相传球,但在过去,这种情况比较罕见。16世纪著名的数学家塔尔塔利亚曾应威尼斯兵工厂(当时在技术方面居西方之首)的请求,向工匠师傅提供咨询。工匠师傅问他射石器取什么角度发射可以达到最大的射程。数学家计算后说,这最佳角度应是45度³²⁷。可是,关于18世纪前的这类例子,历史学家举不出很多;至于在工业化浪潮开始后,这类例子又简直太多了。

必须要举的第一个例子是蒸汽机,19世纪进步的典型象征。蒸汽机不就是技术与理论科学长期互助(以技术为主)的产物吗?在第一台蒸汽机定型后,难道不正是它的被使用以及为它设想的几种用途而呼唤促使和强制人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吗?H. J. 亨德森有一句俏皮的名言,他说“科学受蒸汽机之恩,大大超过蒸汽机受科学之恩”³²⁸。这是不言自明的事。第一台名符其实的铁路机车“火箭号”(1829年)由英国工人乔治·斯蒂文森(1771—1848年)所发明,他在经过补习后当上了工程师³²⁹。技术万岁!这固然不错,但还应看到,“火箭号”机车的别具一格正在于它使用了装有给水

管的锅炉,后者则是约瑟夫·蒙戈尔费埃的侄子、法国工程师马克·色甘(1786—1785年)的发明³³⁰。因此,在某些场合下,也应高呼理论万岁。反过来,随着蒸汽机的使用,由此积累的经验对理论也可资利用。热力学于1860年的诞生宣告了物理学的一门新学科的蓬勃兴起³³¹。蒸汽机的不完善确实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蒸汽在机车汽缸中的膨胀和压缩照例不遵守古老的马略特定律,并突然损失15%至50%的功率。直到1870年,一位名叫古斯塔夫·阿道夫·伊思的阿尔萨斯工业家(1815—1890年),此人醉心于形而上学,终于解决了问题:在实践中,只要在汽缸中避免水的形成和存在就够了³³²。

当然,科学和技术在这方面还将继续发展,对机车的器械、铁轨、枕木、车厢的挂钩、车轮(便于走弯道)作出新的改进。

科学促技术,技术促科学,关于这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冶金工业在法国国内和国外经历的众多变革充当了见证。“19世纪标志着钢铁的广泛应用,不仅在制作梁、桥、架等方面替代了旧材料,而且还取得了制作铁轨等器材的新用途。”³³³使用者和顾客纷纷主动提出要求,刺激生产,催促对新发明的实施应用。焦炭取代了木炭,结果使生产的钢铁质优价廉:贝塞麦炼钢法(1856—1859年)、马丁炉(1864年)、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炼钢法(1878年)都是标志着“冶金革命”、“科学炼钢”的里程碑,而“冶金革命”则主要是为制造耐磨损和抗撞击的铁轨所必需的。产品首先以质量为重,汪代尔工厂在第二帝国期间正是因优质而获益³³⁴。于是便陆续开始寻求新的合金钢,建立各种实验室和信息体系,名目极其繁多的科学冶金法从此也就成为势在必行。

在电力方面,科学与技术也同样进行对话。但这里的对话过程却与常情背道而驰。正如弗朗索瓦·卡隆所说,“电在成为工业以前已是一门科学”³³⁵。决定一切的理论准备业已由安培(1775—

1836年)、阿拉戈(1786—1853年)、法拉第(1791—1867年)、麦克斯韦(1831—1879年)等人所完成。实践和试验随后才登上舞台。钟表匠兼物理学家路易—弗朗索瓦·布雷盖(1804—1883年),身兼炮兵军官、工程师和企业主三职的威纳尔·冯·西门子(1816—1892年)都曾有所建树;泽诺布·格兰姆(1826—1901年)更表现出色。这位非同凡响的发明家生于列日附近的一个贫苦的多子女家庭。由于“书写错字连篇”,学习成绩很差,他先当上了细木工,尽管干活心灵手巧,生活却过得着实艰难。他于1855年来到巴黎,仍然当他的穷木匠。作为细木工,他于1860年进入了专门制造电器的阿莱恩斯公司。电器简直使他着了迷,后来,当他在采用电镀法加工金银器的克里斯托弗尔工厂就业时,突然灵机一动,想设计一种新机器。自然没有人对他的计划感到兴趣。在他的妻子的帮助下,他于1869年“在厨房的一只桌子上安装起机器的基本部件”³³⁶。计划因战争而推迟,他后来才向科学院展示了格兰姆直流发电机,这种用曲棍操作的发电机几十年前在我们中学的物理课讲堂上还可见到。它不但不靠电流转动,反而能够利用一台蒸汽机发电。当然,这位发明家无意中接受了前人的启示。对历史学家赋予木匠发明家的功劳,科学家们通常提出异议。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道理。在技术革新和工业进步的运动中,格兰姆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更何况,在格兰姆之后,电力的发展势如破竹。直到1870年为止,“电力主要用于满足电报的极其有限的需要”³³⁷,莫里斯·多马指出,电力作为“现代工业的主要象征”,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西门子于1879年建造了第一台电气机车;德普勒于1883年在维济耶和格勒诺布尔之间的14公里的线路上实现了输电;巴黎于1906年安装起有轨电车³³⁸;首都在1906年为照明用的电线共长671公里,而同期供

照明用的煤气管道则长达 25 万公里³³⁹。电化学在此期间已对整个化学重工业进行了重大的改造。随着水力用于发电,一种新的能源终于问世,并且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与煤和蒸汽机进行竞争。

一个世纪以来,工业更使技术和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直到 1924 年前,我每年都返回默兹省的家乡,我还记得,村庄中照明的大煤油灯用铁钩悬挂在餐桌的上方,油灯本身以及灯罩都以半透明的白瓷为材料。我能回想起早年在巴黎的煤气灯下进行学习(直到 1920 年为止)的情景,灯头的白炽网罩很容易破碎。

还有二三件往事的模糊回忆:大约在 1910 年左右,我的母亲试图给我讲解什么是电影,但又讲不清楚,我在一旁听着,如堕十里云雾之中。我隐约记得,在 1913 年,我与伏尔泰中学杰出的拉丁文教授亚历山大·梅尔洛一起,第一次见到在巴黎上空飞行的飞机。就在同一时期,我几乎战战兢兢地靠近我毕生第一次见到的电话机。最后,1913 年 9 月,听我父母讲,他们乘坐在特雷沃赖镇上开设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的一位邻居的汽车出外游览夜景。

知其然,再问其所以然

我们以上使用于贝尔·布尔让的框架,即使经过修正并赋以例证,也只是有助于归类和叙述。能否对确认的顺序问一个为什么,并进一步在演变过程中以及在伴随着演变的行为中推导其意义?在法兰西工业永不停止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问题是要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些反复起作用的和导致几乎同样后果的规律?照乔治·古尔维奇的说法,这是一些“倾向性”规律,以避免使用“法则”一词;他正确地指出,“法则”一词对人文科学难以适用。

首要的规律无疑就是所谓“第二个上帝”。这个不寻常的说法见诸较晚出版的一本书,昂都纳·卡约在书中写道:工业“如同第

二个上帝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³⁴⁰。萨伐里·台布吕斯龙的《贸易辞典》不是也与以上的说法不约而同吗？辞典写道：“人们历来认为，工业奇迹是从需求的怀抱中降生的”³⁴¹。朗格多克巡按使巴维尔对人类智慧的崇敬更胜于对上帝的崇敬，他写道，“居民不辞辛劳耕种土地，而收益甚少，由此蒙受的损失仿佛要通过工业和商业特有的才能，由自然界给予补偿”³⁴²。

热沃唐的情形十分典型，在这个贫穷的高山地区，寒冬迫使农民困守家室。甚至不必有包买商的怂恿，他们都利用当地生产的羊毛，努力织造粗呢，而且销路居然不错。据1740年的一份报告说，“热沃唐地区约有5000台织机”³⁴³。在“适于耕种土地”的季节里，一半织工停止织呢。他们夏季务农，“一年中的6个多月，由于土地和房屋被冰雪所覆盖，他们呆在家里”从事纺织。他们织造的呢绒在山下的交易会上出售，对这些山民的艰难生活倒也不无小补。

附近的塞文山区，情形也是相同。还有阿列日地区，特别是米尔普瓦主教区，在这个穷地方，除了作坊主，就再也找不到殷实的人家。马扎梅的四郊多系“不毛之地”，居民因此专心从事纺织活动³⁴⁴。1733年的一份报告在全面谈及朗格多克的情形时甚至指出，拥有肥沃的土地并“满怀希望进行辛勤耕作”的农民往往入不敷出，而在贫瘠的土地上，农民因“收成很差，从事作坊生产”，却能“使穷人得以维持生计和承担各项开支”³⁴⁵。这无疑是事实。乡村工业的好处在于，它可补充土地生产的不足，不论土地的产量多么微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乡村工业是第二个上帝。它从不排斥农业劳动，乡村工匠至少耕种小块土地，经营菜园和喂养几头家畜。

城里的情形当然有所不同，手工业在城市始终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它自发地诞生于城市以及市郊居民的需求。那么，城市手工业是不是抵御贫困的第二个上帝呢？这里有必要对贫困以及对贫困的性质和存在理由先取得共识。城市肯定不是规律的例外。

试举里尔为例，城市人口过多促使工业的快速增长和朝多样化方向发展。法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居民 51 人，而北部省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 100 人这个临界数字。里尔区的人口密度更高达 255 人！由于人口过多，各种工业兴旺发达，力图突破法国国内市场的重重障碍，并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市区几乎历来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地窖里和院子里也充斥着众多的无产者。这是一个出现较早的极端的事例。城里的人累得精疲力尽，穷于应付，纺织活动便向四郊的平原地区泛滥³⁴⁶。以上情形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同样的原因往往产生同样的结果。从今天的情形看，新加坡、香港、南朝鲜都因工资较低和劳动日极长，工商业取得引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切都以大量的国外定货为转移，因为在目前，整个发展过程（且不说它是整本的戏剧）要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在这里，我们也还必须说，工业是第二个上帝。

我们更可以说，工业仿佛是一扇太平门，需要的时候始终都能打开。它也像是起死回生的一帖药，即使是苦药。尽管工业发展不时会出现故障，会突然中断，但它必定能恢复前进。它像一条河流，在其漫长的流程中，不但能冲破和克服各种障碍，而且河水的流量也在自然而然地增加。甚至百年战争及其潜在的危机也阻止不了它的前进。工业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有所削弱，便在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地区重新缓过气来。这里似乎有一条补偿法则在起作用。旷日持久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或 1714 年）经常被引以为例。人们不是往往谈到战争在最后几年中造成的实业凋敝和经济萧条吗？一位在兰斯进行调查的官吏于 1703 年 4 月 6 日写信报告财务总监说：“大人，现在我敢对您保证，由于特别的幸运，该市的大宗贸易在这场战争中竟没有受损失或损失很小，城内也没有一名工人失业。”³⁴⁷我不打算把以上的“调查结果”普遍推广，“由于特别的幸运”这句话不允许随意推广。我并不否认，特别在随

后的岁月里,由于1709年严酷的冬季等气候条件的影响,法国的手工业将蒙受困难。但是,说到底,关键在于工业的长河仍未枯竭。假如在和平的条件下,情况显然会好得多,何况在1713—1714年达成和平后,情况也确实变得越来越好。

大革命时代和帝国时期的法国将是更好的见证。一些历史学家拚命渲染当时如何灾难深重。对他们的一片真诚,我并不怀疑。可是,他们究竟说得对不对呢?当时的对外贸易确实一落千丈(进出口总额1789年为10亿里佛;1795年为5.5亿;1815年为6.22亿)。但对外贸易只占整个贸易的一部分,而当时的贸易额在法国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如“第二帝国以后(1852年)那么大”。尤其,拿破仑时代的“工业生产指数高于旧制度末年的指数”³⁴⁸。我因此赞同塞尔日·夏萨涅的见解³⁴⁹,认为在旧制度与热月反动之间的法国,工业的结构和产量保持着连续性。甚至在热月反动以后,尽管法国在战争中丧失了巨大的有生力量,情况也没有变化。法国所缺少的乃是工业革命。这不就是原来的老问题吗?工业革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果,唯独英国在17和18世纪完成了工业革命。就法国而言,早在1789年以前,工业的命运业已确定³⁵⁰。

法国在19和20世纪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我所提供的初步论断是否反而适用呢?障碍是否已经克服了呢?尽管1870年战争对法国的民族自尊是个极其痛苦的打击,但它肯定没有使法国经济沦于破产。这已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法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空前的考验,情形又有什么不同呢?让·布维埃帮了我大忙,代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只是在短期内遏制了法国的工业增长。法国并未因此一蹶不振。战后接着出现了两次相当迅速的增长,弥补了战争期间的损失,进而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使生产量和消费量上升到前所未见的

高度：从1944年到1977年（弥补性增长包括在内），工业生产扩大了12.8倍。”³⁵¹由此可见，损失得到了弥补，发展的连续性始终得以保持。即使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危机对此也无可奈何：就工业而言，法国渡过了1929年危机的难关，这场危机确实比1857年危机或1810年危机更加难过；据历史学家说，后一场危机对帝国的危害甚至超过西班牙战争。但法国终究已经渡过了所有这些难关。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展现在我们眼前，经济萧条犹如一潭死水，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危机也正在克服之中。

工业默不作声地奋力向前，随时迎接各种挑战，准备对付国际的不景气或政府的愚蠢；这种一往无前正体现着工业发展史的基本趋势。人们在介绍这一历史时往往把它分成段落，却不知这些段落构成一个连贯的、延续的、时有反复的和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我们要对业已作出的解释再次加以考察，因为过程和联系势必反复重现，互相渗透，互相制约，并且同时共存。不存在剩余的农产品，便不可能有工业；工业要靠人去发展，必须有剩余的乡村劳动力投入到繁杂的工业活动中去；工业产品没有销路，工业活动也就不能维持下去。为部队制造呢料的洛代沃在革命和帝国期间大发横财³⁵²，马扎梅向加拿大出售其哔叽，拉瓦勒生产的布远销西属美洲，如此等等。贸易因而是工业活动的主宰。如同工业一样，贸易取决于信贷和银行，也就是说，受制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之所以不快，原因就在银行出力不够或者帮助不及时；这话不是已成老生常谈了吗？浩大的商业洪流推动工业发展，犹如河水推动船舶前进。这一切汇合成充满活力的、体现生活必然的、普遍的前进运动。

反复的波动

若说经济生活势必推动着和包含着连续不断的工业活动，若

说这种连续性是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岂不是与工业特有的节奏相矛盾的吗？人们确实隐约看到，在轰轰烈烈的起步以后，有多少次突然出现停顿，节节后退，乃至跌入低谷！从单个的企业看，工业发展遵循的规律似乎是不连贯的，企业寿命都很短。人们经常谈到被废弃的村庄，应该承认废弃的手工工场和现代工厂也为数不少！

莫里斯·多马在其《工业考古学》一书中列举了法国各地业已关闭的各家工厂的遗址，厂房或者只剩断垣残壁，或者已改作它用。建筑物的“恒久常在”与企业的“转瞬即逝”在莫里斯·多马的笔下恰成鲜明对照³⁵³。我们且在他的带领下，去实地参观宏大的手工工场。

在朗格多克地区的洛代沃，宏伟的圆拱形楼房依然矗立在横穿市区的莱尔格河的岸边³⁵⁴。不远处便是维尔纳威特手工工场的厂址。同许多其他手工工场一样，这家工场依山傍水，来自黑山的激流可供清洗羊毛，平整呢料和推动磨坊的水轮。工场打破了长寿的纪录：它于1677年创办，经过长时间的衰退，直到1954年才完全停工。今天的参观者还能够“几乎完整无损地”看到18世纪组织的原貌，从工场主的住所到宽大的拱顶仓库，装置机器的真正厂房，排列在几条街上的工人住所（兼充家庭住房和织布作坊），还有水利工程的引水设施。约有12个村庄拱卫在这资本主义堡垒的周围³⁵⁵。在阿布维尔、色当、卢维耶等地，还有一些今天已经破败的状如古堡的漂亮建筑，它们也是大型纺织企业诞生、成长和死亡的见证。在我们的导游陪同下，我们可走遍法国各地，寻找往日的高炉、锻铁炉、冶炼炉以及其他的冶金设施，从佩里戈尔地区到上马恩省、沙蒂永省和科多尔省，又从朗德省到布列塔尼地区；我们将顺便参观唯一已被列为历史文物的一座高炉，这座高炉晚至1865年建在默尔特—摩泽尔省希耶河边的孔拉格朗维尔，过了15年后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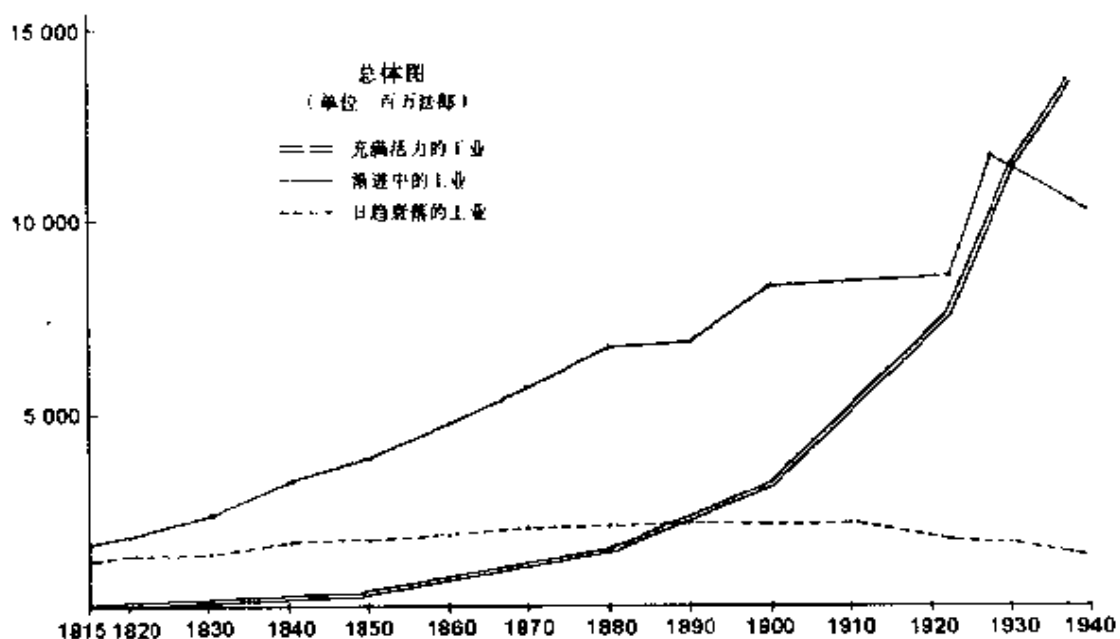
告停工³⁵⁷。

我不打算对这许多难得被利用的历史资料发表长篇大论,只想着重指出工业活动的繁荣为时十分短暂。在这里,我与瓦尔特·霍夫曼有关工业革命的英国的见解殊途同归³⁵⁸,霍夫曼的论断完全可以扩大应用于18和19世纪的法国。其实,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论断超出了本已十分宽广的时间跨度。

与其说是论断,不如承认这是一条规律,甚至放心大胆地称之为法则。瓦尔特·霍夫曼认为,任何工业,不论在什么地点和以什么为对象(我再补充一句,也不论在什么时代),都从诞生到停止大体上呈现一条抛物线,经一段相当迅速的上升后达到巅峰,停留片刻再直线下降。我们且把他所提供的例证搁在一边。我在另一部著作中使用了霍夫曼的这条法则,举出16世纪时可惜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作定量分析的例子³⁵⁹。即使在创办时出尽风头,即使在鼎盛时强大有力,工业企业总是寿命不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在前进途中会遇到有利的机遇,它却必将屈服于命运,迟早要走这条下坡路。

总之,一个村庄的兴衰前后总要延续几百年时间,而一家工厂却从没有把握保持一百年的繁荣——可能的例外只是证实了规律。我们的结论是:相比之下,工业的寿命显得短暂。由于工业发展首先是人定胜天的历史——我们时刻都与一些追逐幸运的企业家在打交道——,工业企业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人至多只能抓住短时段;而长时段,特别是超长时段,为人所不可企及。

以上确认的事实并不妨碍我回到我挂记在心的原来的论断,就是说,在民族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整体考察,工业活动具有渐进的连续性,尽管从表面上看,上述事实与这种连续性似乎相矛盾。工业潮流从不停歇,并且自动地趋向于扩展。如果失败和下滑是一条规律,那么,生机勃勃的起飞又是另一条规律。可以说,整个情形就



充满活力的工业、渐进中的工业和日趋衰落的工业

(材料来源: 蒂奥米尔·马尔科维奇的《1789至1964年间的法国工业, 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学报》, 1966年。)

像是有加有减的一张帐单。我坚信, 在外界条件比较有利时——政府的举措得当, 新市场的开辟, 经济形势的好转, 竞争对手的消失——, 整个工业便会向前发展。我的论点散发着乐观的气息。我敢毫不自欺欺人地确信, 在这个问题上, 蒂奥米尔·马尔科维奇这位对18世纪至今的法国工业史最熟悉的专家站在我的一边。他把众多的法国工业划分为三类: 起着创新、带头作用的新工业; 勉强维持现状、即将趋向衰败的工业;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工业³⁶⁰。这种划分完全接纳了瓦尔特·霍夫曼的解释, 我从马尔科维奇的著作中借用的草图在这里足以说明问题: 工业运动取决于技术革新; 经过以上提纲挈领的叙述后, 我们便与门施、安德烈·皮亚蒂埃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革新是工业永葆青春的秘密, 是心灵手巧的、必不可少的技术对工业的奖赏。

剩下尚待解释的还有衰落本身, 为永葆青春需要反复采用的

措施,以及最终展现工业命运的这些经常性波动的理由。显而易见,在过去,就连亨利·赛这位一丝不苟和熟悉资料的历史学家也是借用政治分期来考察历史:复辟王朝发生了什么事?七月王朝、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又发生了什么事³⁶¹?后来,我们从弗朗索瓦·西米昂划分的经济阶段出发进行了思考:1817至1852年的下降,1852至1876年的上升,1876至1896年的下降,1896至1929年的上升(跳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等等。可是,看来工业在下降时期的发展有时竟比在上升时期更快³⁶²,这个问题真有点令人棘手。能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虚假的问题或不可解决的问题抛开不管呢?或者,是否能够从危机的角度再作什么解释呢?人们也许可以认为,在经济增长时期,由于冲突和竞争的减少,利润和需求的扩大,所有人都能分享好处,包括跛脚的鸭在内。而在经济危机期间,生产一落千丈,利润急剧下降,国内和 international 的竞争更趋加剧,结果却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³⁶³。这种优胜劣汰对从事革新、寻找新途径和开辟新出路可能也有所裨益。我们这里又遇到另一个问题:怎样解释危机本身?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结果是小企业仍继续存在

历史学家今天一致公认,旧制度下的法国由于领土广大,资源丰富,人口居欧洲之首——俄罗斯除外——,是当时欧洲的第一工业大国。但是,这个领先地位建立在资源、历史进程和小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资本的集中虽在里昂、里尔等一些大城市或在马赛、波尔多等大港口业已完成,但这些活跃的经济中心却宁愿把资金挪作它用,企业家们全都明白,兴办工业要冒风险。可向工艺制造业投资的大资本集中在巴黎,但巴黎也倾向于发展商业和运输,对纺织业和冶金业并不重视;与其兴办呢绒工业,还不如从西班牙进口羊毛,再转手出售色当和埃尔伯夫生产的呢绒。首都的呢绒商在

17 世纪对发展呢绒工业表现的兴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简单地说,在 1789 年,法国的经济生活虽然朝气蓬勃,但其工业生产方式却依旧不变;棉纺、采矿、冶金等部门的某些例外只是证实了规律。基本上从英国输入的工业革命难以打破法国的旧格局,只得与后者同时共存。

这种延续了整个 19 世纪、甚至一直保持到 1914 年以后的工业体系,人们称之为“次工业”,或用蒂奥米尔·马尔科维奇的说法,叫做“广义的手工业”,相对而言,集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大工业则是“本义的工业”。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期间,分别于 1840—1845 年、1848 年、1860 年、1861—1865 年进行的四次大调查,其结果由蒂奥米尔·马尔科维奇归纳为以下的图表(数字单位为百万法郎):

年代	工业总产值	年平均数	
		本义的工业	广义的手工业
1835—1844 年	6385	1612 25.2%	4773 74.8%
1855—1864 年	9090	3406 37.5%	5684 62.5%

根据这些调查,“在 1840 至 1860 的 20 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42.36%,本义的工业增加了 111.29%,广义的手工业仅增加 19.08%。工业结构变化很大。本义的工业所占的比重由 25.2% 上升到 37.5%”³⁶⁴。如果比较利润和工资分别在本义的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结构的变动则显得更加清晰”:利润从 56% 上升到 60.4%,工资从 44% 降低到 39.6%。“在日趋发展的工业(‘充满活力的工业’)范围内,工资比重的相对下降是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原料价格却在上涨。马尔科维奇据此认为,这是大国推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原因之一³⁶⁵;对他的这个看法,我们是否应该赞成呢?

无论如何,小工业的比重虽然有所减少,但它仍比大工业大得

多(1860年小工业占62.5%)。更何况,数字还低于实际,调查员为区分大小工业所选择的标准(是否使用机器)本身很成问题。因此,在1866年调查的数字中,拥有一台辛格牌缝纫机(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工具)和两名帮工的裁缝竟被列入大工业!蒂奥米尔·马尔科维奇正确指出,为了区分工业和手工业,应该注意的是“究竟老板只动口而不动手,或者他同时兼顾领导和具体操作”。因此,他把各种小作坊,把如野草般繁生的乡村工业,以及把主要供家庭消费的日用品制造,统统列入手工业的范围。根据这个新标准再作计算,本义的工业的比重在1860年就不再是37.5%,而是19.8%,占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³⁶⁶。处于少数地位的这种大工业仍被传统工业所包围,随时受传统工业的牵制,就像大海中的孤岛一样。特别是手工业继续维护其生存和繁衍的权利。工业发展实际上在两方面同时并进,大工业发展迅猛,但小工业也并非止步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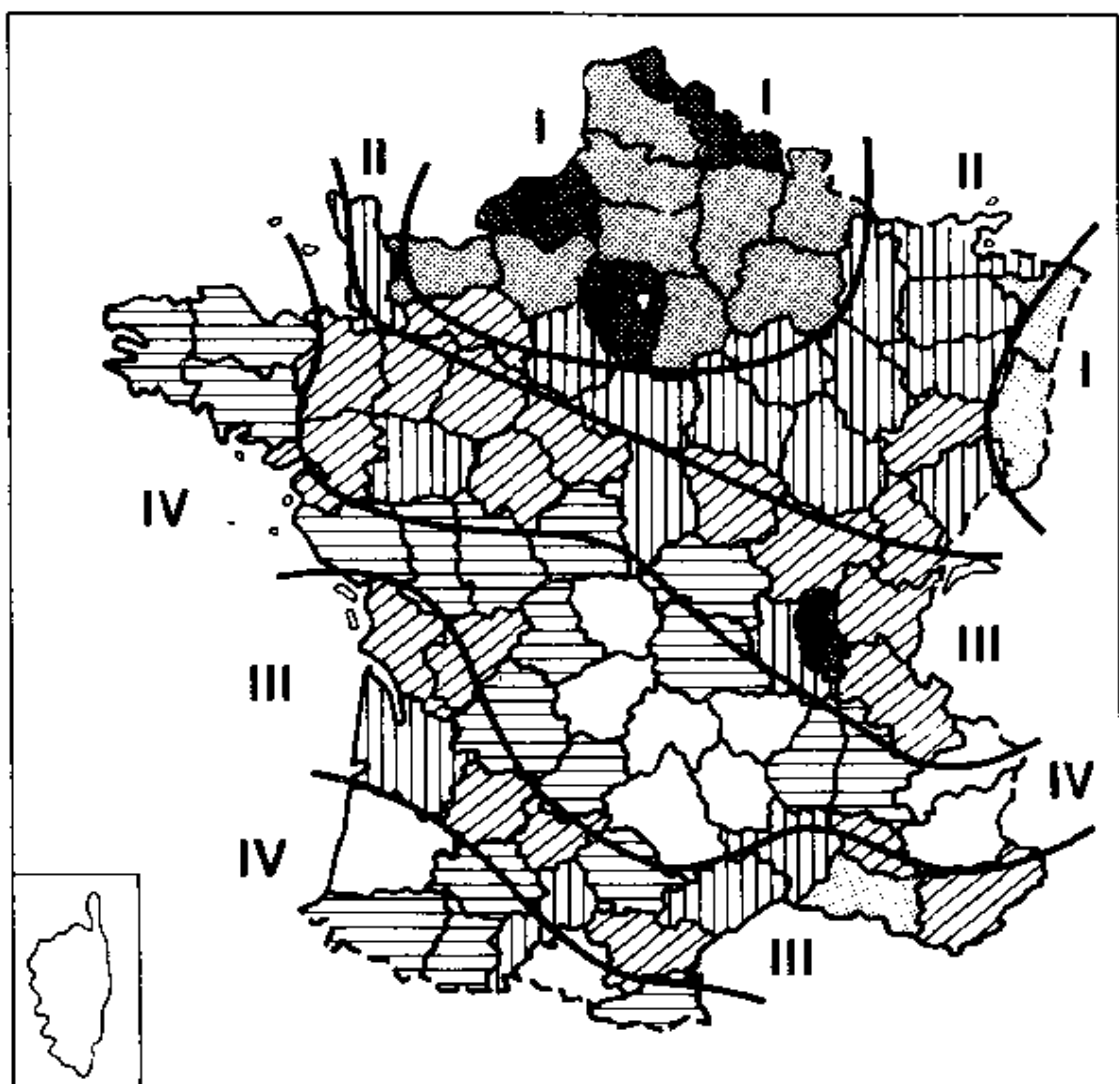
经过蒂奥米尔·马尔科维奇修正的计算数字与我们上一辈的历史学家的稳健考证不谋而合,这些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夏尔勒蒂和夏尔·塞诺博斯)参与了厄内斯特·拉维斯主编的资料丰富,但已偏于陈旧的《法国现代史》的编撰工作。夏尔·塞诺博斯撰写的是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从第二帝国到1900年前后,法国已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程。各种统计材料全都表明法国工业的巨大进步。“据1866年的估测,在最集中的工业部门,每家冶金工厂平均雇佣86人;每个矿山仅21人,每家化工厂仅17.4人;到了1906年,炼铁厂、矿山和玻璃制造厂的平均工人数分别上升到711人、449人和96人。雇佣1至10人的小企业1896年只占工人总数的36%,1906年占32%。”³⁶⁷小工业占三分之一,大工业占三分之二,计时的沙漏已经颠倒了过来,但小工业的比重还是不小。

究竟是小企业的顽强存在阻碍着大企业的发展?或者是大企业需要与小企业共处,并与小企业保持联系?不论对问题作何解

答,大工业的发展确实不快。原因恰恰就在大工业本身;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最初似乎一炮打响,但如果我没有搞错,随后却就再也无声无息。尤其,银行支持不力,犹豫再三,对工业所需的长期贷款轻易不肯发放。如同旧制度下的大港口一样,银行一心想在世界范围发挥作用,以至忽略了法国国内的职责,工业企业不得不实行互助,对结清购销贷款,相互给予宽限。关于影响着我国命运的这些问题,我将在后面再谈。资本主义对此负有罪责吗?资本主义既然名声不佳,自然是罪责难逃。

埃尔韦·勒布拉提出的另一种解释却是令人神往。他首先注意到,在日内瓦和圣马洛之间的直线又一次把法兰西分割成两块,北部的一块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南部的另一块则因循守旧,强有力的家庭组织形式长期阻碍着工业的发展。“两个地区互相对峙:一边优先发展大生产,另一边偏重实行小生产;一边居住集中,另一边居住分散;一边是小地产,另一边是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农庄。”³⁶⁸法国南方的工业由于拒不接受集中工人的现代形态,自18世纪遗留下来的许多手工工场和传统作坊在现代工厂的竞争下纷纷消失。因此,南方便大大落后于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富裕地区(见286图),后者而且将越来越富。迪潘男爵于1827年大声疾呼:“南方同胞们,我把本书《法国的生产和贸易实力》对法国北方的介绍奉献给你们……当你们看到由我们的祖先根据使用奥依语或奥克语而划分的法国两大地区,在人口、财富、手工工场和商业等方面,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他恳请南方同胞“顺应各省的需要,从事严肃认真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因为你们今天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蒙受的匮乏,促使你们的个人需求变得更多和更加紧迫”³⁶⁹。

对迪潘男爵关于发展工业的倡议,南方竟不受诱惑:居民坚持留在当地务农,不愿去北方加入工人的行列(工人中包括大批外国



法国经济地域的水平差异(1830年)

根据 33 项涉及经济各方面(农业、运输业、工业、收益、祖产等)的可变数字而绘制的这张地图展示了 1830 年法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从黑到白,从 I 到 IV,正表现出地区间的贫富差别。

(资料来源:见贝纳尔·勒帕蒂的文章,载于《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6 年,第 6 期。)

移民)。过了很久以后,当农村人口终于出现大批外流时,南方人往往都投入服务业、自由职业等第三产业或充任公职人员,很少或几乎不从事工业活动。总之,无论在过去或现在,法国南方对充当工人一事似乎在感情上就怀有敌意。

由于以上情形,在 19 世纪期间,包揽法国工业生产的北方本应该大力发展工业。可是,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北方的工业增长却是相对低下(至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时候为止)。埃尔韦·勒布拉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作出了解释。国家在上个世纪对南北地区的不平衡深感担忧,以至把“巩固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置于发展工业的需要之上”。政府的投资——即北方的财富——被用于发展南方,例如推行统一的教育政策(费里法案),发展铁路交通,调整行政区划,大力推进公私建筑等等;这最后一项措施“往往被经济学家指责为生产性投资的挪用”。在埃尔韦·勒布拉看来,这是“1860 至 1914 年间法国工业增长屈居末位”的主要原因。“为了缓和伴随着工业化初期而出现的发展不平衡,法国可能限制了自己的工业增长,但却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统

— 370 —

四 商业始终提前点火起动

古今以来有关商业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就凭这一点,人们往往以为,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别的地方,商业是各种经济活动中范围最广的活动。这其实是经不起数据检验的一种假象。根据迪潘男爵 1837 年对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农业为 60 亿法郎,工业为 30 亿法郎,商业为 15 亿法郎³⁷¹。以上这些数字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然而,在我国 19 世纪的不断进步中,商业的比重比位居前列的另外两个部门增长更快。如果不算银行,再也没有别的增长速度能超过商业。可是,归根到底,银行难道不就是金钱的交易吗?莱昂斯·德·拉韦涅于 1870 年指出,法国“自 1815 年以来国力大增,有时竟出现迅猛、壮观的飞跃。对外贸易增加了 14 倍,工业产量翻了三番,农业因其庞大而不够灵活,产量也翻了一番”³⁷²。这种发展节奏——工业比农业快,商业比工业快——一点也不新鲜。据皮埃尔·肖努的计算,1800 年欧洲的农业收益约是 17 世纪末年的 1.5 倍,工业约为 3 倍,商业至少可达 10 倍,也许达 20 倍,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商业爆炸³⁷³。

原因无疑有许多。人们会想到英国“政治算术”的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 年)的法则:“工业收益超过农业,商业收益又超过工业”³⁷⁴。利润显然在这里起作用,劳动分工并不如某些人所想,持中立的立场。它制造差别和等级,抬高一些部门的身价,贬低另一些部门的地位。实际上,分工的出现正是来自各行各业发展速度的差别:农民的人数远远超过工匠,工匠的人数又多于商人及其从业人员,这最后一类人与银行家的小圈子相比也是大相径庭。经济进步的作用与它所涉及的人员数量恰成反比。

总之，商业走得最快，一马当先，起着带头和支配的作用。我在谈到包买商制度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长篇论述。在本章的末尾涉及商业资本主义——或用我更喜欢的说法，商品资本主义——时，我还将论述这个问题。我这里只想顺便指出，工业——首先是工业，但并不仅仅是工业——处在商业的影响之下。工业的进步虽然是技术革新——彻底的决裂，革命的飞跃，破旧图新的创举——的产物，但它也受商品更新所左右。有关的事例不胜枚举，足以提供无可怀疑的佐证。

就举精织呢绒业为例：这门工业在法国肇始于 17 世纪，因为在开始建立工场以前，精织呢绒已取代了丝绸，用于室内装饰，特别是制作高级服装。外国的呢绒可以满足预先存在的市场需求。全靠巴黎的服饰商人，通过在色当、埃尔伯夫、卢维耶等地开办手工工场，才把这个市场夺了回来。另一个例子，另一项证据：朗格多克的呢绒在 17 世纪（直到大革命为止）旨在开辟远在东地中海的市场，与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不再经由塞特港（科尔倍尔于 1666 年设立了商港），而是取道马赛（运输繁忙的转运港）。因此，在朗格多克的维勒讷韦特手工工场的历史档案里，出现一连串以保护神命名的马赛和普罗旺斯船只（“圣约瑟夫号”、“加冕王太子号”、“耶稣童子号”、“加龙圣母号”、“良逢圣母号”、“恩惠圣母号”、“圣路易与阿勒颇城号”，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已经举过其他的例子：拉瓦勒的棉布 18 世纪在西属美洲十分畅销，马扎梅的哔叽在加拿大风行一时……

农业本身也需要商品的青睐。随着贸易在 18 世纪的法国急剧的发展，各省纷纷打破了相互的隔阂，逐渐向有利可图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葡萄种植在上普罗旺斯省普遍推广，其他的省份也摆脱了谷物的桎梏，着重经营畜牧业……俄罗斯当局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试图打开西方的大门，出口谷物、麻、木材等货物。在俄国驻

马赛领事佩希埃³⁷⁵——其实是在马赛从事大宗贸易的一名瑞士侨商——的活动下，乌克兰小麦开始从黑海的港口（全部设施尚待新建）向马赛出口，俄罗斯谷物的大批外销（这本身就是一项创举）即使不能完全归功于佩希埃，但他在其中确实出力不小……贸易是创造奇迹的魔术师。

以经商为业的人

我国的商业虽然不像意大利城市国家、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那样达到空前发达的高度，但我们也不能以为它的活动竟是默默无闻。经商者在我国人数众多，商人与商人也有不同：大商人又称“批发商”，从事大宗贸易，另外还有其他各种商人。杜尔哥正确地指出，“从在集市卖菜的女商贩到南特或加的斯的船主”，都属于商界。用鲁昂一份材料的另一种说法，“从伙计到大商人”，都属于商界³⁷⁶。

商业可见包括几百种行业。经商者加在一起，人数相当可观。在14世纪的阿维尼翁和孔塔—佛奈桑，商人约占社会特权阶层中的2%至5%。在1800年，法国人口接近3000万，商人总数可达150万人。到1825年，如果迪潘男爵的计算不错，商人约占我国人口的10%。然而，在1856年，根据让—克洛德·杜坦的计算，仅有190万人在各商业部门就业。他的数字实际上只计算了“坐商”³⁷⁷。

可见，商界的最上层是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少数批发商。在他们的下面是人数较多的中等商人及其下属的服务部门。再下面是“小本经营”、“谋求蝇头小利”的小商人³⁷⁸；最后是不计其数的手工工匠铺，以及向城市集市供货的小商贩。

例如，那些在大清早睡眠惺忪地从巴黎郊区出发，驾着轻便马车进城出售蔬菜、黄油或家禽的小商贩。此外，在路易十三去世的1643年，一位旅行者说，贩到里昂城内“出售的东西真是应有尽有”

有：油饼，水果，薪柴，木炭，成箱的葡萄，芹菜，鱼，煮熟的豌豆，柑桔，等等。各种时鲜蔬菜放在手推车上沿街叫卖。苹果和梨都煮熟后出售。樱桃则是论斤计价”³⁷⁹。在卡昂，“日用品生意由大批不开店铺的零售商所包揽（本小利微的糖果食品商除外）；他们整天就在街头和广场边上耽着……这些人不设货摊，全部货物就用两、三个筐子装着；他们每天早晨从市郊的村庄步行进城”³⁸⁰。这就是交换坐标的零点吗？人们有不止一个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依我之见，坐标零点位于以货易货、以服务换服务的区域：谷物换面粉；奶换黄油、奶酪或猪肉，如此等等。我们在圣安托南这个小城市里曾见到过这类情形。

是否应把流动商人——驾车奔赴各地参加交易会的客商——或普通商贩置于零坐标的水平之上呢？对于前者，肯定是应该的，而对后者，又几乎是不应该的。

总而言之，以经商为业的人无疑不断在增多，随着人口、剩余农产品、工业产品和运输活动的增长，这本是合乎情理的事。

有关这种“持续”增长的见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早在路易十二统治的末年，即1515年，当时任马赛主教后来又晋升都灵大主教的克洛德·德·塞塞尔写道：“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做生意，如果路易十一那时（1461—1483年）有一名商人，到了现在（路易十二治下，即1498—1515年）就有50多名，而且小城市的商人比大都市更多。”³⁸¹这是一个孤立的但又是可靠的见证。到了17世纪，形势变得更加明朗：店铺简直就像传染病一样，无空不入地侵占所有的欧洲城市。它们根据传统惯例按行业集中，在许多街道的两侧排列成行。1656年12月，两位荷兰旅行者来到了巴黎的铁器街，他们“在无辜圣徒收尸所的附近，但见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开设铁器、铜器、白铁器、黄铜器一类的铺子”³⁸²。

商人的数量在18世纪更趋增加。鲍狄埃·德·拉埃斯特鲁瓦

于1716年指出，“从事零售商业的不仅有个体商人，而且还有手工业主，后者往往是些夫妻老婆店，出售自己制造的产品”；他又说，“这些零售商在城市居民中占一个不小的比例”³⁸³。他们不仅出售自己的产品，而且还经销他人的产品。

在19世纪，随着拿破仑的垮台，法国又恢复了和平，商人的队伍再次扩大。1817年，利摩日的一个爱发牢骚的人抱怨说：“在我们的同胞中，有一大部分人既想赚钱，但又不肯吃苦，他们纷纷投入了商业活动。许多小职员、仆役和零工都开设了店铺。在今天的利摩日（居民共1万人），竟有25名呢绒商，76名杂货商，97名服饰商，41名制造商，14名金银制品商，18名五金制品商，5家车行，23家咖啡馆和85家小酒馆。”³⁸⁴

类似的抽样调查还曾进行过多次，例如1725年对格勒诺布尔³⁸⁵，1789年对萨瓦地区³⁸⁶，但调查所得的数字往往还存有争议。我们了解到一些城市中“开店”经商为生的户主比例：在克吕斯占12.5%；在托农占8.5%；在埃维昂占7%；在艾克斯莱班占6.1%；在博讷维尔占3.5%；在阿讷西占15%；在格勒诺布尔占12%；在尚贝里，比例约在12%至15%之间。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能否认为重要城市中的“零售商”相对地比小集镇（小集镇更多地向交易会贸易开放）更加密集呢？这或许有此可能。但是，人们却无从算出城市、集镇和村庄的整体比例，尤其对于商业部门不容置疑的增长，无从计算出增长的速度。

我之所以在介绍我国商业的历史时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些不言而喻的细节，这是因为统计学家容易忘记这些细节，而被壮观的国际贸易所陶醉。作为商业的上层建筑，国际贸易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在商业实际中却只占一个微薄的部分。国内贸易的份量和价值远比主要面向国外的大宗贸易大得多。

我国主要的统计学家之一莫里斯·布洛克于1875年强调了

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这一比例差异,他说:“人们对国内贸易通常不能得出十分正确的认识,国内贸易的范围很广,全国个人之间进行的各种交易活动统统都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些活动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对外贸易,即使说前者起码等于后者的10倍乃至20倍,也还低于事实的水平。更何况,人们不难明白两种贸易之间的差别,如果指出外贸的任务只是补充国内供应的不足或推销国内过剩的产品。人们还可以想一想,法国3600万居民每年进行的交易活动,其数量该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一种物品不经过三、四道中间环节,就能够送到消费者的手里,由此便产生出多次商业活动;在这些实在的买卖之外,还应加上银行和信贷机构的活动,它们是商业必不可少的助手;应该承认,把国内贸易的交易额至少算为350至400亿,即平均每人1000多法郎,丝毫也不过分。”³⁸⁷

许多其他数字同样也显示出国内商品的雄厚实力,它在出口中发挥的作用,它为工业和国计民生筹集必要的物资所起的作用。就在莫里斯·布洛克说话的当时,国内贸易的营业额和利润额也有所增长。甚至在伏尔泰的时代,“小敦刻尔克”这家难能可贵的店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更出现了一些大商场:“菲利克斯·波坦”于1850年³⁸⁸;“便宜市场”于1852年;“罗浮”于1855年;“萨马里坦恩”于1869年,等等。大城市里的某些零售商在赢利方面居然也能与批发商并驾齐驱。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国内贸易额350至400亿这个数字,莫里斯·布洛克本人承认,他所提供的这个数字是无从考证的。尽管纯属推测,并且异议甚多,这个数字或许还有待人们作出有益的分析。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杜尔哥的设想,它涉及到包括贩运、集市、交易会、店铺在内的“各种性质的交易活动”。另一方面,相同的商品十之八九都要多次转手,经过买进卖出几道手续,营业额因而也就多次计算,信贷、汇兑、记名本票等业务还不算在内,而后一些业

务也包含在“国内商业流通”之中。因此,对于国内贸易的营业额超过法国物质生产总值(当时约 250 亿)一事,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至于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总值于 1872 年仅达 78.3 亿(转手出口不算在内,约占总值的四分之一弱)³⁸⁹。

以上所得的比例(80 亿比 350 亿)与某些英国历史学家的估测不谋而合³⁹⁰,这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国内贸易额相当于对外贸易额的 4 至 5 倍。只要由此再往前跨出一步,人们当即可以认为,国内贸易对发动工业革命起着主要作用;这一步确实已经跨出。早在这些英国历史学家以前,笛福不是就已声称,18 世纪的英国,中间商在商业交易活动中起着乘数的作用,全心全意赚取的点滴利润终究积少成多,促使民族市场的不断扩大?

利润积少成多,正是国内贸易的特征。对外贸易又怎样呢?加利阿尼教士以谷物为例明确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国内贸易数额巨大(由无数商人均摊),利润微薄而又经常;大宗贸易则利用国际差价进行投机,只是在发生粮荒时,才参与其事。外贸的营业额本身很小,但利润被进口商独吞,就大得惊人:希门尼斯公司 1591 年的利润率竟达 300%。

内外贸易的比较,要害就在这里。米歇尔·莫里诺为此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证³⁹²。人们知道,在 18 世纪,根据贸易支付结算,“法国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除战争时期有时出现例外,一般有很大的入超”³⁹³。例如在 1750 年,进口额超过 6 200 万,而出口额竟不到 2 700 万³⁹⁴。然而,于 18 世纪期间翻了二至三番的这项大宗贸易却是我国大西洋沿岸各港口大发横财的关键。这一咄咄怪事究竟奥妙何在?其实不难明白,我们就看波尔多装备的一艘商船 1729 年去圣多明各往返一次记下的珍贵帐目。启程时装载的货物价值 37 149 里佛,返程时则为 92 895 里佛,按贸易差额计算,入超达 55 746 里佛。可是,商人所做的这笔生意丝毫不亏本。运去的货

物(葡萄酒、烧酒、面粉、咸肉、黄油、蜡烛、玻璃器皿)在莱奥甘出售时,价格翻了一番以上,售价达 81 678 里佛。返程时用 78 678 里佛买进的靛蓝、糖、鞣革等货物,在波尔多卖出,价值 92 895 里佛。扣除包括船只折旧在内的各项旅行开支,利润率高达 35.6%。这个比例对安的列斯群岛的整个贸易大体全都适用,就并非投机性的经常贸易而言,数字相当可观。据沃邦的估测,商业利润平均约在 10% 左右。

到了这里,我就可以分析我所关心的问题。我不想就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作数字的比较,这是我不可能做到的事。也不想对英国历史学家的估测表示同意或者反对,他们认为英国国内贸易在工业革命中起着马达的作用,可能言之成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法国国内市场的进步是我国工业化的基本动力)。我所关心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孕育过程中——资本主义在活跃、促进和独占国内市场的同时成长壮大——,营业额为数不大的对外贸易却反常地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要求我们作出解答,甚至提供几个答案。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让批发商登台串演主角。

批发商和远程贸易

批发商与其他商人肯定有所不同:一般商人开设店铺,顾客登门购买所需的货物;批发商则拥有堆积货物的仓库,而且出库的商品都是“成包成捆”,数量很大。在黎塞留和路易十三那时,兰斯的商人马伊菲尔回忆他早年的学徒生涯,最初在“一家零售店”打杂,接着又先后在两名“栈商”那里帮工。后一位栈商“从事意大利的大宗贸易……我看到这里的买卖前程远大,做批发生意要碰运气,而且不必像零售商那样低三下四,受人颐指气使,因而觉得自己身份高贵,越干越有兴趣”³⁹⁵。

但是,为了充当一名批发商,不仅需要自己有钱,而且家庭也

必须相当富有,以便必要时取得家庭的支持。大宗贸易的诱惑力大,风险也大,依赖性自然也大:钱花出去很快,收回来却总是很慢!每次结算时,除“挂帐”的活债外,还有不可收回的死债。所有的“商行”都不免蒙受这类损失。因此,当企业初创,必须借债渡过难关,或为避免破产受辱时,家庭可以随时挺身而出,给予必不可少的保护。或者,通过开办两合公司以及后来的股份公司³⁹⁵,取得其他商人的帮助。孤立无援的富人似乎总是寸步难行。

充当批发商的另一项条件是必须从事远程贸易,把生意做到国门之外。远程贸易又意味着海外运输。文学著作在这方面从不搞错:“无论是《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或者是《基督山伯爵》中的船主,再或者是巴尔扎克和大仲马笔下的银行家,主人公的命运始终与满载财富的货船平安抵达港口联系在一起。”³⁹⁷东地中海贸易几百年间异乎寻常的发迹正是依靠这些货船及其载运的胡椒、香料、药材等货物。还有名贵的藏红花、食糖、高级织物等。“一斤来自塞浦路斯的食糖相当于三头乳猪的价格。”³⁹⁸在13世纪,“30米佛兰德呢绒在马赛出售,价格相当于一名撒拉逊奴隶的二至四倍”³⁹⁹。以上这一切“使我们对当时人们的心态似乎难以理喻,对奴隶价格的低下,对尼德兰某种呢料出奇的昂贵,以及对生产者和批发商从中谋取的巨额利润,也都感到茫然不解”⁴⁰⁰。18世纪的“海岛贸易”,与美洲或远东的贸易,全都遵循类似的规律,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此外,大宗贸易要碰运气,必须善于抓住机会。例如圣马洛商人经过绕道南海的漫长旅行后,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度从白银产地智利和秘鲁取得银币和银锭,他们的利润率竟高达800%⁴⁰¹。又如,在1784年,某些商人得以让一艘满载高级奢侈品的大船不时进入俄罗斯的港口,每次进入都能引起轰动,并从俄国人那里取得“几百万卢布”。沙皇政府为保护其创建不久的手工工

场,竭力“禁止这些诱人动心的奢侈品”进入俄国⁴⁰²;尽管如此。冒点风险还是值得的。

18世纪的黑奴贩卖也是惊险丛生的交易:1782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利润高达300%,与所冒的风险恰成正比。但是,在这个世纪中,通常的利润率分别为50%、63%或80%⁴⁰³。正如南特的船主德格尔1763年所说的,这无疑是“一种充满艰险和成败未卜的贸易”,哪怕仅仅因为许多被卤获的黑人在横渡大洋时死于非命,就可能落得亏本的下场⁴⁰⁴。由于贩卖黑人与殖民地的货物贸易同时进行,后者相当可靠,风险得以抵销。从敦刻尔克到巴约讷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全都广泛地参加了黑人贩卖活动⁴⁰⁵。

德国的历史学家早就揭示了“远程贸易”和“远程商人”在交换中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时的人全都知道,“凡是飘洋过海去远地做生意”⁴⁰⁶,利润通常更加丰厚。率先与荷兰人作对的马蒂阿·德·圣让神甫于1646年断言,“从事外国货物的买卖总是收益最高,获利最大”⁴⁰⁷。

到了18世纪,人们又看到对外贸易的另一项好处,即是能使经商的资产者“不受国王的支配”⁴⁰⁸。换句话说,争得了自由。国内贸易始终处在地方当局的监视之下,地方当局可以随意发号施令,而对外贸易则越出了国门:商船一旦离开了港口,一切都由船长(也就是商人)作主,国王也就被置诸脑后。贸易署对此完全明白,它指出,“对于在商业中占相当大一部分的对外贸易,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国内贸易就在政府的眼皮之下进行,……随时都能下达适当的命令,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

我们这里可就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再次进行比较。贸易署毫不犹豫地认为,外贸重于内贸。主管海军的国务大臣莫尔帕在1730年10月3日向路易十五呈递的报告中,也同样指出:“对外

贸易当为我国争取到黄金和白银,并且推动国内贸易的发展,前者对国民造福愈大,后者的发展也愈顺利。”⁴⁰⁹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予以监视,这是另一个问题。在上文已经引证的文件里,贸易署承认,“对一年多来在东地中海各商港发生的事,一无所闻。同样,对西班牙各港口的情形,也一无所知。我们对那里的贸易进展毫不知晓”⁴¹⁰。

这种自由是否说明,正如英国经济学家 K. 贝利就 20 世纪不发达国家的情形所指出的⁴¹¹,对外贸易比国内贸易容易展开?他说:“不发达国家开展国际贸易不但比国内贸易更加方便,而且费用也往往比较低廉;国家间的专业化往往比同一国家地区间的专业化更易实现。”人们于是会问,从历史上看,既然开展外贸比较容易,对外贸易是否能够走在国内贸易的前面,并且与我刚才介绍的见解相反,至少在最初能够超过国内贸易总额。历史学家马塞洛·卡马涅尼曾以 1680 至 1820 年间智利经济增长初期的情形为例,毫不含糊地对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写道:“智利的对外贸易总值远远超过其它各个部门”⁴¹²,即比国内贸易总值高出许多。正向欧洲靠拢的美洲其他地区是否也属同样的情形?照这么说,难道古老的欧洲在其经济的起步阶段竟没有遵循我们目前看到的,对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的经济全都适用的规律?

这项假设可能使我们偏离最初提出的问题,即远程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和为什么能制造巨额利润,实现资本的超额积累,进而使资本主义得以脱胎而出?对这个问题必须作进一步的考证,因为近二、三十年以来,尤其在法国,历史学家深信,集体的实际活动比杰出人物的壮举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胡椒、香料和海外冒险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少⁴¹³。

关于偏离观察视野的这个危险,在巴黎大学举行的维托里诺·马加拉埃·戈蒂诺论文答辩会上发生的争论恰好就是证明。

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葡萄牙胡椒和香料的贸易中，国王当称最大的商人，这项奢侈品贸易的数量和价值是否超过了国土逼仄的葡萄牙王国的国内谷物贸易？回答肯定不是。但这个答复丝毫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除开个别例外，谷物贸易实际上掌握在成千上万人的手里。即使在赢利的情況下，利润由于极度的分散，也就被日常生活的汪洋大海所淹没。相反，以贵重货物为对象的远程贸易在欧洲却导致少数几名商人平分利益，不论这些商人在威尼斯，在热那亚，在马赛，或者后来在阿姆斯特丹。保尔·亚当对此看得很清楚⁴¹⁵，他说：在地中海的繁荣时期，“地中海城市在贸易中处于‘瓶颈’的地位，上端向东方扩散，下端向西欧辐射，为数不多的商人在这里把贸易控制在手。”地理位置的优越正是使贸易得以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地，再从该地向四面八方扩散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就以18世纪初勒芒的府绸商人为例，尽管这个例子并不十分起眼。府绸商人与经销这类优质细布的外国市场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他们通过中间商在巴黎、鲁昂、里昂、波尔多、利摩日、图尔等地交易会上成批出售，但从不自亲自光顾这些交易会，即使近在卡昂边上的吉布累交易会也不去参加。他们能否控制局面呢？由于负责布匹的染色和精加工工序，他们仍能把全部产品在完工前抓到手里，这使他们对货物的定价在产销两方面都有充分的发言权。1710年前后，人们常说，“买货卖货的诀窍就看你怎么开价”⁴¹⁶。勒芒的少数批发商于1720年后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设立了经销机构，就近开拓美洲殖民的市场，从此对确定货物的价格拥有更多的自由。勒芒的批发商总共不过十多家，在1740年竟把这项国际贸易全部垄断了起来⁴¹⁷。

赢家占少数

商人做生意不可能每次都成功,这是不自待言的事。有幸加入商人行列的人只占一小部分,商人集团并不对敢于孤注一掷的赌徒全都开放。赶上经济气候有利,赌徒们可以乘机谋利,但商情转向恶化,他们很可能因一场小小的风暴而翻船破产。唯独批发商才能抗拒恶劣的天气。

再说一遍,无论在威尼斯或在里斯本,在加的斯、阿姆斯特丹或伦敦,批发商通常人数较少,而且在当地都互相熟悉。在18世纪初的法国,他们的人数更是少得出奇。作为美洲白银的目的地,加的斯依靠日常的走私活动,曾长期是欧洲最大和设备最好的商业都市,但在1703年⁴¹⁸,当地的法国商人仅有26人,而且都是并不独立经营的经销商。其中没有一名称得上是“超级商人”的批发商。

过了一年以后,即在1704年,后来起而反对沃邦征收“什一税”计划的鲍狄埃·德·拉埃斯特鲁瓦仍对整个法国作出悲观的判断。他写道,法国“商人很少为自己的利益经商”⁴¹⁹。可能因为他们不够大胆,也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本钱,大部分商人“满足于为英国人和荷兰人,特别是为后者,充当经销商,这不但不能使法国变富,而且只会使法国越来越穷……法国所需要的决不是经销商,他们为谋取微薄的佣金孜孜以求,一味讨好外国商人,很少顾及国家的利益……我们应该有真正为自己谋利的批发商”⁴²⁰。法国商人地位的低下并非始于18世纪初期,这是历史留下的一笔沉重的遗产。法国在国际分工中因运乖命蹇,未能占得有利地位,自然要为此付出代价。直到马扎然的时代,意大利商人在里昂、巴黎及王国其他城市中发号施令。随后,荷兰人又控制了从敦刻尔克到巴约讷的面对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法国滨海地带。甚至科尔倍尔也未能扭转这个局面。有鉴于此,《经商大全》一书的作者雅克·萨瓦

里于 1675 年大声疾呼说,法国商人应该“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强盛和商人的利益,真正的生财之道就在于从事远程贸易”⁴²¹。这也恰好证明,远程贸易还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

据 1744 年担任大理院主事兼商务总监的雅克·玛丽·蒙塔朗(1701—1782 年)称,在约翰·劳推行货币改革那时,情况曾有明显的改善,既然蒙塔朗身兼两大要职,他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于 1753 年讲了一番奇怪的话:“和平已使往日的萌芽开花结果……直到 1720 年为止,法国还只能见到普通的商人;贸易的活跃终于促成了批发商的诞生。”⁴²²难道是在漫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法国人通过截获敌国的商船才发现外国从事的远程贸易?或者,难道是约翰·劳货币改革引起的动荡,才使批发商终于问世?又或者,难道是美洲海岛贸易的开始才把波尔多从一个睡梦未醒的城市变成第一流的商业都会?又或者,莫非蒙塔朗在无意中自欺欺人?

法国在 1720 年以前毕竟已有一些批发商,例如圣马洛的船主就是批发商。萨缪埃尔·贝纳尔、安都纳·克鲁扎、沙塔尔侯爵等一些大商人(关于他们的作用,我在下面再谈)几乎富可敌国。在 17 世纪末服饰和呢绒商的对抗中,人们发现巴黎也有大批发商。服饰商在不直接参与制造的情况下,拥有开展批发业务的特权,他们当时可能有 2 000 人。其中实力最强的还从事出口贸易。专门经营各种呢绒的商人不过 40 人左右。可是,这一小批大服饰商在新兴的细呢工业中进行了投资,他们利用自己的雄厚实力和既得地位,同时控制了巴黎的市场——法国最大的市场——和对外出口。呢绒商人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并显然获得当局的重视。国务会议 1687 年发布的一项命令确认,呢绒商享有在巴黎出售呢绒的专利权,但是命令也为希望“无条件加入呢绒行业”的服饰商敞开大门。“因此,1687 年 10 月,70 名服饰商作出了这后一项选择,其中包括

雅克·卡多、里厄尔·德·拉莫特、德尼·罗梭、弗朗索瓦·色利埃尔、弗朗索瓦·米尼奥、吉贝尔·培尼翁等人”。其实，一切还是照旧不变。“至少在 50 多年期间，法国细呢工业仍被巴黎的少数批发商所控制，他们全都住在‘菜场’和沙特莱之间一个不大的四边形街区之内。”¹²³

在同一期间，真正的批发商住在圣德尼街一带。我们已经说过，这些住在首都的商人在法兰西岛地区组织金丝花边的织造，其大部分产品运销汉堡、华沙、维也纳、纽伦堡、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马德里、里斯本、塞维利亚、西属美洲等国外市场。

因此，我们对鲍狄埃·德·拉埃斯特鲁瓦或对雅克·玛丽·蒙塔朗，都不能盲目相信；法国的资本主义集中毕竟业已开始，尽管其发展程度还不如邻近的大国；否则，这些批发商的活动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当时的巴黎，他们确实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随着 18 世纪的到来，人们不难看到，各海港的大宗贸易将日趋活跃和不断增长。

关于大商业的见证

这里只要举三个例子进行分析，就足以使大家相信。

我首先将前往马赛，以便介绍法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贸易；接着再以 1702—1723 年间的圣马洛为例，说明法国与西属美洲的联系，最后再到波尔多去考察，从而对风靡一时的海岛贸易有所了解，所谓“风靡一时”是说比“转瞬即逝”略长的小段时间。

我将举这些大型商业活动为例，就几个同类的过程进行分析：开始、兴旺、回落。可以肯定，威廉·霍夫曼关于工业潮汐涨落的规律对商业周期也同样适用。商业周期究竟比工业周期更长，或是更短？从历史的角度看，商业周期似乎为时较短，因为经商是人的主动行为。不过，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资本家的作用。

东地中海贸易涉及到一系列古老的交换路线。从叙利亚到波斯湾和伊朗,或在西奈高地的两侧,东地中海各地区之间历来存在着贸易联系;与此同时,它们一方面与西方的经济和文明相会面,另一方面又与遥远的远东的经济和文明相会面。黑海、红海和浩瀚的印度洋也为贸易提供了过境便利。罗马通过东地中海地区发现了胡椒、香料、生丝、药材等货物。地中海贸易在中世纪初期无疑曾有所下降,随着伊斯兰征服的开始,贸易虽然并未全面衰落,但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基督徒和穆斯林几乎都不再出海航行,地中海上几乎见不到船只。

欧洲在 11 世纪终于复苏。随着十字军东征的进行,意大利城市国家撞开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大门:胡椒、香料、生丝、药材又源源不断地运抵西地中海地区。欧洲在更大的规模上重走罗马的老路。因为,欧洲对胡椒和香料的兴趣要比罗马大得多。

与蒙彼利埃、纳博讷一样,马赛很早就参与这些珍贵货物的贸易。然而,胡椒在马赛长期仍是稀有之物⁴²⁴，“几乎具有黄金和白银的作用,因为它是一种可供交换的货币,许多赋税均可用胡椒支付”。实际上,马赛无非就像在庆宴上敬陪末座而已。东地中海贸易已是意大利各城邦的争夺对象,不容马赛这样的小角色挤进竞争者的行列。只是到了 15 世纪,意大利城邦才在加泰罗尼亚人的倾轧下,被迫作出了让步。

至于马赛,它于 1482 年刚刚归属法兰西王国,但使马赛大商业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并不是法国,而是土耳其。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舞台上崭露头角,便打破了原来的竞争格局,并且不自觉地推行了一项新政策。随着土耳其的初步胜利,1453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特别是迅速占领叙利亚(1515 年)和埃及(1516 年),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奥斯曼帝国从此扼守东地中海的大门。帝国不可能再把大门关上,否则就势必放弃重大的收益。但是,它对过去

的主子礼貌周全,并且接受后者的挑战。1530年,马赛的第一家商行就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起来。弗朗索瓦一世于1535年甚至与土耳其苏丹结成同盟,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极大不满。

剩下的一大障碍是威尼斯及其在伊斯坦布尔、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等地设立的商业据点。由于圣马克城与土耳其人的冲突,威尼斯的地位日渐衰落,终于为马赛的上升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勒班陀战役(威尼斯参加了这场战役)取得辉煌胜利过后不到两年,威尼斯终于向奥斯曼大君屈服,签订了1573年和约。已在1569—1573年冲突期间取得实际成果的马赛立即扩大战果:从1573年开始,以马赛城和法兰西国王的名义,陆续建立了一些领事处,分设在东地中海的不同通商港口。有关外侨权利的第一批协议在1597年与苏丹穆罕默德三世签订;法国国王亨利第四的专使德·布雷夫伯爵于1604年签署了第二批协议;德·诺恩泰尔侯爵于1673年签署了第三批协议,进一步巩固了马赛的地位,当时正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在位期间⁴²⁵。

马赛商人来到东地中海地区,正赶上胡椒和香料陆续重返那里的好时机。由于葡萄牙的探险活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发现了好望角,一大部分胡椒和香料的贸易一度曾绕道好望角转运大西洋地区,使里斯本和安特卫普先后获益匪浅。但是,从16世纪70年代起,随着西班牙白银取道地中海大批流往热那亚,利润丰厚的胡椒和香料贸易又重返地中海地区⁴²⁶。交换几乎仍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亚洲提供香料、胡椒、染料等植物产品,烧碱,药材,丝绸,羊绒等。此外还有印花布一类的棉布织品(主要在阿勒颇一带制造),这是一项例外,但例外也恰好证实规律。作为交换,欧洲供应的是高级纺织品和银币,由东方各国随后改铸成自己的货币。由此可见,一方是天然产品,另一方是工业制成品……马赛的鸿运高照将使朗格多克地区的呢绒制造业兴旺发达,直到18世纪

为止。

东地中海贸易的复兴确实吸引了英国人(自 1579 年起)和荷兰人(自 1612 年起)前来地中海经商,两国商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动辄以兵戎相见,不时在海上劫船越货。然而,东地中海的大门对所有的西方商人全都开放。

从外地注入马赛的资金来自蒙彼利埃、里昂、热那亚乃至巴黎。马赛港内商船云集,大批货物分销地中海沿岸城市,并且沿罗纳河逆流而上,运抵里昂。在 1563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东地中海产品的进口无疑集中掌握在“十来名大商人的手里……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斯卡尼奥·隆卡尔、皮埃尔·阿尔贝尔塔、马丁和让·科维(1578 年),仅他们几人拥有的流动资金就达 5 万埃居。他们总共使用 14 艘船从事航运,其中 3 艘帆浆船和 2 艘木船前往特里波利,2 艘帆浆船和 6 艘木船开往亚历山大港,1 艘木船开往希俄斯岛”⁴²⁷。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 50 年代。1614 年,在从马赛启航的 585 艘商船中,67 艘开往东地中海地区,“其中包括 48 艘大型商船,2 艘三桅商船,2 艘帆浆船,15 艘木船”。从目的地看,26 艘抵达亚历山大港,26 艘来到叙利亚,还有 15 艘在希腊各地(希俄斯岛,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赞特)靠岸。在 1618 年,又有 23 艘船从马赛前往叙利亚,7 艘前往埃及,10 艘前往希腊各地……

尽管出航船只的数量逐年有所不同,马赛与东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在马赛港进出的船只每年数以百计,但开往东方的船不过几十艘;它们往往空船启程,只带几袋面值 8 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币,但每次都能满载货物而归。这使东地中海的贸易和利润始终占据首位。不言而喻,受益者主要还是几家最大的批发商行⁴²⁸。

东地中海贸易在 1650 年发生变化。胡椒和其他香料在贸易中

并未因此消失——雅克·萨伐里于1712年指出,香料仍在开罗出售⁴²⁹——,但它们的地位已不再重要。与经由埃及转销地中海地区的咖啡相比,与生丝、羊毛、皮革以及原棉和棉纱相比,胡椒和香料的贸易几乎无足轻重。因为从1595年起,荷兰人在过了一个世纪以后又重新沿着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的航线,取道好望角进行航运活动,他们不久并垄断了在南洋群岛的“细香料”贸易。

大西洋在更大的规模上再次夺走了地中海(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作为香料贸易必经之路的地位。尤其严重的是,欧洲各地区或快或慢地在放弃饮食重口味的癖好,正是这种癖好才使它们在过去500年间喜爱使用香料。诚如弗朗哥·波尔朗迪所说,这也许因为西方人以食肉为主,而肉食又不易保存,他们便多加调料,掩盖可能出现的坏味道。不论如何,一条十分古老的交换路线至此已告衰落,甚至停止运行。

与此同时,另一条贸易路线正在打通。土耳其帝国日益对基督教国家开放贸易,并在后者的渗透下,逐渐沦为殖民地的地位。帝国像是一个身体日衰的“病人”,但它的陆军,或至少是它的舰队,却在战场上还能耀武扬威,土耳其帝国横遭蚕食的命运令人不能不想起威尼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对拜占庭帝国的吞噬。在1750年后,产自海岛的香料、食糖和咖啡越来越多地从大西洋运往东地中海⁴³⁰,这个时间标志着货物流通的方向已经颠倒了过来。

马赛参与了这场角逐,每年运往土耳其帝国为数可观的皮阿斯特(一笔巨大的投资)以及部分呢绒。甚至到了18世纪,当马赛已成为与印度、中国、北非、美洲保持联系的世界级港口时,东地中海贸易仍在马赛的收益中占着首位。马赛商船在色雷斯地区的卡瓦拉,在18世纪兴旺发达的萨洛尼卡地区,在爱琴群岛、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带、塞浦路斯、克里特岛的拉卡尼亚、摩里亚岛的莫登等港口停靠,并且在士麦那设立据点;东地中海贸易的中心之所以北

移,也许正是为了靠近奥斯曼帝国的心脏。马赛还控制了所谓“商队运输”,即在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进行的近海航运;由于与奥斯曼大君经常发生战争,威尼斯在这一带不能立足,近海航运便全由马赛控制。因此,马赛得以有 100 多艘船舶在东方扬帆破浪,并由此实现了与荷兰船于 17 世纪在英吉利海和大西洋所确立的军事封锁相类似的局面。法国商人甚至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各商港之间建立起汇兑联系,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也利用汇兑系统把财政积余汇往苏丹的国库。汇票可使钱款避免在海路或陆路受意外的损失。但这项服务显然不是免费的。诸位可以设想,一家英国公司过去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架设电话线,电话的经营活动自然也由这家英国公司所掌握。

然而,马赛的商人,特别是批发商,从此却不再亲自前往东地中海各商港经商。一些“经纪人”充当他们在当地的代表,并收取佣金,数额之高有时可达 60%,“由此获得的可观收益使经纪人除生活开支外尚有积蓄,他们在东地中海地区居住一段时间以后,便回国尽情享受……马赛有好几家大商行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⁴³¹。

到了 18 世纪末,马赛不再能把大量的朗格多克呢绒运销土耳其市场,因为土耳其国家的财源开始陷于穷竭。朗格多克为此倒了大霉,突然被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至于马赛,通过交出更多的银币,特别是利用在米兰轧制的印着玛丽-泰雷莎头像的塔勒,城市勉强逃脱了困境。

选择圣马洛作例子,对了解法国与西属美洲的直接贸易,实在是很恰当的。这一贸易说来“好景不长”;自 1698 年至 1724 年,圣马洛的商船经常偷偷摸摸地在新西班牙的海港靠岸,特别是在韦拉克鲁斯港,它们甚至还远届位于南海沿岸的智利和秘鲁各港湾。就以上的两个日期作为极限,历时不过四分之一的世纪⁴³²,这段“转瞬即逝”的时间实际上只是历史的插曲。

藏在这一偶然事件的背后,真正的问题还是新大陆白银的一般流通过程;我们知道,从1503年起,在哥伦布自塞维利亚首次远航美洲过后十多年,美洲白银便经由大西洋运抵西班牙:输入的白银立即被贪得无厌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所攫取。确实,一大部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印度和中国。在17世纪末,太平洋从东往西的航线已经开通,新西班牙和秘鲁的白银便取道由西班牙人于1543年发现的菲律宾,运往中国,西班牙人并于1571年创建了马尼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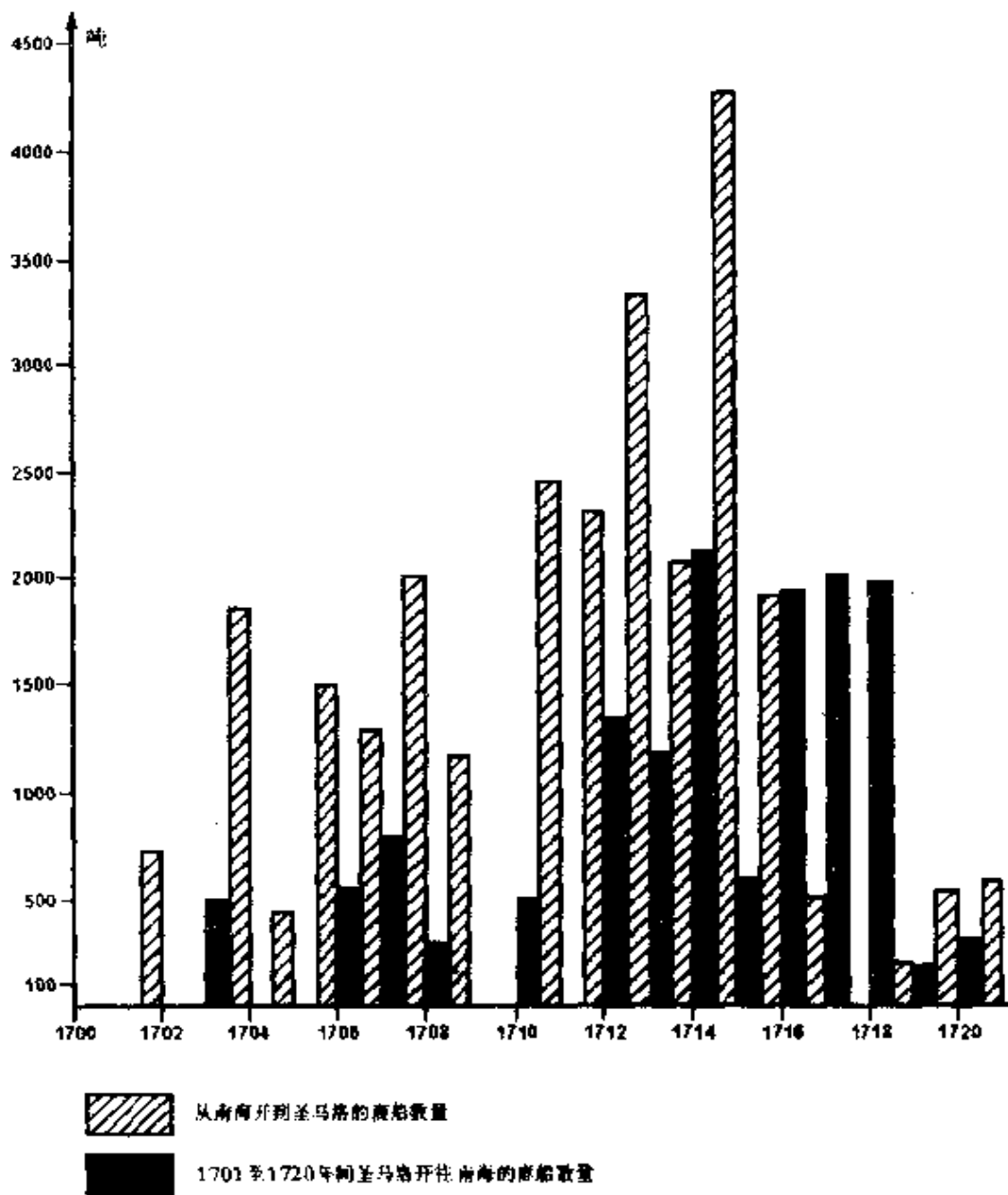
一条规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发挥着作用。现今的报刊经常谈到海湾地区的酋长国,它们并不把石油留给本国使用,而是用来换取别的产品;与这种情形相同,西班牙人过去也不能让美洲白银由自己独占。他们用白银作为商品换取其他必需的用品:谷物,木材,厚木板,纺织品(棉布和呢绒),五金器材等。17世纪美洲贸易的桥头堡加的斯更是“货物充足,品种齐全,法国、英国、佛兰德、荷兰、汉堡和意大利制造的产品应有尽有”⁴³³。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推销产品,因为欧洲为确保贸易平衡,势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白银供应。在白银的这次再分配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不仅是贸易债务的清偿,而且还有西班牙帝国在本土之外的尼德兰战场的军事开支。尼德兰的反抗导致天主教国王派遣阿尔贝公爵(1567年8月)率领部队进行镇压;直到1714年,尼德兰仍留有西班牙占领军,占领历时两个多世纪,军费开支极其浩大。

最后,早在“印度之路”⁴³⁴船队成立之初,在西属美洲的漫长海岸沿线,特别在加勒比海的许多交通枢纽,走私活动日渐蔓延。隐蔽而有效的走私活动在从美洲返航的船只必定停靠的第一个港口塞维利亚以及在17世纪后来居上的加的斯港十分猖獗。塞维利亚的海港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下游的特里亚纳桥彼侧,当局对走私

物品进行检查还相当有效。而在加的斯开阔的海湾,走私者简直可以以所欲为。

圣马洛很早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这些非法转运活动。这是十分自然的,尤其因为圣马洛的水手对出入伊比利亚半岛早已熟门熟路。在15世纪,他们已被冠以“海上运货人”的美名,从北往南在直到马德拉为止的整个大西洋沿岸从事贸易和私掠活动⁴³⁵。到了16世纪,布列塔尼的“木船”把谷物分别运往里斯本和塞维利亚,前者用金币支付,后者则以银币交换。圣马洛商船于1570年出航地中海,经常在奇维塔韦基亚装载托尔法矿的明矾。后来,随着美洲的需求日增,他们又把大批布列塔尼布匹先后运抵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然后再向新大陆转销。在这同一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专在纽芬兰从事捕鱼的圣马洛开始把晒干或盐腌的鳕鱼运往西班牙、马赛和热那亚。船舶在返程时再把银币或银条带回北方⁴³⁶。最后,继圣马洛的商业活动之后,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更进一步为法国贸易打开西班牙的门户,马扎然的胜利兼具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意义。

建立在布匹、鳕鱼和白银三种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圣马洛贸易活动当时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了新的发展。法国驻加的斯领事的信函提供了商船往返情况的大量信息。例如,1702年4月1日⁴³⁷,来自莫尔莱的4艘圣马洛三桅船在上午抵达加的斯,它们花8天时间完成了布列斯特至加的斯的航程,“没有遇到敌人”⁴³⁸,“装载的布匹估计价值50万皮阿斯特,我们的商人对此喜不自禁⁴³⁹,因为他们曾担心途中会遇到麻烦”。确实,就在上一年,欧洲再次爆发了战争。我们顺便指出,50万皮阿斯特至少相当于150万里佛。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圣马洛繁荣的贸易已达到多大的规模。就在同年的10月15日:“昨晚有艘圣马洛商船从红帽洲(纽芬兰重要渔场之一)开到这里,载有半船鳕鱼。”⁴⁴⁰



圣马洛与南海贸易的短周期

1. 从南海开到圣马洛的商船数量。
2. 1701至1720年间圣马洛开往南海的商船数量。

重要的是从圣马洛启航的商船，因为所有的船都返回法国，但有时把货卸在别的港口。例如，1709年返航的商船没有在图表上列出，原因是它们已在欧赖港卸货。

(资料来源：让·德吕莫主编的《圣马洛港 1681—1720 年间的商船活动》，1966年版。)

比这早 20 年,即在 1682 年⁴⁴¹,一份例行的领事报告对过去一年加的斯向欧洲输出的白银作出了结算:450 万埃居交给热那亚和里窝那(以热那亚为主);350 万交给荷兰;250 万交给英国;250 万交给圣马洛、勒阿弗尔、敦刻尔克和马赛。圣马洛利用其 12 艘商船大约取得 200 万埃居。再看一个细节,“好几位法国商人把大部分资金转到英国和荷兰,据说那里可比在法国多得一点收益”。

有关的见证材料多不胜数。我们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从扑朔迷离、疑窦丛生的事件经过中,人们隐约可以看到,圣马洛进行的某些贸易夹带着走私。事情发生在 1672 年,荷兰战争在当年 3 月开始;法国军队于 5 月入侵联合省境内,但西班牙尚未与我国开战。10 月 16 日,一艘拥有 50 门火炮的西班牙战舰,在西班牙舰队司令拉瓜斯公爵的指挥下,向停泊在加的斯海湾的“圣雅克”号逼近,这艘圣马洛船共有 40 门火炮和 150 名船员。战舰当即命令“圣雅克”号让西班牙方面登船检查,但这一要求遭到了法国人的拒绝;在再次敦促又遭到拒绝后,西班牙战舰便发炮轰击。圣马洛的船只进行了反击,但因火药仓库着火,引起了爆炸。结果是包括船长在内的 100 多名船员全部丧生。这艘圣马洛船只是否载有私货?不过,据法国领事说,“‘圣雅克’号运的是价值 30 万埃居的银条以及许多印度商品。”⁴⁴²

从我查阅到的历史资料看,这起事件对法国商船在加的斯的贸易活动并未产生直接后果,即使在西班牙与法国交战后也是如此。在当时,除个别例外,战争从不使商业往来完全中断。十年过后,即在 1682 年,一艘圣马洛货船,在“搬运夫”号和“姗姗来迟”号这两艘法国护卫舰的护送下,从加的斯启程,把“价值 20 万埃居的白银”运往法国。在 1689 年,法国商船又从加的斯把 188.4 万埃居和 20.5 万埃居分别运往法国和热那亚⁴⁴³。总之,即使在西班牙战争的艰难年头,圣马洛也不顾荷兰人和英国人对西班牙港口实施

的禁运,继续与加的斯保持联系。英荷两国只是进行了短期的禁运。美洲的白银仍源源不断地运抵加的斯,然后再向欧洲各地输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正是在以上简略回顾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白圣马洛从事南海贸易的这段短暂的历史插曲。不过,事情的开端还并不十分清楚。肇始的日期大概是在1695年,法西两国之间的战争当时正方兴未艾(赖斯韦克和约于1697年签署)。在“被人视为敢作敢为”的德·热纳先生的率领下,由国王提供的一支船队于6月3日离开了拉罗歇尔,准备在越过麦哲伦海峡后进入南海和太平洋。可是,计划未能成功。在狂风的阻拦下,船队重又折回大西洋,在巴西的圣萨尔瓦多停泊,并且在法属圭亚那的卡宴岛等了很长的时间。船队于1697年4月21日返回拉罗歇尔。我们且别由此得出结论,这次航行无功而返。相反,我认为这是经由麦哲伦海峡抵达太平洋的初次尝试。

实际上,这次失败的远航是那些在南海沿岸对小型商船肆意掳掠至少达10年之久的海盗在返回法国后想出的主意。可见,海盗曾经起了教唆的作用。人们甚至有权认为,圣马洛人从这些海盗行径中学到了前往太平洋海域并在那里谋取利益的必要知识和办法⁴⁴⁵。总之,我正是这样来解释巴黎商人茹尔丹和圣马洛船主诺埃尔·达尼康在同海军大臣蓬夏特朗通信中承认的某些事实和涉及的某些细节的。蓬夏特朗保护茹尔丹和达尼康二人,并鼓动他们放手大干。1698年3月4日,就在行动即将开始时,他们致信蓬夏特朗说,“既然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都在墨西哥和卡塔赫纳沿海从事走私贸易,他们决心前往西属美洲的南海沿岸一试身手”⁴⁴⁶。在这些尚未真正被欧洲人控制的和紧靠大片荒漠的海岸地带,避开西班牙人制订的关于不准与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禁令,无疑会方便得多。

几个星期以后,1698年5月20日,茹尔丹和达尼康又向蓬瓦特朗宣布,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派遣四艘战船经麦哲伦海峡前往南海,以便控制这条通道,在智利沿海设置据点,进而抵达至今未被任何欧洲强国占领的加利福尼亚”⁴⁴⁸。这家公司于同年11月17日很快进行了改组;这第二家公司的资本共分20股,茹尔丹独占13股⁴⁵⁰,另外5名出资者各占1股,第七位出资者贝贡拥有2股⁴⁵¹。这些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茹尔丹在过了半年以后,于1698年12月19日告诉蓬夏特朗说,“启航的礼炮”已在拉罗歇尔放过,四艘整装待发的船舶将于翌日“清晨扬帆出航”,开往南海⁴⁵²。

由圣马洛的水手和船主串演主角的这场戏不属于所谓“私掠战”的范围,私掠战是由各国作出明文规定的海盗行为,在17世纪的战争期间几乎是合法的,对圣马洛也是司空见惯的⁴⁵³。这次行动(法国刚于1697年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是不折不扣的海上行劫,尽管人们想方设法去掩盖其劫掠的性质。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1696年在圣马洛创办的中国公司;公司的创办人声称,对中国和对南海的两种贸易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成了既定的远航行动的正式目标。

可是,1700年11月1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被指定继承王位,成为菲利普五世。从此直到1713年为止,两个王国一度合并。圣马洛于是很快想到,也许有可能在天主教国王的同意、默许乃至协助下,远航南海。这也正是茹尔丹于1702年7月30日提出的计划。这项确实颇不寻常的计划在凡尔赛草拟完毕,路易十四的政府很可能暗中参与策划;据茹尔丹说,整个方案是“为我以及在圣马洛给我下达指令的达尼康先生”制定的。据我所知,这项计划后来没有任何下文,但它却能让人深思:每年派两艘商船和一艘装有30至40门火炮的护卫舰——

悬挂西班牙国旗和受西班牙国王委托的法国船——前往秘鲁，进而远航菲律宾和中国。船队的出航将在拉科鲁尼亚或加的斯准备就绪，待返回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后，再向西班牙国王照常纳税。所打的牌照也很冠冕堂皇（是否相信，悉听尊便）：清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南海的走私活动，制止中国对新西班牙和秘鲁的贸易，因为这项贸易使天主教国王每年损失 300 万埃居⁴⁵⁴……究竟这是出于天真，或者是心怀叵测？

大概应该说这是口是心非：在圣马洛建立的中国公司确实是为远航太平洋沿岸充当骗人的招牌。在茹尔丹致蓬夏特朗的一封信里，我觉得有一句话值得相信：“中国与南海的确是分不开的，分则两伤。”⁴⁵⁵可见，经由南太平洋前往中国，然而再重新返回，这种往返航行的目的确实是要让中国的黄金向波托西的白银靠拢⁴⁵⁶。可是，1702 年计划所打算阻止的，恰恰正是有损于西班牙利益的这种中国与秘鲁之间的贸易。

另一个方便的挡风屏障是东印度公司。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部分地放弃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垄断权，允许中国公司开展远程贸易，由中国公司支付补偿。这项活动并未立即取得成功。随后，在 1706—1714 年期间，随着圣马洛商人推行了分包契约，情况有所改善。分别于 1712 年和 1714 年签订的最后两份分包契约其实是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垄断权几乎全部出让。在当时的大金融家之一安都纳·克罗扎的支持下，一家新公司于 1715 年成立，名为圣马洛东印度公司。圣马洛在 1708—1713 年间曾派出 15 艘船远航印度洋，这在战争期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此外，在 1702 年，随着战争的重起，圣马洛人照例配备武装船只立即展开“私掠战”。杜盖—特鲁安是圣马洛一位富有的造船主（此人于 1693 年加入海军）的儿子，他于 1695 年卤获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他洋洋得意地声称，“我的船主花一份成本，可

得 20 倍的利益。”⁴⁵⁷ 他于 1711 年 10 月武力抢占里约热内卢的港口码头，并向该城索取赎金。

我们再来仔细考察这些南海航行的情形；旅程十分漫长，生活极其艰苦：“1701—1709 年期间，每次航行约需 20 至 26 个月，1710 年后则长达 3 年”⁴⁵⁸。无论在大西洋或在太平洋，途中必须在许多港口停靠，以便取得淡水 and 新鲜食品的供应。相反，在旅行的终点，条件相当优越。在智利沿海的康塞普西翁和阿里卡，当地有少量法国侨民定居，为物资供应和商品交换提供据点。最后，甚至在利马的卡亚俄港，船舶以取得淡水和食品供应为借口，大量出售布匹等工业制成品；由于与西班牙当局相勾结，所有这一切都得以顺利进行。贸易盈亏最后以白银结算，银币或银条均被接受。圣马洛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些贸易。“在法国 1698 至 1724 年间派往美洲西海岸的 133 艘商船中，竟有 86 艘属于圣马洛的批发商或属于他们主持的商船公司所有，占总数的三分之二”⁴⁵⁹。

值得称赞的是，参与远程航行的这些船只竟没有一条在海上失事，也就是说，自从圣马洛商船的航线不再经由险象丛生的麦哲伦海峡，而是取道霍恩角绕过美洲以后，商船在航行途中减少了失事的危险。究竟是圣马洛人或者是荷兰人最早抵达美洲的顶端霍恩角呢？看来很可能是荷兰人，但这并不重要。不论情况如何，取道霍恩角使航行变得便利，以至载重不过百吨的小船也能与吃水量高达 700 吨的大船以及货运量为 250 至 400 吨的三桅船一起进行往返航行。

这是船舶和船员的壮举，也是商业事业的巨大成功。只有于 1698 年进行的第一次航行亏了本。后来，利润经常保持在 200% 上下。尤其重要的是，商船返航时给法国的经济和财政带来了为发展贸易和支持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白银。1707 年，一支由 7 艘商船组成的圣马洛船队，在由夏贝尔指挥的一艘国王战舰的护航下，把大

批白银运抵位于布列塔尼南端的欧赖，据官方承认，价值可达1 700万里佛，而实际数量可能更多，约值3 000万里佛，因为其中肯定还有隐瞒和走私的成分。在这可怕的1709年，这笔巨款的到达是否挽救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危机呢？看来这是可能的⁴⁶⁰。

令人惊讶的是——究竟是否值得惊讶，也还难说——，圣马洛的鸿运高照使它很早就发了大财，但这种兴旺的局面在战争结束（1713年）时却几乎不再存在，尽管直到1724年为止⁴⁶¹，仍有几批船只远航南海；我们对最后这几次航行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在1713年，“据说仍有30艘船在秘鲁沿海活动，几乎都是法国船”⁴⁶²。鉴于船舶航行缓慢，又有利可图，放弃南海贸易怎能在朝夕之间立见成效？

不论早晚，圣马洛毕竟开始了衰退。这里有许多原因：和平的恢复及私掠战的结束；繁忙的海上运输逐渐朝大西洋方向转移，南特、拉罗歇尔和波尔多三个港口在18世纪得益于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决定改弦易辙，马尔提奈于1716年率领舰队在智利和秘鲁沿海试图恢复秩序，并且取得成功。法国实际上面临着以下的选择：或者进行走私，或者通过加的斯发展正当的贸易；事实上，后者所得的利润始终相当丰厚，法国整个经济的平衡有赖于正当贸易。

此外，南海贸易需要垫付的开支高达百万里佛，如系大船，开支更要翻番。这笔巨额开支超过了圣马洛本身的财力。于是，巴黎、鲁昂、南特、马赛等地的资金便纷纷加入进来生息取利（私掠活动和印度贸易自然包括在内）。因此，圣马洛显赫阔绰的船主兼商人——马贡·德·拉朗德和马贡·德·拉希波蒂埃尔，勒费尔·德·博韦，吉约姆·埃昂，贝荣，洛盖·德·格朗维尔，德·拉埃，戈贝尔，达尼康——在我们眼里都是真正的批发商和极其富有的财主，但他们毕竟比不上路易十四统治末年的大金融家和大银行家，

诸如萨米埃尔·贝纳尔和安都纳·克罗扎,后二人与圣马洛的商业活动情况也有联系。因此,认为圣马洛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次等的地位,这也许并不过分;它在繁荣兴旺的时代被掩盖的伤口,势必会在退潮时重新暴露出来。其实,法国所有的大资本家都为“私掠战”、南海贸易、远航印度和中国出了力气,他们当时都关注着蓬夏特朗所推进的事业,蓬夏特朗是与圣马洛商人保持友好联系的法国秘密当权者之一。但在路易十四死后,蓬夏特朗遭到了排挤。印度公司很快摆脱了圣马洛商人的控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由约翰·劳于1719年重建的印度公司在币制改革的灾难性失败中得以幸存。

可见,在1713年或在1719年以后,圣马洛丧失了大资本和王国政府的合作。城市又恢复其原来的次等地位。当然,它将继续在红帽滩和纽芬兰的其他渔场捕捞鳕鱼,分销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它与邻近的英国和荷兰依旧保持联系,仍然把布列塔尼的咸鱼和布匹,间或还把谷物运抵加的斯,并且由素以安全闻名的圣马洛商船带回白银⁴⁶³。可见,圣马洛已经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证据就是:当地最具活力的成分从此将另谋出路,或到南特等法国其他港口赚钱,或去加的斯和印度洋发财。另一个征兆也很重要:圣马洛没有汇兑市场⁴⁶⁴。尽管它一再要求,圣马洛始终未能取得自由港的地位;否则,它或许还能避免沦为次等城市的命运。

在18世纪最初的25年期间,难道真正的问题就是圣马洛的命运吗?

据我看,圣马洛城在这短短几年中的表现在整个历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前,法国已经看中了加的斯的白银。后来,当它在稳当可靠的加的斯贸易与玩命冒险的南海贸易之间作出选择时,它再次决定选择前者,而且义无反顾,毫不犹豫。与此同时,英国却通过梅休因条约(1710年),优先

注意里斯本及巴西黄金，支持布拉干萨王室。也许正是由于葡萄牙的缘故，英国将不知不觉地迅速采用了金本位。接着，荷兰、热那亚还有威尼斯等资本主义强国也选择了黄金。法国仍抱住白银不放。这是因为西班牙使它产生虚幻的希望。拿破仑也将为此上大当。

最后一个例子是 18 世纪的波尔多。透过波尔多的好运，我们这里注视的目标是安的列斯群岛的食糖、咖啡、棉花、烟草、靛蓝贸易。这项强大的奢侈品贸易确实犹如由草秸引燃的一个火种，但它毕竟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因为新的草秸不停地在被搬来引燃火种。

波尔多主要从安的列斯群岛进口产品，并且转销各地，但与群岛从事贸易的城市不是波尔多一个。除波尔多外还有鲁昂，其出口制成品的种类之多简直不可数计；另外是南特，当之无愧地堪称黑奴买卖的中心；最后还有敦刻尔克和马赛。

此外，安的列斯群岛并不是法国在美洲的全部属地；加拿大、路易斯安那位居群岛之后，那里土地辽阔，但起步缓慢。拉罗歇尔就是主要与加拿大联系的港口。

在这里，我故意缩小观察的视角。

我之所以如此谨慎小心，第一个原因在于，介绍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些岛屿的陆地与辽阔的海域构成一个整体。岛屿在整体中并不起眼。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 1492 年 10 月 12 日首次登上了瓜达哈尼岛（巴哈马群岛），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只是在他以后，西班牙人才慢慢在那里立足。他们随后占领了圣多明各（1496 年）、波多黎各（1508 年）、牙买加（1509 年）和古巴（1511 年）。古巴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科尔特斯正是从古巴出发，然后才抵达墨西哥，哈瓦那则是“印度之路”两支船队的会合地点。征服者的巧取豪夺，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导致大批土著居民死于非命。他们随船运来的牛在各岛屿自行繁殖，并退回到野生状

态。

但是,过不多久,其他欧洲人继西班牙人之后,也来到这些岛屿。岛上野牛成群,且容易捕猎,因而吸引一些冒险家——其中以法国人居多——前来偷猎,这些冒险家又称“布卡尼埃”(得名于一种名为“布卡”的木架,用于熏制捕猎所得的野牛肉)。在1630年前后,荷兰人和英国人逐渐增多,他们把野牛斩尽杀绝,从而使原来的“布卡尼埃”与龟岛的海盗相勾结,在海上从事劫船越货的活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海盗在交战国的武装面前渐趋消失,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海盗的收益正逐渐减少。总之,在17世纪的最后20年间,海盗活动已转移到南海海域。在此期间,英法荷三国在群岛地区站稳了脚跟,占领陆地,发展农业……英国人于1655年把西班牙人从牙买加逐走。荷兰人于1634年登上库拉索岛。法国人于1635年占据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并于1659年进占西属圣多明各岛的西半部(必须等到1697年签订赖斯韦克和约,才正式承认它归法国所有)。这是法国在加勒比海面积最大(3万平方公里)⁴⁶⁶和经济成果最巩固的一块属地,因此引起了英国人垂涎三尺。原因之一是圣多明各长期拥有未开垦的处女地,种植作物不必施肥。

虽说如此,直到17世纪末乃至后来,这些海外领地的作用也不宜夸大。变化将在18世纪发生,岛上开始种植甘蔗和发展制糖工业。

甘蔗原在印度恒河平原生长,慢慢向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迁移。它朝东来到了中国,往西抵达了地中海的“酷热区”(萨瓦里解释说,最炎热的地区就是公元十世纪左右的埃及),然后是塞浦路斯的沿海平原。到了15世纪,塞浦路斯岛上已出现了“食糖大王”,威尼斯贵族科尔纳诺是大种植园主之一。在这破旧立新的15世纪,甘蔗逐渐进占西西里岛、巴伦西亚以及摩洛哥的苏斯河流域;接着

又在大西洋各岛屿广为种植，其中的马德拉群岛、卡纳里亚斯群岛和佛得角群岛更为美洲的甘蔗种植首开先河。最后，到了16世纪50年代，在南起桑托斯、北至累西腓的巴西滨海地带，甘蔗种植园、制糖作坊（水力压榨机用于压榨甘蔗和提炼糖浆）以及制糖作坊主已是比比皆是，作坊主使用奴隶劳动，所作所为几乎与封建领主无异。

在种植园的中央，建有供主人居住的“大屋”，附近是奴隶所住的木棚。17和18世纪制糖作坊的景色千篇一律地由三个部分组成；主人的住所（在牙买加，被称作“大屋”），奴隶的房舍，还有必不可少的工业设施。当荷兰人夺取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地区（伯南布哥州）时，他们首先抢到的是制糖作坊，并且在1630—1654年间经营甘蔗种植园。当他们从殖民地被驱逐时，许多种植园主和制糖技师跟着离开这里，前往别处谋生，其中尤其以新教徒居多。阿丽斯·皮弗尔·卡纳布拉瓦早已指出，安的列斯群岛制糖业的兴起是这伙种植园主和技师迁徙的结果⁴⁶⁷……安的列斯群岛从此便陆续以大小不等的规模发展种植园，开始出现商业繁荣的景象，首先是食糖，其次是胭脂红、棉花、可可、生姜和烟草，后来还有咖啡。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在1654年前后展翅起飞，圣多明各于1680年随后跟上，但它迅速在生产和交换中跃居首位。

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地域范围后来变化不大。根据1763年的巴黎协定，法国被迫出让了所属的几个小岛：圣克里斯托弗岛，安提瓜岛，蒙塞拉特岛，多米尼加岛，圣文森特岛，巴巴多斯岛，多巴哥岛，格林纳达岛，格林纳丁斯群岛。通过1783年的凡尔赛协定，法国收复了多巴哥岛和圣巴泰勒米岛；总的说来，损失和收复的属地都不太大。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地域和经济可见都相当稳定：运往法国的产品始终不变，食糖在其中占一半以上，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最初由荷兰人所掌握，后在科尔倍尔时代被法国

人夺回，并于1664年建立起东印度公司⁴⁶⁸。东印度公司的专营贸易权在两年后即被废弃。从此，在这些岛上，“法国商船一律受到欢迎”⁴⁶⁹。

法国向安的列斯群岛出口的货物也依旧不变。群岛因广为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食品仰求外给，为此运来了成船的面粉，桶装咸猪肉，以及鲱鱼、鳕鱼、葡萄酒和食油……此外还有缝衣针、别针、鞋、帽、丝袜和毛袜、布匹、被褥、玻璃器皿、锅炉和制糖用的铜锅，这些工业制成品主要来自鲁昂。与阿基坦地区交通十分便利的波尔多供应桶装面粉（利用加龙河上的水力磨坊碾压）和葡萄酒；它还供应各种工业产品，因为它与制造这些产品的省份往来密切。这一贸易也包括输送黑奴：贩卖黑奴的船只主要从南特出发，沿着传统的三角形路线航行（南特—几内亚—安的列斯群岛—南特）。为了在非洲沿海地区进行物物交换，船舶载运特殊的货物（烧酒、棉布、枪支），用以换取奴隶。它们在抵达安的列斯群岛后，经过内部装修，使之适用于向法国运送成箱的食糖和成袋的咖啡。可是，黑奴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大革命前夕在圣多明各一地竟达50万人。由此引起了奴隶的反抗、骚乱、逃跑等各种事件，1791年更导致了一场大暴动。

安的列斯群岛与法国的贸易额为数相当可观，以下的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在七年战争（1757—1763年）结束后的鼎盛时期，每年在法国和安的列斯群岛海域之间往返的法国商船总在千艘以上。在马提尼克岛装卸货物的商船也有80艘之多。交易额于1778年高达2.1亿图尔里佛，占法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⁴⁷⁰。

尽管存在局部性的走私活动，宗主国享有对其殖民地的专营贸易权，我国的商人和行政当局始终把殖民地贸易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即使在曲折艰难的战争年代，也勉力保住这种联系。单就进出口平衡而言，法国对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始终处于入超

地位,但我们已经看到⁴⁷¹,这种入超究竟掩盖着什么:依靠受到严密控制的和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系列交换,波尔多的出口商品在穿越大西洋的同时,价格竟翻了一番。船舶的航行日期和载货数量都一再经过斟酌,使得欧洲产品在岛上始终紧俏,售价始终很高,而所要运走的食糖却总在甘蔗收割后不久收购,以便达到低价收购的目的⁴⁷²。根据米歇尔·莫里诺所举的例子,船舶运回法国的货物的价值也增加 20%。这在贸易的全过程中是最具侥幸性的部分:成功与否取决于殖民地产品在欧洲的市价,这里有英国和荷兰的竞争。波尔多要把进口的大部分货物转手出口:就以 1785 年为例,出口的糖占 87%,咖啡占 95%,靛蓝占 76%⁴⁷³。

可见,安的列斯群岛贸易构成“一个复杂的交换整体”,尤其因为葡萄酒和面粉来自吉伦特省的内地,咸牛肉往往直接在爱尔兰采购,波尔多的批发商赶上机会,也把货币当作普通商品一样,做几笔投机生意。1727 年“出航大西洋的 123 艘波尔多商船的载货清单”特地指出,实际上,还应追加一份关于皮阿斯特银币的清单,“近二、三年来,批发商把皮阿斯特银币运往美洲,可稳得 50% 的利润”,这种贸易必须保守秘密,因为它是“明令禁止”的⁴⁷⁴。

总而言之,安的列斯群岛贸易的利润十分丰厚。这对波尔多在 18 世纪的起飞具有决定性作用。城市居民于 1700 年为 4.5 万,至 1747 年达 6 万,在大革命前夕更上升到 11 万以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里昂、马赛、巴黎或任何其他法国城市⁴⁷⁵。确实,大西洋贸易在波尔多是一场姗姗来迟的革命。波尔多盛产葡萄酒并因此致富,本是由来已久之事,它已习惯于看着外国商人和商船前来装货,然后运销欧洲各地;波尔多当地既不造船,更没有水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波尔多的传统出口急剧下跌,英国向葡萄牙产品(其中包括波尔多葡萄酒)敞开大门,致使波尔多蒙受严重的打击。这场危机以及政府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 1717 年

诏书(批准波尔多和其他 12 个港口为对“法属美洲诸岛”贸易的指定起点),再加上一批新商人的崭露头角,终于促使波尔多自 1720 年起从事航海活动和发展造船事业⁴⁷⁶。

在这批商人中,有的原是本土的资产者,有的是新迁来的外国批发商,他们迅速成了暴发户。原籍汉堡的许累家族,葡萄牙犹太人格拉迪家族,作为造船主和经销商而发了大财的朗格多克人博纳非家族,利用家族成员众多,在各商港经销药材的茹尔纽家族⁴⁷⁷,都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些批发商毕竟人数不多;1790 年左右,他们在全城 800 名“大小商人”中肯定只占很小的比例,即占商人总数的 10%⁴⁷⁸。在 1779 年的鲁昂,根据《商人名录》的分类登记,造船主和出口商仅 61 人,他们是“当时的资本家”,城市的主宰者⁴⁷⁹。

18 世纪法国港口的大西洋贸易显然单独构成体系;在各岛屿实行的奴隶制无疑比古代的奴隶制更加残酷,但也更富生产效能,尤其因为它受大洋彼岸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操纵。电位差是成功的要素之一。这个被纳入到基本上对外封闭的地域之内的体系⁴⁸⁰当然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首先面临战争的考验,好不容易才渡过这个难关。英属牙买加的种植园主全力阻止英国吞并他们的直接竞争者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另一项危险是非洲黑奴的来源可能枯竭,幸而此事没有发生。此外,随着运价的高昂,从事大西洋运输可能变成得不偿失,这个危险也未能成为事实。

结果是奴隶制的成功导致了自身的崩溃:黑奴人数过多。制宪议会于 1790 年 3 月 28 日决定解放奴隶,赋予他们自由和政治权利。在杜桑·卢维杜尔的带领下,黑人于 1791 年在圣多明各举行起义。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在岛上重建有利于白人的殖民统治。更何况还有别的食糖产地(甚至在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等地),欧洲不虞出现食糖匮乏,甜菜糖不久将要问世。此外,以奢侈品为对

象的海岛贸易,因恢复古代奴隶制而落伍于时代,与欧洲人的心态变化相抵触。随着 19 世纪的到来,国际贸易将改变方向,侧重发展煤、铁、谷物等原料的交换。

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同其他各国一样,法国贸易经历了一系列连续的周期:就 1569 至 1650 年马赛的例子来看,周期似乎很长;再以波尔多和 1698 至 1724 年的海岛贸易为例,周期也不能算短;只有 1698 至 1724 年圣马洛在南海的冒险活动,如果从时间上进行衡量,周期显得短些。假如我们在哪一天能够让贸易的历史走出叙述的范围,它也许可以说明周期过程的规律性或反复性。我们选择的三个例子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除了事先早已说明的、不言而喻的事实:所有这些贸易联系都取决于广大世界的众多偶然因素。到了今天,贸易联系的破裂和转换要比往昔迅速得多。尽管如此,即使在过去,像马赛和波尔多这样的为时将近百年之久的周期毕竟也是创纪录的例外。我们应该解释出现这些例外的原因,即令只是指出,它们产生自强烈而又持久的集体需求,这些集体需求已被人们所确认,就像中世纪对各种香料的喜爱,后来对酒、咖啡和烟草的嗜好,以及今天对强烈或温和的毒品的恶性追求一样……此外,已建立的稳固的商业体系也起了作用。没有经销系统的联系、配合和传送,也就不可能有商业。

贸易平衡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同一个问题。任何贸易顺差实际上都体现着调动更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我国的贸易在 19 世纪之所以出现逆差,这是因为我国资金出口允许我们坐享其成,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相反,在现时代,让我们为之伤透脑筋的外贸逆差则是一大弱点,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危险的奢侈,因为这会导致我国负债,影响我国的未来。可是,在正常情况下,进出口贸易在总体上

趋向平衡。与国民收入相比，贸易的盈余或亏空通常是个很小的百分数。因此，根本的问题是要知道，这个本身无足轻重的现象在今天和在以往却能对整个国民经济总起着轴心的作用。

实际上，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然而，我觉得，如果从基础到上层有可能证实我的认识，一切将变得豁然开朗。这些认识是：

——基层的经济活动在一些相对不变的地方流通渠道中自行达成平衡，这些短距离的运动在基层单独进行，并在基层消耗其动力；

——外部经济几乎不触及这一基层，它在自身运作方式的限制下，发挥有限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外部的运动实际上反而有所加强；

——这种外部经济又取决于国际经济，后者限制、加强和领导前者。

以上认识说过不谈，我们不能就此以为，民族经济可能动用全部实力去从事对外贸易。只有一部分实力被投入运动，正如风车一样，只是活动着的上半部分才随风转动。有鉴于此，假如加以极度的简化，读者就能假设有一条经由巴黎的并且以首都为中心转动的直线，它把我国分成两个部分。如果这条轴线像一条纬线那样自东而西地贯穿全国，法国在 15 世纪就被一分为二：南部因靠近地中海而身价倍增，北部则相对地落在后面。从 16 世纪开始，轴线趋向于沿着巴黎的子午线方向延伸。西侧面对大西洋，并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起而获得白银；在东侧的勃艮第等地区，仍然使用铜币。到了 17 世纪，轴线又恢复横向的位置，但这次却是北部占上风。荷兰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贸易的主宰不是太阳王，而是阿姆斯特丹。后来则是伦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今天的情形又怎样？法国的所谓荒漠地带位于西部，而在东部，德国经济的吸引力

正逐渐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上的概貌只是一种有待详加证实的推断，我们至少也应该确切地画出主要的通商路线，重现贸易的地理布局。同时还不应忘记，流动性始终位于经济的一定高度，而在基层则保持相对的惰性。

在缺少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对法国贸易进行的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容易移动、反应敏捷的高层次经济活动也正是我所说的在我国过去存在的资本主义成份。

五 阶梯的最高一级：资本主义

我承认，在冗长的本章末尾，又把“资本主义”一词引了进来，会使以上的解释变得复杂化。但舍此又怎样完成我们的考察呢？“资本”、“资本家”以及在以上二词基础上扩展词义的“资本主义”在任何经济考察中都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人们怎能排斥它们而不受损害？

根据最通用的定义，“资本”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并被重新纳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存在于经济的各个部门，并势必存在于各个时代。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叔父、经济学家夏尔·纪德指出：“资本与第一把石斧同样古老”⁴⁸¹，人们还可以说，与“最原始的农业工具”⁴⁸²掘地棍同样古老，镐和犁当然更不在话下⁴⁸³。

资本主义既然是调动资本家参与经济活动的基本因素，它的作用“无非是调动资本而已”；这个定义下得有点过分仓促⁴⁸⁴，但它足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极其悠久。马赛尔·拉丰·蒙代尔把他的著作题名为《从汉穆拉比到洛克菲勒的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1938年版），曾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非议，而我则相反，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同样，杰出的历史学家泰奥多尔·蒙森曾在论述古巴比伦时谈到了资本和资本家，使马克思为之深感愤慨，而我也并不觉得对蒙森有什么可予指责。

但是，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中，“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却与“资本”不同，它们并不享有所无不在的特权。它们实际上局限在经济生活的最高和最敏感的层次。这是它们惯常的栖生之地。资本主义当然不断在向下层侵蚀，但它首先是位于大厦最高层和阶梯

最高级的现象。站在资本主义的身旁，也就等于登上居高临下的塔顶。正因为如此，我喜欢说资本主义是经济大厦的最高一级。

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

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历来都能分门别类，但直截了当提出如何分类的问题，则要归功于雅克·拉斐特，他所作的区分失之偏颇，并且为时过晚。他说：“资本并不始终属于使用资本的人所有。相反，拥有资本的人，即俗称富翁的人〔早在拉斐特以前，杜尔哥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人都已使用‘资本家’一词〕，往往不是自己使用资本，而是把资本借给那些被迫以劳动谋生的人，条件是索取部分收益，借以过坐享其成的生活。”⁴⁸⁵

这个区分为经济生活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但界线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清晰：因为我同时可以出资兴办企业，即作为资本家坐收其利，又参与某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假如接受雅克·拉斐特的分类，那就不应该附和赫赫大名的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的见解，仅仅说银行家“一旦使用别人的金钱”，便开始履行其独特的职能。这项条件对商人、批发商、工业企业家全都适用：他们也“使用别人的金钱”。

照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搞错，高层经济可划分为两个区域：一部分资本被积累起来，处于休眠状态，被贮存的资本因而不再生息；另一部分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就像河水推动磨坊的水轮一样。根据以上区别，人们不难懂得，用于生产的资本可被认为是恪守职责的“真”资本，至于其他的资本，则是因脱离生产，对公众无益而丑名远扬的假资本。约瑟夫·夏佩曾谈到“死货币”，是否存在“死资本”呢⁴⁸⁶？

我以为这种观点简直大错特错。我不打算为资本的积累和贮存作辩解。可是，如果把道德观念抛在一边，我以为资本主义只是

依靠资本持有人的积蓄,才可能始终活跃;资本积累原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犹如蓄水的水塔,源源不断地、程度不同地提供必要的水流。我甚至怀疑会有静止不动的死资本的存在:一种重力不断在推动资金像水一样流出其蓄积池。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算不上是社会新闻的小事,见诸《德·古尔维尔先生的回忆录》⁴⁸⁷。事情发生在1663年,正值路易十四当政不久。回忆录的这位作者回到了布鲁塞尔,他说,“我觉得住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舒服。承蒙西伊里侯爵特意前来晤面,我听他说准备去安特卫普一游,便决定与他结伴同行。我领他去拜访德·帕拉维西尼先生,此人说来少见,家境极其富有,却不肯坦然承认。我要德·帕拉维西尼先生破费请客……招待我们吃饭,至少也应派一辆四轮马车和四匹马,带我们四处逛逛。他当即就向西伊里侯爵解释,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富有;他指着卧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对我们说,那里放着价值10万埃居的银条,却不给他增添分文的收入……他在威尼斯银行有10万里佛的存款,息率还不到3%,他在家乡热那亚另有40万里佛的存款,利息也高不了多少;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他赚不到很多钱。在我们告别出门后,西伊里侯爵对我说,所见之事简直难以置信。后来,据他讲,在返回巴黎后,他为未能把这个场景告诉莫里哀,让他收录到《怪吝人》的喜剧中去而十分生气”。这本是件可能办到的事,因为《怪吝人》只是在1668年方才公演。

我介绍这个插曲不是为了谈论吝啬,否则岂不脱离了主题。毫无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资本家竟是怎样的谨小慎微,似乎甘愿枯守万贯家财。顺便还应该提到的是,早在15世纪前已是热那亚富豪的帕拉维西尼家族,其继承人仍然是首富之户。与昂利·皮兰纳和阿韦奈尔子爵的想法相反,这里的事实恰恰证明,资本家的财产,资本的占有,在经过两三代的时间以后,并不如公平的准则

所要求的那样，立即自动消逝，从而为新生的富豪让出位置。这个例子尤其可以证明，资本的休眠往往只是表面现象。这不仅因为，对它的主人来说，银条是一笔储蓄，一种保障，他随时可在安特卫普的市场出售一条或者数条，而且因为他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存款，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信誉卓著的银行的交易活动。这些存款都派一定的用场。

由此可见，静止不动的金钱，在其重力的作用下，或出自投资的需要，趋向于转入流通和“重新变活”。此外，还有遗产继承和由此产生的不测事故，败家子可把财产挥霍殆尽；还有嫁女的妆奁，对家族所尽的道德义务，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容忽视；经由公证人或银行家的可靠介绍出借的部分资金，或委托包税商向王公发放信贷，也有一定的诱惑力。

总之，在活资本和死资本（多少处于静止状态的资本）之间，势必存在着由后者通向前者的一个转换过程。无论在过去或当今的经济中，这个过程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法国最富有的人无疑并不是拥有动产的资本家，1981年以来缴纳巨额财富税的纳税人名单大概可以为此作证。

休眠资本的重力

留着不用的这笔资金对整个经济来说是一种保障，一种储备，意味着安全。这还不够，吸水的海绵应能不断恢复饱和状态。这笔财富在法国是否有效地发挥作用？

可以肯定，它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还很不够，因为在旧制度下以及在后来，确切地说直到1850年为止，信贷尚未真正组织起来。巴黎虽有100多名大小不等的银行家，但巴黎是首都，而且那时还是在1789年。就在同一时期，作为经济发达的重要商埠，鲁昂只有四名银行家¹⁸⁹。因此，人们不得不向“财主”告贷，苦苦哀求，等

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目的。

拉瓦勒的一位名叫让-弗朗索瓦·弗里尔的织布商于 1746 至 1770 年间，通过 55 笔贷款，从贵族、教士、资产者、公证人乃至手工工匠那里借到 282 093 里佛，利率为 5%（利息达 13 625 里佛），借款而且以票据形式进行交割⁴⁹⁰。事情好不容易方才办成，确实费了不少口舌。我对此完全可以想象，至少这里有一份偶然见到的历史资料，它逐日记述了鲁昂的一位名叫罗伯尔·杜加尔的大商人当时因告贷无门而遇到的几乎不可克服的惊人困难。此人于 1749 年在鲁昂市郊的达尔讷塔勒开办了一家染织手工工场。为了发展生产，他需要追加投资。他的合伙者路易·小茹维在巴黎到处联系贷款，却找不到有人愿意借钱。杜加尔开始着急，可怜的小茹维写信对他说：“等我再作一次努力，办事总该花点时间，尤其是要借钱，谨慎小心只会少出纰漏……换上比我胆大或比我聪明的别人，事情或许一办就成，但我担心遭人拒绝，即使吃了闭门羹，也还不能就此罢休”。借款的事将以失败而告终⁴⁹¹。

我还可举出发生在 19 世纪的第戎或阿马尼亚克地区的类似事例。但这里就不必多此一举了。何况，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与英国的情形相比，法国的信贷虽然极其困难，但它毕竟与大笔的休眠资本同时共存。作为资本主义的助手和后备，休眠资本在环境的帮助下可以复苏，甚至成为供血的动脉；到了那时候，人们就能衡量出它的能耐了。每当某个地区遭受自然灾害，金钱便从隐藏的地点冒了出来，缓解暂时的困难，帮助渡过难关。目击者有时为此感到意外。

例如，在 1708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必须设法借到现款。资金并不匮乏。问题是财政当局从 1701 年开始发行了纸币，而且不声不响就成倍地增加了发行量。1708 年 3 月 6 日，一名官员自雷恩发信，向财政总监报

告说：“城里的大资产者之一，长期与本省最知名的批发商一起，从事海上和陆地的贸易，目前在商界且颇有名气，据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有3 000万皮阿斯特银币被藏了起来，另有价值6 000多万皮阿斯特的黄金和白银……如果不把纸币清除干净，货币流通量不适当减少，商业得不到部分恢复，这些铸币和金银就不会重见天日”⁴⁹⁵。在贫穷的布列塔尼可见也藏有财宝。在1708年，这也许因为雷恩依靠本市的商人以及布列塔尼省的行政当局和铸币所，并且作为圣马洛的后方城市，从圣马洛商人在智利和秘鲁攫取的巨额白银中分享了利益和扩大了储备。可是，雷恩却轻易不肯动用这笔储备。

过了20年以后，确切的日期是1726年3月20日，仍然在布列塔尼地区，但这次是在南特。据一则消息说，“我们只是在一个偶然场合才了解到城市的实力和潜力；当时，商人们必须作出抉择⁴⁹⁶：或者在国王兴办的印度公司范围内独立经商，或者为同一目的与实力雄厚的圣马洛商人结成伙伴。为避免互相妨碍，决定采用后一个方案，贸易活动全在圣马洛公司的名下进行。南特商人的认股金额竟高达1 800万，而我们原以为加在一起也不过400万。九艘商船整装待发，一旦航运自由得以恢复，立即就可启航……我们希望通过向宫廷提供巨款，能够把败坏王国财政的印度公司所享有的专营贸易权予以撤销，并让宫廷许诺在各地普遍推行自由贸易。”⁴⁹⁷顺便值得指出的是，这笔巨款是商人们积攒而成的。

以上的引文显然不必再加评论。它清楚地说出了我们想说明的东西：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法国与中国或印度一样，也是贵金属的坟场。它把贵金属拦截下来，不费力气就把贵金属转化成积蓄。这个缺点或这个优点一直延续到旧制度结束以后很久。在19世纪，法国货币总量与整个欧洲持平。在1857年短暂而猛烈的国际危机期间，危机的始发地美国有5 000家公司破产，银行纷纷倒

闭,英国被卷入漩涡,接着是德国、丹麦、北意大利、威尼斯、华沙,几乎整个欧洲出现了连锁反应。法国局部地得以幸免,因为它的银行在第二帝国初期虽有蓬勃的发展,但不是危机打击的太大的目标:银行存款额仅1.2亿,“而闲散资金合计约有30亿之多。藏在袜筒里的私人积蓄使法国免遭灾祸。不过,这对发展企业却是个障碍,类似情形至今依旧存在”⁴⁹⁸。

再过半个世纪,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奈马克⁴⁹⁹于1905年对法国这一巨大的潜在财富大加称赞。他问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储备?”1929年的危机比1857年更加严重,但对法国的打击也比其他国家来得较晚。这是因为它靠积累的资本,还能苟且偷安吗?酷爱历史的银行家希克1945年就法国人当时还拥有的大量黄金作了计算,力图借此安抚民心⁵⁰⁰。

对积聚的狂热,储蓄的数额之大,如同贯穿我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并不仅限于富有或小康的家庭。穷人经过拚命努力,稍有余裕者也以各种方式进行积攒,以求岌岌可危的生计有所保障,从而得以“平安度日”。到手的钱要点滴积累,而国王的税却强制乡村经济放血,用皮埃尔·古贝尔的话来说,迫使农民“吃尽苦头去筹集现金”⁵⁰¹。因此,预防灾荒的办法,就是把金币或银币妥为贮藏起来。一个“富裕的省份”1786年因洪水泛滥成灾,农民被迫“出空他们的私蓄,人们突然见到,于1706年铸造的金路易大量进入流通,而且锃光发亮:它们都来自地下的贮藏”⁵⁰²。农民的贵金属贮藏在19世纪有增无减。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正如一位有眼力的观察家1815年在谈到莫尔旺山区时所指出的,贫穷地区“贮藏的白银反而比大耕作地区多得多……现代经济学家尽管说的都是至理名言,但越是拥有白银最少的地方,却偏偏总是以留下贮藏的居多”。

可以肯定,平民百姓虽说胼手胝足,小本经营,但因人数众多,

他们在货币流通中占着最大的比重。专门研究新教徒银行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吕蒂认为,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是个没有银行的国家,货币经常出现贬值的国家,但也是贮藏财富的国家,国内的贵金属似乎被埋在地下”⁵⁰⁴。

当然,法国的全部积蓄并不都处于休眠和收藏的状态,杜尔哥在陈述他的导师万桑·德·古尔奈的一项主张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他说他担心富人不愿冒险经商,而宁肯安稳地放债,保证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可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吸引力或强或弱的利率对资本的运动可能起着决定的作用。法国早在16世纪推行的“年金”恰恰起着这个作用,年金是经公证人当面登记的一种永久性借贷,可作遗产继承。还有风险贷款,这是批发商之间为合伙装备某次出海的商船,因资金不足而向圈子以外的人借款的一种方式⁵⁰⁵。

此外另有海运保险,或者一般的短期贷款,由一位银行家或公证人牵线,委托他们选择信誉良好的借款人。圣马斯岛的一位原种植园主在回到家乡阿马尼亚克后从事烧酒生产,他于1820—1830年间就曾放过短期贷款(当时利率不高,仅为4%或5%)⁵⁰⁶。

可是,除开这些简单、公开的投资方式外,要追索闲散资金或所谓休眠资本可能的投资渠道,却并不始终是件容易的事。例如,贵族照例被认为依靠土地收益为生。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可能拥有积极资本,旧贵族在16世纪往往家道中落,有时甚至沦为贫民。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第二部分论及社会时再谈。这里先用三言两语把问题提出:在凡尔赛的俄国大使1785年11月向他的政府转告了两则“社会”新闻⁵⁰⁷,读者对此将作何感想?第一条新闻,菲利普—平等的父亲奥尔良公爵去世后,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一笔收益达480万里佛的遗产,“没有丝毫债务”;第二条新闻是奈克尔的女儿与斯塔尔男爵结婚。大使告诉我们说,日内瓦银行家支配着10

万里佛的年收入……比较这两个数字会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陈年的积累(主要是土地,再加上国王给予的恩赏和爵禄)竟远远超过一位金融家的资本;这笔资本何况又处于休眠状态,因为在奈克尔当政后,他的财产只有一半留在银行作投资。至于奥尔良公爵的财产,却肯定不是留着不派用场。几名心腹代他经营,由他们出面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如开凿运河,租让土地等等⁵⁰⁸。这是一个值得作深入考证的好题目。

对两合公司作整体的考证(公证文书篇幅浩繁,因而很难进行考证)也将是一个好题目。两合公司为18世纪的工业投资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其主要合伙人首先是巴黎的大商人、金融家和银行家,他们十分有钱,但人数不多。后来,到了18世纪中叶,贵族纷纷开发矿业(安赞煤矿等),在圣戈班兴办制造厂,在科讷发展炼铁炉,如此等等⁵⁰⁹。贵族转到了积极资本主义的营垒。

尽管如此,在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信贷仍然缺乏保证,工业投资往往无以为继。在这方面出现的大事,是银行于1850年在外省设立和发展分行,从而开始有效地吸纳储蓄。一位历史学家⁵¹⁰告诉我们说,这是加速资金流通的一项决定性措施,其意义之重要堪与开展铁路运输相比拟。谁又会不同意这一定论呢?现金的充裕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照科尔倍尔和康替龙的说法,财富等于金属。可是,我已多次说过,从经济方面看,法国却远不占首要地位。法国甚至也不免出现银根紧缺;据说,货币“匮乏”在全国各地经常发生。

我们首先要将这种反常现象归罪于休眠资本的大量存在。布阿吉尔贝尔的见解比重商主义者更加清醒,他指出:“当金钱不在持续的运动之中时,法兰西的躯体也就出了毛病。”⁵¹¹血液一旦不再流动,还会有什么用处!衡量运动的尺度不仅是死资本和活资本的比例关系,流动资金和不动资金的比例关系,而且是铸币总量和

纸币总量的比例关系；纸币被称为“冒充的铸币”，但它的流通速度却比铸币要快得多。然而，在欧洲各国中，法国是最后改铸币为纸币的国家之一。法国在1750年前的支付方式，大体上是铸币占93%，银行券占7%⁵¹²。到1856年前后，银行券的比例奇迹般地从7%上升到20%。就在同一时期，银行券在英国已占65%⁵¹³！可见，在我国，资本积累的历史首先是金属通货的历史。

金属货币：储备和流通

19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煞费苦心地向他们的读者进行解释，在我国，金属通货单独代表不了资产的总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这位海人不倦的教授，这位被后辈经济学家奉为庸俗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却认为有必要于1828年长篇大论地提醒我们注意：“尽管资本具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有人却偏要抱住旧习惯不放，坚持认为几块埃居就是一笔资本，并把一国拥有的埃居硬是当作该国的资本呢？”⁵¹⁴他随后又补充说：“法国的资本除金属货币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价值。”⁵¹⁵我们再说一遍，不能不认为萨伊的说法完全有理。但能否因此就贬低现金的作用呢？作为使用方便、结算快捷的资产，还由于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现金称得上是真正的希腊海神普洛透斯，它势必要扮演技压群芳的主角。此外，现金不正是理想的价值博物馆吗？马克思的概括完全恰当：对商人和批发商来说，就是从金钱出发，经由商品，再回到金钱。

可是，也许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日常所见的平凡现象更使人们的观察走样：天天看见相同的东西，也就熟视无睹。在让—巴蒂斯特·萨伊时代的法国，货币运动虽然尚未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但已形成正常的流通过程。因而，以往时期的观察家更容易对货币的力量、作用和特点感到惊讶，这是相当自然的。埃翁于1647

年不胜感慨地写道：“请想一想：假如一道命令下来，不准我们使用货币，迫使我们牵着公牛或母牛去商店换布，我们现在将陷于什么境地？当我们身无分文，却要走二、三百里路前往外地，那又该多么可怜？”⁵¹⁶这篇漂亮的文章正好告诉我们，货币才能避免物物交换，难道不是如此吗？

过了一个世纪以后，在 1770 年，杜尔哥也还没有使用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术语。他对物质资产（房屋、货物）和有价资本（金钱）作了明确的区分。但他强调指出，金钱（即货币）代表已积累的全部价值或资本，而金钱的流通卓有成效地推动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⁵¹⁷。杜尔哥比让-巴蒂斯特·萨伊更能满足历史学家的要求。皮埃尔·肖努说得对⁵¹⁸，在历史学家看来，货币归根到底是“交往最好的加速器”，我宁愿说它是流通的加速器，各种经济的加速器。货币也是现代国家针对其他各国的打击力量，甚至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⁵¹⁹。总之，是国家的支柱，“价值”的参数，“价值”一词对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个含义模糊、令人棘手的概念。一个名叫旺代尔·默伦的荷兰人于 1779 年说：“各种价值，甚至某些交易活动，都与普遍尺度（即白银）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与纸币或与只会导致纸币贬值的信贷无关。”⁵²⁰

响当当的金属货币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但它单独囊括不了全部经济活动。货币与经济互相促进，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既对经济生活有所约束，又为经济生活广开门路一事加以说明。积极的资本主义操纵货币，甚至尽力与这一不可或缺的工具相等同，这是个事实。积极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某些特性，富尔-苏雷神甫甚至声称，在杜尔哥的时代，有一种“真正的货币资本主义”的存在⁵²¹。

我们不要忘记，早在 16 世纪，货币总量已经相当庞大。

法国货币流通量于 1500 年可能为 3 000 万图尔里佛，于 1699

年可能达 8 000 万⁵²²。在 1661 年至 1683 年科尔倍尔当政时期,货币储备约达 2 亿。据一份报告估计,1706 年⁵²³的“银币”数额约达 2.5 亿里佛,再加上“银行券”5 000 万,其中的 1 200 万,政府准备予以兑付,合计数额共有 3 亿,但这 3 亿里佛大概只是真正流通着的货币总量的一部分,据让-巴蒂斯特·萨伊推测,“死货币”的数量与实际流通量大致持平;萨伊认为,法国的货币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50%用于流通,50%留作贮藏。拿破仑的财政大臣弗朗索瓦·莫利安(1758—1850 年)于 1810 年估计,“实际使用”的货币至多占货币储备的三分之二、鲍狄埃·德·拉埃斯特鲁瓦在批评沃邦的“什一税”计划时断言,法国于 1704 年流通的货币为 4.6 亿里佛(“藏在私人家里不用的”⁵²⁵不算在内),这个数字几乎等于 1706 年报告所估计的数字的一倍,我们能否就此认为,这个数字代表着货币储备总量,即活货币加死货币的总和?

许多年过后,在 1786 年,奈克尔估计法国的流通量为 22 亿图尔里佛⁵²⁶。就在同期,阿尔诺的估计是 19 亿。取个整数,就算是 20 亿。在 1809 年,欧洲的货币储备估计为 90 亿⁵²⁷,法国的流通量大概界于 40 至 50 亿之间,约占欧洲货币流通量的半数。无论如何,增长的数额很大。18 世纪的重商主义者恐怕会为此喜不自禁。重商学派的后辈之一古达尔于 1756 年断然声称:“依我之见,一个国家的通货越多,这个国家也就越是富有。”⁵²⁸

货币的充足确实不可否认,但富裕无疑却并不随之而来。我们已经看到,通货的匮乏,流通的故障,仍不断在出现。1691 年 2 月,由于新铸的货币没有及时运到,奥尔良竟然铸币绝迹,造成“贸易停止,情形令人难以置信”⁵²⁹。1639 年 11 月在图尔:“白银匮乏在该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昨天竟没有足够的银币用于雇佣工人,货币兑换商的门前空无一人,人们把这种匮乏归罪于为国王征收各项赋税的包税商,他们把全部收入用车辆运往巴黎,不在当地花费

一分一文”⁵³⁰。即使在巴黎,1715年5月13日,形势也十分紧张。财政总监德马雷收到一封惶恐不安的信件:“大人当已获悉因货币流通不畅而出现的混乱,尤其在巴黎,大部分批发商已不能如约偿债,尽管他们有此诚意,而且手头还有许多商业期票”。根据每年商情的偶然变化,总是这里通货充足,那里通货奇缺。在1838年,欧坦还没有大商业,城里住着一些家道殷实的地主;这里通货充斥,而邻近的第戎却闹钱荒⁵³¹。路程和运费在这种不协调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直到1848年为止,法国还存在一种国内汇兑,里佛或法郎在巴黎的兑换价与里昂等地不同⁵³²。

金属本身在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法国拥有的金属货币虽然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但数量毕竟也还不够。正如昂热·古达尔(1756年)所说,这不仅因为铸币有改制金银器皿的“缺点”,尤其还因为沉重的铸币不便于流通,20万块埃居重达1吨;用车从里昂运到巴黎至少要花10天时间⁵³³。结果是货币总量不论多大,所起的作用却很有限。王国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由自主地限制着流通的速度。

说到底,法国的货币运动极不全面:货币主要为上层经济服务,此话说来不算夸大。在18世纪初,庇卡底和阿图瓦都远不是穷省,“农民用现金缴纳封建杂税还很少见……金属货币不足,很少进入流通,并且也不是不可缺少,因为直接交换仍十分流行。实物纳税制可见是出自具体环境的需要……在1720年,苏瓦松财政区的谷物售价过低,以致地租一律用谷物缴纳,用现金缴租委实太难了”⁵³⁴。

到了18世纪,情况当然有所变化,货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但也远不能覆盖所有的交换场合。直到1789年以后,法国还有一些地区几乎不用货币。科西嘉确实是个异常的特例,这种情形几乎一直维持到1914年⁵³⁵。

货币流通的受益者主要是商人和国家。国家强制人们用现金纳税。由于纳税人往往用铜币支付，税款必须换成银币或金币。关税以及外贸利润的提成也源源不断在提供铸币。在科尔倍尔的时代，国家在可能高达2亿里佛的货币流通中，用这种方式提成的铸币约在8000万上下，接着通过各种支出把提取的这笔巨款重新投入流通，然后再征收税款，如此循环反复。可是，整个过程最终却并不导致货币在全国各地的良性循环；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在国家这一章里详加论述。国王的钱财几乎完全用于宫廷、军队和战争的开支，用于偿还债务。钱不再回到各省，不在地方经济中投资。

至于贫苦阶层，货币流通对他们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我们这里不得不改变我们的习惯判断。不，“美男子菲利普的货币骗局对百姓的家产和货物的价格都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在平民大众中，小百姓未受骗局的损害”⁵³⁶。同样，我们过去对坎康普瓦街的种种传闻和热闹表演寄予太多的关注，我们今天发现，约翰·劳的币制改革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在法国深层次的经济生活中掀起了风暴。

总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货币的历史是一种多层次的历史：上层发生的事不一定也在下层发生。

王公的货币

王公必须征服货币，正如他为扩张疆土而征服外省一样；他监督货币的铸造，确定货币的价值，控制货币的发行。国王没有货币，也就不成其为国王。

不过，货币像是渔人手中的滑泥鳅，随时可能溜走。必须紧追不舍，采取各种各样的保护和防卫措施；1295至1328年间，有关金币的敕令在法国就曾下过15份，有关银币的敕令27份；当时，金马克的价格波动率为75%⁵³⁷，银马克为100%。

另一件让人不放心的事,就是不管人们怎么做,本国的铸币总要外流,外国的铸币又总是合法地或非法地向国内渗透。这些外国货币中只有一部分是受到欢迎的。苏利于1601年⁵³⁸倡言禁止外国货币入境,“西班牙的货币〔金币和银币〕属于例外,如突然不准入境,会在大宗贸易中产生太大的空缺”。但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外国货币和本国货币的混合流通在欧洲各国是普遍的规律,作为世界的中心,尼德兰于1614年通行400种货币;在法国则有82种⁵³⁹,也许略为多些,因为1577年敕令谈到180种货币,“分属20多个主权国家”⁵⁴⁰。至少从1526年起,西班牙的货币已在普瓦图地区流通⁵⁴¹……而在1611年,据有人说,“庇卡底、香巴尼、勃艮第等地区外币充斥,数量超过法国货币”⁵⁴²。

至于外国,总是想方设法从法国挖走良币,塞进劣币,特别是至多薄薄地包一层白银的铜币。这些与“指券”无异的金属货币,这些“黑币”,价值自然低于面值,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脱手,对王公来说都是一本万利的事。针对劣币的入侵,明智的办法是予以制止。威尼斯在16世纪曾多次成功地抵制了劣币的入侵。葡萄牙亦然,但威尼斯和葡萄牙都十分重视发展大宗贸易的需要,它们的活动舞台也不如法兰西王国那么广阔。法国对劣币入侵几乎束手无策。“荷兰先令”⁵⁴³于17世纪末涌入法国北方诸省,洛林公国利用与法国接壤的边界走向十分复杂,把“洛林芬”走私运进法国;法国为此怒不可遏,厉声进行恫吓,走私者一被抓住,立即予以严惩,让他们为未遭逮捕的走私犯替罪。据莫利安说⁵⁴⁴,英国于1780年前后制造和运来我国的“法国辅币”低于法定的成色。只要有利可图,哪能顾上守什么规矩?

总之,货币在法国虽受王公的控制,但它也遇到其他货币的冲击,并且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平衡。“当黎塞留主教于1640和1641年整顿法国货币时,他主张与其让法国的铸币沿袭本国以往采用

的成色和价格,不如使它们与邻国的通用货币取齐。换句话说,他宁肯彻底改变王国至此实行的货币体制,而决不放过这次机会,把邻国通用货币的价格和成色引入法国。他决定不再制造四分之一埃居的铸币,改为发行我们今天〔指 1706 年〕所见的银埃居,其重量和成色与西班牙本洋相同⁵⁴⁵。西班牙皮斯托尔⁵⁴⁶当时是在各邻国广为通行的金币。为此法兰西王国不再发行原来的金埃居,改铸与西班牙皮斯托尔的价格和成色相同的金路易”⁵⁴⁷。同样,从 1661 年起开始铸造的英格兰“畿尼”也与皮斯托尔的价格和成色取齐⁵⁴⁸。

另一件事情也要注意:调节金币和银币的关系,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成色以及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官定的比价或商业的比价。人们长期以为金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比例关系,即 1 比 12;在重量相等的情况下,金价等于银价的 12 倍。这个比例其实是可变的,有时偏向黄金,有时偏向白银,因此,在某些时期,银价比金价更俏,而在别的时期,又是黄金炙手可热。例如,在 16 世纪 60 年代,白银把主导地位出让给黄金,早在 1558 年已预感到这一转折即将出现的热那亚人先行吃进黄金,为此获利颇丰。

但政府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借助金银比价来引导货币运动:路易十五的政府为稳定图尔里佛的行市,于 1726 年压低了金价(1 比 14.5),造成黄金朝荷兰、英国和热那亚外流,而进入法国的白银得以升值。卡洛纳于 1785 年再次调整了两种金属的比价;由于比率增加了一个整数点,等量黄金的价格一下变成为白银的 15.5 倍。结果是贬值后的白银因价格便宜而流向国外,黄金则为此涌入法国。一个国家总要选择一种货币本位,金本位或者银本位,虽然在当时,货币本位一词尚未问世。

货币的内部交换

我国的货币构成一个体系,它与近代欧洲实行的各种货币体系相类似。它包含着一些内部的运作规则。首先,它不属于复本位制(金和银),而属于金、银、铜三种金属的货币本位制。铜是制造金币和银币所必需的合金材料,用以增加金币和银币的硬度;更重要的是,铜还是制造辅币的主要原料。辅币有时也渗一点银,但银的含量很低,盖不住铜的本色,所有这些小铜板终究都会颜色发黑,成为所谓“黑币”,即供穷人使用的、纯信用性的货币,其法定价值被随意确定,与金属的价值无关。

其所以必须使用辅币,是因为穷苦大众工资菲薄,购买力低下。辅币供工匠和低收入者购买日用必需品。更何況,这些铜板只能“从手里转到嘴里”,因为工资仅能勉强糊口而已。铜板的流通要比作为商业交易基本工具的银币迅速得多,专供远程贸易使用的金币更不在话下。

这种货币体系的运行操作似乎并不费事,但还必须解决几个困难:

1. 图尔里佛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是一种记帐货币,因而也是虚构的、“想象的”货币。每图尔里佛值 20 苏,每苏值 12 德尼埃。可是,无论里佛、苏或德尼埃都不是可在你的掌心里掂量的、真实存在的金属崩子。它们被用来记帐,把不同的金属货币折合成同一个计算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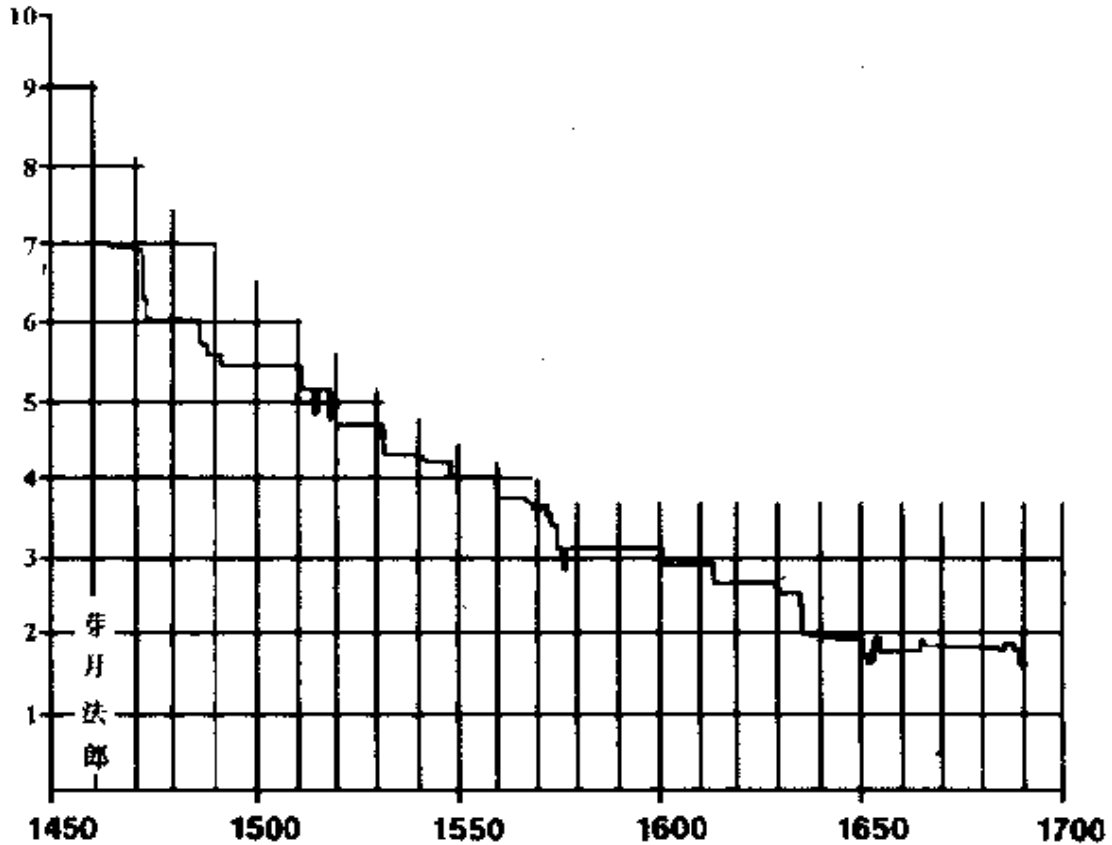
图尔里佛同时是历史的遗产和人为的选择,这份遗产由查理大帝帝国解体后产生的各国所继承。在查理大帝的时代,经过公元 781 年的改革后,作为记帐货币的里佛恰好等于一磅白银,下分 240 德尼埃,就是方便流通的货币。因此,里佛本身也是一种真正的货币,尽管没有化为实物。可是,在查理大帝后裔的治下,德尼埃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开始发生变化,重量不断减轻。里佛从此就不再是真正的货币。记帐和立约仍以里佛为单位,随着金属货币价值的变化,里佛折合德尼埃的数量也就大有出入。例如,在法国,每里佛于1290年折合260德尼埃,1295年合300德尼埃,1301年合400德尼埃。更加添乱的是,在加佩王朝建立前的法国境内,可以见到价值不同但又统称里佛的几种记帐货币:鲁西永、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多菲内、勃艮第、洛林等地区各有自己的里佛,再要加上巴黎里佛和图尔里佛。“1200至1300年,朗格多克地区使用的雷蒙德里佛(图卢兹伯爵发行)竟比图尔里佛价格要低6倍;在1207年,9雷蒙德里佛仅值30图尔苏”⁵⁴⁹。图尔里佛被选中充当国王的货币,当时的价值相当于巴黎里佛的五分之四⁵⁵⁰,需要消灭竞争的对手。巴黎里佛按理说应该占有优势,但终究在1667年被彻底取消了。图尔里佛之所以被选中,主要因为它使加佩王朝可能取得金雀花王朝的领地。在成为国王的货币后,它迅速确立了作为记帐货币的地位,尽管“外省的封建主拚命抱住他们的特权不放”⁵⁵¹。

综上所述,图尔里佛是一种价值尺度。真实的货币分别具有各自的价值,并按图尔里佛订出牌价,牌价当然是可变的。货币贬值在过去是件简单的事。只要抬高真实货币的面值,也就等于贬低了作为衡量尺度的里佛的价值。另一个办法是改铸新币,新币尽管成色低下,却保留旧币原有的面值。因此,帕斯基埃院长于1621年说,他一点也不喜欢听到这样的格言:“名声不好的人像用旧了的银币一样到处不受欢迎”;近百年来新币的成色却是每况愈下⁵⁵²。

如果里佛与某种具体的金币或与金币的换算率可以一次固定下来,里佛的地位也就得到了巩固。这正是1577年发生的事:在里昂商人的建议和敦促下,软弱的亨利三世政府决定,金埃居标准币的价格一次确定为3里佛或60苏,今后不再变更;里佛因此与黄

金挂钩,再次成为真正的货币。但决定刚刚实施即告破产,金埃居的牌价一再提高,不久就达到 63、64 甚至 70 里佛。⁵⁵³



图尔里佛的市价(以金银为基准的芽月法郎计算)

图尔里佛在两个半世纪期间丧失了四分之三的价值,贬值自 13 世纪以来从未停止过。

(参见弗朗克·斯普纳:《1493 至 1680 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法国的铸币制造》,1956 年版。)

2. 我曾说图尔里佛在旧体制下并不化为实物,这个定义下得过于仓促。它在两种情况下显得不很确切,虽说这两种情况不产生重大的后果。如果发行纸币,其面值也以里佛为记价凭证。这正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情形,但纸币迅速贬值,这种凭证的价值因而没有保障。里佛的另一种物化形式是辅币;辅币代表一定数量的苏或德

尼埃,体现里佛——记帐货币——的分数,而不体现苏——真正的金币或银币——的倍数。我已经说过,辅币只是信用货币,与纸币并无区别。

3. 由此可见,至少有三种办法能使图尔里佛贬值:

——抬高金币或银币的法定价值;

——改铸新币,减低成色,面值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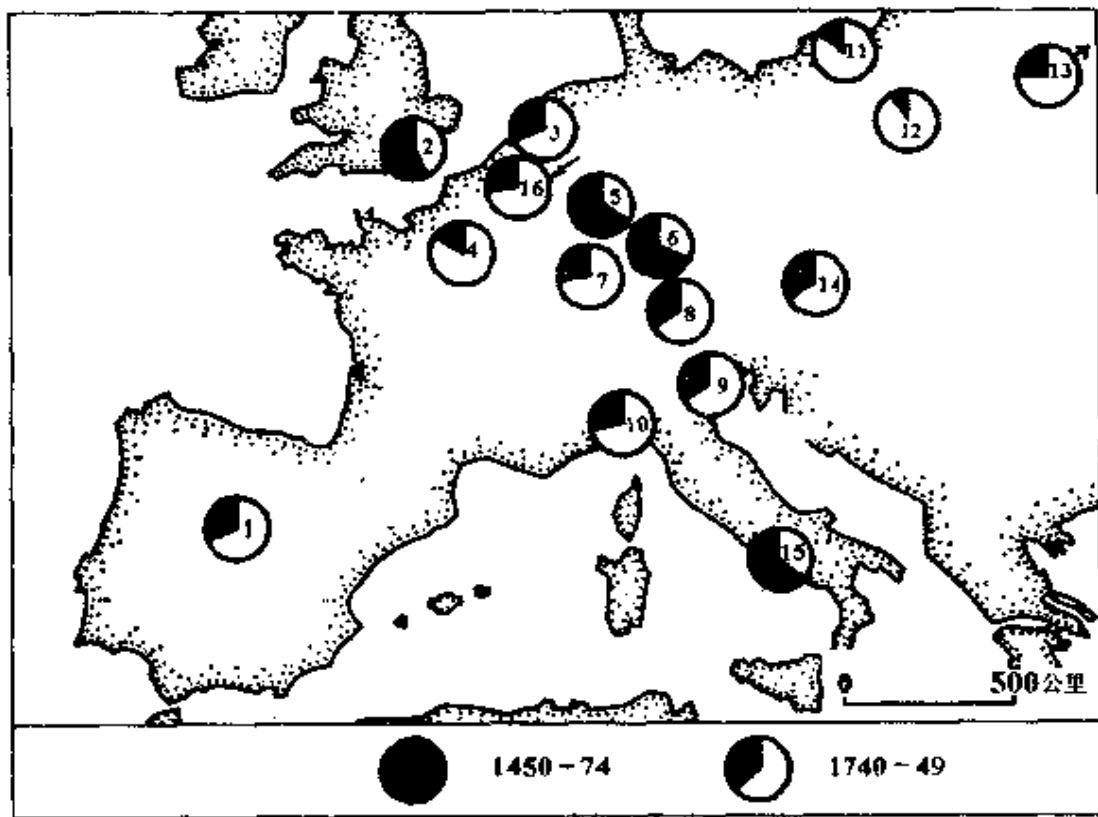
——降低辅币的官价,例如使一枚辅币的价值从3德尼埃削减到2德尼埃(1668年)。

图尔里佛不断在继续贬值。第345页弗兰克·斯普纳的图表把贬值的结果摆在我们的面前,图表仅记录了1450年后的情形,如果把图尔里佛1258年的价值定作100,它的价值指数在1360年仅为53,1465年为36,1561年为11。通货膨胀从没有停止过。

里佛的价值只是在1726年才稳定下来,当时的里佛又与白银重新挂钩(每马克白银等于54里佛)。卡洛纳于1785年调整金银的比价(从1比14.5⁵⁵⁴改为1比15.5),巩固了以上的改革成果。经过大革命时期的货币风暴后,1803年4月7日创设的芽月法郎取代了旧制度留下的这些价值尺度。币值终于恢复稳定,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928年6月25日法决定改行庞加莱法郎,又名“四苏法郎”,因其价值为芽月法郎的五分之一。但这次变化又使法郎与黄金相联系,而与白银脱钩,法国从此便确立了金本位的单一货币体系。

大家都知道,实行金本位是为挽救法郎的稳定作出的最后一次尝试。但过后不久,通货又我行我素地膨胀起来,在1945年后,更如脱缰之马,不受任何约束。

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近50年来我国发生的这种通货膨胀与法国以往几个世纪期间的通货膨胀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回过头来再谈昔日的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在欧洲各地是普遍现象

(参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967年版)。

1. 新卡斯蒂利亚；2. 英格兰；3. 荷兰；4. 法国；5. 法兰克福；6. 维尔茨堡；7. 阿尔萨斯；8. 奥格斯堡；9. 威尼斯；10. 热那亚；11. 但泽；12. 波兰；13. 莫斯科；14. 奥地利；15. 那不勒斯；16. 哈布斯堡王朝的尼德兰。

为了弄明白两种通货膨胀之间的区别，必须简要地先下几个必要的定义。我在上文使用了“货币运动”一词，它其实也包括着扩展货币经济的一般含义。说得更清楚一点，货币运动其实是要扩大货币为贸易活动的服务：

——无论实行金本位制、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例如在1726年、1785年或1803年），货币都为贸易活动提供一个尽可能固定的参数和尺度；

——使所谓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成为可能；

——为贸易活动充当价值储备；

——使信贷体制得以建立，信贷大体上可被认为是货币的助手。

然而，旧货币制度程度不同地满足以上四方面的要求。

它使包括汇票和证券在内的信贷业务得以展开：汇票长期必须用黄金支付；里昂交易会的“马克埃居”与当今的美元一样到处通行⁵⁵⁵。

旧货币制度自动提供保值服务，即储蓄，因为在交换和支付的洪流中，货币不断在人们之间转手。如果我抓到了货币，并把它关进我的保险箱，在我重新取出的那天，作为贵金属的货币并不会改变价值。今天，为保证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人们买进金拿破仑等旧金币或者金条，但这些已属于商品；此外还有土地、房产、宝石、画作、艺术品等等。所有这些保护手段在 1789 年前也业已存在，且不说以金银器皿形式出现的贵金属。昂热·古达尔说：“在目前（1756 年）的法国，金银手饰和盘盏的价值当在 30 亿以上”⁵⁵⁶。我不能保证这个数字完全可靠，但以这种方式积聚财富的事实却是肯定无疑的。我国早期的统计学家之一迪潘男爵根据 1818 至 1829 年的官方记录明确指出：“人们可以相信，法国家庭每年增添的金银手饰和盘盏约达 2 000 万法郎”。但重要的是，无论在 1914 年前或在 1789 年前，法国的货币体制都具有自动的保值功能，它向愿意储蓄的人直接提供金币和银币，不必进行转换。当然，自从法兰西银行切实有效的政策使法国人对纸币的价值变得放心以后，袜筒里就会既装铸币又装纸币。但铸币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期间内发挥了它们的作用。佩里戈尔历史学会⁵⁵⁸在一份报告中称：“在 1420 年的利摩日，6 个世纪以前制造的铸币，即于公元 817 年制造的印有宽厚者路易头像的铸币，仍然比比皆是。人们同时还可见到以查理大帝、厄德、阿基坦的丕平的名义发行的其他铸币，这些金属货币的铸造时间约在公元 752 年和 890 年之间。人们知道，

在这些国王死后很长时间，印着他们头像的铸币仍在继续制造；尽管如此，以上的事实毕竟令人感到好奇。”另有一些细小的事实也值得注意，但它们不如前面的事实那么突出，但丝毫不容人们忽视：“在1892年，下诺曼底的农民在交易会出售牲畜时只用‘皮斯托尔’或‘皮斯托尔半开’定价〔以上两种金币在路易十四时代流通〕；布列塔尼的农民则往往用里亚尔开价，这是西班牙贸易留下的残余。”⁵⁵⁹

新旧金属货币都为交换进行了周到的服务。虽说份量很重，运输不便，它们仍在法国和欧洲各地混杂流通。每次面对一笔帐款，我们都不免感到惊讶。贝纳尔堡（位于今日的萨尔特省）盐仓的税官于1670年把7173里佛2苏的一笔税款用车辆运送拉瓦勒。为了凑成这个数目，他不得不把86枚每枚价值12里佛的金路易，86枚每枚价值110苏的金路易，12枚每枚价值4里佛5苏10德尼埃的西班牙皮斯托尔，8枚每枚价值5里佛13苏9德尼埃的金埃居，再加上价值1000里佛的若干银路易和价值450里佛的“十二开金洋”……装进一个口袋⁵⁶⁰。人们由此不难明白记帐货币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也可以理解塞巴斯蒂埃—迈尔西埃于1788年何以对在维维阿讷街所见的景象如此沮丧。每月10日和20日，在这条商业街上交付现金的数量之多，竟使大批收帐员被他们的银箱压得弯腰曲背。今天的人见此情景，会说这是拦路抢劫的极好机会！铸币显然难以搬动，但商人和批发商可通过纸币和汇票，利用交易会或储蓄银行神奇的冲帐手段，避免部分困难⁵⁶¹。

总之，不论保值与否，旧货币体制直到1914年为止始终在法国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它之所以得以持久存在，仅仅因为它能适应我国经济的要求，符合我国经济的节拍。为此，我先验地断定，甚至在1726年稳定币制以前，货币制度并没有带来灾害。

可是，尽管采取了各种谨慎措施，旧货币体制仍然制造并局部

保持了长时期的通货膨胀。我们对此又该作何解释？能否认为通货膨胀以及图尔里佛的不断贬值是万恶之源？或者是否应该认为，通货膨胀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现象？只要查阅第 347 页的地图，你就会发现通货膨胀是欧洲的普遍现象；例外在这里恰好证实规律：货币只是依靠本国经济的活力才得以稳定币值。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都属于这种情况，伦敦在这方面更是突出的事例。1726 年后我国币值的稳定是 18 世纪法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成果，正如 1929 年芽月法郎的取消反映着法国为取得大战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致使战后经济复苏乏力。此外，即使“光荣的三十年”也未能使法国恢复金本位制。通货膨胀其实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一种多少经过思索的选择。R. 赛迪约说得好：“自从高卢演变成法兰西以后，货币往往被用于军费开支，但一个国家要形成，也就难免花钱打仗。”⁵⁶²

货币还能派许多其他的用场，掌管许多其他的事务。人们对安都纳·巴纳夫(1761—1793 年)的高瞻远瞩也许作了过高的评价。不过，吉伦特派的这位著名人物确实是看得很远。他认为政治制度的要害在于如何使用本国的财富。而财富的作用方式又与该国的地理位置——“内陆”国家或“海洋”国家——产生的各种后果有着紧密的联系。特雷昂·斯托瓦诺维奇指出，大革命初期，由于法国基本上以农立国，法国的货币仍与土地相结合，因而流通缓慢，障碍层出不穷，漩涡、沼泽和坑洼随时可见；难道他说得不对吗？英国的货币则不然，它与贸易，与“海上霸权”相联系，因而机动、灵活，能够加快流通速度，并促使经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比法国更远，甚至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⁵⁶³。

因为，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未来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对法国和英国作个比较。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治下，英国还远不是称霸欧洲的强国，为什么它却能稳定英镑的币值？可能回答

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释，无疑是货币在英国比在法国使用更早，流通范围更广。费尔斯勃朗和霍普金斯认为，在16世纪上半叶，领取货币工资（不再是实物工资）的人已占英国居民的三分之一⁵⁶⁴。在法国，尽管16世纪巴黎的小民以及图卢兹四郊的靛蓝生产者领取货币报酬⁵⁶⁵，但我觉得工资制在我国不如英国那么广为发展。英国为什么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英国最初不是被迫为改变经年积弱的状况而奋斗吗？保尔·亚当强调指出，英国与法国的争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强制流通，建立旨在实行大生产的工业，所有这些考验都势必加快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保尔·亚当说得不错，可是，英国国土逼仄，因而比我国更早为建立真正的民族经济而增加国内的经济联系。

纵向兑换

货币体系既然就如上述所说，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投其所好，顺便从中取利？当然，资本主义的前途有赖于纸币的使用、扩散和统治，虽说纸币是货币的象征符号。尽管资本主义是个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和适应性的过程，但它却并不像熔化的蜡液一样在任何模具中浇注。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同时把金属货币和纸币掌握在手。

一枚铸币的真实购买力和商品价值不一定与其法定价值相吻合。你用一枚银埃居在场所购得的东西总比等价铜币所购得的更多些；铜币的面值不等于真实价值，它在朝夕之间可能丧失其部分的法定价值。我们已经说过，这正是里佛贬值的动因之一。达让松男爵于1738年8月说：“二苏铜币今天早晨突然跌价，跌幅达2里亚尔（每苏等于4里亚尔），占面值的四分之一，贬值严重。”⁵⁶⁶用胡塞·让蒂·达西尔瓦的说法，铸币之间确实始终存在着一种“纵向兑换”，这个用语虽然容易产生词意不清，但仍不失为一个恰当

的说法,它表明硬通货与软通货之间有着一种可变的交换关系,变化而且始终有利于硬通货⁵⁶⁷。

对商人、富人甚至对国家来说⁵⁶⁸,聪明的办法通常是把自己从租户、佃户、小纳税人那里收进的“黑币”首先用于偿债,或者简单地按老规矩办事,强制债权人同意用铜币偿还部分债款。这项旧例于1780年被奈克尔所废止,但在大革命期间得以恢复,1803年以设置芽月法郎为内容的币制改革仍规定债款的四十分之一用“黑币”支付。出任败政大臣的莫利安于1810年彻底废除这种做法时解释说,如果在100法郎的应付款中,人们收到“98法郎的银币和2法郎的黑币,而后者的实际价值不到1法郎”⁵⁶⁹,人们因此一项便损失1%;人们也就不难懂得,为什么“精明的人挑选良币,而让劣币留在百姓手里”⁵⁷⁰。里昂银行家在16世纪推行的政策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力图实行“对金埃居的垄断”。一些经纪人为他们在里昂四出奔走,甚至去客店纠缠旅客,征集金埃居⁵⁷¹。一名佃户为推迟偿还借款,于1645年写信向债权人致歉;他手头仅剩一些德尼埃,“担心不宜用于偿付”,他答应过几天从圣贝尔托缪交易会回来后,“将有上好的白银给您送去”⁵⁷²,这位债权人后来收到的果真是上好的银币。

黑币就这样被不断抛向下层经济,并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无比迅速地进行流通,而受富人青睐的良币则滞留原地,它们的命运是装进保险箱里,过几星期、几月或几年以后,再派正当的用场。

良币向经济高层的上升从来是一种持久的运动。让蒂·达西尔瓦认为,这种剥夺方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源,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外国都莫不如此⁵⁷³。

此外还有黄金和白银的兑换,这个问题更加微妙。对消息极其灵通的大商人来说,通用什么货币似乎并不重要。他们甚至对1726年稳定里佛币值的措施也并不看得很重。就个人而言,他们

超脱了这方面的困难。他们明白，顺手抓住良币，毕竟是件相当容易办到的事。加斯贡在谈到里昂银行家收集金埃居一事时，已向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专攻马赛史的历史学家卡里埃尔曾站在17世纪马赛批发商的立场上，向我们不止一次地陈述了收购皮阿斯特银币对发展东地中海贸易的好处。圣马洛商人在18世纪初从事美洲白银的投机。从1720年到1750年，圣马洛大商人马贡家族又盯住了中国的黄金：用白银在中国换取黄金，稳能谋得暴利，因为中国银价极高。在18世纪末，于1794年终将被送上断头台的宫廷银行家让-约瑟夫·德·拉博特则像许多其他银行家一样，炒买炒卖西班牙白银和来自巴西的葡萄牙黄金。

这些都属于初级的兑换活动，对此我可以表示同意，但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要有一定的地位和实力，就是说，要置身于经济的高层。胡塞·让蒂·达西尔瓦的解释仍然至关重要。“纵向兑换”只是吸收储蓄的形式之一，但缺少这种由剩余劳动积储起来的资金，资本主义将不能存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期间，通过向公众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银行的活动说到底难道不正是上下之间的一种纵向兑换吗？公司的董事会可任意支配公众投入的资金。乔治·杜歇纳于1869年揭示了这一事实真相；接着，利捷斯于1911和1912年又大肆谴责银行劫掠公众小笔储蓄的罪恶行径⁵⁷⁴。纵向兑换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却始终相同。

纸币慢慢才露头

纸币的出现并不改变一切，既不使形势恶化，又不使局面急转直下。纸币其实由来已久。作为铸币的替身或代用物，它经历一个缓慢的，但又是十分简单的发展过程：书写几行文字，再加一两个签名，事情就能办成。不懂个中奥妙的人不可胜数，他们把货币视为荒诞不经的鬼蜮伎俩。在其他人的眼里，纸币则是一个诀窍，一

项奇迹，一种简捷便易的手段。可以肯定，它是正在形成或业已形成的现代经济的体现，并且仅次于交换的最高一层。但这一现代化进程在平凡的生活中进展并不顺利；只有商人和细心的观察家才有所察觉。例如《摄政报》的主笔³⁷⁵，出身低微的让·比瓦密切注视着约翰·劳制度的曲折发展，这里面确实大有东西好学！他于1720年4月指出：“人们一般所说的信用，是指一个人或几个人作出的书面或口头承诺，这种承诺可充当货币使用……例如，世界上的大宗贸易每天都仅仅使用纸币进行。商人并不专门派人派船携带金属货币前往他们拥有信贷的地点。他们单凭纸券不仅能够借到他们所需的款项，而且还可以用船运走王国所需的各种食品……因此，人们想在法国使用纸币〔即后来实行的约翰·劳制度〕，不过是用公共信用确认银行家个人每天通过私人信用所作出的承诺。”这番话说来倒也言之成理。

不过，记名期票、公司股票、城市债券并不把大量纸券抛向市场。国家更加放手地参与其事。国家很早就发行了财政证券：早在1522年，巴黎市政厅发行的年金债券保证按期付息，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息票。这些财政证券是否如我们所想，可被视为真正的货币呢？伊萨克·品托³⁷⁶于1771年赞同这一见解，但他有点犹豫，拐弯抹角地作了以下的说明：“财政证券尽管在某些方面与货币十分相似，但它并不完全等于是货币，发行财政证券能使通货增加。证券成为像土地和房屋一样的资产，其优点是不必进行耕耘和维修；最大的好处是它能促进货币的流通，而且纸券的流通比金属货币更快，正因为如此，人们可在一定意义上和部分地把它当作金钱，它并且还往往行使现金的职能。在伦敦市场上，人们在24小时内就能把10万英镑的年金换成现钱。”

但这种兑换只有通过交易所的途径方可进行，而巴黎交易所于1724年枫丹白露敕令发布前尚未真正存在。在这以前，市政厅

的年金债券“不但不能进入商业交换”，却要经过艰苦而缓慢的讨价还价，最后在公证人面前立据转让，建立公证文书自然不是免费的。然而，在路易十六即位后，交易所活动有所发展，投机渐趋盛行，像在阿姆斯特丹或在伦敦一样，做多头和做空头的证券投机变得十分活跃，成交额已不在小数。政府和不止一名观察家对此深感忧虑。在 1789 年，《巴黎日报》和《公报》每天都辟专栏刊登交易所的证券牌价：印度公司的股票，王国公债券，贴现银行的债券，巴黎市政厅的债券等等。在大革命初期，形形色色的债券价值 80 亿里佛，为数十分可观，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等于金属货币流通总量的四倍⁵⁷⁷。

在这笔债券中，国王的债券竟高达 30 亿，从而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可是，经济史对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局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根据目前的规律，国债只要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仍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国王的债务既然只在 30 亿上下，他理应能够找到脱身之路。不过，当今的规律是否对过去适用？人们对卡洛纳大张挞伐，说他把法兰西航船引入歧途，而卡洛纳此人才智横溢，是位敢做敢为的经济学家，有人甚至称他像是现代的凯恩斯。但在当时，他怎么可能准确地把握航船的方向呢？

纸币的历史首先是银行券的历史，银行券只是由建立于 1800 年的法兰西银行印行时，才得此名称。在 1800 年正式得名前，银行券仅是一张“纸券”而已，并且长期被排斥在日常的交换之外。它是一种典型的应急手段，而且是政府在财政窘迫时采用的一种拙劣的权宜之计。路易十四政府于 1701 年后被迫出此下策：发行的纸券以惊人的速度贬值；它们成为不值一文的废纸，进入商人的钱袋（使商人不知如何处理为好），或者落在王国的高利贷者和投机者的手里。巴黎警察总监达让松男爵的书信揭示了许多欺诈和欺骗行径，证明纸券的普通持有人竟是何等的天真和无可奈何。他们委

托中间人把纸券换取白银，兑换率再低也在所不惜，而中间人却干脆把还款的事置诸脑后。这在巴黎是如此，在里昂也同样如此。法国大规模发行纸币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取得好结果。顺便请看大约写于 1706 年的一份回忆录，读来倒也不乏兴趣：“必须像培育娇弱的植物那样，在法国扶持纸券”。

下一次尝试，约翰·劳的尝试，是在普遍改革税制及其征收措施的范围内展开的，最初还能平稳和有效地进行。后来，机器超速运转，出现卡壳，终于闹成一场不可收拾的灾祸。路易十四的债务居然化为乌有，人们几乎将为此拍手叫好。但约翰·劳的纸币留下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回忆，它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始终笼罩在银行制度之上。下面的一首打油诗反映着人们的愤懑心情：

一埃居就是一埃居，
一张银行券就是一张银行券；
埃居是一枚金币，
银行券是张擦屁股纸⁵⁷⁹。

听说有一句谚语，说法国人遇事总爱发牢骚，怪话说过，也就不再唠叨；我以为这句谚语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1718—1720 年通货膨胀的电击”⁵⁸⁰对法国银行事业的落后起了持久的作用。“贴现金库”于 1775 年悄然成立，避免使用“银行”一词，它所发行的大面值纸券专供大宗贸易和投机使用，而与一般百姓没有多少牵连。人们能否设想，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指券”和“国土票”将比约翰·劳制度的命运略为好些？指券于 1790 年经制宪议会同意发行时，在议会内部已遇到激烈的反对，几个月后，当议会决定实行强制流通时，指券在其持有人手中已成为真正的银行券。人们在集市或交易会上很快只能用金属货币购买谷物或牲畜。指券的价值一落千丈。共和四年雪月十五日，43 至 44 里佛的铸币在尚贝里可换 1 万里佛的指券。一位老人在 1838 年回忆起 1797 年的情形：“一

笔3万里佛的收益刚够买一双靴子。”⁵⁸¹这与德国魏玛政府1923年的窘况几乎同出一辙，只是有程度的差异而已。

如前所说，银行券真正进入法国的生活要等到法兰西银行成立以后；法兰西银行于1800年取得铸权，可在巴黎地区发行银行券，为期15年。地方银行在外省也发行银行券，仅在发行银行所属的省区流通。可是，由于巴黎的银行券可被外省接受，而各省的银行券在巴黎却不能通行，于是便根据出入首都的款项多少，在两种银行券之间确定兑换率。实际上，法兰西银行的基本业务就是进行贴现。每次贴现都把银行券投入到商业流通中去，银行券随时可兑换现金。但银行仅仅发行面值500法郎以上的大票，银行券因而几乎完全只为大商业服务，这项谨慎措施显然可保万无一失⁵⁸²。

1820至1895年间银行券和金属货币在货币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货币总量				
	合计	铸币	纸币	储蓄	合计
	(10亿法郎) K	(%) L	(%) M	(%) N	(%) O
1820—1824	2.30	80.1	8.5	11.4	100.0
1825—1829	2.56	80.6	7.9	11.5	100.0
1830—1834	2.86	81.0	8.1	10.9	100.0
1835—1839	3.27	81.4	7.6	11.0	100.0
1840—1844	3.49	80.7	8.6	10.7	100.0
1845—1849	3.83	79.7	9.8	10.5	100.0
1850—1854	4.58	77.2	12.6	10.2	100.0
1855—1859	5.49	77.6	12.4	10.0	100.0
1860—1864	6.24	76.2	12.3	11.5	100.0
1865—1869	7.23	70.8	14.8	14.4	100.0
1870—1874	7.30	53.0	32.6	14.4	100.0
1875—1879	8.02	53.1	28.8	18.1	100.0
1880—1884	9.02	52.7	29.0	18.3	100.0
1885—1889	9.24	49.1	28.7	22.2	100.0
1890—1894	9.48	41.2	32.1	26.7	100.0

(参见费·布罗代尔和厄·拉布鲁斯：《法国经济和社会史》第三卷，第1集，197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必须等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以上的格局才开始被打破，这是银行的行长、副行长和经理们所意料不到的。地

方银行当时被并入法兰西银行,后者的业务从此扩展到全国各地。面值为 50 法郎的银行券使法兰西银行向小商人靠拢,尽管一般百姓仍然顾虑重重。1848 至 1852 年间推行的银行券法定价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抵制,有利于银行券的进一步推广。

参看以上的图表,人们仍会发现,银行券的进展相当缓慢。信贷活动主要由地方的放款人,特别是由公证人零敲碎打地在进行。只是从 1860 年开始,当银行的分支机构开办并扩大储蓄业务时,信贷才得以加速发展。尽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⁶⁸³,金属货币在货币流通中仍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法兰西银行对它经营的银行券已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自如,银行券也已成为信贷和交换的日常工具。无论如何,正是银行券逐渐排斥了汇票。我们现在就要费点篇幅,再谈汇票的问题。

汇票的作用

前面的叙述为我们扫清了道路。我想说的是,在图尔里佛、银行券等主角登台表演以后,现在该轮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主角上场了;汇票出现较早,牵涉许多问题,便于我们阐明 12 至 19 世纪欧洲经济的全部历史。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提出的问题几乎在成倍增加。一个问题才刚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真可谓层出不穷。人们原本以为,在安德烈·赛约、雷蒙·德·罗佛尔和朱利奥·曼迪什以后,有关汇票的话该说的都已经说完。可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又写了一部新著,目前尚未出版,题名为《私有货币与君主政权》;该书提出了几个问题,作出了几个出色的回答,同时又让人在读完书后觉得,还有其他的问题自动出现,因为论述的时间只到 16 世纪为止。

汇票是“一张飞行票证”,与现今的钞票差不多大小。翻开诸如经商入门之类的教科书,你当可得知汇票的书写格式,这种千篇一

律的格式几百年来从不变化，等因奉此这类套话无不是原文照抄。今天见到一张汇票，就可想象出成千上万张其他汇票，我们在档案馆里保存的汇票数以万计。

签发一张汇票实际上是把一笔款项从一个商埠寄往另一商埠或交易会所在地，用另一种货币兑付；从里昂发往坎波城的汇票用里昂的汇兑货币马克埃居汇出，再按坎波城的汇率折换成当地的记帐货币马拉维迪；如果汇票发往安特卫普，抵达后将按格鲁斯里佛计算……不难理解，汇票活动至少应有四人参加。这四个人在商业行话中都有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名称。但这些名称并不重要。值得研究的倒是汇兑的操作以及必须有四人参与其事。我且试举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在 1945 年，从法国向意大利汇款相当困难，虽然并非绝无可能。当时巴黎就有一个人人们颇为熟悉的代办机构，你把一笔法郎交给它，它在威尼斯、热那亚或罗马的同行就把等价的里拉付给你所指定的人。在这个例子中，我已经涉及到两名中间人，一人在巴黎，另一人在威尼斯，他们之间必定互相完全信任。再加上用法郎汇款的那个法国人。他换得一纸收据，寄往威尼斯，由他所选定的人支取等价的里拉，手续费应予扣除。汇兑可见就有四个人经手。如果我前往威尼斯旅行，在威尼斯领取自己在巴黎汇出的款项，我就身兼二任，可被算作两人，到头来还是四个人。

在上面这个不值一文的例子里，其实可以看出两位同行之间有一条结算的渠道，而在两端的顾客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渠道。最后，在巴黎取得的收据，匆促拟就的票证，不论属“飞行票证”与否，都是神圣的汇票的变相等价物。

我们现在再作几项补充说明：

1. 在 1945 年巴黎往威尼斯汇款的以上例子里，显然也可以从威尼斯朝巴黎的方向汇钱；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寄出汇票

称作“发汇”，而从外地返回的汇票又名“收汇”。这正是让·特朗尚在其《算术原理》一书中所持的见解，他说，汇兑就是“在一个城市取款，然后在另一个城市偿还，或者相反在一地付款，再在另一地收回”⁵⁸⁴。

2. 有着贸易往来的商埠或交易会城市往往不在同一个国家，不属同一个货币体系。可是，也有一些名不符实的“汇票”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流通，例如里昂自16世纪起向巴黎、鲁昂、图尔、南特、波尔多、拉罗歇尔、马赛等地签发的汇票。在两种情况下，寄发地和接收地之间的地点差异结果造成了交换价值的不同。汇票按汇款比例收费，我们可称之为利息，但百分比随行就市，经常有所变化。汇款存在着不可靠的因素，即所谓“风险”，正因为如此，把有息借贷视为高利贷而予以禁止的教会却接受汇票，并为汇票洗刷高利贷的罪恶。这一让步无疑为资本主义开放了门户，但教会的收益分散在欧洲各地，它也遇到与商人同样的问题。顺便指出，教会准许使用汇票有一个前提，即确实有一笔款项从一地转往另一地。

3. 至于汇票的四位当事人，他们必定是银行家、批发商以及货物或钱币交易商。汇票并不是会写字的随便什么人都能签发的。只有少数专家才懂这门技术。孔狄亚克说，“在各大商业城市，对一名商人最好的恭维是称他熟悉汇兑业务”⁵⁸⁵。“熟悉”这项业务的困难显然在于藏在汇票背后的币值变化。单是签发汇票自然十分简单。除填写必备项目（地点、人名以及用所需货币写明汇款数额）外，只要照搬等因奉此这套千篇一律的程式就够了。当然，汇票必须自己亲笔书写，作为额外的谨慎措施，你的字体和笔迹早已交到了汇兑受理人的手里。

4. 汇票逐渐改变了性质，扩大了职能。从16世纪开始，商人试图把汇票当作一种有价证券使用，但背书的方式尚需很长时间才得以推广。相反，很早以前，发往一个商埠的汇票，在事先取得同

意的条件下,去一个或几个别的商埠转过一圈后,可能又重新回到原主那里,这种所谓“连锁契约”,被宗教当局视为违背规则而禁止使用。连锁契约于16世纪已在意大利实行,但在里昂也并非完全见不到,当地人称之为“反签”或“转汇”。朱利奥·曼迪什曾指出有一张汇票就这样被寄来寄去,历时达6年之久!我个人也曾发现菲利普二世于1590年向富格尔家族签发的一张汇票,其清帐日期竟一直拖到1596年。在两种情况下,汇兑都是有息借贷的一种形式,只是人们不直呼其名而已。反签汇票有时甚至可以作弊或至少制造假象,即我们法国人所说的搞“空头汇票”。不论它纯属投机或者充当信贷工具,反签汇票需要在判明真伪、选定路线等方面拥有专门的技巧,内行自然比外行占更多的便宜。原在佩勒戈银行当职员的雅克·拉斐特于1808年老板去世后接任其职,他声称对前任一无所知的这些业务十分熟悉⁵⁸⁶。

还要指出的最后一次变化,无疑是1884年6月7日法⁵⁸⁷的实施,准许“在付汇商埠签发汇票,借以确认现实状况”;当时,与银行券相比,特别是与支票相比(支票自1865年起已从英国引入法国),汇票几乎已丧失其重要地位。在以上法律实施后,关于汇兑收发地必须不在同一城市的规定已经取消。

汇票是否促进了欧洲内部的联系

汇票“自身的”历史曾是历史学家的中心研究课题之一。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却是汇票的外在关系,即汇票对资本主义的成长以及对早期欧洲经济的成长所起的作用。

为了从内部转到外部,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先举一个例子。我这次走出六边形的国土,介绍卡斯蒂利亚的一位商人,关于他的经历,我从头到尾都熟悉。西蒙·吕兹是坎波城的一名商人,他的所有信件至今得以保存。他一生曾做过各种生意,到1590年后,时近

晚年,便在坎波城和佛罗伦萨之间专门从事汇票投机。正是利用这些汇票往来(从坎波到佛罗伦萨为“发汇”,反之为“收汇”),他使自己的资本增值。汇兑可见已不再像最初的时候那样,仅是资金的简单转移。

西蒙·吕兹刚向坎波城的一位羊毛商人买进一张在佛罗伦萨兑现的汇票,这位羊毛商因此得以动用他的羊毛货款;羊毛货包通常装船从阿利坎特经里窝那运抵佛罗伦萨,但出售后应得的货款却不能立即收到,而要拖欠很长时间,除运输时间外,一张佛罗伦萨的汇票需等3个月才能兑现。羊毛商把汇票卖给西蒙·吕兹,就能提前支取应得的货款,这位商人信誉卓著,又是他的同乡,因而绝对可以信任。巴塔扎尔·苏亚雷兹收到汇票并领取汇款后,又在当地买进另一张汇票,由西蒙·吕兹在坎波城兑现取款。在寄出汇票过后6个月,西蒙·吕兹就可收回本金,另加通常为5%的利润。这项活动每年进行两次,收益可达10%⁵⁸⁸。

既然资金转移不收佣金和息金,汇兑的利润又从何而来?根据不同的时间,随着汇票本身的变化,汇兑利润有几个不同的来源。

《私有货币与君主政权》一书的作者们指出,直到16世纪为止,汇票使用者仅能谋得微薄的利润,但这是不谋自得的利润。他们为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为什么凡用外国货币(“不定值”)为本国记帐货币(“定值”)标价的商埠——例如在里昂,公布马克埃居兑换热那亚埃居的牌价——,它们提供的汇率总是高于用不定值的外国货币折算本国货币的商埠(例如在热那亚,用马克埃居折算热那亚埃居,但其汇率与里昂的汇率不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有关的解释几乎占全书的一半篇幅,涉及到每个国家中真实货币的市价体系及其法定价值和固有价值关系。读者自可参阅原书。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自动获利的机制建立在欧洲各商埠以一个交易会城市为中心的等级化组织的基础之上,交易会的

中心城市(首先是里昂交易会,接着是贝桑松交易会)起着乐队指挥的作用。每个欧洲商埠分别扮演各自的角色,在交易会的中心城市公布定值货币或不定值货币的牌价后,有利可图的汇兑路线就自动形成。结果,不论当时的经济形势如何,16世纪的“汇兑商就能在两地的一次往返中稳得转换收益”,虽说数额极其有限。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里昂与热那亚之间一次交易的获利率为1.8%,一年四次即等于7.3%⁵⁸⁹。

汇兑机制的得以运行,无非因为汇票在当时——而且长期以来——是少数人的禁脔,为少数人所垄断。享有特权的意大利银行家“集团”,“组成一个几乎覆盖信奉基督教的整个拉丁欧洲的联系网”,他们对需要使用汇兑的商人或君主政权,都独立开展业务。在1577年货币改革后,这个体系迅速土崩瓦解。但在几十年间,易地汇兑以及让蒂·达西尔瓦所说的纵向汇兑却曾是发财致富的可靠手段。

此外还要加上汇兑的其他收益,它们不如上述的收益那么稳当,但在17和18世纪却不断发展。加利阿尼于1770年写道,在商业大国享有的特权中,我们还不要忘记“汇兑的收益;汇兑几乎始终对它们有利……商人出售货物有时似乎无利可得,但汇兑一项却给他们一份可观的收益”⁵⁹⁰。据萨瓦里的《商人大全》一书记载,在1710年前后,收益“有时为2%、3%至4%,有时则达10%至15%,视铸币的牌价升降,白银数量的余缺或上市汇票的多少而定”⁵⁹¹。

当然,汇票仅仅反映着贸易盈亏或信贷需求所产生的国家之间的货币运动。例如,西蒙·吕兹突然对他进行的汇票交易感到失望。由于佛罗伦萨白银过多,他的伙伴只能高价收购发往坎波城的汇票。他写道:“由眼下的汇兑行情所决定,脱手白银要听对方开价。”为了保证有利可图,西蒙·吕兹别无良策,不得不转签在安特

卫普或贝桑松兑现的汇票⁵⁹²。相反,如果当地现金紧缺,而我为经商又急需资金,我就签发一张汇票,把它卖掉,过一年半载以后再行偿还。在此期间,买下汇票的汇兑商让汇票从一地转到他所选中的另一地,转一圈后再回到自己的手里,从而获取汇票逐站积累起来的利润。汇票的这些往返旅行,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连锁契约”。可见,商人通过汇票就能向批发商、领主和王公提供有息贷款。

主要依靠汇兑交易会(也靠诸如威尼斯银行之类的储蓄银行),汇票还可充当转帐工具,即意大利人所说的“票据见面”(riscontro),或者后来英国人所说的“划帐”(clearing)。法兰西学士院于1985年希望用“冲帐”一词(compensation)代替为今天的经济学家所常用的“划帐”,但不主张恢复在法国早已废弃不用的“票据会面”(rescontre)。这个古字未被《里特累词典》收录,萨瓦里的《世界贸易辞典》也只说它用作动词。

冲帐是交易会的主要职能。直到1539年,甚至直到1579年,里昂还是最大的交易会城市,大批汇票赶在一年四次到期兑付的时候,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其实,这些汇票只是互相冲帐,一笔债权抵销一项债务……里昂的历史学家克洛德·德·吕比(1533—1618)为百万债务在一个早晨就清理完毕,不必动用分文现金,深感钦佩。冲帐另有一个更妙的作用,就是说,如果还有债务尚未结清,可以挪到下次交易会去解决,即所谓“留存”(这是一种信贷手段,每期交易会的利率为2.5%,年利率为10%)。到了17世纪,里昂已丧失了优越的国际地位,但“留存”业务仍继续开展,旨在吸收“闲散”资金。这正是里昂放款人牢牢抓住的资金来源之一,是他们获得可靠收益的来源之一。

到了这里,我们就能探讨本段小标题提出的关键问题,并且也有进行分析推断的一线希望。汇票究竟在什么时候和由于什么原

因在西方出现？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谁都并不确实知道。它可能于 12 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出现。也许是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各地的商业活动中需要调动资金，或者是他们为发展欧洲各国间的贸易而要向香巴尼交易会输送资金。另一种假设似乎也有可能：汇票是犹太人的发明，借以在千里之外收回他们流亡后丧失的财富。再说，汇票很早就 在突尼斯（伊弗利加）至印度的伊斯兰商人之间流通，莫非它像纸张、棉花、甘蔗、火药一样，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财富传到了西方。我曾多次主张采用这再后一种解释，但包括埃士顿在内的伊斯兰历史专家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尽管没有提供切实的证据。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们所关心的还是汇票后来的发展。

毫无疑问，批发商和银行家利用汇票制造了一种货币，这种冒牌货币脱离君主政权的控制，超越欧洲各国的政治边界和货币势力范围，从而在各种各样的金属货币之上，建立起纯由商人主宰的一统天下，甚至长期在高利贷问题上跟商人寻事找碴的教会也奈何他们不得。至于君主，他们尽可以禁止现金外流，而汇票却不买君主的帐。汇票终于造就了《私有货币与君主政权》一书作者所说的欧洲联合体，据我看，这种联合体具有在狭小的欧洲大陆很早（从香巴尼交易会那时起）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世界的全部特征。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方才言之成理，当然还应补充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对 这个论断再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甚至提出某些保留。

首先，在 12 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各地之间势必业已存在着一般的交往关系。这些关系已使金属货币得以流通和转移，金属货币尽管十分笨重，而且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它们毕竟不断在移动着。历史文献常有记载，说某个地方有多少外国铸币，这就是证据。汇票不但不取消现金的流转，相反只会使现金流转成倍增加。

可见，金属货币也为欧洲的内部联系创造了条件，尽管联系还

不尽完美，这一功绩是随着货物和人员的交流而来的。

汇票的优点，用形象一点的说法，就是它能凌空飞翔。它飞向交换大厦的顶层，必须集中的顶层，因为建立在三月一期的交易会基础之上的汇兑体系需要有一个能够安排票据交换的中心，从而使因成千次反复交换而过分膨胀的流通恢复秩序。弗朗索瓦·莫利安⁵⁹³于1810年说：“自从发明了所谓‘发汇’和‘收汇’这种美妙的通用货币以后，贸易已使比黄金和白银多20倍以上的实际财富进入了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一种化繁为简的措施，一种消除膨胀的措施。冲帐制度就这样几乎自动地建立了起来。

难道冲帐制度是个奇迹？批发商从事买卖活动，总是力求做到收支平衡，这种平衡必须经过一次全面的清帐，才能有机会见诸天日。作为毋庸置疑的交易会中心城市，里昂在马克埃居充当记帐货币的时期——马克埃居于1533年创立，于1575年被太阳埃居所取代——，冲帐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里昂交易会的货物贸易自1562年开始衰落，但汇兑交易的繁荣却一直保持到1575年为止⁵⁹⁴。这种滞后当然事出有因，香巴尼交易会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它于1300年左右已停止了货物贸易，但在汇兑方面却继续发挥作用，直到1335年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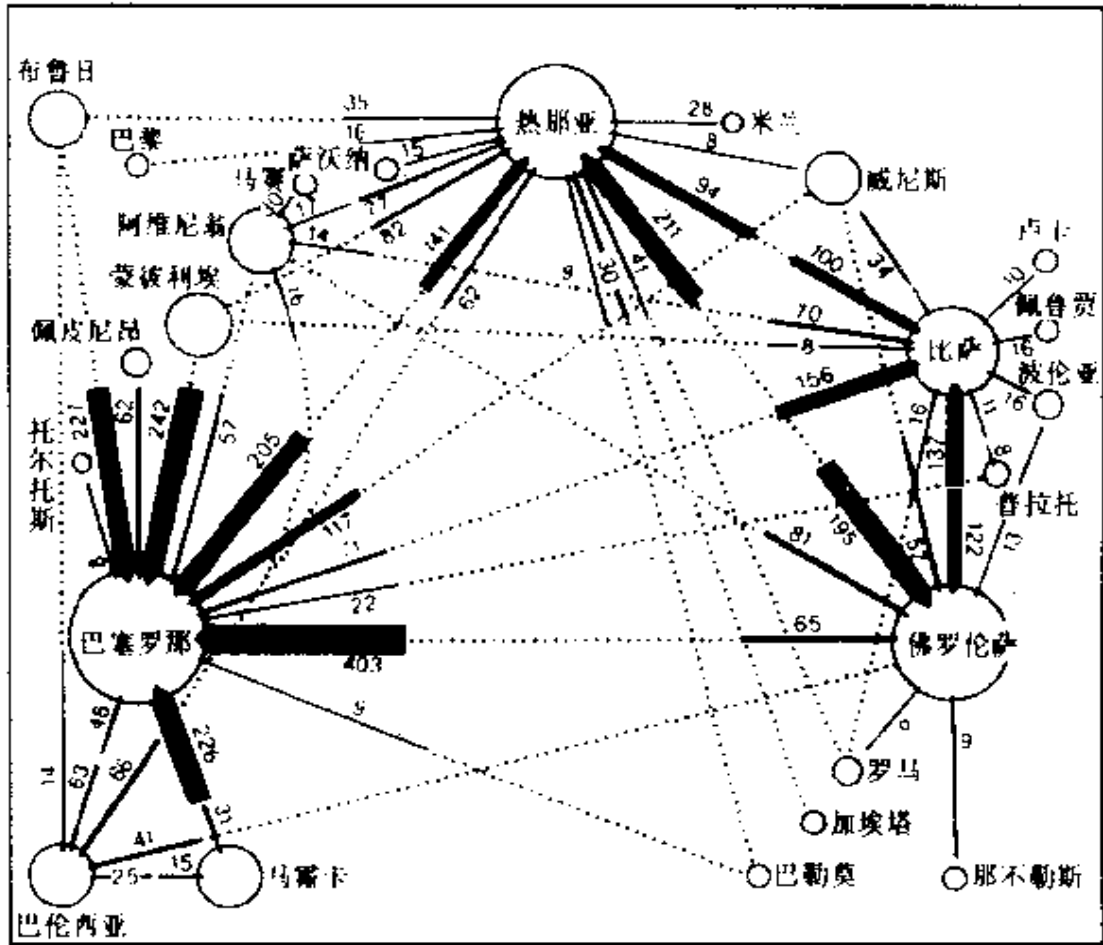
随着里昂的黯然失色，必须出现另一个交易会中心。在1579年后，所谓贝桑松交易会在皮亚琴察建立，受热那亚商人的严格控制，正如里昂交易会曾受托斯卡纳商人的控制一样。热那亚的鸿运高照是一系列有利经济形势的天然后果，热那亚的汇兑商因此得以攫取天主教国王的大笔白银（这些白银在欧洲各地流通，特别在反叛西班牙的尼德兰），并且自1557年起，取代上德意志的富格家族、韦尔瑟家族及其他大商人的地位，向天主教国王提供政治贷款，然而又代替安特卫普，充当欧洲的金融中心。事实上，战争于1569年切断了西班牙与北海的联系，大西洋的通道已被关闭，地

中海乘机得利。为天主教国王运送银条和里亚尔银币的西班牙帆桨船不再驶往安特卫普，而是开到热那亚，后者再把白银转卖给从事东地中海贸易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大客商。与此同时，热那亚又通过汇票向安特卫普提供黄金，用来向天主教国王的作战部队支付军饷。

于是在1558至1627年间，出现了热那亚的盛世，又称“热那亚时代”，为期不到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在此期间，圣乔治城和皮亚琴察交易会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皮亚琴察距米兰约40公里，这里的交易会是由热那亚商人建立的。

我从史学同行那里曾得到许多有益的借鉴，他们认为在当时，由于热那亚商人的操纵，汇兑活动竟“一反常态”，不再与下层的商品流通渠道相联系，而完全依赖西班牙“政治”白银的输送。由于这种反常，皮亚琴察交易会——且不说热那亚——的日薄西山也就为时不远了。对于以上的见解，又该作何评论？

他们这些颇具创见的解释理应使我神往，但我觉得难以接受：事态是以另一种方式向前发展的。作为插在经济大厦顶上的一面旗帜，汇票要以现金——黄金和白银——和货物为后盾。热那亚是白银充斥的金融中心，但不是交易繁忙的商品集散地；商船为数不多，尽管拉古萨的货船为它服务；尤其，木材、谷物、布匹、各种纺织品和五金用品等大宗货物的运输为荷兰船所包揽；最后，西班牙和北海之间的白银运输迟早会取道大西洋航线。自1630年起，为西班牙国王运输白银的差使交给了英国人，在1648年后，又交给了荷兰人。为此而大惊小怪纯粹是多余的，须知在生意场上，从来只讲买卖的关系。尤其，一些犹太裔的葡萄牙金融家（不论他们是否真已改奉天主教）因得到奥利瓦雷斯大公的宽容，开始为西班牙效力。西班牙逐渐落入他们的罗网，就像法国后来落入新教徒银行家的罗网一样。我以为，热那亚时代的衰退正是由于以上这许多原



汇票的流通渠道(1385—1410年)

带箭头的线条代表汇票的运动方向和数量。当两个城市之间有汇票往来时，汇兑次数列在接受汇票的商埠一旁。例如，马霍卡岛向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分别发出 226 张和 25 张汇票，又从这两个城市收到 31 张和 15 张汇票。

(雅克·贝尔坦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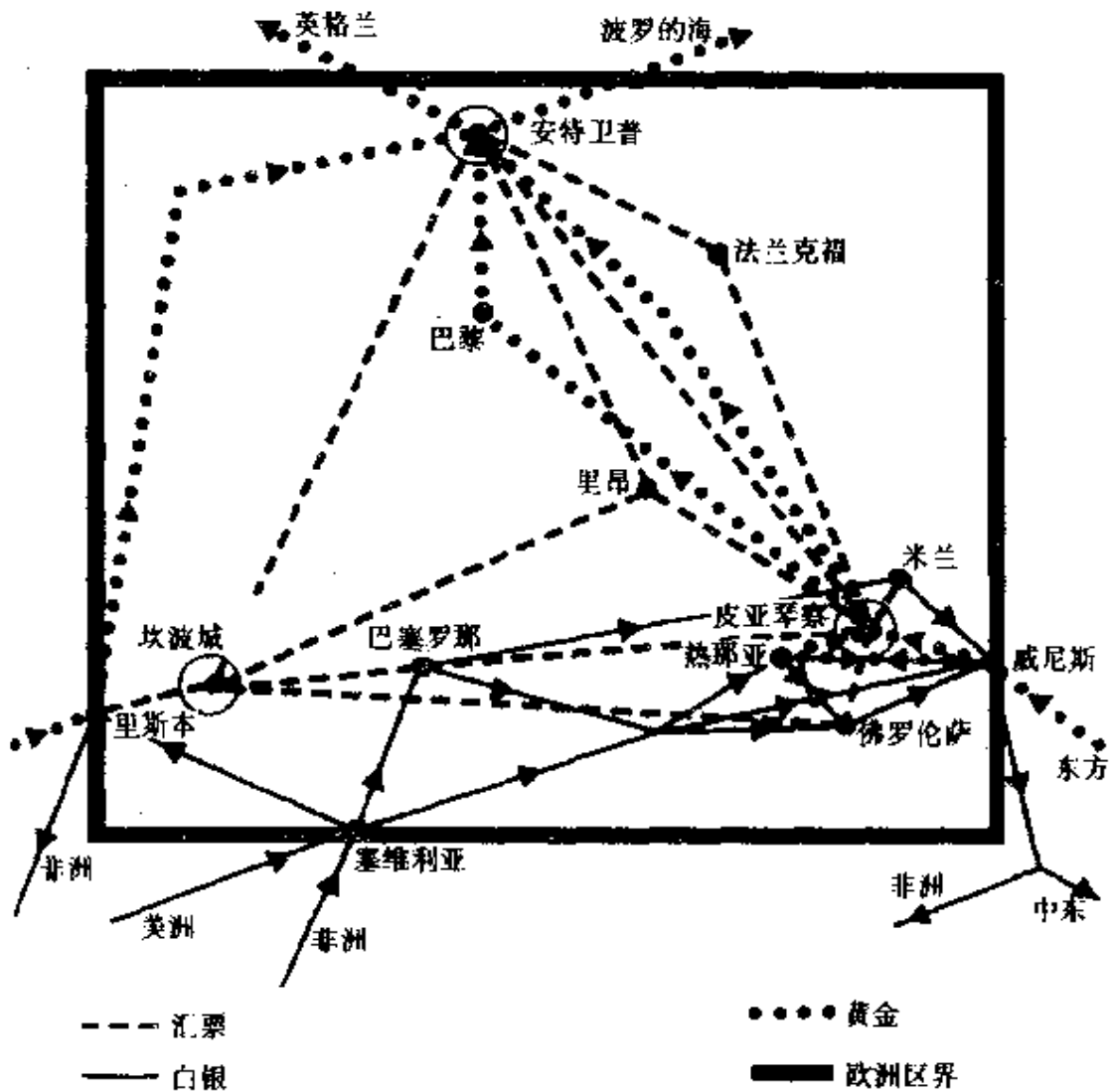
这第一张简图是对艾列娜·赛奇发掘的极其难得的原始资料所作的概括。艾列娜·赛奇提供了一位名叫弗朗赛斯科·迪马可·达蒂尼的普拉托商人付诸流通的全部汇票的清单。这些汇票分别从三个基点出发：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巴塞罗那(大家知道这三个城市在 14 世纪的重要地位)恰巧显示当时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地理布局：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还有朝布鲁日和北方地区伸出的触角。

因，而并非因为汇票的使用不当；更何况，热那亚时代的逝去并不

意味着热那亚的惊人财富就此散失殆尽。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斟酌有关经济世界的解释，特别是有关正在欧洲建立的经济世界的解释；无论愿意与否，法国正不断被纳入到欧洲经济世界中去。我们已经说过经济世界是个独立的，仅限于地球一个局部的经济区域。它以一个城市为极点，这个极点在欧洲曾先后是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但是，考虑到交易会中心的重要作用，建立在欧洲的经济世界便具有两个重心，一个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另一个是交易会中心。这么一来，经济世界的概念便变得复杂起来，在香巴尼交易会的时代，热那亚已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热那亚的钱币商在香巴尼交易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香巴尼交易会衰落后，威尼斯便与布鲁日的交易会和交易所相结合，上升到了首位，全靠里昂的帮助，安特卫普在里昂交易会上与佛罗伦萨平分秋色，尽管交易会主要受佛罗伦萨的操纵。当热那亚东山再起时，它把交易会的中心挪到离城市不远的皮亚琴察。但是，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先后成为欧洲的中心时，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和交易会中心分设两地的情形便不复存在。阿姆斯特丹身兼二任，城市就是交易会和交易所的所在地。伦敦也同样如此，拥有建于1571年的交易所以及建于1780年的票据交换所。

有关汇票及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至此是否都已谈到。当然没有。谓予不信，读者自可参看上面的两张简图。第一张简图的材料选自弗兰西斯科·迪马可·达蒂尼（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留下的丰富档案。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布鲁日是收发汇票的起点和终点，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从意大利到北海的欧洲经济的各个据点；这也正是已进入近代初期的资本主义的轴线。第二张简图展示出以热那亚设在皮亚琴察的所谓贝桑松交易会为



汇票金三角以及世界的货币运动

(参见《私人货币与君主政权》)

第二张简图展示两个世纪后由热那亚银行家控制的汇兑网和货币运动(美洲的白银, 东方的黄金)。皮亚琴察(贝桑松交易会)、安特玉普和坎波城位于三个基点的周围, 欧洲联合体已朝东和朝北的方向大大扩展。

中心的汇兑网和货币运动网。这张网当时覆盖整个法国以及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法兰克福交易会则是朝维也纳和克拉科夫方向输送资金的中转站。在弗兰西斯科·达蒂尼死后的两个世纪, 欧

洲联合体或欧洲经济世界已经成长壮大。

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开端

夜幕降临，屋内点亮着灯，但又窗户大开，小虫和飞蛾纷纷朝亮处扑去。资本家和有钱人不分白天黑夜，争先恐后地朝着国家点燃的大灯扑去。但与投火的飞蛾不同，他们并不始终自取其焚。在世界各地，无论是明代的中国或者是大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国家总是首屈一指的大老板，是吸收白银的第一号大户。百姓生来就要缴纳赋税，纳税人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家也就难以生存下去，这话似乎不用我再多说，千百年来不正是这样过来的吗？在法国，征税至少从加佩王朝真正的开国君主菲利普·奥古斯特之时已经开始。他在当政之初就已下令臣民为国家作出贡献。

逃税的办法自然很多，隐瞒、欺骗乃至装穷。吕西安·费弗尔常说，过去法国最脏的村庄是领主居住的村庄，百姓故意装穷，让领主受骗上当。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兰西国王，不是比近在咫尺进行剥削的领主更容易欺骗吗？法兰西岛司法区的大法官于1709年写道：“村里的富人如今躲着在夜间杀猪，如果公开屠宰，就会增加他的税款”⁵⁹⁶。更加可以肯定的是，纳税人始终不急于缴清税款，深怕别人认为他生活优裕，借此增加他的负担。与其及时纳税，他们宁愿迎来旷日持久和所费不赀的司法诉讼。

在旧制度下的法国或是在随后几个时期的法国，国家不辞辛劳地投入流通的一大笔现金、信贷和收支款项在货币运动中构成最大的洪流。它从一开始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至10%，这在法国是如此，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比例逐渐有所变化。今天，比例已高达50%上下，这笔提取对整个经济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促使社会朝着一定的秩序倾斜，但无论如何，社会对此总是抱怨不已。

与国家拥有的这一庞大的潜在财富相比，梅第奇、富格、韦尔瑟或罗思柴尔德的家产都显得微不足道。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财产1840年估计约1.23亿法郎，占当时法国货币储备的2%。

但国家的金库及其可变的、流动着的积累又是何等的奇妙！它仿佛是个水库，有时装满了水，有时干涸见底，接着再次积存，重新流空，不断换水。国家既强取豪夺，又施财行善。即使国家面临支出膨胀，那也还有苏利在制造局囤积的财宝，还有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总之，往来流动、时聚时散的这一大笔钱关系到广阔的经济领域。又有哪一位资本家会不想在其中插上一脚？无论从事汇兑业务、大宗贸易或者欧洲内部的大商业，私人经营都必须付出耐心，冒点风险和精打细算。如果能够既为国家效力，又不忘记自己的利益，一切岂不更加方便。

总之，把国家的收益化为私人的收益，这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十分平常的事。据说，一位记者发现，在摩洛哥开拓殖民地是化公款为私产的一个方法；有些经济学家一本正经地揭露，资本主义今天与国家相勾结。事情难道不历来就是如此的吗？请想一想：又有哪个国家能够不需要商人、金融家和银行家为它效力？对于路易十四在马尔利接见法国和欧洲的商界巨子萨米埃尔·贝尔纳，难道能借圣西门之口⁵⁹⁷，斥责他“自贬自贱”吗？对于欧仁妮皇后让詹姆斯·罗思柴尔德出入拿破仑三世宫廷，难道能作何指责吗？这些都是既合理又有利的姿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发生后，间接税的岁入有所下降；总包税所的收益于1703年跌到4200万里佛，比1683年减少2000万以上；下降幅度之大使包税商拒绝续订包税契约，税款于是改为由官方机构征收，但在1709年，征收的间接税竟只有3100万⁵⁹⁸。由此可见，国家和资本家不得不携手合作。

更引人注意的也许是，由于国家的参预，我国经济这块特殊的土地过去竟被一道地质新层切割成为两块，用今天的术语来讲，一

边是公有经济,另一边是私有经济。如果可以把一切简化——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人们就能断言,“财政”属于国家的管辖范围,即所谓公有经济,而银行经营的业务则不受君主的左右,纯由银行自己作主。如果能把一切简化,银行家和金融家就像两个物种、两个人种一样互不相干。当然,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更何况,在15世纪,“金融家”一词同时适用于为国王管理财政的官吏和以私人身份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⁵⁹⁹。只是到了后来,金融家和银行家二词才分道扬镳;《百科全书》于18世纪说:“凡包收直接税和间接税或经营与国王收益有关的企业和事业,并被认为是从中谋利者”⁶⁰⁰,就是金融家。到了19世纪,两个词又重新趋向于混同。这无疑因为大革命切除了包税制的赘瘤,把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职权交回给国家(在1789年前,仅有一半的直接税由国家经营)。从此,国家在道义上和在法律上真正当家作主。

以上说过不谈,我再着重介绍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金融和银行之间的界限,这种区分在延续几百年的旧制度期间相当明显。

不过,我在这里先要说明:

1. 这条分界线不是完全隔离的一道墙。

2. 界线经常被超越,银行家从界线的右侧来到金融家一边,位于界线左侧的金融家也前往银行家的一边。

3. 为了便于观察,我站在国家的一边;这里的国家不是指在菲利普·奥古斯特建立税收制那时专事征税的国家,而是指皮埃尔·肖努所说的金融国家,因为国家如果不靠别人为它提供现金,就无法存在,不论提供现金的人位于我们的分界线的一侧或另一侧。照一位财务总监的说法⁶⁰¹,国家要靠别人为它的“静脉输血”……既然如此,国家又怎样接受并耗费别人提供的现金呢?它怎样报答这些人的呢?

关于这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国家表现为软硬兼施,而

且两种态度交替使用；它认为有权利或有义务通过法庭审判、粗暴处死等手段让为它服务的人吐出侵吞的钱财。为此，雅克·克尔、桑布朗赛、富凯等人均遭严惩不贷。我甚至设想，约翰·劳假如没有离开法国，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最后，在1793年，国民公会决定将拉瓦锡等包税商处死。这个悲剧是否应归结为大革命与旧制度的一脉相承呢？若说一脉相承，我更加喜欢拿破仑一世让当时幸免于难的原包税人征收间接税这一出人意外的举动。这些包税人在征税方面肯定拥有丰富的经验！

雅克·克尔(约1395—1456年)作为查理七世的财务总监于1436年在全国整顿了货币秩序，他向国王提供一笔200万里佛的贷款，使国王得以收复诺曼底的失地。他的双脚显然分别踩在上述界线的两侧：他既是为国王服务的金融家，又是亲自经营远程贸易、开发许多矿山的银行家。他向布鲁日、马赛、蒙彼利埃、热那亚、威尼斯等欧洲各大商埠都派出经纪人。他在艾格莫尔特至少拥有7艘帆桨商船，并成功地参与东地中海贸易。这位杰出人物与“当时的意大利大商人旗鼓相当”⁶⁰²，但又是国王手下的一位要员。他终于发现，像他这样有钱有势，势必招来嫉妒，住在君主的国土上，将会蒙受很大的危险。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控毒害查理七世的宠妃，号称“美夫人”的阿涅斯·索雷尔，于1451年被关进监牢接受审讯。他幸而越狱成功，改投教皇的门庭，于1456年在塞浦路斯岛得尽天年。这真是可作一部小说的动人题材！单就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而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实例。

晋封桑布朗赛男爵的雅克·德·博纳(1445—1527年)也有相同的经历，但结果更加悲惨。他出身于图尔地区的一个商人兼银行家的家庭，国王常在图尔驻跸，当地不少人家因此发财致富。雅克·德·博纳为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效力，最初仍保留自己的银行。他于1518年出任弗朗索瓦一世的财务总监。国王的母亲路易

丝·德·萨瓦对他宠信有加,接着又与他作对;她对妨碍她的人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她甚至指控雅克·德·博纳挪用米兰地区作战部队的军饷,这项指控看来是毫无根据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桑布朗赛男爵是无罪的。他的过错在于拒绝拨款,并于1525年反对进行新的远征,从而导致米兰地区的得而复失以及1525年2月24日帕维亚一战的惨败。弗朗索瓦一世在战场被俘,路易丝·德·萨瓦以摄政身份代替国王执掌政柄。她与几名亲信合谋,决定对财务总监提起公诉:桑布朗赛男爵被判绞刑,解送蒙福贡的绞架吊死。

尼古拉·富凯的经历是桑布朗赛男爵的翻版,他原与塞尔维安一起担任财务总监的职务,但自1659年起,职务改由他一人担任。1661年9月5日,富凯失宠下狱,幸而被判终生监禁。经受将近20年的铁窗之苦后,他于1680年在皮涅罗尔监狱去世。他的死因至今不明。难道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了吗⁶⁰³?

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同情失败者,对当时的胜利者科尔倍尔和路易十四颇多微词。

富凯事件是悲剧的最后一幕。不过,在约翰·劳的币制改革失败后,假如摄政王没有给予方便,让他逃往威尼斯,约翰·劳又会落到什么下场?如同富凯一样,约翰·劳知道的事委实太多了。奈克尔的情形可能也是如此:在1789年7月11日解职后,假如国王的政变企图没有失败,奈克尔将会理所当然地被解送法庭受审。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银行与金融的区分。应该指出,同雅克·克尔和桑布朗赛男爵恰恰相反,富凯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金融家。金融家在当时不是早已出现了吗?

所谓金融家,当时又名“包税商”,他们在向国家垫付一笔款项后,有权以国家的名义征收税款或出售官职。金融家的统治是在16世纪进入下半叶那时开始的,我觉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外

国银行家当时逐渐受到了排斥。国王从此试图依靠本国的臣民为他理财。但他始终需要多方举债,才能维持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法国君主偏偏又没有能力亲自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原因是人手不够,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公务人员。在以上情况下,一种特殊的制度便应运而生,使征税人成为国有资产的承包经营者。

在间接税方面,法国采纳了威尼斯的方法,对国家的征税权实行招标拍卖。威尼斯包收税款的人通常出身低贱,但背后都有贵族担保,也就是说,贵族暗中参与其事,垫付资金,收取一份利润。臭名远扬的法国包税商正是为国王提供了同样的服务(尽管在形式上不是对威尼斯的模仿)。他们的名声之坏肯定超出了诋毁的程度,因为他们既非出身贫寒,又不是臭名昭著的恶棍。他们所以能向国王出借巨款,是因为如同在威尼斯一样,他们有大批将本求利的放款人充当他们的后盾。他们主要起居间的作用。这个制度好歹一直维持到大革命的爆发,但在科尔倍尔于1669年建立五大包税区那时,一度曾得到全面推广。

至于直接税,则是国家委托出钱购买税官差事——税务总办、出纳总办、税务会办等——的金融家负责征收。这些差事也就使金融家们成为国有资产的实际经营者。

正如人们所说,君主就这样廉价出让了自己的权益。难道他能有别的选择吗?当然是有的。始终走在大陆前面的英国,早在1688年已经成功地建立起现代的税收机构。我们前面说过,法国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不得不满足于以上的双重税制,当然也是过时的税制。然而,弗朗斯瓦兹·贝亚尔和达尼埃尔·台赛尔分别在两部近著中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双重税制虽有各种弊端,但其“引人瞩目的生命力”,“极端的”(贝亚尔语)、“非凡的”(台赛尔语)灵活性,竟使法国政治在“一日三惊、破产频传”的情况下渡过了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的各个难关⁶⁰⁴。国王一方面蒙受着金融家的盘剥,

丧失他向臣民收取的一大部分税款，另一方面也被侍奉得十分周到。这主要因为藏在金融家背后的国有资产承包经营者往往就是富埒王公的“佩剑贵族、长袍贵族和高级教士”⁶⁰⁵以及达官显贵，他们都属于社会和经济的最高阶层。承包经营国有资产不但利润丰厚，而且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因为这笔利润来自国王的收益；放款人的姓名实行严格的保密⁶⁰⁶（由于金融家名声不佳，放款人不愿与他们公开合伙）。因此，金融家不难满足君主的要求。他们自己拥有充裕的资金，必要时还可向将本求利的放款人拆借资金。总之，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于能使躺在保险箱里休眠的资本投入流通。

可是，国王的债务以及对不幸的平民百姓征收的税款因此不断增加。上面提到的两位作者振振有词地指出，法国能承受这个沉重的负担，这说明法国必定比人们通常所想的更加富有，它的贸易收支也比人们常说的有更多的盈余，因为通过金融家借得的巨款始终都是现金。

心平气和地承认以上的事实，也就为旧制度下的金融家恢复名誉扫清了道路。费利克斯·盖夫的《路易十四时代的阴暗面》一书过去曾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现在该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时候了。他对金融家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不惜无中生有和含沙射影地加以丑化，硬说金融家出身下贱，这并不符合事实。一些金融家挥霍浪费，心术不正，与大贵族的妻室女儿私通，借机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确实有此可能的。尽管有勒萨日刻画的《杜卡雷先生》，但包税人并不都是引诱天真的人上钩，实行重利盘剥的普通高利贷者。

总之，这里所说的包税制并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是由于环境所迫。我以为，为了真正搞清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17世纪以前，至少直到亨利二世的统治时期。在那国势衰颓、人物凋零的当时，法国经济却日趋增长，战争也接连不断。由于战争急如星火，政府的支出大大增加。为此，政府便向财源茂盛的商埠里昂告债，

而且这次不同寻常，债主不限于久已控制国际银行业的意大利批发商和银行家。早在 1542—1543 年（弗朗索瓦一世依然在位），里昂大主教图尔农（1489—1562 年）已在里昂私人资本和法国国家财政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系。在 1555 年意大利战争的最后一战打响前，他再次向里昂告债，而且款项更大。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里昂“大借款”。银行家分 41 期交易会陆续向国王出借 260 万埃居，每期的利息为 4%，再加 1% 的转期利息。由于交易会每年举行 4 次，经过长达 10 年的利上滚利，息率可达 20%。除银行家外，里昂税务总办又发放债券，吸收各种私人投资，这是一项新发明。认购小笔债券的人多如涌潮。“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债券，甚至仆人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妇女变卖她们的金银手饰，寡妇则用年金转换债券”。外国人也不甘落后，“瑞士各州，德意志王公，其他王公，甚至土耳其的帕夏和商人，都用他们代理人的名义踊跃认购”⁶⁰⁷。

实行公众和银行家相结合这次借款（银行家历来只是把别人的钱出借）具有“现代”的特征，因为它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荷兰借款⁶⁰⁸几乎同出一辙，与 1840 年后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法国政府的历次放贷也没有不同。总之，里昂“大借款”摆脱了解决法国财政困难的陈规旧习。这次放手推出的“大借款”与市政厅以往审慎发行的年金公债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尽管在富凯当政的时候，年金公债的息率也高得惊人。

法军接着在圣康坦一战（1557 年 8 月 10 日）吃了败仗，这个致命的打击最终使战争以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而结束，亨利二世不久又出人意外地死于非命（1559 年 7 月 10 日）。

国王留下了大笔债务。债券的市价逐渐从面值的 80% 跌到 70%、50% 和 40%。法国财政状况由此一落千丈，国家与商人的关系，或不如说，与具有某些近代特征的资本家的关系，几乎陷于破

裂。在很长时间内,我与弗兰克·斯普纳都认为,法国的经济中心当时从里昂转移到了巴黎,我的这位英国同行还把这次转移比作欧洲经济中心从安特卫普向阿姆斯特丹的转移。我现在不再持这种见解了,巴黎必须等到17世纪末才从里昂夺得这个居高临下的地位。可是,在1559年后,确实有过几家意大利公司迁到了巴黎,例如卡波尼家族,还有总是红光满面的塞巴斯蒂安·扎梅³¹⁰等人。他们当时想方设法向法国君主邀功请赏。

1599年的当头棒喝对作为“交易会中心”的里昂显得尤其严重,因为危机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安特卫普、威尼斯、西班牙、克拉科夫全都蒙受了打击。此外,在这些冲击和破坏发生的同时,“热那亚时代”正如旭日东升般兴起,这就意味着欧洲经济将恢复旧秩序,其重心将转向地中海;这个转折对法国相当不利,对里昂更不谥是一场灾难。亨利·豪塞、罗朗·穆尼埃、哈特洛在这个问题上都赞同我的见解。亨利·豪塞甚至说,“1557年的危机……很可能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³¹¹。

金融和银行:错过一次机会

16世纪下半叶建立的包税制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依旧被沿袭。频繁战争使国家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但因没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包税制仍继续实施,甚至有所加强。面对到期的债务和紧迫的开支,国库便向金融家、国有资产承包经营者、包税商以及根据买主要求而胡乱设置的无数包税机构的负责人伸手要钱,因为政府天天都有大批款项急需支付,国有资产承包经营者和金融家垫出的款项实际上不等于政府欠下的债务,因为他们都可从未来的财政收入中,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中收回垫款。

然而,税款的来源毕竟有个限度。法国的纳税人主要是农民,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不靠货币收入为生,其贫富完全取决于农田

收成的丰歉：在丰收的年景，农产品价格下跌，歉收更造成匮乏乃至饥荒。由此可见，推行包税制并非毫无困难，有时不免出现危机。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6—1697年）使法国财政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当战争结束时，国有资产承包经营者和金融家已耗尽了他们可以动用的全部资金。随着查理二世的去世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开始，1701年的仓促宣战使他们在惊慌之余，更是不知所措。由于别无良策，他们只得向银行家求助。正是在这时候，已于1697年前崭露头角的银行家才正式在法国君主制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银行家在法国的遭遇与改奉基督教的葡萄牙犹太人以往的经历几乎完全相同：他们被从本国逐出后，只能浪迹天涯；他们到处建立联系，相互间保持一定的默契。没有放眼世界的这种视野，建立银行是不可想象的。我已经说过，改奉基督教的葡萄牙犹太人以荷兰为据点攫取天主教国王的政治白银，他们的成功简直像是一部充满传奇故事的历史：西班牙的这些敌人刚刚来到异国他乡，竟能强迫天主教国王接受他们卓有成效的、几乎忠心耿耿的服务，而卡斯蒂利亚当局却在罗织罪名，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各种莫须有的指控，并且不仅限于宗教方面。法国新教徒银行所起的作用肯定比改奉基督教的葡萄牙犹太人在西班牙菲利普四世那时的作用更大。然而，究其起源，二者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南特敕令废止前，法国已有一定数量的新教徒银行家：他们由于不能担任国家公职，自然就朝工业、商业、金融业方向发展。但这些银行家远不是死抱住信仰不放的新教徒，他们在巴黎甚至还受到王国当局的协助；当迫害刚开始时，他们立即表示皈依天主教，至少在口头上，以免招灾惹祸。然而，在他们中间，仍有许多商人和银行家选择了流亡的道路，陆续迁到日内瓦、巴塞尔、法兰

克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地定居，无意中找到了为开展银行活动所不可或缺的中转站。毫无疑问，废止南特敕令为新教徒银行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条件，至少也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新教徒在取得了银行家的身份以后，也就可以重返里昂和巴黎，不再需要掩盖他们对新教的信仰。这难道不是世事轮回、时来运转的一个奇妙表现吗？我这里不禁想到后来的德国犹太人，从1935年起这些可怜的人被纳粹所驱逐，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逃往美洲避难，流亡生活使他们取得了众多的利益，特别是在银行和商业等极其重要的领域。

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期间，新教徒银行已因时势所迫而为路易十四效力。由于欧洲各国群起反对路易十四，日内瓦成了法国能与欧洲通商和利用阿姆斯特丹信贷（荷兰与法国为敌，但并不因此而中断与法国的商业关系）的唯一“通道”。经由日内瓦运抵法国的首先是黄金和白银，没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原料，我国的造币厂就不可能继续铸造货币；而为部队发饷，我国又必须不断铸造金属货币。因此，当时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日内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是城市主要生计的工业逐渐衰退（特别是丝织业），市内的大家族放弃工商业，转而发展银行业务，激起了行会的大声抗议。

日内瓦就这样与法国的财政相靠拢。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路易十四晚年的一大悲剧——旷日持久，日内瓦的渗透更趋加剧。安茹公爵当上了西班牙国王，号称菲利普五世，法国这次与西班牙并肩作战。欧洲其他国家则仍与太阳王为敌。法国既与西班牙结盟，也就不再需要寻求贵金属，但因财政体系百孔千疮，国王仍要新教徒银行家从日内瓦助一臂之力。其中的中心人物名叫萨米埃尔·贝尔纳，他是留居法国的原新教徒银行家之一，于1685年在当局的压迫下，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在南特敕令废止后不久，他突然发了大财，其原因相当奇特，或不如说神秘莫测。很可

能是他摇身一变成为业已流亡国外,但仍有资金等着转移的那些新教徒的银行家。无论事实究竟如何,他曾吹嘘自己从不在法国向别人借款⁶¹²。这笔来路不明的钱财使他雄心勃勃地谋求高位,并且居然达到了目的。萨米埃尔·贝尔纳的发迹标志着银行家——特别是以四海为家的胡格诺派银行家——的首次胜利,旧式的金融家作为集资人从此便下降到次等的地位⁶¹³。

原有的包税制对此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但为国王征收税款和偿还债务的使命仍由金融家承担。银行或不如说萨米埃尔·贝尔纳则通过签发汇票垫付紧迫的开支;当战争主要在境外(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进行时,付款必须采用签发汇票的方式。银行的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期票实行贴现”⁶¹⁴。《私有货币与君主政权》一书的作者说,这是对汇票用途的又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并不完全是新发明;汇票难道不正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变用途而担负起新使命的吗?但在这一次,汇票却为国库提供并输送后备资金。问题是输出的资金需要偿还。这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一脚踩空便灾难降临。

异想天开、缺乏经验和对利润的狂热追逐(贴现率高达36%)使日内瓦的银行家以为这是一注应该抓住不放的好生意。可是,于格坦作为第一牺牲品,尝到了彻底破产的味道,接着又轮到豪格兄弟。这些银行家结果陷进了错综复杂的困境之中,全靠家族的帮助才勉强得以脱身。萨米埃尔·贝尔纳较有经验,凭着他在安德列·佩尔斯(批发商、船主兼银行家,是荷兰商业巨头之一)等人那里积聚的资金,特别是就近在巴黎取得财务总监的有力支持,居然得以四处周旋,左右逢源,几乎垄断着全部汇兑业务。但到1708年,他也终于捉襟见肘,无以为继了。当时,他向里昂发汇的1400万巨款立等清帐,但他却拿不出这一大笔现金。他手头只剩在1705年发行的银行券1800万,但这些银行券的实际价值已丧失了80%以

上。确实，萨米埃尔·贝尔纳在1704年曾主张发行银行券，最初也以为银行券的贬值不会如此迅速。但报应如今落到了自己的头上。虽说萨米埃尔·贝尔纳在外国的商埠，特别在阿姆斯特丹，依旧享有可靠的信誉，但在里昂却不同，对萨米埃尔·贝尔纳又怕又恨的里昂不受他的控制，他在里昂自然也是地位不稳。里昂仍是旧式金融家的基地。

政府授予萨米埃尔·贝尔纳一系列特别提款权，允许他“对总包税所、烟草局和邮政局的收益，对用国王书记官和档案员的任职捐纳金，对在巴黎征收的阴沟捐、路灯捐和屠宰捐，对贵族的查抄家产和对一般财政收入”⁶¹⁶（总之，对随时可以增添的各种新旧收益来源）以及对收入日减的国库，都可指定开支，随意提取。后来，更设立了特别经费提款处。但所有这一切都远水救不了近火。时间就是金钱，拖延支付将导致灾难的后果。在里昂，已有几位银行家曾垫付了现金，萨米埃尔·贝尔纳照例向他们签发了融资汇票。所有的人都等着收回融资。由于久等不耐，也由于居心叵测，两名债权人吕兰和孔斯坦以面值70%的价格抛出了原来向他们提供的、用以充当抵押的银行券。国王的银行券因此受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打击。

详细讲述萨米埃尔·贝尔纳险遭破产的经过，未免累赘乏味。新任财务总监的尼古拉·德马雷于1709年9月22日签署的延期结算令在紧要关头救了贝尔纳一命，德马雷担任此职直到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为止，对他的精明、才智和果断，人们只能表示钦佩。但此人是包税制和旧制度的维护者；签署延期结算令究竟是出于他的既定主张，或者纯属形势所迫？无论如何，毕竟是他于1709年9月挽救了萨米埃尔·贝尔纳；他作出的宽限裁决固然对贝尔纳有利，但国库本身不也需要有一个宽限，以便结清欠帐吗？我们不妨对他们两人再作一番分析，我想说的是，解释他们各自的所作

所为。人们注意到，萨米埃尔·贝尔纳野心勃勃，希望成为国王手下唯一的银行家，从而独揽国王的财政收入。德马雷与他的前任夏马亚尔不同，他是一名精明能干的理财行家，当他于1708年接替长期曾是他的顶头上司的位置时，国家的财政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萨米埃尔·贝尔纳等银行家对他已是尾大不掉，欲罢不能的了。

在他去职的那年，夏马亚尔曾试图抛开贝尔纳等银行家。当时，除西班牙以外，法国军队已退回到国境之内。通过米兰和阿姆斯特丹等中转站向国外付款因而已成为多余。夏马亚尔下令“调集各省金库的现有铸币，不经国外汇兑的中间环节，直接解送前线部队”⁶¹⁷。这个办法可惜还是行不通。部队要求定期得到支援，而铸币的运输却是困难重重，时断时续，不能及时分送到位，因而不能在固定日期发放军饷和应付军费开支。于是又不得不再次向萨米埃尔·贝尔纳求助，通过汇票迅速把款项送到。不论愿意与否，德马雷于1709年只能听任萨米埃尔·贝尔纳继续其冒险行径。他在发布延期结算令时表现的迟疑不决，使人们对他有何难言之隐提出了种种的猜测。他究竟喜欢还是讨厌这位傲慢无礼的银行家呢？

后来，随着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的搁浅，德马雷与萨米埃尔·贝尔纳有所疏远。后者竭力支持银行的成立，这将在国王和私人资本之间增添一条联系的纽带。银行不会受政府的控制。它将负责归还国王的债务，也就是说，把银行吸收的几亿银行券重新投入流通，并使之增值。德马雷迫于日常支付的需要而开办的“财政金库”（又名勒让德尔金库）正是为准备成立国家银行而从事的一次小规模尝试。

为法国及其国王十分需要的这个银行一旦成立，将是什么样子？它肯定会参照建于1688年的英格兰银行的模式，成为一个兼具储蓄、流通和发行三种功能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贝尔纳等银行家将主宰一切。由于财政部门、包税总所和出纳总办的一致反

对,这项计划终于遭到排斥。反对者大概还有批发商,但我不明白他们反对的原因何在。至于德马雷是否反对成立银行,还在疑似之间。银行既然开办不成,法国又倒退回旧制度,恢复了金融家的统治。勒让德尔金库是个冒牌银行,我甚至敢说是银行的对立面。银行家打进国王财政机构内部的时机尚未成熟。更何况,他们利用汇兑、储蓄等手段,通过插手安都纳·克罗扎在路易斯安那的专营贸易、圣马洛的南海航运、私掠战、海事保险、购买外国小麦等大规模活动,在远程贸易和欧洲贸易方面表现十分活跃。同以往的和随后的银行家一样,他们始终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商人。一次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金融和银行(续完)

继续推行“包税商”制度可见符合德马雷的愿望,至少取得了他的赞同。这个旧制度尽管依旧运转不灵和弊端丛生,但其东山再起却使君主得以应付其财政开支,甚至直到漫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为止。我认为,大理院 1716 年 3 月追查“在财政方面犯下的贪污枉法行为”并不是这个制度的必然结局,应该说这从来就是蛮横无理的君主制的习惯反应。路易十四去世不久,德马雷立即遭到贬斥,勒让德尔金库也跟着彻底垮台。8 000 名金融家当时被立案侦查,4 410 名被判赔偿和罚款,少数人锒铛入狱⁶¹⁸。

包税商制度肯定不能为约翰·劳推行的币制改革(1716—1723 年)负责,币制改革引起的一系列哄动事件无非表明,法国经济当时还不可能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与约翰·劳的破产一样,南海丑闻或“南海泡沫事件”使英国人痛心疾首,但英国经济却顶住了风暴的袭击,恢复了平衡,政府则全力支持破产的南海公司;法国则相反,约翰·劳的试验失败后,顷刻间便一切都垮了下来,一切都被清除干净⁶¹⁹。

我对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片面解释不敢苟同。梯也尔认为约翰·劳的错误是他不该求助于“虚假资本”，求助于股票的“不可靠的价值”，从而动摇了金属货币的地位，金属货币在当时曾长期是法国经济生活的基础⁶²⁰。目光极其敏锐的观察家雅各布·旺·克拉夫伦把一切都归罪于路易斯安那公司的失败，归罪于南海航行的功败垂成以及孔迪大公和孔代大公等大贵族的奸诈；设在坎康普瓦街上的交易所的疯狂投机活动反而不被认为应负第一位的责任。约翰·劳在事后声称，由于马赛的黑死病于1720—1721年使四分之一的法国陷于瘫痪，他的试验注定不能成功。不过，他的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

以上各种解释都有部分的道理，但必须把它们加在一起，才能揭示出法国经济长期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毛病其实出在异体嫁接的排斥性。约翰·劳在摄政王的帮助下，逃离了法国；据说摄政王曾利用约翰·劳制度，赚进了一笔现金。托斯卡纳在巴黎的代表于1720年9月3日毫不犹豫地写道：“摄政王所得的收入加在一起可达三亿”⁶²¹。摄政王从中谋取了利益，负有一定的责任，任何人恐怕不会对此有所怀疑，问题在于他究竟赚了多少钱，负有什么责任。在风暴过去以后，君主又故态复萌（大理院再次开庭审判，对金融家进行最后一次迫害），难道这是摄政王的过错？或者，在约翰·劳制度失败以后，摄政王应该赔偿金融家的损失，让金融家清理约翰·劳留下的烂摊子。采取后一种办法，那就是恢复于1715年已被贬得一钱不值的旧制度，让臭名昭著的帕里兄弟东山再起。舍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是当时唯一可打的一张牌。

现在，对于约翰·劳制度，我们难道能像许多历史学家那样，进行夸大其词的渲染吗？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约翰·劳制度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民把藏在袜筒里的几块金币重新投入流通。尽管如此，这场失败的教训将使纸币在法国公众的心目中

从此信誉扫地。不过，恐怕整个事情无非是晴日里下的一场雷阵雨而已。厄尔·汉密尔顿在他字斟句酌的文章里指出，约翰·劳制度并未导致物价的疯狂上涨以及人们哄传的破产。在巴黎，一度曾成倍上涨的物价迅速回落到正常的水平。但这些文章没有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让-保尔·斯瓦松根据对巴黎和凡尔赛公证文书所作的考证，也注意到公证事务所的活动相当平稳，而并不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是乱成一团⁶²²。总之，正如雷阵雨一样，哄动的事件往往只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包税制自动恢复以后，国王的债务又差不多回到了1718年的水平。弗勒里主教1726—1743年当政期间做了不少好事，尽管达让松男爵在其《日记》中对他颇多指责。主教向后倒退了一步，于1726年重建包税总所，我在上文曾经指出，这个机构自1703年起已被直属政府的税务局所取代。

在这里，我想就不必再详细介绍金融家为国王效力的具体的经过。他们依旧忠心耿耿地为国王服务，为推动旧齿轮的运转不惜忍辱负重，甘受种种不公正的打击。只是到了1770年，由于三大臣的莽撞行事，金融家与政府的关系才彻底闹翻。路易十五无疑恢复了君主的权威，统治长达20年之久；出任财务总监的台雷教士搞乱了国家的财政，却没有实现全面的革新。

其实，正如人们所常见的，变革的根本原因不在这里，而是来自法国经济生活的深层。法兰西王国当时经历的经济增长，仿佛是一株老树春天萌发了新的枝芽。根据让·布维埃⁶²³的见解，正是经济增长有力地推动了信贷的发展，促使信贷的数量和规模大大增加。移居国外的新教徒银行家从没有完全放弃在国内的阵地——何况也不可能这么做——，他们现在又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台吕松银行（后来曾多次更改正式名称，特别是在1757至1768年间，以台吕松—奈克尔银行著称）于18世纪初在巴黎成立，并于恢复

和平的 1715 年在热那亚、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设立分行；凡尔内(1742 年)、佩雷戈(1781 年)、比台尔曼和克拉维埃尔(1782 年)、霍丁格(1785 年)等银行家陆续回到了巴黎。

内克尔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于 1777 年主持法国财政，虽然名义上不担任财政总监的职务；1781 年 5 月 19 日内克尔被迫辞职，但是国家财政形势的恶化又使他于 1788 年 8 月复职。他在 1789 年 7 月 11 日再次失宠。两天过后，巴黎举行了起义。一位银行家如此深得人心，他在 1789 年公然站在革命一边，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作一番解释。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再多噜嗦。

从 1789 年至 1848 年

我想加快步伐，着重分析从 1789 年到 1848 年的整个长时段，这个时期以漫长而激烈的大革命为开端，一直延续到意义同等深远，但正如众所周知没有来得及完成的 1848 年革命为止。我之所以故意独出心裁地把革命时期、帝国统治、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构成一个先后交替的具有连续意义的整体；金融家当时步步后退，而银行在保住既得地位的同时，占领金融家撤出的阵地；也就是说，银行日益向国家靠拢，为国家效力。但银行继续停留在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只有这样，银行才能保住自己的行动自由。

实际上，大革命对后来事态发展的影响远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得多。首先，大革命为未来扫清了道路。其次，它在破除旧制度的同时，有所维护，有所建树。最后，这场革命对银行是一次选择性考验，银行的活动尽管遇到重重困难，却仍得以继续进行，甚至还相当活跃。

大革命的功绩或作用是它像一把铁扫帚清除了间除税(虽然事后又陆续恢复)，停止征收或不认真征收直接税；执掌国家大权

的人推翻了全部税收制度。他们因此注定要迅速利用印钞机，大量发行“指券”和“土地票”。

督政府在 1799 年末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秩序。正是在那时候，政府的财政机构终于建立了起来：国家设置财政部，统一管理财政收入；同时又设立度支部，主管各项开支。波拿巴说，“法国目前幅员广大，仅设财政部不足以应付各项事务！我正需要取得财政管理方面的保障：一名部长是不够用的。”⁶²⁴正是这第一句话——法国幅员广大——使我喜出望外。两部并存将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由国家任命的收纳员、稽核员、接柜员将各司其职，向国家提供重要的财政保障。然而，在这次整顿中，许多旧习惯和旧人员仍保留了下来。国家容许税务局长在一定期限内，把全部税款汇总交给中央当局，他们在把税款上交前因而有可能挪用这笔已经入帐的资金（这使我们联想到旧制度下的出纳总办）。国库自然也很想向他们预支一部分款项！总之，包税制及包税商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而新体制并没有把旧场地清理干净。

既要破坏，但又要保留、保证和革新。督政府于 1800 年创建了法兰西银行，其目的是要保护私人银行和商人，正是私人银行和商人最需要法兰西银行的成立。于是，就把原由一批银行家以两合公司形式组建的，但又未能履行其使命的“往来帐户金库”（共和 8 年雨月 24 日到 1800 年 2 月 13 日）改组为法兰西银行。新银行在 3 年后取得了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纸币的面额都很大，因而在最初，甚至在后来，它们为大商业的服务仍然超过为国家的服务。贝特朗·吉尔指出：“人们认为它是一个〔为富人服务的〕互助合作社。其股票之价格——5000 法郎——实际上把所有的小商人排斥在外。”银行的股份属于银行家，其中多数人出任董事：佩里埃、罗比亚尔、佩雷戈、马莱、勒库尔德、雷卡米埃、热尔曼……此外还有几名批发商和一名公证人。继承了大革命遗产的法国人居然容忍

这家银行一半以上的股份归私人所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实际上，老一辈的金融家早已被撇在一边，当时又没有任何可取的其他方案。尽管如此，这对抢先入股的银行家来说却是一笔有钱可赚的好生意。1800年2月20日，法兰西银行正式开门营业。

在法兰西银行的帮助下，巴黎及外省的银行和商界在督政府时期和帝国时期遇到的众多困难均得以克服。法兰西银行当时起着三重作用：吸收储蓄，接受贴现，发行货币。它最初小心翼翼，把审慎奉为金科玉律。凡没有三人签字担保，期限超过三月的期票一律不予贴现。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法兰西银行仍帮助信誉卓著的商号渡过难关，帮助政府筹集借款，但决不允许政府对银行发号施令。总之，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机构。它的地位如此之高，因而在1803年、1806年和1810年的历次危机期间得以巍然不动。相反，巴黎银行家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

我曾泛泛地说过，在经济增长时期，银行业的发展比商业更加迅速，而工业和农业则远远落在后面。但在经济衰退和停滞时期，农业继续缓慢地向前爬行，工业有所进步，而商业则急速后退，并带动银行信贷的回落。这正是1789至1815年间发生的事。然而，巴黎大银行（其中包括号称“救国委员会的银行家”佩雷戈开设的银行）却相当顺利地度过了艰难的革命时期⁶²⁶。在这些风云险恶的岁月里，明智的做法显然是韬光养晦，稳扎稳打：“马莱家族正是遵循着这个政策：他们的资本从1788年的80万里佛减少到1792年52.5万，再到1794年的24万，而在指券泛滥的时期更下降到零”⁶²⁷。大批资金已移作不动产和地产投资。佩里埃家族也买下了一些大庄园以及昂赞煤矿的股票。波拿巴上台后建立的强有力政权一度为银行活动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可是，和平的破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和破产，先后在1803年、1806年和1810年给予巴黎的银行业沉重的打击。巴黎的银行直到复辟王朝时还没有缓过气

来⁶²⁸。

在督政府和帝国期间，法国的信贷资金显得捉襟见肘。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讲，叫做“银根紧张”。事情确实如此。拿破仑亲自接见的大商人加布里埃尔·乌弗拉尔当时不过是个兼职银行家。他从事的投机活动包括国有产业、殖民地产品、军需物资以及1801年饥荒期间从英国和荷兰采购的大量谷物；他于1804年向面临饥饿威胁的西班牙供应粮食，然后在新西班牙的墨西哥支取皮阿斯特，这些银洋由英国船运回法国。乌弗拉尔是位天才⁶²⁹，但他毕竟也保留了旧商人的习气：讲排场，爱冒险，有时不守信用，甚至寡廉鲜耻。

1815年的法国已经百孔千疮，背了一身亏空。迪潘男爵⁶³⁰所作的总结即使略嫌夸大，但也并非完全不合事实：200万人应征入伍，100万人死亡，70万老兵等着退伍，两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至少分别达10亿和5亿法郎，数额与外国占领（直到1817年国土解放为止）的开支大体上相当。但经济生活正日趋恢复，农业、工业、商业……都有所进步。和平又一次成为立见成效的良药。各个经济部门纷纷动了起来，而一些尖端部门更预示着，决定着变革的发生：金融活动，贸易公司，冶金和化工等新企业，里昂煤气照明公司，运河开凿，蒸汽轮船，铁路，等等。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指出：“小工场、分散劳动、家庭作坊正日趋消失。大工厂正拔地而起，像兵营和修道院一样集中大批工人，厂内的巨型设备由大功率马达所驱动。”⁶³¹这段话的语气有点夸张，但是，眼看法国走上前程似锦的一条新路，当时的人怎能不为之心醉神迷？举目所见，到处都是进步的兴旺景象，特别是根据1842年法建设的铁路。

为了承担这些重大的任务，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和信贷供应。股份有限公司于1807年正式取得合法存在，终于陆续建立了起来：自1825至1837年，法国仍有1 039家两合公司（资本总额

为 12 亿),而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达 157 家(资本总额为 3.93 亿)。这仅是一个开端,凡事开头难。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商业经营中将把全部权力交给人数不多的董事会;小股东就像绵羊一样听任这些大权在握的人盘剥和宰割。当然,这是上层对下层的剥削,丝毫也不新鲜。社会的规律和力量,社会的历久长存,恰恰在于它能适应层出不穷的新形势和新事物,不断地重塑自己的形态。这一次,在经济的上层,却丝毫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根据 1807 年商法典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枝叶茂盛前早已生根发芽。同样,银行的崛起也经过由来已久的准备。在经历了革命和帝国风雨如晦的岁月后,银行确实迅速得到了复兴,但新开设的银行为数不多(而且大多还是昙花一现),主要还是旧银行重返舞台,其中有三分之一在旧制度下已经相当活跃。继 1830 年革命之后建立的七月王朝任命卡齐米尔·佩里埃和雅克·拉斐特等银行家为部长,恰恰说明大银行的地位已迅速得到了巩固。到了第三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期间,随着银行业务的急剧扩展,大银行的地位还将变得更加稳固。

“大银行”一词直到 1914 年乃至后来始终十分流行。该词实际上确指的是巴黎的大银行,它们财力雄厚,不仅在法国发展业务,而且还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这些银行的主人大多出身于银行世家,他们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是佩雷戈的继承人雅克·拉斐特,来自苏黎世的霍丁格,以及亨奇、佩里埃、德累赛尔、富德、詹姆斯·罗思柴尔德等等。大银行家总共约在 20 至 25 人之间,其中相当多的人原是外国人。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几乎是一条古老的规律,不可或缺的前提。做大生意的人不能不与外国保持联系。梅耶·安瑟伦·罗思柴尔德的五个儿子于 1820 年都已成家立业,安瑟伦在故乡法兰克福,索洛蒙在维也纳,纳桑在伦敦,卡尔在那不勒斯,詹姆斯在巴黎:被置

于他们监视和操纵之下的欧洲确保着他们的财富以耸人听闻的速度增长。他们也照例同时开展多项经营活动,包括储蓄、贴现、汇兑、公债以及与大宗贸易相联系的经销业务。住在巴黎的詹姆斯“为发展金融业务提供资金,在勒阿弗尔建有码头,海上拥有船队,逐渐成为法国唯一的茶叶进口商,是购买羊毛、谷物和生丝的大主顾”⁶³³。一度出任路易·菲利普政府首相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他投身政界后不久便死于霍乱,此人“组织远洋航运,开办银行,从事地产和公私债券投机,经营冶金、玻璃、炼糖、肥皂、面粉等工业企业,活动之广可谓包罗万象,而且规模巨大”。总之,一半以上的银行家仍与大宗贸易和工业相结合。

然而,最能与国王路易·菲利普心投意合的詹姆斯·罗思柴尔德则比其他银行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的财政事务。他逐渐把政府的公债几乎置于他的垄断之下。具体操作还是按阿姆斯特丹18世纪采用的一套老办法进行。因此,银行家的作用就是在公债发行前向政府垫付债款,买下债券,其价格自然总是低于面值。同意以最低折扣率成交的银行家就能做成这笔生意。当债券以平价向公众出售后,银行家还有另一张牌可打:哄抬债券在交易所的牌价,从而高价抛出自己原来留下的债券,这照例还是“少付代价,少冒风险,但又稳得巨利”⁶³⁴的老办法。银行家从此与国家相结合,“财政”和“金融家”二词从此丧失了各自的特定含义。

难道国家竟是如此暮气沉沉和随遇而安?无论如何,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国家的行事准则将有所改变,这是工商界所没有预料得到的。第二共和国是个政局动荡、经济困难和对“国际金融”十分不利的时期。霍普银行为此干脆迁往伦敦。至于詹姆斯·罗思柴尔德,他于1847年8月刚在一次公债招标中以2.5亿法郎的巨款得标,便因困难重重,被迫停止公债的发行⁶³⁵。到了第二帝国期间,工商界和银行界总算缓过气来,但罗思柴尔德因受富尔德的排

挤,不再像在路易一菲利普的时候那样能与当局串通在一起。财政大臣皮诺于1854年为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急需筹集2.5亿法郎的债款,但他不再让罗思柴尔德充当中间人,而听取达西耶和米雷斯这两位金融家的劝说,决定采用由国民直接认购的办法发行公债券。这一措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发行额在几天之内已认购完成,“拿破仑第三对‘资本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深表满意。大银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它对公债发行的实际垄断从此被废除”⁶³⁶。国家把公债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顺便指出,这在旧制度下原是经常发生的事。更何况,这也并不妨碍国家向大银行再次求助,1870年战败后,以阿尔丰斯·罗思柴尔德为首的大银行又为国家发行公债,以支付战胜国索取的50亿法郎赔款。

总而言之,金融贵族取得补偿的机会还是不少。继1846—1848年的严重危机之后,法国及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欣欣向荣的时期。欧洲经济如大海涨潮般地向前推进。究其原因,也许是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1848年和1851年)使欧洲的黄金数量大大增加,“在20年内增加的黄金数量几乎等于16世纪以来开采的数量”⁶³⁸。法国在10年内取得了价值33.8亿法郎的黄金,相反又丧失了价值11亿法郎的白银,这笔白银大量流往远东地区,支付海外贸易的亏空。因此,在1861年,法国80个省份都缺少面值5法郎的银币以及各种辅币⁶³⁹。有人于1865年断言,金矿和铁路“是欧洲工商业繁荣的两个秘密”。

然而,自1842年起受到政府推崇的铁路恰恰正是大银行最热衷投资的经济部门。大银行在国家提供信贷担保的条件下为建造铁路募集数以十亿、百亿计的 necessary 资金。无论是大银行或者是它的竞争者,都不会受丝毫的损失。由此产生的巨变促使大银行从门类繁多的大宗贸易中脱身,但它与工业、矿业、冶金业和新兴保险业的联系在1820年后又进一步加强。

然而,1846—1848年危机表明了法国信贷的不足和严重不平衡。直到1840年,银行业务和贴现活动主要是为巴黎的商业界以及国外大宗贸易服务。相反,在外省从事国内贸易的商埠以及乡镇中心,资金供应十分短缺⁶⁴⁰。巴黎的大银行家故意限制自己的信贷和贴现机构向外省扩展业务。担心生产发展过快,造成“市场上产品充斥,竞争激烈,使已有40至50年经营历史的商号陷于破产”(以上是1840年所说的话)⁶⁴¹。尤其,他们还阻挠外省建立独立的流动渠道,这也不难办到,因为此事必须报请参议院批准。在19世纪上半叶,除为巴黎的银行直接关注的部门外,工业发展全靠自谋资金,工业企业及其客户以赊欠或短期拆借资金等手段互相帮助。例如,阿尔萨斯的纺织厂于1827年得到了勒阿弗尔棉花进口商以及巴黎、里昂、巴塞尔等地的批发商的资金支持;400名里昂制造商于1844年利用了70名当地丝绸商和180名法国和外国经销商的信贷。可是,建立在商品流通基础上的短期资金拆借往往不甚可靠。连锁破产可能因此发生;1846—1848年危机正是这样一个例子⁶⁴²。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排除持久的经济故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在夺取政权后不过几天,于1848年3月8日决定取消参议院的批准手续,在巴黎创办了国家贴现银行,并在法国各大城市按照首都的模式设立分行⁶⁴³。巴黎的垄断从此被打破,继拿破仑第三的政变之后,银行和工业在外省蓬勃发展,其规模与1945年后“光荣的三十年”差相仿佛,“银行家之间和各种类型的银行之间相互竞争的混乱情形”⁶⁴⁴已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当时新建的一些银行今天依然存在,我们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建于1852年的“地产信贷银行”(与“动产信贷银行”同时建立);建于1859年的“工商信贷银行”;建于1863年的“里昂信贷银行”;建于1864年的“通用银行”。历史学家由此断言,在1848年以后,或不如说在1852年以后,法国建立起来的新一代的新式银行

正逐渐淘汰罗思柴尔德式的旧式大银行。这个说法是否完全正确？

毫无疑问，旧式大银行基本上属于某些大家族的私产，它们不足以承担起商业银行的任务，也不可能像里昂信贷银行和通用银行那样，利用其分支机构向全国各地发展，吸收整个法国的储蓄。可是，在一方面，经过对 1860 年前后的情形进行仔细观察后，列维—勒布瓦耶得出结论说，新式的信贷银行在信贷分配和投资政策方面并没有改变旧式私人银行的老办法⁶⁴⁶。不同之处就在于当时的经济总量，在于银行机构的非集中化，非集中化确实有很多好处。难道能把“经济发展和银行活动混为一谈”吗？难道能够先把第二帝国的经济增长归功于银行活动，然后再把 1860 年后增长速度的放慢又归罪于银行活动吗⁶⁴⁷？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如同交易所以及过去的交易会 and 集市一样，商业银行或储蓄银行只是工具或手段，其作用随着经济的升降而波动。指出这些庞然大物与业已在欧洲出现，并且行将在美国出现的那类大资本家有着某些联系，难道是一种错误的推断吗？我想说的是，大资本家可能仍扮演着主角。事实上，大银行家在银行革新中并未置身事外：他们在 1800 至 1890 年间经常出任法兰西银行董事会的董事，在第三帝国期间还参与一些新银行的创建，拥有地产信贷银行 20% 的资本，动产信贷银行 50.5% 的资本（在董事会 12 个席位中占 8 席），通用银行 23% 的资本，如此等等⁶⁴⁸。在 19 世纪下半叶，我国的大信贷银行纷纷向国外发展信贷和银行业务，通用银行更步往年资本家的后尘，大胆从事风险投机，把欧洲的资金扔进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和秘鲁这些无底洞里去；这些新式银行在国内本有牢固的根基，怎么会自动走上这条路去？这恐怕因为旧式大银行家仍然十分活跃，他们在董事会中对新式银行施加影响，进而保住既得的阵地和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以上见解得自让·布维埃的启示，他在一篇出色的文章里同

时分析了 1850 年后法国各银行的赢利率和政策⁶⁴⁹。除法兰西银行和地产信贷银行以外,法国的银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仍是“广泛从事多种经营的企业”,从事风险投机的企业。银行赢利的普遍上升(中间隔着两个停滞时期,即 1872—1882 年和 1893—1901 年)是转变经营政策的结果:1873 年后大幅度降低利率(资本的赢利率相对减少)由扩大对法国经济的信贷投资所抵消;国内市场虽然赢利不大,但在国外市场扩展地盘可望取得巨额利润。这一政策的策划者正是“主宰巴黎大型交易活动——特别是发行国债券——的金融集团,直到 1914 年为止,这些金融集团始终把旧式大银行的银行家、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结合在一个牢固的整体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旧式大银行难道不再对法国整个银行界发号施令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要留待在本书续卷有关社会的章节中重新再谈。因为银行作为经济的重要上层建筑,对我国的历史具有决定的意义。其影响比历史叙述的众多政治危机和边界告警都重要得多。

少数人的重要性

不论是否合乎逻辑,不论是否符合我们今天的道德准则,权力、决策乃至特权始终集中在经济生活的高层。正是盲目的、充其量是半自觉的集中才使少数特权集团独享利益。这些集团的成员可能发生更换,但更换的程度远比人们所说的要小,而且即使更换,集团的人数还是很少。

在 1550 年前后,正值里昂经济的鼎盛时期,交易会的汇兑业务由 80 个意大利商人家族所垄断。当皮亚琴察于 1590 年成为左右欧洲资金运动的交易会中心时,大约 60 多名意大利银行家主宰一切。达尼埃尔·台赛尔在其近著中对金融家的人数作了统计,这

些“财政官”或“包税商”为路易十四效力，代他向臣民征税，又为他垫付开支，再从税收中偿还。这些重要人物为数很少：1668至1715年间，据统计，与国王签订的包税契约总共有693项。但因有的人单独签了6项契约，甚至60多项契约，涉及的人数只是242人⁶⁵⁰。这些“金融家”的籍贯大多是“在南特至日内瓦一线北侧的法国北部”，这条界线在我国是一条永恒的接合线⁶⁵¹。金融家都在当时的“金融中心”巴黎居住。不用多久，旺多姆广场附近便建造起许多豪华的金融家宅邸⁶⁵²。因此可以说，资本的集中遵循两条规律：人数少，地点单一。

在这人数不多的包税商世界中，总包税所是最重要的堡垒，其成果也最为显著。自1680年福科内租约订立后，总包税所在预付承包税金的前提下，负责征收盐税、助税、商品入境税和进口税等一大批间接税。一位历史学家经仔细考证后指出，“地区差异在这方面已经很小，因为众多的联姻已使包税商之间结成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认真地查一查家谱，说不定他们就属于二至三个家族，甚至同属一家的可能也不能排除”⁶⁵³。可是，这个堪称“超级资本主义”雏形的富豪集团在全国各地拥有一大批人为它服务。古达尔于1756年写道：“总包税所从乡村抽调的公民达5万人以上，其中多数并不是包税所的职员，而是今天所说的分包人。包税所只雇佣2.5万职员，并向他们支付工资；但与包税所发生关系的公民人数就多得多了。”⁶⁵⁴确实应该看到，包税所又像君主政府同它签订包税契约一样，再把某些杂税的征收权分包给次等的包税人；包税所自己承认，这些次等包税人比任何人都更加遭人憎恶，更何况，群众暴力的矛头主要也正是针对他们⁶⁵⁵。

简单说来，在我们从容考察的上述事例中，可以得出一个意义深长的启示：山的体积极大，而人们通常却只看到浮出水面的一个尖顶。没有奴隶、附庸或仆役作后盾，强权集团也就不可能存在。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东地中海地区欣欣向荣的贸易集中在几个人的手里。18 世纪的马赛盛极一时,商船开往大西洋,与圣马洛商人携手合作,后来又参与海岛贸易;据夏尔·卡里埃尔的统计,马赛的批发商不过 80 人,仍然是享有特权的一个小集团。鲁昂的批发商据 1779 年统计仅 61 人⁶⁵⁶,在复辟王朝期间及后来,巴黎的大银行家族不超过 25 个。

人数少这条规律的普遍性远不是用以上几个例子所能完全阐明的。这条规律简直可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即使是一条不道德的定律也罢。马略特定律不也是不道德的吗?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就需要少数特权者实行统治和整顿秩序。无论如何,不管人们喜欢(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或不喜欢,这条定律在其他各国的社会中也同样在起作用,受定律约束的不仅仅只是我们法国人。

荷兰的特权集团作为城市和商业公司的主宰,长期统治着欧洲最光彩夺目的经济⁶⁵⁷。加的斯是 18 世纪最富现代气息的城市,塞维利亚的执政官在那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占统治地位的旧城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力。然而,一名法国商人于 1702 年 12 月 2 日写道:塞维利亚的“执政官”原系四、五名巴斯克商人,他们“操纵商业活动,借以谋取私利;商船的出航和返航,全凭他们随意决定;他们派人在美洲攫取各种收益。一句话,发财致富的只有他们五人,吃亏受害的却是批发商。”⁶⁵⁸

定律一词在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是十分难得遇到的;如果一定要说定律,它就必须在从属的各个领域中全都适用。实际上,各种形态的权力无不归少数人所有,特权的胜利使他们的船舶得以在被压迫者的辽阔海面上,为着自己的利益,逍遥自在地航行。皮埃尔·古贝尔的《路易十四和二千万法国人》一书的标题在这里值得一提。这 2 000 万人犹如一团散沙,听任少数贵族支配整

个法国,也就是说,支配 2 000 万人的人身、财产和劳动。而少数的贵族则悠闲自在地在宫廷相聚。在学校老师多年的教课中,我承认曾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即旧制度下的历史似乎是贵族要跑两段路程:第一段先来到宫廷;第二段再在政府中取得权势。黎塞留主教于 1614 年担任王后奥地利的安娜的随身司铎,他因此跨出了第一步,就像新任议员首次进入波旁宫一样。对 18 世纪历史了如指掌的弗雷德里克·列维曾直截了当地断言:“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晚年,实权并不由衰迈的国王或虔诚的王后在行使,而掌握在科尔倍尔和费利波两大臣家族的手里”⁶⁰;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承认感到有点意外,尽管它同我的新看法不谋而合。这为解释摄政时期何以与路易十四及其政体背道而驰增加了一条新的理由。这条理由同样也能说明曾在破产边缘“拯救”了国王的德马雷总监何以失宠,德马雷正是这两大家族的成员之一。

法国说过不谈,我们且来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皮野副官是位善于观察的军人,在他的笔下,19 世纪初的英国处在十大家族的统治之下,勋业彪炳的威灵顿在十大家族面前不过是奴才,陪衬或新贵而已。读到这些,我承认也深感惊讶。难道社会的上层或最高层竟是各种权力形态的公开或幕后的主宰吗?

甚至文化史似乎也逃不出少数人统治的规律。吕西安·费弗尔常说,每一个时代都处在十来位大作家和大思想家的笼罩之下,只要真正读懂了他们的著作,也就能对当时的思想界了然于胸。不用提醒,我们立即想到七星诗社,想到 18 世纪以狄德罗为首的“哲学家”。在绘画方面,我们想到立体主义的诞生地“洗衣船”、蒙帕那斯画派、巴比松画派、卢万河畔画派等等。在宗教狂热的漫长历史中,少数派总是失败,例如费尼隆及其朋友,但少数派却能悄悄地深入人心;对圣伯夫的《罗亚尔堡修道院史》一书,我曾一读再读,爱不释手。

这番浮光掠影的联想就此打住，在本书的续卷中，我将从容不迫地再发议论。

我已指出资本主义在法兰西经济生活的顶层栖身，这并非对它有所责难。在 18 世纪末经济蓬勃的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初展风采。恕我说话轻率，我觉得资本主义对法国经济的渗透相当缓慢。这也许因为，即使在詹姆斯·罗思柴尔德的时代，资本总量仍然微薄，此外还因为，在 19 世纪下半叶经济腾飞、资本主义开始扩展时，法国的投资往往偏重国外，往往向殖民地发展（利齐斯的指责确实合情合理）。总之，我觉得倔强的法国对资本主义模式似乎缺少必要的热情，对追逐利润似乎并不起劲，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也就转不起来。法国没有真正被资本主义所征服，这同时是法兰西的迷人之处和不幸之处。之所以迷人，因为它的生活方式将有别于许多其他民族。之所以不幸，它将意识不到自己的财富和可能性，因而在世界列强的相互竞争中，它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不够充分，这无疑是个事实。但同时，法国又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无疑也是个事实。塞巴斯蒂安·迈尔西埃历来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写作才华和很强现实感的记者，但他有时也进行思考。我这里仅引证他在大革命几年后所说的一段话。他的文章标题便是《资本家》。他写道：“平民没有钱了，这是件大坏事。人们利用伤天害理的轮盘赌和一再诱人入彀的公债券把百姓的腰包掏得一干二净。而资本家及其同伙的口袋却满满地装着至少 6 亿巨款。他们就靠这笔钱无休止地与王国的公民作对。他们串通起来，勒紧腰包，不让这笔钱重新进入流通。尽管成了一笔死钱，它却还能招来别的财富，而且横行霸道地压倒任何竞争对手。他对农业、工业、商业乃至艺术从不问津，却一味从事证券投机，通过制造假象和策划阴谋，危害人民，践踏国家。过五、六年后，

所有的钱都会被资本家巧取豪夺，转到他们的手里。他们为鲸吞不属于他们的所有钱财而互相帮助。”⁶⁶¹

总 结 论

在这第一部分的三卷书里，我试图反复衡量法国历史的某些基本实在：地域、人口、经济等。

我在叙述过程中常对自己说，归根到底，当我作结论的时候我将不可能再填补缺漏，甚至不可能对某些阐述的不确切之处进行纠正。在撰写结论的时候，往往也是人们后悔、怀疑和缺少把握的时候。但我在写这篇结论时，却发现自己对观察所得的形象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更改，至多在某些问题上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因此，这里并不是再从反面去进行论证，而是对长篇的阐述作个简单的概括。这至少有一个好处：简明扼要。

多样性和单一性

法兰西确实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持续的，根深蒂固的。沃邦已谈到“组成王国的所有省份各具地方特色”¹。米希莱、吕西安·费弗尔以及许多其他人也都指出，正是这种多样性导致了对抗、分离和不统一。法国人乐于把这种千差万别的异质性视为他们的国家举世无双的一大特点，这个判断可能是错的，但为什么会有千差万别的异质性呢？我于1982年在哥丁根大学演讲时坦然指出，法国的这种多样性是绝无仅有的，这就证明如果不是感情用事，人们很容易就人云亦云，迎合本国同胞近乎天真的先入之见。当讨论开始后，我的听众立即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声称，德意志也具有多样性，并摆出了证据。我对此完全同意。更何况，意大

利、西班牙、波兰、英国也都具有多样性。因此,如果要设法说明多样性的缘由,就应走出六边形的国土,尽管多样性在各国有着程度的不同。

无论在法国国内或者国外,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史前时期的一些小型人类群体占据了某一块地域,这块地域可能具有多样性,也可能不具有多样性,但我们宁可认定它属于前者,因为差异越大,资源也越丰富。然后,这块地域又适应群体的人数、工具和迁移的可能性而形成独特的个性,随着农业的诞生,群体放弃了游荡生活,实行了定居,但仍在住房和田园之间往返。群体的定居和适应环境使人的居住条件在几个世纪期间固定下来,因为住房不会完全改变其原始的模式。树木也是一样,在扎根以后,便长期不再更换地点。

根据以上似乎真实可信的解释,经济便是决定地域划分的第一要素,因为地域最初是遵循屠能阐述的规律划分的。

此外,这些原始的群体和地域并不完全对外封闭。逼仄的乡土历来都与外界有所联系。无论如何,外来者对这块乡土虎视眈眈,即使当地人不去外地旅行,他们也不得不开放门户,哪怕只是一条缝隙。单用自然因素解释多样性的产生应予放弃,自然景观仅是舞台的布景。经济因素又一次在这里起作用,因为任何群体不能闭关自守,因为多样性呼唤着别的多样性,正如正电吸引负电一样。以上情形可在组织尚不健全的交换网中看得一清二楚,具体地说,当村庄—集镇—城市的连锁体系尚未完全形成时,例如在19世纪的波旁地区西部或沃莱山区,由于经济落后,人们仍靠一些往往不在城市举行的交易会实现群体的凝聚。这些交易会不是预作准备的专门场所,“就在露天里把吵吵嚷嚷的人群聚集起来,进行历时几天的交换”,这种“极其古老的形式,在尚处传统的农民经济阶段的中央高原南部(鲁埃格、热沃唐、上维瓦赖等偏僻地区),至今仍可

见到”²²。根据这些在过去原是随处可见的事实,我是否有权得出应有的结论呢?一些结合松散的群体为补充交换的不足,便采取交易会这个爆炸性的形式。经济对自己的权利可见当仁不让。

经济当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但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人际关系和互帮互助也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农民赶集或进城,也是他出外散心,暂时摆脱过于孤独的生活的机会。他借此去赶热闹,找人聊天,打听消息,在小酒馆里与相遇的朋友碰杯。可惜的是,人际交往不像经济束缚那样留下容易被人发现的痕迹。这种交际是不太引人注目的。据我看,人与人的交往在分散的村落比在大村庄更加明显,这种交往在相距甚远的房屋之间和村落之间至少比别处更加活跃和更有必要。法兰西的统一性正是肇始于这些基本的联系,正是在这些联系中,人最终确认自己是社会的动物。但是,社会的动物并不一定要求蜂巢和蚁穴那种极权主义的统治。人走到半路,就停止了下來。

世界是个不容忘却的干扰因素

在“地理是否创造了法兰西?”这一章里,我在讲述了1707年土伦围城战以后便就此搁笔。难道这是不可逾越的一块军事界石?当然不是,法国的势力既远届海外,又深入欧洲大陆。我在边界停下,正是为了突出边界的重要。边界对法国国内的历史具有决定意义。但边界不但面向国内,而且也面向国外。

继许多其他人之后,我匆匆确认,法国的海上扩张并不成功,法国没有取得海上霸权,即世界的权杖。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肯定还要用很多篇幅重新谈论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我可以并应该立即指出位于边界之外的欧洲对法国施加的重压,欧洲塑造着法兰西的命运,仿佛雕塑家正用他的拇指把一块泥塑造成他的作品。在法国的国内,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存在,世界的存在。

从恺撒时代(甚至在这之前)到公元五世纪的大规模蛮族入侵,法兰西的历史曾是地中海历史的一部分。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事,即使距离很远,也影响着法兰西自身的生活。但在后来(意大利战争属于例外,这里故且不谈),法国的所作所为主要面对中欧和东欧。在浮想联翩的旅行生活中,我承认仿佛梦见过这样一个欧洲,它从索姆河、默兹河或莱茵河两岸开始,一直深入到西伯利亚和遥远的亚洲……我尤其还想到,从莱茵河到波兰,我常常发现那里的自然景观竟与我在童年时代所见的洛林地区基本相同:密集的村庄,开阔的田野,实行三季轮作制的麦地。从飞机上鸟瞰波兰,但见狭长的田块像锥子一般钻进茂密的林区。这些深刻的印象反复展现在我的记忆之中。

如果能用一个形象表现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我愿意把法国画成一个圆圈,巴黎位于圆的中心。从几何学的角度看,这肯定是极其荒唐的:真正的中心布尔日只是在查理七世时代一度具有历史价值。在圆的周边上,除马赛、波尔多、拉罗歇尔、南特、圣马洛、鲁昂、敦刻尔克等大港口外,还有里尔、斯特拉斯堡、里昂等地处内陆的边境城市。所有这些城市一半与法国内地相联系,另一半又受到外部的吸引。内外的影响始终形成鲜明对照。关于西班牙的边沿区和内陆区,人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说到过。除此以外,能不能说还存在先倒向外部,后倒向内部这样一种平衡运动呢?在法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8世纪,达让松侯爵却认为法国的内陆还是一片空白,这也许因为法国经济朝边沿区的扩展当时过于急促。

无论如何,上述表象立即被经济世界的表象所否定,因为在经济世界中,边沿区总是代表着落后、贫困和被剥削。这就需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设法调和两种表象之间的矛盾。任何合理的人类共同体难道不都注定要对其边沿部分施加影响,以便在世界秩序中占一席之地?正是依靠边沿地区,国内和国外方才连成一片。

关于这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将留待本书最后一章《法兰西在国外》再作考察。只是在反复地深入研究了法兰西自身的情形以后,再开始真正的周游世界,我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

但这里有必要提前说明,边界并不等于是篱笆。否则,法国在世界的影响就不会如此之广,法国经受的苦难也不会如此深重。

法国农民经济的剧变

据我看,这在昨天的法国,特别在今天的法国,是个最突出的现象。当然,在工业方面,在城市里,在运输业以及在科技界,也曾发生过其他的变革。我们还知道,明天的工业将不同于今天,工业的变革还将继续下去。

我之所以着眼于法国的农村,因为除非出现诸如石油危机之类的意外事件,法国的农村很可能将停留于现有的水平,保持已达到的平衡。此外,这种平衡状态需要人们解释其产生的原因;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但一旦作出正确的解释,法国的其他变革也将部分地但又恰当地得到说明。

我曾不厌其烦地指出,古老的、以农立国的法兰西,即表现为集镇、村庄、村落、分散的住所的法兰西,在长时期中曾基本保持原来的状态,至少直到1914年为止,甚至可能直到1945年为止。在1945年以后,它成了“光荣的三十年”的牺牲品,法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的70年代,当经济再次出现腾飞时,它无疑将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建设性和破坏性。

且不说1945年以前,就在更早的1914年以前,法国农村毕竟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曾指出,在耕地面积、农业产量、耕作技术和肥料使用等方面,法国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进步;至少,从1822年开始,有铁犁的改良,后来又有脱粒机、收割机、割捆机等许多农业机械的出现。

另一项变化意义更加深远：在 20 世纪初期，一部分无业盲流以及铤而走险之徒已被社会所吸收。那时候，城市的召唤使乡村逐渐摆脱了人浮于事这个至今不可治愈的伤口。最穷苦的地区自然比其他地区更晚得到解脱。据涅夫勒省议会于 1907 年³ 揭露，“盲流在大路上不绝于途，他们以明抢暗偷为生，恐吓乡村居民，在城市经常制造事端”，而且还随身传播传染病的病菌。同样，在热沃唐这个贫困地区，司法诉讼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介绍有关流浪汉的偷盗和暴力行径的详细情形，“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离开洛泽尔省，于 1910 年前后在城市定居”⁴。

在法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还必须加上大地产的发展这一项；早在 1789 年前，法国业已存在着大地产，例如在巴黎四郊，大地产的发展反映着资本主义活动已开始进入我国的乡村。

所有这些冲击逐渐把古老的农民经济推向灾难。我以为，最关键的冲击还是拖拉机的使用（因为这是最后的冲击之一，当然还由于别的原因），这种可移动的马达能够牵引最新式的轮犁，庞大的联合收割机（几乎是一座活动的工厂），以及满载着事先已经压成方块形的饲草或麦秸的拖车。土地兼并之所以成为可能，农户的经营规模之所以得到扩大，这无疑有赖于拖拉机的使用。否则，今天已成为农业风貌重要特征的大块土地怎么可能耕得过采？除非像 1933 年前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垦殖主那样，在大片土地上调动成群的牲畜同时作业，并肩和交叉进行犁耕。但是，就在那时候，拖拉机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开始使用，甚至在夜晚亮着车灯前进。拖拉机当时在法国本土的发展反而没有那么快。只是在 1945 年以后，整个情形才迅速变化。牛马套犁往往完全见不到了。当我于 1980 年最后一次回默兹省的家乡时，村里只剩下一匹马，已经退役，在我的一位老邻居家里养着。交换的急剧发展使原来得天独厚的地区变得条件更加优越，而使最贫穷的地区沦为真空地带。人烟

稀少的真空地带在法国自动扩大，留下了野猪出没、荆棘丛生的荒野。

关于法国 1945 年后翻天覆地的剧变，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始终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农民蒙受了多种形式的打击，人们不难看到这个事实。

我这里所注意的和感兴趣的却是这个问题的反面。为什么这一剧变如此姗姗来迟？这显然与整个经济状况有关。法国农民曾长期为法国过多的人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这难道不也是一个事实吗？离塞雷不远的阿斯颇勒山如今又变成了一片荒野，空旷、贫瘠的土地促使荆棘、染料木和欧石南漫山遍野地生长。阿德里埃纳·卡泽伊 1985 年 1 月 20 日写信告诉我说：“以往的生活建立在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市场交换的比重很小，而且多系以物易物，很少与外界进行贸易，这种供求平衡在 1950 年已被彻底打破”。当地居民抛下一切，远离家乡，就像在战争时期慌忙撤出不再能守住的阵地一样。在阿斯颇勒的山村，生活确实贫寒和艰苦，但并不悲惨，贫寒和悲惨决不是一回事。我的一位朋友是农民的儿子，生于 1899 年，他曾对我说过一句既风趣又巧妙的话：“除了钱以外，我们什么都不缺”。

我以为历史学家对同情农民的习惯看得过于严重。他们也许过分迎合了悲天悯人的倾向，尽管他们出于诚心诚意。

这种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平衡现象虽然比比皆是，但可靠的见证并不很多。我曾一再征询我的同龄人提供见证，至少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他们所见的法国不同于当今的法国。如果你出身于雷蒙·普恩加莱时代的某个农民家庭，你大概会觉得生活苦不堪言。农田劳动十分艰辛，而且没完没了，尽管表面上自由自在；人们有选择的余地，但所有的活计都很累人。然而，人们照常生活，毫无埋怨；没有自来水，必须去水井或公共水池边取水，这是件苦差事；夜

间照明不足(没有电);衣着简陋,很少替换;没有城里人的舒适条件和娱乐活动。农民精心种植菜园,在大田推广土豆,在家里贮存水果和蔬菜,星期天去肉铺买肉,另有自己喂养的猪宰杀后在当地消费,全靠这一切,人人都能吃饱肚皮。我童年时的观察是否具有见证的价值?让·帕蒂对1914年前勃艮第山区的回忆是否具有见证价值?原塞雷市长和东比利牛斯省议会议长米歇尔·萨日洛利是否可以充当见证?还有那位哲学教授,他对洛林的见闻是否也能说明问题?

我们可让问题留待今后讨论。在掌握更充分的材料以前,我相信旧时代的法国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一个自然条件还算优越的国家里,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面对旧时代的法国农民,我确实没有理由流露悲天悯人的感情,因为回过头来再看,维持这些旧平衡在当时只可能是明智的和合情合理的办法。相反,今天朝着技术进步和移风易俗方向发展的农业却不一定都很合理。农业虽然抛弃了坏地,只耕种好地,但其产量仍与以往一样,各地有着很大的差别。我十分喜欢阅读记实小说,这些作品对我们讲述的农村情况(例如,艾米利·卡勒的《野菜汤》把我们带到阿尔卑斯山的莫列纳河谷,克洛德·库尔歇的《重返马拉韦伊》)不见得十分准确,难以充当不偏不倚的见证。但是,应该承认,其中有几句话确实打动了,使我觉得与实际丝毫不差:“那时候,你独自从事生产,日子还过得下去。现在,每月都有分期付款单给你寄来。一有了开头,想停就再也停不下来。全部帐单刚刚付清,拖拉机成了一堆废铁。你到头来是为农业信贷银行干活。”我把这话再作引申:早先你为领主干活,后来你为地主干活,如今你为国家和银行干活。克洛德·库尔歇又说:“银行生意兴隆,到处开设分支机构……万变不离其宗:土地从不给种地的人带来任何利益”。在今天的法国,也许并不是一切都新。

长时段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即将结束时，但愿读者对长时段历史的专门用语已经习惯。历史深层的运动决定着法兰西各历史时期的前进速度和发展方向，借助长时段来考察历史的深层还真是个好办法，《法兰西的特性》的第二部分将遵循这个方向，在国家、文化、社会、对外关系等方面，寻找并发现地下的暗流。

关于“长时段”的含义，有许多现成的形象可为我们提供解释。我们最好还是躲开形象的解释，但它们却偏偏紧跟不舍。甚至电视也在展现这样的画面：扎伊尔河汹涌澎湃，急水横流，探险家不顾一切，潜水深入河底……够了，我们且不谈历史深层的“暗流”。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几乎一平如镜的，可得舟楫之利的辽阔水面。河水像“百年经济周期”那样缓慢流逝，但又势不可挡地带动一切前进；我们平民百姓犹如驾着一叶轻舟，而为历史掌舵的大人物乘坐的则是艨艟巨舰。所以说，在历史的缓慢行进中，势必存在着连续、持久和反复，我们不难预料，未来的历史也将始终如此，几乎与过去相同。

历史当然也有断裂和剧变，但无论如何也从不把整个历史一刀切成两段。因此，长时段的历史不是判断而是衡量和说明任何命运的一项参数。如果我没有搞错，它能使我们区分主要和次要，掂出法兰西的分量，领会法兰西的历史，进而了解法兰西的特性可能是什么。总之，它把所有的旧问题同时重新提出，长时段的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开始，今后还将顺着平缓的斜坡长期发展下去。因此，在长时段历史中，人的自由和责任具有局限性。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除责任。

编辑后记

本书的部分注释遇到了一些麻烦。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写作时几乎完全以卡片为依据，上面往往扼要地记着参考书作者的姓氏(有时用首写字母或特殊记号代替)和页码。这套代用符号只有他个人完全明白。为了避免延误本书的出版，我们决定让一些注释留下空缺，以便在再版时补齐。

我们对与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期共事的安妮·杜歇纳、玛丽-泰雷兹·拉比涅特和若齐阿纳·奥夏谨致谢意，他们耐心地从事了注释的整理工作。

注 释

第 三 章

1. Daniel THORNER, "L'économie paysanne. Concept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in: *Annales E. S. C.*, mai-juin 1964, n°3, pp. 417—432.
2. Louis CHEVALIER, *Les Paysans, étude d'histoire et d'économie rurale*, 1947, pp. 223—224.
3. D. THORNER, art. cit., p. 418.
4. Frédéric LULLIN DE CHATEAUVIEUX, *Voyages agronomiques en France*, 1843, I, pp. 40 sq.
5. Maurice PARODI, *L'Economie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puis 1945*, 1981, p. 81.
6. Daniel HALEVY, *Visites aux paysans du Centre (1903—1934)*, 1935, rééd. au "Livre de poche", 1978.
7. G. VALRAN, *Misère et charité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 1899, p. 29.
8. Jacques LAFFITTE, cité par S. CHARLETY, *La Restauration*, 1921, in: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IV, p. 307.
9. Jacques LAFFITTE, *Réflexions sur la réduction de la rente et sur l'état du crédit*, 1824, p. 6.
10. A. N., F²⁰130.
11. Alain CORBIN, *Archai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1975, I, p. 58 note 31: "Car (en 1866) les gens de la campagne ignorent l'usage des fosses d'aisance."
12. Michel-Christophe KIENER, Jean-Claude PEYRONNET, *Quand Turgot régnait en Limousin; un tremplin vers le pouvoir*, 1979, p. 32.
13. C'est-à-dire labourer superficiellement.
14. Paul DUFOURNET, *Une communauté agraire secrète et organise son territoire à Bassy (Haute Savoie)* 1975, p. 551.
15. Anne-Marie BRISEBARRE, *Bergers des Cévennes. Histoire et ethnographie du monde pastoral et de la transhumance en Cévennes*, 1978, p. 26.

16. volume I, chapitre II.
17. Robert FOSSIER, *Le Moyen Age, II: L'Éveil de l'Europe*, 1982, p. 292.
18.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égion mâconnaise*, 1971, p. 362.
19. Jean SCHNEIDER, "Problèmes urbains dans la France médiévale", in: *Actes du 100^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1977, p. 139.
20. Jean-Pierre POLY, *La Provence et la société féodale, 879-1166*, 1976, pp. 226-227.
21. Nom vulgaire du kermès, variété de cochenille qui vit sur les chênes verts du Midi.
22. J. -P. POLY, *op. cit.*, p. 231.
23. Hektor AMMANN, "Deutschland und die Tuchindustrie Nordwest-Europas im Mittelalter", in: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1954, p. 8.
24. J. -P. POLY, *op. cit.*, pp. 233-237 et 248-249
25. G. DUBY, *op. cit.*, p. 53.
26. *Ibid.*, p. 50.
27. *Ibid.*, pp. 46-47.
28. *Ibid.*, p. 93.
29. *Ibid.*, p. 48.
30. *Ibid.*, p. 264-266.
31. *Ibid.*, pp. 275 sq.
32. *Ibid.*, pp. 309-310.
33. *Ibid.*, p. 316.
34. André CHEDEVILLE, *Chartres et ses campagnes, XI^e - XIII^e siècles*, 1973, p. 434.
35. Nicolas de LAMARE, *Traité de la police...*, II, 1710, p. 727.
36. R. FOSSIER, *op. cit.*, II, p. 285.
37. Anne LOMBARD-JOURDAN, "Les foires aux origines des villes", in: *Francia, Forschungen zur We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 X, 1983, p. 483. Cette liste est tirée du cartulaire de Saint-Aubin d'Angers. p. 483. Cette liste est tirée du cartulaire de Saint-Aubin d'Angers.
38. François-P. GAY, *La Champagne du Berry*, 1967, p. 50.
39. Guy DEVAILLY, *Le Berry du X^e au milieu du XIII^e siècle*, 1973, p. 197.
40. *Ibid.*, p. 553.
41. N. de LAMARE, *op. cit.*, I, p. 539. Défense du Prévot de Paris de nourrir pigeons, oisons, lapins et porcs dans la ville de Paris, 4 avril 1502.

42. Elie BRACKENHOFFER, *Voyage en France 1643—1644*, éd. de 1925, p. 110.
43. Jean PITIÉ, *Exode rural et migrations intérieures en France. L'exemple de la Vienne et du Poitou-Charentes*, 1971, p. 672.
44. A. N. , Y 10558 A.
45. A. CORBIN, *op. cit.* , I. , p. 69.
46. A. LOMBARD-JOURDAN, *art. cit.* , p. 441. Les Syri ou marchands levantins apportaient en Occident, jusque vers la fin du VI^e siècle, les denrées précieuses en provenance de l'Orient.
47. Jacques MULLIEZ, "Du blé, 'mal nécessaire'. Réflexions sur les progrès de l'agriculture de 1750 à 1850",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XVI, janvier-mars 1979, p. 8.
48. Ainsi, pour notre vaste Midi, Charles HIGOUNET, "Sources et problématique de l'histoire des campagnes", *in: Actes du 100^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1979, pp. 181 sq.
49. Oswald SPENGLER, *L'Homme et la technique*, 1958, p. 90.
50. François JACOB, *La Logique du vivant. Une histoire de l'hérédité*, 1970, p. 261.
51. Karl MARX, *Economie et philosophie (manuscrit sparisiens) (1844)*, *in: Oeuvres*, II, Bibl. de la Pléiade, 1968, p. 62.
52. Maurice GODELIER, *L'Ideel et le matériel. Pensée, économies, sociétés*, 1984, pp. 9 sq.
53. MALOUET, *Mémoires*, I, 1868, p. 111.
54. Paul DUFOURNET, *Pour une archéologie du paysage. Une communauté agraire secrète et organise son territoire*, édition de sa thèse de 1975, 1978, p. 9.
55. Jean GEORGELIN, *Ven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1978, p. 14.
56. A. N. , F²⁰561, Dordogne.
57. André BOUTON, *Le Main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VII^e et XVI^e siècles. L'administration de l'Ancien Régime. Ses classes sociales, ses misérables*, 1962, p. 495; Alain MOLINIER, *Stagnations et croissance. Le Vivarai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85, p. 33.
58. A. N. , F¹⁰242, Aveyron, 1796.
59. *Gazette de France*, 12 octobre 1772, p. 378.
60. *Ibid.* , 16 janvier 1649, p. 60.
61. *Ibid.* , 21 janvier 1651, p. 135.

62. A. N. ,G⁷521, Tours, 30 juin 1693.
63. A. N. ,F²³, 560. *Tableau des pertes causées dans chaque département par les inondations, grêles, incendies, épizooties. . . de 1807 à 1810 et 1814 à 1819*. Un tableau analogue, pour les années 1826—1835, pas tout à fait comparable parce qu'il inclut les gelées dans la liste, donne des chiffres beaucoup plus élevés (plus de trois fois), mais avec le même classement (grêle et incendies en tête), *ibid.*
64. *Voyage d'Angleterre, d'Hollande et de Flandre fait en l'année 1728*,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86 NN2, fol. 4.
65. *Histoire de la Champagn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CRUBELLIER, 1975, p. 204.
66. René CHAPUIS, *Une vallée franc-comtoise, la Haute-Loue. E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1958, pp. 16—17.
67. A. N. ,H 1517, 222—227.
68. Charles DUPIN, *Le Petit Producteur français*, III, 1827, pp. 1—2.
69. Léonce de LAVERGNE, *E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1877, p. 39.
70. J. PITTE, *op. cit.*, p. 672
71. Joseph ANCILLON, *Recueil journalier de ce qui s'est passé de plus mémorable dans la cite de Mets, pays messin et aux environs, de 1675 à 1684*, 1866, p. 13.
72. A. N. ,G⁷293, Montpellier, 16 avril 1679. Il s'agit du père du chancelier d'Aguesseau.
73. Stockalper Archiv, Brigue, Sch. 31, n°2998.
74. A. N. ,F¹⁰226, 1792.
75. Philippe ARBOS, *La Vie pastorale dans les Alpes françaises. E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1923, p. 234.
76. André PIOGER, *Le Fertoi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73, p. 17.
77. M. DARLUC, *Histoire naturelle de la Provence*, I, 1782, pp. 129—130.
78. Se dit en Provence des habitants de la région de Gap et, plus généralement, des montagnards des Alpes.
79. A. N. F¹⁰V(1)Hérault, Séance du Conseil général du département, session de l'agriculture, an XII.
80. *Journal de Nicolas de Baye, greffier au Parlement de Paris, 1400—1417*, p. p. A. Tuetey, 1885, I, p. 211, 17 janvier 1408.

81. Charles CARRIÈRE,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au XVIII^e siècle*, I, 1973, p. 108.
82. *Histoire de Marseill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douard BARATIER, 1973, p. 151.
83. Robert TRIGER, *Observations agricoles et météorologiques sur les années remarquables de 1544 à 1789 dans la province du Maine...*, 1881, p. 4.
84. *Journal de Simon Le Marchand, bourgeois de Caen, 1610—1693*, p. p. Gabriel VANEL, 1903, p. 166.
85. Claude HARMELLE, *Les Piquès de l'aigle. Saint-Antonin et sa région (1850—1940), révolution des transports et changement social*, 1982, p. 46.
86. A. N., F^{1c} III Bouches-du-Rhône 7.
87. A. N., F^{1c} III Aube 4, 19 novembre 1853.
88. A. N., F^{1c} III Ardennes 6, 27 février 1854.
89. Jehan RICTUS, *Les Soliloques du pauvre*, éd. 1971, p. 9.
90. D'après la formule de l'Assemblée Provinciale de l'Île-de-France, 1787, p. 245.
91. Pierre-André SIGALAS, *La Vie à Grasse en 1650*, 1964, p. 86.
92. Antoine Laurent de LAVOISIER, *De la richesse territoriale du royaume de France*, in: *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XIV, 1847, éd. 1966, p. 595.
93. A. CORBIN, *op. cit.*, I, p. 67.
94. Thomas MORE, *L'Utopie, Discours du très excellent homme Raphaël Aythloday sur la meilleure constitution d'une république*, éd. de 1966, pp. 81—82.
95. Richard de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1755, pp. 97—98.
96. MESSANCE,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1788, p. 85.
97. Léonce de LAVERGNE, *E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1860, p. 75.
98. Jules-Marie RICHARD, *La Vie privée dans une province de l'Ouest. Laval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22, p. 5.
99. Elie BRACKENHOFFER, *Voyage en France, 1643—1644*, éd. de 1925, p. 111.
100. A. N., F¹⁰295, 141, et H 1517, 207—211.

101. N. de LAMARE, *Traité de la police, op. cit.*, I, p. 569, éd. du 12 décembre 1697.
102. François JULIEN-LABRUYÈRE, *Paysans charentais.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Aunis, Saintonge et bas Angoumois. I: Economie rurale*, 1982, p. 218 note 1.
103. *Ibid.*, p. 269 et note 18.
104. P. G. POINSOT, *L'Ami des cultivateurs*, 1806, II, pp. 39—41.
105. A. BOUTON, *op. cit.*, pp. 497—498.
106. P. ARBOS, *op. cit.*, p. 196.
107. *Ibid.*, p. 174.
108. André GERDEAUX, "Evolution de l'agriculture et métamorphoses des paysages de la Champagne châlonnaise", in: *châlons, 2000 ans d'histoire, mélanges d'histoire, de géographie, d'art et de traditions*, 1980, p. 243.
109. P. ARBOS, *op. cit.*, p. 173.
110. A. N., F¹⁰212 AB.
111. Pendant la Révolution, les réserves de chasse étant supprimées, il y a eu forte diminution du gibier.
112. Alfred LEROUX, *Le Massif Central. Histoire d'une région de la France*, 1898, II, p. 45; Alain MOLINIER, *Stagnations et croissance...*, *op. cit.*, pp. 179—180; P. ARBOS, *op. cit.*, pp. 172—173.
113. Jean-François SOULET,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Pyrénées sous l'Ancien Régime, du XVI^e siècle au XVIII^e siècle*, 1974, pp. 84—85.
114. A. BOUTON, *op. cit.*, p. 502.
115. *Ibid.*, p. 501.
116. *Ibid.*, p. 502.
117.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94.
118. A. N., F²⁰561
119. A. N., H 1462, imprimé, 1785, p. 3.
120. Roger BRUNET, *Les Campagnes toulousaines. Etude géographique*, 1965, p. 163.
121. Pierre DEFFONTAINES, *Les Hommes et leurs travaux dans Les pays de La Moyenne-Garonne (Agenais-Bas-Queray)*, 1932, p. 220.
122. Gustave HEUZÉ, *La France agricole, Région du Sud ou région de l'olivier*, 1868, p. 91.
123. J. PITIÉ, *op. cit.*, p. 307.

124. L. de LAVERGNE, *op. cit.*, p. 387; Robert LAURENT, *Les Vignerons de la «Coted'Or» au XIX^e siècle*, 1958, p. 177.
125. Michel AUBRUN, «La terre et les hommes d'une paroisse marchoise. Essai d'histoire régressive», in: *Etudes rurales*, janv. -sept. 1983, p. 252.
126. F. JULIEN-LABRUYÈRE, *op. cit.*, I, p. 224.
127. Pierre VALMARY, *Familles paysannes au XVIII^e siècle en Bas-Quercy. Etude démographique*, 1965, pp. 15-17.
128. *Réflexions d'un citoyen-propriétaire sur l'étendue de la contribution foncière et sa proportion avec le produit net territorial, converti en argent*, 1792, p. 8; A. de LAVOISIER -*op. cit.*
129.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INSEE*, 58^e volume, 1951, p. 119.
130. Jean-Claude TOUTAIN,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00 à 1959*, in: *Cahiers de l'ISEA*, 1963, pp. 54-55.
131. Au XVIII^e siècle, dans l'élection picarde de Clermont, cultures à bras: 1850 arpents; labours: 76665; Albéric de CALONNE, *La Vie agricole sous l'Ancien Régime en Picardie et en Artois*, 1883, p. 261.
132. Les bouillies, base de l'alimentation dans les Pyrénées ariégeoises; Les châtaignes, dans le Limousin et le Gévaudan.
133. Louis-René NOUGIER, *Géographie humaine préhistorique*, préface de Pierre DEFFONTAINES, 1959, p. 8
134. Marc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I, 1952, p. 24.
135. A. N., F¹⁰2211.
136. Isaac de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1771, p. 12.
137. L'Angleterre en effet, à partir de 1689, a encouragé les exportations par des primes (*bounties*) Cf.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1969, p. 71.
138. Jean CHAPELOT, Robert FOSSIER, *Le Village et la maison au Moyen Age*, 1980, p. 147.
139. Jean-Claude TOUTAIN, *Le Produit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de 1700 à 1958. I. Estimation du produit au XIX^e siècle*, in: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ir. J. MARCZEWSKI, *Cahiers de l'ISEA*, série AF, n^o1, juillet 1961, p. 23.
140. Georges d'AVENEL,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des salaires, des denrées et de tous les prix en général depuis l'an 1200 jusqu'en*

- l'an 1800*, I, 1894, p. 268.
141. L. de LAVERGNE, *op. cit.*, pp. 402—403.
142. Marc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1, 1952, p. 22.
143. J. MULLIEZ, «Du blé, "mal nécessaire"», art. cit., pp. 3—47.
144. Ainsi autour de Prades, en 1859, «on arrose ordinairement trois fois le blé, froment et seigle, savoir à l'époque de la floraison, à celle de la grenaison et au commencement du mois de juin afin que la terre puisse conserver une humidité suffisante jusqu'à la parfaite maturité du grain. Il est des années où il faut arroser 4 et même 5 fois...» (Rapport du sous-préfet de Prades, A. N., F¹⁰ III Pyrénées-Orientales 8, in: *Documents d'histoire économique 1800 — 1914*, Service éducatif d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s Pyrénées-Orientales, 1974, p. 10).
145. L. de LAVERGNE, *op. cit.*, p. 139
146. *Ibid.*, p. 50.
147. 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LEBERT,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1697, rééd. 1966, pp. 253 et 254.
148. G. d'AVENEL,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op. cit.*, 1894—1912, 6 volumes.
149. *Ibid.*, I, p. 406.
150. *Ibid.*, I, pp. 394 et 405—407.
151. *Ibid.*, I, p. 275.
152. Moscou, A. E. A., 84/2. 418. p. 7v°.
153. Henrich STRODS, *Die Einschränkung der Wolfsplage und die Viehzucht Lettlands*, 1970, pp. 126—131.
154. G. d'AVENEL, *op. cit.*, I, p. 273.
155. L. de LAVERGNE, *op. cit.*, p. 350.
156. A. N., F¹¹ 2740.
157. F. JULIEN-LABRUYERE, *op. cit.*, I, p. 479, En termes de chasse, les bêtes de pelage fauve (lièvres, cerfs, daims, etc.) par opposition aux bêtes noires (loups, sangliers).
158. Les limites des propriétés forestières étaient marquées d'ordinaire par un fossé, souvent reconnaissable aujourd'hui encore.
159. André MATEU, *Un village gascon au temps de Louis XIV Fals-en-Bruilhois ou la chronique de l'abbé Laplaigne*, 1978, p. 10 note 16.
160. L. de LAVERGNE, *op. cit.*, p. 85.

161. *Ibid.*, p. 75.
162. J. -J. MENURET, *Mémoire sur la culture des jachères*, 1791, p. 28.
163. R. CHAPUIS, *op. cit.*, p. 65.
164. Joseph CRESSOT, *Le Pain au lièvre*, 1973, p. 65.
165. Michel COINTAT, *Tresques en Languedoc ou l'histoire vivante dans le Midi*, 1980, p. 263.
166. A. N., H 1518. Culture des gros navets.
167. Classe de plantes comprenant des herbes annuelles ou vivaces et des arbrisseaux (oseille, persicaire, renouée, rhubarbe, sarrasin...).
168. J. -J. MENURET, *op. cit.*, pp. 18—19.
169. Michel CHEVALIER, *La Vie humaine dans les Pyrénées ariégeoises*, 1956, p. 217.
170.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I, 1966, p. 71.
171. F. JULIEN-LABRUYÈRE, *op. cit.*, I, p. 302.
172. J. -J. MENURET, *op. cit.*, pp. 28—29.
173. R. M. HARTWE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971, p. 127.
174. Ernest KAHANE, *Parmentier ou la dignité de la pomme de terre. Essay sur la famine*, 1978, pp. 38—41.
175.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141.
176. E. KAHANE, *op. cit.*, pp. 52—53.
177. *Ibid.*, pp. 67, 73—75, 84, 91.
178. *Ibid.*, p. 74.
179. A. N., F¹⁰242, 29 vendémiaire an IV.
180. Claude CHEREAU, *Huillé, une paroisse rurale angevine de 1500 à 1836*, 1970, p. 120.
181. J. -J. MENURET, *op. cit.*, pp. 21—22.
182. Guy THUILLIER, *Aspects de l'économie nivernaise au XIX^e siècle*, p. 17.
183. Margoter ou marcotter; multiplier une plante en isolant une tige aérienne qui a été préalablement mise en contact avec le sol et qui y a pris racine.
184. A. N., F¹⁰210, Libreville, 30 frimaire an III.
185. "La jachère ou guéret (ou encore : versaine, sombre, somart, cultivage, estivade, cotive, etc)...", François SIGAUT, "Pour une cartographie des assolement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in: *Annales E. S. C.*

- 3, 1976, p. 633.
186. G. THULLIER, *op. cit.*, pp. 52—53.
187. André DELEAGE, *La Vie rurale en Bourgogne jusqu'au début du XI^e siècle*, 1941, I, p. 188.
188. 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1960, p. 169 note 81.
189. A. N. , H 1514, Alfort, Maisons et Créteil, 14 juin 1786.
190. Cité par J. MULLIEZ, art. cit. , p. 7.
191. Jean Antoine Claude CHAPTAL, *Chimie appliquée à l'agriculture*, 1823, I, p. XLVI.
192. *Histoire des faits économiques jusqu'au XVIII^e siècle*, dir. par Robert BESNIER, n^o 502, 1963—1964, p. 42.
193. *Ibid.* , 1962—1963, pp. 63 sq.
194. F. JULIEN-LABRUYERE, *op. cit.* , I, p. 202.
195. A. N. , H 1515, n^o 60.
196. Ernest LABROUSSE, “L'expansion agricole: la montée de la production”,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dir. par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II, 1970, pp. 435—436.
197. A. N. H 1514, Alfort, Maisons et Créteil.
198. Déroyer ou desroyer; mettre en désordre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u XVI^e siècle*).
199. E. LABROUSS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 op. cit.* , II, pp. 436—437.
200. M. BLOCH, *op. cit.* , p. 215.
201. Pour la Basse-Auvergne, sur “l'incompatibilité de la vaine pâture et de la prairie artificielle”, Abel POITRINEAU, *La Vie rurale en Basse-Auvergne au XVIII^e siècle*, 1965, pp. 243 sq.
202. A. N. , H 1514.
203. *Procès-verbal de l'Assemblée Provinciale de l'Isle-de-France*, séance du 15 décembre 1787, p. 370.
204. A. N. , F¹⁰1576, 22 avril 1836.
205. A. N. , F¹⁰ III Meuse 11, 25 juillet 1861.
206. L. de LAVERGNE, *op. cit.* , pp. 10—111.
207. Pierre BARRAL, in: “Le monde agrico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dir. par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IV, 1979, pp. 359—360.

208. E.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op. cit.* I, p. 71.
209. *Ibid.*, p. 59.
210. "En 1700, les intendants s'accordent à reconnaître que les provinces ne cultivent que le blé nécessaire à leur consommation", J. -C. TOUTAIN, *op. cit.*, I, p. 4, note 5.
211. Chef-lieu de canton du Nord, à 19 km de Valenciennes.
212. Arthur YOUNG, *Voyages en France, 1787, 1788, 1789*. II. *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agriculture,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1976, pp. 549—550.
213. L. de LAVERGNE, *op. cit.*, pp. 73 sq.
214. *Ibid.*, p. 75.
215. Gilles Le BOUVIER dit BERRY, *Le Livre de la description des pays...*, p. p. E. T. HAMY, 1908, pp. 30—31.
216. A. N., F¹⁰212 A—B.
217. Joseph de PESQUIDOUX, *Chez nous. Travaux et jeux rustiques*, 6^e éd. 1921, p. 106.
218. André PLAISSE, *La Baronnie du Neubourg*, 1961, p. 193.
219. J. MULLIEZ, *art. cit.*, pp. 40—41.
220. Paul ADAM, *Systèmes économiques et histoire. Essais sur la violence dans les guerres et la paix*, 1980, pp. 197sq.
221. A. N., F²⁰ 560.
222. Production totale, en 1835, 32 millions de stères de bois; *ibid.*
223. L. de LAVERGNE, *op. cit.*, pp. 95—96
224. *Ibid.*, p. 435.
225. M. DARLUC, *op. cit.*, I, pp. 263—264.
226. *Statistiques de la France esquissées par Hubert, le long d'une période de 90 ans, 1785 à 1875, 1883*, pp. 20—21.
227. Pierre BONNET, *La Commercialisation de la vie française du Premier Empire à nos jours*, 1929, p. 93.
228. Jacques MULLIEZ, *Les Chevaux du royaume. Histoire de l'élevage du cheval et de la création des haras*, 1983.
229. C'est-à-dire milliers de livres anciennes, soit environ 450 kg.
230. A. N., H¹262, 10 janvier 1731.
231. Jacques SAVARY DES BRUSLONS,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éd. 1759, I, col. 550.
232. Abbé Alexandre TOLLEMER, *Journal manuscrit du sire de Gouberville*

- ... , *op. cit.* , pp. 381 — 384.
233. Au sens ancien, *haras* signifie à la fois l'établissement d'élevage et "les étalons et les cavales renfermés dans le haras" (LITTRÉ).
234. A. TOLLEMER, *op. cit.* , pp. 367 — 369.
235. A. N. , F¹⁰222, Mémoire sur l'engrais des bœufs en Limousin et pays adjacents, février 1791.
236. A. N. , F¹¹2740.
237. Xavier de PLANHOL, "Essai sur la genèse du paysage rural de champs ouverts", in: *Annales de l'Est*,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Nancy, 2 — 7 septembre 1957, pp. 418 — 419.
238. *Ibid.*
239. André LEGVAI, *De la seigneurie à L'Etat. Le Bourbonnai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1969, p. 20
240. Victor HUGO, *Les Pyrénées*, éd. Danièle Lamarque, 1984, p. 170.
241. A. N. , F¹⁰628, 1733.
242. A. TOLLEMER, *op. cit.* , pp. 391 — 399.
245. "L'usage dangereux qu'ont les habitants des campagnes d'être pêle-mêle avec leurs bestiaux" est dénoncé comme une cause de dépopulation des Côtes-du-Nord, en l'an IX. Cf. Octave FESTY, "La situation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d'après la session de l'an IX de sconseils généraux de département", in: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4, p. 288; cf. aussi le rapport du Docteur Bagot, cité par Jean-Pierre GOUBERT, *Maladies et médecins en Bretagne, op. cit.* , pp. 192 — 193.
244. JAQUET, *Mémoire sur la statistique de l'arrondissement de Suze*... , an X, p. 9, p. p. Charles MAURICE, *La Vie agricole au XVIII^e siècle dans l'ancien Ecarton d'Oulx*, réimpr. 1981.
245. Jean ANGLAD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assif Central au XIX^e siècle*, 1971, p. 162.
245. Nicolas Luton DURIVAL, *Description de la Lorraine et du Barrois*, 1778, I, pp. 288 — 289.
247. P. ARBOS, *op. cit.* , pp. 12 sq.
248. *Ibid.* , p. 21.
249. Dom Thierry RUINART, *Voyage littéraire... en Lorraine et en Alsace*, 1862, p. 50.
250. Jean et Renée NICOLAS, *La Vie quotidienne en Savoie aux XVII^e et*

- XVIII^e siècles, 1979, pp. 21 sq.
251. *Ibid.*, p. 23.
252. A. N. F¹⁰ 222, Mémoire sur l'engrais des bœufs en Limousin et pays adjacents, février 1791.
253. J. MULLIEZ, *Les Chevaux du royaume...*, *op. cit.*, pp. 38—39.
254. Noëlle BERTRAND, *Colondannes, village creusois (1623—1802)*, 1975, p. 43.
255. P. ARBOS, *op. cit.*, p. 203.
256. Archives des Bouches-du-Rhône, amirauté de Marseille, BIX, 14.
257. M. JAUFFRET, *Petite E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 I, 1816, p. 49.
258. P. ARBOS, *op. cit.*, pp. 183—184.
259. Fromage de deuxième catégorie.
260. P. ARBOS, *op. cit.*, pp. 167—168.
261. *Ibid.*, p. 185.
262. L. de LAVERGNE, *op. cit.*, p. 317.
263. A. N., Z¹⁰ 430—431.
264. De *trans*, au-delà, et *humus*, terre.
265.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p. 76 sq.
266. Cité par F. JULIEN-LABRUYÈRE, *op. cit.*, I, pp. 402—403.
267.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Lozère C 480, citées par A. -M. BRISEBARRE, *op. cit.*, pp. 99—100.
268. A. -M. BRISEBARRE, *op. cit.*, pp. 103—104.
269. Bernard DUHOURCAU, *Guide des Pyrénées mystérieuses*, 1973, pp. 119—120.
270. René NELLI, "Le berger dans le pays d'Aude", in: *Folklore, revue d'ethnologie méridionale*, printemps 1952, pp. 3—13.
271. Jean-Pierre PINIES, *Figures de la sorcellerie languedocienne*, 1983, p. 45 (*arma*=âme dans le languedocien archaïque).
272. Thérèse SCLAFERT, *Cultures en Haute-Provence: déboisements et pâturages au Moyen Age*, 1959.
273. Marie MAURON, *La Transhumance du pays d'Arles aux grandes Alpes*, 1952.
274. A. -M. BRISEBARRE, *op. cit.*
275. Jacques MULLIEZ, "Pratiques populaires et science bourgeoise, l'élevage des gros bestiaux en France de 1750 à 1850", in: Actes du Congrès de Clermont-Ferrand, "L'Élevage dans les hautes terres", 1982, p. 299.

276. L. de LAVERGNE, *op. cit.*, pp. 90—91.
277. *Ibid.*, p. 212. Cf. aussi le *Larousse agricole*,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Michel CLEMENT, 1981, à la rubrique "Bretonne Pie Noire."
278. A. N., F¹⁰1574.
279. *Ibid.*
280. J. MULLIEZ, "Pratiques populaires. . .", *art. cit.*, p. 299.
281. *Larousse agricole, op. cit.*, légende de la première photo entre les pages 208 et 209.
282. *Ibid.*, pp. 55—56.
283. A. N. F¹⁰222, Mémoire sur l'engrais des bœufs en Limousin et pays adjacents, février 1791.
284. *Ibid.*
285. Charles FIGAULT LEBRUN, et Victor AUGIER, *Voyage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 1827, p. 31.
286. J. MULLIEZ, *Les Chevaux du royaume. . ., op. cit.*, p. 81.
287. J. SAVARY DES BRUSLONS, *Dictionnaire. . ., op. cit.*, article "Cheval", I, col. 1057 et 1060.
288. R. CHAPUIS, *op. cit.*, p. 73.
289. A. N., F¹²67, fol. 98—99, 4 avril 1720.
290. Georges de MANIEYER, *Le Livre journal tenu par Fazy de Rame en langage embrunais (6 juin 1471—10 juillet 1507)*, II, 1932, p. 85.
291. P. ARBOS, *op. cit.*, p. 182.
292. "Un paysan qui a une charrette et deux bœufs est à son aise", écrit en 1713 l'intendant de Guyenne; cité par Jean-Pierre POUSSOU, in: *Hommage à Philippe Wolff, Annales du Midi*, 1978, p. 409.
293. Antoine LOISEL, *Mémoires des pays de Beauvaisis. . .*, 1617, p. 27, cité par 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 .*, p. 111.
294. Gabriel DU MOULIN, 1631, cité par René DUMONT, *Voyages en France d'un agronome*, 1951, pp. 376 et 379.
295. D. HALEVY, *op. cit.*, p. 217.
296. Edouard DEMOLINS, *Les Français d'aujourd'hui*, 1898, p. 133.
297. Robert LAURENT, *Les Vignerons de la "Côte d'or" du XIX^e siècle*, 1958, p. 18.
298. Léonce de LAVERGNE, *E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1860, éd. 1877, p. 123.
299. E. DEMOLINS, *op. cit.*, p. 137.

300. Roger DION,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1959, éd. 1977, p. 650.
301. E. DEMOLINS, *op. cit.*, p. 133.
302. A. N., F¹⁰226, p. 35.
303. Georges DURAND, *Vin, vigne et vigneron en Lyonnais et Beaujolais*, 1979, p. 11.
304. Renée CHAPUIS, *Une vallée franc-comtoise... op. cit.*, p. 17.
305. Cité par R. DION, *op. cit.*, p. 101.
306. Diodore de Sicile, cité par R. DION, *op. cit.*, p. 102.
307. André DELEAGE, *La Vie rurale en Bourgogne jusqu'au début du XI^e siècle*, 1941, I, p. 154.
308. Charles LAMPRECHT, *Etudes sur l'état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pendant la première partie du Moyen Age*, 1889, p. 23.
309. Alfred LEROUX, *Le Massif Central. Histoire d'une région de la France*, 1898, II, p. 50.
310. Gustave BLOCH, *Les Origines. La Gaule indépendante et la Gaule romaine*, in: *Histoire de France*, p. p. E. LAVISSE, 1911, II, p. 425.
311. R. DION, *op. cit.*, p. 129
312. *Ibid.*, p. 148.
313. *Ibid.*, p. 165.
314. *Ibid.*, p. 202 et p. IX.
315.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 p. 231.
316. *Histoire de l'Alsace*, p. p. Philippe DOLLINGER, 1970, pp. 158 et 175; Jean-Pierre KINTZ, *La Société strasbourgeoise 1560—1650*, 1984, pp. 319 sq.
317. "Les formations alluviales caillouteuses appelées *graves* possèdent les propriétés physiques qui font les grands vins de Bordeaux", R. DION, *op. cit.*, p. 34.
318. Nicolas de LAMOIGNON de BASVILLE,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Languedoc*, 1734, p. 252.
319. *Ibid.*, p. 258.
320. *Ibid.*, p. 271.
321.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200.
322. Michel BELOTTE, *La Région de Bar-sur-Seine... op. cit.*, 1973, p. 45.
323. A. N., F²⁰221.

324. Emile APPOLIS, *Le Diocèse civil de Lodève*, 1951, pp. 421—422.
325. P.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 .*, *op. cit.*, 1960, p. 168.
326. Mariel JEAN-BRUHNES DELAMARRE, *Le Berger dans la France des vil-
lages*, 1970, p. 20.
327. A. N., F¹⁰ 221 Marne.
328. R. DION, *op. cit.*, pp. 462 sq.
329. *Ibid.*, p. 469.
330. *Ibid.* p. 491.
331. *Ibid.*, pp. 459—460.
332. Pierre de SAINT-JACOB,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egime*, 1960, p. 539.
333. J. SAVARY DES BRUSLONS,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commerce*, 1762,
IV¹, article "Vin", col. 121 sq
334. L. de LAVERGNE, *op. cit.*, p. 123.
335. P. CLEMENT, *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1861—1882,
II, pp. 624—625.
336. R. DION, *op. cit.*, p. 33.
337. Brassier; celui qui n'a que ses bras pour travailler, synonyme de
manouvrier.
338.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I, p. 278.
339. *Voyages du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et autres lieux de l'Orient*, IV,
1811, p. 107.
340.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 p. 200.
341. Pierre CHERRUAU, "Sauternes fait main", in: *Le Monde*, 30 septembre
1984.
342. R. DION, *op. cit.*, pp. 119—120.
343. "Le vin de Suresnes", in: *Le Monde*, 22 septembre 1984.
344. Cité par R. DION, *op. cit.*, p. 25.
345. Gaston ROUPNEL, *Histoire et destin*, 1943, pp. 61—62.
346. Henry de ROUVIERE, *Voyage du tour de France*, 1713, P. 56.
347. Arthur YOUNG, *Voyages en France 1787, 1788, 1789*, 1976, I, p. 93.
348. POTTIER DE LA HESTROYE, *Réflexions sur la Dime royale*, 1716, I, p.
52 et *infra*.
349. J. SAVARY DES BRUSLONS, *op. cit.*, I, 1759, p. 531.
350. Cité par Jean CLAUDIAN,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évolution du vo-
cabulaire alimentaire", in: *Cariers de Nutrition et de Diététique*, IX, p.

351. E. DEMOLINS, *op. cit.*, p. 84.
352. J. SAVARY DES BRUSLONS, *op. cit.*, II, 1766, colonne 785.
353. A. N., F 10 226.
354. Adrien de GASPARIN, *Cours d'agriculture*, 1831, éd. 1860, pp. 1—2.
355. Frédéric LULLIN DE CHATEAUVIEUX, *Voyages agronomiques en France*, 1843, I, pp. 283 et 287.
356. A. N., H 1510 n°16, cité par Marc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1952, p. 54.
357. F. LULLIN DE CHATEAUVIEUX, *op. cit.*, II, pp. 331—332.
358. A. de GASPARIN, *op. cit.*, V, p. 3.
359. *Le Livre de main des Du Pouget (1522—1598)*, éd. Louis GREIL, 1897, p. 20.
360. Christophe MATHIEU de DOMBASLE, *Traite d'agriculture*, 1862, p. 213.
361. *Procès-verbal de l'Assemblée provinciale de l'Ile-de-France*, 1787, p. 245.
362. Jean MEUVRET, *Le Problème des subsistances à l'époque de Louis XIV*, 1977, p. 111.
363. Henri-Louis DUHAMEL DU MONCEAU, *Eléments d'agriculture*, 1762, livre II, ch. IV, p. 221.
364. François SIGAUT, "Pour une cartographie des assolement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in: *Annales E. S. C.*, 1976, pp. 631—643.
365. François SIGAUT, "Quelques notions de base en matière de travail du sol dans les anciennes cultures européennes", in: *Les Hommes et leurs sols—Les techniques de préparation du champ dans le fonctionnement et l'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culture*. Numéro spécial du *Journal d'Agricultur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1977, p. 155.
366. Etienne JULLARD, *Problèmes alsaciens vus par un géographe*, 1968, p. 112.
367. Jean-Robert PITTE, *Histoire du paysage français*, 1983, II, p. 62 et note 551 p. 150 d'après Gérard SIVERY, "Les noyaux de bocage dans le nord de la Thiérach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in: *Les Bocages*, 1976, pp. 93—96.
368. J. -R. PITTE, *op. cit.*, II, p. 63.
369. Louis MERLE, cité par J. -R. PITTE, *op. cit.*, II, p. 63 et note 555, p.

- 150.
370. René LEBEAU, cité par J. -R. PITTE, *op. cit.*, II, p. 63 et note 556, p. 150.
371. J. -R. PITTE, *op. cit.*, II, p. 63.
372. Arthur YOUNG, *Voyages en France, op. cit.*, II, p. 617.
373. François SIGAUT, "La jachère en Ecosse au XVIII^e siècle ; phase ultime de l'expansion d'une technique", in: *Etudes rurales, janv. -mars 1975*, p. 99.
374. L. de LAVERGNE, *op. cit.*, p. 257.
375. Germain SICARD, "Le métayage dans le Midi toulousain à la fin du Moyen Age", in: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 législation, Toulouse, 1955*, p. 36.
376. Paul Louis MALAUSSENA, *La Vie en Provence oriental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1969, p. 87.
377. Roger DION, "La part de la géographie et celle de l'histoire dans l'explication de l'habitat rural du Bassin Parisien", in: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ille, 1946*, p. 72.
378. Pierre MASSE, *Varennes et ses maîtres*, 1926, p. 24.
379.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1962, p. 72, cité par F. SIGAUT, "Pour une cartographie des assolements. . .", p. 635.
380. R. DION, art. cit., p. 59.
381. J. MULLIEZ, art. cit., p. 11.
382. F. SIGAUT, art. cit., p. 636.
383. J. MEUVRET, *op. cit.*, pp. 108—109.
384. René MUSSET, "Les anciens assolements et la nourriture", in: *Mélanges géographiques offerts à Ph. Arbos*, 1953, p. 176.
385. *Mémoires de Oudard Coquault, bourgeois de Reims (1649—1659)*, p. Charles LORIQUET 1875, I, p. 183.
386. A. N., F¹¹222.
387. P. MASSE, *op. cit.*, pp. 23—24.
388. *Ibid.*, p. 23.
389. Maurice LE LANNOU, "Les sols et les climats", i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p. p. Michel FRANÇOIS, 1972, pp. 23—24.
390. Pierre de SAINT-JACOB, "Études sur l'ancienne communauté rurale en Bourgogne", in: *Annales de Bourgogne*, 15, 1943, p. 184.
391. *Les Bocages, histoire, écologie, économie*. Table ronde du C. N. R. S. ,

- Rennes, 1976, I. Géographie. Pierre FLATRES, *Rapport de synthèse*, pp. 21—30.
392. L. de LAVERGNE, *op. cit.*, p. 186.
393. *Ibid.*, p. 208.
394. Marc BLOCH, *op. cit.*
395. *Hermes*, nom dans le Midi des terres incultes et improductives. *Terre gaste*, Georges BERTRAND, "Pour une histoire écologique de la France rurale",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p. p. G. DUBY, 1975, p. 74.
396. L. de LAVERGNE, *op. cit.*, p. 264.
397. *Ibid.*, p. 269.
398. *Ibid.*, p. 270.
399. P. L. MALAUSSENA, *op. cit.*, p. 84.
400. L. de LAVERGNE, *op. cit.*, pp. 246—247.
401. François Hilaire GILBERT, *Recherches sur les moyens d'étendre et de perfectionner la culture des prairies artificielles*, 1787, p. p. Ch. DUFOUR, 1880, p. 35.
402. Marc BLOCH, *op. cit.*, 1931, rééd. 1952, pp. X et XIV.
403. François SIGAUT, "Pour une cartographie. . .", art. cit., p. 632.
404. Maurice LE LANNOU, *Pâtres et paysans de la Sardaigne*, 1941, p. 195.
405. Xavier de PLANHOL, "Essai sur la genèse du paysage rural de champs ouverts", in: *Annales de l'Est*, 1959, p. 416.
406. Michel CONFINO, *Systèmes agraires et progrès agricoles. L'assolement triennal en Russie aux XVIII^e—XIX^e siècles*, 1969, *passim* et pp. 29—46.
407. Laszlo MAKKAL, "Grands domaines et petites exploitations, seigneur et paysan en Europe au Moyen Age et aux temps modernes", in: *Eigh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gress*, Budapest, 1982, "A" *Thèmes*, pp. 10—11.
408. Comte de GASPARI, *Cours d'agriculture*, V, p. 6.
409. J.-R. PITTE, *op. cit.*, pp. 40 et 117.
410. R. MUSSET, art. cit., p. 172.
411. X. de PLANHOL, art. cit., p. 417.
412. Robert SPECKLIN,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s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1870—1940)*, 1979; "E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in: *Acta Geographica*, 2^e trimestre 1982.
413. Olivier LAUNAY, *La Civilisation des Celtes*, 1975, p. 170.

414. Lucien GACHON, "Regards sur la campagne française", in: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10 février 1940, p. 2.
415. François SIGAUT, *Les Réserves de grains à long terme*, 1978, p. 32.
416. *Ibid.*, p. 21.
417. J. SAVARY DES BRUSLONS, *op. cit.*, 1762, pp. 524—525, article; "Blé".
418. Geneviève ACLOCQUE, *Les Corporations et le commerce à Chartres du XI^e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1917, p. 212.
419. Maurice BLOCK, *Du commerce des grains*, 1854, p. 59.
420. G. ACLOCQUE, *op. cit.*, p. 214.
421. *Ibid.*, p. 215.
422. *Ibid.*, pp. 218—220.
423. Blattiers; "Petits marchands forains qui vont avec des chevaux et des ânes chercher du blé dans les campagnes éloignées... et l'amènent à somme dans les marchés... , ou bien proche des rivières ou ils le vendent aux marchands qui chargent pour les... grandes villes" (Nicolas de LAMARE, *Traité de police*, II, 1710, p. 738).
424. G. ACLOCQUE, *op. cit.*, p. 215.
425. A. N. , Y 10558 z (4 mai 1775).
426. Gazier; travailleur du textile, ouvrier en gaze.
427. F. SIGAUT, *Les Réserves de grains...*, *op. cit.*, p. 37.
428. F. LULLIN DE CHATEAUVIEUX, *op. cit.*, I, p. 62.
429. A. N. F¹²647—648.
430. Pierre LE GRAND D'AUSSY, cité par Jean CLAUDIAN, "L'homme et son pain", in: *Cahiers de nutrition et de diététique*, VII, 1972, p. 269 note 1.
431. A. N. , F¹⁰226.
432. Georges DUBY, *L'E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I, 1962, pp. 223—224.
433. POTTIER DE LA HESTROYE, *op. cit.*, I, pp. 122—123.
434. Mais pas forcément ce que nous appelons aujourd'hui pain blanc, fait de farines à très fort taux de blutage que les moulins ne peuvent fournir que depuis l'avènement du moulin à cylindre, dans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XIX^e siècle. Elles sont restées une rareté tant que le tamisage se faisait à la main. Jusque-là la farine de pur froment, plus blanche que les autres même grossièrement débarrassée du son, était à elle seule un luxe. Henri BEAUFOR, *Le Préjugé du pain blanc*, 1931, pp. 8—9.

435.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110; Jean MEYER,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e siècle*, 1966, pp. 446—447.
436. Jacques-Joseph JUGE SAINT MARTIN, *Changements survenus dans les mœurs des habitants de Limoges depuis une cinquantaine d'années*, 1817, pp. 14—15.
437. Valentin JAMMERET-DUVAL, *Mémoires*, 1981, p. 112.
438. A. N. , F¹⁰★1B(1786)et A. N. , H 514(1787).
439. A. N. , F¹⁰★1B.
440. Jean-Claude TOUTAIN, dans ses statistiques rétrospectives, aboutit pour les années 1781—1790, à un chiffre proche, entre 2420 et 2850 millions de livres. *Le Produit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de 1700 à 1958*, I, p. 215 (*Cahiers de l'I. S. E. A.*, 1961).
441. J. MARCZEWSKI, "Ya-t-il eu un 'take off' en France?", in: *Evolution des techniques et progrès de l'économie. Cahiers de I. S. E. A.*, mars 1961 (série AD, n°1), p. 72.
442. J. SAVARY DES BRUSLONS, *op. cit.*, I, 1760, article "Ecu", colonne 250.
443. J. -C. TOUTAIN, *op. cit.*, I, p. 8.
444. SULLY, *Mémoires*, III, éd. 1822, p. 485.
445. Antoine de MONTCHRÉTIEN, *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Rouen, 1615, éd. 1889, pp. 23—24.
446. VAUBAN, *Projet d'une dime royale*, 1707, p. 26.
447. A. N. , F¹²647—648.
448. A. N. , F¹²673(vers 1696).
449. Mémoire publié par la Société d'Agriculture, Sciences, Arts et Belles-Lettres de l'Aube, 1836, p. 151.
450. J. SAVARY DES BRUSLONS,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II, 1760, col. 781, article: "Fromage".
451. F. LULLIN DE CHATEAUVIEUX, *op. cit.*, I, p. 298.
452. A. N. , F¹⁰III, Saône et Loire.
453. Pas moins de 300000 écus pour un seul achat en Suisse, en mars 1710. A. N. , G⁷1511(1711).
454. A. N. , F¹⁰226(30 janvier 1792).
455. A. N. , F¹²1904.
456. A. N. , F¹⁰1576(1837).
457. Jean-Henri SCHNITZLER, *Statistique générale, méthodique et complète de la France comparée aux autres grand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tome

IV, p. 40.

458. Alfred SAVVY,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1918—1931)*, I, 1965, pp. 239—240. Pour la moyenne 1903—1912, voir *Annuaire rétrospectif de l'INSEE*.
459. René GIRAULT, "Place et rôle des échanges extérieur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V, 1979, p. 199.
460. Arthur de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des finances avec les Intendants des provinces*, I, 1874, p. 11. (M. de Ris, intendant à Bordeaux au Contrôleur Général, 8 janvier 1684).
461. *Ibid.*
462. Bernard Hendrik S LICHER VAN BATH, cité par Immanuel WALLERSTEIN, *Le Système du monde du XV^e siècle à nos jours*. I. *Capitalisme et économie monde 1450—1640*, 1980, p. 92.
463. Ange GOUDAR, *Les Intérêts de la France mal entendus*, 1756, I, p. 19.
464. A. N. , F¹⁰226 et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 p. 86.
465. A. N. , F¹⁰III, Côte-d'Or, 7 (1819).
466. A. N. , H 1517 (Dufriche de Valazé à M. de Tarlé).
467. A. N. , F¹⁰226 (1792).
468. A. N. , G⁷449 (Thouars 27 avril 1683).
469.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A 1 1524, 6 (Rochefort, 2 janvier 1701).
470. A. SAUVY, *op. cit.* , I, 1965, pp. 239—240.
471. Alfred RAMBAUD,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1888, éd. 1926, p. 488.
472. Abbé de MABLY, *Le Commerce des grains*. Œuvres, XIII, pp. 291—297.
473. 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EBERT,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1697, 1966, I, p. 381.
474. Nicolas de LAMARE, *Traité de police*, II, 1710, p. 1038.
475. A. N. , G⁷1651, fol. 26.
476. A. N. G⁷ , 1651, f^o27.
477. Ustensile: droit pour les troupes de passage de prendre chez l'habitant le lit, le pot et la place au feu et à la chandelle (LITTRÉ).
478. A. N. , G⁷156 (Dijon, 12 juillet 1682).
479. Yves-Marie BERCE, *Histoire des croquants*, 1974, p. 65.

480. POTTIER DE LA HESTROYE, *op. cit.*
481. A. YOUNG, *op. cit.*, II, p. 863.
482. Jean FOURASTIE, *Machinisme et bien-être*, 1962; en 1899, ils faisaient vivre 43 personnes (aujourd'hui 300).
483. Jean FOURASTIE, *Les Trente Glorieuses*, 1979, p. 159.
484. Marquis d'ARGENSON, *Mémoires*, 26 janvier 1732, p. p. J. E. B. RATHERY, 1859, II, p. 72.
485.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58.
486. A. N. G⁷1633 (Bérulle).
487. A. N. G⁷103 (Desmarets de Vaubourg).
488. *Ibid.*
489. A. N. ,G⁷346
490.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 p. 55.
491. A. N. F¹¹704 (30 avril 1812).
492. Philippe SUSSEL, *La France de la bourgeoisie 1815-1850*, 1970, p. 70.
493. Toschio HORII, "La crise alimentaire de 1853 à 1856 et la caisse de la boulangerie", in: *Revue historique*, oct.-déc. 1984, pp. 375 sq.
494. E.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1911, IV, pp. 132 sq.
495. *Ibid.*, 1911, VII, 1, p. 349.
496. Louise A. TILLY, "La révolte frumentaire, forme de conflit politique en France", in: *Annales E. S. C.*, 1972, p. 731.
497. Arsenal, M 4116. Chevrepied; qui a des pieds de chèvre, en parlant du dieu Pan, des faunes, des satyres et-par extension-d'hommes capables de violence et d'agression.
498. Auguste POIRSON, *Histoire du règne de Henri IV*, 1862, I, pp. 593 sq.
499. Boris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1963, *passim*.
500. E. LAVISSE, *op. cit.*, VII, 1, p. 355.
501. Y. -M. BERCE, *op. cit.*, II, p. 681
502. B. PORCHNEV, *op. cit.*
503. Hugues NEVEUX, "Die ideologische Dimension der französischen Bauernaufstän de im 17. Jahrhundert",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avril 1984.
504. P.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op. cit.*, 1960, p. L.
505. F. JULIEN-LABRUYÈRE, *Paysans charentais, op. cit.*, I, p. 302.
506. George RUDE, "The growth of cities and popular revol-1750-1850",

- in: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500—1850*, p. p. J. F. BOSHER, 1973, p. 176; Ernest LABROUSSE, in: LABROUSSE-BRAUDEL,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p. 729; Jean MEYER, in: *Histoire de France*, p. p. Jean FAVIER, III, *La France moderne*, p. 448.
507. Jean NICOLAS, "L'enjeu décimal dans l'espace rural savoyard", in: *Prestations paysannes, dîmes, rentes foncières et mouvement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à l'époque industrielle*, p. p. Joseph GOY et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pp. 66, note 20, p. 674 et note 64, p. 690.
508. A. N., G⁷1642, 396.
509. A. N., G⁷415—416.
510. A. N., G⁷1642, 403.
511. François LEBRUN, *L'Histoire vue de l'Anjou*, 1963, I, pp. 169 et 170.
512. A. N., G⁷1646.
513. *Ibid.*
514. A. N., G⁷1647.
515. F. LEBRUN, *op. cit.*, I, p. 170—171.
516. A. N., G⁷1646, 342 (Moulins, 16 juin 1709).
517. A. N., G⁷1646, 369 (Orléans, 20 mars 1709).
518. F. LEBRUN, *op. cit.*, pp. 192—194.
519. A. N., F¹¹2740.
520. TOULOT, *Subsistances 1816. Vues générales sur la nécessité de faire des achats de grains à l'étranger pour parer à l'insuffisance de la récolte de 1816*, 20 janvier 1817, p. 5.
521. Carreau; lieu de vente autour des halles.
522. A. N., F¹¹726.
523. A. N., H 1517.
524. A. N., F¹¹728.
525. *Ibid.*
526. Alfred RAMBAUD,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1888, 6^e éd. 1901, p. 488.
527. L. de LAVERGNE, *op. cit.*, p. 440 note 1.
528. René PILLORGET, *Les Mouvements insurrectionnels de Provence entre 1595 et 1715*, 1975, p. 989.
529. Pierre LÉON, "L'épanouissement d'un marché national",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II¹, 1976, pp. 301—302.

530. L. de LAVERGNE, *op. cit.*, p. 45.
531. Yves LEQUIN, *Histoire des Français*, II, *La Société*, p. 307.
532. Adeline DAUMARD, *Les Fortunes françaises du XIX^e siècle*, 1973, p. 192.
533. Pierre LEON, *in*: BRAUDEL-LABROUSSE, *op. cit.*, III², pp. 604—606.
534. Alain PLESSIS, *les Regents et gouverneur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1985, p. 204.
535. R. LAURENT, *in*: F. BRAUDEL-E. LABROUSSE, *op. cit.*, III², pp. 740—744.
536. Félix GAIFFE, *L'Envers du grand siècle*, 1924, pp. 117 sq.
537. L. de LAVERGNE, *op. cit.*, p. 38.
538. A. N., F¹¹ 2740 (Amiens, 23 et 28 avril).
539. A. N., F¹¹ 2740 (Paris, 3 juin 1817).
540. Guy THUILLIER, *Aspects de l'économie nivernaise au XIX^e siècle*, 1966, p. 82.
541. Elisabeth CLAVERIE, Pierre LAMAISON, *L'Impossible Mariage. violence et parenté en Gévaudan, XVII^e,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1982, p. 339.
542. G. THUILLIER, *op. cit.*, pp. 75—76
543. *Ibid*, pp. 81—82.
544. Louis LÉOUZON, *Agronomes et éleveurs*, 1905, p. 232.
545. Paulette SEIGNOUR, *La Vie économique du Vaucluse de 1815 à 1848*, 1957, p. 101.
546. Joseph PESQUIDOUX, *Chez nous. Travaux et joies rustiques*, 6^e éd. 1921, p. 141.
547. Souvenir personnel.
548. Daniel ZOLA, *L'Agriculture moderne*, 1913, p. 13.
549. L. de LAVERGNE, *op. cit.*, 1877, p. 105.
550. *Ibid*, 1877, p. 194.
551. Aimé PERPILLOU, "Essai d'établissement d'une carte de l'utilisation du sol et des paysages ruraux en France", *in*: *Mélanges géographiques offerts à Philippe Arbos*, 1953, p. 197.
552. L. de LAVERGNE, *op. cit.*, pp. 51—52 et pp. 402—403 où l'auteur corrige en partie les chiffres donnés p. 52.
553. Robert LAURENT, "Tradition et progrès: le secteur agrico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II², p. 672.

554. *Ibid.* ,p. 682
555. Pierre BARRAL, "Le monde agrico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V¹1979, p. 361.
556. André GAURO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I. *Le temps des modernistes*, 1983, p. 19.

第 四 章

1. Isaac de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1771, p. 218.
2. Ce n'est pas la définition marxiste de ces mots, bien entendu.
3. Pierre CHAUNU,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classique*, 1970, p. 26.
4. Voir *infra*, courbe et P. 186
5. Heinrich BECHTEL,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von der Vorzeit bis zum Ende des Mittelalters*, I, 1951, p. 255.
6. François-Gabriel de BRAY, *Essai critique sur l'histoire de la Livonie*, III, 1817, pp. 22—23.
7.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1967, pp. 21 sq.
8. Julius BELOCH, «Die Bevölkerung Europas im Mittelalter»,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900, p. 409.
9. Chiffres que me communique Gérard CALOT de l'I. N. E. D., 28 mai 1984.
10. Bien qu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encore, il n'y ait que "l'ébauche d'un réseau urbain vivarois" (Alain MOLINIER, *Stagnation et croissance. Le Vivarais aux XVII^e—XVIII^e siècles*, 1985, pp. 46—47 et 67 sq.), il s'agit de bourgades depuis longtemps stagnantes, mais très anciennement fondées. (Pierre BOZON, *Histoire du peuple vivarois*, 1966, pp. 263 sq.) De même dans le Gévaudan.
11. Guy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 1976, pp. 61 et 66—67.
12. Yves RENOUARD, *Les Villes d'Italie de la fin du X^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1969, I, p. 15.
13. Jean SCHNEIDER, "Problèmes d'histoire urbaine dans la France médiévale" in: *Actes du 100^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Paris, 1975), 1977, p. 150.
14. *Ibid.*, p. 153.
15. *Ibid.*, p. 152.
16. Ce que Bernard CHEVALIER, *Les Bonnes Villes de France du XIV^e au XVI^e siècle*, 1982, a bien mis en lumière.
17. G. BOIS, *op. cit.*, pp. 311—314.
18. Edouard PERROY, "A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in: *Annales E. S. C.*, 1949, pp. 167—182; Wilhelm ABEL,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XIII^e—XX^e siècles)*, 1973, p. 75, cités par G.

- BOIS, *op. cit.*, p. 84, note 32.
19.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p. 468 sq.
 20. Cité par Friedrich LÜTGE,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éd. 1976, p. 207.
 21. Jean-Robert PITTE, *Histoire du paysage français*, I, 1983, p. 149.
 22. B. CHEVALIER, *Les Bonnes Villes de France...*, *op. cit.*
 23. Louis STOUFF, "La population d'Arles au XV^e siècle: composition socio-professionnelle, immigration, répartition topographique", in: *Habiter la ville, XV^e — XX^e siècles*, Actes de la table ronde organis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GARDEN et Yves LEQUIN, Lyon, 1984, p. 8.
 24. Henri SEE, *Louis XI et les villes*, 1892, *passim*.
 25. *Ibid.*
 26. F. REYNAUD, "Du comté au royaume (1423 — 1596)", in: *Histoire de Marseille*, p. p. Edouard BARATIER, 1973, p. 132.
 27. Sal. a. WESTRICH, *L'Ormée de Bordeaux. Une révolution pendant la Fronde*, 1973.
 28. B. CHEVALIER, *op. cit.*, p. 310.
 29. Jean-Baptiste SAY,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1852, réimpression 1966, III, p. 612.
 30. J.-R. PITTE, *op. cit.*, II, p. 25.
 31. *Ibid.*, pp. 31—32.
 32. Thomas REGAZZOLA, Jacques LEFEBVRE, *La Domestication du mouvement. Poussées mobilisatrices et surrection de l'Etat*, 1981, p. 123.
 33. J.-R. PITTE, *op. cit.*, II, p. 40.
 34. Bernard QUILLIET, *Les Corps d'officiers de la prévôté et vicomté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 de la fin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au début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étude sociale*, thèse soutenue à l'université de Paris IV, 1977. Lille, service des reproduction de thèses, 1982, I, p. 145.
 35. Philippe de COMMYNES, *Memoires* I, éd. J. CALMETTE, 1964, pp. 73—74.
 36. Le *Dictionnaire de Furetière* (1690) définit la ville: "Habitation d'un peuple assez nombreux qui est ordinairement fermée de murailles."
 37. Roberto LOPEZ, *Intervista sulla città medievale*, 1984, p. 5.
 38. A. N. .G^o1692—259, f^o 81 sq.
 39. Jules BLACHE, "Sites urbains et rivières françaises",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de Lyon*, vol. 34, 1959, pp. 17—55.
 40. Daniel FAUCHER, *L'Homme et le Rhône*, 1968, p. 179.

41. Jean-Pierre BARDET, "Un dynamisme raisonnable. Dimensions, évolutions (1640—1790)", in: *Histoire de Rouen*, p. p. Michel MOLLAT, 1979, p. 214.
42. Jean MEYER, *Etudes sur les villes en Europe occidentale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 1983, p. 68.
43. A. N., F¹² 673, Metz, 6 juin 1717; de même en 1712, G⁷ 1697, 127, 7 septembre 1712.
44. A. N., F²⁰ 215.
45. Paul BOI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in: *Histoire de Nantes*, p. p. Paul BOIS, 1977, p. 245.
46. Référence égarée.
47. Paulette SEIGNOUR, *La Vie économique du Vaucluse de 1815 à 1848*, 1957, p. 77.
48. Renée CHAPUIS, *Une vallée franc-comtoise, la Haute-Loue*, 1958, p. 125.
49. J. MEYER, *op. cit.*, I, p. 69.
50. Adolphe BLANQUI, "Tableau des populations rurales de la France en 1850", i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janvier 1851, p. 9.
51. E. A. WRIGLEY, *Towns in societies*, 1978, p. 298.
52. L. STOUFF, art. cit., p. 10.
53. Alain CROIX, *Nantes et le pays nantais*, 1974, pp. 163—199.
54. Roger DEVOS, "Un siècle en mutation (1536—1684)", in: *Histoire de la Savoie*, p. p. Roger DEVOS, 1973, p. 258.
55. Olivier ZELLER, "L'implantation savoyarde à Lyon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in: *Habiter la ville. . .*, *op. cit.*, p. 27.
56. Maurice GARDEN, "Trois provinces, une généralité (XVII^e — XVIII^e siècles)", in: *Histoire de Lyon et du Lyonnais*, p. p. André LATREILLE, 1975, p. 227.
57.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irs*, V, 1783, p. 282; VI, 1783, pp. 82 — 83; IX, 1788, pp. 167 — 168, et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op. cit.*, I, p. 431.
58. Jean-Pierre POUSSOU, *Bordeaux et le Sud-Ouest au XVIII^e siècl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t attraction urbaine*, *passim*, et pp. 100—101 et 369 sq.
59. Cf. *supra*, p. 14
60. Pour Caen, Jean-Claude PERROT, *Genèse d'une ville moderne: Caen au XVIII^e siècle*, 1975, I, pp. 23 sq., et II, chapitres X et XI, étudie les sentiments et les intérêts jouant pour et contre le nouvel urbanisme; la de-

- struction des fortifications , commencée en 1751, ne sera totale qu'en 1787. Hésitation à Bordeaux, in: *Histoire de Bordeaux*, p. p. Ch. HIGOUNET, p. 236.
61. J. -R. PITTE, *op. cit.*, II, p. 16.
62. *Ibid.*, II, chapitre I.
63. J. MEYER, *op. cit.*, I, p. 14.
64. L. S. MERCIER.
65. Léonce de LAVERGNE, *E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1860, éd. 1877, p. 192.
66. Jean-Pierre FOUSSOU, "Une ville digne de sa fortune", in: *Histoire de Bordeaux*, p. p. Charles HIGOUNET, 1980, p. 238; J. GODECHOT et B. TOLLON, "Ombres et lumières sur Toulouse (1715—1789)", in: *Histoire de Toulouse*, p. p. Philippe WOLFF, 1974, pp. 370—372; A. BOURDE, "Les mentalités, la religion, les lettres et les arts de 1596 à 1789", in: *Histoire de Marseille*, p. p. Edouard BARATIER, 1973, p. 237; Jean-Pierre BARDET, "Un dynamisme raisonnable. Dimensions, évolutions (1640 — 1789)", in: *Histoire de Rouen*, p. p. Michel MOLLAT, 1979, p. 213; J. -C. PERROT, *op. cit.*, II, p. 585.
67. Claude NIÈRES, "L'incendie et la reconstruction de Rennes", in: *Histoire de Rennes*, p. p. Jean MEYER, 1972, pp. 213 sq.
68. *Ibid.*, p. 229
69. *Ibid.*, p. 233.
70. J. -C. PERROT, *op. cit.*, II, pp. 592 et 615—617.
71. Louis TRENARD, "Le Paris des Pays-Bas (XVIII^e siècle)", in: *Histoire d'une métropole, Lille Roubaix Tourcoing*, 1977, p. 278.
72. Pierre PATTE, *Mémoire sur les objet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l'architecture*, 1772, p. 6, cité par Claudette DEROZIER, "Aspects de l'urbanisme à Besançon au XVIII^e siècle", in: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1984, p. 82.
73. Jean-Marie CARBASSE, "Pesanteurs et fastes de l'Ancien Régime", in: *Histoire de Narbonne*, p. p. Jacques MICHAUD et André CABANIS, 1981, p. 244.
74. Eugène NOËL, *Rouen, Rouennais, rouenneries*, 1894, pp. 164—172.
75. Jean-Pierre BARDET, "La maison rouennais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 économie et comportement", in: *Le Bâtiment. Enquête d'histoire économique XIV^e — XIX^e siècle*, I. *Maisons rurales et urbaines de la*

- France traditionnelle*, p. p. J. -P. BARDET, P. CHAUNU, G. DESERT, P. GOUHIER, H. NEVEUX, 1971, pp. 319—320.
76. Roberto LOPEZ,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n°3, avril 1962, pp. 115—126.
77. Lors de la soutenance du 27 mai 1972.
78. Witold KULA, Rapport de A. Wyrobisz et discussion, sixième semaine de Prato, 1974.
79. Sébastien CHARLETY, *Histoire de Lyon*, 1903, p. 129.
80. En 1789, la dette de Lyon atteint 40 millions, celle de Marseille presque 19, celle d'Aix-en-Provence 1,8, celle d'Arles 1 million.
81. Pierre CHAUNU, «Le bâtiment dans l'économie traditionnelle», in: *Le Bâtiment... op. cit.*, pp. 19—20; Hugues NEVEUX, «Recherches sur la construction et l'entretien des maisons à Cambrai de la fin du XIV^e siècle au début du XVIII^e», *ibid.*, p. 214.
82. J. -C. PERROT, *op. cit.*, II, p. 615.
83. P. CHAUNU, art. cit., in: *Le Bâtiment... op. cit.*, p. 20.
84. *Ibid.*, p. 25.
85. Louis 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classes dangereuses*, 1958, p. 217.
86. P. CHAUNU, art. cit., p. 31.
87. Jacques DUPAQUIER, "Le réseau urbain du Bassin Parisien au XVIII^e et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Essai de statistique", in: *Actes du 100^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Histoire Moderne II* (Paris 1975), 1977, p. 125.
88. Cf. *supra*, I, p. 159.
89. Marcel REINHARD, "La population des villes, sa mesur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in: *Population*, 1954, n°2, pp. 279—288.
90. Paul BAIROCH, *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mies dans l'histoire*, 1985, p. 288.
91. François LEBRUN, "La tutelle monarchique (1657—1787)", in: *II Histoire d'Angers*, p. p. François LEBRUN, 1975, p. 83.
92. *Ibid.*, p. 101.
93. *Ibid.*, p. 103.
94. *Ibid.*, p. 103.
95. *Ibid.*, p. 101.
96. Rémy CAZALS, Jean VALENTIN, *Carcassonne ville industrielle au XVIII^e*

- siècle*, 1981, pp. 3—4.
97. Pierre DARDEL, *Commerce, industrie et navigation à Rouen et au Havre au XVIII^e siècle*, 1966, p. 118.
98. *Ibid.*, pp. 118—119.
99. *Ibid.*, pp. 123—129.
100.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 pp. 282—283 et note.
101. Pierre CAYEZ, *Metiers jacquard et hauts fourneaux aux origines de l'industrie lilloise*, 1978, pp. 79 sq.
102. *Ibid.*, p. 107.
103. *Ibid.*, pp. 154—155.
104. Edward Fox, *L'Autre France. L'histoire en perspective géographique*, 1973.
105. J.-P. POISSOU, *Bordeaux et le Sud-Ouest...*, *op. cit.*, pp. 411—414.
106. M. BRAURE, *Lille et la Flandre wallonne au XVIII^e siècle*, 1932, II, pp. 85 sq., 389 sq.
107. M. BRAURE, *op. cit.*, II, pp. 376—377.
108. *Ibid.*, p. 376.
109. *Ibid.*, pp. 378—379.
110. *Ibid.*, pp. 378—379 et 387.
111. L. TRENARD, art. cit., in: *Histoire d'une métropole...*, *op. cit.*, p. 245.
112. Mémoire d'Antoine de SURMONT, cité par M. BRAURE, *op. cit.*, II, pp. 379—380.
113. P. CAYEZ, *op. cit.*, p. 94.
114. A partir de 1692, Maurice BORDES, *L'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e et municipal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1972, p. 199.
115.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 123.
116. Herbert LÜTHY,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I, 1959, p. 314.
117. Jean SENTOU, *La Fortune immobilière des Toulousains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70, p. 25.
118. *Ibid.*, p. 174.
119. Robert BESNIER, *Histoire des faits économiques jusqu'au XVIII^e siècle*, 1965, p. 42.
120. Arghiri EMMANUEL, *L'Echange inégal. Essai sur les antagonismes dans l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internationaux*, 1969, p. 43.
121. Arghiri EMMANUEL, *L'Echange inégal. Essai sur les antagonismes dans*

- l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internationaux, 1969, p. 43.
122. Séminaire de Charles MORAZE.
 123. A. N. , F¹³242. Réponse du département du Mont-Blanc a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sur les questions concernant l'agriculture, les manufactures, le commerce, an IV. La Savoie est devenue le département du Mont-Blanc le 27 novembre 1792.
 124. Extrait de souvenirs d'enfance que mon ami Roger VERLHAC, mort prématurément, avait commencé à rédiger à ma demande, sur Saint-Gervais et la vallée des Contamines, avant l'invasion du tourisme. En 1820, le même système fonctionnait dans le Jura autour des Rousses, cf. Abbé M. BERTHET, "Les Rousses", in: *A travers les villages du Jura*, p. p. J. BRELOT, M. BERTHET, G. DUHEM, 1963, p. 285.
 125. Informations recueillies par Gilbert BLANC, garde-forestier et guide de Saint-Gervais.
 126. Joseph-Michel DUTENS,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intérieure en France*, 1828, I, pp. IX—X, cité par Jean-Claude TOUTAIN, *Les Transports en France de 1830 à 1965*, Cahiers de l'ISEA, série AF-9, sept. -oct. 1967, p. 38.
 127. Bernard LEPETIT, *Chemins de terre et voies d'eau, réseaux de transports et organisation de l'espace en France, 1740—1840*, 1984, p. 91.
 128. Arthur YOUNG, *Voyages en France*, I, éd. 1976, pp. 75—76, 142, 163, 393.
 129. *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e. Territoire et population*, 1837, p. 47.
 130. A. N. , F¹⁰242, *op. cit.*
 131. Pierre GOUBERT, Daniel ROCHE,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1984, I, p. 55.
 132. L. de LAVERGNE, *op. cit.*, p. 434.
 133. Fonds privé du D^r Morand qui nous a été gracieusement communiqué.
 134. P. GOUBERT, D. ROCHE, *op. cit.*, I, p. 55.
 135. Alexis MONTEIL, *Description du département de l'Aveyron*, an X, cité par Claude HARMELLE, *Les Piqués de l'aigle. Saint-Antonin et sa région 1850—1940. Révolution des transports et changement social*, 1982, p. 75.
 137. Marc AMBROISE-RENDU, "Géographie parisienne, les révélations du nouvel atlas démographique et social de la capitale", in: *Le Monde*, 30—31 décembre 1984, p. 1.

138. B. LEPETIT, *op. cit.*, p. 81
139. A. N., F^o197.
140. B. LEPETIT, *op. cit.*, pp. 67—71.
141. René FAVIER, "Une ville face au développement de la circulation au XVIII^e siècle: Vienne en Dauphiné", in: *Actes du 100^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Paris, 1975, pp. 54—55.
142. Pierre FUSTIER, *La Route. Voies antiques, chemins anciens, chaussées modernes*, 1968, pp. 228—236 et 249—254. Le premier pont de fer est construit sur le Rhône en 1824 par Marc SEGUIN entre Tain et Tournon.
143. STENDHAL, *Mémoires d'un touriste*, 1838, éd. 1929, I, pp. 73 et 309—310.
144.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 112.
145. Guy ARBELLOT, "Les rout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in: *Annales E. S. C.*, mai-juin 1973, p. 790 hors texte, cité par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1979, pp. 270—271.
146. 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documents statistiques sur les routes et les ponts, 1873, cité par J.-C. TOUTAIN, *Les Transports...* *op. cit.* p. 15.
147. Jean-Claude GEORGES, *De la Beholle à la Falouse*, 1985, p. 75.
148. Alain CROIX, *La Bret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 1981, p. 39 et note 95.
149. Victor HUGO, *Les Pyrénées*, éd. 1984, p. 18.
150. Pierre GOUBERT, Préface à l'ouvrage d'Anne-Marie COCULA-VAILLIERES, *Un fleuve et des hommes. Les gens de la Dordogne au XVIII^e siècle*, 1981, p. 7.
151. Blaise de MONTLUC, *Commentaires (1521—1576)*, éd. Pléiade, 1964, V, p. 515 cité par A.-M. COCULA-VAILLIERES, *op. cit.*, p. 15.
152. Antonio PONZ, *Viaje fuera de España*, 2^e éd., 1791, I, p. 56.
153. A.-M. COCULA-VAILLIERES, *op. cit.*
154. *Ibid.*, p. 34.
155. *Ibid.*, pp. 79 et sq.
156. *Ibid.*, pp. 110—114.
157. *Ibid.*, p. 73.
158. *Ibid.*, pp. 76—78.
159. Ces contrats portaient non seulement la liste des marchandises, le prix

- du transport, mais aussi un délai limite (en général trois semaines). Dans le registre d'un marchand du XVII^e siècle, on les retrouve inscrits et signés par deux témoins. O. GRANAT, "Essai sur le commerce dans un canton de l'Agenais au XVII^e siècle d'après le 'livre de comptes et de raisons de Hugues Mario, marchand' de Montaigut en Agenais aujourd'hui Montaigut-du-Quercy (1648 — 1654)", in: *Revue de l'Agenais*, 1901, t. XXVIII, pp. 425 — 440.
160. Léon CAHEN, "Ce qu'enseigne un péage du XVIII^e siècle; la Seine, entre Rouen et Paris, et les caractères de l'économie parisienne",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1, III, pp. 487 — 518.
 161. A. N. ,G⁷1647, n°345, 14 juin 1710.
 162. *Ibid.* , n° 326, 20 avril 1709.
 163. Maurice BLOCK,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comparée avec les divers pays de l'Europe*, 1875, II, p. 250.
 164. O. GRANAT, art. cit. , pp. 437 — 438.
 165. A. N. ,F¹⁴168, imprimé.
 166. Henriette DUSSOURD, *Les Hommes de la Loire*, 1985, pp. 85 sq.
 167. A. N. ,G⁷124.
 168. A. N. ,H 94, dossier VI, pièce 74.
 169. *Gazette de France*, 15 avril 1763.
 170.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sur l'Allier en Bourbonnais*, p. p. le Service éducatif d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llier, 1983, p. 30.
 171. A. N. ,F¹²1512 C.
 172. Adrien HUGUET, *Histoire de Saint-Valéry*, 1909, pp. 1191 sq.
 173. J. -C. TOUTAIN, *op. cit.* , pp. 74 — 75.
 174. J. MEYER, *op. cit.* , p. 36.
 175. Richard GASCON,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au XVI^e siècle. Lyon et ses marchands*, 1971, p. 157.
 176. Joseph-Michel DUTENS, *op. cit.* , I, pp. IX — X, cité par J. -C. TOUTAIN, *op. cit.* , p. 38.
 177. VAUBAN, *Mémoire sur la navigation des rivières*, in: *mémoires des Intendants sur l'état des généralités, dressés pour l'instruction du Duc de Bourgogne*, p. p. A. M. de BOISLILE (1^{re} éd. 1761), I, 1881, p. 401
 178. Par exemple, d'après une statistique annuelle du mouvement de la navigation de l'Allier, en 1837 (seule année où elle soit donnée en détail), 29 bateaux ont transporté à Paris 870 tonnes de charbon de bois, et 18

- bateaux 360 tonnes de paille de Pont-du-Château à Moulins.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sur l'Allier...*, *op. cit.*, pp. 34 — 35.
179. A. N., F¹⁰242.
180. J. -C. PERROT, *op. cit.*, p. 211.
181. A. N., F¹¹3059.
182. J. LETACONNOUX, «Les voies de communication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II, 1909, p. 108.
183. J. -C. TOUTAIN, *op. cit.*, p. 40.
184. La Statistique annuelle de navigation de l'Allier, citée plus haut, donne pour l'année 1837 un tableau des poids et valeurs de toutes les marchandises transportées (vin, charbon de terre, charbon de bois, planches, merrains, pierres, plateaux de bois, paille, fruits, etc.), puis mentionne «108 trains de bois», sans autre précision et sans les inclure dans le tableau.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sur l'Allier...*, *op. cit.*, pp. 34 — 35.
185. A. N., F¹² — 653, janvier 1786.
186. J. -C. TOUTAIN, *op. cit.*, p. 248.
187. VAUBAN, *Mémoire sur la navigation...*, *op. cit.*, p. 413.
188. T. REGAZZOLE, J. LEFEBVRE, *op. cit.*, p. 132; J. -C. TOUTAIN, *op. cit.*, p. 252.
189. Marcel MARION,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éd. 1976, p. 561.
190.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 97.
191. *Ibid.*, p. 111.
192. Ch. DEPLAT, «Les résistances à l'implantation de la route royale dans le ressort de l'intendance d'Auch et de Pau au XVIII^e siècle», in *Annales du Midi*, 1981.
193.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 105.
194. M. MARION, *op. cit.*, pp. 153 — 154; Gaston WIMBÉE, *Histoire du Berry, des origines à 1790*, 1957, p. 245.
195. A. N., H 160, Mémoire de M. Antoine, sous-ingénieur en Bourgogne, su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rvée en Bourgogne, 1775.
196. M. MARION, *op. cit.*, p. 154.
197. Guy ARBELLOT, «Le réseau des routes de poste, objet des premières cartes thématiques de la France moderne», in: *Les Transports de 1610*

- à nos jours, Actes du 104^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Bordeaux, 1979, 1980, I, p. 107 et note 4.
198. Voir *supra*,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pp. 358—360.
199. Pierre DUBOI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707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dactylogramme, p. 28, lettre de Tessé.
200. Madeleine FOUCHÉ, *La Poste aux chevaux de Paris et ses maîtres de poste à travers les siècles*, 1975, pp. 84—85.
201. Pierre CHAMPION, *Paris au temps de la Renaissance. L'envers de la tapisserie. Le règne de François I^{er}*, 1935, p. 32. Diego de Zuniga écrit le jour même de la Saint-Barthélemy pour l'annoncer à Philippe II qui reçoit la lettre le 7 septembre et laisse éclater sa joie. Philippe ERLANGER, *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 1960, p. 203.
202. A. N., F¹⁰221—1, Quimper, 27 juin 1791.
203. Chiffres obligeamment communiqués par J.-C. TOUTAIN, qui les a réunis pour un livre à paraître.
204. D'après le chapitre VI des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Languedoc*, rédigés en 1737 par l'intendant de Basville.
205. Pourcentages calculés par J.-C. TOUTAIN: 1781—90, 30%; 1803—14, 32%; 1825—34, 37%; 1845—54, 45%; 1875—84, 52%; 1895—1904, 58%; 1920—24, 65%; 1925—34, 72%; 1935—38, 75%; 1980, 95%.
206. Cité par M. MARION, *op. cit.*, p. 540.
207. *Ibid.*, p. 188.
208. *Ibid.*, p. 437.
209. Moscou, AEA 35/6, 381, f^{os} 170—171.
210. Cité par M. MARION, *op. cit.*, p. 541.
211. *Ibid.*, p. 540.
212. Moscou, AEA 13/6, 439, fol. 168 et v^o.
213.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 158.
214. *Ibid.*
215. *Ibid.*, pp. 152—154.
216. Michel CHEVALIER, *Système de la Méditerranée*, 1832, cité par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p. 160—161.
217. T. REGAZZOLA, J. LEFEBVRE, *op. cit.*, p. 165.
218. Pierre BONNET, *La Commercialisation de la vie française du Premier Empire à nos jours*, 1929, p. 82.
219. C. HARMELLE, *op. cit.*, pp. 152 et 162.

220. Georges DUCHÈNE, *L'Empire industriel. Histoire critique des concessions financières et industrielles du Second Empire*, 1869, p. 297.
221. Pierre FUSTIER, *La Route, voies antiques, chemins anciens, chaussées modernes*, 1968, p. 256.
222. Jacques LOVIE, «Chemins de Savoie; la route d'Italie à l'époque romantique (1815 — 1860)», in: *Les Transports de 1610 à nos jours...*, *op. cit.*, p. 80.
223. A. N., F^{IC}III Loiret 7, n°307.
224. Edmond GOT, *Journal...* 1822—1901, II, 1910, p. 245.
225. P. SEIGNOUR, *op. cit.*, p. 91.
226. Elie REYNIER, *Le Pays de Vivarais*, 1934, cité par René NELLI, *Le Languedoc et le Comté de Foix, le Roussillon*, 1958, p. 51.
227.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1977, publié en français sous le titre: *La Fin des terroirs; la modernisation de la France rurale, 1870—1914*, 1983.
228. C. HARMELLE, *op. cit.*
229. *Ibid.*, p. 53.
230. *Ibid.*, p. 93.
231. *Ibid.*, pp. 92—93
232. *Ibid.*, p. 222.
233. Alexis MONTEIL, *Description du département de l'Aveyron*, an X (1802), cité par C. HARMELLE, *op. cit.*, p. 75.
234. *Ibid.*, p. 77.
235. *Ibid.*, pp. 110—111.
236. *Ibid.*, p. 235.
237. *Ibid.*, p. 320.
238. *Ibid.*, pp. 152 et 162.
239. Pierre CAYEZ, référence incomplète.
240. Paul HARSIN, «De quand date le mot industrie?»,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pp. 235—242.
241. C. J. A. MATHIEU DE DOMBASLE, *De l'avenir industriel de la France*, 1835.
242. G. DUCHÈNE, *L'Empire industriel...*, *op. cit.*, p. 45.
243. Lettres au préfet des Côtes-du-Nord, Loudéac, 24 février 1853, et au Préfet du Finistère, Morlaix, 14 janvier 1850, A. N., F¹²4476C.
244. A. N., F^{IC}V Hérault, 3, 1837.

245. Jean-Baptiste SAY,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I, 1966, réimp., pp. 100—101.
246. Pierre BARRAL, "La crise agrico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op. cit.*, IV₁, p. 371.
247. Massimo M. AUGELLO, "II dibattito in Francia su economia e società", in: *Rassegna economica*, janvier 1981, pp. 21—22, et Charles DUNOYER, "Notice historique sur l'industrie", in: *Revue encyclopédique*, février 1827, p. 178.
248. David RICARDO,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1817, pp. 3—8.
249. *Ibid.*, p. 7 note I de Jean-Baptiste SAY, à l'édition de D. RICARDO.
250. Eugène de BOULLAY, *Statistique agricole et industrielle du département de la Saône-et-Loire*, 1849, p. 10.
251. Maria Rafaella CAROSELLI, "I fattori della seconda Rivoluzione industriale", in: *Economia e Storia*, 1978, pp. 389—418.
252. Albert DAUZAT, Jean DUBOIS, Henri MITTERAND, *Nouveau 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et historique*, 1964.
254.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 p. 261.
255. F.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I, pp. 232 sq.
256. Serge CHASSAGNE, "Industrialisation et désindustrialisation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quelques réflexions à partir du textile", in: *Revue du Nord*, janvier-mars 1981, p. 43, note 26.
257. Pierre GEORGE, "Histoire de France, le recours à la terre", in: *Le Monde*, 27 octobre 1984.
258. Béatrix de BUFFEVENT, "Marchands ruraux de l'ancien 'pays de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in: *Le Développement urbain de 1610 à nos jours*, Actes du 100^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Paris, 1975, 1977, pp. 171—184.
259. Pierre LÉON,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entreprise industriel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II, 1970, p. 262.
260. Le mot peut avoir diverses significations, même dans l'industrie d'aujourd'hui comme le souligne Yves MORVAN, *La Concentration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1972, pp. 15 sq. Il peut concerner uniquement la taille de l'unité de production (c'est le cas des manufactures) ou le

rassemblement de métiers divers travaillant à la même production (c'est l'exemple donné ici de Gueugnon).

261. A. N. F¹⁴4481, documents 1 et 7.
262. Christian DEVILLERS, Bernard HUET, *Le Creusot. Naissance et développement d'une ville industrielle 1782—1914*, 1981, pp. 36—49.
263. Adrien PRINTZ, *La Vallée usinière, histoire d'un ruisseau, la Fensch*, 1966, pp. 57—67.
264. *Société lorraine des anciens établissements de Dietrich et Cie, de Lunéville 1880—1950*, 1951, p. 9.
265. Alexandre MOREAU de JONNES, *Etat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depuis Henri IV jusqu' à Louis XIV*, 1867, pp. 59—60.
266.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I, p. 95.
267. *Le Monde des affaires en France de 1830 à nos jours*, 1952, p. 83.
268. Isaac de PINTO, *Lettre sur la jalousie du commerce*, in: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1771, p. 287
269. François VERON de FORBONNAIS, *Principes et observations économiques*, 1767, I, p. 205.
270. Pierre Samuel DUPONT de NEMOURS, *De l'exportation et de l'importation des grains*, 1764, pp. 90—91, cité par Pierre DOCKES, *L'Espace dans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u XVI^e au XVII^e siècle*, 1969, p. 288.
271.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ou de l'Education*, éd. 1961, p. 266.
272. Louis GUENEAU, *Les Conditions de la vie à Nevers (denrées, logements, salair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919, pp. 99 sq.
273.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Meusienne*, avril 1984.
274.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La France de l'Est, Lorraine, Alsace*, 1917, p. 38.
275. André CHAMSON, *Les Hommes de la route*, 1927, p. 76.
276. Gilbert ARMAND, *Villes, centres et organisation urbaine des Alpes du Nord. Le passé et le présent*, 1974, pp. 85—86
277. Pour Laval, Cholet, Saint-Quentin, voir Serge CHASSAGNE, "Industrialisation et désindustrialisation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in: *Revue du Nord*, 1981, pp. 37—40.
278. G. ARMAND, *op. cit.*, p. 92.
279. *Ibid.*, pp. 88—89.
280. Jacques SCHNETZLER, *Les Industries et les hommes dans la région de*

- Saint-Etienne*, 1976, pp. 50—51.
281. Pierre LÉON,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II, 1970, p. 252.
282. *Ibid.*, pp. 252—253.
283. François DORNIC, *Le Fer contre la forêt*, 1984, p. 40.
284. Eugenii K. TARLE, *L'Industrie dans les campagnes en Franc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910, p. 48.
285. S. CHASSAGNE "Industrialisation et désindustrialisation...", art. cit., pp. 49—50.
286. Georges DESBONS, *Capitalisme et agriculture*, 1912, p. 19 et Charles SEIGNOBOS, "L'évolution de la III^e République",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 p. Ernest LAVISSE, VIII, 1921, p. 460.
287. Paul BAIROCH,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sous-développement*, 1974, p. 276.
288. Maurice DAUMAS, *L'Archéologie industrielle en France*, 1980, p. 106.
289. Louis-Marie LOMULLE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de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Guillaume Ternaux, 1763—1833, créateur de la première intégration industrielle française*, 1978, p. 56 note 9.
290. M. DAUMAS, *op. cit.*, p. 98.
291. Jacob van KLAVEREN, "Die Manufakturen des 'Ancien Régime'", in: *Vierteljahrschrift und Sozial-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4, pp. 145 sq.
292. 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5^e éd. 1928, II, p. 731. Cf. aussi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 pp. 259 sq.
293. Pierre LEON,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I, 1970, pp. 237 sq.
294. M. DAUMAS, *op. cit.*, pp. 134—135, A. N., O²871 à 906.
295. Claude PRIS, *La Manufacture royale des glaces de Saint-Gobain 1665—1830*, 1973.
296. M. DAUMAS, *op. cit.*, p. 106.
297. *Ibid.*, pp. 111—114.
298. A. N., G⁷259 f^o 9.
299. M. DAUMAS, *op. cit.*, pp. 98—106.
300. P. LEON,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art. cit., p. 260.

301. *Ibid.*
302. Frédérick Louis NUSSBAUM,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modern Europe*, 1933, pp. 212—213.
303. Rémy CAZALS, *Les Révolutions industrielles à Mazamet 1750—1900*, 1983, p. 79.
304. Louis François DEY de SÉRAUCOURT, *Mémoire sur la généralité de Bourges, dressé par ordre du duc de Bourgogne en 1697*, 1844.
305. P. LEON,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art. cit. , pp. 259 et 243.
306.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II, p. 514.
307. Albert SOBOUL, “La reprise économique et la stabilisation sociale, 1797 — 1815”,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 — années 1980)*, 1976, p. 107; Pierre LEON, “L’impulsion techniqu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op. cit.* , III₂, 1976, p. 485; R. CAZALS, *op. cit.* , p. 114—115.
308. Cf. L. S. MERCIER, *op. cit.* , VII, p. 147.
309.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1755, éd. 1952, p. 36.
310. Pierre BONNET, *La Commercialisation et la vie française du Premier Empire à nos jours*, 1929, p. 12. Walter ENDREI, *L’Evolution des techniques de filage et de tissage du Moyen Age à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968, p. 145.
311. Hervé LE BRAS, *Les Trois France*, 1986, p. 237.
312. P. LEON, “L’impulsion technique”, art. cit. , p. 498.
313. A. PRINTZ, *La Vallée usinière. . .*, *op. cit.* , pp. 57—67.
314.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1979, II, p. 287 et note 341; A. N. , F¹²682(9 janvier 1727).
315. Tihomir J. MARKOVITCH,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Conclusions générales, in: *Cahiers de l’ISEA*, IV, 1966, p. 59.
316. T. J. MARKOVITCH, référence incomplète.
317. Georges d’AVENEL, *Le Mécanisme de la vie moderne*, 3^e série 1900, pp. 215—216.
318. Yves GUYOT, “Notes sur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de la France”, i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1897, p. 287.
319. Marcel GILLET, *Les Charbonnages du Nord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1973, p. 28.

320. G. d'AVENEL, *op. cit.*, p. 214.
321. *Ibid.*
322. Sébastien CHARLETY, référence incomplète.
323. Jean-Antoine CHAPTAL, *De l'industrie française*, II, 1819, cité par P. LEON, "L'impulsion technique", art. cit., pp. 482—483.
324. P. LEON,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art. cit., pp. 239—243.
325. P. LEON, "L'impulsion technique", art. cit., p. 481.
326. Carlo PONI, "Archéologie de la fabrique; la diffusion des moulins à soie *alla bolognese dans les Etats vénitiens des XVI^e et XVIII^e siècles*", communication à la 3^e semaine de Prato, 1971, et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1979, III, p. 476.
327. Charles SINGER, Eric John HOLMYARD, A. Rupert HALL, Trevor. I. WILLIAMS, *Storia della tecnologia*, III, 1963, p. 382.
328. Cité par François CARON, *Le Résistible Déclin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1985, p. 66.
329. Jacques PAYEN, "Machines et turbines à vapeur",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p. p. Maurice DAUMAS, IV, 1978, p. 18.
330. *Ibid.*, p. 118.
331. Jules GUÉRON, "L'énergie nucléaire",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p. p. Maurice DAUMAS, IV, 1978, p. 42.
332. Jacques PAYEN "Machines et turbines à vapeur",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IV, 1978, pp. 46—51 et François CARON, *op. cit.*, p. 67.
333. F. CARON, *op. cit.*, p. 57.
334. François CARON,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 p. Pierre LEON, IV, 1978, pp. 91—92.
335. F. CARON, *Le Résistible Déclin...*, *op. cit.*, p. 87.
336. Louis LEPRINCE-RINGUET, *L'Aventure de l'électricité*, 1983, pp. 46—52.
337. F. CARON,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art. cit., p. 93.
338. Robert MOÏSE et Maurice DAUMAS, "L'électricité industrielle", 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op. cit.*, IV, pp. 418, 364 et 423.
339. Référence égarée.
340. Antoine CAILLOT,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mœurs et usages des Français*, 1827, I, p. 134.
341. *Op. cit.*, article "Commerce", II, p. 113.
342. Nicolas LAMOIGNON de BASVILLE,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 Languedoc*, 1734, p. 39.
343. Moscou, Bibliothèque Lénine, FR374, f° 159.
344. R. CAZALS, *op. cit.*, p. 14.
345. *Ibid.*
346. Louis TRENARD, *Histoire d'une métropole, Lille-Roubaix-Tourcoing*, 1977, pp. 248—249 et 318—319.
347. A. N., G^o 1691, 63.
348. Tihomir J. MARKOVITCH,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Conclusions générales", in: *Cahiers de l'I. S. E. A.*, AFn^o 7, n^o 179, nov. 1966, p. 142.
349. Serge CHASSAGNE, "L'industrie lainière en France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mpériale 1790—1810", in: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olloque A. Mathiez et G. Lefebvre, 1978.
350.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pp. 481 sq.; Pierre BONNET, *La Commercialisation de la vie française du I^{er} Empire à nos jours*, 1929, constatant le retard français en 1814, par rapport à l'Angleterre notamment, range la Révolution et les guerres napoléoniennes parmi les "causes apparentes", les véritables causes étant d'ordre technique, social, législatif et avant tout "l'hégémonie de la terre", bref structurelles, pp. 17—53.
351. Jean BOUVIER, "Industrie et société",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V^e, 1982, pp. 1724—1725.
352. Emile APPOLIS, *Un pays languedocien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le diocèse civil de Lodève*, 1951, p. VI.
353. M. DAUMAS, *L'Archéologie industrielle en France*, 1980, p. 30.
354. *Ibid.*, p. 99.
355. *Ibid.*, p. 106.
356. *Ibid.*, pp. 98—106 et Claude ALBERGE, J.-P. LAURENT, J. SAGNES, *Villevette, une manufacture du Languedoc*, in: *Etudes sur l'Hérault*, 1984, n^o 12.
357. M. DAUMAS, *op. cit.*, pp. 185—186.
358. Walter G. HOFFMANN, *British Industry, 1700—1950*, 1955, cité par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 p. 304.
359. F. BRAUDEL, F. SPOONER,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in: *Cam-*

- 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 454 et 484.
360. T. J. MARKOVITCH,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54*, *op. cit.*, p. 196.
361. Henri SEE, "Esquisse de l'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de 1815 à 1848, les progrès du machinisme et de la concentration", in: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23, n°4, pp. 473—497.
362. P. LEON, "L'impulsion technique", art. cit., p. 479.
363.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I, pp. 69 et 231.
364. T. J. MARKOVITCH, "Salaires et profits industriels en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et le Second Empire)", in: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Cahiers de l'ISEA*, avril 1967, p. 79.
365. T. J. MARKOVITCH,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op. cit.*, p. 86.
366. Conclusions tirées d'un rapport-résumé de T. J. Markovitch rédigé à l'intention exclusive de F. Braudel en 1984 et englobant les résultats essentiels que T. J. Markovitch a tiré de ses sept volumes publiés à ce jour sur *l'Histoire des industries françaises*.
367. Charles SEIGNOBOS, *L'Evolution de la III^e République*,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 p. E. LAVISSE, 1921, p. 460
368. H. LÈ BRAS, *Les Trois France*, *op. cit.*, p. 223.
369. *Ibid.*, p. 236.
370. *Ibid.*, pp. 228—229.
371. Référence égarée.
372. Léonce de LAVERGNE, *E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1877, p. 45.
373. Pierre CHAUNU,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classique*, 1966, pp. 328—329 et 342.
374. *Œuvres économiques de Sir William Petty*, 1905, I, p. 277, cité par Pierre DOCKES, *L'Espace dans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1969, p. 152.
375. Cf. sa correspondance dans les archives de Moscou. Les négociants suisses se chargeaient souvent à Marseille des consulats étrangers, par exemple du Danemark, d'Autriche d'Angleterre;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p. p. Gaston RAMBERT, IV, 1954, pp. 529—530.
376. 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1766, in: *Œuvres de Turgot*, p. p. Eugène DAIRE,

- 1844, rééd. 1966, I, p. 43; A. N. , G⁷1697, 165, 23 décembre 1712.
377. Jean-Claude TOUTAIN,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00 à 1959*, in: *Cahiers de l'ISEA*, AF 3, 1963, tableaux n^{os} 136—137.
378. A. N. , K 1351, *Le compagnon ordinaire des marchands*, 1700.
379. Elie BRACKENHOFFER, *Voyage en France 1643 — 1644*, trad. Henry LEHR, 1925, pp. 115—116.
380. Jean-Claude PERROT, *Genèse d'une ville moderne; Caen au XVIII^e siècle*, I, 1975, p. 182.
381. Claude SEYSSEL, *Histoire singulière du roy Loys XII*, 1558, p. 113.
382. *Journal de voyage de deux jeunes Hollandais (MM. de Villers) à Paris en 1656—1658*, p. p. A. -P. FAUGÈRE, 1899, p. 30.
383. POTTIER de LA HESTROYE, *Réflexions sur la dime royale*, 1716, pp. 104—105.
384. Jacques Joseph JUGE SAINT-MARTIN, *Changements survenus dans les mœ urs des habitants de Limoges*, p. 90.
385. Edmond ESMONIN, "Un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de Grenoble en 1725", in: *Cahiers d'histoire*, 1957, réédité dans *Etudes sur la Franc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64, pp. 429—461.
386. Gilbert ARMAND, *Villes, centres et organisation urbaine dans les Alpes du Sud*, *op. cit.* , p. 83.
387. Maurice BLOCK,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comparée avec les autres Etats de l'Europe*, II, 1860, p. 225.
388. Pierre BONNET, *La Commercialisation de la vie française du Premier Empire à nos jours*, 1929, pp. 170—171 et 173.
389. M. BLOCK, *op. cit.* , II, p. 286.
390.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1969, p. 18; R. M. HARTWE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971, pp. 180 sq.
391.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I, p. 357.
392. Michel MORINEAU, "Quelques recherches relatives à la balance du commerce extérieur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où cette fois un égale deux", in: *Aires et structures du commerce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colloque, Paris, 1973, pp. 1—45.
393. Ruggiero ROMANO, "Documenti e prime considerazioni intorno alla 'balance de commerce' della Francia dal 1719 a 1780", in: *Studio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p. 1291.

394. M. MORINEAU, art. cit. , p. 3.
395. *Mémoires de Jean Maillefer, marchand bourgeois de Reims (1611—1684), continués par son fils jusqu'en 1716*, p. p. Henri JADART, 1890, pp. 10—12.
396.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I, pp. 387—390
397. Robert BIGO, *Les Banques françaises au cours du XIX^e siècle*, 1947, p. 272.
398. Friedrich LUTGE,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6, p. 235.
399. L. BLANCARD,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e commerce de Marseille au Moyen Age*, 1884 (21 mars 1248), cité par Gérard SIVERY, «Les orientations actuelles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 du Moyen Age dans l'Europe du Nord-Ouest», in: *Revue du Nord*, 1973, p. 213.
400. *Ibid.*
401. Jacques ACCARIAS DE SERIONNE, *Les Intérêts des nations de l'Europe développés relativement au commerce*, 1766, I, p. 93.
402. Moscou, A. E. A. , 50/6, 522—105 Amsterdam, 20 sept. et 1^{er} oct. 1784.
403. Dieudonné RINCHON, *Les Armements négriers au XVIII^e siècle, d'après la correspondance et la comptabilité des armateurs et capitaines nantais*, 1955, *passim* et pp. 83, 73 et 75.
404. C'est le cas pour les frères Chaurand, pour onze expéditions de 1783 à 1792, *ibid.* , pp. 128—129.
405. *Ibid.* , p. 12.
406. Louis TURQUET DE MAYERNE, *La Monarchie aristodémocratique ou le gouvernement composé et meslé des trois formes de légitimes Républiques*, 1611, p. 122, cité par Roland MOUSNIER, «L'opposition politique bourgeois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L'œuvre de Louis Turquet de Mayerne», in: *Revue historique*, janvier-mars 1955, p. 64.
407. Jean EON (le père Mathias de Saint Jean), *Le Commerce honorable ou considérations politiques. . . composé par un habitant de la ville de Nantes*, 1646, pp. 21—22.
408. Jean Baptiste PÉRIER, *La Prospérité rochelaise au XVIII^e siècle et la bourgeoisie protestante*, 1899, II, p. 5.
409. B. N. , Fonds Fr.
410. A. N. , F12 116, 99 sq.

411. Immanuel WALLERSTEIN, *Le Système du monde du XV^e siècle à nos jours*, I, *Capitalisme et économie monde 1450—1640*, 1980, p. 120.
412. Marcello CARMAGNANI, *Les Mécanismes de la vie économique dans une société coloniale : le Chili (1680—1830)*, 1973, p. 14.
413.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II, p. 355.
414. Vitorino MAGALHAES GODINHO,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1969;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II, p. 355.
415. Paul ADAM, "Les inventions nautiques médiévales et l'émergenc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moderne", in: *Systèmes économiques et histoire*, dactyl., 1980, p. 58.
416. François DORNIC, *L'Industrie textile dans le Maine (1650—1815)*, 1955, p. 43; Nicolas de LAMARE, *Traité de la police...* , II, p. 725.
417. François DORNIC, *Histoire du Mans et du pays manceau*, 1975, pp. 146—151.
418. A. N., A. E. B1 280 (29 mars 1703).
419. POTTIER DE LA HESTROYE, *op. cit.*
420. A. N., G⁷1687, 33.
421. Jacques SAVARY, *Le Parfait Négociant ou Instruction générale pour ce qui regarde le commerce de toute sorte de marchandise tant de France que des pays étrangers...* , 1675, II, p. 156; voir aussi J. EON, *Le Commerce honorable...* , *op. cit.*, p. 167.
422. Jacques-Marie MONTARAN, cité in: Charles CARRIERE,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au XVII^e siècle*, I, 1973, p. 245.
423. Jean-François BELHOSTE, "Naissance de l'industrie du drap fin en France", in: *La Manufacture du Dijonval et la draperie sédanaise 1650—1850, Cahiers de l'Inventaire*, n^o 2, 1984, p. 14.
424. Régine PERNOUD, *Le Moyen Age jusqu'en 1291*, in: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p. p. Gaston RAMBERT I, 1949, p. 56.
425. A. E., Mémoires et Documents, Turquie, 11. Capitulations; nom donné ordinairement aux traités passés avec les Turcs.
426.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 I, pp. 448—449 et 497;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pp. 137—138.
427. D'après l'enquête du 3 février 1563 et Joseph BLLIoud, "Le commerce de Marseille de 1515 à 1599", in: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II, 1951, p. 445.

428. Louis BERGASSE, "Le commerce de Marseille de 1599 à 1660", in: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V, 1954, pp. 95. 91 et 94.
429. *Le Parfait Négociant*, op. cit. , 1712, II^e partie, pp. 385—387.
430. Robert PARIS, "De 1660 à 1789. Le Levant", in: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V, 1957, pp. 557—564.
431. A. N. , A. E. , Mémoires et Documents, Turquie, 11.
432. André LESPAGNOL, "Saint-Malo port mondial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in: *Histoire de Saint-Malo et du pays malouin*, 1984, p. 113.
433. A. N. , A. E. , B1 211 (9 mai 1669).
434. *Carrera de Indias*: flotte destinée à l'Amérique espagnole dont le trafic, monopole du roi d'Espagne est organisé, contrôlé et protégé militairement.
435. A. LESPAGNOL, *Histoire de Saint-Malo*, op. cit. , p. 79.
436. *Ibid.* , pp. 102 sq.
437. A. N. , A. E. . B1 214, f^o 282.
438. *Ibid.*
439. *Ibid.*
440. *Ibid.* (Cadix, 15 octobre 1702).
441. A. N. , A. E. B1 212 (19 octobre 1682).
442. A. N. , A. E. B1 211 (16 octobre 1672).
443.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 . , p. p. A. M. de BOISLISLE, I, 1874, p. 173, 18 février 1689.
445. Abbé PREVOS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 . , 1753, XI, pp. 47 — 63, Relation du voyage de M. de Gennes.
446. A. N. , Colonies F² A 15 (4 mars 1698).
447. La Basse-Californie, occupée par les Espagnols en 1602, qui fait partie de l'actuel Mexique.
448. A. N. , Colonies F² A 15 (20 mai 1698).
450. *Sol*: on partage d'ordinaire le capital des sociétés en 20 parts dites *sol*, par analogie avec les 20 sols de la livre, monnaie de compte.
451. A. N. , Colonies F² A 15 (17 novembre 1698).
452. *Ibid.* , 19 décembre 1698.
453. Saint-Malo y avait très largement participé ainsi que Dunkerque; A. LESPAGNOL, *Histoire de Saint-Malo*, op. cit. , pp. 114—120.
454. A. N. , Colonies F² A 21, 30 juillet 1702. Sur les inconvénients pour le gouvernement espagnol du commerce entre les Philippines et le Pérou,

- cf.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 p. 169 et note 215.
455. A. N. , Colonies F² A21 , Paris 12 juin 1700.
456. F. BRAUDEL ,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 II, p. 169.
457. A. LESPAGNOL , *Histoire de Saint-Malo, op. cit.* , p. 121.
458. *Ibid.* , p. 124.
459. *Ibid.* , *op. cit.* , p. 123.
460. *Ibid.* , *op. cit.* , pp. 126 — 127; Pierre GOUBERT , “Le tragique XVII^e siècle ” ,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 II, 1970, p. 364.
461. A. N. . F 12 681 106.
462. A. N. , C⁷ 1701 137 f^o 57; Anne MOREL , «Les armateurs malouins et le commerce interlope» , *in: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 p. p. Michel MOLLAT et al. , 1962, p. 313.
463. A. LESPAGNOL , *op. cit.* , pp. 129 sq.
464. Jean MEYER , “Le commerce nantais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 *in: Histoire de Nantes* , p. p. Paul BOIS, 1977, pp. 135 — 136.
466. La partie espagnole de l'île est de 48 000 kilomètres carrés. Cuba de 114 000.
467. Alice PIFFER CANABRAVA , *A industria de açúcar nas ilhas inglesas e francesas do mar das Antilhas (1697—1755)* , 1946, dactylogramme.
468. Jacques SAVARY des BRUSLONS , *Dictionnaire. . . op. cit.* , V, col. 1462.
469. *Ibid.* , V, col. 1456.
470. Ruggiero ROMANO , “Documenti e Prime Considerazioni intorno alla ‘Balance du commerce’ della Francia dal 1716 al 1780” , *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 1957, pp. 1274, 1275, 1291.
471. *Cf. supra* , p. 355.
472. F. BRAUDEL ,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 II, pp. 367 — 368.
473. François CROUZET , “Le commerce de Bordeaux” , *in: Bordeaux au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p. p. François-Georges PARISET , *Histoire de Bordeaux* , V, p. p. Charles HIGOUNET, 1968, p. 233.
474. M. MORINEAU , «Quelques recherches relatives à la balance. . . , art. cit. pp. 32 — 33; Jean CAVIGNAC , *Jean Pellet commerçant de gros, 1694—1772.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négoce bordelais du XVIII^e siècle* , 1967, p. 103.
475. J. -P. POUSSOU , *Bordeaux et le Sud-Ouest au XVIII^e siècle, op. cit.* , p.

476. J. CAVIGNAC, *Jean Pellet. . . , op. cit. , pp. 31 — 32.*
477. Jean-Pierre POUSSOU, «Les structures démographiques et sociales», in: *Bordeaux au XVIII^e siècle. . . , op. cit. , pp. 344 sq.*
478. J. -P. POUSSOU, *op. cit. , pp. 27 et 31.*
479. Pierre DARDEL, *Commerce, industrie et navigation à Rouen et au Havre au XVIII^e siècle, 1966, p. 141.*
480. En pratique, la contrebande anglaise n'a jamais cessé, avec la complicité des habitants qu'elle ravitaillait en farine, bœuf salé, chevaux, mulets. . . Les agents du roi fermaient les yeux le plus souvent. J. CAVIGNAC, *Jean Pellet. . . , op. cit. , pp. 172 — 173.*
481. Charles GIDE,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5^e éd. 1919, I, p. 198.*
482. Maxime RODINSON, *Islam et capitalisme, 1966, p. 27.*
483. Emile SAVOY, *L'Agriculture à travers les âges, I, 1935, p. 119.*
484. René SEDILLOT, *Histoire des marchands et des marchés, 1964, p. 188.*
485. Jacques LAFFITTE, *Réflexions sur la réduction de la rente et sur l'état du crédit, 1824, p. 14.*
486. Joseph CHAPPEY, *La Crise du capital. I: La Formation du système monétaire moderne, 1937, p. 189.*
487. Jean HERAULT, sieur de GOURVILLE, *Mémoires de Monsieur de Gourville, 1665, éd. 1724, II, p. 2.*
488. *Ibid.*
489. Pierre DARDEL, *Commerce, industrie et navigation à Rouen et au Havre au XVIII^e siècle, 1966, p. 159.*
490. François DORNIC, *L'Industrie textile dans le Maine et ses débouchés internationaux (1650—1815), 1955, pp. 182 — 183.*
491.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 II, p. 343.*
494. Les billets émis par Louis XIV et rapidement dépréciés, voire *infra.*
495. A. N. , G⁷1691, 35, 6 mars 1708.
496. Copie de lettre expédiée en Pologne aux Radziwill, Varsovie, AG, AD Radziwill.
498. Jean DUCHE, *Le Bouclier d'Athènes. L'Occident, son histoire et son destin, 1983, p. 487.*
499. Alfred NEYMARCK, «Le développement annuel de l'épargne française»,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u commerce, de l'industrie et de la banque, 1906, p. 7.*

500. Léon SCHICK, *Suggestions pour une reconstruction française*, 1945, pp. 38 sq.
501. Pierre GOUBERT, *op. cit.*
502. Emile VINCENS, *Des sociétés par actions. Des banques en France*, 1837, pp. 117—118.
503. G. THUILLIER, *Aspects de l'économie nivernaise au XIX^e siècle*, 1964, p. 496.
504. Herbert LÜTHY,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1959—1961, I, p. 95.
505. Jean MEYER, *L'Armement nantais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1969, *passim*.
506. Fernand LAURENT, *En Armagnac il y a cent ans. La vie d'un aïeul (1761—1849)*, 1928, ch. X, pp. 198 sq.
507. Moscou, AEA 93/6—428—174, le chiffre paraît énorme. Mais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a Noblesse au XVIII^e siècle*, 1976 (p. 78) confirme, chiffres à l'appui, l'importance des fortunes terriennes de la grande noblesse; "Les revenus des princes, dit-il, se comptent par millions."
508. Béatrice F. HYSLOP, *L'Apanage de Philippe Egalité duc d'Orléans (1785—1791)*, 1965, chapitres I et II.
509. P. LEON,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art. cit., pp. 255—256; G. CHAUSSINAND-NOGARET, *La Noblesse au XVIII^e siècle*, *op. cit.*, pp. 119, 161 et 144.
510. Jean LABASSE, *Les Capitaux et la région. Etude géographique. Essai sur le commerce et la circulation des capitaux dans la région lyonnaise*, 1955, pp. 9 sq.
511. Cité par R. BIGO, *Les Banques françaises au cours du XIX^e siècle*, *op. cit.*, pp. 41—42.
512. E. VINCENS, *op. cit.*, *passim* et pp. 114 sq.
513. R. BIGO, *op. cit.*, p. 41.
514. Jean-Baptiste SAY, "De la production des richesses", in: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réimpression de l'édition 1852, 1966, I, p. 131.
515. *Ibid.*, I, p. 132.
516. J. EON, *Le Commerce honorable. . .*, *op. cit.*
517. Jean-François FAURE-SOULET, *Economie politique et progrès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1750—1789), thèse, 1964, pp. 94—95.

518. Pierre CHAUNU, *op. cit.*
519. Fritz WAGNER, *Europa im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und der Aufklärung*, tome 4 de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p. p. Theodor SCHIEDER, 1968, p. 104.
520. VAN DER MEULEN, *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II, 1779, p. 75.
521. J. -F. FAURE-SOULET, *op. cit.*, p. 101.
522.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II, pp. 266—267.
523. A. N. ,G⁷1622-
525. POTTIER de LA HESTROYE, *op. cit.*, *passim*.
526.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1964, p. 740 et note 3.
527. Michèle SAINT-MARC,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a France, 1800—1980*, 1983, p. 36.
528. Ange GOUDAR, *Les Intérêts de la France mal entendus*, 1756, II, p. 20.
529. A. N. ,G⁷418.
530. A. N. ,G⁷521, 19 novembre 1693.
531. R. BIGO, *op. cit.*, p. 42.
532. *Ibid.*, p. 114.
533. F. BAYARD, *op. cit.*, p. 107; R. GASCON, *op. cit.*, I, p. 188.
534. Albéric de CALONNE, *La Vie agricole sous l'Ancien Régime en Picardie et en Artois*, 1883, p. 70. II cite A. D. Aisne c 765.
535.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I, p. 391.
536. Georges d'AVENEL,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des salaires, des denrées. . . op. cit.*, I, pp. 21—22.
537. M. -T. BOYER, G. DELAPLACE, L. GILLARD, *op. cit.*, p. 123.
538. Maximilien de BETHUNE, duc de SULLY, *Mémoires*, III, éd. 1788, p. 6.
539. Barry E. SUPPLE, "Currency and commerc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décembre 1957, p. 240 note 1.
540. Marie-Thérèse BOYER, Ghislaine DELAPLACE, Lucien GILARD, *Monnaie privée et pouvoir des princes*, dactylogramme, p. 55.
541. Paul RAVEAU, *Essai sur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l'état social en Poitou au XVI^e siècle*, 1931, p. 92.
542. Germain MARTIN, "La monnaie et le crédit privé en Franc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les faits et les théories (1550—1664)", in: *Revue d'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1909, p. 28.

543. Les escalins (déformation française du flamand *schelling*) sont des petites monnaies des pays Bas, subdivisions de la *livre de gros*. La Hollande exporte en quantité à partir de 1680 de "méchants escalins", de très basse qualité. Cf. SAVARY DES BRUSLONS, *Dictionnaire. . .*, *op. cit.*, II, colonne 362.
544. François-Nicolas MOLLIEN, *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1780—1814*, III, éd. 1845, p. 469.
545. Pièce de huit; piastre ou pièce de huit réaux, première pièce d'argent frappée par les Espagnols en Amérique en 1535.
546. La pistole, frappée à partir de 1537 avec l'or importé du Nouveau Monde.
547. A. N., G^o 1622, vers 1706.
548. Jean RIVOIRE, *Histoire de la monnaie*, 1985, p. 33.
549. G. d'AVENEL, *op. cit.*, I, p. 39—40.
550. J. RIVOIRE, *op. cit.*, p. 21.
551. G. d'AVENEL, *op. cit.*, I, pp. 37.
552. F. BRAUDEL, *Civ mat.* I, p. 410.
553. Richard GASCON,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au XVI^e siècle. Lyon et ses marchands*, 1971, II, p. 760.
554. M. MARION,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op. cit.*, p. 384.
555. José GENTIL DA SILVA, *Banque et crédit en Italie. . . op. cit.*, I, 1969, p. 284.
556. A. GOUDAR, *op. cit.*, II, p. 120.
557. Charles DUPIN, *Le Petit Producteur français*, I, 1827, p. 21.
558. *Société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u Périgord*, 1875, p. 50 et 1880, p. 397, cité par G. d'AVENEL, *op. cit.*, I, p. 37.
559. G. d'AVENEL, *op. cit.*, I, p. 35.
560. André PIOGER, *Le Fertoi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73, p. 196.
561.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1979, II, pp. 71—72.
562. R. SEDILLOI, cité par M. SAINT-MARC, *op. cit.*, p. 208.
563. Traian STOIANOVITCH,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dactylogramme, pp. 68—69.
564. E. H. PHELPS-BROWN et S. V. HOPKINS, "Wage-Rate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16th Century", in: *Economica*,

- XXIV, 1957, p. 298, cité par Immanuel WALLERSTEIN, *Le Système du monde du XV^e siècle à nos jours*, I; *Capitalisme et économie-monde, 1450 — 1640*, 1980, p. 79.
565. Jean MEUVRET,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t utilisation économique de la monnaie dans la France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 in: *É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recueil d'articles*, 1971, p. 132 et note 8.
566. Marquis d'ARGENSON, *op. cit.*, p. 56,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 p. 376 et note 157.
567. José GENTIL DA SILVA, *Banque et crédit...*, *op. cit.*
568. Jean MEUVRET, "La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des temps difficiles", in: *É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71, p. 27.
569. F. MOLLIEN, *op. cit.*, III, pp. 471 — 472.
570. *Ibid.*, p. 478.
571. R. GASCON, *op. cit.*, II, pp. 569 — 570.
572. Yves-Marie BERCE, *Histoire des croquants*, 1974, I, p. 42 note 105.
573. José GENTIL DA SILVA, *Banque et crédit en Italie au XVII^e siècle*, 1969, p. 404;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 pp. 374 — 377.
574. Georges DUCHÊNE, *L'Empire industriel. Histoire critique des concessions financières et industrielles au Second Empire*, 1869, *passim*; Lysis (pseudonyme de Eugène LETAILLEUR), *Les Capitalistes français contre la France*, 1916.
575. Jean BUVAT, *Journal de la Régence*, B. N., Ms. Fr. 10283 III, pp. 1352 — 1409. Je mets en cause la partie non publiée du *Journal*, intitulé *Idées générales du nouveau système des finances*.
576. Isaac de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1771, p. 148.
577. A. N., G⁷1622, vers 1706.
578. Guy THUILLIER, "La réforme monétaire de 1785", in: *Annales E. S. C.*, sept. - oct. 1971, p. 1031 note 3; H. LÜTHY, *op. cit.*, II, pp. 687 — 698 et 706.
579. *Journaux inédits de Jean DESNOYERS et d'Isaac GIRARD*, p. p. Pierre DUFAY, 1912, p. 90 note 2.
580. Jean BOUVIER, "Vers le capitalisme bancaire: l'expansion du crédit après Law",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 p.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II, 1970, p. 302.
581. A. N., F¹³242; Article du *Moniteur* du 30 septembre 1838.
582. Jean RIVOIRE, *Histoire de la banque*, 1984, p. 50.

583. Jean BOUVIER, "Rapports entre systèmes bancaires et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dans la croissance européenne du XIX^e siècle", in: *L'Industrialisation en Europe au XIX^e siècle*, colloque C. N. R. S., Lyon, 7-10 octobre 1970, 1972, p. 117.
584. Jean TRENCHANT, *L'Arithmétique*, 1561, p. 342, cité par Marie-Françoise BOYER, Ghislaine DELAPLACE, Lucien GILLARD, *Monnaie privée et pouvoir des princes* (dactylogramme), p. 20.
585. 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in: *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XIV, 1847, p. 306.
586. Jean BOUCHARY, *Le Marché des change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1937, p. 37.
587. R. MOLLIER, *op. cit.*, p. 69.
588. Félix RUIZ MARTIN,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1965.
589. M.-Th. BOYER, G. DELAPLACE, J. GILLARD, *op. cit.*, p. 235.
590. Ferdinand GALIANI,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grains*, in: *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XV; *Mélan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II, réimpression de l'édition 1848, 1966, p. 51.
591. J. SAVARY, *op. cit.*, I, p. 187.
592. F. RUIZ MARTIN, *Lettres marchandes*, ..., *op. cit.*, lettre du 30 mars 1590.
593. F. MOLLIER, *op. cit.*, III, p. 471.
594. M.-Th. BOYER, G. DELAPLACE, L. GILLARD, *op. cit.*, pp. 115-116.
595. *Ibid.*, pp. 302-303.
596. *Référence égarée.*
597.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Mémoires*, II, éd. La Pléiade 1969, p. 1029.
598. Adolphe VUITRY, *Le Désordre des finances et les excès de la spéculation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IV et au commencement du règne de Louis XV*, 1885, pp. 27-28.
599. Jean BOUVIER et Henry GERMAIN-MARTIN, *Finances et financiers de l'Ancien Régime*, 1969, p. 6.
600. J. BOUVIER, H. GERMAIN-MARTIN, *op. cit.*, p. 5.
601. *Mercure de France*, XI, p. 557.
602. J. BOUVIER, H. GERMAIN-MARTIN, *op. cit.*, p. 40.
603. Georges MONGREDIEN, *L'Affaire Fouquet*, 1956, pp. 240 sq. Daniel

- DESSERT, *Argent, pouvoir et société au Grand Siècle*, 1984, à propos du procès, précise que l'on a préféré ne pas aller au fond des choses, pour ne pas compromettre de grands personnages, dont Mazarin et Colbert lui-même (pp. 279—310).
604. Françoise BAYARD, *Finances et financier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1598 — 1653)*, dactyl., 1984, p. 1851; D. DESSERT, *op. cit.*, p. 365.
605. D. DESSERT, *op. cit.*, p. 209.
606. *Ibid.*, p. 207.
607. Jean BODIN et Claude de RUBYS, cités par Henri HAUSER et Augustin RENAUDET, *Les Débuts de l'âge moderne*, 1938, pp. 572—573.
608.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 pp. 339—343.
609. H. HAUSER et A. RENAUDET, *Les Débuts...*, *op. cit.*, p. 573.
610. Sur Zamet, sa carrière surprenante, sa familiarité avec Henri IV, voir la thèse dactylographiée de F. BAYARD, *op. cit.* IV, pp. 1141—1146.
611. Henri HAUSER,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559", in: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1930, pp. 241 sq., cité par I. WALLERSTEIN, *Le Système du monde*, *op. cit.*, p. 167.
612. Lettre de Bernard à Chamillart, 12 octobre 1707, citée par H. LUTHY, *op. cit.*, I, p. 121.
613. *Ibid.*, I, p. 122.
614. *Ibid.*, I, p. 111.
615. *Ibid.*, I, p. 121.
616. Jacques de SAINT-GERMAIN, *Samuel Bernard, le banquier des rois*, 1960, p. 193.
617. H. LUTHY, *op. cit.*, I, p. 195.
618. *Ibid.*, I, pp. 283—285.
619. *Ibid.*, I, pp. 414—415.
620. Adophe THIERS, *Histoire de Law*, 1858, pp. 175 et 178.
621. A. d. S. Florence, Francia f^o 105 v^o.
622. Jean-Paul SOISSONS, *Notaires et sociétés*, 1985, pp. 309 sq; Earl J. HAMILTON, *Prices and wages at Paris under John Law's Syste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1 1936 — 1937, pp. 30 — 69) et Prices and wages in Southern France under John Law's System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IV. 1934 — 1937, pp. 442—461)*.

623. J. BOUVIER, «Vers le capitalisme bancaire; l'expansion du crédit après Law», art. cit. , p. 321.
624. Georges PARISET, *Le Consulat et l'Empire*, 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 p. E. LAVISSE, III, p. 40.
625. Bertrand GILLE, *La Banque et le crédit en France de 1815 à 1848*, 1959, p. 41.
626. *Ibid.* , p. 39.
627. *Ibid.* , p. 40.
628. *Ibid.* , pp. 46—47.
629. Jean SAVANT, *Tel fut Ouvrard, le financier providentiel de Napoléon*, 1954.
630. Charles DUPIN, *Le Petit Producteur français*, I, 1827, pp. 5 sq.
631. Cité par Jean BOUVIER, "Les premiers pas du grand capitalisme français. Le système de crédit et l'évolution des affaires de 1815 à 1848", in: *La Pensée*, n° 72, mars-avril 1957, II, p. 67.
632. B. GILLE, *op. cit.* , pp. 52—54.
633. F. DUCUING, *De l'organisation du crédit en France*, 1864, p. 80, cité par R. BIGO, *op. cit.* , p. 124.
634. R. BIGO, *op. cit.* , p. 125 note 1.
635. Guy PALMADE,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tes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1961, p. 122.
636. R. BIGO, *op. cit.* , pp. 125—126.
637. G. PALMADE, *op. cit.* , pp. 133—134.
638. *Ibid.* , p. 128.
639. R. BIGO, *op. cit.* , p. 40.
640. Maurice LÉVY-LEBOYER, "Le crédit et la monnaie; l'évolution institutionnel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I₁, pp. 354—355.
641. *Ibid.* , pp. 362—363.
642. *Ibid.* , pp. 372—373.
643. Rondo CAMERON, *La Fr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1800—1914*, 1971, pp. 128—130.
644. Jean BOUVIER, *Les Rothschild*, 1967, pp. 199 sq.
645. M. LÉVY-LEBOYER, "Le crédit et la monnaie. . .", art. cit. , pp. 393—400.
646. Maurice LÉVY-LEBOYER, "La spécialis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 bancaire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 , III, *op. cit.* , pp. 470—471.
647. M. LEVY-LEBOYER, “Le crédit et la monnaie. . . ”, art. cit. , p. 353.
648. *Ibid.* , p. 395.
649. Jean BOUVIER, “Les profits des grandes banques françaises des années 1850 jusqu’à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Studi Storici*, avril-juin 1963, pp. 223—239.
650. D. DESSERT, *op. cit.* , p. 80.
651. *Ibid.* , p. 88.
652. *Ibid.* , p. 71.
653.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es Financiers du Languedoc au XVIII^e siècle*, 1970, p. 236.
654. A. GOUDAR, *op. cit.* , I, pp. 70—71 et note.
655. F. BAYARD, *op. cit.* , p. 918.
656. M. LEVY-LEBOYER, “Le crédit et la monnaie. . . ”, art. cit. , p. 350.
657.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 , III, p. 166.
658. Séville, A. N. Marine B7 226, cité par E. -W. DAHLGREN,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maritimes entre la France et les côtes de l’océan Pacifique (commencement du XVIII^e siècle)*. I. *Le commerce de la mer du Sud jusqu’à la paix d’Utrecht*, 1909, p. 36 et note 1.
659. En particulier d’Emile BOURGEOIS.
660. Claude-Frédéric LEVY, *Capitalistes et pouvoir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II. *La Révolution libérale 1715—1717*, 1979, p. 10.
661.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III, 1782 pp. 198—199.

总结论

1. VAUBAN, *op. cit.* , p. 164.
2. P. BONNAUD *op. cit.* , II, p. 23.
3. G. THUILLIER *op. cit.* , p. 82.
4. Elisabeth CLAVERIE, Pierre LAMAISON, *L’Impossible Mariage. Violence et parenté en Gévaudan*, 1982, p. 339. *Les Financiers de Languedoc au XVII^e siècle*, 1970.